

# 近代中國史稿

《近代中國史稿》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







# 近代中国史稿

上 册

《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

人 民 出 版 社



##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

## 毛主席语录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

本书是在（按校名笔划为序）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学院和南开大学合编《近代中国史稿》教材的基础上，由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公司工人理论组、六院校部分中国近代史教师修改而成的。

在编写过程中，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从研究指导思想、拟定编写提纲、修改定稿到绘制地图，始终同我们并肩战斗；并曾得到工农兵和专业工作者的热情帮助，吸取了有关著述的研究成果，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  
一九七五年国庆节于北京师范学院、南开大学



# 目 录

## 上 册

<b>第一章 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b> .....	1—88
第一节 贩毒与禁毒的斗争 .....	1
一、腐烂的天朝和外国侵略者 .....	1
二、罪恶的鸦片贸易 .....	7
三、禁烟与反禁烟的斗争 .....	13
第二节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战与抚两条路线的 斗争 .....	22
一、英国发动侵略战争 .....	22
二、“战”与“抚”的斗争 .....	26
三、三元里抗英凯歌 .....	40
四、清政府卑屈投降 .....	47
第三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和人民 的继续反抗 .....	53
一、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沉沦 .....	53
二、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的胜利 .....	61
第四节 龚自珍、魏源的变法革新、抵御侵略的 思想 .....	70
一、“九州生气恃风雷” .....	70
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	79
<b>第二章 蓬勃兴起的太平天国革命</b> .....	89—171

第一节 革命的酝酿和发动 .....	89
一、社会矛盾的激化 .....	89
二、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 .....	94
三、农民革命的宣言书 .....	99
四、风烟滚滚的紫荆山 .....	103
第二节 武装夺权与胜利进军的高潮 .....	108
一、金田起义 .....	108
二、永安建制与反颠覆斗争 .....	113
三、挺进两湖与奠都南京 .....	118
四、北伐和西征 .....	125
第三节 各地各族人民响应太平天国的起义 .....	132
一、江南天地会起义 .....	132
二、北方捻军起义 .....	137
三、云贵各族人民起义 .....	141
第四节 内政外交与反孔斗争的高峰 .....	145
一、革命政权的建设 .....	145
二、天朝田亩制度 .....	154
三、内政与外交 .....	160
四、农民阶级反孔斗争的高峰——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	167
<b>第三章 反对英法联军侵略和沙俄鲸吞中国大片领土的斗争 .....</b>	<b>172—232</b>
第一节 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 .....	172
一、可耻的“修约”讹诈 .....	172
二、极端不义的战争与《天津条约》 .....	178
三、津、京陷落和《北京条约》 .....	184
四、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	192
第二节 反对沙俄鲸吞中国大片领土的斗争 .....	199
一、沙俄侵占中国东北和西北大片领土 .....	199

二、人民的反抗浪潮 .....	210
第三节 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勾结 .....	215
一、北京政变和“借师助剿” .....	215
二、列强加强控制清政府 .....	225
<b>第四章 太平天国英雄们为保卫农民政权而斗争…</b>	<b>233—311</b>
第一节 粉碎反革命政变和发动防御中的攻势 …	233
一、短命的反革命政变 .....	233
二、团结战斗，“革故鼎新” .....	241
三、三河大捷，东征凯歌 .....	246
第二节 反对李秀成投降路线和抗击中外反动派 的联合进攻 .....	253
一、坚持农民专政 .....	253
二、维护集中统一 .....	261
三、保卫安庆的浴血奋战 .....	266
四、坚决反对外国干涉 .....	272
五、英勇悲壮的天京保卫战 .....	282
第三节 封建统治者的反攻倒算和各族人民的继 续战斗 .....	287
一、“隆礼”复辟 .....	287
二、前赴后继，坚持战斗 .....	293
第四节 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	300
一、单纯农民战争高峰 .....	300
二、农民不能成为革命的正确的领导者 .....	306
<b>第五章 中国社会加速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早期的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b>	<b>312—368</b>
第一节 外国资本主义卵翼下的洋务活动 .....	312
一、秉承洋人旨意的“借法自强” .....	312
二、卖国主义的洋奴哲学 .....	328

三、早期的官僚买办阶级	333
<b>第二节 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b>	338
一、中国社会经济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338
二、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	344
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351
<b>第三节 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伟大的无产阶级的诞生</b>	359
一、社会基础和突出优点	359
二、早期的斗争	366
<b>第六章 保卫祖国边疆，反对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b>	369—420
<b>第一节 反对沙俄侵略中国西部边疆</b>	369
一、讨伐阿古柏入侵新疆	369
二、沙俄侵占伊犁和《伊犁条约》	375
三、沙俄侵占中国帕米尔	380
<b>第二节 反对美、日侵略台湾和英国侵略西南边疆</b>	384
一、日、美侵略中国台湾省	384
二、“马嘉理事件”和《烟台条约》	388
三、英军侵藏和西藏人民抗英斗争	391
<b>第三节 反对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b>	394
一、中越人民联合抗法	394
二、中、法陆路和海上战争	398
三、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411
<b>第七章 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b>	421—492
<b>第一节 反对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b>	421
一、日本蓄意挑起侵华战争	421
二、投降路线下的清军溃败	428

三、人民群众的抗日烽火 .....	446
第二节《马关条约》与所谓“干涉还辽” .....	450
一、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	450
二、沙俄导演下的三国“干涉还辽” .....	456
第三节 反对日本霸占台湾省的斗争 .....	460
一、英勇悲壮的反割台斗争 .....	460
二、连绵不断的台湾各族人民大起义 .....	468
第四节 瓜分狂潮和人民的反抗 .....	473
一、沙俄最先伸出魔掌 .....	473
二、划分势力范围和“门户开放”政策 .....	481
三、中国人民反瓜分浪潮 .....	489

## 下    册

<b>第八章 戊戌维新运动</b> .....	493—569
第一节 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和改良的两条路线 .....	493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	493
二、孙中山与兴中会 .....	498
三、康有为与“公车上书” .....	502
四、维新运动的高涨和帝国主义的阴谋 .....	512
第二节 尊法维新与尊孔守旧的大论战 .....	522
——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	
一、爱国与卖国 .....	522
二、变成法与“祖宗之法不可变” .....	525
三、君民共主与君主专制 .....	530
四、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 .....	534
第三节 百日维新与顽固派政变 .....	542
一、改良派的幻想 .....	542
二、那拉氏的屠刀 .....	553
三、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 .....	560

<b>第九章</b>	<b>伟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b>	570—660
第一节	瓜分声中义和团狂飙突起	570
一、侵略激起了反抗	570	
二、广大群众的反帝爱国组织	580	
三、席卷全国的农民反帝大风暴	590	
第二节	反抗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605
一、帝国主义联合发动侵华战争	605	
二、清朝营垒的破裂和资产阶级各派系的活动	611	
三、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	625	
第三节	粉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	637
一、中外反动派绞杀义和团和《辛丑条约》的订立	637	
二、义和团高举“扫清灭洋”大旗继续战斗	648	
三、义和团的历史功绩	655	
<b>第十章</b>	<b>粉碎沙俄的“黄俄罗斯”迷梦和抗击英、俄     侵略西藏</b>	661—705
第一节	反对沙俄独霸中国东北的“黄俄罗斯” 计划	661
一、“黄俄罗斯”计划的险恶用心	661	
二、沙俄假“废约”、真侵占的诡计	667	
三、“御俄寇”，“复国土”	672	
第二节	列强角逐东北和人民的英勇反抗	677
一、日俄战争与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争夺	677	
二、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俄侵略者	684	
第三节	英、俄争霸西藏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690
一、英、俄在中国西藏的激烈争夺	690	
二、抗击英、俄侵略西藏的斗争	698	
<b>第十一章</b>	<b>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b>	706—798
第一节	革命风潮一日千丈	706

一、 “洋人的朝廷”	706
二、 群众斗争风起云涌	714
三、 革命、保皇决分二途	724
四、 民主潮流浩浩荡荡	731
<b>第二节 孙中山创建同盟会及其三民主义</b>	<b>742</b>
一、 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	742
二、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749
<b>第三节 “革”与“保”的路线斗争</b>	<b>758</b>
——近代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一、 革命派和保皇派的大论战	758
二、 回击尊儒反法逆流	767
三、 论战的意义和局限	773
<b>第四节 哀求立宪和武装反清</b>	<b>778</b>
一、 围绕预备立宪的论争	778
二、 立宪派的叩头请愿	784
三、 革命派的武装起义	789
<b>第十二章 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b>	<b>799—882</b>
<b>第一节 武昌起义天下应</b>	<b>799</b>
一、 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	799
二、 铁路风潮鼎沸腾	805
三、 武昌起义全国响应	812
<b>第二节 建立政权的斗争和南京临时政府</b>	<b>822</b>
一、 袁世凯东山再起	822
二、 新政府和旧人物	827
三、 创建南京临时政府	839
<b>第三节 袁世凯窃国</b>	<b>849</b>
一、 和谈阴谋	849

二、诱骗和逼宫	856
三、争都与复辟	862
第四节 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867
一、值得纪念的丰功伟绩	867
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	870
<b>第十三章 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斗争</b>	<b>883—996</b>
第一节 反击袁世凯尊孔复辟逆流	883
一、反攻倒算和“二次革命”	883
二、投靠洋大人，充当儿皇帝	897
三、掀起尊孔复古逆流	902
四、“洪宪帝制”丑剧	913
五、全国人民反复辟怒潮	920
第二节 短命的张勋复辟和段祺瑞的反动统治	935
一、军阀割据	935
二、张勋复辟和段祺瑞卖国	939
三、人民群众的反军阀斗争和孙中山的“护法运动”	950
第三节 反对俄、英侵略中国边疆的斗争	956
一、挫败沙俄侵略内外蒙古	956
二、抗击沙俄侵略新疆	963
三、粉碎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	966
第四节 中国革命的新曙光和近代第四次思想解放潮流	969
一、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	969
二、无产阶级开始向自为阶级过渡	978
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983

# 第一章

## 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

### 第一节 贩毒与禁毒的斗争

#### 一、腐烂的天朝和外国侵略者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也“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sup>①</sup>，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sup>②</sup>几千年来，中国各族人民为了反抗黑暗势力的统治和外来民族的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在中国人民革命史册上，谱写了光辉壮丽的篇章。几千年来，中国各族人民又以自己辛勤的劳动，耕耘和灌溉着祖国的大地，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创造了世界上先进的经济和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半个世纪，已进入衰落末世；统治中国的清王朝，经过“康乾盛世”，已明显趋于没落。正如《红楼梦》中有句话说的那样：“外面的架子虽没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清代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龚自珍则

---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横排一卷本（下同），第584、58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586页。

形象地概括这个封建“衰世”是：“将萎之华，惨于槁木。”<sup>①</sup>

这时，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剥削农民，依然是主要生产关系的基础，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旧是基本经济结构。但是，在这个封建社会母胎内，从明朝中叶开始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江南地区的丝织、棉纺织、陶瓷、采铜、冶铁、制茶、造纸等行业中，已有或大或小的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这些资本主义萌芽，在自然经济中，虽似汪洋大海中的孤岛，但它却有力地冲击着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桎梏。这表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必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这时，建筑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弥漫着腐烂的气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颙琰（嘉庆）、旻宁（道光）昏愦无能，残民以逞。一些封疆大吏，对侵扰中国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奉讲“忠恕”，养痈遗患。参与大政决策的枢机之臣，哼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的调子，因循守旧，反对革新。由儒生而步青云的显贵，活象鹦鹉，只会“子曰”、“诗云”，唱着“古圣先贤”的陈词滥调。那些掌握财权的库臣，又都是盗窃的里手，理财的拙夫。真是“文官爱钱又惜死，武官惜死又爱钱”。整个清王朝百孔千疮，每况愈下。

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由于地主、贵族和皇室大肆兼并土地，贪婪地聚敛财富，形成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广大农民失去土地，纷纷破产。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举行连续

---

<sup>①</sup>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7页。

不断的起义。一七九六年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持续了九年，革命烽火燃遍鄂、川、豫、陕、甘五省。一八一三——一八四年的天理教起义，波及豫、鲁、冀等地，京郊的一支农民起义军，杀进了皇宫（紫禁城），在隆宗门一带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现在隆宗门匾额上还保存着一支当年他们射向阶级敌人的箭头。这是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遗迹。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已经动摇。地主阶级总头子颙琰惊恐万状，悲呼哀号：这是汉、唐、宋、元、明以来“未有之祸”。他急忙下诏“罪己”，妄图欺骗群众，稳住阵脚。

这时，清朝反动统治者，为了维持腐朽的封建统治，在加强武力镇压农民反抗的同时，竭力抓住孔孟之道作为救命稻草，疯狂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思想内容的程（颐）朱（熹）理学，用这套精神枷锁来禁锢人民，强化地主阶级专政。他们规定仍然以孔孟之道作为科举取士的内容依据，同时继续推行以注释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的考据学，借以牢笼知识分子，培养为清朝尽忠效劳的奴才。清朝统治阶级“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



镇压农民的“奉宪永禁顽佃  
积弊碑”碑文拓片

样强迫人民信奉”<sup>①</sup>，对“伦理纲常”的任何微弱反抗，就被诬蔑为“大逆不道”，就有杀身之祸。笼罩着当时清朝思想政治领域的，就是这么一片“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

正当清朝国势日益衰微、江河日下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却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已成为奔走全球、寻找殖民地的头等侵略国了。英国在十七世纪中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末叶开始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工业更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起来。以棉织业的用棉量和生铁的产量为例：一七七一——七七五年，英国加工的棉花仅为五百万磅，一八四一年便达到五亿二千八百万磅，即鸦片战争前七十年间猛增了一百倍；一七九六年生铁的生产数字为十二万五千吨，到一八四〇年增加到一百三十九万吨，即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增长了十一倍。

法国经过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工业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到十九世纪的三十至四十年代，它的煤铁产量和棉毛织品的产量有了很大的增长。美国经过十八世纪独立战争后，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权，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较晚，它远远落后于英、法两国，但它从工业革命以后，就以海盗式的向外侵略而闻名于世界。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猛烈增长，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起来。一八二五年，在英国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对内加紧榨取工人阶级

---

<sup>①</sup>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788页。

和其他劳动人民，对外发动掠夺殖民地的战争，以夺取新的市场。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的特性时，指出资本主义具有无限扩张的倾向，他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sup>①</sup>中国这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盈，但又十分落后的封建帝国，早就引起了欧美殖民主义者馋涎欲滴，成为他们的侵略对象。

欧美殖民者早在十六世纪便由海道侵入中国，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掠夺和侵略活动。一五一四年葡萄牙海盗船第一次闯到我国广东。一五五七年葡萄牙强租我国澳门，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随后，西班牙（一五七五年）、荷兰（一六〇一年）、英国（一六三七年）、法国（一六六〇年）、美国（一七八四年）接踵而至，相继闯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犯下了一系列血腥罪行，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坚决反抗。

十七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侵入中国东北。沙皇俄国本来是一个欧洲国家，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才以莫斯科为中心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与中国并不接壤。一五八一年沙俄越过乌拉尔山，迅速向东扩张，在短短半个世纪中吞噬了西伯利亚的大部。从一六四三年起，沙俄侵略者进一步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筑垒屯兵，蓄谋把我国黑龙江以北地区据为己有，并一度武装侵入松花江流域。清政府多次向沙俄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沙俄侵略军撤出中国领土，但俄方置之不理。清政府为了捍卫领土主权，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在当地广大人民支持下，大败俄军，收复失地，制止了沙俄侵略势力在黑龙江流域的

---

<sup>①</sup>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545页。

扩张行径。一六八九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会谈，经过平等协商，中国方面作了重大让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东段以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和外兴安岭至海为界，东面乌第河以南、外兴安岭以北为待议地区，肯定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包括库页岛，均为中国领土。一七二七年签订的《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确定了中、俄两国中段边界（这段边界目前大部分已成为蒙苏边界）。至于西段，当时的中国的疆界在巴尔喀什湖，同沙皇俄国的疆界相距还很远。

清政府为了抵抗欧美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防范外国人支持国内的反清势力，于一七五七年实行了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关闭对外贸易的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关，只许广州一口通商；设立“公行”制度，由公行包办一切进出口贸易，代缴和承保外商税饷，负责政府与外商的交涉事宜；限制输出货物的品种和数量；限制外商的活动。清政府采取对外国的“闭关政策”在当时是中国方面所可能采取的必要的自卫措施。

但是，“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sup>①</sup>。为了掠夺中国，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英国资产阶级首先使用了“商品重炮”，妄图用它来轰开中国的大门。在一七六〇——一八三三年的七十多年间，英国向中国大量倾销毛织品、金属制品等商品，致使英国对华出口贸易额增加了十五倍；同时，又从中国大肆搜刮茶叶、生丝、土布及其它土特产，致使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贸易额也增加了九倍多。

然而，中国的大门不是英国毛织品等“商品重炮”所能轻易

---

<sup>①</sup>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下同），第4卷，第390页。

打开的。首先，因为以男耕女织为核心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具有顽强的抵抗力。“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sup>①</sup>农民并不急需当时的外国机器制造品，也根本没有能力来购买它。整个说来，中国市场的规模还是很狭小的。其次，因为当时欧美工业革命在生产上的效果尚未充分显现出来，英国本土的“王牌商品”——毛纺织品，还不够精美、便宜，无力冲破中国自然经济的藩篱。英国工业品很难在中国大量销售。可是，由于中国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中国的茶叶、丝、土布及其它土特产，却在西方销路畅通。因此，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直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仍旧出超二百至三百万两以上。这样，欧美资产阶级为了获取中国的茶、丝，就不得不拿出大量的白银来，当时每年平均约在一百至四百万两之间。英、美资产阶级为了改变这种十分不利的贸易逆差，冲破中国自然经济的藩篱，最大限度地掠夺中国人民，经过精心策划，向中国倾销一种“特殊商品”——杀人不见血的毒品鸦片。

## 二、罪恶的鸦片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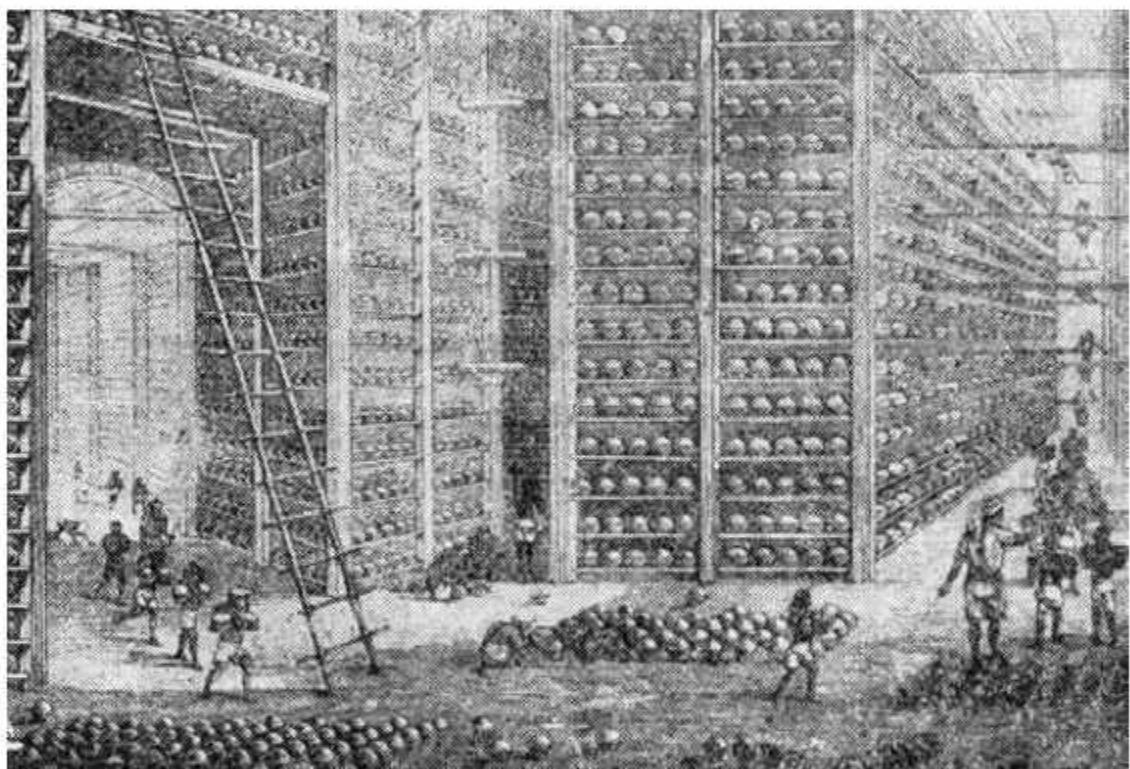
鸦片是从罂粟（又称阿芙蓉）中提炼的，俗称大烟，出产于印度、小亚细亚一带，可作药材少量使用，但它含有大量使人麻醉的毒素，一抽上瘾，就会使人慢慢骨瘦如柴、精神萎靡。在一七六七年以前，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数量不超过二百箱（每箱约重一百三十三磅）。当时清政府许可输入少量鸦片以供医

---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6—587页。

疗使用。

一七七三年，英属印度政府（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确立了鸦片侵华的政策。为了保证这一可耻的侵略政策的充分实现，一七七三年和一七九七年，英属印度政府又先后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sup>①</sup>在印度的鸦片专卖和制造特权。东印度公司利用这些特权强迫和用贷款引诱印度农民种植罂粟，并设厂大量制造



东印度公司鸦片制造厂仓库

鸦片。鸦片制成功后，通过英属印度政府的官吏在市场上公开拍卖给商人，然后偷运进中国。东印度公司在每箱鸦片上的费用不到二百五十卢比，而在加尔各答市场上的拍卖价格却高达一

<sup>①</sup> 东印度公司是一六〇〇年——一八五八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推行殖民掠夺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它拥有军队和舰队。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在长期中，东印度公司掌握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行政权。

千二百一十至一千六百卢比<sup>①</sup>，超过原来成本的六倍。英国的印度殖民政府，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鸦片税成了英国的印度殖民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宗，一八三〇年约占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鸦片贩子把鸦片由印度偷运进中国，既不需要纳税，又能拿到中国烟贩的预购烟款，既稳妥，又能牟取暴利。英国鸦片贩子泰勒就说过：“鸦片同金子一样，任何时候我都能卖掉。”<sup>②</sup>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查顿在信件上说，在最好的年头，每箱鸦片的利润可高达一千银元。

肮脏罪恶的鸦片贸易，不仅使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政府、鸦片贩子可获得暴利，而且与英国政府和整个英国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英国强迫印度生产鸦片，换取中国白银，借以扩大英国工业品在印度的销路。印度用种植鸦片的收入购买英国纺织品，英国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丝，运销英国和世界各地。可见，在英国——印度——中国，即棉纺织品——鸦片——茶、丝，这循环转贩的“三角贸易”关系中，鸦片起着重要作用。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就是紧紧抓住鸦片贸易这个环节，把英国——印度——中国“三角贸易”链条带动了起来，从而使自己取得了一箭双雕的便宜：既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在印度大量推销出去，又把自己需要的茶、丝从中国大量购运进来。例如，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三五年的二十一年间，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纺织品，从不到一百万码增加到五千一百万码，这主要是靠印度农民被迫种植鸦片的收入来购买的。一七九三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购进中国的茶叶，从一千六百万磅增加到三千万磅以上，这主要是靠鸦片走私换来的。而大量进口茶叶，又使

---

① 银洋和卢比的比价，一八一七年为100：206。

② 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8页。

英国政府获取丰厚的茶税收入。一八三三年一年英国的茶叶税收即高达三百三十万镑。因此，只要鸦片贸易这个环节越来越扩大，“三角贸易”这个链条就会越转越快，英国资产阶级腰包中的利润就会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侵略者煞费苦心地坚持可耻的鸦片走私的秘密所在。

正是在英国的印度殖民政府的大力扶植和鸦片暴利的刺激下，鸦片就象一股黑色毒流，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由一七六七年的二百箱，到一八三七年的三万九千箱。总计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共偷运进中国的鸦片不下四十二万七千箱，从中国掠夺走了三至四亿银元。这是世界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一笔可耻掠夺账！

美国鸦片走私也十分猖獗。十九世纪上半期，在广州的美商几乎无不经营鸦片走私。他们从土耳其和波斯搜罗鸦片，贩运到广州，在一八〇六——一八三四年的二十九年间，根据大大缩小了的报关数字即有八千九百零一箱。美国侵略者为了大规模武装走私，特制了许多配有大炮等武器的“鸦片飞剪船”，遇到中国水师巡船，就悍然发炮攻击，横冲直撞而过。为了掩饰肮脏罪行和诱骗中国人吸毒，美国耶稣教牧师还极力制造和散布一种“鸦片无害论”，胡说什么“鸦片无害于中国人，象酒的无害于美国人一样。”<sup>①</sup>由此不难看出，美国侵略者历来就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凶残而又狡猾的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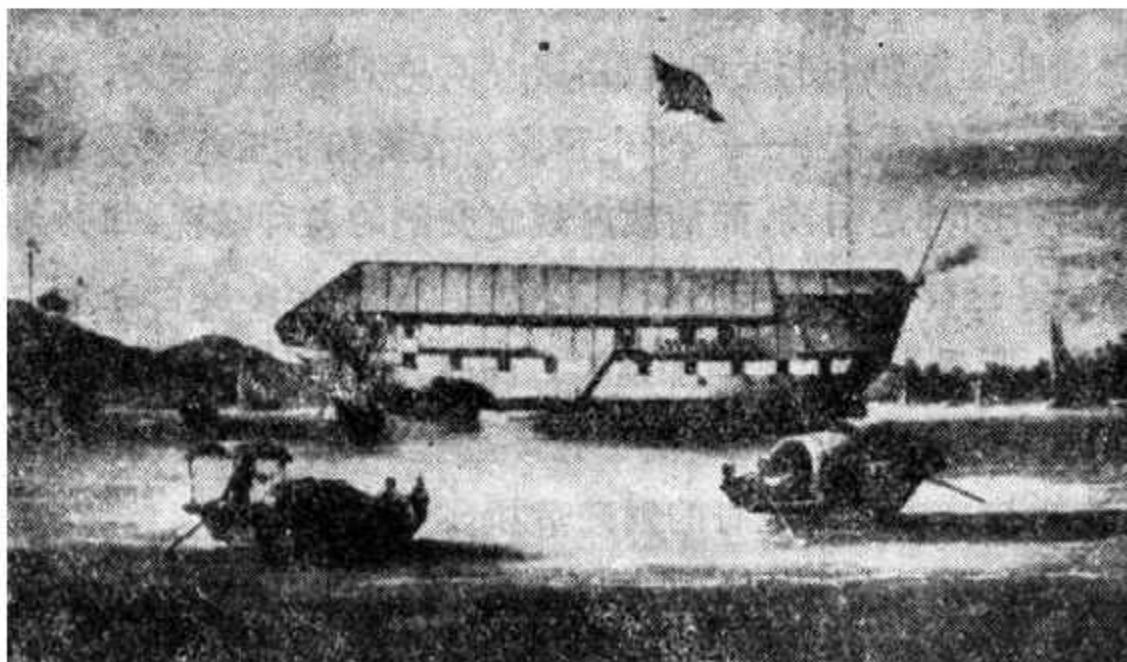
沙皇俄国看到英、美向中国走私鸦片，牟取了大量暴利，十分眼红，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也自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一直到一八五二年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沙俄侵略者还在向中

---

<sup>①</sup> 摩理逊：《麻塞诸塞航海史》。

国输入鸦片，进行可耻的侵略活动。

清政府从一七二九年起，曾多次下令禁烟，但是，都没有收到什么成效。这固然与英、美侵略者竭力破坏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吸食鸦片成了腐朽的地主、官僚寄生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惟恐鸦片不能源源接济，瘾发难熬。鸦片走私还使得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获得大量贿赂。有的甚至利用权势在各地开设鸦片烟馆，牟取暴利。这就形成了一个鸦片利益集团，他们从自己的私利出发，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竭力破坏禁烟法令的施行。西方资产阶级竭力通过腐朽的鸦片利益集团这个内部因素，来破坏中国禁烟，扩大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都不能发生效力。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



一八三九年停泊在广东伶仃洋上的鸦片走私趸船

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sup>①</sup>

鸦片泛滥使英、美等侵略者获得了血腥的暴利，却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灾祸。

第一，使清朝统治阶级更加腐化，更加残酷地压榨人民。起初，吸食鸦片的人还不多，只是部分贵族、官僚、地主和大商人。到了后来，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各种人物，如宫廷里的太监，各级衙门中的差役、轿夫，军营中的兵弁，寺院里的僧尼、道士，城市里的妓女等，也都吸食起来。据一八三五年估计，吸食鸦片的人达二百万以上，地区遍及十几省。统治阶级及其依附者吸食鸦片，加深了他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他们都把吸食鸦片的巨大耗费，用各种手段，转嫁到农民和手工业者身上，使本来已经十分苛重的封建剥削，更加沉重。

第二，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白银大量外流。一八二一——一八四〇年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一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币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年流出五百万元白银，相当于清朝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例如一七九四年，白银一两兑换铜钱一千文，一八三八年是一千六百文——一千七百文。农民和手工业者平时出卖产品所得的都是铜钱，而清政府规定交纳的各种赋税，却必须折成白银。这样一来，农民和手工业者实际上要多交百分之六十的赋税，所受剥削大大地加重了。同时，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价上涨，各省拖欠的赋税也就日益增多，而库存又在日益减少，这样就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第三，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金融恐慌，市场混乱，从而使国内

---

<sup>①</sup>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页。

工商业遭到破坏。到鸦片战争前夕，江南若干地区的商业和城市手工业已呈现出某些衰落现象。一八三八年林则徐在调查了苏州、汉口等地之后写道：“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阑闌聚集之地。……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之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sup>①</sup>这种正当贸易有一半被鸦片夺去的严重情势，不能不损害当时江南地区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第四，鸦片还严重毒害了一些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摧残了中国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曾经愤怒地揭露：“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sup>②</sup>这点，连英国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蒙哥马利·马丁说：“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赫（吃人的神）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sup>③</sup>这是多么悲惨的一幅图画啊！

总之，烟毒泛滥已造成深刻的民族灾难，使得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

### 三、禁烟与反禁烟的斗争

毛主席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

<sup>①</sup>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以下简称《鸦片战争》）第2册，第140—141页。

<sup>②</sup>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页。

<sup>③</sup> 转引自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4页。

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sup>①</sup>

鸦片泛滥，首当其冲、受害最深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劳动人民。他们与英、美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归根到底，是中国的被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他们成了最坚决、最广大的禁烟派，抵抗外国侵略的主力军。他们恨透了外国侵略者及其贩运的鸦片，把罂粟花叫做“妖花”，视鸦片为“毒蛇”，称鸦片走私船为“鬼船”。一八一七年五月，一只美国船非法运载鸦片进到广州海面兜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以李奉广为首的渔民、疍户，立即行动起来，打死了船上的五个美国烟贩。可是，反动的清政府却倒行逆施，竟将反抗侵略的群众诬蔑为“匪犯”，处以死刑，还厚颜无耻地邀集美国人去“环视行刑”，为侵略者张目。清政府的镇压并没有吓倒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反抗风暴。据一八二八年记载，在江淮之间，由于烟毒泛滥、银价高涨，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广大群众迸发出“闹西洋”的怒吼，致使封建士大夫感到：“凡此朕兆，大为可虑。”<sup>②</sup>

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英、美殖民主义者公然无视中国主权，企图用暴力阻止广州地方政府处决鸦片贩子。被激怒了的中国人民，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万人大示威。他们包围了洋馆，高呼消灭“洋鬼子”<sup>③</sup>的口号，并投掷石头、瓦块，砸碎了洋馆的玻璃窗，拆毁了栏杆，击伤了一些侵略分子。外国侵略者惊呼这是“空前的暴动”<sup>④</sup>！他们怕得要死，龟缩在洋行里，不

---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48页。

② 包世臣：《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安吴四种》卷35，《鸦片战争》第4册，第463—464页。

③④ 亨德：《广州番鬼录》，《鸦片战争》第1册，第272、271页。

敢出来。那个带头向中国人民挑衅的美国领事吐哪，被吓得精神错乱。这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反鸦片侵略的巨大威力，表明了中国人民所坚持的是坚决反对鸦片侵略的路线。

人民群众反对鸦片侵略斗争的高涨，促进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在地主阶级内部以禁烟与反禁烟为内容的两条路线斗争日趋激化。其中，大贵族、大地主、大鸦片商是极端腐朽的社会势力，是鸦片的吸食者、贩卖者和受贿者。他们是一个鸦片输入受益集团，因而成为外国鸦片贩子在中国的代理人或同伙。这种地位决定了这伙民族败类是反禁烟派。诚如林则徐当时所揭露的：“衙门中吸食最多，……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sup>①</sup>，特别是“现任督抚，嗜烟者约占半数，若辈岂肯回扳石头压自脚，则阴持两端，模棱其辞，势所必然。”<sup>②</sup>包世臣也说，广东水师的许多将弁，不仅吸烟而且大量受贿，以至“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者。”<sup>③</sup>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伊里布以及太常寺卿（掌管祭祀礼乐）许乃济，就是反禁烟派的主要政治代表，他们推行了一条卖国投降路线。

一八三六年六月，许乃济向旻宁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代表鸦片利益集团，提出了“弛禁”鸦片，公开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妥协的主张和要求。他在“闭关不可，徒法不行”的借口下，反对从前的禁烟命令，主张允许鸦片合

<sup>①</sup>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鸦片战争》第2册，第141页。

<sup>②</sup> 林则徐：《与胞弟林元抡书》。

<sup>③</sup> 包世臣：《答果勇侯书》，《安吴四种》卷35，《鸦片战争》第4册，第466—467页。

法输入，准令外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内地种烟，听民自便；民间吸食，一律勿论。显而易见，这种主张实际上是鼓励鸦片泛滥，为鸦片贸易辩护，迫诱劳动人民种烟吸烟，使鸦片的祸害扩大加深，是彻头彻尾地背叛民族利益的卖国论调。果然，这种谬论一出笼，立即得到了英国鸦片贩子的喝彩，他们纷纷称赞“这个奏折，立论既佳”<sup>①</sup>，急切地等待“弛禁”命令的公布。

为了替这种卖国主义的“弛禁论”寻找理论根据，反禁烟派还搬出了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说，企图借助孔丘的亡灵，来为自己的卑鄙行为辩护。反禁烟派吹嘘“重兴贩而轻买食”是符合“王道”之治。他们无耻地为地主阶级吸毒行为辩护，说什么：这些人大都是“忠良后裔，簪缨世胄，其人温恭尔雅；或富而好礼”<sup>②</sup>，他们吸毒“非有凶暴害人之心，亦无狂妄悖理之事，不过如酒色过度之自戕躯命耳”<sup>③</sup>。因此，为了让他们“还淳返朴”，应该以“仁者爱人”之心，从宽处理，以体现“圣朝宽大”。反禁烟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琦善，进而用儒家晦涩的语言，把这条卖国主义路线概括为：“御外夷以智”，“抚亿兆以仁”，掩饰其投降卖国和反对人民的真相。其实，他的所谓“智”，实际上是先假封关禁海之名，行纵容鸦片走私之实，然后仍准通商，一切照旧。他的所谓“仁”，就是在“国家仁厚开基，明慎用刑”的幌子下，反对“执斧钺之威”以禁烟，公开包庇贩毒、吸毒和受贿的地主官僚<sup>④</sup>，其结果，必将是中国在汹涌的鸦片狂涛中衰败下去，直至灭亡。因

---

①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11页。

②④ 琦善：《遵旨复奏禁烟折》，《鸦片战争》第1册，第493—495页。

③ 《贵州巡抚贺长龄议奏禁烟及抬高钱价之法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

而，它一出笼，就立即遭到中国人民及其影响下的清朝政府中禁烟派的强烈反对。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中小地主、正当商人则不同。鸦片侵略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使中小地主、商人的利益受到某种侵害。“片时之烟，耗数十日之费，未几，百亩尽消，囊空莫告，富豪之子，转而困厄乞丐者多矣”<sup>①</sup>，这是代表这个阶层说话的。江南某些地区市场上的流通货币有一半转而进行鸦片贸易，这使正当商人的生计被鸦片夺去，市场出现了萧条和衰败。加上大地主、大鸦片商对银荒危机的转嫁和对土地的兼并，也使中小地主、商人的利益直接或间接受到一些损失。因此，他们同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大地主、大贵族、大鸦片商有矛盾。尽管他们同农民之间依然有阶级矛盾，但是，他们不赞成弛禁，而主张严禁，想利用农民同外国侵略者及其依附势力反禁烟派的矛盾，来达到其政治上的目的——维护民族尊严和改革弊政。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禁烟斗争中结成了禁烟派。湖广总督林则徐、鸿胪寺卿（掌管殿廷仪礼）黄爵滋就是这一禁烟集团的主要政治代表，他们实行的是一条爱国的反侵略路线。

一八三八年六月，黄爵滋向旻宁上《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从国家的财政观点着眼，详细申述了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严重祸害，尖锐地指出：“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如何能支？”他提出一个“重治吸食”的严禁方案，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一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普通人处以重刑，官吏加重治罪。在他看来，只要人人戒烟，鸦片则不禁自绝。这篇奏折在清朝统

---

<sup>①</sup> 周乐：《鸦片烟说》，《二南文集》卷上，《鸦片战争》第1册，第485页。

治阶级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旻宁把黄爵滋的奏折，交给各省总督、巡抚商议。

湖广总督林则徐反对卖国的“弛禁论”，支持黄爵滋的爱国主张，并且更进一步作了重要的补充。

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闽侯）人，没落小地主家庭出身。林则徐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能够比较坚定地走上反鸦片侵略的道路，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源流。他早年深受我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如李纲、岳飞等反对投降、坚持抗战的传统影响<sup>①</sup>。他认为只有发扬民族气节，始是以“言治”。到了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林则徐更从外国侵略者制造的鸦片灾难中，看到了“鸦片流毒中华”足以“贫民”、“弱种”的深远后患<sup>②</sup>和“兵弱银涸”的统治危机。他坚决要求制止外国的鸦片走私，严禁国内贩卖吸食鸦片。他继承了先秦法家“信赏必罚”、“以刑去刑”的观点，强调鸦片流毒天下“为害甚巨”，“法当从严”<sup>③</sup>。在他看来，鸦片“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sup>④</sup>。他主张重治吸食、开馆兴贩和制造烟具者，规定限期，逾期不改，平民处死刑，官吏加等治罪。反禁烟派攻击林则徐等实行“法治”

① 林则徐在福州求学时，对南宋抗金将领李纲就深怀敬仰。一八一九年，他路过河南汤阴，拜谒了南宋抵抗女真贵族侵扰的著名将领岳飞祠，并挥笔赋诗：“不为君王忌两宫，权臣敢挠将臣功；黄龙未饮心徒赤，白马难遮血已红！尺土临安高枕计，大事河朔撼山空；灵旗故土归来后，祠庙犹严草木风！”（《汤阴谒岳忠祠》，《左云山房诗钞》卷1）呵斥南宋投降派秦桧等屈辱投降的罪行，表露了他敬慕岳飞的心情。

② 林则徐：《与胞弟林元抢书》。

③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鸦片战争》第2册，第142页。

④ 林则徐：《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鸦片战争》第5册，第133页。

是“专尚峻酷”，“非不忍之政”<sup>①</sup>，胡说这样一来是“欲兴率土普天之大狱”，“伤残自己的子民，而快遂外夷之毒计”<sup>②</sup>。林则徐反驳说，“执重法”只是禁烟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只要认真实行，结果一定是“先时虽有论死之法，届期并无处死之人”<sup>③</sup>，决不会“诛不胜诛”。

一八三八年九月林则徐上书旻宁，尖锐指出鸦片泛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sup>④</sup>，要求严禁鸦片。

禁烟派对“弛禁论”的揭露和抨击，大灭了反禁烟派的威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为全国性的禁烟、抗英运动的到来，作了舆论的准备。

在统治阶级内部禁烟派和反禁烟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中，旻宁的思想开始充满着矛盾，态度犹豫。他一只眼瞅着鸦片走私的利益，一只眼又看到鸦片走私的危害。特别是当他想到林则徐在奏折中所痛陈的鸦片走私所造成的“兵弱银涸”危机时，

“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因为军队是清王朝用以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统治的主要支柱；粮饷是清王朝赖以维持军事官僚机构的财政基础。如果支柱倒了，基础垮了，皇帝的宝座也必将一起完蛋。这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sup>⑤</sup>正是从维护清朝封建反动统治出发，在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禁烟的巨大压力下，旻宁暂时倾向于禁烟派，下令将许

① 《江南河道总督麟庆议奏查禁鸦片章程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

② 琦善：《遵旨复奏禁烟折》，《溃痛流毒》卷1，《鸦片战争》第1册，第495页。

③④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鸦片战争》第2册，第142页。

⑤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

乃济革职，并于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禁烟，使禁烟派暂时处于优势地位。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矛盾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爱国与卖国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一八三九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在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形势下，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合作，一面加紧整顿海防，惩治鸦片走私、受贿官弁，严拿烟贩；一面于三月十八日通知外国鸦片贩子，要他们三日内报告存贮鸦片数字，“尽数缴官”，“不得丝毫藏匿”，并要他们“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林则徐向外国侵略者斩钉截铁地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并且警告他们说：倘若“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sup>①</sup>，显示了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决心。

英、美资产阶级是绝不甘心放弃鸦片贸易的。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顽固抵制和疯狂破坏禁烟命令，阻止英商缴烟具结，并于三月二十三日命令所有鸦片烟船开出珠江口，作出战争姿态；自己则于二十四日星夜从澳门赶到广州，手持凶器庇护大鸦片贩子颠地潜逃，妄图躲过风头，卷土重来。阴险狡诈的美国烟贩，使用两面派手法，暗中支持英国破坏禁烟，他们有的闻风暂时转移逃跑；有的假意具结，然后转往福建大肆走私贩毒；有的帮助已被停止贸易的英商转卖货物，收购中国茶、丝。美国充当了英国侵略中国的可耻帮凶。

<sup>①</sup> 林则徐：《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鸦片战争》第2册，第243—244页。

广州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破坏禁烟的罪恶活动无比愤慨，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洋馆中雇佣的中国工人二百多人自动包围了洋馆，截住义律和企图逃跑的英国烟贩。西报记载说：包围洋馆的群众，“大声喊叫如雷，令我等好多人害怕。犹如上年十二月十二日之事一样”<sup>①</sup>。人民群众高昂的反侵略斗争情绪，再一次鼓舞了林则徐。为了打击义律的破坏活动，他按照“违抗封舱”的惯例，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派兵严守洋馆，撤退洋馆中的中国雇员，断绝鸦片趸船与洋馆的交通。这对侵略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侵略者唉声叹气说，我们的洋馆“倏时间即变成大监牢，内中之人，好似未带锁链之犯人”<sup>②</sup>。他们完全失去了为所欲为、为非作歹的自由。

“无可奈何花落去”。由于中国人民以及林则徐等禁烟派的斗争，英、美烟贩被迫交出鸦片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麻袋（其中美国一千五百四十箱），共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六月三日，在林则徐主持下，震撼世界的销烟壮举开始了。中国爱国官兵满怀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无比义愤和禁烟斗争胜利的无限喜悦，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把一箱箱的鸦片倾倒在池中，用盐卤和石灰销毁，把可耻的殖民污垢冲入大海。到六月二十五日，这批秽臭毒物，才全部销毁净尽。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重大胜利，是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沉重打击，是对卖国的“弛禁论”的深刻批判。侵略者们哀号：“鸦片贸易的末日似乎是到了。”<sup>③</sup>虎门销烟向全世界庄严地表明了中国人民禁毒的决心和反抗侵略的坚强意志。今天，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铭刻的第一幅巨型

①② 《澳门新闻纸》，《鸦片战争》第2册，第420页。

③ 亨德：《广州番鬼录》，《鸦片战争》第1册，第273页。

浮雕，就是纪念这一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光辉事迹的。

## 第二节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战与抚 两条路线的斗争

### 一、英国发动侵略战争

中国人民禁烟斗争重大胜利的消息一传到英国伦敦，立即引起了英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巨大震动，使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感到“在中国的商业地位，遭遇到空前的变动，不胜惊骇”<sup>①</sup>，甚至觉得“天色昏暗愁惨”<sup>②</sup>。虎门销烟之所以对英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引起这么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

第一，禁烟斗争直接阻止了英国利用鸦片作侵略手段的阴谋。一方面，是那些被中国缴销的鸦片烟的本钱在销烟雾中，全部化为灰烬。据说英商损失六万三千二百六十六镑。另一方面，是那些已经准备好而尚未运华的鸦片等物，将失去从中国牟取暴利的好机会。一八四〇年第一季度，印度的孟买“要到中国鸦片棉花存下未去者，共计亏银六百万棒，真是大有害于利益，若再迟延不理，必倒塌许多贸易，地方穷困”<sup>③</sup>。尤其是使英国感到威胁的是，鸦片税是英国的印度殖民政府的重要收入，是“英吉利属国中最为费财之薮”<sup>④</sup>，随着中国禁烟斗争的展开，他们将断绝这种重要的利源。

① 《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第2册，第641页。

② 《澳门新闻纸》，《鸦片战争》第2册，第424页。

③④ 《澳门月报》，《鸦片战争》第2册，第534、531页。

第二，禁烟斗争将打碎英国政府和英国资产阶级榨取中国、印度资财的那条连环式的锁链，将使它们失去掠夺中国的可能。

第三，禁烟斗争的开展，使英国政府和英国资产阶级无法用可耻的鸦片作手段来掠夺英国资本十分需要的中国的茶、丝等，从而引起它的市场出现了价格的波动。这一方面表现在茶、丝等进口货价格上涨；另一方面表现在因必须以白银去购买某些必需货物而发生的“银根吃紧”情况。

总之，中国人民的禁烟斗争将使英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以鸦片谋利和侵略的希望破灭。但是，巨额利润又在散发着诱人的气息，召唤他们去拚命。马克思曾经借用邓宁格的话揭示过资产阶级的本质：“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sup>①</sup>早就企图打开中国大门、伸展其侵略势力、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的英国资产阶级，便利用中国禁烟作为借口和导火线，竭力煽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一八三九年八月间，伦敦的英国资产阶级侵华集团，由“印度和中国协会”<sup>②</sup>出面，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策划怎样挑起侵华战争的问题，并组成了一个领导机构——九人委员会。参加会议的，都是与侵华利益有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伦敦的“印度和中国协会”主席拉本德，曼彻斯特商会主席、纺织资本

<sup>①</sup> 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1卷，第829页。

<sup>②</sup> 印度和中国协会，由与侵略中国利益有密切关系的英国资本家集团，于一八三六年，在伦敦成立，聚集了一百零九家和侵略印度与中国有关的大公司，包括进出口贸易、航运、金融等各界巨头。它经常与英国政府各部门特别是外交部保持联系，书面或口头提供情报，督促英国政府加紧侵略中国。

家莫克维卡，刚从中国逃回英国的大鸦片贩子颠地，臭名昭著的大鸦片贩子、这个会议的幕后操纵者查顿之流。会后，他们还进见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向他汇报了在中国搜集到的军事情报。

接着，英国资产阶级即开始了行动，他们大肆制造发动侵华战争的舆论。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中国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收。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采，是不能轻易放过的”。什么“对于中国和对于一切软弱的政府一样，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sup>①</sup>。一时间，疯狂的侵略叫嚣，充斥着英国伦敦、曼彻斯特等地；翻滚的战争乌云，密布在中国沿海上空。

一八三九年十月一日，英国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侵略中国问题，巴麦尊根据查顿出的点子，建议派军舰封锁中国沿海港口，勒索缴出的鸦片代价。会议结果，决定发动侵华战争。这一决定由巴麦尊在十月十八日用密令通知义律，指示他准备在第二年的三月间，本季商务结束后，开始进攻中国。

正是在鸦片贩子的策动下，在整个十月中，曼彻斯特、伦敦、里兹、利物浦、格拉斯哥、布里斯特等大城市的商会，纷纷向英国政府上书，要求采取断然的处置，强有力的手段，使英国“所遭受的损失，得到赔偿。并将今后的对华关系，置于较以前更稳固的基础之上，俾商人等更有保障”<sup>②</sup>。

---

<sup>①</sup> 《安德鲁·韩德森致拉本特函》，《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第2册，第661、663页。

<sup>②</sup> 《下列卜赖克卜恩市签字商人致巴麦尊子爵》，《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第2册，第640页。

查顿看到英国工商界在各地已经开始动起来了，便连续上书巴麦尊，建议勒逼清政府赔偿财产，订立“平等”通商条约，并提出发动侵略战争应派出的军舰和水兵的具体数目等。

接着，又由伦敦“印度和中国协会”的头头写信给巴麦尊，提供详尽的侵华方案。函中详细说明“鸦片贸易”的所谓合法性和重要性，以及采取武力保护这项“贸易”的必要性，拟出了要挟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的具体内容，如：开放广州、厦门、宁波、福州和扬子江等口通商；或给岛屿一处；取消公行制度；协议进出口关税；设商务监督驻在北京等等。同时提出了作战计划，预计最好在四月到十一月，中国沿海季候风盛吹期间发动战争，同时乘机劫夺盐船和漕船；派遣大小战舰十八只，海陆军六千五百人；在进攻中国大陆之前，先封锁海口，占据一、二个沿海岛屿如台湾、金门岛或舟山岛；等等。

巴麦尊接到这个方案以后，点头称是，立即草成密令，送交义律，指示他尽量搜集军事情报，等候远征舰队的来到，必要时“先揍它（指清政府）一顿，然后再作解释”<sup>①</sup>。

一八四〇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曾任印度总督、英国好望角舰队总司令官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sup>②</sup>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四月，英国政府组成了一支包括由五百四十门大炮装备的四十八艘舰船、士兵四千人的所谓“东方远征军”。英国政府给这支侵略军的指示是：第一步封锁珠江口，然后占据舟山群岛，再北上天津，胁迫清政府接受赔偿烟款、割让岛屿、开埠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侵略要求。

---

① 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8页。

② 懿律叫乔治·义律，是查理·义律的堂兄。当时中国官吏为了区分这两个人，将乔治·义律译为懿律。

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最后就扩大侵略战争。这样，鸦片贩子所提供的侵华方案，就变成英国政府的侵华行动纲领了。后来，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英国侵略军的行动纲领、作战部署和进攻步骤，差不多都是依照伦敦“印度和中国协会”的计划进行的。

《南京条约》的内容，实际上也就是查顿等鸦片贩子所提的建议的实现。一八四二年四月底，巴麦尊在他写给鸦片贩子阿拜·斯密斯脱的信件上招供说：“我们之所以能得到这些令人满意的结果，主要是依靠你和查顿先生所供给的情报，与大力帮助，因而我们才能够给我们的在华海军与外交人员详细的指示。”<sup>①</sup>

事实证明，鸦片战争是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鸦片贩子是当时策动侵华战争的急先锋。仅仅从这一点，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次战争的肮脏性质了。

一八四〇年六月初，英国侵略军相继从印度抵达广东海面。英国资产阶级为了保护可耻的鸦片贸易、掠夺市场和殖民地而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伟大导师马克思愤怒地指出：这场战争是“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sup>②</sup>，是资产阶级“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sup>③</sup>，是非正义的战争。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国的反鸦片战争”“是义战”<sup>④</sup>。

## 二、“战”与“抚”的斗争

当着英国侵略者向我国猖狂进行武装进犯的时刻，中华民

① 考力士：《外国土》。

②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

③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页。

④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47页。

族内部禁烟与反禁烟的斗争，则迅速转换为“战”与“抚”的激烈斗争。这是禁烟与反禁烟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坚决抵抗，还是屈膝投降？这是区分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首要标志。英军大举进犯，首先使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和英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中国人民高举爱国抗英的大旗，坚定不移地执行反侵略反投降的革命路线，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给予嚣张一时的“海上霸王”——英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他们是鸦片战争中的主力军，是保卫祖国的中流砥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

林则徐这些代表着中小地主、正当商人利益，在鸦片走私和武装侵略中受到某种侵害的禁烟派，这时在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推动和影响下，主张大敌当前，必须利用“民心”，改革弊政，抵御外侮，维护民族独立。他们是鸦片战争中的地主阶级抵抗派。这样，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这一点上，人民群众同地主阶级抵抗派有着客观上的一致性，而同地主阶级投降派有着深刻的对抗性。因而在鸦片战争中形成了人民群众与地主阶级抵抗派暂时共同反侵略、反投降的局面。这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都有这种情形。”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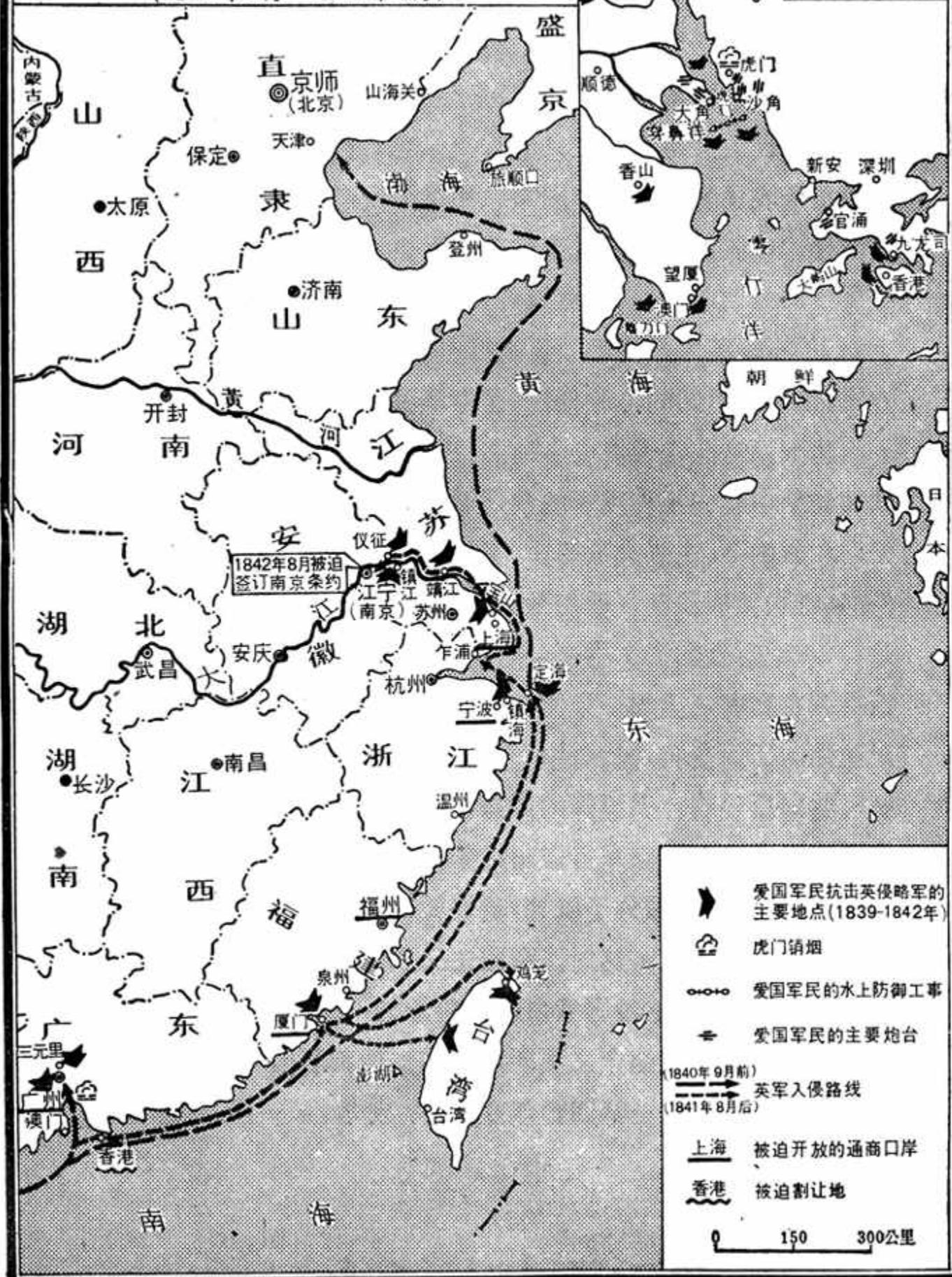
---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95—296页。

# 第一次鸦片战争形势图 (1840年6月—1842年8月)

虎门附近

30公里



而穆彰阿、伊里布、琦善这些代表着大贵族、大地主、大鸦片商阶层利益，与鸦片走私关系密切的反禁烟派，这时他们害怕一旦战争打起来会破坏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同时，他们更害怕人民群众在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发展力量，乘机起而推翻自己的统治。因此，他们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既得利益，畏敌如虎，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不敢进行抵抗，一味奴颜卑膝，屈辱求和。他们奉行尊孔“抚夷”的投降主义路线，坚信孔丘“忠信笃行于蛮夷”<sup>①</sup>应是清朝对外的方针。他们是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

这样，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两个战场的尖锐对立和激烈斗争。在爱国主义抵抗路线指引下，由中国人民自动组织起来的抗英战场，或者在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密切配合下，由抵抗派指挥的抗英战场，都打了或大或小的胜仗，为捍卫祖国的独立作出了贡献。相反，在卖国主义投降路线指导下，由投降派指挥的战场，都吃了败仗，从而招致了国家主权的逐步丧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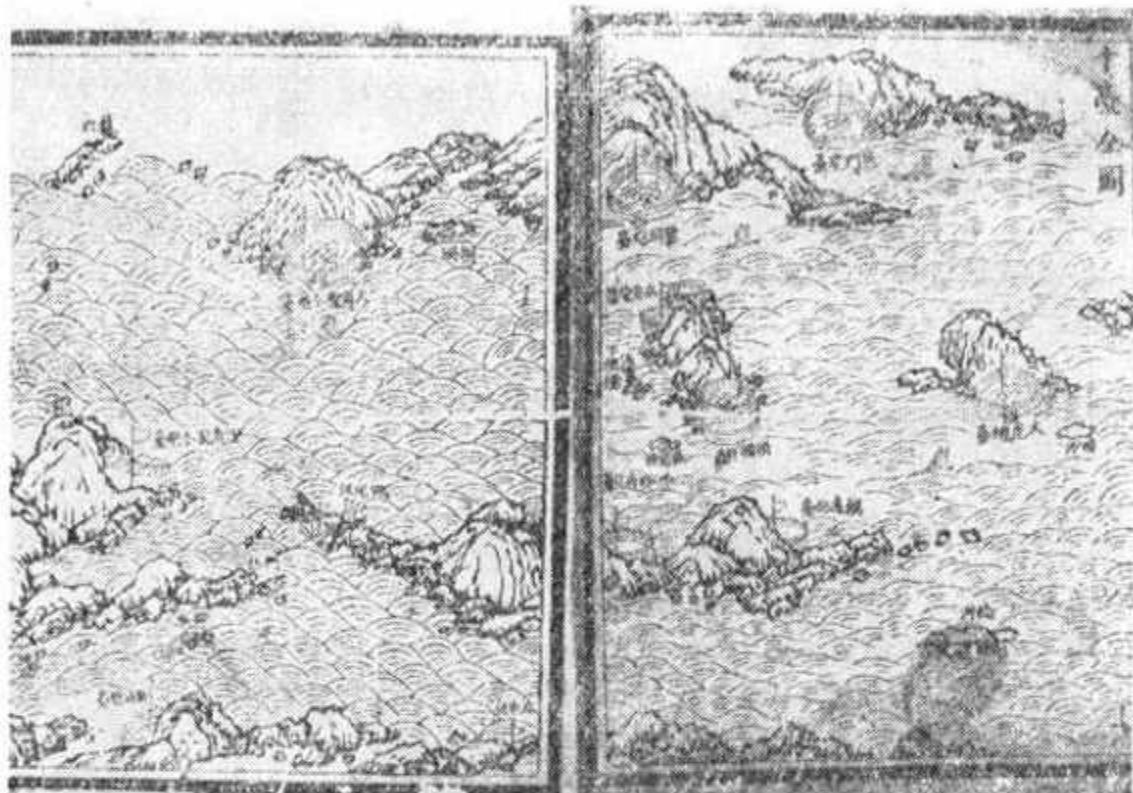
鸦片战争从一八四〇年六月正式开始，到一八四二年八月结束，经过三个阶段。

正当英国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已由钦差大臣任命为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在广东积极认真备战。林则徐清醒地看到英国侵略者“惟利是图”<sup>②</sup>，“欺弱畏强”<sup>③</sup>，若是对他们妥协退让，只会助长他们的侵略野心，对付这帮外国侵略者的办法，只

① 张喜：《抚夷日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356页。

② 林则徐：《会奏英夷抗不交凶严断接济查办情形折》，《鸦片战争》第2册，第176页。

③ 林则徐：《会奏九龙洋面轰击夷船情形折》，《鸦片战争》第2册，第180页。



虎门炮台形势图

有针锋相对，进行武装抵抗。为了迎击侵略者，林则徐积极筹备广东沿海防务。

他亲自视察海口形势，在水道要冲安设木排铁链，加强防御工事；购置大炮，添筑炮位，增强防御火力；大力整顿水陆官兵，撤掉了少数包庇鸦片走私的军官；并五次请求清廷下令加强海防。

为了克服“银枯”危机，发展经济，坚甲利兵，林则徐主张严禁鸦片贸易，维护和发展正当贸易，增加白银入超；极力劝说清廷拿出关税的十分之一，制造坚利的船炮，作为“制夷”“防夷”之用。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备战，必须了解敌情。林则徐在广州设立翻译馆，组织翻译人才，翻译外国书报，了解国际形势。他把积累的材料编成《四洲志》等书。这些书叙述各国历史、疆

域、政治等情况，成为了解近代西方最早的著作。这和当时清朝统治阶级中昏庸腐朽、以“天朝上国”自居的顽固派比较起来，林则徐因反侵略斗争的需要，能够睁眼看世界，是有进步意义的。

林则徐从禁烟与抗英斗争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广大军民积极禁烟、踊跃参战、齐心杀敌的作用，因而主张利用人民力量抵抗资本主义侵略，这是林则徐认真备战的主要特点。他不仅大力整顿水陆官兵，使他们在抗英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还积极倡导“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邨庄”<sup>①</sup>。并从渔民、疍户、盐工中大量召募水勇，加以训练，使他们协助水师，对敌作战。林则徐还公开号召：“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sup>②</sup>

林则徐积极备战和广大群众对他抵抗外国侵略的坚决支持，是广东海防巩固的最重要保证。一八三九年秋冬之间，他



鸦片战争时中国军队使用的大炮

① 林则徐：《议复团练水勇情形折》，《鸦片战争》第2册，第227页。

② 林则徐：《英夷鵠张安民告示》。

打退了义律发动的七次武装挑衅，赢得了中英之间前哨战的胜利。一八四〇年六月，英军企图进犯广东，由于他防守严密，都被打败。

但是，林则徐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一员，他与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因此，他组织团练依靠的主要对象是“正士端人”，即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士绅。他召募的水勇丁壮，大部分是下层劳动人民。林则徐既要利用他们反英，又害怕他们“借端生事”，扰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所以，他认为“驾驭必须得法”<sup>①</sup>，严格加以控制。这就表明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不可能真正和彻底地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来抵抗侵略，因而他的反侵略斗争，自然就只能依靠封建统治势力，寄希望于封建皇权。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活动，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与活动，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这也是他的禁烟和抗英事业尽管开头取得了一定胜利，而最后毕竟归于失败的基本原因。

英军在广东碰壁以后，六月三十日北犯福建厦门。由于当时已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同样作了战守准备，因而进犯厦门的英军，也被打得仓惶逃窜，未能得逞。

但是，在投降派卖国主义路线的指导下，从浙江到直隶，在漫长的海防线上却不作任何防御的准备。例如，华北重镇天津，仅有守兵八百人；山海关连大炮也没有一尊。懿律于广东、福建被击退后改犯浙江，七月攻陷定海。八月，北窜侵入白河口，直逼北京门户——天津，并投书清廷，进行恫吓。

定海失陷、英军北上的消息，引起了盲目自大、毫无战备的清朝政府的张惶失措。在这一片恐慌的气氛中，投降派乘机纷

---

<sup>①</sup> 林则徐：《议复团练水勇情形折》，《鸦片战争》第2册，第227页。

纷跳出来活动。他们一面在旻宁面前大进谗言，攻击林则徐禁烟过激，惹来了兵祸，并造谣说林则徐接受英王文书，私自销毁；一面又大肆制造种种投降舆论，说什么中国“地势之无要可扼”，“军械之无利可恃”，“兵力之不固”，“民情之不坚”<sup>①</sup>，甚至恫吓人们：敌人“船坚炮利”，难以取胜，即使今年把它打退了，明年还会再来，如果战端一开，战争便没个完。说穿了，他们的主张是：抵抗不如投降，晚投降不如早投降。这是典型的卖国投降逻辑！

侵略者的炮火威胁，投降派的谣言煽动，深深影响了旻宁。对于禁烟斗争，开始他倾向于支持，但是没有多大决心，更没有料到禁烟斗争会发展到武装对抗。对于英军的武装挑衅，开始他认为清朝是“天朝帝国”，“外夷”不堪一击，幻想“示以声威”，稍加还击，就能吓退侵略者。可是与英国真正交锋的结果，腐朽的清军却一触即溃，英国侵略军一直打到了天津。旻宁这时感到他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在惊慌之中，急图苟安，于是又倾向采纳投降派的“抚夷”主张，希望以较小的代价来止息干戈。旻宁把林则徐和邓廷桢撤职，改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东“议抚”，也就是向敌人谈判投降条件。

林则徐被革职后，上《密陈洋务不能歇手片》，劝告旻宁把禁烟斗争坚持下去，并请求亲赴浙江前线，随营效力，抵抗侵略者。但是旻宁却把这些正确主张和要求一概斥之为“无理，可恶！”

“一片胡言”。仍将林则徐和邓廷桢流放新疆。即使在流放新疆期间，他们也仍然坚持抗英立场，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林则徐在西北边陲的新疆伊犁，度过了近三年（一八四二年十二月至一八四五年十月），他对沙皇俄国向我国西北边疆殖民扩张的

---

<sup>①</sup>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2，第12—16页。

威胁，有所觉察，并认为只有加强边疆的防卫力量，才能抵御沙俄的侵略扩张。他在给伊犁领军开子捷的诗中提醒说：“静以绥中原，动以御外侮”，是伊犁驻军的职责。虽然目前“三载无边烽，华夷悉安堵”，但“厝薪火难测，亡羊牢必补”<sup>①</sup>，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御来自西北方的突然袭击。面对沙俄殖民扩张的威胁，林则徐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搞屯田，实行“耕战”的建议。林则徐在离开新疆后几年，还针对沙俄侵略扩张的威胁大声疾呼：“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sup>②</sup>

林则徐在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在外有侵略者和内有投降派的双重压力下，奋起反对卖国的“弛禁论”，打击英、美等资产阶级的鸦片侵略，敢于坚决抵抗“海上霸王”——英国在东南沿海的武装侵犯，并密切注视和反对北方沙俄的殖民扩张，客观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起了维护祖国独立的进步作用。林则徐这种坚持禁烟和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可贵的。然而，由于他是地主阶级的一员，使其将禁烟和反抗侵略的希望始终寄托于封建皇帝。即使他坚持过的禁烟和抗英事业遭到失败而被遣戍时，他一面甚为愤懑，但另一面仍纠缠着“君恩每饭总难忘”的君臣伦理观念。等到接旨获释时，他又惊又喜，发出“雨露雷霆皆圣泽”，表示要“再造仁”以报“君恩”<sup>③</sup>。林则徐入关后，随着国内阶级矛盾日趋上升，他在署理陕甘总督、担任陕西巡抚和云贵总督期间，曾经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一八五〇年抱病居里的林则徐又接受了清廷任命他赴广

① 林则徐：《送伊犁领军开子捷（开明阿）》，《云左山房诗钞》卷7。

② 黄冕：《林文忠公逸事》。

③ 林则徐：《乙巳子月六日伊吾旅次被命回京以四、五品京堂用纪恩述怀》，《鸦片战争》第2册，第557页。

西镇压农民起义的可耻使命，“星驰就道”，结果病死于广东潮州途中。

一八四〇年十一月底，钦差大臣、新任两广总督琦善抵广州。他适应中外反动派的需要，抱定妥协投降到底的宗旨，力反林则徐所为，一面自动撤防，派心腹鲍鹏①乞降；一面压制反对“议和”的抵抗派，包庇纵容汉奸。有的群众捉住汉奸告到他那里，他反诬群众说：“汝即汉奸。”他的这种倒行逆施，导致了“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②的严重后果。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旻宁发出卖国的“上谕”：“我朝抚驭外夷，全以恩义，各国果能恭顺，无不曲加优礼，以期共乐升平。”③卖国贼琦善秉承旻宁旨意，与义律谈判（这时懿律因病回国，义律任侵华全权代表，伯麦任侵略军总司令）。在谈判中，琦善对义律提出的各



英舰侵占广州海口的炮台

① 鲍鹏，原是英国大鸦片烟贩颠地的买办，是英国鸦片贩子一手培养起来的走狗。禁烟运动开展以后，被林则徐通缉在案，潜逃山东，通过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引荐而成为琦善的心腹。琦善就是依靠这个流氓汉奸和侵略者开始谈判的。

② 《林则徐关于鸦片战争的书札》，《鸦片战争》第2册，第565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上谕。

项侵略要求，几乎全部接受，只有割让香港一条，不敢作主，但答应向旻宁代为请求。义律看透了琦善害怕战争的卑怯心理，一面决意施加军事压力，于一八四一年一月，率兵突破大角、沙角

炮台，驱入虎门；一面又通过汉奸鲍鹏以巨金收买琦善。在侵略者的威迫利诱下，卖国贼琦善擅自于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与义律在川鼻洋签订了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开放广州等条款的《川鼻草约》。由此结束了鸦片战争的第一阶段。

与清朝统治者张惶失措、卑屈投降相反，沿海人民无不奋勇杀敌，坚决打击外国侵略者，并掀起了

虎门沙角山“节兵义坟”墓碑

反妥协、反投降的斗争高潮。浙江镇海曾爆发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请愿活动，反对伊里布与英军妥协后撤退镇海防兵。有人投书官府，要求收复定海。广州人民激烈反对英军宣布根据《川鼻草约》占领香港。爱国士绅举行集会要求当局驱逐侵占香港的英国侵略者。许多倾向于抵抗派的官员，也纷纷上书，要求罢

免琦善，重新起用林则徐、邓廷桢，继续抗战。旻宁原以为只要惩办了抵抗派，默许恢复鸦片走私，英国就会交还定海，罢兵息战。不料义律不仅没有立刻交还定海，而且蛮横地提出了更多的苛刻条件，这使旻宁感到有损“天朝”尊严，加之割让香港又等于公开承认清政府已丧失保疆守土、统治人民的能力，破坏了“天朝皇威”。于是旻宁又倾向于“主战”，于一月二十七日正式“宣战”，下令逮捕琦善，派遣皇侄、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各省防兵一万七千人开赴广州，声称要对侵略军“痛加剿洗”。其实，他并非真的决心要抵抗侵略，只不过是幻想凭借“天朝威严”，吓退洋人，换个体面的“和平”而已。同时，他又深恐人民群众的斗争危及自己的统治，始终没有放弃其敌视和镇压人民的政策，在四月公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sup>①</sup>的反动方针，把反人民放在第一位。同时，对林则徐等抵抗派，也仍然排斥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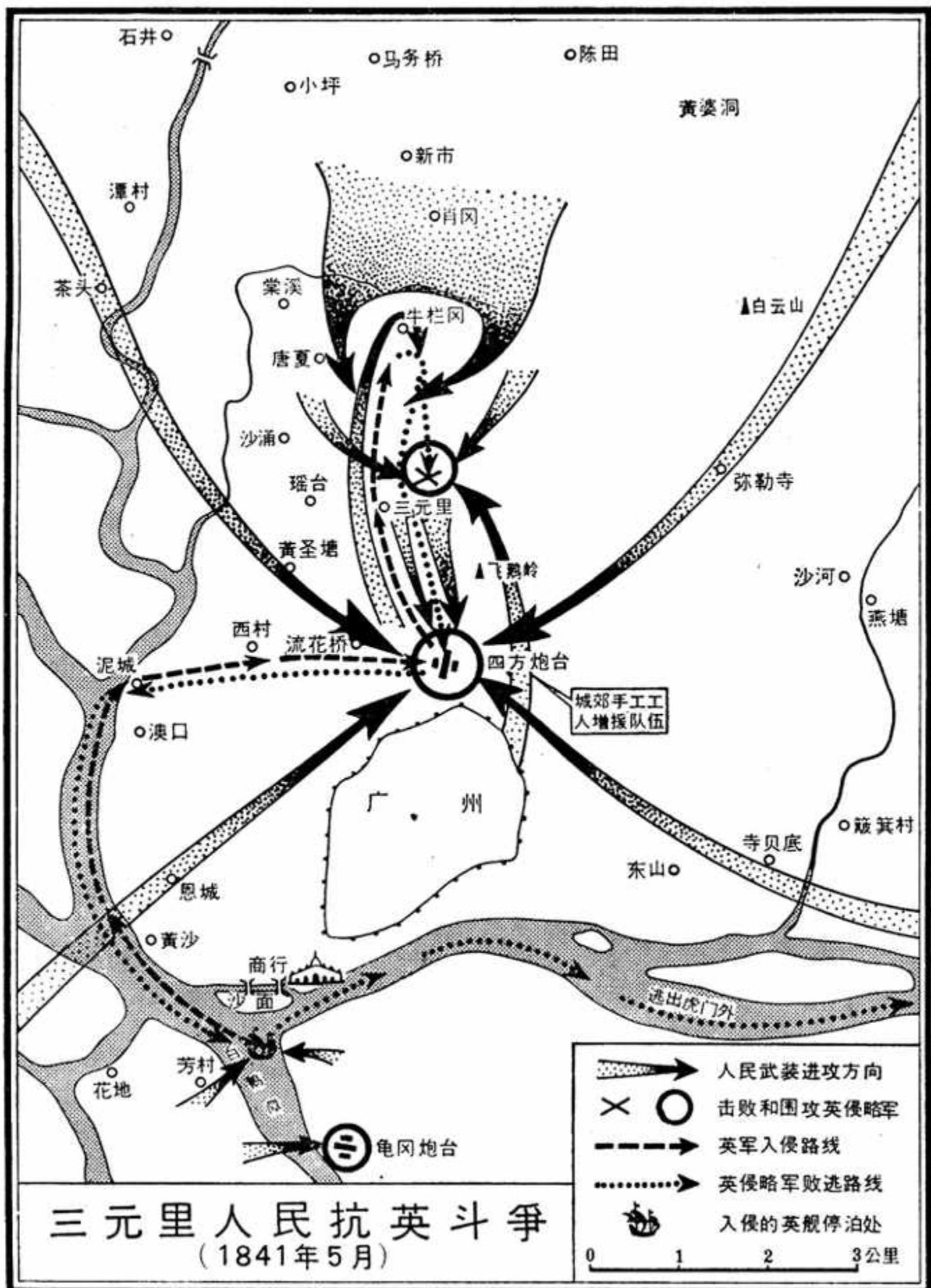
虎门炮台遗址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5。

二月，风闻清朝政府改变态度的义律，乘奕山迟迟未到的机会，先发制人，突然袭击虎门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英勇抵抗，终因琦善拒援，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四月，奕山蹒跚到达广州。他死抱着“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信条，大骂抗战群众是“匪徒”、“汉奸”、“无赖之徒”<sup>①</sup>，血腥镇压和竭力摧残群众力量，为英军侵略扫清道路。对奕山的卖国路线和滔天罪行，广东商民愤怒地进行了控诉，说奕山之流是“常存杀民之心，不奋杀夷之志”，“徒有剿夷之名，反有害民之实”<sup>②</sup>，骨髓里浸透了反人民的毒液。旻宁对奕山摧残人民的罪恶行动不仅不加制止，反而竭力鼓励，命令奕山：如能拿获一名，即行枭首一名，将来出剿时，亦须严密防范为要。旻宁和奕山这种敌视人民的政策，削弱了反抗侵略战争致胜的重要力量。五月二十一日，奕山幻想侥幸取胜，匆匆忙忙拼凑了一支四百人的小队伍，冒险夜袭英军，结果惨败而归。英军趁势发动进攻，占领了四方炮台，包围了广州城，然后架起几百门大炮，居高临下，猛轰城中，军民死伤无数。奕山等惊慌失措，草木皆兵，连卫兵打一声喷嚏，也以为是射来了火箭，而吓得要死。在敌人炮口下，奕山在城上竖起白旗投降。二十七日，奕山接受了英军提出的全部屈辱条件，签订了《广州和约》。奕山按照《广州和约》的规定，率清军立即退出广州城六十里以外，并大肆搜刮库款、民财六百万元作为“赎城费”交给了英军。奕山在吃了败仗和接受投降条件后，却对旻宁大撒其谎，把大败说成大胜，把自己求降说成英人求和，把赔款说成商欠。旻宁虽然知道奕山打了败仗，也知道“所奏与所闻迥异”，但在谕令中却说：“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7，第34页。

② 《广东商民呈懇冤词》，《鸦片战争》第3册，第317页。



衷，准令通商”<sup>①</sup>，批准了《广州和约》，乞求早日结束战争。这是鸦片战争的第二阶段。

### 三、三元里抗英凯歌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sup>②</sup>

在穷凶极恶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面前，与投降派走的卖国主义路线相反，中国人民走的是坚决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路线。就在奕山向英军可耻投降，偃旗息鼓，带着清军撤出广州城的时候，广州附近三元里人民，却高举战旗，大擂战鼓，狠揍英国侵略军，掀起了气势磅礴的武装抗英高潮。



英国掠劫队（漫画）

三元里位于广州城北五里，贴近泥城、四方炮台，是一个有几百户居民的村落。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的早上，一小股英军跑到三元

里一带行凶作恶。这伙强盗，杀人放火，污辱妇女，抢劫粮食，乱宰猪牛，甚至盗掘坟墓，从棺材里盗取陪葬品。顿时鬼蜮横行，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第13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6页。

人民遭殃。菜农韦绍光等仇恨满胸，当场打死侵略军八、九人。三元里人民料定凶残横暴的敌人绝不会罢休，一定会来进行疯狂报复。于是，他们立即组织起来，在村北北帝庙集会，推举韦绍光为领袖，将庙里的三星旗作“令旗”，对旗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sup>①</sup>，表达了统一组织行动，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下午，韦绍光等串连、邀集了附近一百零三乡群众代表，聚会于牛栏冈。会上，共商了组织群众联合抗英的部署，并一致决定：（1）三星旗为总指挥旗，各乡自成一个战斗单位，各备乡旗一面，推选领队一人，指挥作战；（2）各乡准备大锣数面，



三元古庙

一有警报，一乡鸣锣，各乡皆出；（3）十五至五十岁的男人，一律上阵杀敌，妇幼病残预先疏散；（4）不正面进攻敌人，采取诱敌深入至丘陵起伏、适合埋伏用兵的牛栏冈进行决战，包围聚歼。这样，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人民抗英武装就迅速组织起来了。

<sup>①</sup> 《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鸦片战争》第4册，第34页。

其中：有贫苦农民，人数最多；有纺织、打石和烧炭工人；有渔民；有秘密会党成员；也有一些爱国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由农民阶级领导的抗英联合战线。

五月三十日清晨，三元里和各乡群众约五、六千人，手持锄头、铁锹、木棍、刀矛、石锤、鸟枪，浩浩荡荡地向英军占据的四方炮台挺进佯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率二千多名持新式武器的侵略军负隅顽抗。在战斗中，卧乌古曾下令炮兵发射火箭、火炮。农民群众按原定计划，且战且退，诱敌深入，牵着骄横愚蠢的敌人的鼻子进到牛栏冈附近。忽然一声锣响，埋伏四周的几千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漫山遍野，猛冲下来，围歼敌人。三星令旗迎风飘，锣声杀声冲九霄，刀斧砍去鬼头落，锄棒挥舞血满冈。贫苦农民颜长浩手持长矛冲杀在前，挺矛刺死英军少校毕霞。一个农民举起缴获的“洋枪”，击毙了英军旗手伯克莱。

下午一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滂沱。敌人陷在泥泞里难以动弹，枪炮淋湿不能使用。而人民群众却更加精神抖擞，越战越勇，乘机分割包围，痛歼敌人，“杀之如切瓜”<sup>①</sup>。这时，卧乌古及其率领的侵略军只好弃甲曳兵，狼狈逃走。“夷兵方舍命突围出，无奈人如山积，围开复合，各弃其鸟枪，徒手延颈待戮，乞命之声震山谷”<sup>②</sup>。直到晚上，在四方炮台守敌的接应下，侥幸活命的侵略者才连滚带爬，逃出丘陵地带，溜回四方炮台。这个在清朝统治者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海上霸王”，在中国人民的打击之下，完全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得到了广州城郊打石工人和手工业丝织工人的有力支援。以邓潜为首的打石工人高举铁锤、铁

① 蔡蕙清：《秋窗纪略之一》，《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9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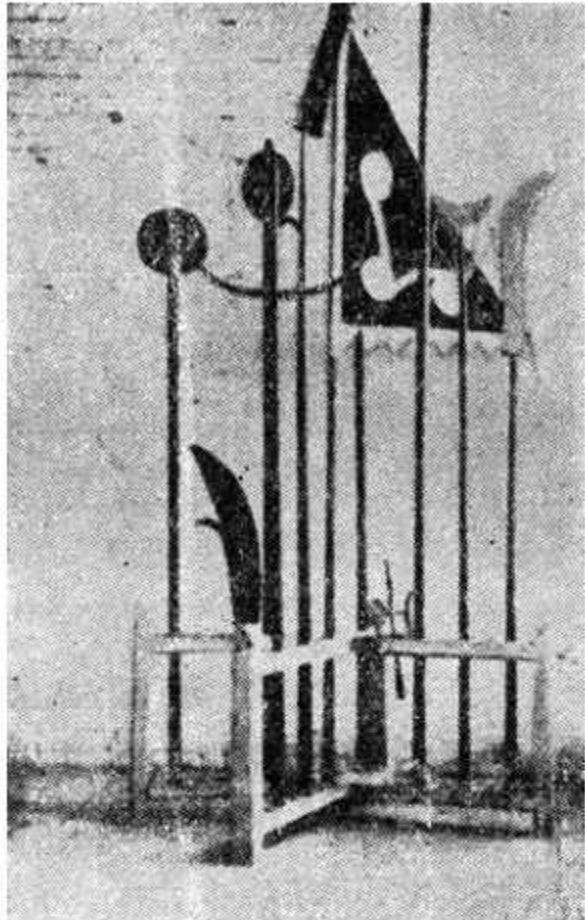
② 梁廷柟：《夷氛闻纪》，《鸦片战争》第6册，第43页。

棒猛击侵略者，或用大石头滚砸敌人。以陈棠为首的丝织工人一千余人也英勇参战，并杀死英海军军官一名。

在这场恶战中，“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sup>①</sup>，“少壮争御侮，老弱同赍粮”<sup>②</sup>，织成了一幅人民战争的画卷。这场激动人心的战斗，战果辉煌，共消灭了包括两名校官在内的敌军二百多人，生俘十多人，并缴获大炮两门、洋枪无数。

胜利喜讯传四方，群众

斗志更高昂。五月三十一日，广州附近佛山、番禺、增城、花县、从化等县四百余乡群众踊跃赶来与三元里群众会合，达数万人，把英国侵略军团团围困在四方炮台。义律率兵来救，也被包围。炮台四周，旗帜招展，刀矛如林，杀声震天。面临灭顶之灾的英国侵略者，龟缩在炮台里再不敢窜出来了。时间很快在过去，恐惧迅速在增长。他们心里明白：即使群众不立即冲上来，长期围困，也会饿死。诡计多端的义律、卧乌古搜索枯肠，终于想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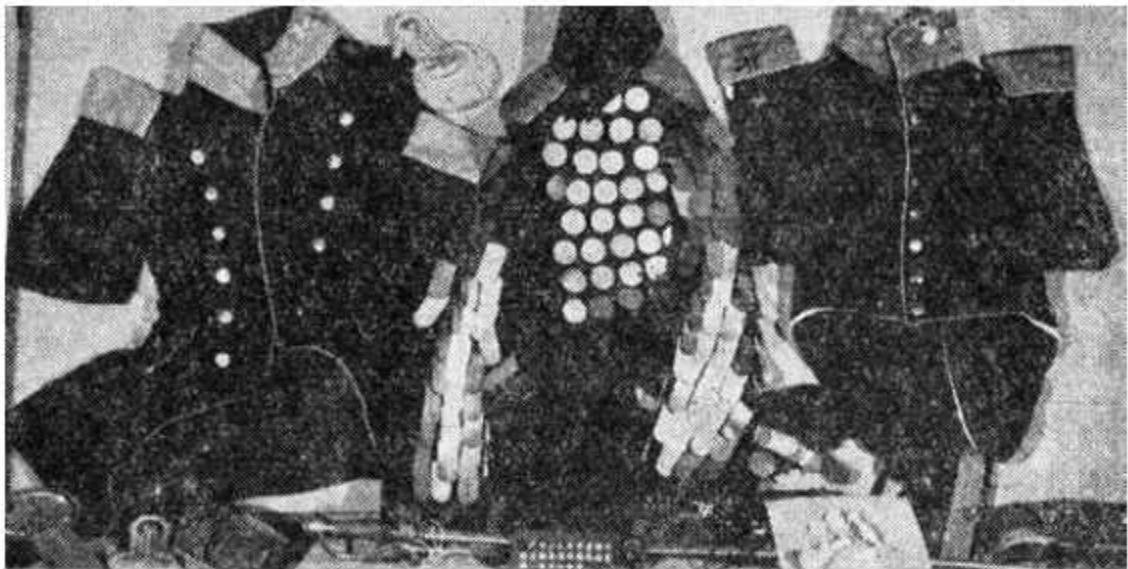


三元里人民抗英时使用的

武器和三星旗

① 张维屏：《三元里》，《鸦片战争》第4册，第716页。

② 何玉成：《团练乡勇驻扎四方炮台等处纪事》，《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97页。



三元里人民缴获的英军的军服、军刀和印章

一个鬼点子。他们密派奸细，混出重围，投书广州知府余保纯，威胁他说：群众“示威”如果继续下去，便立即“恢复敌对行动”。这纯粹是一种恫吓。可是在腐朽昏愦的投降派身上却生了效。余保纯连忙秉承洋大人旨意，带着番禺、南海两县知县，出城为敌人解围。余保纯使尽全身解数，欺骗威胁群众解围。一会儿他向群众打恭作揖，哄骗说：“现在已经议和了，洋人们不会再侵犯了，你们放了他们罢。”一会儿他又威胁士绅说：“将来万一有事，要你们负责”<sup>①</sup>，六百万元赎城费也得由你们赔还。士绅大部分是不当权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这些人在社会上有点“声望”，他们的态度对群众有较大的影响。在余保纯连哄带吓下，终于动摇了。有的“潜避”，有的转到余保纯一边，帮助“劝说”群众。一场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群众反侵略斗争，被官吏的卖国和士绅的动摇退却破坏了。余保纯“保”着外国主子，在群众笑骂声中狼狈撤走了。

<sup>①</sup> 《广东人民在三元里抗英斗争简史》，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6页。

群众队伍是暂时分散了，但抗英烽火并未熄灭。六月一日，被三元里人民打得落花流水的英国侵略军，如惊弓之鸟，灰溜溜地逃离广州。义律为了掩饰自己的血腥暴行和可耻败绩，于七日贴出了一张自欺欺人的“告示”，说什么：“此次百姓刁抗，蒙大英官宪宽容，后毋再犯。”<sup>①</sup>人民群众马上贴出《告示》，予以痛斥：你们这些侵略者所讲的“仁义”、“宽容”都是一片“诳言”和“假仁假义”，其目的无非是“哄骗百姓”，“用计骗我”；你们都是一些口头上讲“仁义”、“宽容”，实际上是“豺狼成性、抢夺为强”的家伙！人民群众还贴出《告示》警告侵略者说：如果你们胆敢再来，我们“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即杀尽你们这些侵略强盗<sup>②</sup>。这些充满战斗激情的豪言壮语，表达了中国人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强信念和英雄气概，同腐朽的清政府在侵略者面前畏敌如虎，妥协投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三元里人民把抗英斗争力量的基点，放在“自己出力”的基础上，这比起当时地主阶级抵抗派来要高明得多。

人民群众不仅怒斥外国侵略者，而且抨击清朝统治者压制人民、媚外投降的可耻行径，质问他们“有何面目见广东之士民？”“尔等狗官军，与禽兽何异？……要尔何用？秽臭万年也！”<sup>③</sup>九月，余保纯主持科举考试，考生大哗罢考，宣称“不考余汉奸试！”余保纯见众怒难犯，急忙上轿回衙，考生在后紧追，并用瓦块掷击，打破了他的坐轿。清廷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将余保纯撤职。

<sup>①</sup> 《广东人民在三元里抗英斗争简史》，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9页。

<sup>②</sup> 《广东义民告英人说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第1142—1143页。

<sup>③</sup>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

人民赢得了战争，战争教育了人民。三元里人民通过抗英斗争实践，革命觉悟大为提高。首先，他们对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贪婪和虚弱的本性，有了比较深刻感性的认识。他们揭露英国侵略者总是“得尺则尺，得寸则寸”<sup>①</sup>，贪欲没有止境；但又“欺善怕恶，欺软怕硬”，具有脆弱性的一面。他们认识到，尽管外国侵略者船坚炮利，只要依靠“荷锄之农夫，操戈御敌，纠壮勇数十万，何怕英逆之义律不可剪除？”<sup>②</sup>他们戳穿了英国侵略者的纸老虎原形，增强了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侵略者的信心，从而得出“鬼子不足怕”<sup>③</sup>的光辉结论。

其次，他们认识到清朝封建统治者实行“抑民以奉外”的反动方针，揭露清朝的“疆臣大帅，惜命如山，文吏武臣，畏犬如虎”。他们指出清朝当权派害怕敌人，仇视群众，为了“割地输金”以“求和”，不惜夸大侵略者的“强横”，诬蔑人民革命力量“涣散”<sup>④</sup>。他们看到“官兵不可恃”<sup>⑤</sup>，认识到“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sup>⑥</sup>的真理。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的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第一声，是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反侵略路线的胜利。它以不可磨灭的辉煌业绩，载入近代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荣史册。它所提供的丰富斗争经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胜利证明：第一，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民，是人心的向背，而不是什么新式武器。任何的新式武器

①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12—1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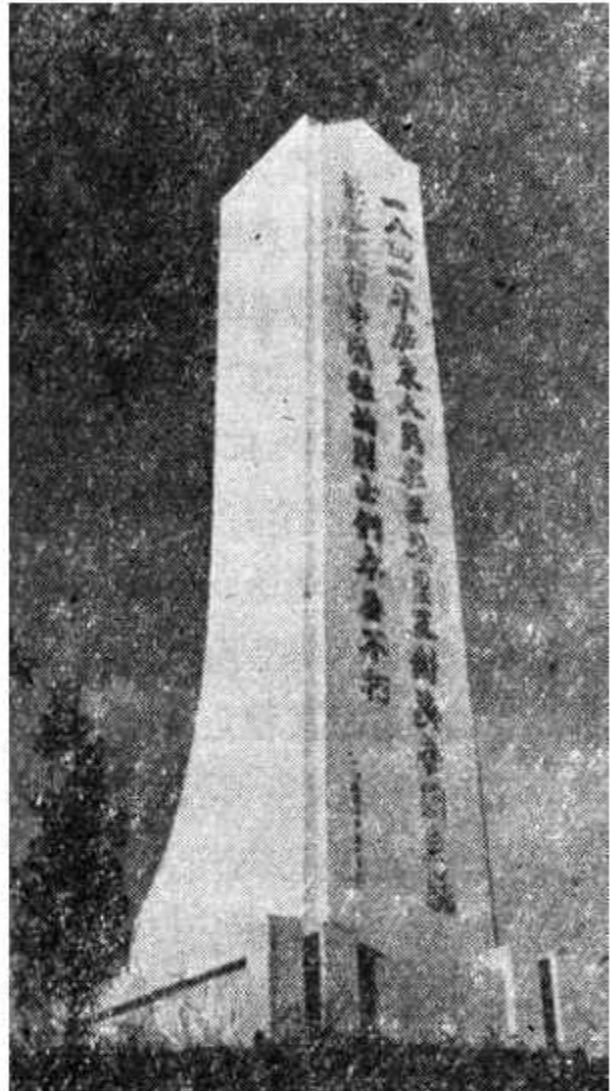
② 《三元里等乡痛骂鬼子词》，《鸦片战争》第4册，第16页。

③⑥ 《粤氛纪事》第1卷，第1页。

④ 《全粤义士义民公檄》，《鸦片战争》第3册，第354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第15页。

都救不了侵略者的命。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sup>①</sup>第二，弱国的人民也能够打败强国的侵略者。资本主义侵略者看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并不可怕，只要破除迷信，敢同它斗，它也没有啥。第三，要打败外国侵略者，保家卫国，就必须组织一支有战斗力的人民武装，坚持人民战争。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民武装组织“是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可靠的保障”<sup>②</sup>。



广州三元里抗英死难烈士纪念碑

#### 四、清政府卑屈投降

一八四一年四月，英国政府认为《川鼻草约》勒索太少，不予批准，改派殖民老手、狡猾政客璞鼎查代替义律，来华扩大侵略

<sup>①</sup> 列宁：《在罗果日——西蒙区工人、红军扩大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7页。

<sup>②</sup>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4页。

战争，索取更大权益。八月二十五日，英军侵占厦门，鸦片战争的第三阶段正式开始。当地群众五百人，组织起来，以抬枪袭击敌人，使侵略军不敢久踞。九月二十五日，英军又侵占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和郑国鸿率五千守军浴血奋战六昼夜，杀伤不少敌人，最后英勇牺牲。这次定海抗战，连参加这次战争的英国侵略军也不得不承认：“有些汉军军官表现得很英勇，汉军总兵葛帅在长列炮台中阵亡。他的僚属和我们的军队短兵接战，都英勇地与他同时殉节。高地上的旗手选了一个最显著的地位，站着摇旗，丝毫不怕落在他四旁的从轮船打来的炮弹。最后弗莱吉森号的一颗炮弹把他打倒，另一个人赶紧取其位而代之。”<sup>①</sup>定海陷落后，英军又接连侵占了镇海和宁波。在镇海保卫战中，主张抗战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蒙古镶黄旗人）在战前集众宣誓，表示决不退却，决不议和，誓与镇海城共存亡。广大爱国官兵在裕谦的激励下，士气高涨，斗志昂扬。可是，扼守镇海城外制高点的浙江提督余步云却贪生怕死，首先临阵逃跑。英军蜂拥登岸。裕谦力战不支，投河殉职，履行了自己的誓言。英军在进犯浙江的同时，两次派兵船侵入台湾。台湾道姚莹和总兵达洪阿等奋起迎战，得到人民的支持和配合，出现了爱国军民一致抗敌的局面。英国侵占台湾的企图未能得逞。

英军占领定海、镇海、宁波以后，浙东人民自动组成“黑水党”，随时随地狙击英国强盗，“两月之中，擒斩数百，英人大恐，遂弃郡城”<sup>②</sup>。定海县三十六岙民众“立誓订盟”，并散发《告白》说：“倘英夷尚敢盘踞，与我抗战，当与之约定日期，船勇自外进攻，我等自内杀出，……彼夷虽有炮船之利，何难指日歼

<sup>①</sup>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卷2，第5章，《鸦片战争》第5册，第264页。

<sup>②</sup> 《定海直隶厅志》，《鸦片战争》第4册，第383页。

除。”<sup>①</sup>宁波民众也散发《公启》，愤怒声讨侵略军占领三城后的血腥暴行，号召人民“合力同心，定期起事”，消灭侵略者，使其“不在浙江省滋闹”<sup>②</sup>。

浙江连失三城，死了一个总督、三个总兵，形势变得极为严重。旻宁的乘势了结战事的幻想破灭了，“太平统治”保不下去了，又只好重振旗鼓，被迫应战。十月十八日，旻宁慌忙调兵遣将，派另一皇侄、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武将军，侍郎文蔚、蒙古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牛鉴为两江总督，调集数省军队到浙江应战。奕经与奕山一样骄奢淫逸，腐败无能，他敌视人民，诬蔑浙江人民十之七、八是“汉奸”。奕经走的仍是奕山走过的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老路。奕经一路游山玩水，沉湎酒色，视战争为儿戏。一八四二年一月间，奕经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英军上船逃往外洋。他周围一帮阿谀奉承、腐朽透顶的僚属们，竟胡说这个梦是“吉祥的征兆”，文蔚为了附和竟捏造自己也做了同样的梦。一八四二年三月，奕经为了实现梦境幻觉的“胜利”，竟决定兵分三路进发，幻想侥幸同时克复三城。结果，因轻举妄动，一触即溃，从此不敢再战，只好乞怜求降。

清政府的再次出师又告失败，进一步暴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脆弱，“文职无能，武官怕死”<sup>③</sup>，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恨。同时在战争过程中，官僚们乘机勒索供应，大肆剥削百姓，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广大人民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人民起义此伏彼起。一八四二年初，湖北崇阳爆发了以钟人杰为首的会党起义。这时，以旻宁为头子的清政府深恐“外患未

<sup>①</sup> 《定海县三十六番民人告白》，转引自《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第299—320页。

<sup>②③</sup> 《宁波众义民公启》，转引自《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第302页。

除，内讧又起”<sup>①</sup>，十分害怕武装抗英的人民“乘机窃发”、“潜投逆党”，推翻其反动统治，认为“内乱”重于“外患”。为了集中力量镇压革命，决计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向侵略者投降。旻宁谕令官吏说：“攘外必先安内，禁暴即以爱民。”<sup>②</sup>这就是说，旻宁宁肯对敌人投降，决不允许人民起来造反。因此，他愈害怕人民，对敌人的妥协投降就愈加坚决。旻宁对外国侵略者的任何行动，都是从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利益出发的。四月，旻宁派满洲贵族、盛京将军耆英和原来因与侵略者妥协而被撤职的两江总督伊里布向英国侵略者求降。旻宁密谕耆英、伊里布：一定要“慎持国体，俯顺夷情……不必虑有掣肘，以致中存畏忌”<sup>③</sup>。耆英、伊里布秉承旻宁意旨，急切卖国求降。可是，侵略军却不急于罢手。因为他们深知南京是当时的江南重镇，并控制长江、运河两大水道，如果攻占南京，就等于卡住清政府的咽喉，使江南的大量漕米和税银不能北运，从而便于迫使清政府接受其全部侵略条件。六月，英军进犯长江。江南提督、年近七十的老将陈化成，率领水陆官兵五千人守卫吴淞炮台，抗击英军。在激战中，他身负七伤，仍亲燃大炮，轰击敌人，击伤敌舰数艘。但由于扼守侧面的两江总督牛鉴等纷纷临阵脱逃，放弃炮台，使陈化成腹背受敌，最后血染战衣，以身殉国。吴淞口、上海、宝山相继失守。七月，英军进犯镇江。当时镇江守城爱国官兵总共不过一千五百人，但他们毫不畏惧，顽强应战。他们避开英军新式武器的优势，采取了近距离的冲锋，短兵相接的格斗。就连侵略者的记载也说：城内的“很多清军就直向英军冲击。有时他们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5，第23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5，一八四一年道光上谕。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5，一八四一年道光密谕。

冲到英军警卫哨去，捉住他们的敌人，然后抱起来一起跳下城墙去”，“他们的确是不害怕任何大刀搏斗或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的”①。

《横山乡人类稿》对清军爱国官兵的坚决抵抗曾有一段生动的记载：“英登北固山，以火箭火弹迸射城中，镶白旗举人噶喇土实十三门未成，凭城发炮应之，持时许，……。十三门已倾十余丈，英践而登，噶喇杀十数人。一青州兵持长矛，贯一夷，未及拔，复贯一夷，矛不能举，夷拥砍之，城遂陷。”城陷后，镇江全城人民宁死不屈，有男女老幼全家殉难的。副都统海龄也举火自焚。这是鸦片战争中清军爱国官兵对敌人进行的一场顽强英勇的白刃战，给予侵略者极大的杀伤。英国侵略军自己招供伤亡一百八十五人。镇江军民在抗英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威武不屈的战斗精神，是惊天动地，闻名世界的。当时，伟大导师恩格斯曾热烈地赞扬说：“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②

英国侵略者为了迫使清朝统治者屈服就范，以便打开中国大门，除了利用大炮以外，还利用孔孟之道作为敲门砖。他们指责清政府说：“久延兵祸，非我大英之罪，实由贵官不施仁义所致。”③伊里布等人也公然表示对外国侵略者要讲孔孟的“忠恕之道”④，胡诌什么：“船坚炮利是霸道，非王道也。天朝所行，俱

① 杨纳德：《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一八四四年英文版，第2卷。

② 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89—190页。

③ 张喜：《抚夷日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356页。

④ 《伊里布致璞鼎查照会》，《鸦片战争》第5册，第475页。

是王道”，“我朝以德服人，不在兵威”<sup>①</sup>。他们扯起孔孟之道的破旗，作为对外屈膝投降的理论根据。八月初，英军兵临南京城下。八月二十九日，在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汉华丽”号上，卖国贼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与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sup>②</sup>鸦片战争的失败，决定性的因素是清政府“抑民以奉外”<sup>③</sup>的反动卖国路线，而不是英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它集中地反映在以下三个问题上面：第一，对当时中国人民自发的抗英斗争，清政府不仅不去动员、号召和组织，反而荒唐地指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潜相煽惑”，“为害甚大”，而横加反对、破坏甚至镇压。清朝反动统治者甚至堕落到去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爱国人民的地步。这样的反动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的。第二，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在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是有决心、有成果的。但他们最终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他们“徒有救国之志，而无尺寸之权”<sup>④</sup>。由最反动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掌握了战争的领导权，由琦善、耆英、伊里布等这些投降主义分子去抵抗外国侵略者，无疑是缘木求鱼。第三，政治上的反动和腐朽，带来了军事上的无能和腐败。到鸦片战争前夕，八旗、绿营官兵，多半懒于操练，纪律松弛。到了战争爆发，在投降派的领导下，许多地区守军，如虎门、广州等地，是远远看见敌军即开炮轰击，等到敌人靠近竟逃之夭

---

① 张喜：《探夷说帖》，《鸦片战争》第5册，第351—352页。

② 转引自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日《人民日报》。

③ 《清史列传·耆英传》，《鸦片战争》第6册，第357页。

④ 陆嵩：《有问贼中事者，诗以答之》。

夭。又如宁波、余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竟不战自弃，沦于敌手。英国侵略者把这类情况看作是他们“唾手而得的胜利”<sup>①</sup>。正如魏源所说的：“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sup>②</sup>

### 第三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和人民的继续反抗

#### 一、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沉沦

继《中英南京条约》之后，英国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于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在香港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十月八日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作为《中英南京条约》的补充。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英国侵略者从中国夺取了许多特权，其中最主要的是：

（1）强占香港。侵占中国香港作为侵华的经济和军事据点，这是英国侵略者蓄谋已久的。这个罪恶的企图在一八四一年由义律和琦善签订的《川鼻草约》中加以实现。《草约》签订后六天，英国侵略军即强行占领了香港。《南京条约》签订时，英国侵略者再次把强占香港列为重要内容写进第三款。从此，英国资产阶级的这一侵略野心得逞了。

（2）勒索巨额赔款。《南京条约》第四、五、六款分别规定，中国赔偿鸦片烟费六百万银元、商欠三百万银元、军费一千

① 杨纳德：《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一八四四年英文版，第2卷。

② 魏源：《海国图志》卷1。

二百万银元，共二千一百万银元（广州赎城费六百万银元还不计在内），分四年付清。这个数目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是英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掠夺。

（3）协定关税。《南京条约》第十款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这就是说，中国海关进出口货物的税率，无权自行确定，必须与英国共同议定，只要英国不同意，中国就不得增加海关税率。《五口通商章程》还将中国的海关税率大大压低，规定绝大部分主要货物的税率为百分之五。

（4）开放五口。《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国有权派驻领事官员，维护其侵华利益。《五口通商章程》又规定，在上述各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军舰一只驻守，造成外国兵轮可自由进入中国领海的局面。《虎门条约》还规定，准许英国侵略者在五口租地盖房，永远居住，这实际上是“租界”制度的开端。

（5）自由贸易。《南京条约》取消了公行制度，规定在五个通商口岸，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同中国商人做生意，这就使得英国可以按它的需要迫使中国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

（6）保护汉奸。《南京条约》第九款规定，凡是为英国的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效劳的汉奸、卖国贼，中国政府必须准许“全然免罪”，已被监禁起来的，也必须全部“加恩释放”。这对中国的内政是粗暴的干涉，同时又无异于鼓励那些民族败类、汉奸更死心塌地充当侵略者的走狗和帮凶。

（7）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款规定，凡是中国人和英国人“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即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官）照办”。这就是说，英国

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对中国人民犯了罪，中国政府却无权根据中国法律来制裁，而是要由英国领事根据英国法律来定罪。

(8) 片面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规定，如果中国政府以后“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就是说，将来无论那一个国家如果从中国夺得了新的侵略特权，英国都有权取得一份。

《南京条约》虽然未提鸦片问题，但这只是因为清朝官吏认为用不着在条约上规定鸦片贸易为合法的缘故，他们早向璞鼎查作了保证：不管外国商船带不带鸦片，中国不必查问，也不采取任何行动。在英国侵略者和清政府这一默契下，不久鸦片贸易又恢复了战前的“繁荣”。

《南京条约》是资本主义侵略者强加给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第一副枷锁，是中国开始从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标志。

《南京条约》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打开了大门，从此各国侵略者接踵而至。

美国侵略者在可耻的鸦片贸易中，是英国资产阶级最大的伙伴，通过明目张胆的毒品走私，从中国抢走了大量的白银和原料；在鸦片战争中，充当英国侵华的主要帮凶，派军舰到中国领海，为英国侵略军助威壮胆，替英国商人转销商品、代购原料。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侵略者掠夺中国的野心急剧膨胀。一八四四年二月，美国专使顾盛带领三艘兵舰在中国海面挑衅，扬言“有使中国再尝战祸之必要”，用武力要挟清政府。清政府在美国侵略者的威逼下，派卖国老手、两广总督耆英为钦差大臣，同顾盛谈判，于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也就是《望厦条约》。

美国通过《望厦条约》不但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取得的全部特权（除割地、赔款外），而且还攫得了英国所未取得的一些新特权，并对《南京条约》上的某些条款作了对侵略者更为有利的具体规定。

（1）《望厦条约》第二款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美国）领事等官议允”。这就是说，中国要变动海关税率，必须经过美国领事同意；同时由于有片面最惠国待遇这一特权，所以这种变更也就必须得到所有与中国订有不平等条约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意。

（2）《望厦条约》第十七款规定，美国人有权在五口通商口岸租地建楼，开设医院，建立教堂，进行思想文化侵略。

（3）《望厦条约》第二十五款规定，美国人之间以及美国人与任何其他外国人之间在中国发生的诉讼，“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从而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

（4）《望厦条约》第三十二款规定，美国兵船可以任意到“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各港口中国官员须以“平行之礼相待”；第二十六款规定，美国“贸易船只进中国五港口泊”，“中国无从统辖”，进一步侵犯了中国的领海权。

（5）《望厦条约》第十九款规定，对于在华的美国侵略者，清政府必须“时加保护，令其身家安全”，中国人民“不得欺凌骚扰”；如果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斗争，清政府地方官员必须“派拨兵役弹压查拿”、“按例严办”。

（6）《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款规定，十二年后修约，又为侵略者日后索取更多侵略特权留下了祸根。

《望厦条约》是美国初期侵华活动的第一个罪恶记录，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美国代表顾盛在给美国国务院的

报告中直言不讳地供认：“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门户。现在，英国及其他国家也要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sup>①</sup>因此，就连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丹涅特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在《望厦条约》中第一次显现了帝国主义的色彩。”<sup>②</sup>

法国也紧步英、美后尘，于一八四四年八月，派遣刺萼尼为专使带着八艘兵舰前来中国，进行讹诈，趁火打劫。清政府忙派两广总督耆英前往交涉。十月二十四日法国强迫清政府在广州附近黄埔的法国军舰“阿吉默特”号上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获得了同样的侵略特权；不久，法国又迫使清政府取消了对天主教的禁令。外国传教士从此可以公开在中国传教，进行侵略活动。

继英、美、法之后，沙俄、意大利、葡萄牙等也纷至沓来，要求正式订立通商条约，争夺权益，而清政府抱定“一视同仁”的卖国原则，一概应允。这样一来，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就开始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洞开了。

毛主席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sup>③</sup>

战前，中国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开始遭到破坏。随着英国侵占香港，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也于一八四九年驱逐中国澳门官吏，拒交地租，强占澳门。《南京条约》规定的五个通商口岸，在一八四三——一八四四年相继开放。上海在五口中发展最快，英国侵略者在一八五四年首先胁迫清政

---

① 詹逊：《美国外交史》。

② 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58页。

③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9页。

府地方官员，把上海的一块地方划为“租界”。接着，外国侵略者就得寸进尺，巧取豪夺，在五个通商口岸逐渐建立“租界”，并攫取了“租界”中的行政、司法和警察权，把“租界”变成一个个“国中之国”，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一个个堡垒。这种“租界”制度，后来推广到全国各个通商口岸，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这样，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就出现了第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领海权是一个国家巩固国防的重要权利，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朝政府允许侵略者的兵船和商船任意巡行各口。这就为外国侵略者的侵华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从此之后，外国侵略者的船只就可以在中国的领海内不受约束地横冲直闯，中国的领海主权开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攫得了领事裁判权，使外国侵略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恣意妄为，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罪恶活动，肆无忌惮地欺压中国人民，而中国政府却无权制裁这些犯罪行为，这就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关税自主是一个国家进行平等的国际贸易，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的重要主权。战前中国关税自主，战后侵略者取得协定关税的特权，强迫中国以值百抽五的税率收税。在当时世界各国纷纷建立关税壁垒，对进口货物征收重税，以保护本国经济，中国海关却被压得如此之低，成为世界上进口税率最低的国家，而且又不得自行调整，这就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从此，中国政府就不能完全当中国海关的家了，中国的海关不仅起不了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作用，反而开始成了外国资本主义推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工具。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就是依靠这种特权，随心所欲地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片面最惠国待遇，是侵犯中国主权最严重的一条，它使中国逐渐变成了资

本主义世界共同压迫、竞相剥削的对象，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任人宰割的境地。总之，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领土完整受到破坏，司法、海关等各种主权也受到侵犯。从此，中国开始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开始了被外国侵略者欺凌压榨的悲惨历史。

战前，中国是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外国商品在中国大量推销，沉重地打击了中国城乡的手工业，开始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也刺激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生产商品化的程度逐步提高。例如，战后丝、茶出口激增，刺激了国内丝、茶生产。在很短的时间内，江浙一带的缫丝业，湖南等地的植茶业，都有大量的发展。上海还出现了专门供出口的茶叶厂。但是，这时中国丝、茶商品经济的发展，却开始丧失独立性，逐渐为外国侵略者所控制，走上依赖外国资本的道路。

战前，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主要有地主和农民两大对抗的阶级。战后，除了原有的地主和农民这两大阶级以外，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侵略者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中国沿海城市的洋行、银行、轮船等企业中雇用着各种买办和买办商人。这时的买办和买办商人，成了外国侵略者豢养的、并为其政治、经济侵略服务的工具。他们有的直接受雇于外国商行；有的开设行栈为外国商人推销商品和收购出口货物；有的还通过捐纳，取得官职，成为外国侵略者勾结清朝政府共同镇压革命的媒介。战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在中国沿海城市里出现的第一批买办商人，人数虽然还不多，也还没有形成一种社会力量，但是他们力量的增加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扩张进出口贸易，他们自己也从中获得了厚利，发财致富。他

们是作为一种反动的社会力量，出现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寄生性和腐朽性，与地主阶级一样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人是近代买办阶级的前身，后来发展成为买办阶级。另外，战后不久，随着外国资本首先在香港、广州和上海等通商口岸，经营近代工业，雇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从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他们主要是通商口岸的码头工人、外国轮船上的海员。

战前，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末期阶段，“**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sup>①</sup>因而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战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sup>②</sup>因此，中国人民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已不仅仅是反封建的任务，而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sup>③</sup>。

既然战后中国社会开始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所以，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以上这些都充分证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

<sup>①②③</sup>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8、594、600页。

## 二、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的胜利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sup>①</sup>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投降了。但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却始终坚持反侵略反投降的革命路线，高举爱国大旗，继续斗争，狠狠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广东地区人民由于受外国侵略的时间最早，受投降派的危害最深，因而反侵略反投降的斗争也最为激烈，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

广州城乡人民，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胜利后，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保卫自身的生存，纷纷利用“社学”组织形式，建立群众武装力量，不断抵抗侵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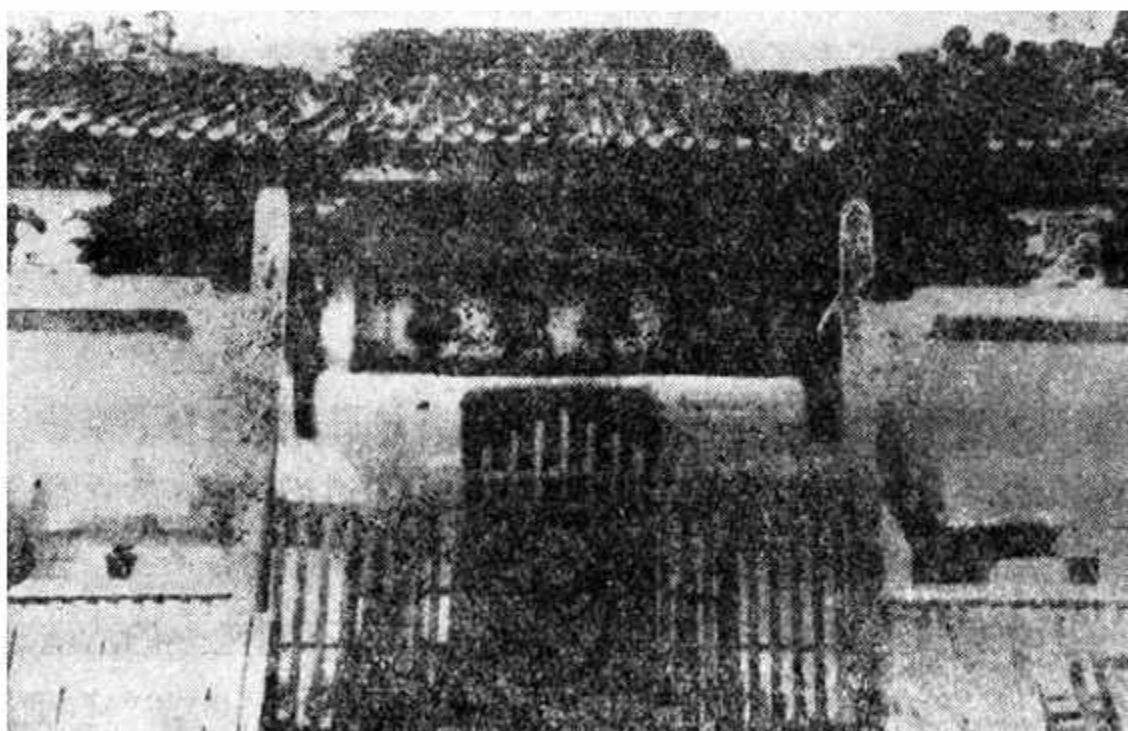
社学是一三七五年（明洪武八年）朱元璋下诏建立的。清初沿明制，后来或称书院，或称义学。成立社学的目的，在“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既为“学人课艺之所，亦为绅耆讲睦之所”。因此，当时的社学是农村中地主士绅进行封建教育的反动组织。清朝中叶，这些社学逐渐地变成了地主士绅兴办“团练”、以“御盗贼”的反动场所。<sup>②</sup>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着英国侵略者的武装进犯，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在三元里人民奋起抗英的影响下，广州一带的社学也起来参加抗英斗争。在鸦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95页。

<sup>②</sup>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32页。

片战争结束后，在广东各地区发展到好几十个。参加的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万人。

最早成立起来的，是广州西北三元里一带的升平社学。一八四二年夏，他们又在升平社学的基础上建立升平总社。附近江村等地又建立升平公所，作为辅助。接着，广州东北路各乡和城南、河南、城内等其他地方也纷纷组织起东平、南平、隆平、城厢等社学。各个社学之间，互为唇齿，守望相助，互相联络，气息



升 平 社 学

相通。升平社学由于成立早、规模大，又是以三元里一百多乡群众为基础，具有抗英斗争的经验，因此，实际上成为各社学的首领。

社学的基本群众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商店店员。地主阶级中一部分具有反抗侵略思想的爱国士绅，在社学中起了一定的组织和领导的作用。社学的任务是，“无事负耒力田，闻警则

操戈御敌”，“踵寓兵于农之法”<sup>①</sup>。他们根据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经验，采取了“不借官饷，亦不受地方官约束”<sup>②</sup>的方针。

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十月，升平社学的两位爱国知识分子钱江、何大庚草拟了《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愤怒声讨英国侵略者“据我土地，戕我文武，淫我妇女，掠我资财”的滔天罪行，无情揭露投降派“竭百千万氓庶之脂膏，保一二庸臣之躯命”，“不顾国仇民怨，遽行割地输金，有更甚于南宋奸佞之所为者”。《公檄》还坚决反对“开门揖盗，启户迎狼”，呼吁“共引团练”，“无事则各归农业，有事则协心从戎”<sup>③</sup>，号召全省人民起来为反对英国在广州“创立码头”而斗争。檄文刻印后，不胫而走，起了很大的动员群众的作用。广州“富者助饷，贫者出力，举行团练”，“旬日之间，城镇集灯楮旗布为之一空”<sup>④</sup>。社学这种极其强烈的反英宣传斗争，使当时在广州主持清政府对外交涉的伊里布及其主要助手黄恩彤等，感到巨大压力和惊恐。黄恩彤曾忧心忡忡地说：“粤东新遭警扰，内民与外人为仇，募勇数万，结队横行，骄悍难制，余窃忧之。”<sup>⑤</sup>卖国贼伊里布为了不得罪洋人，扫除投降障碍，竭力破坏抗英力量。他除了下令遣散、裁减社学外，竟以“倡乱”罪名，把钱江充军新疆，何大庚递解回原籍。伊里布使用这些卑鄙手段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在人民的唾骂声中，终于在一八四三年“忧患成疾，以致出缺”。接替伊里布职务的是签订卖国条约的首席代表、媚外成性的耆英，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

①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65、166页。

②④ 夏燮：《粤民义师》，《中西纪事》卷13。

③ 《全粤义士义民公檄》，《鸦片战争》第3册，第353—355页。

⑤ 黄恩彤：《粤东复市第四》，《抚远纪略》，《鸦片战争》第5册，第419页。

一八四二年底广州爆发了火烧洋馆的斗争。这次斗争是因为英国水手抢夺中国小贩货物，并行凶伤人，后逃入洋馆，激起群愤，数万群众包围和焚烧了洋馆。洋馆起火后，清朝官员带兵来救，被愤怒的群众用飞石击退。英国商馆被烧毁后，广州泥瓦工人一致商定不再给英国人造商馆。清朝反动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站到英国侵略者方面，杀害了十余名无辜的群众，赔偿二十六万银元，公然为侵略者张目。

一八四四年，广州人民又开展了反对英国强租河南地区的斗争。代替璞鼎查新任香港殖民总督的德庇时，企图在广州河南强划“租界”，激起了广大居民和爱国士绅的反对，他们会齐四十八乡三千余人到洋馆抗议示威。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迫使英国侵略者不得不放弃强租河南的无理要求，暂时停止了在广州建立“租界”的活动。清朝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的抗英斗争，深感不安，十分仇视。耆英污蔑示威群众是什么“游棍”、“无赖”、“匪徒”。黄恩彤则公然说什么：“粤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也”<sup>①</sup>，主张“抑民以奉外”，妄图伺机进行破坏。

广州人民所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反侵略斗争，是阻止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的斗争。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一向居住广州城外洋馆。《中英南京条约》并没有规定允许英国侵略者入城。但是，英国侵略者肆意歪曲条文，硬要进城。对于这种无理要求，广州城乡人民纷纷抗议，一致拒绝。但英国侵略者认为入城与否，直接关系到自己的“体面”和侵略利益。如果放弃，就是示弱，会引起连锁反应，中国人民就会进一步迫使它放弃已经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这对以后的侵略活动，显然是非常不利

---

<sup>①</sup> 黄恩彤：《粤东复市第四》，《抚远纪略》，《鸦片战争》第5册，第419页。

的。因此，英国侵略者利用各种手段威迫清朝官吏屈服。英国的帮凶美国和法国，也同英国一鼻孔出气，完全支持入城要求。于是，入城与反入城的斗争，就成了鸦片战争后中外政治关系上较为突出的问题，呈现出十分尖锐复杂的情景。

一八四四年，德庇时向两广总督耆英又提出进入广州城的要求。耆英于一八四五五年三——十一月间，多次复信德庇时，卑躬屈膝地表示：“本大臣与贵公使，心心相印”，“同心同德”，对“入城一节，……并非本大臣别有意见”，“无如众志甚坚，牢不可破”，“若强行势迫，诚恐激起事端”，“此中为难之处，不独上帝可以鉴察，贵公使应亦谅及苦衷也”<sup>①</sup>。这完全是一副摇尾乞怜的奴才相！然而，投降派的苦苦哀求，并没有使侵略者发“善心”而“谅及”。相反地，投降派的卑怯乞怜，更加助长了侵略者的凶焰。一八四五年底，德庇时一面扬言如果再不允许入城，就要发动战争；一面继续利用孔孟之道作为打开广州城门的敲门砖，说什么“于五常之所重要者，乃信义也”<sup>②</sup>，妄图用“信义”来诱使敞开广州城门。一八四六年一月十日，德庇时邀耆英到香港，当面进行威逼和利诱，要耆英就进城一事，张贴告示，晓谕居民。在侵略者软硬兼施的手法下，耆英即向旻宁奏请说：“复查前议条约，并无准夷人进城之说，而稽考历来案牍，亦无不准夷人进城明文，且福州、宁波、上海等处，业已均准进城，独于粤省坚持不允，尤难免有所借口。”<sup>③</sup>旻宁批准了英国人入城的要求。耆英抓住了这根救命的稻草，在一八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置人民的反对于

<sup>①</sup> 《耆英、黄恩彤照复》（第54、60、136、47号），（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篇稿，第14、16、10、19、11—12页。

<sup>②</sup> 《耆英照复》（第136号），《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第19页。

<sup>③</sup> 黄恩彤：《与英酋德庇时论进城不便》，《知止堂外集》卷6，第4—5页。

不顾，张贴“告示”，准许英人入城，并禁止省城内外绅民人等阻挠，同时派广州知府刘浔到英国兵船上和德庇时密约进城日期和准备工作。

耆英这个抑民卖国的“告示”一贴出，人民群众“莫不闻声发指，怒气冲冠，皆思食其肉，而寝其皮”<sup>①</sup>，把“告示”撕个粉碎，并且在广州城厢内外到处张贴痛斥耆英卖国的揭帖，揭露耆英“病国害民，贪爱夷利，数百万银”，指出“赃官误国，甘丧廉耻，从夷所欲，天实厌之，倘夷入城，鸣鼓攻之”<sup>②</sup>。人民群众从三元里抗英斗争中认识到要反侵略必须反投降，因此，他们警告侵略者及其走狗：“我中华百姓，先杀勾通卖国之奸官，然后与鬼子决战，……切莫效从前听信广州府余保纯所劝，放生四方炮台之被围鬼子也。”<sup>③</sup>

一月五日，群众闻知广州知府刘浔从英船回城，纷纷拽带刀械，聚集府署，去找刘浔算帐。刘浔吓得从后院越墙逃命。群众宣布刘浔是卖国汉奸，把他的朝珠公服拿到当街烧毁。官兵前来镇压，也被群众撵走。声势浩大的人民反侵略斗争浪潮，弄得耆英束手无策，连声哀叹：自己“实已智穷力竭，无可如何”<sup>④</sup>。但他并不死心，他想效法一八四一年五月余保纯破坏三元里人民围困英军的卑鄙伎俩，企图分化瓦解反入城斗争的“社学”，请士绅出面转劝民众。由于这时武装的人民群众比过去更有组织和力量，由于英国侵略者如果进入广州城会更直接危害到士绅

① 《阖城公启》，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后の中英抗争》资料篇稿，第279页。

② 《匿名揭贴》，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后の中英抗争》资料篇稿，第269—270页。

③ 《明纶堂绅士议论》，同上书，第274页。

④ 《耆英照复》（第45号），同上书，第44页。

的利益，所以，士绅的态度比较坚定，答复耆英：“吾乡之民能为国家效剿力，不愿从抚。”<sup>①</sup>耆英为了防止群众的激变，不得已在一月十六日贴告示表示拒绝英人进城。人民群众纷纷贴出《公檄》，无情揭露英国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号召群众约期进攻城外洋馆，“内则斩诛丑类，外则焚毁其巢，同心合力，尽剿根株，以彰天讨而申公愤”<sup>②</sup>。德庇时慑于群众威力，缩回香港，这次入城的企图没有得逞。

一八四七年春，野心不死的德庇时，又卷土重来，率千余侵略军突袭虎门，闯近省城，强要进城。广大群众纷纷贴出揭贴，号召“四民人等，务宜齐心杀绝，不准一步入城”<sup>③</sup>。耆英既害怕人民反抗，又害怕英国人，竟偷偷地允许英人两年后进城；同时运动朝廷内调，离开广东，溜之大吉。

一八四八年三月，徐广缙继耆英任两广总督，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总督文翰也代替了德庇时的职务。

一八四九年，文翰率领兵船到虎门口外，要求履行耆英两年后允许入城的诺言。文翰声言“如百姓不欲其进城，情愿助兵弹压”，并以“驾火轮船驶往天津询问京师大臣”，派兵船开入长江“阻运截漕”来恫吓徐广缙。徐广缙经不起威胁，向旻宁表示对进城一事，“实已智尽能索”，如果“拒之过峻，难免激成事端”，要旻宁批准入城要求。旻宁答复说，英国“既重提进城之说，该督若再三阻止，反失含容之度。自宜酌重日期，暂令人城瞻仰”。旻宁担心人民群起抗争，要徐广缙“至诚劝勉”，欺骗人民说，洋人在

① 夏燮：《中西纪事》卷13，第2—3页。

② 《广东全省水陆乡村志士义民公檄文》，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后の中英抗争》资料篇稿，第207页。

③ 《匿民揭贴》，同上书，第279页。

广州“只准暂入，不准常住”<sup>①</sup>。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却根本不听这一套，坚决反对英人进入广州城。广州城厢内外组织起十万余人的武装，昼夜操练，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广州商人发起抵制英货运动，宣布与侵略者“一律停贸”。社学发布《公启》说：

“现计各乡团练义勇，不下十万。饱德之义士，乐助军粮。荷锄之农夫，尽皆劲旅。壮士枕戈，不患逆夷之反复。水陆兼备，何忧鬼蜮之含沙。虽该夷恃其船坚炮利，难当我众志成城”，务使侵略者“片帆莫返”<sup>②</sup>。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徐广缙赶紧向旻宁报告：“提及进城，无不立动公愤……纵以至诚劝说，断难望其曲从”，因而不得不拒绝文翰的入城要求。他盘算：若“婉阻之（指入城）未必遽开边衅，轻许之必至立启兵端。且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进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讧”<sup>③</sup>。事实很清楚，徐广缙所以作出拒绝英人入城的决定，完全是由于广州人民强大压力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害怕群众的怒火烧到自己的头上来。

文翰老羞成怒，悍然率兵船闯入省河，各乡群众闻讯纷纷赶来，省河两岸汇集群众十余万人，摩拳擦掌，杀声震天。文翰畏惧群众声势，于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腕，请求“罢兵修好”，暂时放弃了入城的要求，退回香港。持续了七年之久的反入城斗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英国侵略者的失败而暂告结束。当然，英国侵略者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对英勇不屈的广州人民恨得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第39—40页。

② 《升平社学众绅耆公启》，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后の中英抗争》资料篇稿，第326页。

③ 徐广缙：《奏孰筹英人进城一事实属万不可行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第3170—3171页。

咬牙切齿。巴麦尊疯狂地叫嚣：“要使广州片瓦不留，给该城居民以一次严厉的惩罚”，“我们不得已对中国实行另一次打击的时间快要到来。……这些象中国、拉丁美洲那样半开化的政府，为了使他们听话，需要每隔八年或十年就狠狠地揍一顿”<sup>①</sup>。这个侵略者的战争叫嚣，不仅表现出了他们的猖狂，而且从反面说明了中国人民反入城斗争的胜利，对他们的打击是多么的沉重。

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是鸦片战后侵略与反侵略、投降与反投降斗争的重要内容。它的胜利，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胜利的继续和发展。

一八四九年，文翰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供认：“我绝对认为附近民众和团勇会坚决抵抗我们入城，结果使我们非用极大的武力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他们的抵抗力量比一八四一年第一次抵抗时要强得多。”<sup>②</sup>这就说明，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锻炼，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力量是大大增强了。

在战后广州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社学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社学内外的广大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城市其他劳动群众是反侵略的主力军，他们始终英勇奋战在抗英斗争最前线。中国人民在战后为解除中国半殖民地地位而做出的巨大贡献，将彪炳史册，永放光辉。一部分爱国士绅也曾卷入了群众抗英斗争浪潮，其中有的人如钱江、何大庚等，在反对英人入城问题上，还是比较积极坚定，也反对卖国官吏。而另一些人却与官府保持种种联系，往往在官府出面干涉或镇压抗英群众的时候，发生动摇甚至叛变。如火烧洋馆斗争发生后，当卖国的官府捕杀几名群众，并将钱江、何大庚等三人治罪时，一些所谓“在城公正绅士”，

<sup>①</sup> 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00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99页。

立即为自己洗刷，声明“并不知情”、“并未与闻”<sup>①</sup>。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六名英军到广州城郊黄竹岐村逞凶杀人，被当地群众殴毙。当耆英派兵占领黄竹岐村，大肆搜拘“罪犯”时，该村某些士绅竟出卖十名抗英勇士，使四人惨遭杀害；而另一些士绅，则在官府的压力下，草拟文告，说“此后诸村落，遇夷人至村口，……听其自来自去，……或至调戏妇女，枪伤平民者”，也只可“送官讯办”，不许自卫还击，“致官棘手”<sup>②</sup>。这些都表明了部分士绅，在反侵略斗争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抗英斗争，但是他们与清朝反动官府完全同一鼻孔出气。一八五〇年以后，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社学中的士绅即与官府完全合流，公开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镇压人民革命。在这种情况下，社学中的许多群众纷纷投身到天地会和红巾军等秘密反清革命组织中去，继续进行反抗清朝的反动统治。这预示着震撼中国大地的伟大农民革命风暴行将到来。

#### 第四节 龚自珍、魏源的变法革新、 抵御侵略的思想

##### 一、“九州生气恃风雷”

鸦片战争前后，农民起义对封建反动统治的沉重打击，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影响，以及外来资本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促使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批进步思想家，他们主张变法革新，

① 《刑部惩办钱江、何大庚奏折》，《鸦片战争》第4册，第29页。

② 梁廷柟：《夷氛闻记》卷5，《鸦片战争》第6册，第86页。

抵御外来侵略，同封建顽固派、投降派势力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使死寂沉闷的思想界，激起了几重浪花。龚自珍、魏源就是这一批人物的著名代表。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字璱人，号定盦，又名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一八二〇年在京任内阁中书，晚年就江苏丹阳云阳书院讲席。他的著作由后人编成《龚自珍全集》。他是一个受排挤的官僚和不得志的知识分子。鸦片战争爆发前一年，他弃官南下，逝世于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中。在他生活的五十年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急剧没落，即将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龚自珍作为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方面与政治上的顽固保守势力如穆彰阿之流进行斗争，一方面与文学上的反动流派桐城派如管同、梅曾亮、方东树之流进行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尊法革新，还是尊儒守旧。

当时，封建顽固势力大肆叫嚷祖宗的“大经大法，不可变也”<sup>①</sup>；同时又无耻讴歌清王朝“国家承平”，“天下恬然”<sup>②</sup>。这都是一些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孔孟之徒。他们极力为腐朽的封建制度粉饰门面，替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鼓吹休明。他们认为，变法革新，既无历史根据，更无现实需要，应该一切墨守成规，凡事“率由旧章”。

针对顽固派反对革新的滥调，龚自珍痛加驳斥。他指出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尽管还维持着表面的繁荣，但实际上是一个“四海变秋气”的“衰世”，已处于“日之将夕”、奄奄一息

---

① 程含章：《复林若州言时务书》，《皇朝经世文编》卷12。

② 管同：《戎政刍言序》，《因寄轩文二集》卷1。

的时刻<sup>①</sup>。可是，封建统治者依然进行着残酷的榨取，以致“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sup>②</sup>把劳动人民逼到了因为无力负担苛重赋税，情愿杀掉耕牛，另求活路的地步。他对官场的腐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认为那都是一些寡廉鲜耻的伪君子，做官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奸诈虚伪，官做得越高越大，就越会谄媚。他们除了吃喝玩乐、请客送礼、互相包庇、应酬官场、取媚帝王之外，别的一无所知。为了保持官位，这些人都是“老成之典型，……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sup>③</sup>。龚自珍辛辣地指出，依靠这群狗、蝇、蚊、虻、熊罴、豺狼等吸吮人民血汗、只知苟安其位的兽虫，怎么能为国家办好事情呢？他断言，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是封建制度的死亡，那时候就会有一种反抗清王朝的力量兴起，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sup>④</sup>。龚自珍不仅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丑恶，而且预言了未来的新兴力量的起来，表达了他对封建制度的愤懑。他朦胧地感到一种新的暴风骤雨的时代就会到来。

龚自珍明确指出，要挽救封建制度的危亡，必须变法革新，变法革新是历史常规，必由之路，即“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sup>⑤</sup>。他还进一步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拘一祖之法”，只能自取灭亡<sup>⑥</sup>，从而有力地驳斥

①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尊隐》、《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龚自珍全集》第6—7、87、485页。

② 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21页。

③ 龚自珍：《明良论三》，《龚自珍全集》第33页。

④ 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8页。

⑤ 龚自珍：《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第319页。

⑥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第6、5页。

了封建顽固派攻击变法革新没有历史根据的烂言。

基于上述思想，龚自珍响亮地发出了“何不思更法”<sup>①</sup>的呐喊。他向清王朝尖锐提出：“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他热情地讴歌“变”，肯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sup>②</sup>。一八三九年，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sup>③</sup>他认为，要冲破封建社会末期那种死气沉沉的窒息空气，扫荡阴霾，代之以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就必须进行一番疾风迅雷般的改革。

龚自珍的“更法”主张，不只着眼于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极端腐朽，而且触及到了封建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他在著名的《平均篇》中，尖锐指出，使社会矛盾激化，并造成封建统治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贫富不均”。这种“贫富不均”从“小不相齐”到“大不相齐”，从“大不相齐”到“丧天下”。他从历史上的治乱中，看出了那时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所造成的“大不相齐”现象，已到了“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的严重程度。他的结论是，治理国家现在没有比“平之”更为重要的任务了。为了实现“平均”的原则，他在《农宗》一文中，设想用家族宗法的社会组织形式，调节土地的分配，以克服“大不相齐”的矛盾。具体办法是把农业中的全体社会成员，按人的血缘关系，划分为“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等级，然后按宗授田。大宗（有继承权的长子系统）分田一百亩，可用五个闲民（指兄弟排行中最年幼的一辈）佃耕；小宗、群宗（长子以外的男子系统）分田二十五亩，可用一个闲民佃耕。闲民不能分田，只能当佃户。他还提出占

① 龚自珍：《明良论四》，《龚自珍全集》第35页。

②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第6页。

③ 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21页。

田数不必定死在百亩之内，允许适当的占有，这种占有应以经营能力和劳动力为标准。在《论私》等文章中，龚自珍向往近似资本主义的私富。龚自珍站在中小地主的立场，感到土地兼并和大量破产流民的存在对封建统治的严重威胁，因而企图用这种办法来保护中小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和对劳动农民的剥削地位，并且把流离失所的农民安排到生产中来，使他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资料，即雇主的十分之一的土地上的生产物，以免危及封建统治的基础。显然，龚自珍的这种主张，是一种根本不触动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改良措施，实质上只是限制大地主过分兼并土地，而并不否定封建等级制度和剥削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种“可以更，不可以骤”<sup>①</sup>的措施。这和农民阶级以暴力革命来实现“均田”的理想，在内容和本质上都截然不同。然而，无可否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地主土地兼并是一种打击，客观上有利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要求改革，是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表征。龚自珍的改革思想正是深深地扎根于国家民族土壤中。他十分关切祖国边疆，致力于探讨西北地理，写成了著名政论《西域置行省议》。在这篇代表性的著作中，他发挥了法家先驱的“移民实边”主张，把它同自己的社会改革理想紧密联系起来，批驳了儒家所谓经营新疆消耗了内地财富，巩固西北边防没有什么意义的谬论，斥责他们是“浅见愚儒”，“下里鄙生”。他主张把内地居民迁移一部分到西北，开垦土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充实边疆。还提议把新疆改建为行省。他认为进行这样的改革，将使“国运盛益盛，国

---

① 龚自珍：《平均篇》，《龚自珍全集》第79页。

基固益固”。在当时清朝日益衰落、沙俄对我国东北、西北边疆野心勃勃、蠢蠢欲动的形势下，龚自珍研究西北地理，主张“移民实边”，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东南沿海出现的西方资本主义侵扰的新形势，更使龚自珍觉察到外来侵略势力对中国开始呈现的压力。鸦片战争前，他对鸦片源源输入中国所造成各种祸害，感到痛心疾首。一八三八年，当他的挚友林则徐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时，他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恳切提出建议，热烈支持禁烟，要求狠狠打击来犯之敌；并且主张对那些口口声声讲什么“宽大”、“毋用兵”以破坏禁烟、阻挠御侮的“儒生”，要无情打击，“杀一儆百”。当林则徐到达广州发动禁烟时，他又赋诗叙怀：“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完成的意思）勋。”<sup>①</sup>他是多么深切关注林则徐当时能不能冲破千难万阻，完成艰巨的禁烟事业啊！

由于更法改图的需要，龚自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了尊法批儒的斗争。这时的封建顽固势力，其中有当权的顽固官僚，有所谓“理学”家，也有桐城派的反动文人。他们为了反对革新，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掀起了一股尊儒反法的叫嚣。一方面，他们肆意诽谤前代法家及其政治路线，如胡说什么：“商鞅治秦”，致“秦之祚不长”<sup>②</sup>，“流毒于天下及后世者深也”<sup>③</sup>；秦始皇“焚书坑儒”，“曾不旋踵而社稷墟矣”<sup>④</sup>；“汉兴用秦法，复辙无时休”<sup>⑤</sup>；王安石是“执拗而不近情”<sup>⑥</sup>。另一方面，他们大肆散布

① 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17页。

② 管同：《对用刑说》，《因寄轩文集补遗》。

③ 刘开：《杨墨辨》，《孟涂文集》卷1。

④ 管同：《读吕氏春秋》，《因寄轩文初集》卷3。

⑤ 梅曾亮：《孟庙》，《柏砚山房诗集》卷3。

⑥ 管同：《包孝肃公像记》，《因寄轩文二集》卷3。

尊儒崇道的言论，声嘶力竭地鼓吹程朱理学，胡说什么“道学之尊犹天地日月”<sup>①</sup>。

就在这一阵阵反法尊儒的噪声恶浪中，龚自珍挺身而出，从要求革新的政治立场出发，热情讴歌历史上的法家及其政治路线，并以法家思想作为自己变法革新的理论武器。他非常称赞“商鞅垦土令”，对商鞅顺应历史潮流，为了破坏奴隶主贵族所有制、促进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奖励垦荒的革新举动，表示推崇。他称誉商鞅是了不起的“功臣”<sup>②</sup>。他说自己“少年虽亦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武皇”。他早年就瞧不起被儒家顶礼膜拜的所谓三代的“圣王”商汤、周武王；而对被儒家所菲薄的开辟统一中国伟大事业的秦始皇和巩固、发展这一统一事业的汉武帝，却十分赞许，称秦始皇是“英雄”，汉武帝是“千古知言”，“人难再得”的皇帝<sup>③</sup>。他在一八二九年参加殿试策问时，依据王安石一〇六〇年写给宋仁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法家精神，结合现实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说是“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sup>④</sup>。龚自珍把王安石的《言事书》诊视为“医国”良药的“古时丹”，并直言不讳地宣称，他的殿试对策是以《言事书》为范文的。这就充分证实了他同王安石在要求革新问题上的思想继承关系，同时也表明了他是以王安石的后继者自许，力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现其变法革新的政治抱负。他还曾这样写道：“或问曰：‘王安石，信如人言讥议者耶？’答曰：‘何为其然？’”<sup>⑤</sup>公开为王安石辨诬，宣称儒家们横加给王安石的种种罪名，全

① 管同：《书苏明元辨奸论后》，《因寄轩文二集》卷2。

②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二十》、《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28、11页。

③④ 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34、527、513页。

⑤ 龚自珍：《保甲正名》，《龚自珍全集》第97页。

无稽之谈。难怪，当时就有人说：“定公（指龚自珍）若得志，恐为王荆公。”①

与此相反，龚自珍对儒家及儒家经典却表现了极大的蔑视。他吸取了乾嘉时代的“六经皆史”说，公然宣称《诗》、《书》、《易》、《礼》、《春秋》等都是“史”，先秦诸子也都是“史”②，以此否定了它们之间的尊卑关系。针对儒家把《论语》捧作经典的怪现象，他辛辣地嘲讽说：“怪哉！非所闻，非所闻！”③他还公开反对封建统治者把儒家列在各家之首的“独尊儒术”的行为。他在《十五首》诗中写道：“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④在这首诗里，他明确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原先不过只是法、名、道、墨、阴阳、纵横、杂、农等九家中的一家，各家都有自己的主张，不屑于相信和依附儒家。后来，由于反动派的提倡、吹捧，儒家的地位才被尊崇起来了。这就一语道破了“独尊儒术”的真相。那些儒生却得意忘形，自以为尊贵，脸皮越来越厚，成为寡廉鲜耻之徒了。这是多么形象的描绘，何等辛辣的讽刺！更可贵的是，他从儒法斗争的高度，暗示反动派为了维护其腐朽统治，使儒家成为封建社会唯一的正统学派，而法家、名家等学派却受到污蔑和压制；但尊法反儒的斗争却一直持续不断。他感叹古代许多进步学派，由于受到儒家的攻击、排斥和迫害，未能充分流传下

① 龚自珍：《定庵文集》卷下，第11页《发大心文》后附记引语，引自国学扶轮社本《龚定庵全集》。

② 龚自珍：《古史钩沈论二》，《龚自珍全集》第21—25页。

③ 龚自珍：《六经正名》，《龚自珍全集》第38页。

④ 龚自珍：《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龚自珍全集》第487页。

来。他顺应历史潮流，大胆提出了儒家终会首先被淘汰的看法，给神圣不可侵犯的孔孟之道以当头一棒。这首诗，实质上是龚自珍反儒的战斗檄文，充分表现了他敢于反潮流的精神。当时有的封建权贵向他施加压力，禁止他议论时政。但是，他把这种无理的干涉硬是顶了回去。也有些好心肠的朋友怕他遭到迫害，劝他删毁尖锐抨击时政的《乙丙之际箸议》，他也加以谢绝。龚自珍坚定地表示，为了尊法革新，就要“四不畏”：“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sup>①</sup>

但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龚自珍不可能迈出更大的步伐。他反儒，却又不敢触犯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甚至把孔老二称之为“大圣”；他大声呼喊变法，却又承认“天下有万年不夷之道”<sup>②</sup>；他对清王朝表示极大愤慨，但仍幻想依靠清王朝去进行“自改革”，以扼止农民起义的爆发。这就决定了他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他因“无才去补天”，最后只好到佛经中去寻找慰藉了。

然而，龚自珍的变法革新思想并没有因为他自己的消沉而消失，相反，“九州生气恃风雷”的战斗声音，对于近代主张革新进步的一些思想家都有影响，特别是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sup>③</sup>

---

① 龚自珍：《平均篇》，《龚自珍全集》第80页。

②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第5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4页。

## 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年），字汉士，号默深，湖南邵阳人，出身中小地主家庭。鸦片战争时期，他在裕谦幕府，协助抵抗外国侵略。后来在江苏作过知县和知州。太平军起义后，因为迟误驿报，被清政府革职，后来恢复原官，不久病死。在他生活的六十多年间，正是中国处在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转化的动荡变化时期。社会时代的变迁，阶级斗争的发展，给他以深刻的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军进犯江、浙。这时他正在浙江，基于爱国热忱，亲自参与抗英战争，并目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猖獗和清政府的腐朽卖国，签订屈辱条约。魏源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其所著《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与顽固派和投降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爱国尊法“制夷”，还是卖国尊儒“抚夷”？

鸦片战争中，投降派扯起儒家“贵以德而贱用兵”的破旗，大肆鼓吹所谓“抚夷”的卖国投降论调。他们炮制出一大套妥协投降的所谓“理由”：什么“英人所志不过通商，通商不必生衅”呀！①什么“船坚炮猛……非兵力所能制伏”呀！②什么“海道处处可通”，“诚恐防不胜防”呀！什么“英人如何可畏”呀！③他们反对武装抵抗，鼓吹对侵略者只能“捐释前嫌，示之宽大”④。总

---

①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圣武记》。

② 《鸦片战争》第4册，第147页。

③ 《清史列传·耆英传》，《鸦片战争》第6册，第357页。

④ 黄恩彤：《抚夷论》，《鸦片战争》第5册，第436页。

而言之，在尊孔卖国的投降派看来，抗战必败，只好投降。

同投降派卖国主义的尊儒“抚夷”论针锋相对，魏源提出了爱国主义的尊法“制夷”论。他继承先秦法家“武备御敌”、“以战去战”的主张，指出：英国是“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睃削其精华”<sup>①</sup>，是一个到处伸手，称王称霸的侵略者，是中华民族的凶恶敌人。同时指出：“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附首听命。”<sup>②</sup>他认为对付这些贪得无厌而又欺软怕硬的“海上霸王”，决不可有丝毫的怯懦，必须坚持“以甲兵止甲兵”<sup>③</sup>的方针，这样就可以“使我无畏于彼，彼无小挟于我，自不敢尝试”<sup>④</sup>，不敢肆意侵犯了。魏源针对投降派和腐儒们散布的“船坚炮猛”、“无可抵御”的唯武器论，严正地质问道：“天下有不可制之物耶？”<sup>⑤</sup>他从抗英斗争实践中，看到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他说：“器利不如人和”，“国以人兴，功无幸成，惟励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sup>⑥</sup>。武器的优劣是可以转化的，敌人的船坚炮利是优势，但在另一种条件下，优势反而会变为劣势。他说，外国船舰在海洋上可以横冲直撞，可是一深入内河，因水道险要，活动就不灵了，而我国灵活机动的“舴艋”、“火舟”，虽然不足以驰骋大洋，但在内河御敌，却是十分得力的。他的结论是：只要中国人心齐，斗志旺，同仇敌忾，共同对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斗智不斗力”，使敌人“失其所长”，而“攻其所短”，就完全可以战胜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可以“以小胜大”、以弱胜强<sup>⑦</sup>。他以亚洲一些小国如越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52，第27页。

②④ 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26页。

③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3，第42—43页。

⑤ 魏源：《海国图志》卷6，第5页。

⑥⑦ 魏源：《海国图志》卷1，第12、13、16页。

南、日本、缅甸等对于英国的侵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历史事实，来鼓舞人们战胜外来侵略的信心。他说亚洲的一些小国尚能“足拒夷兵”，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什么做不到呢？①魏源这种蔑视敌人，敢于斗争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当英国在东南沿海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长期对中国抱有领土野心的沙俄，也妄图混水摸鱼，趁火打劫。因此，魏源在揭露英国武装侵略的同时，也戳穿了满口“睦邻”、“友谊”的“口蜜腹剑”的沙俄侵略者的画皮。在《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中，他引述当时《澳门月报》揭露沙皇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夕，准备派“使者”去北京，进行阴谋活动的消息说：“我等且不可闭目不理，鄂罗斯（即俄国——引者）曾以兵威自黄海攻至黑海一带地方，以广其国境，所以今日必要提防。”魏源还系统地揭露了沙皇俄国自十七世纪中叶起，“逾外兴安岭侵逼黑龙江北岸”，把魔爪伸进我国东北边疆地区，进行烧杀抢掠和阴谋霸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的一系列侵略罪行。②魏源在《海国图志》里，以仅次于英国的篇幅来介绍“北洋俄罗斯”，他引用《澳门新闻录》等材料说：“欧罗巴洲各国兵丁战舰之多寡，当时俄罗斯为最多，俄罗斯户口五千万，战船一百三十只，兵一百余万”，“其国兴隆崛起，可谓骤矣”。这里隐喻沙皇俄国将为中国未来的祸患，以警国人。后来沙皇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趁机鲸吞中国大片领土的事实，证明魏源对沙皇俄国侵略野心的高度警惕，可以说是卓识灼见。

魏源的“制夷”思想，一方面是从三元里人民的英勇斗争中，受到极大鼓舞，汲取了巨大力量；另方面也继承了先秦法家御侮

---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10，第23页。

② 魏源：《圣武记》卷6。

的思想传统，以它作为反对投降派的理论武器。

魏源进一步指出，要“制夷”就需要“师夷”——向西方学习，他同投降派闭目塞听的顽固保守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制造和散布“抚夷”论的投降派和腐儒们，抱残守缺，排斥一切新鲜事物。他们散布了种种反对学习西方的谬论，什么近代机器工业是“形而下器”，“奇技淫巧，乱我人心”呀！什么翻译外国书籍，调查了解外国情况是“多事”呀！什么师夷长技、置造船械是“糜费”呀！什么用西洋兵船武装自己是“示弱”呀！魏源辛辣地讽刺这些顽固保守的家伙，都是一些目光短浅、没有见识的“夏虫”、“井蛙”，是一些迂腐不学、浑浑噩噩的“儒者”，对世界各国一无所知。他十分强调“师夷”与“制夷”的关系，他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sup>①</sup>这既讲明了“师夷”的重要性，也指出了不“师夷”的危害性。这清楚表明在魏源的心目中，是不是注意学习外国长处，关系到当时能不能维护民族独立的问题。为了了解“夷情”，以便“师夷”，进而达到“制夷”的目的，他受林则徐的嘱托，前后花了十年时间，在林则徐主编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了介绍各国历史、地理等情况的巨著《海国图志》一百卷本。《海国图志》是近代中国人编著的第一部系统而浩博的世界历史地理著作，在当时可以说是中国关于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在十九世纪中期对中国思想界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并影响到日本。

魏源的“师夷”，从军事方面说，他主张学习西方的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在参加抗英斗争的实践中，魏源亲眼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也无疑是敌人获胜的一个条件。所以，他主

---

<sup>①</sup> 魏源：《海国图志》卷37，第2页。

张主要依靠自己制造船炮，同时也不排斥购置外国船炮，以便“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sup>①</sup>。在经济方面，他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近代机器工业，认为这些“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sup>②</sup>，主张军用和民用工业除官办外，还应鼓励私人投资设厂，“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sup>③</sup>。他朦胧地预见到将有一个民间资本主义的兴起。魏源还注意到西方初期的所谓民主政体。尽管他当时还不知道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是个什么东西，但他称赞美国的宪法，把瑞士誉之为“西土桃花园”<sup>④</sup>。魏源的这种感叹、赞美，说明他看到西方民主政体比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要进步，反映了他对腐朽的清王朝的不满。不过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魏源当时没有、也不可能透过现象看到资产阶级专政的虚伪和反动的阶级实质。魏源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是当时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代表了那些向往资本主义的中小地主（即所谓“有田富民”）和商人（即所谓“无田富民”）的利益，是中国资产阶级即将出世的舆论表征。魏源同顽固派的论争，实质上是中国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论战的先声。

魏源积极主张“师夷”，这说明他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优于中国封建制度，西方有长处，中国有短处，需要向西方学习。但是，他强调这种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不必仰赖于外夷”<sup>⑤</sup>，即实现独立自主。在他看来，这才是“师夷”的成功。他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坚强的自信心，认为中国人的智慧和才能“无所不有”，中国过去并不落后，很早就有许多重要的科学发明创造。

---

①②③ 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4—14页。

④ 魏源：《海国图志》后叙，卷首，第5页。

⑤ 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7页。

他断言：只要大家“励精淬志”，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奋斗，中国就一定能够富强起来，同西方并驾齐驱，出现“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繁荣昌盛景象<sup>①</sup>。魏源在近代的初期能提出这种“师夷”思想值得称赞，这种民族自豪感和上进心是难能可贵的，它与投降派和腐儒们那种恐洋媚外、固步自封的丑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依靠什么力量“制夷”——抵抗资本主义侵略？魏源主张利用“义民”反抗侵略，同投降派“抑民以奉外”的反动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投降派胡说什么“患在内而不在外”，魏源则驳斥说，鸦片战争时期的主要敌人并不是人民，而是外国侵略者。他说自己著《圣武记》是因为“晚侨江淮，海警飙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sup>②</sup>。写《海国图志》目的在于“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非常明显，他把“制夷”而不是“制民”放在首位。

投降派诬蔑沿海人民“通夷”、“柔弱”，魏源用事实驳斥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在广东刀劈敌酋、打坏敌舰的都是“义民”？两次俘获敌舰于台湾，火攻英舰于南澳的也都是“义民”？

“沿海民风强悍”<sup>③</sup>，“义民”同仇敌忾，这才是正确的结论。魏源指出：给人民戴上“汉奸”、“贼党”帽子的人，本身恰恰是汉奸、贼党者流。他满怀爱国热情，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几获雄狐来郑庆，谁开柙兕祸周遭。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早用秦风修甲戟，条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11—12页。

② 魏源：《圣武记》叙。

③ 魏源：《海国图志》卷1，第25—27页。

支海上哭鲸鳞。”<sup>①</sup>在这首历史画卷中，一面是平英团挥刀杀敌，几乎捉住侵略军头子；一面是靖逆将军奕山之流媚外卖国，放虎出笼，“纵夷”遗祸。这里把人民和清朝大吏对侵略者的不同态度加以鲜明对照，鞭挞了投降派，赞扬了群众斗争。他认为如能“早用秦风”，以法治军，定可制服英国侵略者。

魏源进一步指出，在反侵略战争中，“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sup>②</sup>。而且“土兵”和“水勇”既可来自“义民”，也可来自“莠民”，“岂特义民可用，莠民亦可用”<sup>③</sup>。在他看来，对这些人只要“精训练而严节制”，“岂但国家增无数之精兵，而沿海销无数之械斗，中原收无数之‘枭匪’”<sup>④</sup>。这种思想带有鲜明的地主阶级的烙印。它说明魏源作为剥削阶级的一员，同农民依然有着阶级矛盾，主张对人民群众要严加“节制”，只许人民抵御外侮，不许起来造反。尽管这样，魏源“义民可用”的主张，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反侵略成为中国人民当务之急的情况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魏源还认为要抵抗外国侵略，必须改革国内弊政。他说：“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sup>⑤</sup>他认为清王朝当时已经是“蜗庐外漏兼中蠹”<sup>⑥</sup>，面临垮台的边缘，若不进行改革，怎么能做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呢？因此，他提出了“以治内为治外”<sup>⑦</sup>的方针，把学习西方、改革内政、抵抗侵略这三者有机地结

① 魏源：《寰海十章》，《古微堂诗集》卷9，第8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卷1，第1页。

③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下），《圣武记》。

④ 魏源：《海国图志》卷1，第21—30页。

⑤ 魏源：《海国图志》叙，《海国图志》卷首，第1—2页。

⑥ 魏源：《秋兴十章》，《古微堂诗集》卷9，第11页。

⑦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圣武记》。

合起来。

魏源十分注意研究历史上法家的思想及其变法图强的经验。他十分推崇管仲、商鞅，说“以富强归管、商”<sup>①</sup>。他赞扬申不害、韩非，认为要治国就必须取其所长，去其所短。他对李斯提出的“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的历史进化观点，表示心悦诚服。他称颂汉文帝雷厉风行，敢于革新的精神。他对唐代著名法家柳宗元赞扬秦始皇、肯定郡县制的《封建论》一文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世公也。”<sup>②</sup>他“宵拥长沙（贾谊）家令（晁错）篇”<sup>③</sup>，积极寻求拯救时弊的方案。

魏源从前辈法家学说中继承和发展了主张社会变革的进步历史观，作为倡导变法革新，反对复古守旧的思想武器。他认为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社会历史的变化愈来愈文明。他的结论是：“变古愈尽，便民愈甚。”<sup>④</sup>这是一种具有进化论因素的历史观。他对投降派学着宋儒的腔调“专言三代”、复古倒退的历史观进行了尖锐抨击，指出：“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sup>⑤</sup>，拿着古代的制度来衡量今天就是诬蔑今天他痛斥了那些“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的“庸儒”和“腐儒”。他针对投降派和顽固派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论，提出了“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sup>⑥</sup>。他断言：“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

---

① 魏源：《圣武记》叙。

②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3，第29页。

③ 魏源：《秋兴十章》，《古微堂诗集》卷9，第11页。

④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2，第16、17页。

⑤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3，第16页。

⑥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7，第16页。

则大治。”①他积极主张“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指因循不决）、去营窟（指营私谋利）”，“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②，改革应从现实出发，以期收到实际的效果，切勿纸上谈兵。

必须指出，魏源的主张变法革新，还因为他同社会有比较广泛的接触，对人民的生活有一定的了解。当时社会危机严重，农民破产，到处是饥荒。饥民等不及荞麦长熟，荞麦刚开花便摘来充饥，以致中毒死亡。魏源看到这个情况，曾在《道中杂言八首》中哀叹：“中野种荞麦，春风吹麦新。二月麦花秀，三月花如银。麦秋不及待，人饥已奈何！花毒作糗粮，急那知其他。以鸩止渴

# 清夜斋诗稿

默深先生手墨诗稿一册行书  
九十一首删去四首缺者补之

集诗

道中杂言八首

幼遭高士傅姓笑不自裁第勿思妄情何用生世哉勤观  
馬聞風聲此地安和原萬里黄河水枯古流不如此恨胡  
知教  
中野种荞麦春风如秀新二月麦花如三月花如錫零秋  
僵者如亂麻莫此項刻延備以百年嚬授之萬人枕聚土  
遂成墳塚年如依熙春如春如初加食新如稻便復如中  
野風吹蓮蒿中瓜座埋頭并不食寥寥哭無烟問君  
去何如遠遊吳楚魂如拂盡不總休心如泉能在和柳尚有

清夜斋诗稿

① 魏源：《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圣武记》卷7。

② 魏源：《海国图志》序。

饥，僵者如乱麻，冀此顷刻延，偿以百年嗟。”①

但是，魏源毕竟是处于急剧没落的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不能不带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清朝封建统治的问题。他承认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但又说什么“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变而不可复者也”②。这就是说：“势”——统治人民的办法必须因时而易；“道”——封建统治秩序却是不可改变的。正因为如此，当太平天国革命狂飙兴起时，他就本能地站到农民革命的对立面去了。

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当时对那些深受儒家思想蔽固的知识分子起着震聋发聩的作用。在后来则为中外进步人士所瞩目。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深受启示，承认“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③。魏源不愧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

① 魏源：《清夜斋诗稿》抄本。

②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3，第16页。

③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97页。

## 第二章

# 蓬勃兴起的太平天国革命

## 第一节 革命的酝酿和发动

### 一、社会矛盾的激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大变动时期。反动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交相为恶，激化了阶级矛盾，加深了社会危机。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进一步把魔爪伸向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灾难。成千上万只英、美轮船满载鸦片和洋货而来，饱掠白银和丝、茶而去。英、美的廉价工业品，充斥着五口通商口岸和中国东南市场。仅就英国对华输出的棉布一项，从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五年的十多年间，就由六十万码激增至一亿一千二百万码，增加了二百倍。由于洋纱、洋布的大量涌入，严重地打击了中国东南的棉纺织手工业，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生计路绌，陷入失业的危机。当时，中国手工纺织业最发达的江苏的松江、太仓一带，由于洋布的盛行，在一八四六年就已出现“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sup>①</sup>的萧条局面。闽浙地区出产的土布，也因洋布

<sup>①</sup> 君朴：《十九世纪后半期几种洋货和土货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经济研究》一九五六年第2期，第122页。

的竞争而销路受阻，日趋衰落。这就破坏了中国东南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早在一八五〇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①

鸦片战争后，鸦片泛滥比战前更为严重。英、美鸦片贩子以香港和澳门作为贩毒基地，公开向中国沿海各口（其中包括北京的门户天津）大量倾泻鸦片，其数量逐年剧增，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每年竟增至五、六万箱。鸦片潮水般地涌入，白银泄洪似地外流，银贵钱贱更加严重。据估计，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六年，中国每年流出白银约三千五百万元。一八三八年每两纹银换钱一千六百文，到一八五〇年竟涨至二千三百文以上。白银的涨价实际上成了劳动人民的无情灾难。白银严重外流，还造成了中国的财政与货币流通情况极为混乱。可见，战后鸦片的泛滥，白银的外流，更加严重地危害着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

鸦片战争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支付总计大约七千万元的战费和二千多万元的赔款，更加肆意搜刮人民。它们在征收田赋和漕粮时往往又巧立名目，进行敲诈勒索。这些额外勒索，往往比额定的税收还要苛重。地丁税是清政府的主要税收。在一八四一一八四九年的八年之间，这项税收就增加了三百三十多万两。鸦片战争后不到十年的光景里，劳动人民的实际负担比过去增加了好几倍。正象马克思所说的：“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4页。

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sup>①</sup>苛重的捐税使劳动人民濒于绝境。许多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就连一些封建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百姓滋事，皆因州县征收加重所致”<sup>②</sup>。这说明，鸦片战争失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促使中国的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了。

土地兼并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的尖锐问题。鸦片战争后，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结合在一起，贪婪地榨取农民的血汗，兼并农民的土地。因此，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更加严重。据统计，当时全国土地有百分之四十至八十集中到只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的少数人手里，而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六十到九十的大多数农民则没有或很少有土地<sup>③</sup>。例如，广州和广西的浔州地区，地主阶级占有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则没有土地，他们被迫沦为佃户。地主阶级利用土地残酷剥削农民，地租剥削率一般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许多地区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他们还巧立各种名目，强迫农民交纳各种农畜产品，服无偿劳役。这就进一步促使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还在思想上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禁锢人民的革命思想，维护摇摇欲

---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② 《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奏议银钱出纳章程》，《鸦片战争》第4册，第302页。

③ 参阅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1期。

坠的反动统治，极力宣扬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责令各地官绅士庶“致诚尽敬”地“崇儒重道”<sup>①</sup>，尊孔读经。那个曾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的清朝的总头子旻宁，起劲地兜售孔孟之道的礼义、孝悌之类的反动说教。他还命令一帮子孔孟之徒将《圣谕广训》一书中的“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阐发解释，写成《四言韵文》，广为散发，企图利用孔孟之道这种所谓的“正学”，去抵制和禁锢革命人民的思想，镇压人民造反。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一向重视利用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开路先锋，也十分重视利用孔孟之道的反动说教达到他们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一些传教士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则极力把基督教的教义同孔孟之道的反动说教杂揉一起。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一个名叫梁发的中国基督教徒，秉承外国主子的旨意，并由外国主子审定，出版了一本名叫《劝世良言》的布道书，就曾力图把基督教的奴役哲学与孔孟之道合流起来。他说：“盖儒教所论仁义礼智之性，至精至善之极，与救世真经圣理略相符合。”因此，它要求人们既要“从顺”“君王之旨，圣贤相传仁义之道”，又要“遵信”“神天上帝”。它鼓吹“贫者守分而心常安”，“上不违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可见，《劝世良言》是在“神天上帝”的幌子下，要人民安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不要起来革命。它还赤裸裸地鼓吹“君正臣忠，父慈子孝”等儒家的反动说教，要人民完全屈服于反动统治的旧秩序。这说明，《劝世良言》这种披着“上帝”外衣的奴役哲学，是地地道道的西方基督教的神学和中国儒家思想的大杂烩。

鸦片战争后，一些披着传教士、外交官、学者外衣的西方侵

---

<sup>①</sup> 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朝），卷48。

略者，也公然起劲地吹捧起孔孟之道来了。《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英国伦敦会教士理雅各，就来到香港传教和主办英华书院。他在大鸦片贩子查顿、颠地等人出资赞助下，陆续翻译出版了《四书》等儒家经典，后来他还肉麻地吹捧孔老二是“以最好和高贵的身份代表着人类的最美理想”<sup>①</sup>。他们尊孔是为其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目的服务的。这说明，一切中外反动势力，都是把尊孔读经同他们的命运连在一起的。

然而，“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sup>②</sup>全国各族人民面对中外反动势力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思想奴役，从未间断过针锋相对的反抗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一八四一年湖北崇阳会党首领钟人杰起义到一八五〇年不到十年的光景里，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一百多次，单是一八四七年就有二十六次之多。其中尤以两广和湖南地区的天地会起义最为频繁。因为这些地区是中国最早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地区，也是鸦片战争中受害最深的地区之一。鸦片战争中，清朝政府从这三省征调兵力、粮饷最多，战后又就地裁遣，许多散兵游勇流落在这里。再加上沉重的封建剥削与连年水旱灾荒，遂使这个地区的各种社会矛盾都显得特别尖锐和复杂。许多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及遭散兵勇，纷纷参加了天地会的起义。天地会在这里建立了许多山堂。与此同时，农民抗粮、饥民暴动等形式的革命斗争，也在这些地区大大发展起来了。其中几次影响较大的起义有：一八四三年湖南武冈州人曾如炷领导的起义；一八

<sup>①</sup> 理雅各：《中国经典·绪论》，《孔子的生平及其学说》，95页。转引自南木：《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孔老二》，《文物》一九七五年第1期，第52页。

<sup>②</sup>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6页。

四四年湖南耒阳县人杨大鹏领导的抗粮起义；一八四五年广西藤县邓立奇、锺敏领导的起义；一八四六年广西武宣人陈亚贵在修仁、荔浦等地领导的起义；一八四七年湖南新宁雷再浩领导的起义，等等。一八四八年后，两广、湖南境内的起义更是日益增多。广西地处边陲，是清朝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因此，这里很快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和各种反抗力量汇合的基地。

尽管当时各地起义往往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但实际上都是试图以革命的武装去推翻清朝反动的黑暗统治，以“杀富济贫”的革命行动去冲击孔孟之道所极力维护的封建旧秩序。这些连绵不断的起义，犹如午夜的繁星，源源不断地给阴沉黑暗的旧中国的大地播撒着光辉。它标志着全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预示着全国农民革命的狂风暴雨即将来临。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时期，培育出许许多多的农民革命的英雄。洪秀全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列宁说过：“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sup>①</sup>。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前夜，站在时代最前列的洪秀全，犹如一只矫健的雄鹰，迎着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无所畏惧地展翅搏击！他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把那连绵十年之久的许多分散的农民起义，汇聚成了一股涤荡旧世界的革命洪流——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 二、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

洪秀全（一八一四——一八六四年），广东花县官禄布村人，中农家庭出身。他七岁入塾读书，十六岁辍学务农，十八岁被聘

---

<sup>①</sup>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

为本村塾师。他的家乡离广州不到百里，是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尖锐的地区。他自幼生长在农村，过着清贫的生活，还直接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这使他对民间的疾苦和农民的革命要求有着深切的了解。他同广大农民群众一样，对清朝的黑暗统治极度不



洪秀全像

满，对外国资本主义的鸦片侵略切齿痛恨。他曾严厉地谴责清朝统治者“每年化中国之金銀几千万为烟土，收花（华）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每当他“兴言及此，未尝不拍案三叹也”<sup>①</sup>。但是，在封建教育的影响和毒害下，洪秀全也曾一度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封建的科举道路上。他从十六岁起，先后四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县考时，洪秀全每试都考取头名，但从未能考得中秀才。科场的失败加深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使他开始把个人的坎坷遭遇同社会的黑暗腐朽联

<sup>①</sup> 洪仁玕：《英杰归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2册，第570页。

系在一起了。例如，早在一八三八年，他在病床托言做了“异梦”而附会出具有强烈政治内容的神话，借此抒发他对黑暗社会制度的强烈不满，倾吐他对灾难深重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神话说，他遨游天堂，在天堂“俯览全世，芸芸众生，一切痛苦与罪孽，皆现目前，其情状之恶劣，眼不忍睹，口不忍言”。于是他“怒从心起”，有时还跳下床来“大声疾呼：斩妖，斩妖，斩呀！斩呀！”他曾在病床上做诗，借以抒发他决心“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的革命豪情。他还假借曾亲自在天堂听到上帝“斥责孔子，谓其于经书中不曾清楚发挥真理。孔子似自愧而认其罪”<sup>①</sup>的神话，公然嘲弄了反动阶级的“大圣人”孔老二。这说明，此时洪秀全已经开始认识到孔丘的经书没有讲出什么“真理”。尽管这种认识和批判还是朦朦胧胧的，极不彻底的，但与洪秀全病中对黑暗现实不满的言行联系起来考察，却能清楚地看出他的反孔、革命的思想，好象萌芽了的种子，正在破土而出。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对洪秀全的震动很大。特别是三元里人民反击侵略的冲杀和呐喊，广州地区“社学”群众反侵略、反投降的熊熊烈火，对他的影响更为强烈。一八四三年，他在人民群众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斗争推动下，毅然决然地大步跨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积极为发动太平天国革命奔走呼喊，终于成为中国近代农民革命的伟大旗手。

毛主席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sup>②</sup>洪秀全从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由于历史条件

①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42—843页。

②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58页。

的局限，他开始只是接触到一些宣扬基督教的书籍。一八四三年春天，洪秀全在莲花塘村塾中任教时，开始翻阅他在六年前在广州街头得到的《劝世良言》。本来，这种旨在宣扬基督教奴役哲学的反动小册子，是同洪秀全的革命思想根本对立的。但是书中有关反对偶像崇拜，独尊上帝以及基督教的一些宗教形式，却给他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料。他接受了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的影响，并利用其中关于“上帝”的神学概念，结合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中提出的“平均”、“平等”的革命口号，塑造了一个代表中国农民革命权威的“皇上帝”，创立了一个宣扬农民革命精神的“拜上帝会”，作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所以叫“拜上帝会”，就是因为入会的人只拜上帝，“不拜邪神”。洪秀全把清朝皇帝和各种鬼神、偶像、孔老二统统看作“奸宄”和“妖魔”，而把天上的“皇上帝”作为独一无二的真神加以崇拜。他的目的是假借“皇上帝”的无上权威，号召农民起来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而建立农民自己的“四海为家”、“太平一统”的革命政权。可见，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所用的无非是基督教的宗教外衣，其内核却是农民阶级的平均、平等思想和革命造反精神。

拜上帝会最早接纳的成员是洪秀全的同乡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等。拜上帝会成立后，洪秀全毅然决然地砸碎了莲花塘村塾中的孔丘牌位，勇敢地向封建专制制度的象征——孔丘偶像赫然宣战。接着，他又赶回自己的家乡官禄埠村，和冯云山、洪仁玕一起把本村书塾中的孔丘牌位打翻在地。洪秀全这种坚决的革命行动，反映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群众坚决反孔的革命意志，和决心冲破封建罗网的坚强信念。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及其反孔斗争的革命活动，如同一阵

狂飙兴起，立刻惊动了各个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形成拥护和反对截然对立的两大营垒。从此，农民大革命的风雷激荡着官禄墟村，也激荡着黑暗的旧世界。据洪仁玕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其中有闻而即信者，有闻而反对者，有承认其为真理而不敢信从者，有起初踌躇后则信从即如一般闻而即信者。此等信徒自以为受圣灵感动，联合一致，毁坏许多偶像；但其不信者，其心为魔鬼所迷，反对而迫害我等。”<sup>①</sup>一八四四年初灯节时分，官禄墟村的乡绅逼着洪秀全、洪仁玕“制写诗文或对联等以歌颂偶像”，但遭到他们的严词拒绝<sup>②</sup>。从此，洪秀全等人失掉了村塾教席，被踢掉了饭碗。但是，他们在逆流恶浪面前毫不屈服和畏缩。洪秀全和冯云山等人在封建势力的排斥和打击之下，决定外出宣传革命思想、发展拜上帝会组织。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广州南北十余县，于一八四四年五月间到达广西贵县赐谷村。他们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发展拜上帝会组织。但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入会的人并不多。洪秀全在革命实践中总结了经验教训，深感拜上帝会的教义还不完备，革命的理论还不充实，而孔孟之道的反动影响却根深蒂固，成为发动农民革命的极大障碍。因此，要想广泛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去从事伟大的革命斗争，必须用革命的理论去冲破孔孟之道的网罗，广泛的动员群众、武装群众，向群众指明革命的对象、目标和前景。于是，他决心在这方面倾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心血。这年九月，冯云山转入桂平紫荆山区发动群众，洪秀全则于十月间返回花县着手创制革命理论。

---

<sup>①</sup> 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太平天国》第6册，第823页。

<sup>②</sup>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1页。

### 三、农民革命的宣言书

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洪秀全在自己的家乡仍以教书为掩护，专心致志地从事创制革命理论的工作。他先后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三篇向封建制度宣战的重要革命文献，作为广泛动员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

《原道救世歌》以诗歌的形式，明快的笔调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并鲜明地提出人人平等的要求和主张。它指出：“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sup>①</sup>

透过“上帝”的外衣，就可清楚地看出，它告诉人们一个简单而明白的真理：“天下”是大家的天下，封建君主不应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独裁专制。它还进一步指出：“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sup>②</sup>。既然人人都是上帝的赤子，人人都是兄弟，



一八五三年刻《太平救世歌》封面

<sup>①②</sup> 《原道救世歌》，《太平天国》第1册，第87页。

不言而喻，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而不应当存在森严的封建等级，不应该存在“尊卑贵贱”的差别。显然，这是向封建专制制度的挑战，是向几千年来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旧制度、旧秩序的严正申讨。《原道救世歌》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痛斥由于清朝黑暗统治所造成的淫乱、凶杀、赌博、迷信和吸食鸦片等“六不正”的罪恶风气。它特别痛恨吸食鸦片，指出“炼食洋烟最颠狂”，吸食鸦片是“自驱陷阱”，“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sup>①</sup>。这是对清朝黑暗统治的揭露和痛斥，也是对外国资本主义鸦片侵略的控诉和申讨。《原道救世歌》以通俗的语言极力劝诫人们必须改变这种“六不正”的歪风坏俗，不能允许这种腐败的社会存在下去。它不仅谴责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还进一步充实了拜上帝会的教义，加强了它对农民群众的号召力。

《原道醒世训》以犀利的笔锋指斥当日的封建社会正处于“暗极”、“乱极”的时代。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到处充满了不平等，处处是强犯弱、智诈愚、“相陵相夺相斗相杀”<sup>②</sup>。它指出，造成这种“世道乖漓，人心浇薄”和“陵夺斗杀”等黑暗现实的总根子，就是剥削阶级“所爱所憎一出于私”<sup>③</sup>的私有制度。它强烈地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反对封建阶级压迫，而主张国与国、贫与富之间平等、平均。它说：“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sup>④</sup>，国与国同为皇上帝“主宰理化”，同为皇上帝“生养保佑”。因此，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存此疆彼界之私”，不应该“起尔吞我并之念”。这说明，洪秀全已明确地把农民革命的平等主张和要求，推广到国与国的关系中来了，表现出农民阶级强烈地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革命精神。

---

① 《原道救世歌》，《太平天国》第1册，第90页。

②③④ 《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第1册，第91、92页。

《原道醒世训》还明确地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的革命主张和要求，去动员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劳动妇女踊跃投身于革命斗争的伟大洪流。既然人人都是兄弟姊妹，就不应该存在贫富不均，不应该存在剥削和压迫，不应该存在强犯弱、智诈愚、相陵相杀和男尊女卑等现象。而应该建立一个“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的大同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的理想，它号召天下的受苦人起来“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sup>①</sup>，砸烂“陵夺斗杀”的旧世界，建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公平正直”的新世界。这里所说的“公平”，实际上是要求人与人、男与女、贫与富在政治上平等，在经济上平均。它反映了农民群众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制度的强烈愿望。显然，透过宗教的外衣，就可清楚地看出《原道醒世训》以宗教的语言，传布农民朴素的平均、平等思想，提出了农民革命所要建立的“地上天国”的初步图案。列宁指出：“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sup>②</sup>

《原道觉世训》以通俗生动的语言，把社会划分为根本对立的两个营垒。一个是以“皇上帝”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营垒。这是一切衣食器物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主宰世界的主人。天下凡间，人人离不开皇上帝的恩典和保佑，一衣一食都靠皇上帝所赐予。皇上帝的功能昭然可见，灼然易知，人人应当朝夕敬拜。与之截然对立的则是以“阎罗妖”为代表的封建地主

---

① 《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第1册，第92页。

②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第217页。

阶级的反动营垒，它们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它们不但靠封建政权镇压人民，还故意假造各种鬼神和偶像愚弄人民，维护其反动统治。因此，《原道觉世训》严厉地指斥阎罗妖是“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世人的害人精；指斥封建皇帝妄自称“帝”、欺压人民，是“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它公开号召人民快快起来共同击灭阎罗妖和一切妖徒鬼卒，并以革命的人本主张，勇敢地向封建神权挑战，指出“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而“世间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皆后起也，人为也”。这些东西都是“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蠢物”，是万万信不得的。它反复告诫人们不要“跪拜偶像”，不要相信鬼神论的谎言，而应该“跳出邪魔之鬼门”，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创造“永远快活威风”的幸福生活。它号召“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赶快起来把各种偶像统统打倒<sup>①</sup>。可见，透过宗教的外衣，就可清楚地看出《原道觉世训》向农民群众所指出的革命对象，就是清朝皇帝（阎罗妖），封建官吏和地主阶级（妖徒鬼卒），以及在精神上统治人民的各种鬼神、偶像等。在这里，它对封建政权和神权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抨击，从而唤醒了广大农民群众冲破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积极投身于变革现实的伟大斗争。

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sup>②</sup>洪秀全在三篇革命文献中，继承和发展了历代农民起义的平均、平等的革命口号，明确提出了以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男女平等、民族平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民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他

<sup>①</sup> 《原道觉世训》，《太平天国》第1册，第93、97、96页。

<sup>②</sup>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31页。

旗帜鲜明地以四大平等为武器，从意识形态方面向封建四权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表现出农民群众坚决同旧制度、旧思想实行决裂的革命精神。三篇文献是农民革命的宣言书，是批判封建四权及其精神支柱——孔孟之道的战斗檄文。它不仅向农民群众指明了革命的对象和目标，还指明了革命的美好前景。它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革命斗志，表达了农民群众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反对阶级压迫，反对君主专制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三篇文献为太平天国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 四、风烟滚滚的紫荆山

在洪秀全专心致志创制革命理论的时候，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区的群众中扎下了根。这里山峦起伏，纵横二百七十多平方公里，地形十分险要，里面住着许多种山烧炭的贫苦农民，是发动革命的理想根据地。著名的金田村，就座落在紫荆山的南麓。冯云山初到山区，“举目无亲，典借无路”<sup>①</sup>，靠着拾牛粪、打短工维持生活，艰苦地从事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一八四六年春，他被聘为鹏隘山大冲村的村塾教师。他利用一切机会向烧炭工人和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展拜上帝会组织。经过将近三年的艰苦努力，他点燃了紫荆山区的革命烈火，开拓了紫荆山革命基地，发展了两千多人参加拜上帝会，为发动农民武装革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中较早入会的有当地贫雇农家庭出身的炭工“头目”杨秀清，与武宣县贫农出身的肖朝贵等人。

杨秀清（？——一八五六年），紫荆山鹏隘山新村（现名东王

<sup>①</sup>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下同）第57页。

冲)人，“世代以烧炭种山为业”<sup>①</sup>，自幼失去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他烧过炭，打过铁，也曾一度浪迹江湖，是个出身贫苦、阅历较多而富于谋略的人。他在冯云山的启导下加入了拜上帝会，很快成为一个热心于会务的积极分子。肖朝贵(？——八五二年)原是武宣东乡上武兰村人，其父因逃避官府和地主催逼租税，迁居沙田，后由沙田迁居鹏隘山下古棚村，以烧炭种兰为业。他在冯云山的帮助下参加了拜上帝会。肖朝贵为人勇敢刚强、忠实正直，是拜上帝会的得力骨干。

一八四七年夏天，洪秀全携带革命文献重返广西，八月在紫荆山和冯云山会合。他们在紫荆山设立拜上帝会机关，制订拜上帝会各种仪式和《十款天条》。《十款天条》的主要内容是崇拜上帝，不拜邪神，尊敬父母，和严禁妄杀、淫乱、贪财、说谎、赌博等等。这些条文规定，平时作为会众共同遵守的生活准则，战时变成太平军的军事纪律。因此，它在组织农民进行革命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每天写书送人，使《原道觉世训》等三篇革命文献在群众中广泛传播。它反映了革命农民的心愿，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他们还派人四出活动，在紫荆山周围十多个县广泛发展会员。拜上帝会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天地会等旧式会党有着不同的特点：它有比较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有一整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舆论工作和组织形式。它不仅反对贪官，还旗帜鲜明地反对皇帝和一切封建官吏。因此，不少的汉、壮、瑶等族的人民群众纷纷参加拜上帝会。入会的主要是贫苦农民、矿工、手工业者、码头夫等基本群众，另有一些农村知识分子。但在革命的激流里也掺进了一些泥沙。例如，

---

① 《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55页。

一些地主分子因怕拜上帝会“寻衅滋扰”，便伪装拥护革命，参加了拜上帝会。他们“攀名入会，实以免祸”<sup>①</sup>，成了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

洪秀全为了发动群众掀起革命浪潮，始终注意批判孔孟之道和封建神权。他和冯云山一起率领广大群众积极开展捣毁偶像和神庙的斗争。一八四七年十月，他亲自动手捣毁象州恶名昭著的甘王庙，并且告诫：当地各色人等，“永不准复立此妖庙，仍拜此邪魔。倘敢抗命，定与此妖一同治罪”<sup>②</sup>。这一果敢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紫荆山区。“自打破此妖，传闻甚远，信从愈众。”<sup>③</sup>接着拜上帝会群众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了当地所有的神坛庙宇和各种偶像，这就严厉打击了孔孟之道所维护的封建神权，极大地振奋了紫荆山区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入会的人越来越多。洪秀全每到一处就把村塾中的孔丘牌位除掉，充分表现了他坚决反孔的革命精神。一八四八年，洪秀全编撰了《太平天日》一书，他以革命的浪漫主义手法在书中叙述了一个皇上帝鞭打孔老二的生动的神话故事。故事说，一八三七年洪秀全被接上“天堂”的时候，“皇上帝”指着桌子上摆着的孔孟的“四书”、“五经”，训诫洪秀全说：“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连尔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接着天兄基督和众天使一起怒斥孔老二的罪恶。孔丘企图顽抗，“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但被众天使捉回鞭打，“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打甚多，孔丘哀求不已”<sup>④</sup>。洪秀全以这个通俗易懂的神话故事，怒斥了孔丘的罪恶，揭露了孔孟经书荒诞、害人，是“妖

① 杜文澜：《剿平粤匪方略》卷1。

②③ 《太平天日》，《太平天国》第2册，第650页。

④ 同上书，第635—636页。

魔”作怪的根由，宣判了孔老二为历史的罪人。

拜上帝会还旗帜鲜明地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地主，保护农民。紫荆山甘皇岭有个姓吴的地主向农民逼债，并且虐杀民女。农民找拜上帝会痛诉冤情。洪秀全立即率领会众斗争了这个恶霸地主<sup>①</sup>，狠狠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有的地主霸占渠水，不准农民灌田。农民群众在拜上帝会的支持下痛打了地主，保护了农田。他们的革命行动体现了拜上帝会是农民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因此，在紫荆山广大贫苦农民的心目中，洪秀全是他们的革命旗手，拜上帝会是他们的坚强后盾。

强大的革命舆论把紫荆山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拜上帝会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群众在火热的斗争中得到锻炼。但是，拜上帝会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当地封建势力的拼死反对。他们利用反动武装团练进行挑衅和镇压。从此，紫荆山区形成了“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sup>②</sup>的两军对垒的局面。紫荆山石人村的恶霸地主和团练头子王作新，首先跳出来同拜上帝会较量。一八四七年冬，他纠集地方保正逮捕了冯云山，但被拜上帝会群众中途夺回。一八四八年初，王作新又勾结官府把冯云山等逮捕下桂平县狱。冯云山在狱中坚贞不屈，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他还以革命的毅力和智慧，在狱中创造了一部崭新的历法，这就是后来太平天国颁布的《天历》。

洪秀全得知冯云山被捕的消息后，立即赶回广东设法营救，拜上帝会一时无人主持。这时杨秀清利用当地流行的“降僮”迷信，假托“天父下凡”，传言群众安定众心。从此，杨秀清抓到了“天父”代言人的权威，并以此左右革命队伍。不久，肖朝贵假托

① 《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62页。

② 《李秀成自供》。

“天兄”下凡传言群众，取得了“天兄”代言人的权威。冯云山被救出狱后，拜上帝会更加发展壮大，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另有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的领导核心。

韦昌辉，原名韦正，桂平金田村人，出身地主兼典当商，自幼熟读孔孟经书，为人“阴忍而残刻”<sup>①</sup>，绰号“花头鸭”。其父韦源玠为了取得“功名”，花钱捐了个“国子监生”以光门第，并在家门口悬挂了一块“成均进士”的匾额，被当地地主阶级当权派将“成均”二字铲去，然后以韦源玠冒充进士的罪名押赴团局，罚银数百两。韦氏父子为了借势报其私仇，韦昌辉伪装拥护革命，混入了拜上帝会，窃据了领导地位。可见，韦昌辉等人投机革命，实为地主阶级的这一派反那一派，是地主阶级内部当权派与在野派的斗争。

石达开，贵县那邦村人，地主家庭出身，“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sup>②</sup>，也曾做过贩牛、贩鸡等生意。他是“客家”人，因受当地土著地主的欺压，抱着个人野心投奔了拜上帝会，并且挤进了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石达开到处树旗招兵买马，甚至不惜采取“请酒会大餐”<sup>③</sup>的方法，发展拜上帝会组织。更严重的是他领导拜上帝会“不打神像”，连“祭祖先，拜各种神像都可以自由”<sup>④</sup>。这就公然践踏了《十款天条》，破坏了拜上帝会的纪律，并同洪秀全坚决打击封建神权的革命措施相对抗，起着腐蚀革命队伍，涣散革命斗志的作用。

随着拜上帝会同地主团练的斗争日益激烈，洪秀全、冯云山等领导各地会众积极进行了制造武器、操练兵马等武装起义的

① 凌善清：《韦昌辉传》，《太平天国野史》卷12。

② 《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780页。

③④ 《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70页。

准备工作。他们在金田、湴田、花洲等地开炉铸军器，制造刀枪和土炮。拜上帝会会众还抢割地主家的稻禾，用来储备军粮，积极准备迎接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伟大战斗。一八四九年前后，广西连年发生饥荒，整个广西动荡起来，天地会乘机领导群众四处点燃武装暴动的烽火，拜上帝会与地主阶级的武装斗争亦日益激烈。整个紫荆山区革命的风烟滚滚，广大会众斗志昂扬，一场大革命的风暴终于来临了！

## 第二节 武装夺权与胜利进军的高潮

### 一、金田起义

一八五〇年七月，洪秀全看到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立即发布了总动员令，号召各地会众于十一月四日到金田村“团营”（即编制营伍）。于是，各地会众纷纷变卖家产，成群结队地向金田进发。他们冲破了地主武装的重重阻挠，历尽千辛万苦，陆续到达了金田村。数月之间，拜上帝会迅速发展成了一支拥有一万余人的革命大军。其中有紫荆山区基本会众两三千人，秦日纲率领的贵县龙山失业矿工一千余人；另有来自博白、陆川、贵县等地的拜上帝会群众、饥民和“来土械斗”中无家可归的客家人。一部分天地会群众也前来投奔拜上帝会，进一步壮大了革命队伍的声威。参加金田团营的拜上帝会群众，一般都是全家一起参加革命的。甚至有的村庄男女老幼几乎全部参加了。洪秀全以严密的军事制度把他们编制起来，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实行男女别营，建立圣库制度，配给军械、被服和旗帜。

从此，一支顶天立地的革命武装力量——太平军诞生了。

男营女营的建立，是太平军的一大创举。它使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一开始就有严格的军事纪律。分别编入男营女营的革命群众，“虽夫妇不许相见”<sup>①</sup>。这就使革命者免除了家庭的牵累而保持着充沛的革命斗志。入营的妇女，一部分编成女军，同男子一样戎装骏马，奋勇杀敌；一部分妇女则担当守卫和各项后勤工作。她们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建立圣库制度，是太平军的又一革命创举。参加团营的各地会众，将他们变卖家产所得的现金全部交入“圣库”，不许个人私有财产。然后，每人所需衣食杂用，均从圣库领取，人人过着“同食同穿”、大体平均的生活。圣库制度的建立，是几千年来革命农民要求平等、平均思想的具体体现。它沉重地打击了剥削阶级的私有制度，冲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法权。它适应了革命战争的需要，保证了革命成员生活上的必需品，培养和锻炼了革命者之间团结互助、同舟共济的革命精神。

毛主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sup>②</sup>一八五〇年冬，随着革命形势的急剧高涨，洪秀全、冯云山在平南县花洲山人村加紧部署武装起义，决心以革命的暴力去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但是，清朝反动统治阶级是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急忙调兵遣将，妄图把这场伟大的人民革命绞杀在摇篮里。一八五〇年九月，清廷急调湖南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率领楚兵入广西；又调前云南提督张必禄，率领黔兵到广西会剿太平军。十月，清政府将其不称心的广西巡抚郑祖琛革职；这年年底，张必禄也病死在桂平前

---

①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0页。

②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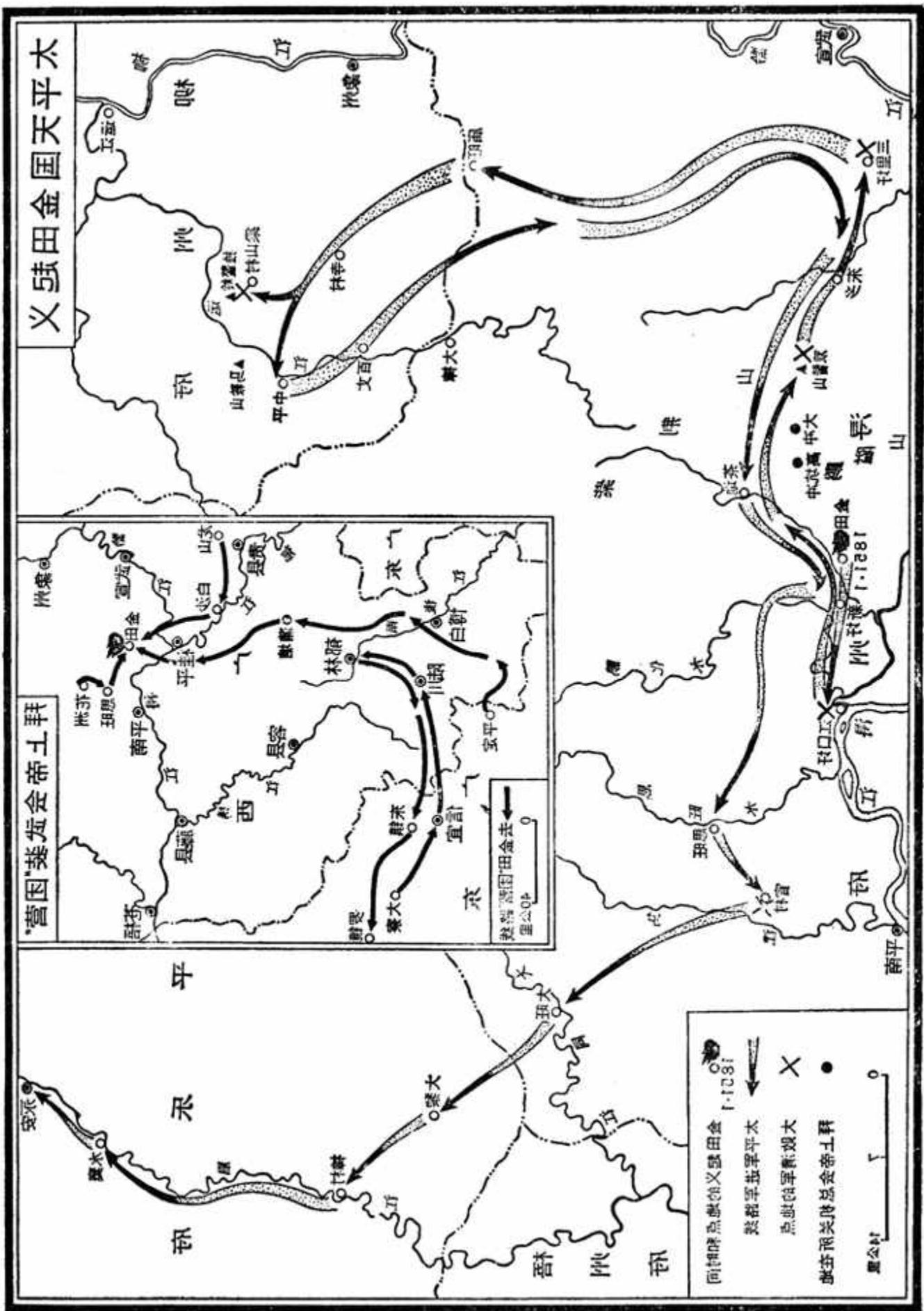
线，由部将镇远总兵周凤歧代统其军。清政府还陆续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北、福建等地调来兵勇，共拼凑了一万多人的反革命武装扑向广西桂平山区，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清军兵分两路，大举进攻新生的太平军。一路屯兵平南县思旺圩，重重包围了洪秀全、冯云山秘密指挥起义的所在地花洲；一路直扑金田村，妄图将太平军一网打尽。洪秀全秘密派人与金田总部取得联系，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举歼灭盘踞思旺圩的全部清军。一八五一年一月一日，太平军在金田附近的蔡村江，以灵活机动的伏击战，击溃了来犯之敌，阵斩清军副将伊克坦布。这两次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也锻炼了年轻的太平军。但是，反革命势力却如同受了创伤的野兽，愈加猖狂地向太平军反扑。一月初，新任钦差大臣、前两江总督李星沅，署理广西巡抚、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相继赶到桂林。向荣也窜至桂平前线督战指挥。然而，这群昏愦残暴的刽子手，不管怎样枉费心机，都是徒劳的。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这天，拜上帝会在金田庄严宣布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sup>①</sup>。从此，举世震惊的太平天国革命开始了！它象霹雷闪电，划破了沉寂黑暗的长空，唤醒了千百万受压迫的奴隶奋起革命。刹时间，整个南中国卷起了一股毁灭旧世界的狂风暴雨！壮丽的大好河山将在革命的风暴中得到新生。

洪秀全颁布五条简明纪律，作为太平军的行动准则。这五条纪律是：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即和睦），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

<sup>①</sup>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0页。



太平军全体将士蓄发易服，头包红巾，标志着同清朝统治者誓不两立。金田起义后的第三天，浩浩荡荡的太平军占领了交通方便、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口墟。天地会几支起义队伍的首领罗大纲、苏三娘（女）等率部与太平军会合，壮大了革命军的声威。三月八日，太平军在激战后退出江口墟，直抵武宣境内。三月二十三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建立了五军主将制度。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肖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

太平军设大营于东乡，前锋进抵武宣城东南的三里圩。四月初，周天爵、向荣率领清军六千余人，气势汹汹地扑向三里圩。洪秀全、冯云山亲自指挥太平军迎击来犯之敌。太平军视死如归，勇敢迎战，杀得清军抱头鼠窜，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清军在广西前线的接连失败，使清朝统治集团手忙脚乱。四月上旬，清政府派大学士赛尚阿兼程入广西部署军事。又从各省抽调重兵，充实军饷，并以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广西提督向荣为大将，加紧镇压太平军。五月，李星沅在武宣忧惧而死，由赛尚阿接任钦差大臣。广西巡抚的职位，也由邹鸣鹤接任。这时，太平军撤离武宣，直奔象州。六月上旬，在象州中坪墟、梁山村等地接连大破乌兰泰所部清军。随后，太平军又由象州折回桂平紫荆山区。七月，赛尚阿到达桂林，立即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组织各路清军进攻太平军。太平军在双髻山等地激战失利，阵地被清军攻破。八月十五日，洪秀全在茶地下诏，整顿太平军的纪律，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号召各军各营加强团结，“队伍宜整齐坚固，同心同力，千祈恪遵天令，不得再逆”<sup>①</sup>。太平军在莫村

<sup>①</sup>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64页。

时，曾处斩了临阵脱逃的黄以镇，指斥“黄以镇逆令双重”<sup>①</sup>，罪恶难容，当杀不赦。这就进一步严明了军纪，大大加强了太平军的战斗力。九月中旬，在平南县官村战役中，一举歼灭了悍敌向荣所部清军，缴获了大批军火炮械，随营粮饷，兵士衣装等军用物资，为太平军北上进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二、永安建制与反颠覆斗争

官村大捷后，太平军分成水陆两路大军，直趋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罗大纲率领陆路大军一举攻克了永安城。太平军迅速“占据仓库衙署”，布告安民，并在州城和城郊七十多个村庄设营布防，严阵以待来犯之敌。永安的解放，是太平天国革命前期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太平军克复的第一座州城。它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军民的革命斗志，沉重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凶恶气焰。

太平军克复永安后，清军立即跟踪而来。乌兰泰屯兵于城南，向荣率领残兵败将扎营于城东龙寮岭。但他们在太平军多次的沉重打击下，已成惊弓之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高垒自固，严密封锁。于是双方便出现了一个暂时对峙的局面。太平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休整部队，补充粮饷、弹药，并在永安城内进行了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工作，开展了清除内部奸细的斗争。

洪秀全进驻永安后，立即建立了崭新的社会秩序。为了更好地宣传和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他领导太平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革命政策的活动。他们反复向群众讲明“天兵是专杀老妖的，绝不伤害百姓”，“凡愿从天兵的，有吃有穿；不愿从天

---

<sup>①</sup>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62页。

兵的，只要不帮妖凑勇，不动不理”<sup>①</sup>。太平军的政治宣传，极大地激发了永安人民的革命热情，迅速掀起了军民一起打击恶霸地主、没收地主浮财、抢割地主稻禾的群众运动。这样既改善了贫苦农民的生活，也解决了太平军的军粮，加强了军民团结，不少贫苦农民踊跃参加了太平军。

加强纪律教育，是永安军事建设的重要内容。洪秀全在永安连续发布诏令，申明军纪。他要求“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sup>②</sup>；重申战争中一切缴获要尽数缴归圣库，不得个人私藏。诏令还一再教育全体官兵加强团结，遵守《十款天条》。一八五二年春，洪秀全还及时地把这些军事纪律的条规加以归

纳和总结，作为太平军的军律刊刻颁行，名为《太平条规》。它简明扼要地规定了有关太平军行军、宿营的严明纪律。例如，“不得吸烟、饮酒”，“不得焚烧民房及出恭在路并民房”<sup>③</sup>，等等，体现了太平军处处爱护人民群众，从而密切了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奠定了这支革命军队克敌制胜的坚实根基。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洪秀全于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发布封王诏令，增订太平天国官制，以加强和完善农民革命政权

① 转引自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第24—25页。

②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65页。

③ 《太平条规》，《太平天国》第1册，第155、156页。

的职能。诏令封立杨秀清为东王，肖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诸王皆受东王节制。此外，还封秦日纲为天官正丞相，胡以晃为春官正丞相，晋封罗大纲为总制。永安封王建制，标志着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太平天国革命政权逐步完善了，它进一步地打击和否定了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国家政权。然而，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毕竟是农民阶级的代表，他们受着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还不可能摆脱旧制度、旧思想的影响，更不可能去创立崭新的、科学的政治制度和政权体制，而只是采用封王建制的旧形式，作为建造农民革命政权的蓝图。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农民政权这一新生事物中，还保留着封建等级制度和其它封建法权的残余，对革命队伍起着腐蚀作用。

凶恶狡猾的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在武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同时，还利用各种手段打入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和阴谋颠覆活动，妄图以内外夹攻的卑鄙手段扑灭这场革命的烈火。这就决定了新生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不单要和公开的敌人作殊死搏斗，还要同混入革命内部的奸细和形形色色的复辟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一八五一年四月，奕詝（咸丰）就曾密令其爪牙“即当设法悬赏购线，使贼党自猜，攻剿更易得手”<sup>①</sup>。同年六月，再次密令其爪牙“多购间谍，解散党与，计诱贼首，使之自相携贰”<sup>②</sup>。当太平军在永安城内进行整顿时，奕詝又令其走卒“乘机设法密委有胆有识者潜入（永安）城中，探悉贼情……以为内外夹攻之计”<sup>③</sup>。因此，在太平天国内部，颠覆与反颠覆的阶级斗争，经常不断地

---

<sup>①②③</sup> 《东华续录》（咸丰朝），卷8。

进行着。十二月四日，天王下诏告诫全体官兵要提高警惕，不要被敌人所诱惑。诏令指出，当今“妖魔多端诱惑”，“妖魔诡计百出”，“特诏大小众兵将千祈坚耐，莫被诱惑”<sup>①</sup>。天王的训诫擦亮了太平军官兵的眼睛。十三日，一个暗自投降了清军的原太平军军帅周锡能，在敌人的唆使下，自清营潜入永安，窥探城防虚实，并在太平军中进行策反活动。他阴谋拉拢监军朱锡琨，巡查黄文安等伙同叛变，刺杀诸王，妄图以“外攻内应”<sup>②</sup>的阴谋手段颠覆新生的太平天国革命政权。但是，周锡能的行迹立刻被识破。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命令锁押周锡能，并亲自审讯。审讯证实了周锡能是一个被清军所收买的地地道道的叛徒、内奸。他在潜入永安之前，还在博白县纠集了一百九十多多个投机分子一起投降了清军统帅赛尚阿。杨秀清查明了案情，便将周锡能及其在永安的同伙立即处斩，粉碎了敌人的颠覆破坏活动，纯洁了革命队伍，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太平天国在永安坚决废除了由封建政府颁行的旧历法，断然否定了清王朝的“正朔”，而颁行了冯云山在桂平监狱创制的新的历法《天历》，实行了以“太平天国”为名号的新纪年。《天历》基本上采用阳历，“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立春、清明、芒种、立秋、寒露、大雪俱十六日，余俱十五日”<sup>③</sup>。《天历》的指导思想是“每年节气通记录，……裁定耕作便于民”<sup>④</sup>。《天历》坚决删除了旧历书中的“一切邪说歪例”<sup>⑤</sup>，做到“农时以正”<sup>⑥</sup>而便民耕作。因此，《天历》的颁行，不但表明太平天国政权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农业生产，还表明它在

①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66页。

②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378页。

③④⑤ 《颁行历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171、208—209、193页。

⑥ 洪仁玕：《英杰归真》，《太平天国》第2册，第589页。

荡涤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封建文化和习俗方面的决心。几千年来，由封建政府颁行的历法，往往塞进一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所谓“生、克、吉、凶”等陈腐的封建条规，几乎充满了每个月日时辰。因此，旧历法一向是宣传孔老二“天命论”的工具，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天历》则把这些无稽之谈一概斥之为“邪说歪例”，并且认为“随时行事皆大吉大昌也”<sup>①</sup>。无疑，《天历》的颁行起到了动员人民要与封建统治势不两立，要与旧思想、旧传统断然决裂的积极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颁行《天历》标志着太平天国用自己的正朔否定了清朝的正朔，反映了农民英雄们用农民政权取代地主政权的革命意志，表现了革命群众决心冲破旧制度、旧秩序网罗的智慧和勇气。

太平天国还在永安大量刊刻革命书籍。其中有的是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总结，有的是宣传革命道理的通俗读物。

太平军的革命活动，驱走了永安山城的黑暗，带来了光明和温暖。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一八五二年二月，清军以数万人的兵力重重包围了永安城。钦差大臣赛尚阿亲赴前线督战指挥。他命令向荣从北路、乌兰泰从南路大举进犯永安。在清军的严密包围和封锁下，太平军的“粮草殆尽，红粉（火药）亦无”<sup>②</sup>，物资供应十分困难。但是，经过休整的太平军，在洪秀全发出“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sup>③</sup>的号召鼓舞下，个个斗志高昂，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的进攻。但是，终因弹尽粮绝，孤城难守，太平军决定弃城北进。四月五日，太平军以罗大纲所部为先锋，乘雨夜突围，大败乌兰泰的追兵，阵斩天津镇总兵

① 《颁行历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172页。

②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368页。

③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68页。

长瑞、凉州镇总兵长寿、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郧阳镇总兵邵鹤龄等清军官兵四、五千人，取得了突围的重大胜利。从此，太平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北上战略进攻。他们以高度的智慧和勇敢，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绘制出一幅千军万马长驱北进的宏伟图画！

### 三、挺进两湖与奠都南京

太平军自永安胜利突围后，大军直抵桂林城下。但向荣已率轻骑提前窜入桂林城内督军固守。乌兰泰也率领援军追来。太平军在桂林城外重创清兵援军。清军都统乌兰泰受创，不久毙命。太平军攻城月余未克，遂撤围北上。一八五二年六月三日，太平军攻克全州。在激战中南王冯云山不幸中炮受伤，不久牺牲。冯云山是拜上帝会杰出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也是太平天国的杰出领导者之一。他为人坚韧不拔，奇智多谋，又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他一生为太平天国革命历尽艰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牺牲是太平天国的一个重大的损失。

太平军乘胜由全州分成水陆两路，沿湘江向湖南挺进。大军刚刚行至离全州不远的蓑衣渡，遭到了团练头子江忠源率领的楚勇的伏击。太平军与敌人激战两昼夜，损失十分严重。由于水路被阻，太平军改由陆路攻入湖南境内。六月十二日，攻占湘南的道州，就地进行整补。并于七月底相继克复江华、永明等县城。太平军在道州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军活动。这里是天地会活跃的地区，起义频繁，人数极众，他们和当地其他劳动群众二万多人参加了太平军。其中有道州、耒阳等地数千名挖煤工人加入，组成“土营”，专开地道攻城。他们在日后的攻坚战

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太平军由广西进入湖南时，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肖朝贵的名义，相继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谕》三篇革命文告。文告淋漓尽致地痛斥清朝“富儿当权”的反动统治，揭露清朝“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的弥天罪恶，号召各色人等“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sup>①</sup>。文告申明太平军起义的宗旨是，“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sup>②</sup>，即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同享太平之乐”的新世界。三篇文告是向清朝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挑战的战斗檄文。它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振奋了劳动群众的革命精神。文告远近散发，甚至“武昌城内外所在，亦多有之”<sup>③</sup>。三篇文告犹如春雷，强烈地震撼着两湖大地，极大地鼓舞了千百万群众的革命斗志。

八月，太平军离道州，攻克嘉禾、兰山、桂阳、郴州等地。清军或望风而逃，或弃城不守。太平军扎营于郴州，继续扩军，又有两三万人参加。接着，洪秀全派肖朝贵率领金一总制李开芳、御林侍卫林凤祥等袭取长沙。九月上旬，肖朝贵兵临长沙城下，奋勇当先，向守敌多次发动猛攻，不幸中炮牺牲。肖朝贵勇敢刚毅，冲锋在前，为太平天国革命立下了显赫的功勋。他的牺牲是太平天国的又一重大损失。十月十三日，洪秀全闻知肖朝贵牺牲的消息，亲率大军进抵长沙城下。清军则从四面八方飞调重兵向长沙增援。太平军同敌人激战多次，攻城不克，于十一月底撤长沙之围。十二月转克益阳、岳州等军事重镇。这里有许多贫苦船户、水手参加太平军，组成“水营”，船队由典水匠（职同将

<sup>①②</sup> 《颁行诏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162、160、164页。

<sup>③</sup>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第4册，第583页。

军)唐正才统辖。从此,太平军建立了强大的水师,进一步增强了全军的战斗力。太平军沿途驱杀贪官土豪,焚烧田契债券,把财物分给贫苦农民。而太平军自己则一贯军纪严明,对人民秋毫无犯,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广大劳动人民和天地会群众纷纷参加太平军。太平军由起义时的一万余人迅速增至五、六万人。十二月十五日,太平军水陆两路“从岳州起程,千帆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镫响,沿路凯歌声,水流风顺”<sup>①</sup>,直趋武昌城下。

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平军攻克汉阳,二十九日夺取汉口。太平军在汉阳与武昌之间的辽阔的江面上,搭成横跨长江的大浮桥,直通武昌城下。大军渡过浮桥进攻武昌,“人马来往,履如坦途”,“虽大风浪不能动”<sup>②</sup>。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二日,太平军轰塌文昌门城墙,胜利攻占武昌城。武昌人民热烈欢迎太平军,“爆竹之声,满城不绝”<sup>③</sup>。

太平军在武昌休整二十余天,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活动,特别是把反孔斗争进一步引向了深入。自从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天国就把反孔斗争与革命战争紧密结合起来,思想的批判和武器的批判同时并举,势如滔天激浪,冲击着反动的封建统治和孔孟之道。太平军在北进途中大都捣毁所过州县的孔庙、偶像,焚毁湖南郴州学宫就是著名的一例。这就严厉地打击了封建统治的象征,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精神堡垒。太平军一开始就十分注重以通俗读物的形式教育群众,批判孔孟之道。金田起义不久就编印了通俗的革命读本《幼学诗》,全文载诗三十

① 李汝昭:《镜山野史》,《太平天国》第3册,第5页。

②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第4册,第594、596页。

③ 张汉:《鄂城纪事诗》第18首自注,《太平天国资料》第34页。

四首，每首五言四句，具有通俗、明快、便于记忆的风格和特点。其内容主要是教育儿童敬拜上帝，团结，自强，要靠革命手段改变贫贱地位，即“贵贱皆由己，为人当自强”<sup>①</sup>。攻占武昌后，太平军在城内组织群众学习自编的《三字经》。这部新《三字经》的问世是太平天国反孔斗争深化的表现，它同孔孟之徒的《三字经》形式虽然相同，内容却是针锋相对的。孔孟之徒的《三字经》极力贩卖三纲五常等反动的纲常伦理教条，诱使学童不择手段地追求读书做官，宣扬什么“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等等，其根本目的就是为地主阶级培养奴才服务，为反动的封建政治服务。这部自南宋以来流毒甚广的反动著作，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害人经。太平军在同阶级敌人进行激烈的武装斗争的同时，编纂革命的《三字经》去宣传群众，教育群众，这是农民阶级反孔斗争的创举，是农民英雄们以自己的果敢行动再次断然宣布：革命与孔孟之道是势不两立的。新《三字经》是三字一句，共三百五十二句，一千零五十六



一八五一年刻《幼学诗》封面

① 《幼学诗》，《太平天国》第1册，第235页。

字。它以犀利明快的笔锋阐明革命道理，批判孔孟之道，教育儿童自幼就要养成坚定的革命立场，对敌人要狠，要战而胜之。例如它把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称作“红眼睛，即阎罗，最作怪，此蛇魔”，并旗帜鲜明地号召人民要象“皇上帝”那样“教其子，制服妖，战服他，不放宽”。《三字经》还教育儿童自幼就要养成严守革命纪律和严格要求自己的好传统、好作风：“小孩子，拜上帝，守天条，莫放肆，要炼正，莫歪心”<sup>①</sup>，等等。可见这部新《三字经》的中心思想是热情地宣扬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其根本目的是为农民阶级政治服务、为农民革命培养接班人。不仅如此，太平军还组织广大群众学习《幼学诗》、新《三字经》等作品，这说明这些作品决不是一般的蒙童识字课本，而是教育军民坚持革命的生动活泼的政治教材，是动员千百万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埋葬旧制度旧秩序、建立地上“天国”的思想武器。当然，由于农民阶级摆脱不了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这些著作同太平天国早期的一些文献、文告一样，里面还有浓厚的宗教语言和儒家用过的一些词句，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

太平军强大的宣传教育活动与反孔斗争，使武昌城内政治空气生动活泼。广大群众冲破了孔孟之道的思想牢笼，甘心为革命赴汤蹈火。一个潜伏在武昌城内的阶级敌人目睹这一大好形势惊呼：人民“死心”拥护太平军，“甘蹈白刃者以此”<sup>②</sup>。这就从反面证明了反孔斗争的巨大威力。思想的解放，必然带来巨大的革命行动。武昌人民积极支援太平军，争先贡献“金银、钱米、鸡鸭、茶叶”<sup>③</sup>等物资以充军用；出现了“民出金帛者，肩摩踵

---

<sup>①</sup> 《三字经》，《太平天国》第1册，第227页。

<sup>②③</sup>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第4册，第599、594页。

接”<sup>①</sup>的动人场面。城内还立即掀起了参加太平军的革命热潮，“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sup>②</sup>。太平军迅速形成了一支号称五十万人的革命大军。

一八五三年二月，太平军自武汉兵分水陆两路，直捣南京。水师由秦日纲、罗大纲、赖汉英等率领，千帆竞发，顺流东下，“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sup>③</sup>；陆军由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等率领，千军万马沿江两岸长驱东进，旌旗蔽日，人马如云，形成一幅威武雄壮的进军图画！太平军以破竹之势连下九江、安庆、芜湖等军事重镇；三月四日兵锋直逼南京城下。陆军扎营在雨花台，水师布防于水西门外。龟缩在南京城内的两江总督陆建瀛等，成了瓮中之鳖。太平军一面积极准备攻城，一面深入宣传革命宗旨，广泛动员群众支援革命战争。他们“在城外搭高台于旷野”，



天王府大门

①② 《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572页。

③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太平天国》第3册，第141页。

“屡讲道理示人”<sup>①</sup>。革命的舆论唤醒了群众，太平军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教育了群众。于是，人民群众积极献出银、钱、米、菜、猪、鸡、鸭等，大力支援太平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太平军于三月十九日胜利攻占南京外城，斩陆建瀛。第二天攻破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

三月二十九日，天王洪秀全在十多万人欢迎的鼓乐声中进入南京城，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太平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开禁放囚”；稽查隐匿官绅，称作“搜妖”；开仓赈济贫民，“发粮无数，来取者即与之”<sup>②</sup>；太平军还“传锣令百姓贸易如故”<sup>③</sup>。这些措施迅速安定了南京的社会秩序。

太平天国在建立天京革命秩序的同时，还及时地展开了对长江下游地区的军事进攻。

三月底，太平军乘胜攻占了镇江、扬州、瓜洲、浦口等军事重镇，并委派罗大纲等统兵镇守，以保卫天京。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的巨大胜利，引起了中外反动势力一片惊慌，打乱了英国等外国侵略者企图干涉太平天国革命的阴谋计划。三月底，清廷令钦差大臣向荣率军在天京城外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令琦善、胜保率军在扬州城外建立江北大营。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饷，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诚采纳其幕僚钱江的建议，在扬州仙女庙设厘金所，对该地米市课以百分之一的捐税，叫做“厘捐”或“厘金”。以后各省相继仿行，推广全国。清政府企图依仗江南、江北两大反动堡垒钳制天京。从此，太平天国同敌人的军事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

<sup>①②③</sup>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50、656、651页。

## 四、北伐和西征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为了巩固农民革命政权，彻底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于一八五三年五月八日，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统兵二万多名出师北伐。北伐军自扬州经仪征攻入安徽，连克滁州、临淮关、凤阳、亳州等地，一路势如破竹。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殿左三检点朱锡琨等相继领兵赶往亳州，与林凤祥、李开芳胜利会师。皖北地区的捻军和贫苦农民积极配合北伐军，连败清军。豫东捻军听到北伐军挺进皖北的喜讯，主动前往亳州等地迎接。在豫东捻军的配合下，北伐军向河南境内挺进。六月十三日，攻占豫东重镇归德府（今商丘），杀清兵三千多人，河南巡抚陆应谷兵败逃走，缴获大批铁炮与火药。北伐军本打算从归德附近的刘家口渡过黄河，取道山东，进攻北京<sup>①</sup>。但因清军在黄河两岸处处严防，并将船只撤到北岸，无船可渡，于是西向开封，扎营于朱仙镇。林凤祥、李开芳在此向天王写了一份报告，秘密送回天京，报告沿途进军情况以及遇到缺粮、无船等困难。但是，英勇顽强的北伐军，在困难面前毫不畏缩和动摇，决心寻找地点飞渡黄河，直捣北京城。北伐军遵循师行间道、避实就虚的战略战术，撤围开封，自朱仙镇继续西进，经中牟、郑州、荥阳到达巩县。他们在当地挖煤工人的协助下，终于在巩县洛河口找到运煤船多艘。六月二十八

---

<sup>①</sup> 一八五三年（咸丰五年）以前，黄河是从旧道入海，即由开封铜瓦厢向东南经徐州、淮阴，再向东北，经苏北进入海口。北伐太平军过归德府往北，打算从刘家渡口过河，就是指的黄河旧道。一八五五年夏天，黄河从铜瓦厢决口，由此折往东北，经济南以北，由大清河入海，这就是现在的黄河河道。

日至七月四日，大军由汜水口胜利渡过黄河；克复温县、武陟等县城，进围怀庆府（今沁阳）。怀庆是豫北重镇，储有火药、兵器很多。因此，清朝政府十分惊慌，急忙任命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统辖黄河南北各路清军六万多人拚死抵挡。北伐军围怀庆两月之久未能攻克，于九月一日主动撤围。他们以乘虚蹈隙、迂回作战的灵活战术，破济源，入山西，连克垣曲、绛县、平阳（今临汾）、洪洞、潞城、黎城等地。然后，大军突然东向折回河南，从武安进入直隶（今河北省）境内。九月二十九日攻克军事重镇临铭关，大破清军。讷尔经额仅仅带着几十个喽罗逃跑了。奕詝闻讯，气急败坏，把讷尔经额撤职拿问，由胜保接任钦差大臣。北伐军从扬州出发时，胜保一路尾随“追剿”，但屡被北伐军所败。北伐军曾在沿途钉上木牌，写着“胜妖免送”加以讽刺。所以，时人称胜保为“败保”。

太平军乘胜继续北上，连克沙河、任县、柏乡、赵州、栾城、藁城、晋州、深州等县城，前锋逼近保定。在北伐军的迅猛攻势下，清朝统治集团惊恐万状，“都中大员家眷及官绅无不各鸟兽散。正阳门大市若荒郊，无人迹”<sup>①</sup>。奕詝急忙召集王公大臣商讨对策。但这帮平时气势汹汹的恶棍、刽子手，此时此刻却威风扫地以尽，“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sup>②</sup>。充分暴露其色厉而内荏的虚弱本质。奕詝一面准备逃往热河，一面急忙派惠亲王绵愉、恭亲王奕訢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统率大军，会同胜保拚死抵抗。北伐军以凌厉的攻势避开前面清军的抵挡，由献县东向克交河，然后沿运河北上克沧州、青县，于十月底迫近天津城郊。清政府飞调重兵竭力阻截，割断北伐军与后方的联系。并派僧格

<sup>①②</sup> 邓文浜：《哭不足以济事》，《醒睡录初集》卷3。

林沁、胜保聚重兵于天津北面的杨村，死死盯住北伐军。北伐军扎营于天津西南面的静海、独流，与清军对峙三个多月。但终因孤军深入，寒衣粮草不济，于一八五四年二月自动南撤至阜城坚守待援。名将吉文元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一八五四年二月，天京派夏官正丞相黄生才、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率七千余人增援北伐。援军从安庆出发，经六安、蒙城、河南永城，然后由苏北的蟠龙集攻入山东。四月十二日，克临清州。但因兵力单薄和许宗扬挑起内争、煽动退却逃跑，致使援军在南撤途中遭到清军截击而全军覆没。五月，天京又派燕王秦日纲率军再次增援北伐。但行至舒城就战败而归了。

五月初，林凤祥、李开芳率北伐军自阜城突围，东至连镇。不久，李开芳率骑兵两千余人南下接应援军，先后被清军围困在山东高唐州与茌平冯官屯。从此，北伐军被分割两地，军势更加孤危。但他们在极端险恶的形势下与清军多次肉搏，表现了坚忍不拔的高贵品质与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一八五五年三月，连镇失守，全体将士壮烈牺牲，林凤祥被俘，慷慨就义于北京。五月，清军攻陷冯官屯，李开芳被俘死。自此，长驱六省、历时两年多的太平军北伐，英勇悲壮地失败了。

北伐战争的失败，是太平天国过早定都南京的错误战略思想的必然结果。太平天国领导者，没有在攻克南京之后乘胜全力北伐，廓清中原，一鼓作气地推翻盘踞北京的清朝中央政权，却是偏安江南一隅之地，而又开辟了北伐、西征和保卫天京三大战场。结果造成兵力分散，顾此失彼，致使孤军深入的北伐军兵力单薄，援军不济而失败。

可歌可泣的北伐虽然失败了，但它英勇顽强的战斗行动，却

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并直接推动了北方广大地区的捻军起义，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在长江流域的革命斗争。

与北伐的同时，太平天国派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殿左一检点曾天养等人率战船一千余艘溯江西上，开始了浩浩荡荡的西征。西征的战略目标主要是夺取武汉、九江、安庆等军事重镇，控制长江中上游和南中国各省，以扩大太平天国的统治地区。

西征军以破竹之势于一八五三年六月十日再克安庆，二十四日进围南昌。但攻城三月未下，西征军主动撤围；九月二十九日再克九江。从此，西征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经略皖北，于一八五四年一月十四日克庐州，并相继收复周围二十余州县，安徽巡抚江忠源兵败投水毙命；一路由国宗石祥祯、韦俊率领沿江西上，挺进湖北，于一八五三年十月二十日再次攻克汉口、汉阳。旋因扬州方面军事紧张，遂于十一月中旬撤出。一八五四年初，石祥祯、曾天养等率领四万兵力再度溯江西上，于二月十六日第三次进占汉口、汉阳。西征军一路经略湖北；另一路乘胜规取湖南，于二月二十七日再克岳州；三月上旬克湘阴、靖港、宁乡。太平军在这里遇到官僚地主曾国藩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湘军的拚死顽抗。

曾国藩（一八一一年——一八七二年），湖南湘乡人，地主家庭出身，自幼接受儒家的反动教育，自称“须臾不离”孔孟经书。一八三八年中进士，选入翰林，成为奸相穆彰阿的门生私党，是个孔孟之道的铁杆维护者。一八四〇年后，他在北京做官期间，纠集一帮孔孟之徒，从所谓“理学大师”唐鑑、倭仁讲习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妄图从中找出挽救清朝封建统治危机的灵丹妙方。从此，他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理学家”，并为清朝统治集

团所青睐。他官运亨通，很快爬至礼部侍郎。一八五二年典试江西因丧母丁忧回籍。这时太平军已连占岳州、汉阳，进围武昌，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席卷着南中国的大地，震撼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为了挽救所谓“危局”，一八五三年一月八日，清廷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团练。一月二十九日，他从湘乡到长沙，着手创办团练，即湘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支由他私人控制的军阀武装——湘军。当时清军的八旗绿营兵腐败无能，从奕詝到大小地主都要求有一个反革命劲旅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曾国藩建成湘军，正是适应了这一反革命的需要。

一八五四年三月，湘军组成陆师、水师两军。陆师十三营、水师十营，合计员弁、兵勇、夫役共一万七千余人，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反革命军阀集团。这支地主武装的主要头目，都是他的同乡、亲属或学生，血统和裙带关系是湘军联系的纽带。这些人是一帮子名利熏心的反动儒生，或为恶一方的土豪劣绅、地头蛇。他们想借军功以获取高官厚禄，公开以孔孟之道为遮羞布，扬言要为保卫“圣朝”而死战，为保卫封建纲纪伦常而卖命。这支反动武装还在衡州、湘潭设立造船厂制造炮船，并向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购置洋枪洋炮武装自己。它是一支有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和浓厚的地方色彩的军队。士兵由营官招募，招多少人，给多大军衔，对象主要是湖南湘乡山区，大都是曾国藩的老乡。这种军队，每营只服从营官，全军只服从“大帅”，完全是军阀性质的军队。这支反革命武装，是太平天国最凶恶的敌人。

西征军进入湖南后，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各营倾巢出动，拚死抵挡。太平军在靖港、宁乡与湘军鏖战中失利，主动撤回湖北。湘军乘势攻陷岳州，准备兼程东下，援救武昌。因此，湖北战场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太平军立即组织反攻，大军再度挺进湖

南，同湘军展开了决战。四月七日，西征军重新夺回岳州，湘军奔溃不能止，曾国藩在乱兵中狼狈窜回长沙。太平军乘胜南下，连克靖港、湘潭等地，形成了南北夹击长沙的军事优势。龟缩在长沙城里的曾国藩，成了瓮中之鳖。他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可悲地发出“东南大局，真堪痛哭”<sup>①</sup>的哀叹。曾国藩为解除长沙北面的威胁，于四月二十八日亲自出马，率领水陆两军杀气腾腾地向靖港反扑。太平军沉着应战，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湘军水师。他们机智地乘风纵火，焚毁湘军战船。在太平军的英勇打击下，湘军水师溃乱覆没；陆师也被聚而歼灭。曾国藩损兵折将，吓得投水寻死，被其喽罗捞起。但在湘潭战役中，由于太平军主将林绍璋指挥不当，遂使太平军作战失利，战船被焚毁二千余艘，遭到严重损失。六月，太平军在湖北战场上接连取胜，再度攻占武昌。七月，湘军重整旗鼓，攻陷岳州。八月，曾天养率领太平军反攻岳州，在城陵矶重创湘军，歼敌数百，击毁击沉敌船三十多艘。但是智勇双全的著名老将曾天养，在与湘军悍将、湖北提督塔齐布交战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使西征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太平军被迫退出湖南。十月，又被迫退出武汉。十一月下旬，在半壁山、田家镇大血战中，太平军再度受挫失利。湘军步步紧逼，猛扑九江，西征形势十分危急。

一八五五年一月，正当曾国藩做着“肃清江面，直捣金陵”<sup>②</sup>的美梦时，天京建立了西征指挥部，集中主要力量打击西线湘军，并及时派罗大纲等人率领精锐之师增援西征。豫王胡以晃奉命自安庆移军至湖口主持战事；十八岁的骁将陈玉成自江北

① 曾国藩：《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

② 曾国藩：《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防堵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4，第49页。



太平军湖口之战

赶至九江协助林启容婴城固守。湘军悍将塔齐布、罗泽南等联合湖北按察使胡林翼会攻九江，湘军水师则气势汹汹地扑向湖口。湘军倾巢出动，老贼曾国藩亲临前线督战指挥。因此，九江和湖口成为双方决战的战场。

太平军先是坚壁高垒，不与敌军决战，只是以灵活机动的小船每夜袭击敌船，使敌军彻夜戒严，疲惫不堪，急于求战；然后佯撤湖口守军，引诱湘军一百多艘舢舨快船冲入鄱阳湖内，其笨重大船仍留在长江江面。太平军乘机重新封锁湖口，把湘军水师切成湖内与江面两段。二月十一日深夜，太平军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江面湘军的大船，焚毁四十多艘，大败湘军水师。罗大纲率领太平军直取曾国藩座船，杀该船管驾等官员。曾国藩惊骇至极，再次投水寻死，又被其喽罗捞起，落荒逃回南昌。

太平军乘胜全面大反攻，于四月三日第三次克复武昌，稳定了长江上游的局面。一八五六年春，太平军在江西大破湘军陆

师，克复江西八府五十四州县，西征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一八五六年四月初，太平军击溃了清军江北大营，再克扬州；六月二十日，各路太平军全面出击，一举攻破了清军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头子向荣逃至丹阳丧命。自此，解除了威胁天京长达三年之久的肘腋之患，使太平军从上游的武汉至下游的镇江，在漫长的大江水面上畅通无阻，形成了太平天国军事上的全盛时期，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

### 第三节 各地各族人民响应 太平天国的起义

#### 一、江南天地会起义

天地会创始于康熙年间。本为明末抗清志士组织的“反清复明”的秘密会社，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人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秘密革命团体。

天地会以建立山堂、结盟拜会等形式组织群众，盛行于东南诸省和长江流域。其支派甚多，东南沿海有小刀会、红钱会；两广和湘赣地区有三合会、三点会、串子会、边钱会、红黑会；长江流域有哥老会，是天地会中最大的派别。在南洋华侨中则用“义兴公司”（即振兴“义”气）等旗号。各派独立活动，互不统属，无统一的纲领和旗号。其主要成员有农民、手工业者、水手、流氓无产者和裁撤兵勇。因此，天地会的成分比较复杂。有些山堂的领导权被坏人所窃夺。这些人以孔孟之道的“忠义”作信条，把“顺天行道”作口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结果一次次地葬送

了天地会的起义斗争。

太平天国起义后，天地会纷起响应。有的直接参加了太平军，有的和太平军协同战斗，互相支援，遂使天地会的革命斗争别开新生面。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前后，著名的天地会起义有以下几支：

福建小刀会起义。小刀会，系一八四九年新加坡华侨陈正成首先在厦门成立，后在广州、上海、宁波等地发展组织。不久，陈正成被清朝反动当局所捕杀。从此，小刀会的会务由黄威（又名黄位）主持。一八五三年五月，黄威与黄德美率领会众在福建海澄县起义，攻克漳州、厦门、漳浦等地，并以“汉大明统兵大元帅”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痛斥清朝反动统治的罪恶。清军增援反扑厦门，起义军被迫退居闽粤海面坚持战斗。起义军曾派专使赶赴天京与太平天国联络，但遭清军破坏。不久，这支起义军在海面上失败了。

福建红钱会起义。一八五三年五月，福建永春县霞陵人林俊率领红钱会起义。红钱会，系天地会支派之一。该会用康熙年间的铜钱式样，将康熙二字用刀刮掉，中涂红色，作为会徽，故称红钱会。林俊，又名林万青，自幼善武术，好义气，为当地青年所推崇。他被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及其在江西的胜利所鼓舞，遂与挚友陈湖分头接洽红钱会、黑钱会密谋革命，率众起义，攻入德化县城，与黄威领导的厦门沿海地区的小刀会起义相呼应。但因军事上不甚顺利，兵锋转向仙游、炉内等地区。九月二十六日攻占仙游城，杀死知县，遍贴安民告示，揭露清朝统治者压榨人民的罪恶，宣布起义军的革命政策和措施，促使敌人分化瓦解。林俊转战闽北山区达五年之久，曾与太平天国取得联系，受封为烈王。一八五七年自闽北顺昌县北上迎接太平军，途中被地

主武装伏击英勇牺牲。从此，这支转战福建南北的起义队伍失败了。

上海小刀会起义。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一八二〇—一八五五年），广东香山县人。一八四五年在香港加入天地会，密图革命。一八四九年，刘丽川到上海，同周立春等天地会首领一起建立和发展上海小刀会组织。这个秘密的革命团体，对外用“义兴公司”为代号，迅速发展革命力量。一八五三年九月五

日，周立春率领嘉定农民起义军攻占嘉定城后，刘丽川于九月七日在上海发动起义，迅速夺取全城，击杀上海知县，活捉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起义当天，立即建立革命政权，建号“大明太平天国”，宣布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刘丽川曾上书天王洪秀全，与太平军进行联络。

小刀会在十多天内连克青浦、川沙、南汇、嘉定、宝山等县城。但清朝统治阶级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同起义军拚死挣扎，这些县城在一个月之内又被清军夺了回去。起义军坚守上海孤城。外国侵略者表面伪装“中立”，暗里却勾结清朝当局镇压革命。美

大明國統理正教招討大元帥劉為 出示安民以靖地方事  
照得安邦定國安民非所以害民發政施仁戡亂非所以擾亂城  
廟内外毋庸驚速士農工商各安本業雖夷當滅明當復興茲因  
童君奇暗污史貪官殘害庶民殊深可憫本帥應順天人興起義  
師剿滅貪官以除殘暴為此特舉義兵先行諭囑部下不得妄取  
民間一物不許姦淫婦女凌害良民如有抗違不遵本帥定當究  
治以免冥報之戮特此諭知各宜凜遵特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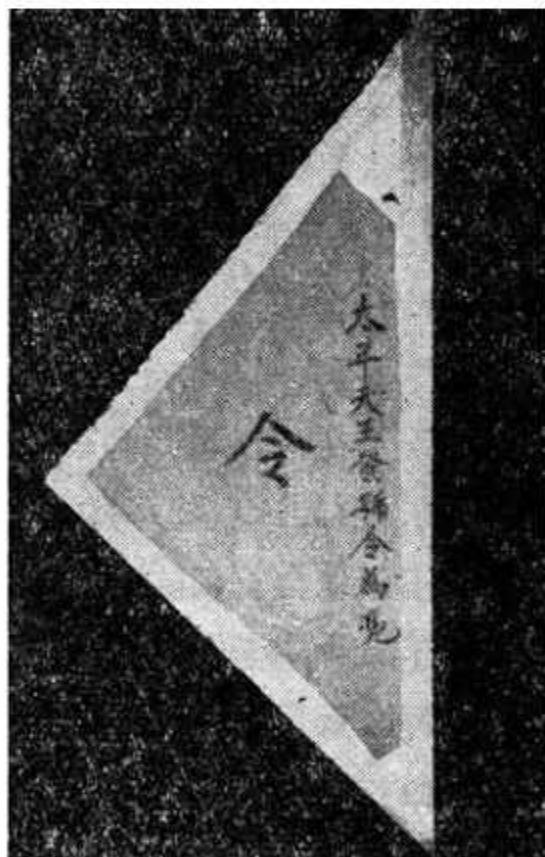
天運元年八月初五日示

發貼上海大東門

刘丽川布告

国侵略者把起义军缴获的部分枪械弹药送回清军，法国侵略者则悍然向起义军开枪射击。刘丽川大义凛然，及时致函美、英、法等国领事，严厉指斥他们的侵略罪行，揭露他们的“不法行为”<sup>①</sup>。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小刀会经过十七个月的浴血奋战后，于一八五五年二月弃城突围，刘丽川不幸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有的辗转流落到江西参加了太平军，有的参加了江西的天地会起义。

湖南天地会起义。一八五二年，浏阳人周国瑜“聚党逾万人”<sup>②</sup>发动起义，建号“征义堂”。一八五三年，道州人何贱苟自称“普南王”，率领衡州、永兴、桂阳、常宁等地的天地会起义。他们“到处发吊码，入会者约四、五千人”<sup>③</sup>。这支起义军以常宁之五洞、桂阳的白水洞为中心，在周围十余州县抗击清军。他们与太平军相联络，曾一度攻占常宁、嘉禾等县城，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的西征。曾国藩无可奈何地惊呼：“此股会‘匪’，实为湖南之巨患。”<sup>④</sup>并派



湖南天地会令旗

① 《刘丽川致各国领事函》，《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17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卷1，第34页。

③④ 曾国藩：《衡永一带剿匪未毕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第23—24页。

重兵驻守衡州，企图扑灭这支起义军。

江西边钱会起义。边钱会“以钱涂朱，描金为字”<sup>①</sup>作标志，故称边钱会。早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边钱会就已活跃在江西吉安、建昌等地区。一八五五年冬，太平军胜利西征，占领了江西广大地区，极大地鼓舞了边钱会的革命斗争。一八五六五月，该会首领林双桂不幸被清军捕杀，广大会众无不义愤填膺。八月，边钱会聚众数千，在吉安、建昌交界处发动起义。他们在太平军的支援下，一举攻破南丰、新城、贵溪、铅山等县城。清建昌知府何栻受创毙命。九月初，起义军曾攻占广信府城，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曾国藩在上奏中哀叹：边钱会“围逼广信，梗塞江西省咽喉之路，大局几不可问”<sup>②</sup>。清朝统治者急忙飞调闽、浙清军入江西镇压边钱会。边钱会和太平军相配合，以灵活的战术打击敌人，牵制了江西和闽浙地区的部分清军，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在江西地区的革命战争。

广东“红巾军”起义和广西大成国的建立。一八五四年六月，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在南海县佛山镇起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同年七月，李文茂等人也在广州北郊佛岭市起义响应。广东人民万众云集，头裹红巾，十多天内就组成了几十万人的起义大军，世称“红巾军”。陈开率领起义军进攻广州城，连克附近数县。起义军围攻广州达半年之久。两广总督叶名琛纠合地主武装疯狂镇压起义军。大约有七、八万人死在这个刽子手的屠刀之下。英、美、法侵略者也悍然用轮船帮助清军运兵运粮绞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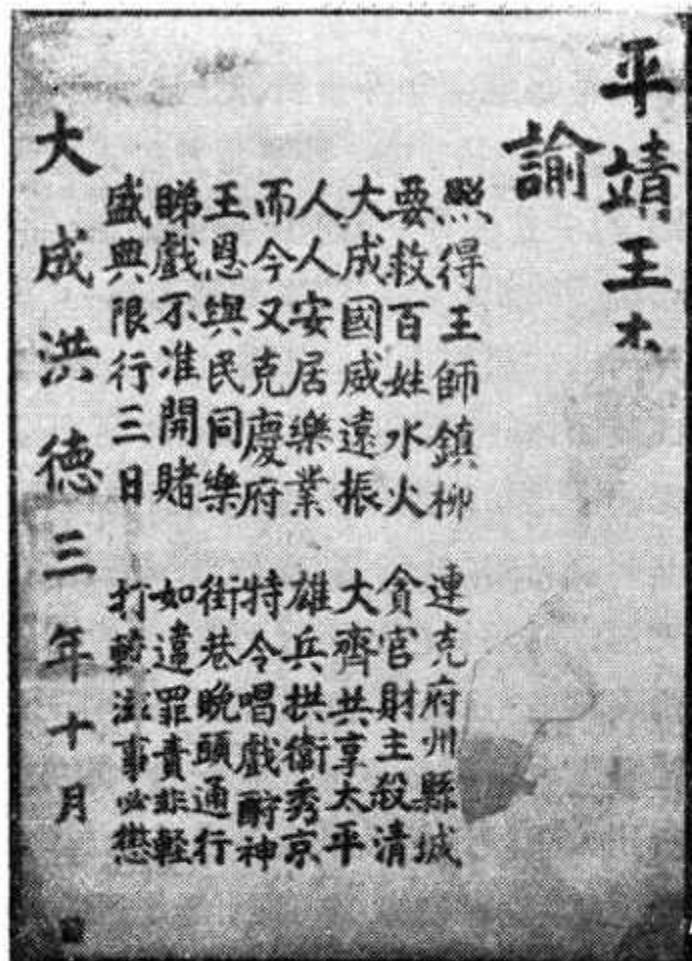
<sup>①</sup> 曾国藩：《边钱会匪围攻广信浙兵援剿解围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0，第11页。

<sup>②</sup> 曾国藩：《边钱会匪围攻广信浙兵援剿解围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0，第13页。

义军。起义军于一八五五年一月照会英、美、法侵略者，严正抗议他们的侵略罪行。四月，起义军主动撤围；陈开、李文茂率众进入广西，攻占浔州府，改称“秀京”，建立“大成国”，势力波及广西大部、广东和贵州部分地区。一八六年斗争失败。

一八五四年，广西天地会首领朱洪英、胡有禄率众起义，攻占灌阳，建立“昇平天国”。朱称镇南王，胡称定南王。

他们接受罗大纲的邀请，于一八五五年六月攻占湖南东安，打算与太平军会合，但遭到王鑫所部湘军的阻击。九月，这支起义军作战失利。胡有禄被俘牺牲。朱洪英率余部退回广西坚持反清斗争。



李文茂告示

## 二、北方捻军起义

捻军，原称捻党或捻子。捻党起于清朝初年，本为淮河两岸穷苦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武装团体，以后逐渐扩展到山东、河南、苏北等地。成员有农民、盐贩、饥民、流氓无产者和裁撤兵勇等

等。起初主要从事抗粮、抗差、吃大户、杀富济贫等斗争，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和斗争目标。活动时往往数十人或数百人为一股，谓之一捻。捻，是皖北方言。当地人民俗称一支、一股或一部分、一伙儿为“一捻子”。因此，各部“自号为捻，不相统一”<sup>①</sup>，无统一旗帜。各部捻军首领通称为“捻头”，或“趟主”。各捻独自活动，“居则为民，出则为捻”，是一种半兵半农的贫苦农民的武装团体。一八五二年，安徽、河南等地农民，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纷纷聚集在各捻周围进行武装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其中著名的“捻头”有安徽亳州的张乐行、龚得树，河南永城的苏天福，河南夏邑的王冠三等。一八五二年年初，张乐行和龚得树等著名“捻头”，在雉河集（今涡阳县城）聚众万人，起义抗清，曾一度攻占河南永城。十一月，永城人冯金标、亳州人朱洪占、宿州人李殿元等十八人各自结捻起义，号称“十八铺”；拥立张乐行为总领袖，在蒙城、亳州等地区打击清朝统治势力。从此，安徽和河南等地农民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捻军起义。特别是亳州、蒙城、永城等地群众普遍结捻，形成“一庄有捻一庄安，一族有捻一族幸……虽及第之荣不若是其赫赫也”<sup>②</sup>的局面。因此，一些地主分子为保其自身之计，也“帮以资粮，纠众而捻”<sup>③</sup>，或窃踞捻头的地位。这就是当时所谓的“招捻”，其实是地地道道的伪捻。他们在捻军同清军的斗争中，经常是朝秦暮楚，反复无常，是破坏捻军运动的反动势力。他们和一些充当捻头的流氓无产者，是清朝统治者进行收买、招安的主要对象。

捻军起义，必然引起清朝统治阶级的仇视和惊恐。于是，他

<sup>①</sup> 尹耕云等：《豫军纪略》卷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以下简称《捻军》）第2册，第289页。

<sup>②③</sup> 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捻军》第1册，第310页。

们疯狂地向捻军反扑。一八五三年三月，清朝命周天爵以兵部侍郎衔在宿州设立行营，作为进攻捻军的据点。他采取武装镇压和“招抚”捻头、分化捻军队伍的反革命两手策略，猖狂地向捻军进攻。他派其长子周光碧，亲赴雉河集招抚捻头冯金标、张乐行等，“尽赏顶戴以笼络之”<sup>①</sup>。张乐行一度堕入敌人的圈套，接受招安。并于五月间奉周天爵之命，协同寿州清军前往定远县境镇压陆遐龄领导的捻军起义。陆部溃散后，张乐行被“遣散归籍”。他重返雉河集，屏弃“招安”，不受周天爵节制，“居民从者愈众”<sup>②</sup>。但是，张乐行一度接受招安，投降清廷，参加镇压定远捻军，实为严重的罪过。

与清军镇压捻军的同时，豫东、皖北的地主团练也蠢蠢欲动。归德、永城一带的地主团练“老牛会”<sup>③</sup>，联合豫皖边境数县的地主团练，猖狂地向捻军进攻。他们纠集八万多人的反动武装，结成剿杀捻军的反革命联盟，大肆捕杀这一地区的起义群众，成为“剿捻”的急先锋。

一八五三年五月，太平军北伐时，皖北、河南各地捻军四起响应，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也大大推动了捻军起义的发展。各部捻军更加活跃在涡河两岸和豫皖边境。一八五四年三月，太平天国北伐援军经过皖北时，张乐行率领所部捻军和苏天福率领的捻军随太平军进入永城县城。但是，老牛会团练联盟，却乘机扑向苏部捻军的家乡永城西南地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反革命复仇政策。老牛会的反革命屠杀，更加激愤了豫东、皖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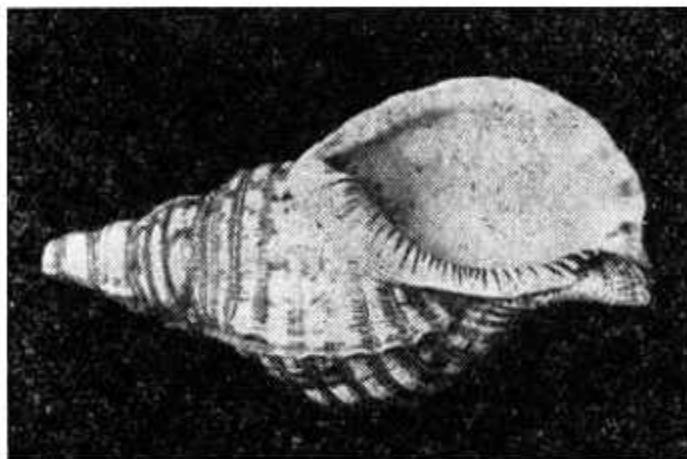
---

① 《蒙城县志书》卷6，《兵事》，《捻军》第2册，第63页。

② 《涡阳县志》卷15，《兵事》，《捻军》第2册，第99页。

③ 老牛会，系由地主分子牛长庚创立，故名老牛会。该会以白布裹头，当地群众称它为“孝帽子会”。

地区的人民群众，他们纷纷加入捻军，打败了老牛会的进攻。各部捻军也在同清军和老牛会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了。



捻军海螺

一八五五年八月，各路捻军大会于安徽蒙城雉河集，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张乐行“自称大汉永王”<sup>①</sup>，“祭告天地，宣布信条”<sup>②</sup>，下分黄、白、红、黑、兰五色旗帜，另有五色镶边旗、八卦旗、水花旗等名目。

每旗各有首领，“各旗统将皆听盟主调遣”<sup>③</sup>。盟主成为捻军的最高统帅，下设“军帅、司马、先锋名目”<sup>④</sup>。盟主对各部捻军只有调遣权，而无任免权。

盟主之下设五大旗，各大旗人数不一，少则万人，多则十多万人，随时增减，并不固定。大旗之下设小旗，是组成捻军的基本单位，能独立进行活动，但无固定编制。各小旗的人数多寡不一，少者十余人，多者数百。各旗一般都是步、骑混合，在初期是步兵多而骑兵少。但随着流动战争的发展，骑兵日益壮大，数量显著增多，到了后期，就完全成了骑兵。

捻军的大联合，标志着它在组织上由分散趋于初步统一，在政治上有了比较明确的反清目标。从此，捻军声威大震，成为北

<sup>①</sup> 《张乐行自述》，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又据尹耕云等：《豫军纪路》卷6载：张乐行曾称大汉明命王，见《捻军》第2册，第301页。

<sup>②③</sup> 《涡阳县志》卷15，《兵事》，《捻军》第2册，第100页。

<sup>④</sup> 尹耕云等：《豫军纪略》卷6，《捻军》第2册，第300页。

方革命武装的主力，在皖北、豫东数百里的区域内进攻城镇，打击清军。一八五五年十月，捻军进攻归德府城时，“马步自东而来者络绎不绝，环城皆遍，枪炮历两昼夜不息”<sup>①</sup>。捻军军威之盛，由此可见。清廷急命湖南提督武隆额由山东赴亳州镇压，年底被捻军打败。

捻军虽然初步统一，但是依然是严重分散、事权不一，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没有一定的军饷供给制度，这仍是捻军起义的极大障碍。一八五六年冬，各部捻头为改变这种局面，接受太平天国领导，进一步和太平军联合。一八五七年初，捻军为配合太平军发起的桐城战役，几乎全部主力齐向豫皖边界的三河尖、正阳关、霍丘、六安一带集结。三月，与太平军在霍丘、六安边界会师后，一举攻克正阳、霍丘，取得了两军联合作战的巨大胜利。从此以后，各路捻军驰骋于江淮之间、大河上下，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势力，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革命。

### 三、云贵各族人民起义

大西南山区是各兄弟民族聚居的地方。在清朝统治下，各族劳动人民备受清朝官吏和汉族地主以及本民族的反动统治者的奴役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一些官吏、地主和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为其私利还经常挑起民族纠纷，遂使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常发生械斗和仇杀。因此，这里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太平天国奠都南京后，各族人民纷纷举起反清斗争的义旗，积极响应太平天国革命。各族劳动人民联合战斗，

---

<sup>①</sup> 尹耕云等：《豫军纪略》卷6，《捻军》第2册，第296页。

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战争。

一八五四年九月，汉族斋教（白莲教支派）首领杨隆喜自称奉太平天国之命，在贵州桐梓聚众起义，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十月初，杨隆喜自称“江汉皇帝”，建立政权，颁布“减免钱粮”的诏令，改桐梓为兴州。起义军坚持八个多月而失败了。

一八五五年四月，贵州台拱苗民在张秀眉、高禾率领下起义，攻占台拱，各地苗民纷起响应。起义队伍攻取城池，迅速增至数万人，控制贵州东南部大片地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与此同时，在贵州东北部地区有“号军”起义，是汉族人民在白莲教支派灯花教领导下发动的。起义军因以服饰、旗帜分为红号、黄号、白号等军，故称号军。其中有不少苗民参加。苗汉人民团结战斗，狠狠打击共同的敌人。

一八五五年，云南各地回民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纷纷发动起义。第二年，逐渐汇合成两支。一支占据云南的南部和东部，但因上层领导成分严重不纯，这支起义军于一八五八年被他们出卖而失败。一支占据以大理为中心的云南西部地区。这支起义队伍“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实行“田赋征粮米，除丁银”，“诉讼速审判，禁羈押”的措施，“民多便之”<sup>①</sup>。他们提出“汉众回寡，尤须重用汉人”<sup>②</sup>的方针，吸引了当地广大汉族人民参加起义。另外，彝族、傣族等族人民也纷纷加入，使这支起义军的力量迅速壮大。起义军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汉人。各族人民密切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清朝统治者。这说明，“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

<sup>①②</sup> 《大理县志稿》卷8，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回民起义》第1册，第29页。

阶级斗争问题”<sup>①</sup>。

一八五六年五月，云南哀牢山区彝族雇农李文学（又名李正学），在太平军战士王泰阶（汉族）和李学东（彝族）的协助下，率领汉彝等各族农民五千人，在弥渡县瓦卢村天生营誓师起义。起义军共推李文学为彝家兵马大元帅，在蜜滴村设“彝家兵马大元帅府”，建立了革命政权。各族人民纷纷响应，“咸操刀持矛来归附”，起义队伍迅速增至万余人。李文学在起义的当天就立即发布檄文，揭露满、汉地主狼狈为奸、欺压人民的罪恶。檄文指出：“自满贼入主，汉庄主（地主）与之狼狈为奸，苛虐我夷汉庶民，食不就口，衣不蔽体；白发爹娘，呻吟于床，幼弱子女，扶门饥啼。”并鲜明地提出“铲尽满清赃官，杀绝汉家庄主”<sup>②</sup>的口号，广泛团结各族人民共同革命，狠狠打击“汉庄主与皇清”等反动统治者。此后十多年间，起义军逐步控制了总面积达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

起义军采取耕战相结合的措施，把十八至四十岁之间的男女组织起来，“练以战阵，战则集之，不战则耕；男任战，女任运，男女各有职”，筑起了革命群众的铁壁铜墙。李文学领导起义军极力维护各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推行“庶民原耕庄主之地，悉归庶民所有，不纳租，薄赋二禩（成），荒不纳”的土地政策，反对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度，并把“帅府督府近郊之庄主田亩，悉收为军耕；庶民原耕庄主之地，悉归庶民所有”<sup>③</sup>，以满足各族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以李文学为首的革命者在斗争中始终坚

①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

② 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2期，第24、23、24页。

③ 同上书，第28页。

持团结各族人民反对共同的阶级敌人满、汉地主阶级的革命路线，并对以刘柄贤为代表的分裂复辟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刘柄贤出身破落地主家庭，是一个尊崇孔孟之道的反动儒生。他投机革命，窃据了副参军的要职。他多次鼓动李文学“正位哀牢王”，建立“哀牢国”，妄图使起义军蜕变为封建割据势力，分裂当时高涨的全国农民革命运动。革命将士奋起迎击分裂复辟逆流，指斥刘柄贤是“奸贼”，是“谄庄主、离间夷回之徒”<sup>①</sup>。李学东尖锐地指出：“呸！倘吾帅为王，草寇王耳，从之者二、三；吾帅为帅，为民除暴谋利，则无论汉、回、‘夷’之民，莫不争附之。为王为帅，幸吾帅慎择之。”<sup>②</sup>李文学积极支持正确的意见，两次“罢称王之议”，挫败了刘柄贤的阴谋诡计。但是，以李文学为首的革命者，没有能够把刘柄贤这个阴谋家及时地清除出去，留下了隐患。当清军重兵进攻帅府所在地蜜滴村的危急关头，刘柄贤勾通清军，里应外合，加速了起义军的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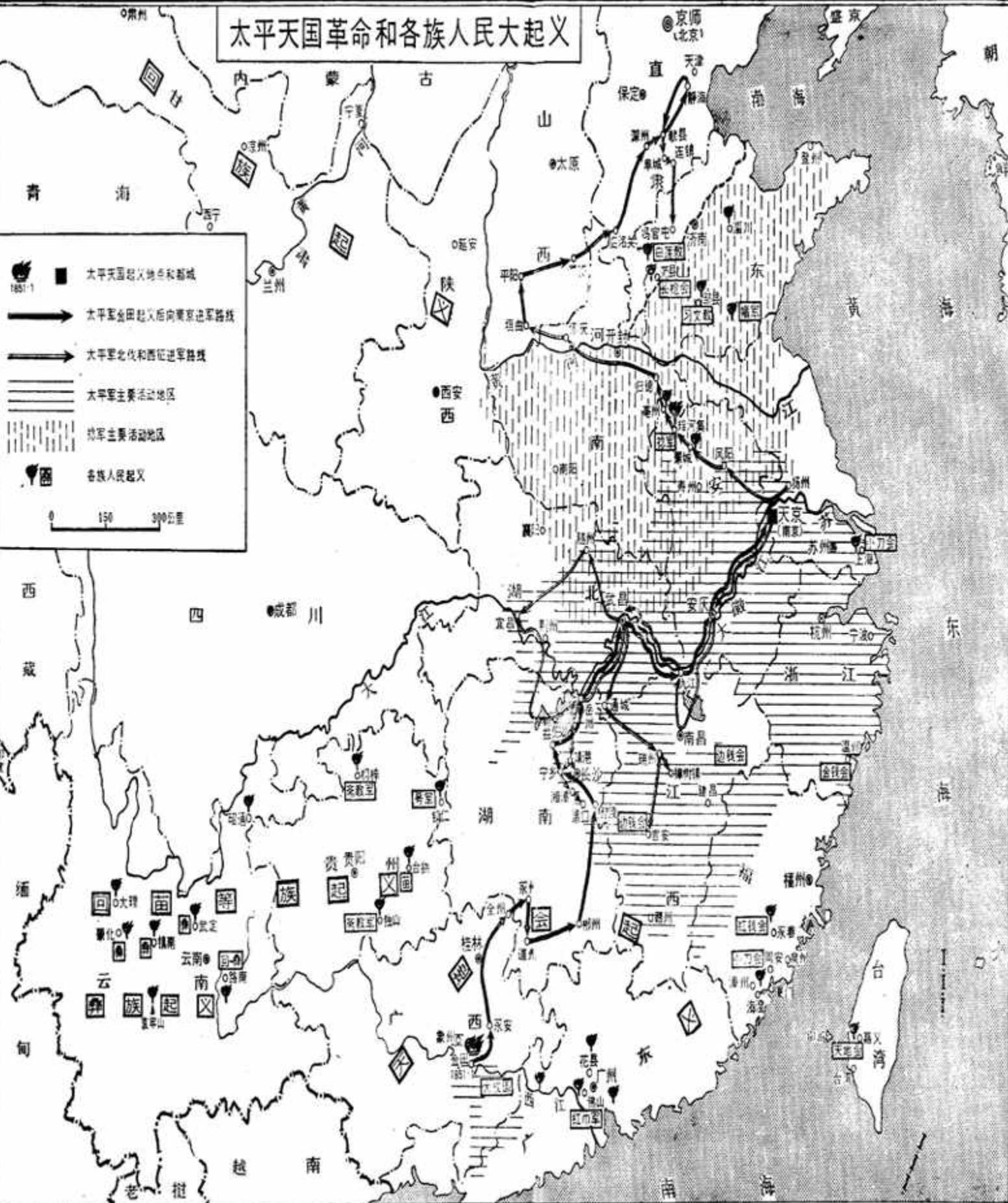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巨大胜利，有力地推动和鼓舞了各地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以及西南山区的人民起义，也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革命战争。这些此起彼伏的起义，有的与太平军直接联合战斗，有的遥相呼应，互为犄角，形成了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高潮。

---

① 王袁：《爱乐山城夷变纪略》。

② 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2期，第26—27页。

# 太平天国革命和各族人民大起义





## 第四节 内政外交与反孔斗争的高峰

### 一、革命政权的建设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sup>①</sup>太平天国同其它革命一样，时刻不曾忘却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而斗争。早在金田起义时期，太平天国就已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的雏形，中经永安建制，使其初具国家政权的规模。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正式建立了规模较为完备的国家政权。这一新生的农民革命政权，是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农民阶级反抗清朝封建统治、镇压封建地主阶级和抵抗外来侵略的暴力工具。因此，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引起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的极度仇视和拚死反对。清朝统治阶级以百倍的疯狂对它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以卑鄙的阴谋手段打进革命队伍内部，大搞颠覆破坏活动。这就迫使太平天国英雄们不得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大力加强其革命政权的职能，特别是加强它的军事职能，使之成为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毛主席指出：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sup>②</sup>太平天国领导者，在革命实践中十分注意壮大革命军队。早在金田起义时，就把群众武装起来，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太平军。这支革命的武装，是农民阶级

<sup>①</sup>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sup>②</sup>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12页。

反抗清朝封建统治者及其靠山外国侵略者的有力工具，是广大农民利益的保护者和代表者，是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这支强大的农民革命的武装力量，在太平天国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太平军是由“终岁勤劳，未尝温饱”<sup>①</sup>的贫苦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组成的革命队伍。它具有顽强的反对封建压迫的革命精神，具有明确的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和建立“地上天国”的革命目标。

太平军军制严密、组织完善。其编制以军为单位。最下一级为伍，设伍长一人，领兵四人；五伍为两，设两司马一人；四两为卒，设卒长一人；五卒为旅，设旅帅一人；五旅为师，设师帅一人；五师为军，设军帅一人。每军官兵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军帅之上设监军、总制。征战时再委派高级官员统领全军，“由本及末，一气通连，颇得身使指应之效”<sup>②</sup>，使这支革命的队伍具有顽强的战斗力。就连太平军的顽敌曾国藩、张德坚之流也不能不承认太平军的军制“有法则”，军目“具有条理”<sup>③</sup>，“其大小相制，视众如寡，臂使指应，颇能联络一气，分合咸宜”<sup>④</sup>，是一支“坚不可拔”<sup>⑤</sup>的军队。

太平天国领导者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深深懂得，没有革命的纪律、没有革命的团结，军队就没有战斗力，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始终把严明军纪、加强团结作为太平军建设的极为重要的课题。从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金田起义时颁布的《五条纪律》，到永安时期刊刻颁布的《天命诏旨书》、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1，《太平天国》第3册，第294页。

②③④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4，《太平天国》第3册，第117、108页。

⑤ 曾国藩：《复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4。

《天条书》、《太平条规》，以及在南京颁行的《行军总要》等革命文件，无一不是以加强革命纪律、加强革命团结为宗旨的。太平军的纪律规条简明、周详，便于革命军民记诵和执行。其主要内容是服从命令，齐心合力，团结爱民，一切缴获归圣库，严禁奸淫烧杀，不得临阵退缩，等等。天王洪秀全十分重视对太平军全体官兵进行纪律教育。每当新的战斗开始之前，总是申明纪律，强调团结，特别把加强团结作为革命纪律的一个主要内容。他在金田、莫村、永安等地就曾多次下诏严明军纪，加强团结。每当革命斗争的转折关头，天王就抓紧时机整顿纪律。例如在茶地、永安和道州等地无不如此。铁的纪律使太平军成为一支号令如一，“齐一心志，誓以死斗”<sup>①</sup>的战斗集体，使广大官兵成为“身临矢石而不惴，膏涂草野而无悔”<sup>②</sup>的钢铁英雄。

纪律严明是太平军取得人民群众拥护的前提。在太平军的纪律中，爱护人民，保护群众利益占着极为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在《行营规矩》中，规定得更为详尽具体。例如，行军时不许“入乡造饭取食，毁坏民房”，甚至连不许捉卖茶水等小贩为挑夫，也作了明文规定<sup>③</sup>。太平军在进军途中，“不但不虏乡民”，还把“衣物散给贫者”，并且宣布“将来概免租赋三年，乡民德之”<sup>④</sup>。太平军所到之处，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则“争迎之”<sup>⑤</sup>，他们同太平军的关系“如水乳交融”，太平军对他们则“视同旧识，心投意洽，日益亲厚”<sup>⑥</sup>。因此，太平军的严明纪律，为世人所称道，深受人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太平天国》第3册，第158页。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3，《太平天国》第3册，第108页。

③ 《太平条规》，《太平天国》第1册，第156页。

④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太平天国》第3册，第271页。

⑤ 同上书，第272页。

⑥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1，《太平天国》第3册，第294页。

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这是太平军从金田起义以来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

进行政治教育和加强严格的军事训练，是太平军建设的另一极为重要的内容。太平天国十分重视政治教育。每有军事行动、下达任务、处罚罪犯等等，必向下级讲清理由和目的，称作“讲道理”。在太平军中，这种活动十分普遍，是向将士进行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的主要方式。太平天国在一八五五年颁布的《行军总要》中，把“纪律严明”和“练习娴熟”并列为建军的根本，视为“能万战万胜而无敌于天下”②的法宝。《天情道理书》中要求太平军将领“天晴则操练兵士，下雨则习读天书。”③这样既培养了战士奋勇杀敌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又训练了娴熟的军事技术。太平军由军帅负责“操练士卒，条分队伍，屯营结垒，接阵进师”④。他们利用行军战阵之隙“鼓角喧阗”，进行各种操练。其军事训练的内容多种多样，如“以大旗数面各领一队，牵线疾趋”⑤，或由广西老兄弟“领两队作对面环抱交叉势”⑥的肉搏练习，或习传各种阵法和枪炮火器的使用，以及要求军中将士谙练各种营规号令等等。因此，太平军是一支训练有素，“打仗亦有熟习之技”的军队。特别是“抛火球放喷筒人人优为之”⑦，技术甚为精湛。至于“渡不测之渊，登壁立之山”⑧，更使敌人望尘莫及。然而，太平天国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训练和培养全军将士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478页。

② 《行军总要》，《太平天国》第2册，第415页。

③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383页。

④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3，《太平天国》第3册，第108页。

⑤⑥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太平天国》第3册，第159、158页。

⑦⑧ 同上书，第159页。

的“敢死”和“耐苦”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太平军英勇战斗，“无不以一当十”<sup>①</sup>，“莫不奋勇争先”<sup>②</sup>。这使曾国藩、张德坚之流无可奈何地发出：太平军“以敢死为技，以能耐劳苦忍饥渴为技”<sup>③</sup>，“我军往往不敌”<sup>④</sup>的哀鸣。

认真奖励战功，严格诠选、考课，是太平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军中将士，凡立有攻城夺地、杀敌破围、扩充军队、征集粮米、探实敌情之功者，“皆与优奖、循次升擢”<sup>⑤</sup>。太平军严格执行“责功保职”的诠选措施。即使是一般圣兵，只要军功显赫，也要破格委任。对各级军官的诠选、考课，主要也是以有无军功、“贤迹”为标准。不分官兵，不论尊卑、亲疏，一概是有功者受奖、受保举，失职者受惩、受降贬。例如，天王的妻舅赖汉英，因在西征中败绩受到革职处分。由于严格的诠选和考课，使太平军所任用的各级军官大都是善于“审势度力”<sup>⑥</sup>、“分数能明，得驭众之道”<sup>⑦</sup>的通达干练之才。

太平军中还有一支为数不少的“童子兵”。他们大都是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儿童，一般并不单独成军，而是分属于各军各馆之中。这些英勇果敢的童子军，往往冲锋陷阵“皆不畏死，无不以号叫跳跃为乐者。且手足轻便，往往登高陟险如履平地”<sup>⑧</sup>。他们在战争中建立了特殊的功绩。太平天国非常重视对少年儿童进行严格的政治思想教育，组织他们学习《幼学诗》、新《三字经》、《御制千字诏》等革命书籍，使他们自幼就养成坚决反孔、勇敢革命的大无畏的造反精神。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虽死

<sup>①②③④⑥</sup>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太平天国》第3册，第157、158、159、158、155页。

<sup>⑤⑦</sup>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3，《太平天国》第3册，第100、108页。

<sup>⑧</sup>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1，《太平天国》第3册，第307页。

不悔，临阵勇往直前，似无一以当十”<sup>①</sup>。这支童子军也是反孔斗争的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其焚烧庙宇，毁坏神像诸事，童子最乐为”<sup>②</sup>。他们在维护革命纪律、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斗争中也非常坚决认真。例如：“搜查洋烟、黄烟及逻查犯天条、犯令各事，童子最认真不遗余力。”<sup>③</sup>童子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阶级敌人胆颤心惊，惊呼：“惟此童子，亦心腹之大患，可不深计熟虑之乎！”<sup>④</sup>青年英雄陈玉成就是从童子军中锻炼、成长起来的。

列宁指出：“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是为了起义取得胜利和巩固起义果实的两个同样必要的机构。”<sup>⑤</sup>可见，革命政权的建设主要是加强军队和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能。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建设也是这样。它不仅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还组成了自己的政权机构，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这个革命政权的初期组织形式是：天王为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下设王、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十三级。其中王、侯是爵位，丞相以下为官职。爵位和官职不分文武，既办理政务，也统兵打仗，具有鲜明的军政合一的形式和特点。

太平天国的行政机构分为中央、省、郡、县。省、郡、县三级为地方政权。省级政权由中央直接派遣丞相、检点等职官员担任。郡设总制，县设监军。总制和监军由中央政权委任。县以下为基层，按《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仿行太平军的组织体系把农户编制起来，建立地方基层政权，设立军帅、师帅、旅帅、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1，《太平天国》第3册，第30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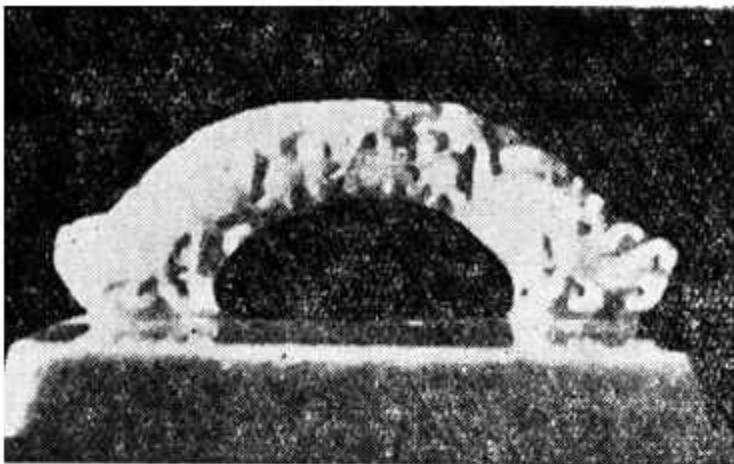
②③④ 同上书，第308、309页。

⑤ 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8卷，第533页。

卒长、两司马、伍长等官，均由人民推举本乡人充任，称“乡官”。丞相至将军四级称“朝内官”，总制、监军为郡县行政首脑，称“守土官”。

乡官制度的建立，是太平天国政权建设中的创举。虽然乡官的组织形式和官职名称来源于《周礼》，但它与旨在维护奴隶制度的《周礼》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张德坚之流咬牙切齿地咒骂说，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度只是“剽窃”《周礼》的“虚名”<sup>①</sup>而

已。建都天京后，在太平军所占领的州县和农村中，大都建立了乡官政权。一大批在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劳动人民的优秀分子，直接参加了政权，充任各级乡官，从而使太平天国国家政权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更坚实的阶级基础。



天王玉玺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3，《太平天国》第3册，第109页。

乡官的主要职责是筹措粮饷和各种军需物资，征调力役，清查户口，受理诉讼，维护地方治安等等。在太平军的监督下，乡官政权具有较高的行政效率。它在支援革命战争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凡军中所需的钱粮、船只和各种物资，“皆悉取给于乡官”，而且往往是公文一到，“咄嗟立办”<sup>①</sup>。

但是，在某些地区的乡官政权中，混进了一些形形色色的地主分子和反动的封建文人。其中有些人窃据了军帅、师帅等重要职位。这些人在革命政权的旗号下倒行逆施，有的暗通清军，有的公然“买田置宅，荣及子孙，一时有军公子，师公子，旅公子之目矣”<sup>②</sup>。有的伺机进行谋杀和颠覆破坏活动。例如，江西彭泽县有个名叫曹炯的廪生钻进乡官政权后，企图谋杀该县监军，并暗中勾结清军，“约为内应”<sup>③</sup>，但被太平军及时破获了。这些混进乡官中的地主分子，对革命政权的破坏和腐蚀作用是很大的。列宁说过：“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广泛的翻天覆地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带些脏东西，都不免会有些冒险家和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混杂在还不老练的革新者中间”<sup>④</sup>，在太平天国革命队伍中也带进了脏东西，混进了形形色色的坏人，形成一批隐藏在革命内部的凶恶蛀虫。那些混进乡官政权的地主分子正是这样。但是，太平军对这些人的监督、惩治也很严厉。“少不如意，则执乡官杀之”<sup>⑤</sup>。可见，在乡官政权中，一直存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太平天国》第3册，第275页。

② 张宿煌：《郡邑拾遗附编之三》，《备忘纪年》。

③ 同治：《彭泽县志》卷7，《团结》。

④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14—515页。

⑤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太平天国》第3册，第273页。

太平天国以革命的暴力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农民政权，摧毁了反动腐朽的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实现了农民阶级对封建地主的专政。这个政权的施政方针是：“为政之道，不用孔孟，不用鬼神，不用道学”<sup>①</sup>，与孔孟之道作了无情的决裂。

面对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进行军事“围剿”，而且从内部加紧策划颠覆破坏活动。定都天京不久，潜入城中的阶级敌人就散布谣言惑众，胡说什么向荣所部清军不久即可“破城”，又说“有番兵数千，青面獠牙”<sup>②</sup>，专食太平军等等，企图以此扰乱军心。北伐军出发不久，暗藏在天京的一些阶级敌人“潜相勾结，署名歃血”<sup>③</sup>，并约期发动反革命叛乱。结果阴谋败露，被太平天国革命政权镇压下去。一八五三年，潜伏在天京的江宁监生、大奸商吴伟堂，伪装积极，窃取了机匠营总制的重要职位，并以机匠营和柴薪衙为据点，窝藏了大批士绅、富人等反革命分子。他利用其“出入各城无阻格”<sup>④</sup>之便，进行策反串联。他先后五次给清军江南大营递送情报，策划颠覆革命政权的阴谋活动。与此同时，一个孔孟之徒、江宁廪生张继庚，潜入韦昌辉的典舆衙，聚伙密谋策反。他散布流言，挑拨太平军中的广西人同湖南人的关系；挑拨水营与东王府官兵的不和，并煽动湖南人自行“结盟”，投降清军。他同吴伟堂相勾结，使两支反革命势力合流起来。他们合谋发展反革命组织，收买动摇、变质分子，组成为数五千余人的反革命集团、有的身居丞相、检点、将军、总制、军帅等职位的人以及东王府的牌刀手等也被拉进了这个反革命集团。他先后七次写信给江南大营的反动头子向荣，递送有关太平军的军事设施、兵力配备、人员

① 汪士铎：《乙丙日记》。

②③④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99、700页。

调动、圣库银粮库存情况，以及入城路线等情报。他还潜出天京，亲自同向荣密谋“外攻内应”的叛乱计划。一八五四年三月，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胜利地破获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张贼伏诛，吴伟堂等仓惶出逃。可见，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是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在革命的实践中，还及时地颁布了农民革命的纲领，制订和推行了一系列的革命制度、政策和措施，充分发挥了农民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 二、天朝田亩制度

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以后，为了巩固农民革命政权，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颁布了农民革命的伟大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农民耕种；第二，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机构，管理社会生产、生活及产品分配；第三，有关司法、行政、教育、礼俗及官员的诠选考课等方面的政治和规定。它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全面地规划出了改革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方案和政策，是个试图进行全面社会改革的宏伟的战斗纲领。这个纲领本着“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sup>①</sup>的精神，主张废除私有制度，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sup>②</sup>的人人平均、个个平等的美好理想。

---

①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第322页。

② 同上书，第321页。

《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sup>①</sup>的原则，把全国土地平均分配给每个人耕种，但所有权仍归天国公有。平分土地的具体办法是，按产量将天下的土地划分为九等。第一等（即上上田）每亩早晚二季产量为一千二百斤，以下各

等则以一百斤依次递减，至第九等（即下下田）亩产量为四百斤。然后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sup>②</sup>；十六岁以上分全份，十五岁以下减半，杂以九等，好坏搭配。

显然，这些平分土地的原则和具体规定，标志着《天朝田亩制度》断然否定了几千年来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击中了封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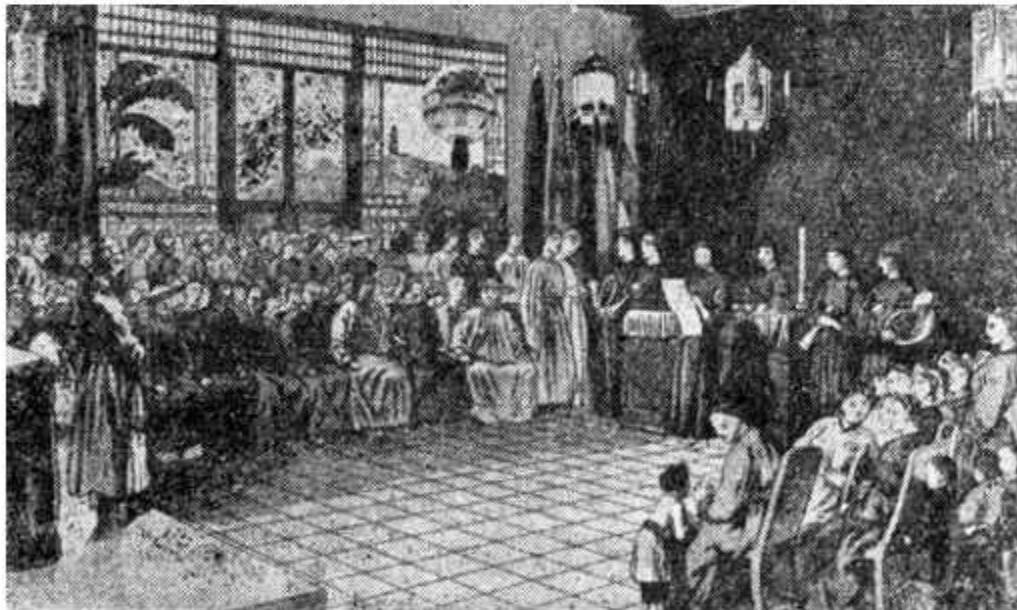


一八五三年刻《天朝田亩制度》封面

①②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第321页。

制度的要害。它鲜明而集中地反映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天朝田亩制度》强调人人“同耕”的含义，无疑正是农民阶级反对剥削，主张人人从事生产劳动，人人自食其力这一革命本色的集中表现。特别是它规定妇女同男子一样分田，这就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妇女与男子在经济上、政治上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标志着太平天国妇女的解放。

《天朝田亩制度》本着寓兵于农的精神，组织社会生活，依照太平军的军事编制把农户编制起来。它规定全军战士平时首领督之为农，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城乡基层每二十五家为一两，作为太平天国的最基本的单位。每两设两司马一人，总管二十五家的生产、分配、行政、司法、教育、礼俗以及军事训



太平天国的礼拜堂（宣讲革命道理）

练等等。每两设国库和礼拜堂各一座，均由两司马掌管其事。每一家农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农民除了耕种土地之外，还要从事植桑养蚕，纺织缝衣和饲养五只母鸡、两口母猪等家庭副业和

手工业。每户农民将每年收获所得的一切农副产品，除留够全家所食可以接新谷外，其余一律缴入国库，不得私人所有。凡有婚丧嫁娶，一律本着节约精神，概由国库开支。凡鳏寡孤独废疾者，均由国库供养。总之，它力求实现“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sup>①</sup>。

《天朝田亩制度》的主要内容并没有超出单纯农民战争的范围，而是把历史上农民战争中提出的“均贫富”，“均田、免粮”等革命口号和思想体系直接继承和发扬起来，形成了更明确、更具有完整体系的农民革命的土地纲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把单纯农民战争发展到了顶峰。然而，农民阶级毕竟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因此，尽管《天朝田亩制度》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制度的性质，但它所描绘的一幅绚丽动人的图案，却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产物。他们不仅主张凡天下田都不加分别的一律收归公有，绝对平均的予以分配，而且对社会产品的分配，也是以绝对平均主义为原则的。这个美好的设想，是以每个农民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永远保持一份平均财产，同时还要最大限度地提供一切剩余产品为前提的。按照他们所设计的这个图案，就是要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使“通天下皆一式”<sup>②</sup>。这实质上是一种以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为主导的空想。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正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sup>③</sup>。事实上，绝对平均主义的平分土地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是《天朝田亩制度》始终没有付诸实行的根本原因。

《天朝田亩制度》平分土地的方案虽然没有实行，但它反

---

①②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第322页。

③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89页。

对封建制度的革命精神却鼓舞着千百万农民群众为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而斗争。在整个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广大农民群众始终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们没收地主、官僚的浮财，焚烧田契、债券，限制地主收租，或收回一些庙宇祠堂占有的土地。例如，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天京附近的农民，有的只向太平天国政府交纳较轻的钱粮，而“不复交田主粮矣”<sup>①</sup>。太平军西征江西时，曾经多征地主的粮米，“分与无田者食，于是有田者多受累”<sup>②</sup>。在太平军的支持下，湖北地区的农民以各种方式同地主作斗争。他们不向地主交租或少交租，因此，地主分子破口大骂：“贫民多挟贼凌富，而田风大坏”，交租时，“箩谷不及二十斤，石谷不满一斗。此种田风，除山业外，阖邑皆然”<sup>③</sup>。另外，据《皖樵纪实》等书记载，太平天国在安徽一些地区，曾把“庵观寺院田产充公”，或将其田租收归革命政权所有，等等。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坚决镇压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许多官绅地主或死或逃，因而出现了不少无主的土地，原来佃耕这些土地的农民便成了土地的实际主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群众的要求，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维护了农民阶级的利益。广大劳动群众欢乐自豪地唱道：

“辛辛苦苦，年年挨过。  
‘长毛’一到，生活好过。  
撑口（即田地）要分，  
单纸（即田契）丢路。

---

① 汪士铎：《乙丙日记》卷2。

② 邹树荣：《蒿青诗草》自注。《太平天国资料》第72页。

③ 邓文滨：《卖脱父亲能抵课》，《醒睡录》卷7。

大家平等，没有富户。”①

“‘长毛’一到，  
叫花子拿元宝，  
穷人着皮袄，  
财主人穿蒲包，  
谁叫‘长毛’不好！”②

《天朝田亩制度》不仅是反对封建的土地制度，也是对孔孟之道有力地打击和批判。

第一，它主张以革命的权威去建立人人平均、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这就从根本上批判和否定了孔孟之道所维护的封建等级制度，批判和否定了孔孟之流所鼓吹的什么“富贵在天”、“世卿世禄”、“恒业、恒产”的反动理论。它主张平分土地，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孔孟之道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第二，它主张奖励农业生产，反对游手好闲。它明确规定“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这对孔老二之流反对生产劳动、鼓吹“耕也，馁在其中矣”的剥削阶级反动思想是个有力的批判。《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民能遵条命及力农者则为贤良，或举或赏。民或违条命及惰农者为恶为顽，或诛或罚”。这就有力地批判和否定了孟轲之流所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观点，并把孔孟之徒任意颠倒了的“贤良”与“恶顽”的道德标准再颠倒过来。

第三，它规定：群众“婚娶吉喜等事”，除了祭告上帝外，其余“一切旧时歪例尽除”。这是对孔孟之道所宣扬的旧礼俗、旧秩

---

①② 《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歌谣选》第110、109页。

序的有力批判和否定。

可见，《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革命的结晶，也是几千年来农民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文献。它不但动摇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打击了封建法权，还荡涤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孟之道。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伟大纲领。

### 三、内政与外交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制订了一系列的革命政策和措施，对私有制度、封建法权和旧传统、旧观念进行了冲击，并在天京进行了各种社会改革。农民政权还在天京“立法安民”，将天京城内男女分别男行、女行，实行男女设馆分居，每馆大约二十五人。十六至五十岁的男子称牌面，居牌面馆；其余称牌尾，居牌尾馆；妇女居女馆。牌面馆的青壮男子，有的参加太平军，有的从事运粮搬物；牌尾馆的老幼从事煮饭打更、放马割草；女馆的妇女则担当开挖壕沟、削制和运送竹签等任务，“侵晨各送八十斤，插地森森密如齿”<sup>①</sup>。在革命政权的组织下，天京男女老幼各得其所，各尽其责，形成了一个统一、灵活的战斗集体。到了一八五五年初，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下令解散女馆，允许男女匹配，从此恢复了家庭生活。

农民政权在天京建立了“天朝圣库”，总管天国公有财产，统筹全城军民生活。天国的一切征收缴获、金银钱粮，以及私人房产货物，商贾资本，统统尽归圣库，不得个人私有。上起天王，下

---

<sup>①</sup>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第4册，第730页。

至一般圣兵，生活供给大体平均，各级官员一概不领俸禄。“天朝圣库”的建立，是早期圣库制度的发展，也是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在天京进行的一次重大的社会改革。它进一步打击了私有制度、等级制度等封建法权。它体现了这场伟大农民革命的空前深入，表现了革命农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精神。

定都天京初期，天京城内曾经一度废止了商业。城内军民的衣食杂用，或由国库供给，或由政府运货批发。从一八五五年开始，由于天京城内居民恢复了家庭生活，因此，曾被禁止的经商贸易事业也就重新恢复了。但在天京城外，或太平天国所管辖的其它地区，则从未实行过禁止商业的政策，而是保护商贾，发给商人凭证，减低商业税率，允许民间自由贸易。一八五四年六月，太平天国政府还颁行自己铸造的银钱、大钱和小钱，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太平天国还建立了“诸匠营”和“百工衙”制度。诸匠营和百工衙，是负责管理百工技艺的生产机构，专门解决军需物资和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供给。这是以国营的形式把各种手工业工人集中起来，按技术工艺的不同分别设立营和衙，从事集体生产。早在金田起义时期，就已在太平军中建立了这两种机构，定都天京后又逐渐发展扩充。诸匠营主要



太平天国商凭

集中在天京，专管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的制造。其编制则依照太平军军制。分为土营、木营、金匠营、镌刻营、金靴营、绣锦营、织营等七种。各营分别由指挥、总制或监军统领，下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和两司马。百工衙设立在天京和各地各军之中，其编制不同于诸匠营，有百人则设置一卒长，分辖四个两司马，二百人则设两卒长，除此之外不设其它官员。它的主要任务是，专管军需物资和日用品的生产，并兼管收发（分配）。百工衙的种类繁多，诸如铜炮衙、铅码衙、典铁衙、宰夫衙、豆腐衙、天茶衙、缝衣衙、铸钱衙、刷书衙等，大约有数十种之多。太平天国创造性地采取诸匠营和百工衙的形式，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废除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并分门别类地组织各种工匠，集中生产资料，统筹生产和产品分配，这就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供给，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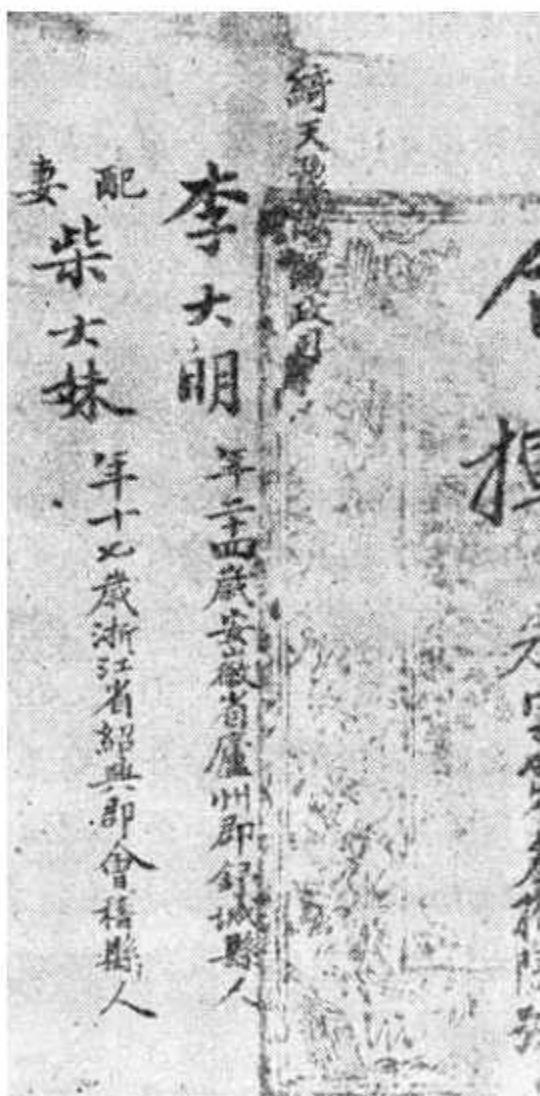
太平天国提倡男女平等，实行了解放妇女的革命政策。它不仅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明确规定妇女同男人一样分田，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平等，而且还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接纳了数以千万计的妇女参加政权和当兵打仗。早在永安时期，太平军已是“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sup>①</sup>。妇女在战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太平军中设有女官和女军。女官有朝内女官和军中女官之分。朝内女官设有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职；军中女官设有总制、监军、军帅、卒长、两司马。总计各种女官共六千五百余人。女军共四十军。每军女兵二千五百人，总计女兵十万人。她们威武矫健，“勇健过于男子，临阵皆持械接仗”<sup>②</sup>。许多有才干的女战士被选拔为女丞相、女军帅、女监

①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68页。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3，《太平天国》第3册，第111页。

军、牌长、百长等各级指挥官。定都天京后，就有一万多名女军担任站岗、巡逻等保卫天京的任务。在天京设立女馆，组织妇女学习工艺，参加生产劳动。太平天国的妇女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参加考试，有的还考中了“女状元”。在婚姻上，《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太平天国禁止娼妓，不准纳妾，提倡“一夫一妇”，提倡自由婚姻，后期还曾颁发过叫做“合挥”的结婚证书。还下令禁止缠足。所有这些规定和政策，都标志着妇女的解放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这就批判和否定了孔孟之道所鼓吹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反动纲常名教，撞击了封建“夫权”这条束缚妇女的沉重锁链。

在对外关系方面，太平天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除了担负起反封建的任务之外，还担负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新的历史使命。因此，究竟怎样对待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是这场伟大农民革命遇到的一个新课题。早在这场革命爆发之前，洪秀全就曾明确地提出：世界各国之间应当“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友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



太平天国颁发的结婚证书

接”<sup>①</sup>。这说明，尽管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使太平天国领导者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还缺乏深刻的、本质的认识，但他们主张国与国之间友好相处、反对殖民侵略和民族压迫，并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互通有无等革命原则却是十分鲜明的。太平天国依据这些原则，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独立自主、反对侵略的革命政策，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八五二年一月，当太平军还在永安的时候，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看到有机可乘，就向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建议，要乘中国革命爆发之机把兵舰开入长江，强占镇江，封锁运河，以便向清政府索取更多的侵略权益。一八五三年初，太平军从武汉顺流东下的时候，极大地震动了中外反动势力。这时阿礼国再次致函文翰，建议要“把（清朝）皇帝从迫在眉睫的瓦解情势中援救出来，从而大大地扩张自己活动领域”<sup>②</sup>。清朝江苏地方官绅惊慌失措，江苏巡抚杨文定竟无耻地向外国侵略者请求援助。阿礼国接到“请援”的照会，立即又向文翰建议由英国或是单独行动，或者联合美、法两国舰队进行武力干涉，以便“趁皇帝还据有能够缔结条约的地位时，向他们取得这种干涉的报酬”<sup>③</sup>。于是，文翰立即下令调集在中国沿海的英国军舰集中于上海，准备以武力镇压太平军。但是，由于太平军迅速占领南京所显示的革命威力和清朝统治在长江流域的土崩瓦解，迫使外国侵略者暂时停止武装干涉，而扯起所谓“中立”的破旗。毛主席指出：

“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sup>④</sup>外国侵略者虚伪

<sup>①</sup>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4页。

<sup>②③</sup> 转引自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新建设》一九五二年第9期。

<sup>④</sup>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1081页。

地宣布“中立”，其目的正是为了观望形势，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一八五三年四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刚刚一个多月，文翰就从上海乘军舰到天京窥探虚实，他把《南京条约》的中文本交给太平天国，企图诱胁太平天国承认他们从清政府得到的侵略特权，并且蛮横地恫吓说：“如贵军或其他人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对于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亦必采取与十年前抵抗各种侵害之同样手段，施以抵抗；彼时曾将镇江、南京及其附近各城占据，并签订和约。”<sup>①</sup>意思是说，如果太平天国拒绝他们的无理要求，他们就象发动鸦片战争一样用炮舰强迫太平天国接受不平等条约。这就充分暴露了英国侵略者的凶恶嘴脸！因此，太平天国领导者断然拒绝了这伙强盗的政治讹诈，并且严词警告外国侵略者不要帮助清朝，如果帮助清朝，真是大错，即令助之，那也是枉费心机的。当文翰离开天京途经镇江时，太平天国守将罗大纲又向文翰一伙严厉斥责了英国人贩卖鸦片的罪行。同年十二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一八五四年五月美国公使麦莲，也相继到天京进行窥探，但他们同英国侵略者的下场完全一样，胁迫太平天国承认不平等条约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太平天国领导人还明确地告诉麦莲：太平天国不但同意和美国一国通商，“至万国亦许往来通商。但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凡欲来天国通商者，准到镇江焦山下听守镇江大员办理”<sup>②</sup>。这就清楚地表明，太平天国赞成同世界各国友好通商，

<sup>①</sup> 《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第6册，第910页。

<sup>②</sup> 《一八五四年六月太平天国东王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文史》第一辑（一九六二年）。

但外国人通商必须遵守太平天国的法纪，必须到指定的地点，而根本不能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更不容许侵犯中国的任何主权。麦莲到天京和芜湖窥探之后，清楚地看出太平天国庄严地执行着捍卫中华民族利益的外交政策，因而在向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断言：“天王兄弟及其臣下，当他们成为这个中华帝国的主人后”，决不可能“承认满清政府与英美法三国已签订的条约义务。”因此，他虽然在天京表示“严守中立”，可是一回到上海就恶毒地诽谤太平天国来源于“内地的强盗群”。他还凶相毕露地鼓吹美、英、法三国联合进行武装干涉。一八五四年六月，英国新任香港总督兼驻华代表包令等再度到天京进行所谓“访问”时，向太平天国提出一系列的挑衅性的问题。太平天国领导者以“诰谕”的形式批复其三十一条，再次庄严地申明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万国皆通商”、“害人之物（鸦片）为禁”、“通商者要凛遵天令”、“凡事秉乎至公，视天下一家”<sup>①</sup>，等等。很显然，太平天国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平等互利、严禁贩卖鸦片和反对侵略的外交政策，而根本不承认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这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顽强的反抗精神。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太平天国领导者还不能充分认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本质，甚至把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外国侵略者视为同是信奉“上帝”、“耶稣”的洋兄弟，因而对他们缺乏足够的警惕。

---

<sup>①</sup> 《一八五四年六月太平天国东王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文史》第一辑（一九六二年）。

## 四、农民阶级反孔斗争的高峰—— 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太平天国奠都天京后，农民革命政权向孔孟之道发起了更猛烈、更全面的进攻。他们疾呼猛进，迅速地把反孔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使奴役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孔孟之道，陷入人民反孔怒涛的汪洋大海之中，形成农民阶级反孔斗争的前所未有的高峰。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把儒家经书宣布为妖书，严禁军民习诵和收藏。它明令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sup>①</sup>一八五五年，太平天国地官副丞相黄再兴申明：“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sup>②</sup>太平天国焚禁孔孟妖书的规模很大，行动坚决。据统治阶级一些记载说：那时的情况是，“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所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sup>③</sup>。这些话虽然充满了敌意和诬蔑，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太平军确实采取了严禁儒家经典的坚决措施。太平天国雷厉风行地推行这项政策的结果，使它的统辖区内出现了一个“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sup>④</sup>的大规模反孔斗争的群众运动。

太平军不论是在江南地区作战，还是在北伐、西征过程中，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8，《太平天国》第3册，第232页。

② 《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第1册，第313页。

③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第4册，第735页。

④ 《山曲寄人题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386页。

都广泛地开展了捣毁庙宇、偶像，查禁孔孟妖书等大规模的反孔斗争。大军所克复之州县，“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或堆军火，或为马厩”<sup>①</sup>。在江宁，把江宁学宫“改为宰夫衙，以壁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sup>②</sup>；在湖北，捣毁德安府学，砸掉孔丘偶像；在山东临清，焚孔庙、砸偶像，结果“各庙神像皆毁，文庙大成殿焚，圣像及两庑木主无存者，……各庙神像或剜目斫手足及首，无一全者”<sup>③</sup>。在江西，“春联门神皆揭去，科甲旗匾一扫平。”<sup>④</sup>在天津的杨柳青，纵火焚毁文昌阁。可见，太平军足迹所到之处，大都掀起了讨孔斗争的怒涛。这就进一步打击了封建统治的象征，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堡垒。在太平天国广大军民中，流传着嘲弄“孔子为不通秀才”，“每考四等”的讽刺笑话，说明孔老二的威风扫地以尽。

在太平天国这样声势浩大的反孔洪流面前，封建统治阶级一片惊呼。他们狂叫什么：“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sup>⑤</sup>

由此可见，批判孔孟之道确实刺到了封建势力的痛处，于是他们象疯狗似地向太平天国的反孔运动拚死反扑。早在一八五三年，正当太平天国革命迅猛发展之际，奕詝这个反动势力的总头子曾多次“诣文庙行释奠礼，亲临辟雍讲学”<sup>⑥</sup>。他还亲自召集百官讲解四书的某些章句，妄图稳住早已崩溃了的孔孟之道的阵脚。极力维护封建礼教的铁杆死硬派、大刽子手曾国藩也急忙跳出来同太平天国较量。一八五四年二月，他在出动反革命

①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2，《太平天国》第3册，第326—327页。

③ 马振文：《粤匪陷临清纪略》，《太平天国》第5册，第182页。

④ 邹树荣：《豫章新乐府八首》，《教匪来》，《太平天国资料》第73页。

⑤ 曾国藩：《讨粤匪檄》，《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2，第46页。

⑥ 《清咸丰实录》，卷84。

湘军以武力对抗太平军的同时，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反革命黑文——《讨粤匪檄》。黑文宣称：“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把毁弃孔孟妖书使“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作为太平天国的头等“罪状”；他扬言要把“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根本”，意即要把孔孟之道作为维系反革命军队的灵魂。他还不遗余力地煽动“凡读书识字者”要死抱住孔丘的亡灵及其名教不放，同太平天国的讨孔运动顽抗到底。那些大大小小的卫道者，统统集结在奕詝、曾国藩的周围，把孔孟之道作为镇压革命、维护封建统治的救命稻草。他们把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同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进步措施一并诋毁和攻击，即所谓“秦灰之暴，清流之祸，乃复见于斯时”<sup>①</sup>。地主分子还编造黑诗肆意咒骂什么：“卜筮之书并泯灭，窃恐祖龙（即秦始皇）笑其后。”<sup>②</sup>由此可见，“尊孔”与“骂秦”历来是一切反动势力诋毁革命、欺骗人民的两面大黑旗！他们还恶毒咒骂太平天国“灭古荒今，背弃伦常……故于干支、六书、时宪、语言、服饰，无任意捏造”<sup>③</sup>，诬蔑太平天国是“开辟至今逆天悖理第一狂寇”<sup>④</sup>。但是，这些人类渣滓的种种狂吠，只能更加暴露了这群吃人蛇蝎的狰狞面孔。他们的种种拙劣表演，只能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出：在人民革命面前，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一手挥舞杀人的屠刀，一手捧着儒家的经书，嘴里还不停地骂骂咧咧。尽管屠刀和儒经的形式不同，但其目的却是一个，都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维护反动统治。可见，历来的反动派都是把屠刀和儒经之间划一个大等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8，《太平天国》第3册，第242页。

②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第4册，第735页。

③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6，《太平天国》第3册，第163页。

④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9，《太平天国》第3册，第251页。

号。然而，在强大的反孔革命洪流面前，反动派的任何猖狂反扑都是徒劳的。

太平天国在同奕詝、曾国藩之流大肆尊孔的反动逆流的斗争中，把反孔斗争进一步引向了深入。洪秀全在天京成立“删书衙”，决定根据拜上帝会的理想和原则，删改儒家经书，试图把这种反动的封建文化加以无情的批判。特别是对儒家经书中专讲什么“吉礼”和“鬼神丧祭”之类的反动教条，更是毫不客气地统统删除干净。据一个地主分子记载说，在太平天国看来，卷帙浩繁的儒家书籍中，“只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二句，能合父之天意”<sup>①</sup>，其余皆“无可取”<sup>②</sup>。当然，除开他对太平天国革命放肆污蔑之外，从中也反映出太平天国对儒家书籍的删改和批判是坚决而广泛的。

太平天国在删改儒家经书的同时，还大量印发自己的各种文献和自己编撰的各种通俗读物，目的在于宣传革命，教育人民，抵制和清除孔孟之道的影响。在这些刻本中有的是新作，有的是重印。太平天国的一些早期文献中存在的一些儒家经书中的字句，在这次重印时统统删掉了。这说明太平天国反孔斗争进一步深入了。

太平天国发布的一系列的文献、文告，充分阐发革命理论，处处同反动的孔孟之道相对立。并在革命实践中依据这些理论制订各项政策和措施，荡涤孔孟之道的反动影响，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

另外，太平天国还荡涤了封建文化的其他方面。例如，改革封建科举制度，试题严禁用《四书》、《五经》的章句，而必须出自

---

① 汪望：《盾鼻随闻录》卷5，《太平天国》第4册，第391页。

② 鲁叔容：《虎口日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794页。

太平天国刊行的革命书籍，应试的人不分男女性别，也不限出身门第，因而出现了工匠称大人，妇女中状元的动人景象。太平天国还改革了一些文字和语言，革新了服饰和风俗。

太平天国轰轰烈烈的讨孔运动，把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使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当时封建文人记载说，受太平军影响较深的群众，对于孔老二的“伦常义理及绳趋墨步之言行，询之如隔世，视我官吏若甚卑，不及贼目之尊贵，毫无敬畏之意”<sup>①</sup>。这种蔑视孔孟之道，卑视清朝官吏的革命行动，正是农民群众挣脱了封建思想束缚的表现。它对封建神权的批判和扫荡，使广大群众解放了思想，相信“天壤间无复有鬼神”，而以大无畏的革命行动去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它解放妇女的政策和措施，激励着近代中国妇女为反对封建制度，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因此，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促进了人们的觉醒，开创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潮的先河，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

<sup>①</sup>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2，《太平天国》第3册，第327页。

## 第三章

# 反对英法联军侵略和 沙俄鲸吞中国大片领土的斗争

### 第一节 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

#### 一、可耻的“修约”讹诈

正当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席卷长江两岸，清朝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英、美、法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伪装“中立”的幌子下，加紧策划新的侵略阴谋。他们对于鸦片战争以来所夺取的特权和利益早已感到不满足，要求大大增加。而当时的中国，农民和地主这两个敌对的阶级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武装搏斗，形成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和清朝地主政权相对峙的局面。他们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经验和对太平天国的窥探中，认识到要完全支配中国，不断取得侵华的新权益，主要的敌人不是封建地主阶级，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不可侮，而清朝地主政权却是可以驯服的。因此，他们决定利用清政府面临覆亡的危机，使它遵循自己的侵略意图，然后帮助它扑灭农民革命的火焰，建立和维护半殖民地统治秩序。

最初，英、美、法等资本主义侵略者，企图以“修约”的方式实现这些新的侵略要求。所谓“修约”，就是要求修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扩充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侵略内容，夺

取更多的殖民权益。他们为了制造修约的“理由”，故意歪曲《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有关十二年后在贸易条款上稍作变通的规定，要求全面修改条约。《南京条约》并无任何有关修改条约的规定，但英国侵略者却援引最惠国条款进行狡辩，扬言必须修改《南京条约》。于是，英、美、法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一八五四年和一八五六年进行了两次可耻的修约活动。

一八五四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联合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美国驻华公使麦莲，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约要求。英国提出修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废除进出口货物的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美使麦莲提出要在长江及其支流的任何口岸城市及港湾进行贸易，美国人可以进入中国内地任何地区贸易、传教、居住，并取得租赁、建筑的自由。法国公使除提出类似的要求外，还要求释放非法潜入陕西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的法国传教士。显然，他们所要求的修约内容，决不是对某些条款的“稍有变通”，而是要逼签一个比《南京条约》的内容更狠毒、更广泛的不平等条约。

这年四月，英、法、美三国公使带着这些苛刻条件到达广州，向负责办理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叶名琛是一个昏聩顽固的封建官僚，虽然担任两广督抚多年，但对外国情况毫不了解。他对付英、美、法侵略者的唯一法宝便是不予接见。六月，英、美公使先后到达上海，又相继访问了天京。麦莲在昆山向两江总督怡良提出“修约”要求，还对怡良施展利诱和威吓手段，说什么：“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sup>①</sup>，否

---

<sup>①</sup>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8，第20页。

则，便要到天津去交涉。怡良不敢答应修约，要他们回广东商办。奕詝对怡良的措置表示称许，指示叶名琛“设法开导，谕以坚守成约，断不容以十二年变通之说，妄有觊觎”。并谕示“接见夷酋等仪文，仍当恪守旧章，无得以该夷等有相待稍优之请，少涉迁就，以致弛其畏惮之心”<sup>①</sup>。八月，英、美、法三国公使串通一气，再一次联合向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叶名琛仍采故伎，不予接见，反派人通知翻译人员说：“并未奉有谕旨办理变通事宜。”他在给英、美公使复文中则说：“天朝臣下无权，但知谨守成约。其重大事件，必须奏明请旨。”<sup>②</sup>他表示条约没有必要作重大修改，他也没有作这种修改的权力。他给奕詝的上奏中建议，对付外国人的办法只有“惟有相机开导，没法羁縻”<sup>③</sup>。

叶名琛的建议和主张，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中以端华、肃顺为代表的顽固派的心理和要求。这批顽固派在当时仍坚持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那种妄自尊大的虚骄态度。他们梦寐以求的是维持鸦片战争前的闭关自守的局面，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步步侵入非常害怕，尤其误认为外国侵略者在太平天国掀起反清革命后宣布“中立”是“偏袒”太平军，况且又提出如此重大的修约要求，更使他们疑虑甚深，惧怕外来势力深入，对封建统治不利，特别是怕“夷船阑入（长江），致与‘贼匪’勾结”<sup>④</sup>。因此，在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而且处于主导地位的时候，既力求避免得罪外国人，又不肯轻易答应侵略者的过高的要求。他们根本不愿抽出镇压农民革命的反动武装以对付外来侵略势力，更不敢也不可能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去抵御外侮，但又不甘心马上对外投降。他们在外国侵略者威胁利诱面前，一方面幻想用“开导”讲

<sup>①③</sup>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8，第23、4页。

<sup>②④</sup> 同上书，卷9，第2、5页。

理的办法，“说服”侵略者执行已定的条约；一方面又摆出天朝大国的尊严，要侵略者遵守条约，“示以抚绥之恩，折其虚骄之气”<sup>①</sup>。清朝最高统治者奕詝，也正是支持和倚重这批顽固派官僚的。

清朝统治集团中，另一派则是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和江浙许多官僚为代表的妥协派。当时他们在清政府中还不占主要地位，不起决定作用。这些人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较早，和外国侵略势力早有勾搭；而且他们又处于太平军直接打击的前沿，急切需要外国侵略者的保护和支持，因而这批人对外妥协趋向更为突出，赤裸裸地主张屈膝投降。吉尔杭阿长期供职江苏，由臬台升任巡抚，是直接对抗太平军的反动家伙。他和江、浙买办势力勾结较深，和外国人打交道较多，自称是“最能信任外人的”官吏。美国公使就曾当面吹捧他是和伊里布、耆英这些老牌投降派并列齐名的清政府三大人物之一。早在一八五三年下半年，当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后，吉尔杭阿就和美国公使麦莲勾结，严密封锁上海，猖狂镇压起义群众，成为外国侵略者的一条走狗。在这些人看来，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仅不会危害他们的统治，还可借助这种外来势力，扼杀正在蓬勃发展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当英、美、法三国公使又一次在广东碰壁后，九月又回到上海，向吉尔杭阿求助。他们既以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相许，又以补交上年外商近百万两欠税为诱饵，说什么“如蒙恩准，钦派重权大臣两三人前来查办，中外利益，实属不小”，倘仍照旧饬回广东商办，那就只好奏知“国王，待命而行。以后之事，即难预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9，第5页。

定。”<sup>①</sup>他们以这种威胁、利诱双管齐下的手段，使吉尔杭阿就范。

吉尔杭阿不仅完全赞同侵略者的修约要求，还多次在奕詝面前为其辩解，劝皇帝赶快妥协，“许其所请”<sup>②</sup>。吉尔杭阿全盘接受侵略者的要求，这不仅表明他是外国侵略者的代言人，也反映了正在抬头的东南沿海买办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相勾结的要求。但是，他这种赤裸裸的妥协投降主张，被对外国侵略者疑惧甚深的奕詝拒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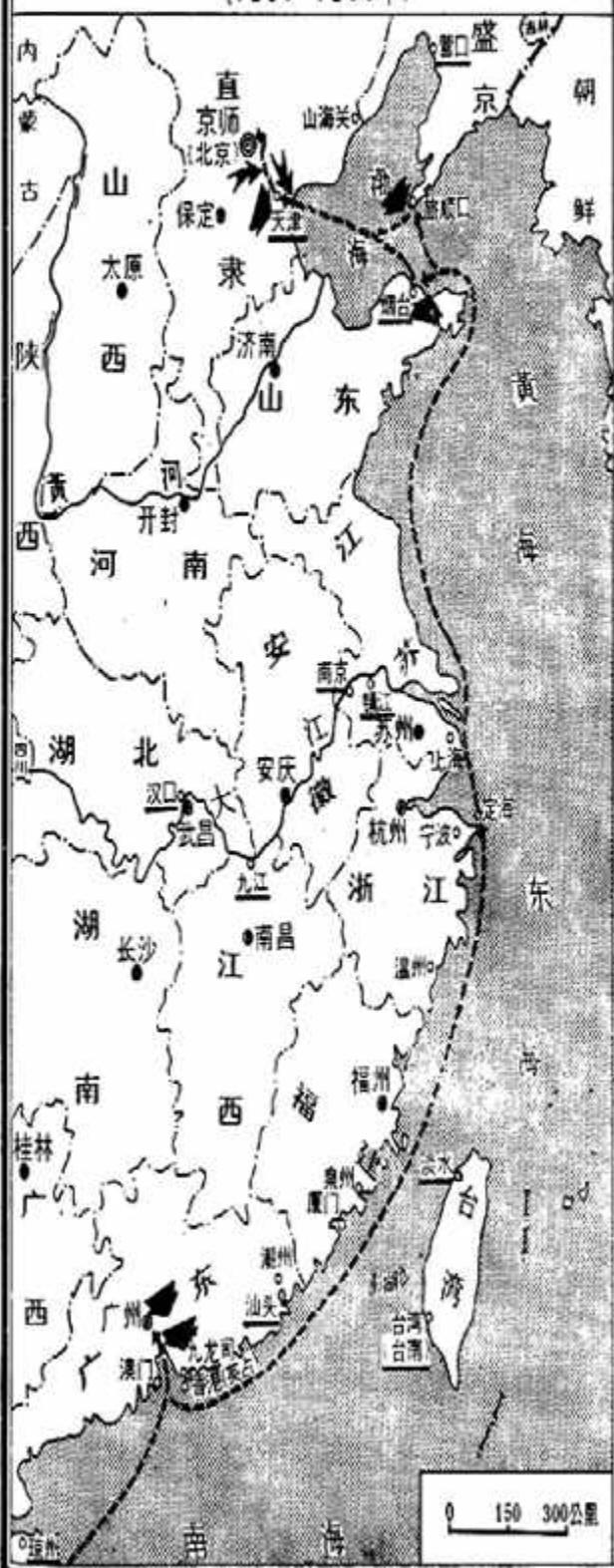
侵略者在上海仍未达到目的。十月，英使包令、美使麦莲率领三百多名侵略军乘兵舰北上大沽口，要求到天津甚至到北京修约。清政府深恐侵略者借机寻衅，不愿在近畿重地谈判，只派级别较低的长芦盐政文谦和前任长芦盐政崇纶听取意见，并要英、美公使仍回广东交涉。英、美却提出了更加广泛、苛刻的修约要求，并以修约不成，即要发动战争相威胁。崇纶等人也乘机劝奕詝妥协，主张答应侵略者的部分要求。奕詝由于急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对外的妥协趋向增强。因此，对英、美提出的修约主要要求作了少许的让步，同意减免外商所欠的上海海关税和广东税捐，允许伸理民夷争执案件。外国侵略者因为没有达到修约的主要目的，于是大肆叫嚷非诉诸武力不可。但是，当时英、法正陷于克里米亚战争之中，美国在华兵力不足，也无力单独发动侵华战争。十一月间，他们只得调棹南返，等待时机，准备战争。

一八五六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届满十二年。于是，美国又带头掀起了第二次修约活动。美国新任驻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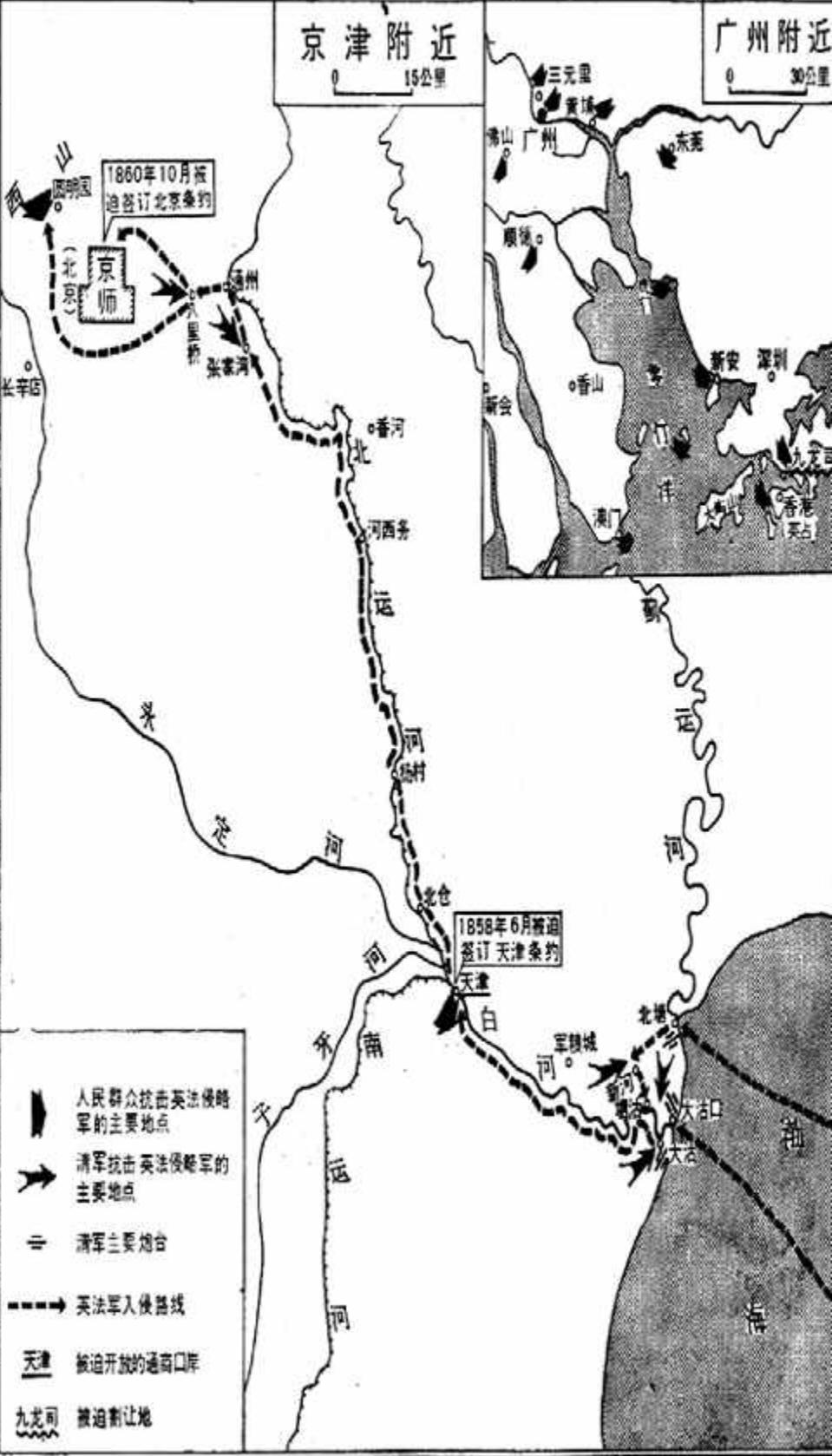
<sup>①②</sup>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9，第3、4页。

# 第二次鸦片战争形势图 (1856-1860年)



## 京津附近

15公里



## 广州附近

30公里





公使伯驾在伦敦、巴黎取得英、法支持后，于五月到达广州，照会叶名琛要求修约。修约要点是：三国公使驻京；中国全境开放，无限扩大贸易；外国人在华传教自由；改造中国司法机关。清政府仍坚持“大段断无更改”的态度，只允许“择其无碍大局者，酌量变通一、二条”<sup>①</sup>。伯驾在广州没有达到目的，七月去上海。当时英、法感到“和平”修约无法达到侵略目的，决定要诉诸武力，因此，只在外交上支持美国的修约活动，两国公使并未随同北上。伯驾在上海活动四个多月仍无结果。十月，英国已在广州借口“亚罗”号船事件，燃起了新的战火。十一月，伯驾赶回香港，参与英、法的侵略活动。

列宁指出：“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sup>②</sup>。外国侵略者的修约活动和战争政策，正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法、美等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急切要求向外侵略扩张，以便寻求新的殖民市场和原料产地。当时，以英国的工业发展最为迅速。它的资本主义工厂已经全盘取代手工工业，号称“世界工场”。它的工商业仍然保持着世界霸权的地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资产阶级满以为可以凭借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侵略特权，在中国大量地推销其工业品，获得巨额的利润。但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的侵袭有着一种抵抗作用，更由于英国对华鸦片走私贸易大量增长直接排挤了其他商品的销售，因而使它的工业品销路不广，对华输出货物的总值增长不大。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就是扩大鸦片贸易；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3，第19页。

② 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第63页。

法贸易不相容的”<sup>①</sup>。但是，贪得无厌的英国资产阶级是不愿放弃任何一种贸易的。它既要扩大鸦片贸易，还要寻觅畅销工业品的途径。在他们看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象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样再次发动侵华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为此，英国侵略者联合法、美侵略者一面进行修约讹诈，一面加紧战争准备。

这时的沙皇俄国，虽然还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农奴制国家，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农奴制危机不断加剧，以农民为主力军的反对农奴制度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兴起。沙皇政府为了摆脱国内困境，转移群众斗争视线，为了给农奴主和贵族不断扩大剥削地盘，为了给资产阶级开辟广阔的国外市场，拼命推行扩张侵略政策，加紧掠夺殖民地，加紧侵略中国。当英、法、美对清政府进行修约讹诈，并准备调集军队进攻中国的时候，沙俄西伯利亚的哥萨克部队也偷偷地开往黑龙江沿岸，在海参崴一带设立军事堡垒。正是基于这种疯狂的侵华野心，沙俄积极支持英、法、美发动新的侵华战争。于是，英、法、美、俄这四个野心勃勃的侵略者，基于共同的侵略利益，暂时结成了联合侵华的阵线，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

## 二、极端不义的战争与《天津条约》

蓄谋扩大侵华的英、法侵略者分别制造了“亚罗”号船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

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广东水师在停泊黄埔港的一只中国

---

<sup>①</sup>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4页。

走私船“亚罗”号上，逮捕了两名中国海盗和十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这只“亚罗”号船，为了走私方便，曾向香港当局领过通航证。但在被捕时，此证早已过期，船上也不再悬挂英国国旗。因此，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上捕人，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可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为了制造战争借口，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声称水师上船捕人有损领事体面；并无中生有的造谣说，广东水师曾扯下了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这是对英国国旗的侮辱，也是对英国的侮辱。他无理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送回水手，赔礼道歉，并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在巴夏礼无端挑衅面前，叶名琛害怕事态扩大，终于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将逮捕的水手送到英国领事馆。叶名琛的妥协行为，大大助长了英国侵略者的反动气焰。巴夏礼故意刁难，借口礼貌不周，拒不接受。十月二十三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领英国军舰突入省河，进犯广州，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昏愦顽固的叶名琛，在英国侵略者武装进攻面前，不仅不作打仗的准备，反而自欺欺人，断言“必无事，日暮自走耳”，并下令“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可传谕收旗帜，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sup>①</sup>他的不抵抗主义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二十九日，英国侵略军攻破广州外城，一度攻入内城，纵火焚烧大批民房，抢劫总督衙门。马克思愤怒地指出，由英国政府发动的“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使“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

<sup>①</sup> 华廷杰：《触番始末》卷上，《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2期，第101页。

的借口下发生的！”①

当英军进攻广州时，清朝官吏东躲西藏，叶名琛逃到巡抚衙门。但广大人民群众和下级爱国官兵则奋起抵抗。当晚，英国侵略军被迫逃出城去，退据虎门等待援军。但它们仍然炮击广州，劫夺船只，焚烧村庄，妄图用暴力迫使中国屈服。

一八五七年春，“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掀起战争喧嚣，英国议会通过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侵略军前来中国，同时向法、美、沙俄政府发出照会，提议联合出兵，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

在“亚罗”号事件以前不久，有所谓马神甫事件。天主教法籍神甫马赖非法潜入中国内地进行侵略活动，于一八五六年二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马赖被杀本来是罪有应得，但法国路易·波拿巴政府却以此为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大使，率领一支侵华军，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的幌子，继英军之后开到中国，正式组成英法侵华联军。

美国积极支持英、法，但因国内政局不稳，没有参加英法联军，而是派出全权大使，同英、法密切配合，趁火打劫。

沙俄为了实现占领中国大片领土的卑鄙目的，虽然一年以前还与英、法打仗，这时眼看趁火打劫的时机已到，便转与英、法合谋，积极策划所谓“联合行动”。这样，英、法、美、俄四国侵略者，共同结成了侵华集团，进一步扩大由英国首先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八五七年十月，额尔金和葛罗会集于香港，美使列卫廉、

---

①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页。

俄使普提雅廷也于十一月间到达香港。四个强盗合谋侵华。十二月，英、法拼凑了五千六百多人的联军（其中法军一千人），作好了大举进犯的准备。十二日，额尔金和葛罗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通牒，要求入城“修约”，“赔偿损失”和英军把守河南地及各炮台，并限令十日内答复。倘不答允，即“令水陆军兵，力攻省垣”<sup>①</sup>。

两广总督叶名琛面对英法联军的侵略威胁，不但不做任何应战准备，反而说什么“彼第作战势来吓我耳，张同云（汉奸）在敌中，动作我先知之，我不与和，彼穷蹙甚矣”<sup>②</sup>。部将见敌人进攻迫在眉睫，请求调兵设防，他不准；请求召集广州市民团练自卫，他不准；请求派人到敌船侦察动静，他也不准；而将全部战守之事寄托在孔老二的“天命论”上，竟“扶乩”问神，胡说什么：“此事我确有把握，可保其无事。……大约过十五日便可了结。”<sup>③</sup>二十六日，额尔金和葛罗发出最后通牒，并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二十八日清晨，英法联军占据海珠炮台，开炮攻城。商店、民房相继起火，总督衙署也被轰击。叶名琛惊骇至极，先后狼狈逃至粤华书院和副都统署躲藏。二十九日，联军再次攻陷广州城，叶名琛被俘，腐朽昏愦的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柏贵，可耻地竖起白旗投降。英法侵略者指派英国人巴夏礼、哈罗威和法国人修莱组成所谓“联军委员会”，对广州实行殖民统治的“军事管制”。卖国贼柏贵在三人委员会的严密监督下，照旧担任原职，为侵略者维持地方秩序，压制人民的反抗活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所制造的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叶名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8，第20页。

②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

③ 华廷杰：《触番始末》卷中，《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2期，第109页。

琛被英国送往印度加尔各答，一年后毙命。

英法联军入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英军抢走布政使衙门库银五十二箱（二十二万七千两），法军也大肆抢劫。事后，额尔金的秘书俄理范，挖苦法国兵有一种“专抢珍贵细软的奇怪本领”<sup>①</sup>。其实英、法侵略者的抢劫本领并不相上下。

广州的失陷，是清朝统治者奉行对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对外妥协投降路线的结果。奕泞曾几次表示：“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sup>②</sup>他支持叶名琛的妥协主张和破坏爱国军民反击侵略、誓死抵抗的革命行动，结果使侵略者的阴谋步步得逞。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这只是它们逼降活动的一个步骤。为了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决定北上进犯白河口，直接对北京清朝政府施加压力。一八五八年四月，英、法、美、俄四国公使，率领英舰十余艘、法舰六艘、美舰三艘相继自香港到上海集中，然后分批北上，于四月下旬陆续到达大沽口外。四月二十四日，四国公使同时照会清政府，要求派遣全权大臣在天津或北京进行谈判。但清政府派出谈判官员后，英、法两国又故意在清政府代表是否具有全权的问题上拖延时间，加紧备战。当时美、俄两国使臣假充“调人”，麻痹清政府。英、法在美、俄掩护下，做好一切战争准备，于五月二十日对大沽口突然发动攻击。直隶总督谭廷襄带头逃走，其他官员也抱头鼠窜，只有下级官兵奋起抵抗，给敌人以应有的惩罚。但因官员先逃和措置失当，大沽炮台终于失陷。直隶总督谭廷襄也是一个与叶名琛同样昏庸腐朽、畏敌如虎的封建官僚，抱定了“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

① 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33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4，第15页。

“抚”<sup>①</sup>的投降卖国方针，使英法联军得以横行无阻，直扑天津近郊。五月二十六日，英法侵略者通知清政府“另派头品可以主持之大臣二员，迅速前来共议”<sup>②</sup>，否则一打天津，二打北京。清政府慌作一团，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赴天津议和。桂良、花沙纳力主投降，在他们看来，英、法“枪炮迅利”，“若抵都门，祸恐难测”；“天津民情汹汹，数日不和，必将内变”；“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不抚而战，虽未闭关，而税课有限，南军待哺嗷嗷，无从筹划”<sup>③</sup>；因此，不能战，必须降。奕詝面对英、法的武力威胁，为了集中全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防止天津人民奋起造反，维持自己反动腐朽的统治，批准了桂良、花沙纳的卖国主张，接受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一八五八年六月，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同年十一月，桂良、花沙纳又在上海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及《海关税则》，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侵略者通过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大大扩张了在华殖民特权：

- (1) 公使驻京；
- (2) 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 (3) 耶稣教、天主教得入内地自由传教；
- (4) 外国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船只只得往来于各通商口岸；
- (5) 中外人民争讼事件，由领事官会同中国官吏审办；

---

<sup>①②③</sup>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第31页；卷23，第6页；卷27，第1—2页。

- (6) 鸦片贸易合法化；
  - (7) 对英赔款四百万两、法二百万两；
  - (8) 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除丝、茶、鸦片以外，进出口货一律值百抽五；洋货运到内地，或从内地运土货出口，除抽百分之二点五子口税外，免征一切税项，外国人的用品进口，完全免税；
  - (9) 邀请英人帮办海关税务。
- 条约规定第二年在北京交换批准书。这个条约是《南京条约》的扩大，基本上包括了侵略者“修约”要求的主要内容。它是外国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副更加沉重的枷锁。因此，马克思怒斥《天津条约》“从头到尾都是欺诈”<sup>①</sup>。

### 三、津、京陷落和《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军于一八五八年七月陆续南撤，暂时解除了对清政府畿辅重地的严重军事威胁。但是，这个新的卖国条约并没有给清朝统治者带来和平与安宁。

以奕䜣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害怕过多的给予外国特权而不利于自己的反动统治。他们特别对《天津条约》中的公使驻京、长江通商、洋人在内地传教等条款十分耽心，害怕侵略者同内地人民革命力量联合起来而造成更大的“内忧外患”；尤其耽心公使驻京会给他们带来肘腋之祸。因此，奕䜣在一八五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多次指使在上海同额尔金、葛罗等谈判通商章程的桂良、何桂清等人，要乘谈判之机修改《天津条约》。奕䜣指令

<sup>①</sup>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五八年十月八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11页。

他们“不但派员驻京必须极力挽回，即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退还广东省城各要件，贻害甚大，均不可不设法阻止”<sup>①</sup>。奕泞答应以“全免课税”作为修改条约的交换条件。但是，英、法两国悍然拒绝了这个要求。这样，奕泞的幻想终于化成了泡影。在上海谈判的同时，清政府还在天津海口加紧布防，兴修大沽炮台，增添防卫兵勇，并授命僧格林沁主持海口防卫事宜。但这只不过是清政府故作姿态罢了，事实上并不打算认真抵抗外国侵略者。

然而，即使这种不是真心准备抗战的举动，也引起了外国侵略者的不满。他们感到清政府还没有在武力下被驯服，还不想去甘心充当他们的侵略工具。所以必须再次发动战争教训它一顿。同时，由于当时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接连爆发了经济危机，大批工厂倒闭，阶级矛盾空前尖锐，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发动侵略战争，以便扩大市场，转嫁危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他们对《天津条约》所规定的条款已感到不能满足。英国政府的报纸接二连三地叫嚷：“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满意。”<sup>②</sup>一八九二年二月，英国侵略分子赫贝特也赤裸裸地叫喊《天津条约》的“每一条款都是新战争的祸根”<sup>③</sup>。三月，额尔金秉承英国政府的意旨，急电英国侵华海军头目西马糜各厘赶快在上海集中“强大的兵力”和“足够的炮舰”<sup>④</sup>，以备护送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普鲁斯进京换约，伺机在天津给予清政府“另一次教训”。法国公使葛罗甚至公然叫嚣，《天津条约》是清政府在枪炮威胁之下接受的，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8，第52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页。

③ 转引自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36页。

④ 转引自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页。

也只有暴力才能使之兑现。可见，进一步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履行《天津条约》和掠夺更大权益，是英、法等国政府的既定方针。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使战争必然重起。”<sup>①</sup>英、法等国已决意再次挑起侵华战争。

一八五九年六月初，英、法新任驻华公使普鲁斯和布尔布隆，相继到达上海。他们拒绝同清政府派往上海等候的桂良、花沙纳会商，而加紧拼凑联合舰队，准备闯入天津海口，重新挑起战争。这支联合舰队共有大小战舰二十余艘，军队二千多人。其中有英国军舰十五艘，法国军舰两艘，美国军舰三艘。六月十七日，三国联合舰队相继由上海到达大沽口外。

清政府同意按期在京换约，但指定各国公使须由北塘登陆进京，随行人员不要超过二十名，并不得携带武器。这本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正当措施，但英、法侵略者则蓄意挑衅，叫嚷：“定行接仗，不走北塘”<sup>②</sup>，坚持沿白河经由天津进京换约。六月二十五日，英国舰队司令贺布率领联合舰队悍然闯进白河，强行拆毁天津海口的防御工事，并于下午二时，突然炮轰大沽炮台，企图由此打开向天津的通路。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经过一昼夜激战，击沉英舰四艘，击伤六艘，俘获两艘，其余挂起白旗表示投降。“敌船入内河者，共十三只，惟一只逃出，余悉击伤”<sup>③</sup>。毙伤英军官兵四百六十四人，占登陆部队半数以上。贺布受了重伤，他的副手也因伤重而毙命，法国司令也被打伤。虽然当时停泊在附近的美国舰队公然发炮助战，舰队司令达底拿还竟然发出“血浓于水”的叫嚣，唆使美国兵舰帮助英、法进攻，但

<sup>①</sup>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页。

<sup>②</sup>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8，第52页。

<sup>③</sup> 《庚申夷氛纪略》。

也丝毫挽救不了侵略者的败局。英、法侵略者狼狈逃往上海。

狡猾的美国公使，在大沽战役中充当了英法联军的积极帮凶，但战后居然若无其事，对清政府又摆出一副“友好”面孔，遵照清政府指定的路线，由北塘入京，交换了《中美天津条约》。

大沽守军被迫自卫反击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侵略者的威风。大沽守军的自卫反击，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中国当局反对的不是英国外交使节前往北京，而是英国军舰沿白河上驶。……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sup>①</sup>

但是，大沽自卫战的胜利，并没有使清政府改变“阳主战而阴主抚”的妥协方针，反而幻想以胜求和，根本不去进一步认真备战，加强防务，却大叫什么“不如趁此获胜之后，设法抚驭，方为妥善。”还密使上海一些买办商人卑躬屈膝地拜倒在洋人脚下，和“英夷说合”，这就进一步助长了英、法联军的侵略气焰。

英法联军可耻失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引起英国统治阶级内部一阵争吵和狂吠。他们叫嚣什么对中国要“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手段，再不能纵容了！……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主人”。他们还妄想“夺取北京”，“永远占领广州”，使之变为他们“在远东的商业中心”，并“奠定新领地的基础”<sup>②</sup>。秉承英国资产阶级的意旨，首相巴麦尊在给外相罗素的信上说：“我们要派

①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43页。

一支陆海军武装部队攻占北京，赶走中国皇帝，把我们的全权使节驻扎在那里，这是最适当的措施。”<sup>①</sup>法国也在积极策划新的战争。

一八六〇年二月，英、法分别派侵略老手额尔金、葛罗率兵来华，先后强占舟山、大连、烟台。英法联军于七月抵大沽口外；清将僧格林沁撤北塘防务，专守大沽。英法联军于八月一日乘



英法侵略军攻陷大沽炮台后的情景

虚而入，登陆北塘，攻大沽后路，水陆夹击，侵占大沽炮台，随后从白河长驱直入，攻陷天津。面对侵略军的进犯，僧格林沁“自保身命，遂弃天津府城于弗顾，狂奔至杨村而后息焉”<sup>②</sup>。但广大爱国官兵自动起来迎击侵略军。在新河、军粮城，三、四千人的中国骑兵同一万多名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侵略军展开了激战。中国骑兵分成小股，避开猛烈的炮火，冲向侵略军，一气夺

<sup>①</sup> 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51页。

<sup>②</sup> 《庚申夷氛纪略》。

得大炮五门，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当侵略军从天津逼近北京时，驻守在八里桥的清军爱国官兵奋起“与贼打仗”，各个“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贼，进如山倒，战一时许，伤毙敌兵千余，白黑夷死者不少，贼势不克，披靡却退”<sup>①</sup>。在抗击侵略军的过程中，许



### 八里桥大战

多士兵为了保卫祖国，维护民族尊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爱国的中国士兵是相当优秀的骑兵，他们非常勇敢，打得“很壮烈”。但是，正当爱国官兵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大学士瑞麟带领的一支清军，却不战“先已溃散”；僧格林沁也“于酣战之际，自乘骡车，撤队而逃”。结果清军动摇，“贼势复张”<sup>②</sup>，联军乘势进逼北京，清廷合朝震惊。

九月，奕詝仓惶逃往热河，命他的六弟恭亲王奕訢留京求和。十月十三日，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控制了北京。

英法联军控制北京以后，对北京城进行了野蛮的洗劫，特别

<sup>①②</sup> 《庚申夷氛纪略》。

是对西北郊的圆明园，更是洗劫一空，为了消灭惊人的掠夺罪证，又纵火将它烧毁，大火三天三夜不熄，壮丽的宫苑，变成一片焦土。圆明园是清皇室的一座行宫，是清朝统治者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经营一百多年，综合中西建筑，聚古今艺术品而建成的壮丽宫苑。它是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农民的铁证，又是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它藏有各种无价的珍宝，罕见的典籍，著名的历史文物。侵略者供认：它是“世界最宏伟美丽的宫殿”，“他们不能再抵抗物品的诱惑力，军官和士卒们都成伙打群冲上前去抢劫，纪律毫无。”“行宫内抢劫的事，今天（十月八日）简直作到极点，令人惊骇了。”他们描绘焚烧圆明园的情景说：“火光熊熊的烧着，仿佛一张幔子，……蜿蜒到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掩没，看起来仿佛象一个长期的日蚀。”<sup>①</sup>焚掠圆



圆明园遗址

---

<sup>①</sup> 《西书有关焚毁圆明园纪事》。

明园的罪恶行径，彻底暴露了以“西方文明”相标榜的英、法等国侵略者的贪婪、野蛮和残暴的丑恶本质。

圆明园被焚掠后，英、法侵略者又进一步提出了新的条款，并且声称，如不接受，即将以同样方式焚毁北京城内宫殿。奕诉被洋枪洋炮吓破了胆，不敢见英、法侵略者。沙俄公使乘机自任“保护人”，条件是：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后，就与俄国订立新约。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奕诉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外，又增加了以下几项主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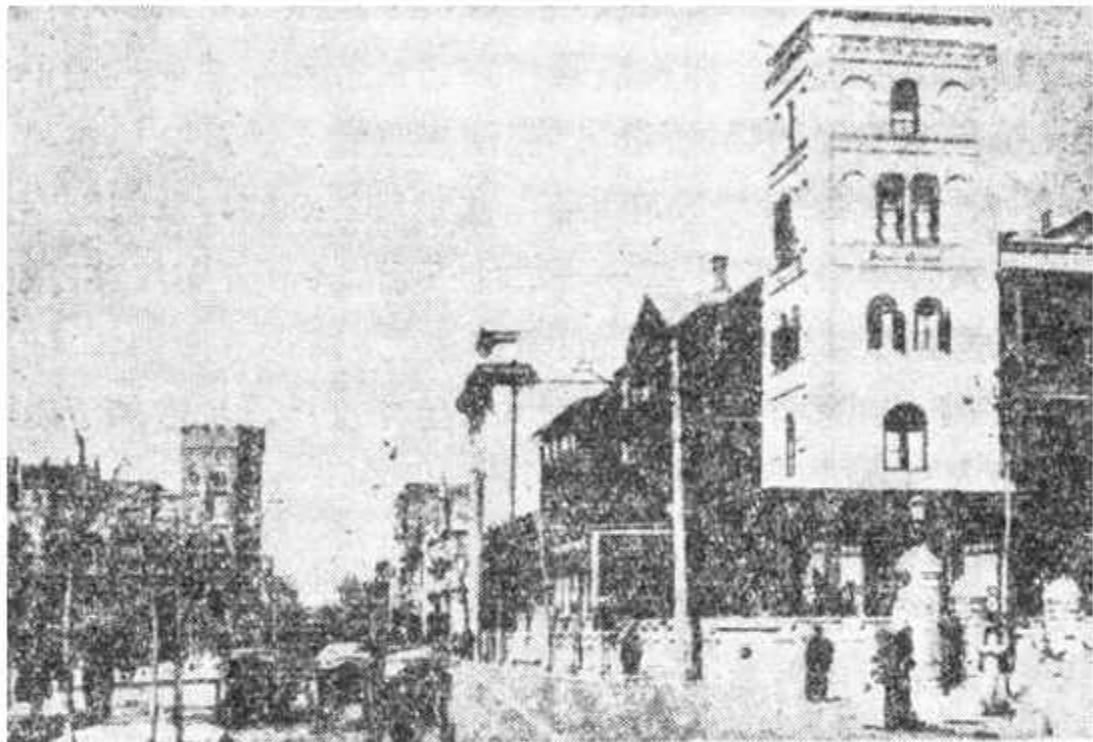
- (1) 开放天津为商埠。
- (2) 准华民赴英、法属地或外洋别地工作。
- (3) 割九龙司为英领地。
- (4) 交还教产于天主教堂。充当翻译的法国神甫，在葛罗指使下，又在条约中文本中偷偷地加入“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条文。
- (5) 赔偿英、法兵费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赔款由海关税收内扣缴。

沙俄怕英、法阻挠和干涉它与清政府签订新约，以北京气候严寒，白河口几天内就要封冻为理由，劝说英、法侵略者早日退出北京。在英法联军退出北京后，沙俄遂于十一月十四日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中俄北京条约》。

美国虽与清政府没有签订新约，但是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所规定的各项殖民特权，美国侵略者都可依照“利益均沾”条款而分享，所以同样十分满意。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中

国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了，中国失去了更多的主权，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天津英租界

#### 四、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面对着英法联军的猖狂侵略，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推行卖国投降路线截然相反，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则坚持爱国反抗的路线。他们同爱国士绅和清军下级官兵一起，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外国侵略者，在近代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热烈赞扬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sup>①</sup>。

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大致采取了两种形式，一种是公开集

<sup>①</sup>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页。

中的武装斗争和罢工罢市斗争；另一种是分散隐蔽的自发斗争。

早在一八五六年十月，英国侵略者开始进犯广州时，广州人民奋起反抗，“城厢内外各榜长红，约剿杀外人，同仇敌忾”<sup>①</sup>；反英揭帖，满城皆是，揭露敌人侵略罪行，警告入侵者“残害粤民，是直与十万百万之人为仇敌”<sup>②</sup>，定将受到严惩。他们对霸占省河的侵略军兵船，不断用放火筏、炸药瓶、水雷等简陋武器进行袭击，迫使敌人层层设防。十一月二十五日，几个中国人巧妙地在黄埔码头一只英国船上，捉去船长、巴夏礼的舅舅古柏，使巴夏礼等急得团团乱转，无可奈何。十二月，愤怒的广州人民，为了搞掉敌人盘踞的巢穴，放火烧毁城郊十三行商馆，迫使敌人“尽栖船上”<sup>③</sup>。在内河，人民群众截击敌人的划艇，烧毁敌人的邮船，使外国侵略者水陆都不得安宁。新安人民也开始组织起来，准备和侵略者作殊死斗争。正是在人民群众打击下，迫使一度侵占广州的英国侵略军，不得不赶快撤出。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英法联军再次侵占广州后，对当地人民进行更加野蛮的烧杀抢掠，激起人民极大愤怒。具有反侵略传统的广州西北郊三元里人民，听说省城陷落，“锐意恢复，募勇团练”<sup>④</sup>。次年初，广州地区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义兵数万。参加群众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店员，也有少数商人和爱国士绅。当时加入广州一带团练的劳动群众，对入侵者怀有强烈的民族仇恨，具有高昂的反侵略意志。而加入团练的一些商人和地主士绅，虽然在侵略者恣意焚掠的暴行面前，在人民群众

<sup>①③</sup> 华廷杰：《触番始末》卷上，《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二期，第101—102、105页。

<sup>②</sup> 《丙辰粤事公牍要略》，《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二期，第134页。

<sup>④</sup> 夏燮：《中西纪事》卷13。

推动下，基于本身的利害关系，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抗外敌的要求，但具有很大的动摇性，他们控制着团练的领导权，因而又严重限制和妨碍了群众的反侵略斗争。面对英法联军的猖狂侵略，广州地区的团练群众，决定各乡“各谋保卫之计，首严清野，禁绝汉奸，又声言：‘夷人入界者，登时格杀勿论。’”<sup>①</sup>东莞、增城、花县、顺德、香山、新会等县，也纷纷成立团练，各地团练互相联合，准备赶走侵略者，收复广州城。中外反动派怕得要死，竭力破坏。英法侵略者指使柏贵贴出告示，声称“中外一家，业经和好，百姓不得再滋事端”。“如殴打洋人及擅敢借词团练等情，定照叛逆治罪”<sup>②</sup>。但是，人民既没有受骗，更没有被吓倒，而是高举抗英大旗，继续打击侵略者。

在广州城内，侵略者凭借武装尚可自保，而在城外广大地区，他们就寸步难行了。有一天，侵略者窜到望牛冈等村，就被团勇鸣锣驱逐，打得敌人坠马受伤。他们虽想报复，但又不敢去，便唆使汉奸柏贵派知州寿祺到石井团练局去吓唬群众，叫嚷什么“洋人入境游奕，须以礼款待，不可挑衅”。但当地群众“义愤难遏”，予以严厉驳斥，指出侵略者“据我省城，戕我民命，焚夺我财务，实义不共戴天，来则击之，虽受荼毒而不悔”<sup>③</sup>。这个走狗无言可对，在群众怒斥为汉奸的诟骂声中狼狈逃回。

六月，东莞县团练又一次惩罚了侵略者。团练群众事先在敌人盘踞的将军署门前贴出挑战书，说：“我东莞勇，现驻榕树头，尔外人敢到此与我打仗，定杀尔片甲不回。”巴夏礼率兵出战，东莞勇“预先于树林僻径节节埋伏，俟敌人深入，伏起截杀，

① 夏燮：《中西纪事》卷13。

②③ 华廷杰：《触番始末》卷下，《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2期，第118—119页。

敌兵大败，毙数百人。我兵跟纵追剿，彼众纷纷逃窜，陷入水田者均不能起，巴酉（巴夏礼）亦坠马，几被获”，狼狈逃入广州城。在人民的铁拳打击下，侵略军惊恐不安，“自此以后，敌人固守城内，挑诱不出”，“复弃新城不守，尽收兵入城内，非数十人不出”<sup>①</sup>。人民群众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继续伺机打击敌人。据记载，某个“英武弁麾下，有厨子，系天竺人，偶行路上，忽被人以刀割其首而去，时有同行之天竺兵二名，并未见及，其神速如此”。有两个法国人，自“火轮船上岸，往南门买食，忽被广勇围住，二人夺围而出，一人在后，头与手皆被割去”。因此，外国侵略者“若无兵丁防守之处，不敢游行”<sup>②</sup>。

广东人民在进行武装反抗的同时，还发动了大罢工和大罢市，号召“在香港、麦高（澳门）等处，为外洋人教书、办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内，概行辞退回家”。结果“一月之内，告归者二万余人”<sup>③</sup>，使洋人各项经济活动陷于停顿，困苦不堪。同时在广州，商民“行封港之法，绝其贸易接济”，结果“省城内外商民，迁徙一空，西关白昼无人迹”，迫使侵略者不得不“自香港载牛至省以充食物”<sup>④</sup>。

中国面包工人，极其镇静地按照预定计划，在面包里掺入大量毒药（砒霜），准备毒杀侵略者。但因药量过大而成了呕吐剂。有一艘英国邮船，行至半途，忽然船上的“中国乘客，取出藏好的武器，劫夺了这艘船”<sup>⑤</sup>。有些被胁迫到外国去的中国“苦力”，也起来斗争，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

<sup>①④</sup> 华廷杰：《触番始末》卷下，《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二期，第123—124页。

<sup>②③</sup> 夏燮：《中西纪事》卷13。

<sup>⑤</sup>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89页。

死，也不愿投降。”<sup>①</sup>旅居国外的华侨，为了声援和支持国内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也举行起义，进行斗争。如在沙捞越、新加坡就发生过这种情形。这些不屈不挠的斗争，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决心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同清朝统治者的屈辱投降、甘作傀儡的无耻行径，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啊！恩格斯指出：“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sup>②</sup>

一八五八年六月下旬，《天津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广东人民“决眦指发，其愤益深”，怒斥清朝统治者的卖国行径。八月三日，英国侵略者派火轮去新安张贴天津“议和”布告，宣扬他们的“胜利”，并胁迫群众“各还原业”，愤怒已极的群众当场打死了张贴布告的汉奸，逐走英国火轮，并对前来报复的英国侵略者予以严惩，伤毙百余人。但是，两广总督黄宗汉却秉承外国侵略者和奕詝的意旨，下令严禁广东人民进行反侵略斗争，甚至阴谋把团练调到西、北两江去镇压起义反清的人民群众。曾经参加反侵略斗争的其他士绅也以“天津抚议已定”，纷纷退出了反侵略的行列。但是，广东人民同官绅完全相反，继续坚持反侵略反投降斗争。他们痛斥官绅“虎头蛇尾”，并向督署投掷揭帖，抗议投降卖国。新安沙井与东莞毗连各乡农民联络一气，“不告于绅，不告于官，自捐自战”，誓与敌人斗争到底。番禺、南海两县数千民众也秘密组织起来，以“灭夷复城”为号召，“冀图起事”。据巴夏礼供认，在整个六月和七月中，“对联军的轻微而厌人的攻击一直不断，终于七月二十一日发展到一个武装夜袭的最高峰”<sup>③</sup>。

①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页。

② 同上书，第19—20页。

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597页。

英国侵略者虽然狂叫要“象占有加尔各答那样把广州保持在自己手里”。但是，由于广东人民和港澳同胞的坚决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迷梦。

同广东的情况相似，当英法联军侵犯天津，清朝大吏一味妥协退让的时候，天津人民却奋起反抗，给嚣张一时的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一八五八年五月，英法联军第一次进犯大沽、天津时，天津人民自动联合起来，焚烧敌船，决心同侵略者决战。他们纷纷聚谈相约，“协联一气”，“誓欲尽歼丑类”，“若遇敌人进行骚扰，即行杀戮”。有一个英国军官，闯进民宅，群众愤极，把他围起来，痛打一顿，“褫剥衣服，将缚而杀之”，这个家伙“再四哀告”，经群众训斥后予以释放<sup>①</sup>。六月的一天，英军“士卒”手牵“夷犬”，“登西北城上，指点民家，随被该处居民掷土砍打，夺其士帽，擒其夷卒，打跑夷犬，该士逃回”。当英军二百人前来报复时，“我街巷义勇、铺民、练勇、乡民均齐心执械待斗。夷见我势众，不敢交手，改称：‘见官讲理。’”<sup>②</sup>一天深夜，十几个侵略军手持火枪短刀，撞开锅店街永泰耀杂货局、庆馨德钱店，抢去首饰衣服等物，并刀砍万成号瓷器铺门。“当时人众惊醒，随登屋抛掷瓦砾，骤如雨雹。”这伙强盗被打得“破头烂额”，纷纷逃窜。<sup>③</sup>由于外国侵略者在天津敲门抢掠，无恶不作，天津人民对这些强盗“痛恨入骨，人皆思斗。自是日起，义勇乡民，互相知会，‘倘夷等仍前抢掠，则乡民随地砍打，设夷聚众滋事，则我鸣锣相应，群起攻之’”。正是由于天津城乡万民齐心，坚决斗争，才迫使侵略者“不敢日间抢掠生事矣”<sup>④</sup>。因此，当时天津人民得出结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6，第23页。

②④ 《津门夷务记》。

③ 《襄理军务纪略》卷2。

论说：“惧夷者官也，非民也，惧夷之甚者大官也，非小官也。”<sup>①</sup>

一八五九年五月，英法联军第二次进犯大沽，爱国军民英勇抗击。当地人民“欢欣鼓舞，馈送饼面食物，于矢石交下之时，运赴营盘，络绎不绝”<sup>②</sup>，极大地支持和鼓舞了坚决抗击侵略者的爱国将士。

一八六〇年八月，英法联军第三次进犯大沽，攻陷天津。天津人民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反侵略斗争。以直隶总督恒福为代表的卖国贼，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给群众加上“土匪”的罪名，进行残酷镇压。但是，天津人民在这股逆流恶浪面前毫不退缩，仍然自发地起来打击侵略者。九月间，王兴邦、隋登初等人率领群众焚毁英法联军的船只，打死打伤侵略军多人。

英法联军进犯北京时，人民群众纷纷拿起武器，到处打击敌人。一八六〇年十月，英国侵略军一百多人侵犯北京西郊的谢庄，谢庄群众在猎户冯三保的领导下，坚守在石寨、土堡要隘处，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敌人不甘心失败，又派五、六百人拖着大炮再犯谢庄，进行报复。冯三保的十九岁女儿冯婉贞率领全村青少年猎手，针对敌人依靠枪炮利于攻远，而惧怕逼近肉搏战的特点，决定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他们手持刀剑和盾牌，埋伏在离村四里的森林里，当敌人走近时，“挟刃奋起，率众袭之，敌出不意，大惊扰”，敌人见枪炮已失灵，急忙上刺刀迎战。婉贞率青少年猎手挥刀砍，所向披靡，敌兵败退。婉贞高呼：“诸君，敌人远吾，欲以火器困吾也！急逐弗失。”<sup>③</sup>青少年猎手越战越勇，全村群众全力支援，一直血战到傍晚，击毙了一百多名敌人，其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6，第23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9，第19页。

③ 徐珂：《清稗类抄》第6卷，第146—147页。

余的丢下大炮乘黑夜仓惶逃窜，从此再也不敢进犯谢庄。

在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封建统治者充分暴露了自己的腐朽无能，只有人民群众才真正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英勇的斗争精神。人民群众掀起的反抗浪潮，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虽然这种小规模的抵抗还不能扭转战争的全局，但斗争的意义是伟大的。早在一八五七年五月，正当广州人民同英国侵略者作殊死搏斗的时候，伟大导师恩格斯就曾指出：“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sup>①</sup>

## 第二节 反对沙俄鲸吞中国 大片领土的斗争

### 一、沙俄侵占中国东北和西北大片领土

沙皇俄国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它梦寐以求的是要成为世界帝国。恩格斯揭露沙皇俄国“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sup>②</sup>。侵略中国，是沙俄争霸世界计划的重要一环；吞并中国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和西北边疆，是沙俄向远东扩张的既定目标。因此，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

<sup>①</sup>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22页。

<sup>②</sup>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页。

后，沙俄展开了大规模并吞中国领土的侵略活动。

本来，早在一六八九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就已从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明确规定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但贪婪的老沙皇仍贼心不死，“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sup>①</sup>十七世纪末，曾亲自批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沙皇彼得一世就叫嚷要在黑龙江口建立“俄国的城堡”<sup>②</sup>。十八世纪，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还公然把夺取黑龙江作为俄国“远东政策的中心”<sup>③</sup>。到了十九世纪，沙俄政府更变本加厉地推行掠夺中国黑龙江地区的既定政策。

一八四七年秋，沙皇任命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并唆使他放手地侵占中国黑龙江地区大片领土。一八四九年沙皇政府成立“黑龙江问题特别委员会”，作出派遣以涅维尔斯科伊为队长的海上“探险队”等入侵黑龙江的决定。穆拉维约夫一面筹建庞大的“外贝加尔哥萨克军”，作为侵略黑龙江地区的主力；一面支持涅维尔斯科伊猖狂进行“探险”活动。他叫嚷：“阿穆尔（指黑龙江，下同）是通往东方唯一方便的航路。”“谁要能占据阿穆尔河口，谁就能控制西伯利亚”，使“西伯利亚永远沦为控制该地的国家的藩属，为之纳贡”。俄国“必须占领阿穆尔河口并须在该河上航行”<sup>④</sup>。一八五〇年八月，涅维尔斯科伊侵占了中国黑龙江口的庙街，建立侵略据点，

①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35页。

②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疆史》，布拉戈维申斯克一九一四年版。

③ 霍多罗夫：《波克洛夫斯基和远东研究》，载苏联《新东方》，莫斯科一九二九年版，第25期。

④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一八九一年版，第2卷。

树起俄国军旗，还以沙皇的臭名改庙街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对此，尼古拉一世极为赞赏，亲自召见涅维尔斯科伊，赏给他一枚勋章，并指着地图上庙街一带地方，悍然宣称：“俄国国旗不论在哪里一经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sup>①</sup>涅维尔斯科伊受到沙皇的赏识，更加野心勃勃。一八五一年七月，他再次窜到黑龙江下游，建立和加强沙俄的殖民统治。他狂妄地宣称：俄国必须占领黑龙江流域，否则，“俄国于太平洋上不能获得自由之海口。俄国将来欲在远东发展，不论由政治、经济及军事之观点言之，黑龙江为必不可少之地。”<sup>②</sup>到一八五三年，这伙强盗完全霸占了中国黑龙江口地区，同年四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一世悍然下令侵占中国的库页岛。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底，穆拉维约夫根据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大司祭巴拉第提供的关于中国事态的详细情报，制订了旨在侵占黑龙江北岸的所谓武装“航行”黑龙江的计划。当时，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蓬勃兴起的时期，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为了镇压农民革命，竟然置国家安危于不顾，频频从吉林、黑龙江征调大批兵丁入关，形成东北边境粮缺兵少、“各路无防”的严重情况。穆拉维约夫在给沙皇政府的报告中说：“目前中国的内乱，正是开辟阿穆尔航线的大好时机，而三年来我们在黑龙江口活动的顺利和安全更是今后成功的可靠保证。”<sup>③</sup>沙皇政府在一八五四年一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他的这个计划，并蛮横地决定无论清政府同意与否都要“沿黑龙江航行”<sup>④</sup>。从一八五四年五月以后，

<sup>①</sup> 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圣彼得堡一八七八年出版，莫斯科一九四七年再版。

<sup>②</sup> 转引自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87页。

<sup>③④</sup>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一八九一年版，第2卷、第1卷。

穆拉维约夫不顾清政府的抗议，派遣大批船只，运载大批侵略军，多次闯进黑龙江，擅自至上、中游北岸和下游地区建立许多军人“村屯”。一八五六年，沙俄悍然宣布成立以庙街为中心的所谓滨海省，明目张胆地将黑龙江下游地区划入该“省”辖境。在武力强占的基础上，沙俄玩弄各种阴谋诡计，企图逼迫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

一八五六年，英、法发动了旨在扩大侵略权益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想趁火打劫，便于一八五七年派遣普提雅廷到中国谈判。普提雅廷在伊尔库次克同穆拉维约夫进行秘密策划。穆拉维约夫狂叫什么：“如果中国不同意我国提出的分界线，依然坚持认为阿穆尔是中国的，那末，我们必须以武力强迫他们承认我们的权利。”<sup>①</sup>那时，我们将“派出两支部队：一路攻取库伦，另一路攻取瑷珲”。在瑷珲登陆后，“从那里有几条平坦的大道，穿过人烟稠密的地区，通向南满和北京”。这样，我们就能“立足满洲、蒙古，从而使满蒙脱离中国，成为受俄国保护的两个公国”<sup>②</sup>。侵略气焰十分嚣张。

普提雅廷于一八五七年八月乘兵船到达天津，向清政府提出中俄两国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的无理要求。清政府严词拒绝，指出：“两国地界，自康熙年间议定，以乌伦穆河相近之格尔毕齐河，及大兴安岭为界，当时立定界碑，永垂不朽，无可商议”；只有乌特河一处，尚未勘定界址，可以就此问题，进行磋商<sup>③</sup>。理屈词穷的普提雅廷未达到目的，便怒气冲冲地窜至香港，同英、法、美三国侵略者进行勾结。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即英

<sup>①②</sup>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一八九一年版，第1卷。

<sup>③</sup>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6，第27页。

法联军攻下广州的当天，他从香港给沙俄政府的电报中说：对中国“不采取有力的强制措施，不能得到任何结果。”“一旦联军将战事北移，我们更应及时建议法、英和我海军于此海域配合行动”。“否则，就很难预见还有什么外交途径能解决我国和中国的争议”<sup>①</sup>。

与此同时，沙皇政府指令穆拉维约夫“必须趁着清政府还在同英、法交战而又急需调整对俄关系以对付英、法的时候，不失时机地结束对中国的谈判。”<sup>②</sup>一八五八年五月，穆拉维约夫趁英法联军进攻天津、清政府陷入困境的时机，率领兵船直趋瑷珲，向清朝的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对中国领土的无理要求，胡说什么“必须在阿穆尔划定两国边界”，“因为中英正在交战”，只有把黑龙江以北割给俄国“才能遏止英国的进犯”<sup>③</sup>。中国方面据理辩论。狡猾的穆拉维约夫立即中断会议，称病不出，并指使其随员将事先拟好的条约草案交给中国代表，声称“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sup>④</sup>，否则他们将联合英法联军进攻中国。接着，他又出动军舰在黑龙江上示威，鸣枪施炮，炫耀武力。奕山这个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炮舰政策吓破了胆的懦夫，这时又被沙俄的炮舰政策所征服。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奕山以防止沙俄“立启衅端”为理由，签订了卖国的《中俄瑷珲条约》。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割归俄国，只有精奇里江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的地区即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中国人

---

<sup>①③</sup>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一八九一年版，第1卷。

<sup>②</sup> 纳罗奇尼茨基：《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一八六〇——一八九五年）》。

<sup>④</sup>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5，第13页。

仍在原地“永远居住”，由中国官员管理，俄国人“不得侵犯”；这样沙俄便侵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此外，条约还硬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中国领土作为中俄“共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了奖励穆拉维约夫侵略我国的“功劳”，特封他为阿穆尔斯基伯爵。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愤怒地谴责了沙俄的侵略罪行，指出：“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sup>①</sup>，它“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sup>②</sup>。“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sup>③</sup>

在沙皇俄国强迫中国签订《瑷珲条约》之前，沙俄认为既然西方列强千方百计地强行勒索，想在中国得到贸易权，我们也应该毫不迟疑地圆满解决这一问题。而普提雅廷这个所谓“调停人”正是这一“任务”的担当者。

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决定乘势胁迫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普提雅廷遵循沙俄政府的旨意，与英、法、美一起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要中国派代表到上海谈判。清政府没有答应这一无理要求。英法侵略军决定继续北进，普提雅廷不仅支持这一行动，而且建议说：要使清政府屈服“最为有效的措施是封锁白河两个河口，禁止中国帆船驶入，直至北京派出全权大臣赴直隶湾同我们谈判”<sup>④</sup>为止。

一八五八年四月，当英、法、俄、美四国军舰聚集白河口外，形成了对京津威胁的局势时，普提雅廷一面怂恿英、法炮击大沽

①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页。

②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页。

③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页。

④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一八九一年版，第1卷。

口，占领天津；一面又把自己打扮成“维护人道之行为”的“中立者”，以“调停人”的身分出现，诱使清政府屈服投降，以便从中渔利。就这样，继《中俄瑷珲条约》签订两周后，于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普提雅廷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沙俄除旧有的陆路通商外，不仅取得了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等七处通商口岸的通商权利，并规定：“若别国再有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而且取得内地传教权、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凡其他侵略国家所得到的一切特权，《中俄天津条约》都写了进去，其中第九款还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为沙俄侵略者以“勘界”为名并吞我国更多的领土埋下了伏笔。对此，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俄国“已设法成立了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而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二十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sup>①</sup>。

沙皇的贪欲是无止境的。瑷珲、天津两个条约的墨迹未干，沙俄就迫不及待的把侵略魔爪伸向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在沙俄看来，“为使乌苏里江和乌苏里江地区永归俄国，必须在乌苏里江采取占领阿穆尔时所使用过的手法，即以实际占领作为外交交涉的后盾”<sup>②</sup>。基于这种强盗逻辑，从一八五八年到一八五九年间，穆拉维约夫亲率船舰不断闯入中国乌苏里江，在江东设立军人村屯，建立据点，任意开枪射杀祖祖辈辈居住在这

<sup>①</sup>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页。

<sup>②</sup>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一八九一年版，第1卷。

里的中国居民，甚至悍然“下令将一切中国官吏和岗哨从乌苏里江右岸（即东岸）驱逐到左岸去”，凡“抗拒者用武力加以拘捕，押往瑷珲”<sup>①</sup>。同时，他还非法派人到处勘察、绘制我国东北边界地图，不仅把从《瑷珲条约》（此约还未经清政府批准）中割去的中国领土划入俄国版图，而且把乌苏里江以东所谓中俄“共管”的全部地区也划入俄界。穆拉维约夫狂妄地叫嚣：“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愿意在哪里划界，就在哪里划界。”<sup>②</sup>一八六〇年六月，沙俄占领了中国重要海口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寓以“控制东方”之意。这充分暴露了老沙皇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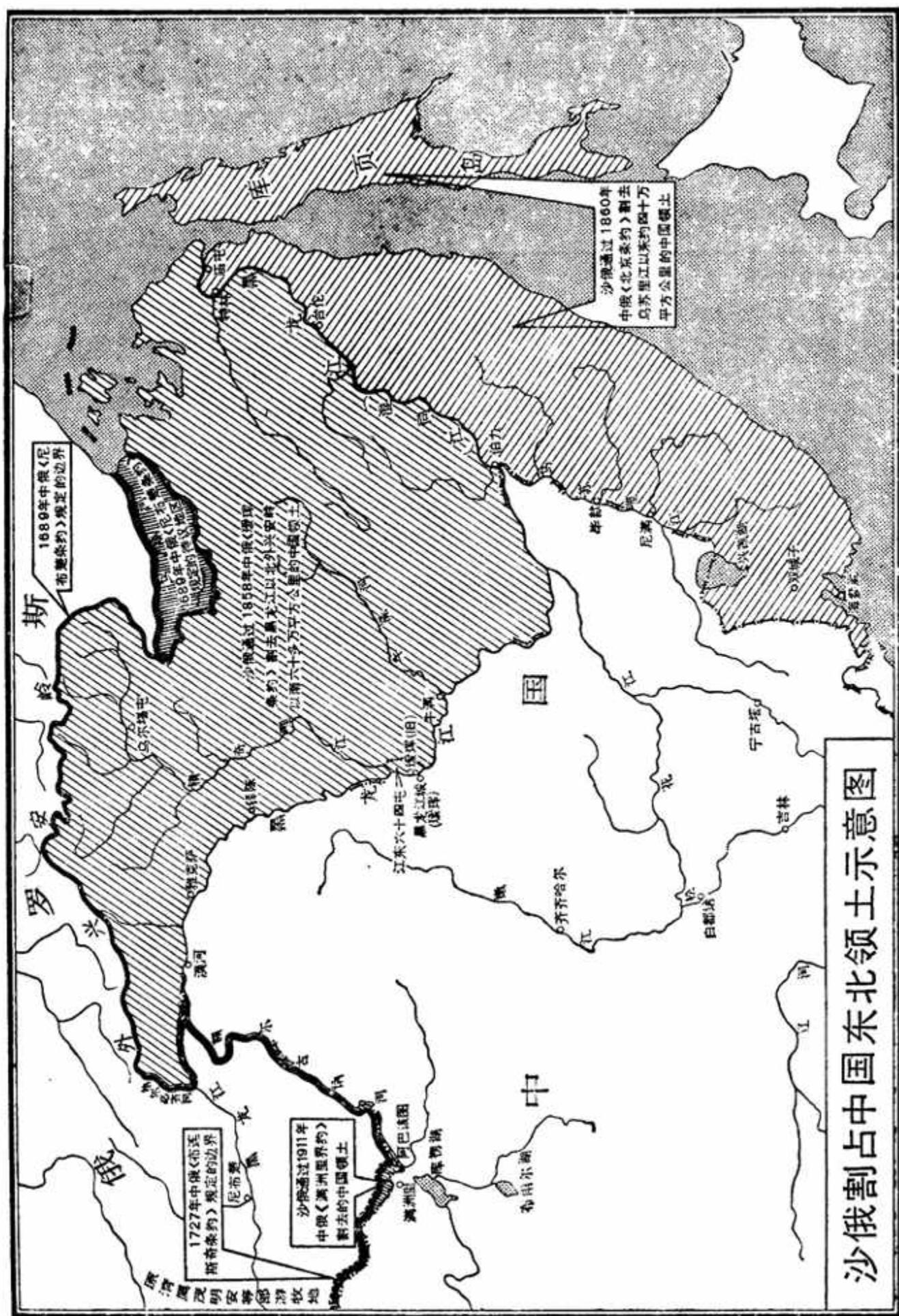
沙俄一面在乌苏里江以东实行武装移民，一面令其驻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彼罗夫斯基为全权代表在北京坐催换约。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中俄天津条约》批准互换，但清政府拒绝批准《瑷珲条约》，彼罗夫斯基扫兴而归。但沙俄贼心不死，又派双手沾满中亚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伊格纳切夫出使中国。六月，伊格纳切夫到达北京。这时正值英法联军在大沽口被中国爱国官兵打得大败之际，他觉得光来硬的不行，便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以“保护中国”、“预防”英、法侵占为名，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割让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的所谓《补续和约》六条，并说什么“中国海界绵长，战法各处皆不能敌，惟本国（俄国）能办此事。”“将此东方属于本国，我国能保不论何国，永不准侵占地，如此中国东界，亦可平安”<sup>③</sup>。强盗闯进别人家里，反说是保卫人家安全，这真是

①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大连一九〇二年版。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一八九一年版，第1卷。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9，第30—31页。

# 沙俄割占中国东北领土示意图



## 沙俄割占中国西北领土示意图

1860年以前的  
中国西北部分边界

沙俄通过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和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沙俄通过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五个勘界议定书割去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1884年中俄《凌勘喀什尔界约》规定。自乌孜别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

十九世紀末  
英軍專占領地

赤裸裸的侵略逻辑。清政府驳斥说：中俄东北边界早在《尼布楚条约》中已经明确划定，奕山所定条约，中国政府并未允准，乌苏里江地区与俄国并不相连，勿须定界；而且那里属吉林将军辖区，奕山无权决定；至于俄国害怕“别国占据”此地一事，“我国自有办法”，俄国“无劳过虑”<sup>①</sup>。伊格纳切夫看诱骗不成，就施之以威吓，狂叫什么“须知我国欲占之地”，“我们业经占立数处”，“不论中国愿意与否”，俄国“仍然自己定界立牌”<sup>②</sup>。他拿出穆拉维约夫送来的地图，要清政府照图办理，否则，他就要“侵吞扰乱”<sup>③</sup>。清政府拒绝了沙俄的无理要求，伊格纳切夫便学着普提雅廷的故伎，愤愤离京，窜往上海，勾结英、法强盗，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他紧随英、法联军北上，百般挑唆怂恿，积极出谋划策。他将中国的种种重要情报密告英、法，并说：天津附近的“北塘毫无戒备，尽可进攻。”<sup>④</sup>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前夕，他把俄国特务固礼测绘的北京详图送给英法联军，并同他们一起研究攻城计划，指出“北京城防最薄弱的地点”<sup>⑤</sup>，便于英法联军攻打。

沙俄如此卖力地充当英、法的帮凶，目的是企图借英、法的武力威胁清政府，以便造成有利于俄国的局势，借以从中渔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对京城的军事示威行动，如果有成效”，“就会给俄国而不是给英国打开前进的道路”<sup>⑥</sup>。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三日，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奕詝逃往热河，由恭亲王奕訢在京维持局面。这时，跟着英法联军干了许多坏事的沙俄公使伊格纳切夫，突然摇身一变，以所谓“和平”使者的面孔出现，向清

<sup>①②③</sup>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9，第33—34、30—31页；卷40，第30页。

<sup>④</sup> 加迪：《法国在东亚扩张政策的根源》，纽约一九五四年版。

<sup>⑤</sup> 奥勒古：《1860年的对华战争》，一九〇一年伦敦版。

<sup>⑥</sup>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页。

政府表示可以出任“调停”，说什么：“俄国不惟不愿在中国千钧一发之时从中取利，且用友谊之态度援助中国。”<sup>①</sup>毛主席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sup>②</sup>沙俄嘴里的所谓“友谊”和“援助”，其实就是逼迫清政府向英、法屈服，并答应它的全部侵略要求。伊格纳切夫威胁清政府说：“为了拯救中国”，“必须立刻同意联军的一切要求”<sup>③</sup>。他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使英、法达到了侵略的目的。法国人曾满怀谢意地说：“我们全靠伊格纳切夫的斡旋，才使恭亲王迅速地作出决定。”<sup>④</sup>

英法联军离京后，伊格纳切夫就借口“调停有功”应有“报酬”，向清政府提出续约草案十五条，并声称所提条款“一字不能更易”<sup>⑤</sup>，只能签字画押。他公然以再次发动侵华战争相威胁，说什么：“你们国家与我国有一万俄里长的陆地边界，俄国在你们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给以不可抗御的打击都是轻而易举的事。”<sup>⑥</sup>而且，如果不接受这些要求，我们立刻可以把英法联军“再叫回来”<sup>⑦</sup>。昏愦无能的奕䜣在沙俄的威逼下，于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沙俄不仅迫使清政府承认了《瑷珲条约》的内容，而且还把《瑷珲条约》规定的所谓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① 转引自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130页。

② 毛泽东：《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毛泽东选集》第1389页。

③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大连一九〇二年版。

④ 易理逊：《一个译员的日记》，转引自加迪：《法国在东亚扩张政策的根源》，纽约一九五四年版。

⑤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8，第14页。

⑥⑦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大连一九〇二年版。

领土一口吞掉。

沙俄还在《中俄北京条约》中，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清朝设在境内城镇附近的常驻卡伦（即哨所）硬指为分界标志，把当时的内湖斋桑湖和特穆尔图淖尔（今苏联伊塞克湖）硬指为界湖，为进一步侵吞我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

中国西部边界原在巴尔喀什湖。十九世纪初，沙俄在中亚进行殖民扩张的同时，就开始觊觎中国的西部地区。一八三一年，沙俄西伯利亚和亚洲问题委员会讨论决定，把俄国的边界推进到中国的斋桑湖，直至卡伦线。一八三六年，就任西西伯利亚总督的戈尔恰科夫公然狂叫：从“政治上和商业上考虑，以及我国事业的一般利益，都坚决要求我们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南部，直到中国西部、喀什噶尔或东土耳其斯坦和当时独立的中亚细亚各国境内，牢固地立定脚跟”<sup>①</sup>。一八四六——一八四七年，沙俄武装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喀拉塔勒河、伊犁河等七河地区。一八五四年，沙俄又强占阿拉木图，把伊犁河下游一带据为已有。沙俄在武力强占中国大片领土的情况下，援引《中俄北京条约》关于勘分中俄西段边界的条款，逼迫清政府订约割地。一八六二年一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划界方针，决定在与中国谈判时，要坚持以常驻卡伦为界，并力争全部占有斋桑湖和特克斯河上游地区。同年八月，中俄双方代表在塔城举行谈判。在谈判桌上，沙俄代表巴布科夫坚持“不论中华边疆，只以常驻卡伦为界”的无理要求；在会外，沙俄军队一意执行沙皇的指令：“尽可能实际上占据符合俄国意图的国界线。”<sup>②</sup>一八六三年，沙俄分别在格根河、伊犁河、塔城附近等九个地方

<sup>①</sup> 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彼得堡一九一二年版，第3章。

<sup>②</sup> 同上书，第6章。

部署了侵略军，“逞兵挟制”。以武力为“后盾”的俄方代表更加猖狂，拿出单方面提出的划界方案，硬要清方代表签字画押，并狂妄地宣称：“如不照此办理，稍有更改”，就要“派兵强占”。清政府代表深感沙俄“动辄以用兵为词”，“欲趁我内外不能兼顾之际，有意寻衅”，“若不允其所求，必至立成决裂”<sup>①</sup>。沙俄通过政治讹诈和武力威胁，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勘界议定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其内容较之《中俄北京条约》更为恶毒，连《北京条约》中定为界湖的特穆尔图淖尔，也被划为沙俄的内湖。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沙俄在鲸吞中国大片领土的同时，还加紧对中国边疆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一八五一年和一八六二年，沙俄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和《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前者使沙俄取得在伊犁、塔城设立领事馆、免税贸易、自由居住和传教的特权。后者规定俄国商人在中国边界百里以内进行贸易完全免税，所谓“小本营生”的俄商在蒙古贸易也不纳税。俄国运货至天津及张家口只纳正税的三分之二，从张家口运货回国只纳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这些规定不仅使中国在税收方面受到严重损失，而且为沙俄在我国的西北、蒙古和东北边疆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创造了条件。

## 二、人民的反抗浪潮

面对着沙俄的野蛮侵略，反动腐朽的清政府推行投降路线，

---

<sup>①</sup>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9，第21—23页。

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出卖祖国的领土主权。但是，中国各族人民却始终坚持抵抗路线，为保家卫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浪潮，虽然分散而无统一领导，但参加的民族和阶层比较广泛，斗争形式灵活多样，给沙俄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沙俄的殖民侵略，点燃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抗怒火。一八五九年，以施沙穆勒夫为首的俄国侵略者窜到黑龙江左岸，烧杀抢掠，毁坏中国哨所，激起当地鄂伦春、赫哲、费雅喀等中国各族人民的无比仇恨。他们纷纷组织民间武装，奋起抗击沙俄侵略者，使这伙强盗不得不仓惶逃命。原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的中国各族人民，面对沙俄侵略军的进犯，散发传单，互相串连，积极组织抗俄人民武装，并警告沙俄侵略者，必须迅速撤离，否则，将受到中国人民的惩罚，或“成为俄殍”，或死于中国人民的“利剑之下”<sup>①</sup>。在刨夫（以采人参为业的贫民）徐得林等的串联下，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从乌苏里江到东南濒海地区的苏城一带，设营一百五十余座，星罗棋布，共约一万多人。他们主动向清政府要求抗战，表示：“俄夷肆逞，是欲绝我生路，同仇敌忾，义所必然，情甘出力。”<sup>②</sup>

一八六〇年二月，俄国侵略者窜至黑龙江左岸彪尔廓地方，向我赫哲族人民进行侵扰、抢劫活动，引起赫哲族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纷起与沙俄侵略者进行搏斗，打得侵略者狼狈逃窜。随后，有三十多户赫哲族人集体到黑龙江右岸，协助当地中国军队打击沙俄侵略者，为当地中国军队侦察情况，传送消息。

---

<sup>①</sup>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一八九一年版，第2卷。

<sup>②</sup>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0，第11页。

同年三月十五日，沙俄侵略者一百多人。分驾爬犁十八张，携带武器由奇咷进犯乌苏里江；不久，又有一批俄国侵略者入侵吉林黑河口包云地方。面对沙俄的进犯，当地人民立即组织起来，枕戈以待。当守卡官兵被沙俄侵略者逼离后，他们很快组织了三万多人，拿起武器，自动站岗守卡，阻击沙俄侵略者。沙俄侵略者吓得魂不附体，急忙托人求饶。

与此同时，吉林黑龙江一带各处城乡人民也纷纷组织团练，每十家选一户长。当时仅黑龙江左岸地区参加团练的人数就达一千三百七十七名，负责团练的户长达八、九十名。他们加紧训练，“无事则寓兵于农，不露声色；有事则众志成城，足资御侮”，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反侵略力量。他们有的还自备器械、带上口粮到珲春、绥芬一带，以捕渔打猎为名，相机打击侵略者<sup>①</sup>。

一八六八年，乌苏里江东南青岛（海参崴附近，今苏联境内阿斯科尔达岛）地方的渔民和淘金工人，不堪忍受沙俄的残暴统治，拿起武器，发动起义。他们同苏城等地人民联合，杀俄官，毁俄卡，一时将黄岛、石庙子、哈蟆塘一带俄卡全行烧毁，打得守卡俄兵非死即伤。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二、三千人，“扬言攻破海参崴”<sup>②</sup>。沙俄出动海陆军血腥镇压，并乱指中国人民为“匪”，大批逮捕，“拘入水牢”。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是中国人民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怒火却从未熄灭。直到九十年代，一个俄国殖民者那达拉夫到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调查，发现在当地居住的中国各族人民，仍然顽强地坚持中国的风俗习惯，不服从俄国的统治。他哀叹：“此等诸族统治甚难，常欲脱我羁绊。”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44，第2—3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8，第27页。

与东北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浪潮相呼应，西北各族人民也同沙俄侵略者展开了英勇斗争。

一八二五年，沙俄侵略军三百余人，在布尔昆德克的率领下，侵入我哈拉塔拉地区，扬言“择水草好处，筑城种地”，并妄图用金钱收买当地哈萨克公阿布拉。阿布拉回绝了侵略者的收买，并提出强烈抗议：“这里是中国的领土，不许你们侵占。”后来，中国边防巡逻队前往阻击，沙俄侵略者被迫离去<sup>①</sup>。

一八五三年，沙俄侵略军侵占我特穆尔图淖尔南岸、伊犁河下游一带，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抗。沙俄侵略军强迫居民给他们预备乌拉，我哈萨克族人民严加拒绝，说：“我们并未归顺你国，无中国吩咐，不能预备。”<sup>②</sup>

同年七月间，沙俄侵略者侵入我塔城地区附近的雅尔噶图金矿，杀害挖金矿工，引起当地居民极大义愤。八月二十六日，当地人民在矿工徐添堯、安玉贤的领导下，一下子聚集了六百多人，把塔城的俄国贸易圈子烧毁，沙俄侵略者狼狈逃窜。此后徐添堯、安玉贤等在塔城一带积极发动群众，准备与沙俄决一死战。但是，媚外卖国的清朝统治者，竟将徐添堯、安玉贤等拘捕监禁，致使这一斗争暂时消沉下去。

随着沙俄侵略者的步步进逼，特别是在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我西北各族人民反对沙俄霸占领土的斗争日益高涨，在人民群众反侵略声浪的推动下，驻西北边防的爱国官兵也奋起抵抗。

一八六三年六月十日，沙俄侵略者二百多人，携带枪炮弹药，闯入我博罗胡吉尔卡伦，被中国军队阻止，扫兴而退。十二、

① 《清道光实录》卷90，第30页；《史料旬刊》，第4期。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6，第2页。

十三两日，沙俄侵略军又连续向博罗胡吉尔卡伦进犯，并用大炮轰击边防哨所。中国爱国官兵为了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祖国的尊严，对入侵者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他们在武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机智果断地采用口袋战术，当敌人进入山谷后，埋伏于两旁山梁的爱国官兵，突然万箭齐发，打得侵略者大败而逃。但野心不死的沙俄侵略者，于六月三十日又派一千多侵略军进犯我博罗胡吉尔卡伦，结果仍被击退。七月四日，当敌人再次来犯时，爱国官兵奋死决战，前后激战五、六个小时，杀敌百余名。七月底、八月初，沙俄侵略者又接连三次向我博罗胡吉尔卡伦大举进犯，均被中国爱国官兵击退，先后歼敌一百多名，还缴获了敌人的大炮、炸弹、火箭多件。爱国官兵之所以能够在反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的取得胜利，这是与西北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的。

世代居住在西北边疆的我哈萨克、蒙古等各族人民，当祖国遭到沙俄侵略时，他们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自动协助爱国官兵守卫边疆。蒙古族扎萨克台吉图布新柯什克挑选精壮阿拉巴图（蒙语，青壮年之意）一千名组成战斗队伍，表示：一旦俄人“逞兵内窜”，我们“即带兵丁前来助守”<sup>①</sup>。哈萨克汗绰坦公阿吉台吉迪纳杂尔·苏勒坦针对沙俄的挑拨离间说：“倘有俄人前来调唆引诱”，我们“万不听从”，关于守边兵丁，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只要一声令下，立即“来城助守”<sup>②</sup>。居住在伊犁一带的哈萨克、布鲁特等各族人民，面对沙俄的武装侵略，团结一致，纷起打击来犯的侵略者。有的自愿参战“出力报效”；有的积极为部队做好后勤工作，“供给马羊”。沙俄对于配

---

<sup>①②</sup>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第33、31页。

合爱国官兵反击侵略者的我哈萨克、布鲁特人民恨之入骨，竟威胁清政府将这些人“俱行逐出，交伊（沙俄）办理，倘不交出，即在内地各处，任意捉拿”<sup>①</sup>。

西北各族人民除积极协助爱国官兵反击侵略者之外，还在沙俄侵占的地区内，自动组织起来打击侵略者。如布鲁特人鄂斯满、察尔根因不堪忍受沙俄的残暴统治，组织了一万二千多人举行起义，他们在松库勒地方与沙俄侵略者激战三昼夜，歼灭沙俄侵略军五十七人，打伤无数，迫使侵略者从察巴哈路上狼狈逃窜。

西北各族人民以各种各样形式反击沙俄侵略的斗争史实，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族人民热爱祖国，不畏强暴，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和压迫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 第三节 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勾结

#### 一、北京政变和“借师助剿”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在英国侵略者的支持下，近代第一个洋务派集团——恭亲王奕䜣集团和西太后叶赫那拉氏一起，在北京发动宫廷政变，杀了顽固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夺取了最高统治权。北京政变适应了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镇压革命、确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是清朝封建政权开始买办化的重要步骤。

---

<sup>①</sup>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9，第31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从清朝封建统治者那里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外国侵略者在几十年的侵华活动中，逐渐懂得了一个道理：他们尽管能够打败虚弱的清政府，却无力征服富于反抗精神的中国人民；他们深知，与其让清政府垮台，不如扶植它作为自己奴役和压榨中国人民得心应手的工具，以便“当这个政府还存在的时候，要他履行条约”<sup>①</sup>，把写在纸上的殖民特权变为现实。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说：“我们愿意在道义上支持现时当政的这个政府，它看来很有维持秩序和我们的条约权利的趋向，我们应赞成中国自行组织军队而雇用外人训练华兵关于平时与战时的技术”<sup>②</sup>。这就是说，侵略者为了实现不平等条约中的侵略特权，需要有一个能够镇压人民起义的清朝傀儡政府。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急于使尽全力去镇压汹涌澎湃的太平天国革命，另一方面又遭到俄、美支持下的英法联军的疯狂侵略。在内外双重压力下，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在如何挽救其统治危机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随着论争的激化，封建统治阶级开始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

顽固派主张以孔孟的“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维持封建统治。他们尊孔守旧，死抱住封建制度不放，反对任何变革，反对一切新鲜事物。这批人在中央以奕詝、载垣、端华、肃顺为代表，在地方以两广总督叶名琛为代表。洋务派是由一部分顽固派转化来的，他们面对着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认为外国侵略不过是“肢体之患”，农民革命乃是“心腹之害”。“两害

---

<sup>①</sup> 转引自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一九五二年第4、5期。

<sup>②</sup> 转引自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24页。

相权取其轻”。他们主张除了用“仁义礼信”等老一套办法外，还要勾结外国侵略者，以镇压农民革命，保持封建统治。这条路线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联各国之好”和“资取洋人长技”。这批人在中央以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湘、淮军阀为代表。

奕䜣是旻宁（道光）的第六子、奕詝的弟弟。他是清朝上层统治集团中最先对外国侵略者改变态度的一个。一八六〇年十月，奕䜣以御弟身份，代表清朝统治集团，向外国侵略者“示以坦白”之意，遂其“贪婪之心”，完全接受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外国侵略者由于他们的要求暂时得到了满足，订约后陆续退出北京。奕䜣在同外国侵略者的直接接触中，体会到外国侵略者并不想取代清朝的封建统治，而只是要清政府更多地拍卖民族主权，成为自己的驯服工具。他在《北京条约》签字后，多次赞扬外国侵略者，安定奕詝的惊恐情绪，提出一整套对外进一步投降、对内加紧镇压农民革命的反动路线。他大肆美化侵略者“并非争城夺地而来……谅不至心存叵测”。他特别感激洋人不把京城“据为已有”<sup>①</sup>，“并不利我土地人民”<sup>②</sup>，而仅仅是“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似属可信”<sup>③</sup>。侵略者即使还有要求，“而所请尚执条约为准”<sup>④</sup>。因此，他一再搬出孔老二的“忠”“信”教条，主张对侵略者“待以优礼”，“以信义为重”<sup>⑤</sup>，完全“按照条约”办事，“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sup>⑥</sup>，借助于外国侵略者，全力扑灭农民革命烈火，使清朝封建统治长治久安。奕䜣等人提出的这条路线，不仅表明已经掌握部分外交大权的洋务派，对外投降卖国，对内镇压人民革命的

①③⑤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9，第1—2页。

②④⑥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8页。

反动愿望，也反映了那些被太平军打得焦头烂额的地方督抚，急于投靠侵略者镇压革命的反动要求。

由此可见，从顽固派转化而来的近代第一个洋务集团——奕䜣集团，和顽固派一样都是以孔孟之道作为思想基础，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农民革命，顽固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集团。他们和顽固派的区别只在于买办成分的多寡和统治方法的差异。顽固派完全是封建式的，企图保持完整的封建主义统治。洋务派则是封建买办式的，充当着维护封建统治又能不断填满侵略者欲壑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外国侵略者对奕䜣等洋务派十分赞赏，大力进行笼络培植；相反，对载垣、端华、肃顺等顽固派却非常厌恶，竭力加以排斥。

外国报纸上称赞奕䜣等洋务派“极为明白清正，并深知通商之便”。英国驻广州的领事罗伯孙也称赞奕䜣等洋务派“开明”，说“他们开始重视外国同盟的价值，已看到中国利益如何深深地和别国利益缠在一起了”<sup>①</sup>。

但是，当时清政府的实权主要还不在奕䜣等洋务派手中，而是掌握在随奕䜣逃往热河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手中。这批人对奕䜣的影响很大，奕䜣等一再要求奕䜣“回銮”，他们竭力劝阻。一八六一年八月，奕䜣在热河病死，奕䜣的儿子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载淳年仅六岁，奕䜣遗诏命载垣等为赞襄政务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从此，他们进一步掌握了清朝政权，继续推行顽固派的路线。他们以北京驻有外国公使为词，坚持反对皇帝“回銮”，企图挟天子以号令，在热河总揽大权。外国侵略者认为这帮顽固派还不是他们理想的驯服的走狗，因

<sup>①</sup> 转引自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一九五二年第4、5期。

此急切地希望并积极策划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动，培植驯服的走狗——洋务派。英国公使普鲁斯说：“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sup>①</sup>

果然，英国侵略者的这种企图并没有落空。载淳的母亲叶赫那拉氏（一八三五——一九〇八年），原是奕詝的宠妃，她常常代替奕詝批答奏章，奕詝死后，载淳继位，二十六岁的那拉氏，被尊为慈禧太后，也称西太后。她企图趁载淳年幼之机，夺取最高统治权，因而同掌握清朝实权的顽固派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发生了矛盾。那拉氏为了与载垣等人争权夺利，爬上最高统治宝座，需要得到有英国侵略者作靠山的奕䜣等洋务派的支持。奕䜣为了夺取最高统治权，全面推行洋务派的路线，也急需借助那拉氏打击载垣等顽固派。这样，那拉氏和奕䜣等人便勾结了起来，在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开始了夺权斗争。他们首先授意御史董元醇上了一个奏折，提出“皇上冲龄，未能亲政”，“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且明确提出要“派近支亲王一、二辅政”，这就是公开要求那拉氏和奕䜣等人上台。但这种要求，遭到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为辞加以坚决驳斥，并策划搞掉那拉氏。对此，那拉氏、奕䜣等人当然不会甘心和坐等载垣等人来收拾他们。一八六一年十月，奕䜣在与英国侵略者密谋策划后，以奔丧为名，从北京赶到热河，与那拉氏密商回京发动政变，当那拉氏以疑问的口气问奕䜣：“奈外国人何！”奕䜣由于已“获得外使之保证与支持”，便马上向她保证：“外国无异议，

<sup>①</sup> 转引自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一九五二年第4、5期。

如有难，惟奴才是问。”奕䜣一再向那拉氏说明：外国侵略者“并无可怕之处，这方面他对太后回京负完全责任。”<sup>①</sup>奕䜣还大抓军权，竭力拉拢当时握有重兵驻扎于京、津一带的兵部侍郎胜保，取得他的武力支持。一切准备就绪，那拉氏等于十一月一日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公开发动政变，宣布由慈安（奕䜣的皇后，称为东太后）和慈禧两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处死了载垣、端华、肃顺，罢免了一批顽固派官僚；任命奕䜣为议政王，并掌管军机处，和外国侵略者经常打交道的桂良、文祥等人都担任了军机大臣。从此，那拉氏和奕䜣洋务集团掌握了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

那拉氏在处死载垣等人时，特别把他们“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和“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坚决反对“回銮”，列为重大罪状。这无异于表示，由那拉氏和奕䜣等人掌握的清政府，此后将放手地执行卖国求荣的投降政策。这个意图的宣告，使外国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北京政变发生后，普鲁斯立即向英政府报告说：在清政府中，“其表现最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恭亲王及其同僚之操权，乃是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这个令人感觉满意的結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他把政变的上谕称为“我们自和中国有关系以来最为有利的文件”<sup>②</sup>。他得意忘形地说：他们“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倾心于和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sup>③</sup>显然，在北京政变中，外国侵略势力起了很

<sup>①②</sup> 转引自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一九五二年第4、5期。

<sup>③</sup> 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71页。

大的作用，他们把媚外势力扶上了台，通过这些媚外势力进一步控制了清政府。普鲁斯供认：“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sup>①</sup>

由此可见，北京政变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朝封建买办势力相互勾结的产物，是清朝封建政权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步骤。在这个政变过程中，奕䜣洋务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是外国侵略势力在清政权内部的忠实走狗，是那拉氏爬上统治宝座的支柱。

这样，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北京政变，中外反革命势力开始结成反动同盟。联合镇压中国人民革命，建立和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是这个反动同盟的政治基础；联合尊孔是这个反动同盟的精神纽带。清朝封建统治者把卖国和尊孔结合起来，从孔孟之道那里去寻找投降卖国的根据；外国侵略者把侵华和尊孔结合起来，也从中国的孔孟之道的垃圾堆里去寻找侵华的遮羞布。他们从各自的反革命目的出发，共同利用这一反动的意识形态来奴役中国人民。

第二次鸦片战争刚一结束，奕䜣就积极鼓吹对侵略者要遵循孔老二的“信义”说教，推行“敦信和睦”的投降主义。洋务派在地方上的代表人物、汉族大军阀官僚曾国藩，大肆宣扬孔老二的“天命论”，借以掩盖他们投降外国侵略者的丑恶面孔。他胡说：“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sup>②</sup>就是说，外国资本主义之侵略中国，是老天爷安排的，是人力无法违抗、无法补救的，谁如果要赶走侵略强盗，那就是“代天作主张”，注

① 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71页。

② 曾国藩：《候选训导计棠稟呈豫中采访记略折》，《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3，第59页。

定是徒劳的。从这一反动谬论出发，曾国藩胡说，鸦片战争后，办理外交，错就错在不能遵守不平等条约，才招致外国的不断入侵。他搬出孟轲“师文王”的“遗教”，兜售儒家“小国师大国”的卖国哲学，大发崇洋卖国的谬论。他说对待外国侵略者，就应该遵照孔老二“言忠信”、“行笃敬”的反动遗教办事：一要“虚心相待，不宜少存猜疑”，“切不露傲惰之象”，也就是要彻底撤除民族界限，做外国侵略者恭顺而又勤奋的奴才；二要“以至诚相与”，“无欺诈之言”，也就是要牢记自己的奴才身份，对主子须完全忠诚老实；三要“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也就是要慷慨地出卖民族利益，满足外国侵略者的一切要求；四要“切诫西洋诸国，（对太平军）不可轻敌”，也就是劝告侵略者从清军的惨败中吸取教训，用全力镇压太平天国<sup>①</sup>。一句话，他认为措置外交事务，“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sup>②</sup>，并发誓要坚守这个媚外投降的原则，“守此而勿失”<sup>③</sup>，决不改变。在他看来，只要守住孔老二所传下的这四个字，对外国侵略者“但有和让，更无别义”<sup>④</sup>，就可以“借洋人之力”，镇压农民革命，挽救清朝垂危的统治。这充分暴露了他崇洋媚外的卖国贼嘴脸。

在外国侵略者方面，传教士、外交官、形形色色的“学者”、“作家”，也把西方宗教和孔孟之道揉合在一起，不断向中国人民散布。早在一八五二年以前，沙皇的御用文人、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传教士比丘林就吹捧“《四书》包括着关于道德和治国的最纯正的概念”。一八五八年，沙俄在给清政府军机处咨文中，公然把天主教和中国孔孟教条融合解释，说什么“此教使人友慈忍

<sup>①</sup> 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复周弢甫》、《复应敏斋观察》，《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0，第5—6页；卷9，第28—29页，卷30，第49页。

<sup>②③④</sup> 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8，第11页。

让，孝顺忠厚，诸事向善”；“即如中国至尊教者圣人，书曰，亦行有九德，故贤君必求才德之人，优待外国来使，则是益于国者，不能不为爱惜”。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也说：中国的“圣教文化，迥出于东方诸国之上，是以泰西各国，无不欣慕尊崇”。当时英国首相巴麦尊赤裸裸地宣称：“为英国利益之故，必须维持清政府及恢复中国内部的安宁秩序。”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中国文化的保护人，切齿咒骂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破坏了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机构”，扬言要让被革命人民赶跑了的“中国有教养、有名望的阶级”（指地主反动派）恢复“平民的天然领导者”的地位<sup>①</sup>。法国侵略者居然以“孔夫子号”给军舰命名，镇压太平军。就在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北京的一八六〇年，有记载说，英国侵略者“祀天主不敬神佛，此处庙塑，多被残毁，而独知尊重孔子，不



法国水师提督致苏松太兵备道照会

① 《英国公使普鲁斯报告》。

敢亵渎”<sup>①</sup>。外国侵略者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利用孔孟之道，支持清政府来绞杀革命的。

一个外国强盗，一个中国民贼，麇集在孔孟之道这面黑旗下，共同对付中国人民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共同镇压中国革命，主要表现在所谓“借师助剿”这个问题上。“借师助剿”是中外反动派合力绞杀太平天国，确保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共同需要。正如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孙所说的：“事实上中国的前途是很黑暗的，除非外边给他强有力的援助，这座房子就会倒塌下来，而我们最好的利益也就此埋入废墟。”<sup>②</sup>外国侵略者为了支撑清朝统治，维护和扩张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撕毁了伪装的中立面具，纷纷向清朝明确表示愿意“助剿”。《北京条约》刚一签字，法国代表葛罗就向奕䜣表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sup>③</sup>，宣称所有该国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沙俄驻华公使伊格纳切夫则面见奕䜣提出水陆两路“会剿”计划，说：“中国发捻横行，均由火器不得力，欲派数人来京，教铸枪炮，一并教演”<sup>④</sup>，并“请令中国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必可得手”<sup>⑤</sup>。美国也公开表示要援助清政府“压平内乱”。

在英、法、美、俄等外国主子一齐出动，公开撑腰打气下，清朝最高统治者于一八六二年二月发出上谕，正式确定“借师助剿”的反动方针：“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使臣

① 《庚申夷氛纪略》。

② 转引自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一九五二年第4、5期。

③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7，第55页；卷69，第22页。

⑤ 曾国藩：《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第11页。

商酌。……所有借师助剿，即着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

在这“中外（反动派）和好（勾结）”的过程中，曾国藩是一个在理论上极力鼓吹、在实践上极力促成“借师助剿”的代表人物。

曾国藩恬不知耻地宣称：外国侵略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攻进北京却不损害清朝的反动统治，同时还出兵帮助清廷“攻剿”太平天国，“二者皆有德于我”。为了报洋大人的“德”，替洋大人拔除侵略中国的最大障碍——太平天国革命，曾国藩就公开鼓吹“借洋兵助剿”。一八六〇年，沙皇向清廷表示愿意出兵帮助清廷“剿灭”太平天国，曾国藩就宣称刚从中国侵吞了大片领土的沙皇俄国与中国向来没有什么“嫌怨”，建议清廷同沙皇俄国共同商定出兵日期。一八六一——一八六二年间，当太平军向江、浙胜利进军，中外反动派被打得鬼哭狼嚎的时候，曾国藩更直截了当地建议清廷“借洋人之力，开诚布公，与敦和好，共保人财”<sup>①</sup>。曾国藩强调说，“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了<sup>②</sup>。

就这样，中外反动派基于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一致要求，进一步结成了军事同盟，穷凶极恶地扑向太平天国。

## 二、列强加强控制清政府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对清政府的控制加强了。为了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清政府的某些政权机构和对外关

---

<sup>①②</sup> 曾国藩：《遵旨通筹全局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8，第29页。

系也相应地出现了变化。这就是：

（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相互勾结的产物。过去，清政府在中央没有办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具体对外交涉事宜由两广总督兼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交涉事务，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为了有效地控制清政府，要求在中央设立专门外交机构。秉承外国侵略者的意旨，奕䜣于一八六一年一月初，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一月二十日，经正式批准，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这个衙门的头子，就是外国侵略者豢养的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䜣，以及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在总理衙门之下，分设南北口岸通商大臣。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的为北洋大臣，由奕䜣得力的帮手崇厚担任，驻天津；管理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各通商口岸通商的为南洋大臣，由署理钦差大臣（五口通商大臣）、江苏巡抚、洋务派大官僚薛焕担任，驻上海。后来南、北洋大臣规定由直隶、两江总督兼任，而直隶、两江总督的位置，几乎照例归湘、淮军阀所专有。这两个机构，完全是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同清朝统治阶级互相勾结的需要而设立的。奕䜣等供认，外国公使“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加上新开口岸很多，“地方辽阔，南北相去七、八千里，仍令其归五口钦差大臣办理，不独呼应不灵，各国亦不愿从”<sup>①</sup>。这就是说，清朝

---

<sup>①</sup>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9—20页。

统治者设立这些机构，完全是为了悉心而周到地为外国侵略者的利益效劳。

总理衙门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外交，同时还经管通商、海防、军务、关税等事务，后来甚至筑路、开矿、制造枪械军火等事务也都经管。它实际上总揽了整个“洋务”事宜，俨然成为一个权力大、职务广的清政府的中枢机关。外国侵略者甚至把它看作“帝国政府（指清王朝）的内阁”。它的设立，一开始就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欢迎和嘉许。当英国公使威妥玛从奕䜣那里探知设立这一机构的消息后，就“甚为欣悦”，认为这是“数十年求之不得”的事。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满口称赞说：“此实中外各国永敦睦好的最妙良法”<sup>①</sup>。清朝统治者特设这个机构，忠实执行卖国路线，对外国侵略者“一以忠信事之”（文祥语）。可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进行投降卖国活动的机构，是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独立主权的工具，是清朝政权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

## （2）外国公使驻京。

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一八六一——一八六二年，英、法、美、俄等国公使相继入驻北京，设立使馆。按照国际惯例，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互换使团，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外国侵略者在北京设立使馆，却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早在一八五五年，美国公使伯驾在谈到公使驻京的作用时，就曾露骨地说：

“中国政府，从远方不能驾驭，到了它的身边，它就变得驯顺多了”<sup>②</sup>。一八六〇年，英国侵略分子阿思本也说：“公使驻京实现

<sup>①</sup>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28页；《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钞本）第4册上，第680页。

<sup>②</sup> 转引自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5页。

以后，即可由清朝皇帝代替英国海陆军来执行警察任务，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并惩罚那些对外国人不完全顺从的官吏”<sup>①</sup>。由此可见，公使驻京是外国侵略者直接控制和驯服清政府的一种手段。外国公使都是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北京，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凌驾清政府之上，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一八六三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薛焕曾说：外国公使“始不过侵我利权，近复预我军事，举凡用人行政，渐行干预。”美国公使田贝也供认：“事实上外国的公使成了中国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监督条约的全部执行”，审定清政府“与外人有关的法律”，“为本国的‘创业者’攘夺各种各样的让与权利”，并通过“教育”方式把清朝官吏培养成洋奴买办，告诉他们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一定不许做，并“任意斥责一切对待外人不称职的中国官吏”<sup>②</sup>。

外国公使们为了把清政府“牢靠地和西方缚在一起”，使它“欲退不能”，还力劝清政府派遣使节出国“访问”。当英、法、美、俄公使入驻北京的时候，清政府还没有向外国派出使节。在外国驻华公使多次要求下，一八六七年清政府才第一次正式派出使节。但这一次出使，却是外国侵略者愚弄清朝统治者的一幕滑稽丑剧。这一年，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蒲安臣卸任回国，昏庸腐朽的清政府听信这个家伙愿为中国“出力”的花言巧语，加上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对总理衙门的授意，蒲安臣即被聘为“办理各国外交涉事务大臣”，次年以“大清国钦差大臣”的头衔，率领由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和两个中国官员组成的中国“使团”，先后出使美国、英国、德国、俄国；蒲安臣并非法代表清政府和

---

① 阿思本：《英国对华关系的过去和未来》。

② 《中国及其人民》。

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订条约八款》（即《蒲安臣条约》），为美国侵略者从中国掠卖华工，在中国设立学堂扩大文化侵略，开辟了道路。后来因蒲安臣在俄国死去，这出丑剧才告结束。这一国际交往史上绝无仅有的奇闻怪事，充分说明外国侵略者对清政府的操纵控制，在短短几年中发展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

### （3）外国侵略者把持中国海关。

在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的过程中，海关起着重要作用。一八五三年九月，上海小刀会起义后，上海海关被捣毁，外国侵略者借口代征税金，于九月九日，乘机夺取了上海海关管理权。一八五四年六月，上海道吴健彰与英、法、美三国领事商定上海海关章程，决定由三国领事各推委员一人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上海海关，而由英国人威妥玛负总责。几个月后，威妥玛去职，由英国人李泰国接任。直到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签订以前，中国海关只有上海一处为外国人控制，但这一年外国侵略者抓住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各口划一办理”的含混规定，硬要把上海海关所实行的办法推行于其他各口岸，上海以外各口也须请外国人“帮办税务”。这显然是无理要求。但媚外卖国的清政府，事实上接受了这种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他们说什么“如别口不用外国人帮办，又恐事不划一，洋商必致借口，易启事端”<sup>①</sup>。一八五九年，由两江总督何桂清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并授权他“选募”其他各口所用的外国人。一八六一年一月，又改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任命。一八六三年，李泰国去职，由英国人赫德继任总税务司，他控制中国海关

<sup>①</sup>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32—33页。

长达四十五年之久，直到一九〇九年才去职回国。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上，赫德是一个重要角色。一八六五年，在北京正式设立了总税务司署，赫德常驻北京统辖全国各海关。与此同时，中国沿海各商埠和长江沿线各口岸共达三十余处，也先后实行了由外国税务司控制的海关制度。从此，中国的海关完全落入外国侵略者之手。

半殖民地的中国海关制度，主要是由李泰国和赫德一手制定和推行起来的。按照规定，清政府在各通商口岸派一海关监督为该口通商事务最高行政长官，税务司只是海关监督的助理，总税务司由总理衙门领导，向它负责。但实际上，由于总税务司掌握了各口外国人“选募”的人事大权，除各口税务司外，副税务司、帮办等高级职员均选外国人担任，他们只对总税务司个人负责。因此，总税务司和各口税务司，实际上都凌驾于清政府各口海关监督之上，连总理衙门也无法干涉。这样，外国侵略者控制下的中国海关，形式上是清政府的机构，实际上却成了外国侵略中国的机构。赫德就曾经直言不讳地供认：总税务司署“与其说……具有本地机关的性质，还不如说它具有外国机关的性质；它简直是一种外国政府的办法，而不是渊源于中国当局的”<sup>①</sup>。而总税务赫德，由于他的“至高无上”的职权和广泛的侵略活动，更得到各国侵略者的信任和支持，实际上成了各国特别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

外国侵略者通过总税务司和各口税务司，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进行了广泛的侵略和干涉：

第一，控制清政府的财政命脉。经过对外战争和国内农民

---

<sup>①</sup> 《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34页。

革命的沉重打击，清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盐税和田赋大量减少，而对外的巨额赔款以及大量战费和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的费用却有增无减，因而这时海关收入就更形重要，甚至成为清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外国侵略者控制了海关，虽然收入每年仍交清朝国库，但却是借用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来支持为他们效劳的反动政权。以后外国侵略者又用海关收入作为对外赔款、借款的抵押。这样，外国侵略者掌握了清政府的财政命脉，“左袒西商”，为倾销外国商品大开方便之门，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因此，海关大权落入外人之手，就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

第二，干涉中国内政。总税务司署实际上是外国侵略者在政治上操纵清政府的一个机构。中国海关的“洋员”，一方面背后有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又是清政府所雇用的办事人员。这种特殊条件，使他们较之各国驻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并支配中国的政治。一个名叫马士的美国人说：总理衙门“在一切国际问题上，从谈判一件条约直到解决一项土地争端，……总是凭靠北京总税务司的忠告和协助，而总督、巡抚和道台们则总是征询各口税务司的意见，以便照计而行”<sup>①</sup>。总税务司赫德实际上成了清政府的最高顾问。他经常以向清政府提出“建议”和“劝告”的方式，进行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而反动腐败的清政府则甘心俯首听命。此外，清政府颁布重要的法律、法令必须在事前征得总税务司的同意，否则便不能在海关行使。甚至清政府在决定中国封疆大吏的任用上也要听取赫德的意见，例如，清政府在一八六七年任命的四川和云贵

---

<sup>①</sup>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16页。

总督就是根据他的意见行事的。

第三，操纵中国的外交。自税务司制度确立之后，清政府的许多重大外交活动大都有总税务司或其他海关“洋员”参与，并为他们所左右。英国公使普鲁斯就说过：“李泰国不仅可以帮助清政府处理商务和海关，而且可以作为一个外交事务上的可靠顾问。”<sup>①</sup>一八七六年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清政府以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赫德被任命为助理，但事实上是“一切唯赫德是听”，卖国贼李鸿章也说：“我不过随同画诺”而已。由此可以看出，总税务司在清政府外交活动中的支配作用。

第四，镇压、破坏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海关税务司，在中外反革命势力共同绞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扮演了极端反动的角色。他们替英国使馆收集大量情报，英国使馆供认：“一切必要的消息都可以从海关那里得到。”<sup>②</sup>他们多次向清政府建议购买外国的洋枪、洋炮和轮船，用以和太平军作战，并积极促使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直接的军事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外反动势力的进一步勾结，太平天国面临着中外两方面的凶恶敌人，斗争任务是更加艰巨了。

---

<sup>①②</sup> 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85、201页。

## 第四章

# 太平天国英雄们 为保卫农民政权而斗争

## 第一节 粉碎反革命政变和 发动防御中的攻势

### 一、短命的反革命政变

一八五六年秋，正当农民革命蓬勃发展的時候，在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发生了短命的反革命政变。

在太平天国内部，一直存在着以洪秀全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和以一小撮叛徒、阶级异己分子为代表的投降路线的激烈斗争。斗争的焦点始终是：坚持团结、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还是大搞分裂、向地主阶级投降。这是社会上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太平天国内部的反映。天京政变，正是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尖锐表现。

太平天国从广西崛起，并迅速跃进到长江流域，犹如大海的怒涛，猛烈地冲击着清朝封建统治的基础，清朝营垒上至奕詝下至大小地主，无不胆颤心惊，深感面临着灭顶之灾。有一个美国侵略分子说：照现在形势来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太平天国的胜利，“有之，惟内讧而已”<sup>①</sup>。奕詝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

<sup>①</sup> 佚名：《天京见闻》，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华北先驱周报》。

更加积极地指使其爪牙采取“打进来”和“拉出去”等手段，妄图分化瓦解革命队伍，破坏革命领导集团的团结，以便消灭太平天国革命。

适应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反革命需要，隐藏在太平天国内部的阶级敌人，兴风作浪，加紧进行颠覆活动。在太平天国管辖区，革命的洪流曾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向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但是却没有能够把它们淹没和冲毁。封建土地制度被打乱了，地主阶级已被击溃，可是都并没有被消灭。地主士绅们还部分的保留着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他们有的公开或秘密的组织团练，负隅顽抗；有的混入革命队伍，钻进各级政权，保护同类，收买叛徒，“欲谋内讧”。他们的作法虽有不同，目的却是一致的，即配合清军推翻农民政权，复辟自己已失去的“天堂”<sup>①</sup>。

面对着日益激化的阶级斗争形势，太平天国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也急剧地尖锐起来。站在正面的是洪秀全，站在反面的是韦昌辉、石达开。

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本来是两个阶级异己分子。他们

<sup>①</sup> 如：“（咸丰六年）二月初五日，伪监军柯景春踞永新，……邑绅陈师锐、师锋、之愈，往湖南乞师，乡民各潜结乡团以应。”（同治《永新县志》，卷15）

据张德坚说：“更有略涉经史，好谈古今，心高志大，自恃才具非常，目空一切，视世间事无可当意者。不幸裹入贼中，必有一二事足以服贼而惊众，渐至柄用，遂得行其意矣。……更笼络其上而恩抚其下，一朝毛羽丰满，则思别树一帜，不齐不楚，中立自雄，……亦有读书明理之人失身其中，……未尝不欲谋内讧，通消息，顾力或不逮，不免曲意逢迎，渐谋亲信，庶可得当以报我军，或游说渠魁翻然来归，事即未效，心则无他。”（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1，《太平天国》第3册，第295页）

再如：江西宜春地主绅士易言颺、袁锡琦等人，窃据乡官要职，勾结太平军的叛徒，出卖了宜春城（同治《宜春县志》卷5）。湖北秀山黄德生，混入太平军当了仪征守将，但因其家庭被镇压，“刻思报复”，暗通江北大营，密谋杀害革命者（倪在田：《扬州御寇录》卷上，《太平天国》第5册，第104页）。

侧身革命并不是为了实现拜上帝会的革命理想，而是图谋利用革命力量建立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建都天京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搏斗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韦、石的地主阶级本性就更加明显的暴露出来。他们加紧策划分裂活动妄图颠覆农民革命政权，复辟地主阶级专政。在他们看来，阻碍自己实现“飞龙之志”的，一是天王洪秀全，二是东王杨秀清。洪秀全是农民革命航船的舵手，杨秀清掌握着太平天国的军政实权。要篡权复辟，就必须改变洪秀全的革命路线，取杨秀清而代之。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都采取了两面派的策略。毛主席指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sup>①</sup>韦、石正是这样。他们对洪、杨“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打着天王的旗号反对天王，假“革命”之名行叛卖之实。

韦昌辉素以“阴柔奸险”<sup>②</sup>著称。他虽“贵为列王”，却“常贩运货物以营私”<sup>③</sup>，贪婪地聚敛财富和追逐官爵利禄。他对洪秀全竭力逢迎，对杨秀清百般谄媚。“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sup>④</sup>韦昌辉以表面上的恭顺，来麻痹洪秀全和杨秀清的警觉性，掩护自己篡权复辟的阴谋活动。他在暗地里，广结党羽，加紧磨剑，窥测方向，伺机而动。杨秀清对韦昌辉的阴谋也略知一、二，遂加意防范，“分其权”于石达开<sup>⑤</sup>，并常常假借天父下凡来压制他。当时湘军的特务机关已经看出，杨秀清与韦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併吞之事”<sup>⑥</sup>。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98页。

②⑥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太平天国》第3册，第47、48页。

③ 凌善清：《韦昌辉传》，《太平天国野史》卷12。

④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66页。

⑤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69页。

石达开同韦昌辉一样，对洪、杨表面上“尊奉”“若神明”<sup>①</sup>，实际上“口顺而心怒”<sup>②</sup>。他修正洪秀全的农民革命路线，“假仁义以笼络天下”<sup>③</sup>。他在安徽、江西、湖北等省，鼓吹孔孟“仁政”，用所谓“春秋大义”劝谕汉族绅衿和反动儒生出任官职<sup>④</sup>，控制太平天国基层政权，破坏对地主阶级的专政。他的倒行逆施，颇受反动儒生的赞扬，说他“性较和平”<sup>⑤</sup>，因变更太平天国的所谓“苛制”，使地主豪绅“少受害”<sup>⑥</sup>。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基于复辟的共同愿望，韦昌辉和石达开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他们“密议，杀东（王）一人，杀其兄弟三人”<sup>⑦</sup>。他们谋杀杨秀清，是为了扫清夺权的道路，最终推翻洪秀全的领导。但是，洪秀全是在当时农民革命的激流中，作为一个阶级的代表，群众的代表，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承担起领导革命的重任的。他同广大农民群众命运与共，休戚相关，血肉相连，若动摇他的地位，便是打击群众，打击革命，必然激起群众的愤怒，引起尖锐的斗争。

一八五六年秋，韦、石利用杨秀清逼洪秀全封“万岁”所造成的局势，发动了天京反革命政变。

在建都天京前后，杨秀清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不起孔孟之道和封建法权思想的腐蚀，滋长了居功自傲、个人权威的思想，开始偏离了洪秀全的革命路线。这主要表现在尊孔和擅权两个方面。早在洪秀全率领太平军进入两湖，沿途焚“学宫”、砸孔丘牌位的时候，杨秀清就在武昌搞了一次“祀孔”活动。据地主文人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太平天国》第3册，第48页。

②⑦ 《李秀成自供》。

③ 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卷13。

④ 刘文藻：《洪秀才》，《诗舫存钞》卷4。

⑤⑥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69、670页。

记载，他“具衣冠谒圣，行三跪九叩礼。又将武昌府学，用红缎金书‘天朝圣宫’四大字作匾额”<sup>①</sup>。及至建都天京，正当洪秀全向孔孟之道发起总攻击，宣布焚禁《四书》、《五经》时，他又假借天父下凡，胡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sup>②</sup>。跟着尊孔而出现的，便是擅权。他“自恃功高，一切专擅”<sup>③</sup>，利用代天父传言的权力，独断专行。他“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数其‘罪’而杖责之”<sup>④</sup>。他既折辱天王，又压制起义有功将领，借以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

一八五六年八——九月间，太平军攻破清朝江南大营，天京城围暂解，革命声威大振。杨秀清被胜利弄得飘飘然起来，似乎肘腋之患已去，天下便可太平无事了。他假托天父下凡，公然“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sup>⑤</sup>，图谋建立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这就严重地破坏了领导核心的团结，给暗藏的敌人夺权复辟以可乘之机。野心勃勃的韦昌辉，立即打起“拥护天王”的旗号，带领心腹武装于九月一日深夜从江西秘密赶回天京，并将队伍迅速而严密地布置在城内要塞，然后对东王府发动突然袭击。杨秀清猝不及防，在九月二日凌晨，被韦昌辉刺杀。杨秀清死了，但韦昌辉并未歇手，他乘机扩大事态，继续挥舞屠刀，残杀城内对革命忠心耿耿、精明练达的干部、战士及其无辜家属。天王派人责备韦昌辉擅自乱杀，命令他：“毋乃伤天父好生心，以宽纵为宜。”<sup>⑥</sup>但是，韦昌辉怙恶不悛，竟然说什么“我为渠除大害，

① 江夏无锥子：《鄂城纪事诗》，《太平天国资料》第39页。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2，《太平天国》第3册，第327页。

③④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太平天国》第3册，第46、45页。

⑤ 《李秀成自供》。

⑥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704页。

今反责我而欲沽名耶？”<sup>①</sup>他名曰为天王“除大害”，实则干着反对天王、夺权复辟的罪恶勾当。在他的屠刀下，有两万多人死去了，老弱妇孺都未能幸免。这种兽性的大屠杀，正是地主阶级对革命农民发泄其刻骨仇恨的表现。象这样大规模地消灭革命力量，破坏革命的中坚，是清朝反革命武装在战场上所做不到的，现在却被隐藏在革命内部的野心家、阴谋家做到了。韦昌辉用血腥的双手控制了天京，独揽了军政大权，进而干脆扔掉“拥护天王”的旗号，举兵围攻天王府，妄图加害洪秀全。很显然，韦昌辉发动这场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并不只是为了取代杨秀清的地位，而是蓄谋夺取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政权。韦昌辉用自己亲手制造的反革命暴乱，揭穿了自己所标榜的“革命元勋”的画皮，激怒了太平天国广大军民。十一月，洪秀全依靠天京军民的力量，处死了罪大恶极的野心家韦昌辉，镇压了反革命叛乱，稳定了局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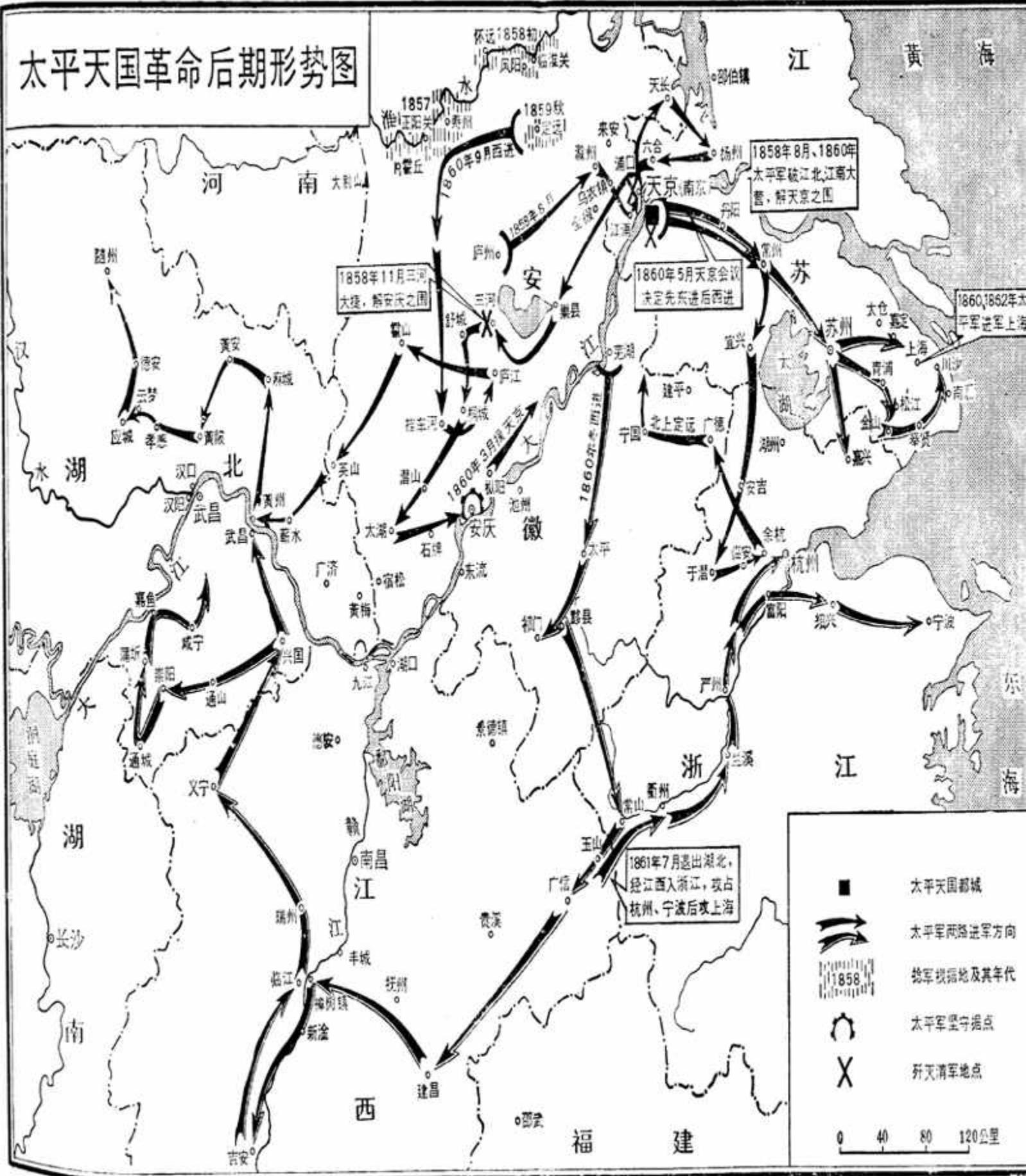
正当韦昌辉的兽性大屠杀刚刚歇手，石达开从武昌前线赶回了天京。韦昌辉为了独占政权，顿起杀机，想把石达开干掉。石达开闻讯逃走，韦昌辉竟将其一家老小全行杀害。石达开为了报私仇和抢夺政权，至安庆起兵讨韦。他“上奏于天王，要求韦昌辉之头”，还凶相毕露地威胁说：“如不得其头，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sup>②</sup>洪秀全处决韦昌辉后，石达开怀着不可告人的野心回到天京。曾国藩认为石达开是“挟诡诈以驭众，假仁义以要民”<sup>③</sup>。左宗棠说：“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

①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704页。

② 布列治门：《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一八五七年一月三日《华北先驱周报》，《逸经》第17期。

③ 曾国藩：《江西近日军情据实复奏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0，第41页。

## 太平天国革命后期形势图





会邪教俚说。”<sup>①</sup>他既然反对拜上帝会的革命理想，而大肆鼓吹孔孟的“仁政”，那么，他的“驭众”、“要民”就只能是为了擅权，破坏对地主阶级的专政。但是，血的教训使洪秀全对石达开提高了警惕。洪秀全亲自主持军政大计，注意防范石达开，“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sup>②</sup>，从而挫败了他的罪恶图谋。石达开极为不满，于一八五七年六月，离开天京，公开分裂革命，妄图独树一帜，割地自雄。他沿途张贴布告，一面向群众散布对天王的不满，煽动分裂太平天国；一面继续打着太平天国旗号，标榜自己对革命忠贞不二，把自己的分裂出走说成是为了报答天王的“恩仁”<sup>③</sup>。他这样作的目的无非是既要搞分裂，又要欺骗太平军将士，掩盖其叛卖革命的实质。起初，确有好多人因不明真相，受骗上当。吉庆元等上天王奏就说过：“小臣等始则信翼王亲奉密诏转回粤西，招纳英俊，广罗贤辅，作我陛下股肱心膂。”<sup>④</sup>石达开用诱骗手段，裹胁走十多万太平军精锐部队，决定远征四川，自立一国。他在军事上放弃江西根据地，避开敌军主力湘军，陷于无后方的流动性作战的困境中；在政治上肆意更改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其动静行为，多滋物议”<sup>⑤</sup>。他顽固坚持分裂路线，压制觉悟到受骗上当的部下，杀害力主重返天京、维护革命路线的将领。但是，血腥的镇压，并不能动摇革命将士反对分裂的决心。吉庆元等将领始则劝石达开“反旆回京，共匡王室”，继则率部“万里回朝，出江扶主”<sup>⑥</sup>，与在江西的太平军会师，重新为太平天国革命事业贡献力量。这支部队后经天王命名为“扶

① 左宗棠：《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4，第17页。

②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704页。

③ 《石达开布告》，《太平天国》第2册，第694页。

④⑤⑥ 《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3期，第6—7页。

朝天军”，以示褒奖。

一八六三年五——六月，石达开率领的部队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陷入清军重围。石达开竟然致书清总兵唐友耕，假革命之名以行叛卖之实。他无耻吹嘘自己是不事“二主”的“忠臣”，“舍命以安三军”的“义士”<sup>①</sup>。其实，他嘴里讲什么“舍命”，心里想的却是“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sup>②</sup>；他名曰“安将全军”<sup>③</sup>，以“救众人”，实则“俱令（将士）弃械投诚”<sup>④</sup>，硬给他们戴上奴隶的枷锁。他诋毁农民领袖洪秀全，却把“仁德普天，信义遍地”<sup>⑤</sup>的桂冠戴在杀人魔王唐友耕的头上。他甚至向载淳屈膝称臣，发出“请主宏施大度”<sup>⑥</sup>的哀号。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叛徒的丑恶灵魂，跃然纸上。六月十三日，石达开投奔清营，乞求活命，六月二十五日，在成都作了四川总督骆秉章的刀下鬼。

韦昌辉、石达开的叛乱、分裂活动，是混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阶级异己分子向农民革命的一次猖狂进攻。这个事件是当时日益激化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斗争，在太平天国内部的反映。韦、石的阴谋如果得逞，势将导致太平天国的变质和地主阶级的复辟。但是，广大的农民和太平军将士，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革命，反对复辟的。他们在自己的领袖洪秀全的领导下，迎头痛击了韦、石掀起的复辟逆流，镇压了韦昌辉的叛乱，反对了石达开的分裂主义，消除了埋藏在领导核心的一大隐患，保卫了太平天国革命事业。

当然，韦昌辉的野蛮屠杀和石达开的分裂出走，也给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事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它损伤了革命的元气，迫使太平军在东西两线的进攻停顿下来，使敌人得到喘息和反

<sup>①③⑤⑥</sup> 《石达开致唐友耕书》，《太平天国》第2册，第759、760页。

<sup>②④</sup> 《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781页。

扑的机会。奕詝一再叫嚷：“乘其内乱，次第削平。”西线湘军卷土重来，侵占武昌、汉阳，顺流东下，进窥九江、安庆。在东线，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掘长壕围困天京。至此，革命形势急剧逆转，太平军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

## 二、团结战斗，“革故鼎新”

在革命遭受挫折、敌人日益猖獗的形势下，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扭转危局，推进革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天王洪秀全既没有被内部敌人的叛乱分裂活动所吓倒，也没有被外部敌人的气势汹汹所慑服，他勇敢地肩负起力挽狂澜的重任。

洪秀全根据旧的领导核心已经分裂，而革命又迫切需要加强领导的实际情况，首先致力于重建新的领导核心。他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sup>①</sup>，自任军师，总理国政。他于一八五八年恢复前期五军主将制，选拔忠心耿耿、战绩卓著的青年将领陈玉成为前军主将，主持军事工作；任命老臣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sup>②</sup>。这就初步改变了“国政不能划一”<sup>③</sup>的局面，“稍可自立”<sup>④</sup>。一八五九年，洪秀全晋封洪仁玕为干王，陈玉成为英王，希望他们扶佐天朝，使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

洪仁玕在金田起义后，曾赶到广西浔州，因太平军已转战永

---

① 《福音敬录》，《太平天国》第2册，第514页。

②③④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1页。



一八五九年刻《资政新篇》封面

安，没有来得及追上革命队伍。由于清军追捕，从一八五二年起，他避居香港，在西方传教士处教书，并学习天文、历数，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但他心中仍念念不忘参加革命，一八五四年曾到上海，想去南京，由于沿途为清军所阻，无法到达。一八五九年初，他才由香港辗转到达天京，终于投入太平天国的怀抱。这种生活经历，使洪仁玕一方面具有革命抱负，但因没有受到革命战争的洗礼，不大了解广大农民群众的最迫切的要求；另一方面，他较多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看到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些发展趋势，但因和西方传教士为伍而受到毒害，又模糊了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这两个方面，决定了洪仁玕思想的独特色彩。洪仁玕就任干王总理朝政后，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企图使太平天国壮盛起来的计划——《资政新篇》。他说自己写《资政新篇》的原则是“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所谓“立政”，就是建立政治制度，制定政纲。所谓“取资”，“其要在于因时制宜，审势

而行而已”<sup>①</sup>。他根据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的逆转和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现实，要求太平天国学习西方，进行某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借以巩固农民革命政权，使“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sup>②</sup>。洪秀全“图治大急，得策则行”<sup>③</sup>，经过逐条审批，然后作为纲领颁布全国。因此，可以说，《资政新篇》虽然是洪仁玕提出来的，但也反映了洪秀全晚年的政治思想趋向。

洪秀全、洪仁玕针对奕詝、曾国藩和韦昌辉、石达开等内外敌人大搞“克己复礼”的现实，大力重申前期提出的“革故鼎新”<sup>④</sup>的革命主张。革故就是坚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反对封建统治，鼎新就是要实现“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sup>⑤</sup>的美好理想。

革故鼎新在政治上表现为坚持用农民政权取代地主政权。针对阶级敌人颠覆农民政权的阴谋，农民英雄们大力宣传洪秀全率领群众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农民政权的神圣性。他们要求全体军民认清“目前些有妖猖獗，欲试弟妹坚耐心”，号召大家团结在洪秀全的周围，经受艰难困苦的考验，坚持不懈地进行武装斗争，“同打江山同扶主”，“同心合力灭妖精”<sup>⑥</sup>。洪仁玕在《资政新篇》里主张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政权，既要实行中央集权制，“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sup>⑦</sup>；又要反对封建专制的倾向，要求办报纸，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

---

①②③⑦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第2册，第523、524、539、532页。

④ “革故鼎新”这个口号，最早见于一八五三年洪秀全旨准颁行的《诏书盖玺颁行论》，一八六一年在洪秀全钦定的《英杰归真》里，又予以重申。

⑤ 洪仁玕：《英杰归真》，《太平天国》第2册，第589页。

⑥ 《醒世文》，《太平天国》第2册，第504、505页。

的新闻官和意见箱，使“人心公议”，“由众下而达于上位”，作到“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sup>①</sup>。这种中央集权和民众公议相结合的主张，是他针对当时“事权不一”<sup>②</sup>的错误倾向，采择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某些精神而提出来的。这对“禁朋党之弊”<sup>③</sup>，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团结广大群众于农民政权周围，争取革命的胜利，都是十分必要的。

革故鼎新在经济上表现为坚持反对封建土地制度，发展资本主义。针对内外敌人复辟被太平天国打乱了的封建土地制度的阴谋，洪秀全不仅重印《天朝田亩制度》，而且批准洪仁玕提出的《天朝则例》<sup>④</sup>，继续动员农民群众为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实现“田产均耕”<sup>⑤</sup>的理想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洪秀全接受了洪仁玕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建议。洪仁玕在《资政新篇》里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近代交通、工矿、金融事业，奖励发明，保障专利，准许“富者”投资和“请人雇工”<sup>⑥</sup>。洪仁玕提出这种主张固然是适应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开始破坏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历史趋势，但主要还是由于受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影响。洪仁玕希望太平天国能象英、美那样富强起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内建天国，外御列强，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洪秀全接受这种建议，表明他具有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强烈愿望。但是，由

---

①③⑥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第2册，第534、532、524、536页。

② 洪仁玕：《立法制谊谕》，《太平天国史料》第147页。

④ 《天朝则例》规定：“男子十六岁以上，每丁耕田十亩，纳赋米三石六斗六升，钱三百六十六文。”转引自范烟桥：《太平天国时的笔记选录——〈燐血从钞〉》，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

⑤ 《一八五四年六月太平天国东王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文史》第一辑（一九六二），第72页。

于缺乏实现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资政新篇》关于兴办资本主义企业的主张，并没有付诸实施，没有也不可能把旧式的农民革命引上新的道路。

革故鼎新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坚持用农民革命思想反对地主阶级思想。洪秀全在一八六二年批准颁行了《太平天日》，把早年创作的“皇上帝”鞭打孔丘的神话故事，经过精雕细琢，思想性和艺术性大大提高以后，正式公布于众，给了太平天国内外敌人掀起的尊孔逆流以迎头痛击。洪仁玕也明确提出要革故鼎新，就必须把“所有邪说异端”“革除净尽”<sup>①</sup>。他继承和发扬洪秀全的革命精神，批判孔孟之道和封建神权，为巩固农民政权奠定思想基础。他赞扬洪秀全删改《四书》、《五经》的活动，认为这是防止“其诱惑人心，紊乱真道”<sup>②</sup>的必要步骤。他批判孔老二的中庸之道，说“儒教贵执中，罔知人力之难”<sup>③</sup>，反对调和矛盾，主张斗争；批判轻视人的作用，强调依靠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他还针对曾国藩“神道治幽”的狂吠，狠狠地批判了封建神权。他指出一切偶像都是人手雕塑制造的，是“愚人所思想以愚弄愚人”的，人们所以会愚蠢地崇拜自己亲手制造的偶像，“实为利欲所昏，故魔鬼得入其心，而以祸福悚之耳！”<sup>④</sup>他认为封建迷信无益于“民生国用”，要使国家去衰弱而致富强，就必须破除“千奇百怪，鬼样邪形”<sup>⑤</sup>的偶像崇拜。

洪秀全、洪仁玕还反对孔孟之徒“不务实学，专事浮文”<sup>⑥</sup>的学风。洪秀全主张行文“要实叙其事，……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但有虔恭之意，不须古典之言”<sup>⑦</sup>。洪仁玕

<sup>①⑤</sup> 洪仁玕：《英杰归真》，《太平天国》第2册，第587、585页。

<sup>②④⑦</sup> 洪仁玕：《军次实录》，《太平天国》第2册，第616、615、617页。

<sup>③⑥</sup>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第2册，第526、525页。

指出“浮文”、“八股六韵”<sup>①</sup>不适用于处理政治问题，不能如实的表达思想，因此，对革命事业有害无益。他认为必须提倡“文以纪实”的精神和“朴实明晓”的文风，“施行正道，存真去伪，一洗颓风”<sup>②</sup>。一句话，语文必须为当前现实的革命政治服务。

洪秀全、洪仁玕的“革故鼎新”主张，是以朴素辩证法观点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洪仁玕认为“事有常变，理有穷通”<sup>③</sup>，“物必改而更新，理之自然者也”<sup>④</sup>。在这里，他指出了“变”是原因，“新”是结果，只有变，才能新，从而论述了“革故鼎新”的合理性，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他们的这种“革故鼎新”和“事势常变”之理，对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来说，确实是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要求的一种极其深刻的反映。

### 三、三河大捷，东征凯歌

洪秀全组成新的领导核心和坚持革故鼎新，是太平天国在防御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洪秀全综观当时的战局，认识到制止清军进犯天京，解除肘腋之患，是摆在太平军面前的首要任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攻势防御，在西线击溃湘军，保住安庆，控制安徽；在东线消灭江南、江北大营，解除天京之围。为着实现这个战略目标，首先，洪秀全力扩军，不仅使实力受到严重损耗的太平军得到新的补充，并且积极联络活跃在淮河流域的捻军，封捻军首领张乐行为征北主将，争取捻军和太

① 洪仁玕：《军次实录》，《太平天国》第2册，第616、608页。

② 同上书，第616页。

③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第2册，第523页。

④ 洪仁玕：《英杰归真》，《太平天国》第2册，第589页。

平军在统一的旗帜下并肩作战；其次，洪秀全使太平军主力在一个时期集中于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以求速战速决，聚歼敌人。

一八五八年，洪秀全指挥太平军进行了浦口和三河两次战役，迭挫强敌。

一八五八年，天京的军事形势非常紧急。江南、江北大营隔江呼应，进逼天京，截断天京的交通和粮道。天京危急，影响整个战局。七月下旬，洪秀全号召太平军各地守将大会于安徽枞阳，研究制订解除天京之围的作战方案。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攻击江北大营，打通天京粮道，并指派陈玉成担任主攻任务，由其他各路军队配合作战。

会后，各路大军立即行动，陈玉成部在各路大军的配合下，旗开得胜。八月，击溃署安徽巡抚李孟群部清军，攻占庐州（今合肥）。九月，直逼滁州东南的乌衣。当时清廷为了阻止陈玉成部东下，集结重兵于乌衣，其中除德兴阿江北大营援军外，还调来蒙古都统胜保的军队。陈玉成决定首先消灭清军主力——胜保的骑兵，埋伏了专破骑兵的刀牌手。九月二十五日，胜保率军来犯，横冲直撞，骑兵尤为猖獗。刀牌手一跃而起，冲入敌阵，盾牌护身，刀削马足，杀得敌人人仰马翻。太平军乘势四面夹击，全歼胜保骑兵，消灭清军三、四千人，胜保落荒而逃。接着，陈玉成等率军奔袭浦口江北大营。德兴阿吓得“愁急交攻，彻夜呻吟”<sup>①</sup>，以一万多人的战死作代价，才突出重围，连续溃逃百数十里，军矢令书皆失，从扬州带来的九千斤重的大炮十余门，全部为太平军所缴获，二十七日江北大营被彻底摧毁。陈玉成等部乘大胜余威，横扫苏北战场，连克江浦、扬州、六合等地，沉重地打击了敌

<sup>①</sup> 鞠殿华奏，《剿平粤匪方略》卷202。

人，解除了天京北面的威胁，对扭转战局起了很大作用。洪秀全为了巩固京师重地，特地将天京北岸门户江浦地区改为天浦省，派人“统兵镇天浦，兼顾浦口拓省疆”，并指令守将要“安抚黎庶，造册举官，团练乡兵，以资防堵；征办粮饷，源源解京；鼓励将兵，严密堵剿，毋些疏虞”<sup>①</sup>。



洪秀全命薛之元镇守浦口诏

正当太平军在东线捷报频传的时候，西线形势又趋恶化。湘军乘太平军主力集中于下游的时机，在安徽战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鲍超部进犯安庆，李续宾部围困三河，进逼庐州，形势十分紧张。三河是庐州的咽喉，是天京、庐州的粮食和物资的重要供应基地，在军事上与经济上对太平天国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太平军在此筑城一座，砖垒九座，“凭河设险，负固有年”<sup>②</sup>。面对着湘军的猖狂进攻，太平军守将吴定规婴城固守，告

① 《天王命薛之元镇守浦口手诏》，《太平天国》第2册，第671页。

② 胡林翼：《查明巡抚衔浙江布政司李续宾三河镇阵亡实迹恳恩加等优恤疏》，《胡林翼全集》上册，卷1，奏疏（一），第284页。

急求援。洪秀全为了制止敌军长驱直入，保卫安徽根据地，把集中在东线的太平军主力迅速调往西线。陈玉成闻讯，立即挥师西指，星夜驰援三河。他看出敌人军锋虽厉，但三河却处于太平军腹地，敌人已犯孤军深入之大忌。他针对敌人的致命弱点，采取迂回包围战术，率军直趋白石山金牛镇，连营数十座，切断敌人退路；又命庐州守将吴如孝自庐州带兵南下，阻击舒城方面敌军的救援，使敌人陷于孤立无援、四面被围的境地。十一月十五日清晨，太平军分三路发起总攻。陈玉成亲自率军英勇冲杀，太平军东路援军从白石山赶来助战，三河守将吴定规也乘势出击，经过激烈战斗，到十八日，李续宾所部湘军精锐六千多人全部被歼。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李续宾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以及文武官员四百多人均被击毙。包围安庆的湘军见势不妙，慌忙逃去，安庆之围不战而解。三河战役的胜利，解除了安徽战场的危机，沉重地打击了湘军，这就暂时稳定了长江上游的战局。胡林翼供认：“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sup>①</sup>

一八六〇年，洪秀全在洪仁玕的协助下，又领导太平军发动了围歼江南大营的战役，取得了丰硕战果。

一八六〇年初，江南大营敌军攻陷九洑洲，添筑堡垒，增掘长壕，加紧围困天京。为了解除敌人对天京的威胁，必须彻底消灭江南大营。洪仁玕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敌人凭壕作战，很难硬攻；而敌人的粮饷出自苏浙，如果攻其必救，引诱敌人分兵驰援，然后乘其分兵力弱之际，迅速回师反击，必能一战而胜。因此，他制定了“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洪秀全批准了这个方

<sup>①</sup> 胡林翼：《复胜克斋钦使》，《胡林翼全集》下册，卷3，宦黔书牍，第694页。

案，派出太平军昼夜急驰，奇袭湖州、杭州，震撼苏浙。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樑果然中计，派张玉良统兵一万三千余人救援杭州。等张玉良接近杭州时，太平军在城厢内外遍插旗帜，迷惑敌人，随即撤出杭州，经皖南迅速回师。四月，太平军各路将领在建平会合，商定分军五路向天京挺进。五月上旬，天京破围战进入决定性阶段。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从外线包围，各路并进，天京守城部队也分头出击，内外夹攻，清军营垒五十余座全被攻破，数万清兵全部溃败。然后，太平军进攻孝陵卫大营，和春从梦中惊醒，披衣上马，狼狈逃窜，“营内存银十余万，军火局内所存枪炮、火药、铅子等项不计其数”<sup>①</sup>，都成了太平军的胜利品。这一次出色的歼灭战，彻底踏平江南大营，解除了敌人三年来屯兵城下的长围，并为太平军进取江浙扫清了道路。



太平军在前线作战图

天京外围战斗结束之后，洪秀全主持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讨

---

<sup>①</sup> 肖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55页。

论下一步军事行动方针。洪仁玕认为江浙距天京较近，“乘胜下取，其功易成”，既得之后，再挥师西进，分南北两路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sup>①</sup>。洪秀全考虑到江浙地处东南，物产丰富，为了把江浙变成天京的东南屏障和物资供应基地，以巩固农民革命政权，同意洪仁玕提出的方案，决定先东进、后西上的战略。

五月十五日，各路太平军一齐出动，向东南挺进。太平军以陈玉成部骁将刘玱琳为先锋，经句容进兵丹阳。这时江南大营帮办张国樑搜罗溃兵，妄图盘踞丹阳作垂死挣扎。十九日黎明，太平军在浓雾中，分道疾进，勇猛冲锋，清军一触即溃，张国樑落水而死，和春逃到常州。驻守常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拥兵两万，但腐败不能战，“见和春一到，即魂亡胆落，立思逃避”<sup>②</sup>。次日黎明，何桂清率清军突开东门，与和春一起逃窜。何桂清逃到上海。和春窜到浒墅关，悲观绝望，服毒自杀。江南清军几乎全部瓦解，残兵败将窜到苏州，在城外放火烧毁房屋，“彻夜火光烛天”<sup>③</sup>。苏州人民恨透了这群武装强盗，立誓“同心杀尽张、和两帅官兵”<sup>④</sup>，迎接太平军。六月二日，在苏州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太平军顺利地占领了苏州。“苏州百姓要杀怯将溃卒于路，夺其所夺之辎重”<sup>⑤</sup>。清江苏巡抚徐有壬见大势已去，绝望自杀。随后，太平军分头出击，在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先后攻克苏南各重镇和浙江嘉兴等地。面对着这种“海沸江翻”的革命声浪，清朝官绅吓得丧魂落魄，发出绝望的哀号：“百姓寒心，三军解体，

①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2页。

② 徐有壬奏，《剿平粤匪方略》卷238。

③ 吴大澂：《吴清卿太史日记》，《太平天国》第5册，第327页。

④ 《李秀成自供》。

⑤ 许瑶光：《谈浙》卷2，《太平天国》第6册，第576页。

以目前时势而论，断无挽回之理。”<sup>①</sup>

占领丹阳后，太平军一部由陈玉成指挥，渡江转赴江北，先攻扬州、全椒，随即挥师南下，自天京经宜兴进入浙江，连克临安、余杭等地，八月初进至卖鱼桥，直逼杭州。不久，因安庆告急，陈玉成率军赶往上游，未能拿下杭州。但攻取浙江的计划并没有放弃。一八六一年五月，太平军李世贤部大举攻入浙江。当时的浙江巡抚王有龄是个“惟以暴敛为能”的大贪官，常败将军张玉良、饶廷选是他手下的两员大将，“张则战而溃，饶则不战自溃”<sup>②</sup>。依靠这支腐朽的军队当然无法抵挡住太平军的强大攻势，加上各地人民纷起响应，所以不到半年时间，太平军就连克浙东、浙西的大部分地区。九月，南路西征军从江西退入浙江，参加了解放杭州的战斗。十一月，杭州“十门合围，饷断信绝”<sup>③</sup>。十二月底，在杭州人民奋起反对清军的配合下，太平军攻占杭州。太平军在浙江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曾国藩哀叹浙江“全省糜烂，无可筹画”<sup>④</sup>。

这样，几乎整个浙江地区与苏南就连成了一片。曾国藩惊恐地说：“现在浙、苏两省膏腴之地，尽为‘贼’有，‘窟穴’已成，根柢已固。”<sup>⑤</sup>洪秀全分别以苏州和杭州为首府建立起苏福省和浙江省，把这两块新开辟的根据地，建设成天京的东南屏障和物资供应基地。正如幼主所说的：“富庶之区首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sup>⑥</sup>

---

① 许瑶光：《谈浙》卷2，《太平天国》第6册，第576页。

②③ 同上书，第589、587页。

④⑤ 曾国藩：《浙省失守徽郡被围通筹全局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7，第43、12页。

⑥ 《幼主诏李秀成》，《太平天国史料》第102页。

## 第二节 反对李秀成投降路线和抗击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

### 一、坚持农民专政

阶级斗争不停，路线斗争不止。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英雄们虽然痛击了韦昌辉、石达开的复辟逆流，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清除孳生韦、石之流的社会基础。太平天国后期，由于中外反动派走上联合绞杀农民革命的道路；由于太平军进入距离外国侵略者较近、地主阶级势力较强的苏、杭地区；由于儒家思想的腐蚀和封建法权的存在，在革命队伍内部不断产生蜕变变质分子。所以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太平天国内部革命和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就日趋复杂和激化。

毛主席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sup>①</sup>农民阶级要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就必须有铁的手腕，坚持对地主阶级实行专政。因此，是农民专政，还是儒家“仁政”，就成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首要问题。

洪秀全始终坚持农民革命路线，力主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实行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专政。但是，身居太平天国军政要职的李秀成却不同，他适应中外反革命的需要，代表地主阶级分子篡权复辟的愿望，竭力鼓吹“仁政”，破坏对地主阶级的专政。

---

<sup>①</sup>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7页。

李秀成出身贫苦农民，在太平军从金田北上永安途中，加入了革命队伍。一八五八年任副掌率，“提兵符之令”<sup>①</sup>。一八五九年被封为忠王。他原先对洪秀全倡导的革命理想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后来就被孔孟之道和封建法权思想所腐蚀，逐渐蜕化变质。他还在当“圣兵”的时候，就对儒家典籍发生了浓厚兴趣，每当获得“妖书”，“辄于枕戈时讽诵之”<sup>②</sup>。等到爬上忠王的宝座之后，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把“中国经书的道德格言”写在“黄缎锦旗”上，悬挂在自己的王府里，公然以孔孟之道做为自己的座右铭<sup>③</sup>。他利用韦、石叛乱、分裂所造成的困难，祭起“仁义”、“王道”这些儒家的破烂武器，妄图胁迫洪秀全改弦更张，“定制恤民”，“依古制而惠四方”，“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sup>④</sup>。这实际上就是要洪秀全放弃农民革命路线，“法先王”，复“古制”，施“仁政”于封建势力，对地主施以恩惠，对反动派“宽刑”，并把政权拱手让给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在李秀成看来，石达开同自己一样是尊孔复辟派，石达开如能重新上台，就可以利用政权力量，推行孔孟“仁政”，变农民专政为地主专政。洪秀全断然拒绝了李秀成的反动主张，并且罢了他的官，革了他的爵位。后来只是由于某些“朝臣”的“奏谏”，洪秀全为了争取他“改邪归正”，才恢复了他的原职。但是，李秀成却辜负了洪秀全的期望，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一八六〇年以后，洪秀全挥军东指，解放苏、杭，开辟了江浙根据地。但是，李秀成却力图把江浙根据地搞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①④ 《李秀成自供》。

② 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卷13，第17页。

③ 吟响：《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183页。

孔家店的亡灵游荡的场所，实行儒家“仁政”的黑样板。因此，在江浙根据地的建设中，以洪秀全和绝大多数太平军将士为一方，以李秀成及其心腹部将为另一方的两条路线斗争十分激烈。

李秀成及其心腹部将利用自己窃取的职权，在江浙根据地大行中庸之道，施“仁政”于地主官绅。李秀成强调“满汉之畛域”<sup>①</sup>，抹煞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立，把建立地上天国的目标篡改为“尊周攘夷”<sup>②</sup>。他百般优礼罪大恶极的清朝官吏，在杭州设立“招贤馆”，专门吸引清朝文武官员，“或授以‘伪’职，相待甚优；或给予护照，听其自便”<sup>③</sup>。他还公然号召“绅董可速出首，来城递册投诚”<sup>④</sup>，使不少“宦族”、“绅富”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乘机窃夺了一些地方政权，其中有的站在前台，出任乡官，号令一乡，有的躲在幕后，假手爪牙操纵政局。他们拉拢腐蚀某些意志不坚定的太平军将领，恃强豪横，为暴乡里，残害农民，保护自己，“逼索侵渔，富更数倍于昔”<sup>⑤</sup>。地主武装团练本来是农民革命的凶恶敌人，必须彻底消灭，不能加以利用。可是李秀成却在“招降一切”的口号下，把某些地主团练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成为太平天国的“国中之国”。苏州齐门外永昌“豪富”徐少蓬组织地主武装，庇护土豪劣绅，抗拒农民革命。李秀成不予镇压，竟派心腹熊万荃去招抚，同这个杀人魔王“面订要约”<sup>⑥</sup>，“各不相犯”<sup>⑦</sup>。徐少蓬因给李秀成“餽银六万为进见礼”<sup>⑧</sup>，被提升为

① 《李秀成谕赵景贤》，《太平天国》第2册，第742页。

② 《化民告示》，《太平天国》第2册，第702页。

③ 薛焕奏，《剿平粤匪方略》卷298。

④ 《李秀成六言谆谕》，《太平天国》第2册，第725页。

⑤ 鹤樵居士辑：《盛川稗乘》，《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195页。

⑥ 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下，《太平天国》第5册，第301页。

⑦ 张瑛：《少蓬君事略》，《知退斋稿》卷5。

⑧ 佚名：《蠡湖乐府》，《近代史资料》总34号，第169页。

扶天豫，不久又爬上扶天侯的宝座。他虽然接受太平天国的封爵，但“壁垒如故”<sup>①</sup>，继续掌握着刀把子，控制着完整地盘。他一面打着太平天国旗号，一面实行封建式割据；一面与太平军周旋，一面勾结清军密谋内应。他串通李秀成的心腹、苏州的熊万荃和常熟的钱桂仁等组成暗藏的反革命集团，勾结盘踞在上海的清朝官绅，阴谋配合清军颠覆苏南根据地。他“家中各立一局，东宅应酬‘长毛’，西宅接待绅董。村中船马俱备，各处绅富避乱寓居者甚多”<sup>②</sup>。简直成了贼窝子。尽管徐少蓬的叛迹昭彰，“众口共传”<sup>③</sup>，可是李秀成仍然假装痴呆，为他百般辩解。正因为有李秀成的撑腰、庇护，徐少蓬一类的地主团练才得以保存下来。地主文人供认：“后来官军之进，亦藉民团未散之力”<sup>④</sup>，可见其危害之大。

李秀成及其心腹部将在政治上的这种倒行逆施，遭到洪秀全和绝大多数太平军将士的反对。他们痛斥反革命的中庸之道和所谓“仁政”的说教，重申通过斗争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决心。洪秀全坚持“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sup>⑤</sup>的革命信念，号召太平军将士“欢喜打江山，放胆灭残妖”<sup>⑥</sup>，把天下土地“通要收复收回”<sup>⑦</sup>。洪仁玕强调指出：太平天国同清王朝的斗争，是“生死存亡之大战斗。咸丰的军队对于我们并无丝毫恻隐慈悲之心，……我们亦不能以仁爱给他们”<sup>⑧</sup>。这是革命农民从战斗实

① 冯桂芬：《公启曾协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177页。

② 汤氏：《鳅闻日记》卷下，《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1期，第114页。

③ 吴云：《两樞軒尺牘》，《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139页。

④ 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下，《太平天国》第5册，第301页。

⑤ 洪秀全对《资政新篇》的批语，《太平天国》第2册，第538页。

⑥⑦ 《天王诏旨》，《太平天国史料》第107、103页。

⑧ 富礼赐：《天京游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955页。

践中总结出来的朴素的斗争哲学。太平军将士既不以“仁爱”给“咸丰的军队”，也反对李秀成及其心腹部将施“仁政”于地主官绅。他们对“宦官之家，呼为妖头，杀之必尽”<sup>①</sup>；“折辱缙绅，无所不至”<sup>②</sup>；并在许多地方捣毁地主阶级的基层政权，实行了农民掌权的乡官制。昔日那些“编户穷民”<sup>③</sup>，现在挺起腰杆，掌握了印把子，对地主实行专政。如绍兴有个名叫范城的人，乡官因他是“官幕名家”，曾“逮系两次”，强迫他参加生产劳动<sup>④</sup>。太平军将士对李秀成包庇徐少蓬一类地主团练头子也非常不满，驻守苏州的慕王谭绍光于一八六三年“设计诱（徐）少蓬到省，钉重镣铐，上全副刑具，囚密室中”<sup>⑤</sup>。接着派兵荡平永昌，镇压为非作歹的土豪劣绅，最后杀死徐少蓬，“石压尸河”<sup>⑥</sup>，为太平天国除了一大害。

李秀成及其心腹部将施“仁政”于地主官绅，表现在经济上就是保护封建剥削制度。一八六三年，李秀成的部下冀天义程某在吴江县颁发的《潘叙奎荡凭》说：“所有各邑田亩，业经我忠王操劳瑞心，颁发田凭”，“仰该业户永远收执，取租办赋”<sup>⑦</sup>。有个斑天安黄某，在苏州的长洲一带大出告示，竟然指摘“佃户畏强欺弱”，“乡官弹压不周”，致使地主租额减少或“籽粒无着”。他叫嚷什么这“殊负”李秀成“笃实爱民之意”，“今本爵宪酌定”必须“还租”，“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sup>⑧</sup>，定予严办。正是

① 《漂灾纪略》，光绪《溧阳县续志》卷16。

② 黄侗：《义乌兵事纪略》。

③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1，《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462页。

④ 范城：《质言》，《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3期，第178页。

⑤⑥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太平天国》第5册，第376、378页。

⑦ 郭若愚：《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续编》第63页。

⑧ 《黄××告示》，《近代史资料》总34号，第2—3页。

秉承李秀成的这种“爱民”即爱地主之意，江浙根据地里的一些掌权的阶级异己分子，就公开支持地主“设局收租”，甚至动用武力镇压农民的抗租斗争，对革命人民实行专政。石门守将邓光明遵循孔老二的“举逸民”的“遗训”，公然发给大地主沈庆余“护凭”，保护地主的政治经济特权，严禁农民革地主的命，狂叫要把被打倒而“不能出头”的“殷富之家”重新扶植起来，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sup>①</sup>。这份复辟宣言书，炮制者虽然是邓光明，根子却在李秀成，它是李秀成投降路线的产物。

李秀成及其心腹部将在经济上保护地主，而洪秀全和绝大多数太平军将士则坚持在经济上打击地主。前面已经提到，一八六〇年以后，洪秀全继续刊印《天朝田亩制度》，坚持反对封建土地制度。他还亲自下诏，指令苏福省“酌减征收舒民力，期无失所安众心”<sup>②</sup>。广大太平军将士同农民群众结合，通过军事镇压和经济剥夺等方式，打击地主，力图变革封建土地关系。



天王诏旨

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文物图释》第199—200页。

② 《天王诏旨》，《太平天国资料》第3页。

首先，直接没收一部分封建地主的土地。他们没收反对革命的清朝官吏、团首的财产。如常熟的“翁、庞、杨、王诸宦注明原籍，田尽入公”，乡官“目为妖产，设局收租”<sup>①</sup>。在常熟等县，还曾没收暂时逃亡在外，或拒不按照农民政权命令进行土地登记的地主的土地，交由农民耕种。

其次，在江、浙根据地内，官绅、地主有的被制裁杀掉了，有的鸡飞鼠窜了，这样就出现了许多事实上“无主”的土地，原来佃耕这些土地的农民，便成了土地的实际主人。农民政权承认佃农对土地的所有权，并发给“田凭”，“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sup>②</sup>。

第三，广泛开展剥夺地主浮财和抗租的斗争。他们坚持“打先锋”，“至缙绅之家”，“搜掘金银，井灶无遗”<sup>③</sup>。对“曩称富人”，强行征收大捐，“千金万金不等”，如果抗不交纳，就予以刑法制裁，“械系之”<sup>④</sup>。李秀成的心腹钱桂仁，在常熟下令严禁“霸租、抗粮”，“犯者处斩”<sup>⑤</sup>。可是，太平军下级官员却坚决抵制其乱命，“任佃农滋事”<sup>⑥</sup>。佃农奋起捣毁地主的收租局，“屋庐多毁，器物掠空”。地主们赶忙向钱桂仁乞援，钱桂仁凶相毕露，派乡勇下乡镇压。太平军下级官员毫不畏惧，“犹倡免租之议”，不但主张佃农不交租，还在行动上支持佃农的斗争<sup>⑦</sup>。各地佃农纷起响应，已经交了租米的“众佃”也“竞欲索还”<sup>⑧</sup>。地主分子哀叹：“顽民之效尤何多也。”<sup>⑨</sup>在太平军和农民群众的打击下，有的地主积蓄一空，财源日蹙，为了苟延残喘，“降价鬻田佃

①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0，《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418页。

② 倦圃野老：《庚癸纪略》卷下，《太平天国资料》第104页。

③ 佚名：《哀江南赋》。

④ 隐名氏：《越州纪略》，《太平天国》第6册，第769页。

⑤⑥⑦⑧⑨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0，《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390、396、397、399页。

户”<sup>①</sup>。

李秀成及其心腹部将不仅施孔孟“仁政”于地主官绅，而且勾结、纵容地主官绅刮起尊孔妖风，为推翻农民政权，复辟地主阶级的统治大造舆论。一八六一年春，常熟举行乡试，李秀成的心腹钱桂仁听信豪绅曹敬的献计，公然破坏太平天国考试题目不本《四书》、《五经》的规定，改出《四书》题。他们利用开考抛出“偃武修文”、“礼门义路”等一串“四书题”<sup>②</sup>，妄图诱骗革命人民放下武器，向反动派投降。考试的人自称“门生”，去拜见钱桂仁，他把这些“门生”送入学宫，“而学宫已毁，像亦无存，乃具纸位望空拜之”。这些孔孟的徒子徒孙，还公然“送报条，祀魁星，收贺分”<sup>③</sup>。当年常熟的“圣像已毁重塑”<sup>④</sup>。一八六二年，钱桂仁“又欲重建圣庙，以重斯文”。因此，地主分子赞扬他“尚知补过”<sup>⑤</sup>。在这里，孔老二的亡灵又重新游荡起来了。同尊孔活动相呼应，佛道鬼神也纷纷出笼，登台表演。在常熟，钱桂仁设立“功德道场”，招集大批和尚道士念经拜讖<sup>⑥</sup>。原来被禁止的“纸马”生意，“至此禁弛”<sup>⑦</sup>。苏州“香筵极盛”<sup>⑧</sup>。杭州“上天竺大殿已毁，复起小殿，争相祈祷。”<sup>⑨</sup>被禁止的“邪歌”、“邪戏”也风靡一时。

李秀成及其心腹部将刮起的尊孔妖风，遭到洪秀全和绝大多数太平军将士的迎头痛击。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一八六二

①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1，《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460页。

②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0，《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393页。

③⑥ 汤氏：《敏闻日记》卷下，《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1期，第118、123页。

④⑤⑦⑧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0、21，《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393、432、450页。

⑨ 丁保和：《归里杂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461页。

年洪秀全正式公布《太平天日》，大力宣传“皇上帝”鞭打孔老二的神话故事。他还继续严禁孔孟妖书，读者“父师并斩”<sup>①</sup>，并毅然杀掉到苏州主持科举考试“因出《五经》《四书》题”<sup>②</sup>的掌试官，以儆效尤。太平军将士坚持扫荡“文庙学宫”，将儒家经典“弃等秽污”<sup>③</sup>，“弃掷践踏，至蔑之厕筹”<sup>④</sup>；坚持捣毁庵观寺院，使某些地方“偶像消灭，僧道绝迹”<sup>⑤</sup>；坚持抵制尊孔拜佛勾当，在嘉兴和常州等地，都发生过孔庙和其它庙宇“随修随焚”的情况。驻守常熟的英王部将侯裕田，在钱桂仁大搞“功德道场”的第四夜，“引众人庙，拆毁坛场，开放洋炮，和尚逃走，各殿巨细佛像不存一位”，并当面斥责钱桂仁违背“拜上帝不拜邪神”的革命纪律，要向天王洪秀全揭发<sup>⑥</sup>。

## 二、维护集中统一

集中统一、还是分裂割据，这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路线和以李秀成为为代表的投降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洪秀全为了巩固农民专政，争取太平天国革命的胜利，积极维护和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李秀成反对集中统一，大搞分裂割据，则适应了阶级敌人颠覆农民专政，扑灭农民革命烈火的需要。双方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兵权与用人两个方面。

太平军是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主要成份，是农民阶级反对武装的地主阶级的工具。但是李秀成却崇奉孔孟之道，“以礼治

①② 陈庆甲：《金陵纪事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01页。

③ 《昆新两县重修合志纪兵》，《太平天国资料》第138页。

④ 《粤匪扰浦纪略》，《浦江县志》稿卷5。

⑤ 吟唚：《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367页。

⑥ 汤氏：《鳅闻日记》卷下，《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1期，第123页。

军”，拼命抓个人的兵权，妄图把太平军变成自己割地称雄、推行投降路线的工具。他招降纳叛，肆意扩充个人实力，借以经营自己的小地盘，弄兵逆命，不听调遣，破坏洪秀全的战略部署。

用人权掌握在谁手里，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农民领袖掌握铨选大权，选拔足以支撑革命斗争大厦的广大人才，是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但是，李秀成为了推行投降路线，图谋篡夺铨选大权，以便结党营私，拼凑自己的黑班底。他用人唯亲，排斥异己，把一些残渣余孽和蜕化变质分子，安插到重要岗位上去。例如曾任清朝寿州知州的熊万荃，桐城大地主钱桂仁以及清朝候补道李文炳等，李秀成都倚为心腹，派熊掌管苏福省政事；派钱接管常熟政事，硬把克复常熟的英王部将黄文金挤走；任命李为江南文将帅，掌管昆山、新阳两县政权。他们以李秀成为靠山，利用自己窃取的职权，一面篡改太平天国打击地主的政策，包庇地主豪绅，用地主分子的话说，就是“颇革长毛之苛政”<sup>①</sup>；一面结党联盟，暗通清军，密谋内应。他们大肆吹捧李秀成，为其夺权复辟制造舆论。李文炳伙同苏州府属“各军绅耆士庶”，在苏州阊门外为李秀成建立石牌坊，横题“民不能忘”，“慕颂”李秀成的“德政”<sup>②</sup>。钱桂仁串通常熟的地主士绅，在常熟为李秀成修建“报恩牌坊”，对李秀成“颂德靡涯”、“歌功无尽”<sup>③</sup>。李秀成被吹得飘飘然起来，提升钱桂仁为“天军主将，独掌常、昭军民事务”<sup>④</sup>。一八六二年，李秀成奉召回京，钱桂仁备办厚礼，专程赶到苏州送行，李秀成屏退左右，对钱桂仁说：“贤弟是

① 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下，《太平天国》第5册，第300页。

② 《庚申遇难杂记》，转引自范烟桥：《太平天国时的笔记选录——〈燐血从钞〉》，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

③ 《常熟报恩牌坊碑序》，罗尔纲：《太平天国文物图释》第56页。

④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太平天国》第5册，第374页。

我心腹之人，我今远离，有要言相嘱。”第一，他说天王怀疑他有“买服民心之意”，所以命他回京，以慕王谭绍光代之。第二，他预计慕王一定会清洗他“所信任者”。第三，他指使钱桂仁结成死党，对抗慕王，说“贤弟回常，可于统下择有智有勇者结为股肱爪牙，遇非常则协力同心，切不擅离守土。即不得已必要到省，当多带护卫之士，令心腹人处处接应。抑或有事与他执拗，必先送信于我，我当力为调护。现在我保举弟为天军主将，是有心不与彼统属也。然虽不统属，亦须刻刻留意，不负我嘱咐深心，则我弟后日必有大过人处已”<sup>①</sup>。这一席黑话，从反面透露了天王、慕王同李秀成、钱桂仁之间路线斗争的消息，暴露了李秀成反对集中统一，阴谋分裂割据的险恶用心。李秀成不仅倚重熊、钱、李等别有来历的家伙，而且还把那些贪图爵禄、惜命保财的蜕化变质分子，如郜永宽、童容海、邓光明之流，视为“爱将”，不次拔擢。这些家伙，最终都成了献城投敌的可耻叛徒。

对于李秀成及其心腹部将的分裂割据活动，洪秀全和绝大多数太平军将士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一八五九年，洪仁玕发表的《资政新篇》和《立法制谊谕》，是两篇严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的战斗檄文。他尖锐地提出：在前期，太平军“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为什么到了后期，竟至“进寸退尺，战胜攻取之威，转大逊于曩时？”他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所以造成这种迥然相反的局势，就是因为前期事权集中统一，“臂指自如”，后期则“出死入生任各军，而事权不一也”<sup>②</sup>。他批评某些人拉山头，搞宗派，“结党联盟”，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是下有自固之术，私有倚恃之端，外为

①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太平天国》第5册，第374—375页。

② 洪仁玕：《立法制谊谕》，《太平天国史料》第147页。

假公济私之举，内藏弱本强末之弊。为兵者行此而为将之军法难行；为臣者行此而为君之权谋下夺。良民虽欲深倚于君，无奈为所隔绝”。他主张严禁朋党之弊，务使“权归于一”。对于洪仁玕的建议，洪秀全深表赞同，批示“钦定此策是也”<sup>①</sup>。

据洪仁玕说，英王陈玉成也早就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驰书来府，请定章程，以救时弊”。陈玉成“所议赏罚之法，致为森严”，洪仁玕将“原书缮本呈奏”，蒙洪秀全旨准颁行<sup>②</sup>。

洪秀全在洪仁玕和陈玉成的协助下，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统一兵权和用人大权，反对分裂割据，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首先，设赍奏官，改定国号。

一八六〇年二月，洪秀全用幼主名义，颁发《设赍奏官诏》，设立赍奏官，专管百官奏章上达和洪秀全命令下传的工作。洪秀全在诏旨中明确指出，添设赍奏官的目的是为了“以一兵权，以密军机”<sup>③</sup>。

一八六一年，洪秀全颁发《改国号诏》，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这种改变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是透过宗教外衣，就可以看出洪秀全推崇“上帝”，正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革命权威，借以统一内部，统一兵权。李秀成本能的感觉到了这一点，他说：“天王改政”，“是天王之计”，称“天朝、天军、天民、天官、天将、天兵、御林兵等皆算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称为我队之兵，称为我队我兵者，责曰：‘尔有奸心！’恐人之占其国，此是言也。何人敢称自兵者，五马分尸”。他供认，“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

①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第2册，第524页。

② 洪仁玕：《立法制谊谕》，《太平天国史料》第148页。

③ 《幼主诏旨》，《太平天国史料》第115页。

贤不服”<sup>①</sup>。

其次，抓铨选，明赏罚。

洪仁玕说在革命队伍中，有些人“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sup>②</sup>。李秀成之流便投其所好，用封建法权思想来腐蚀和拉拢这些争名逐利之辈，作为支持自己据地称雄的基干力量。他们破坏太平天国的铨选制度，私铸印信，擅自封赏，甚至卖官鬻爵，私相授受，结果使太平天国“权分而势益衰”。面对这种严重局势，洪仁玕、陈玉成认为“国家机要，惟在铨选”<sup>③</sup>，主张从抓铨选入手。洪秀全接受洪仁玕、陈玉成的建议，颁行“天法”。“天法”既严禁军事将领“弄兵”、“逆命”，违者“削其兵柄”<sup>④</sup>，严加惩处；又严禁军事将领僭乱天王的封赏大权，规定：“嗣后如主将在外远征，官兵有功足录，只准注明功劳部，存其劳绩，以俟凯旋奏封。主将以下统兵官，无位其高官王位，亦不得私铸印信，私给官凭，僭越一些。倘有私与官职者，当律以大辟，私受官职者，亦正典刑。”<sup>⑤</sup>

此外，洪秀全还仿效“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增封多王，以间其党”，借以限制李秀成拥兵自重。但是由于封赏过滥，越封越多，结果走向了反面，弄得“愈散漫而不可制”<sup>⑥</sup>。

洪秀全采取的上述种种措施，虽然有的对解决革命内部集中统一和分裂割据的矛盾起了一些作用，但是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既是因为地主阶级及其在革命内部代理人的破坏，又是由于农民阶级本身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作为农民领袖的洪秀全也摆脱不了小生产者狭隘眼界的限制，提不出行

① 《李秀成自供》。

②③④⑤ 洪仁玕：《立法制谊谕》，《太平天国史料》第147—149页。

⑥ 李鸿章：《复彭雪琴侍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44页。

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排除干扰和破坏，建立起民主集中的制度。

### 三、保卫安庆的浴血奋战

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英雄们，对内反对李秀成的投降路线，对外坚持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江南大营的覆灭，江浙根据地的开辟，引起反动阵营的极大恐慌。奕詝气急败坏地命令曾国藩督军径赴苏、杭，“保全东南大局”。但老奸巨滑的曾国藩却拒不听命，他狂叫“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sup>①</sup>，继续督湘军主力进犯安庆。

安庆，这个长江中游重镇，对于建都长江下游的太平天国来说，具有特别的战略意义。它是天京的西大门，是安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而安徽根据地又是天京的西部屏藩，是天京和西线太平军人力物力的供应基地。正如洪仁玕所说的：“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sup>②</sup>洪秀全从巩固天京、推进革命着眼，十分重视保卫安庆的问题。早在一八六〇年五月天京高级将领会议上，洪秀全就批准了洪仁玕提出的先取苏、杭，然后分兵南北两路，沿江西上，奔袭武汉，以救安庆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确实打中了曾国藩的要害。因为当时曾国藩把湘军主力摆在安庆外围和安庆对面的皖南，而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却非常空虚。武汉是湘军后方重镇，湖北是“各路用兵之枢纽”<sup>③</sup>。太平军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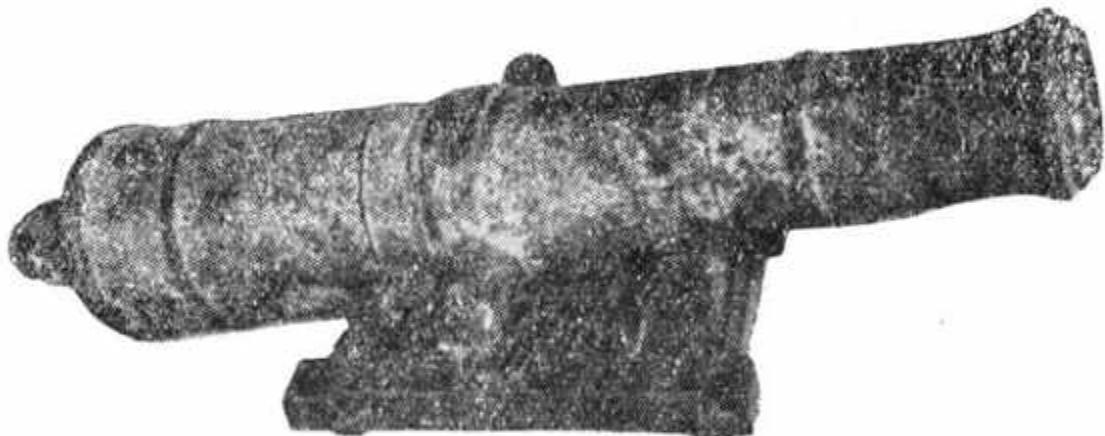
<sup>①</sup> 曾国藩：《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3，第43页。

<sup>②</sup>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3页。

<sup>③</sup> 曾国藩：《请毋分撤鄂军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8页。

袭武汉，把战火引向敌人后方，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攻其必救，既可解安庆之围，又能乘机歼灭湘军主力。曾国藩胆颤心惊地说：“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之外，……‘贼’之善于用兵，更狡更悍。”①

一八六〇年九月，太平军各路将领云集天京，准备西征。洪秀全决定陈玉成部和李秀成部的进军路线，是沿长江南北遥相对称，成为两条平行线向西挺进，于一八六一年四月会师武昌。



太平军铁炮

陈玉成遵照洪秀全的战略决策，于九月底，率领北路西征军由长江北岸经安徽向湖北挺进，“风驰雨骤，昼夜兼行”，气势雄伟，锐不可挡。一八六一年三月，攻克黄州，离汉口只有一百六十里了。当时武昌守军不满三千，战不能战，守不能守，远在安徽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惊慌失措，埋怨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②，飞调水陆援军，但缓不济急。武昌官绅纷纷逃窜，只剩湖

① 曾国藩：《谕纪泽儿》，《曾国藩家训》卷上。

② 胡林翼：《复左京卿》，《胡林翼全集》下册，卷4，抚鄂书牍（二），第974页。

广总督官文和“司道数人在省垣以内而已”<sup>①</sup>。就在武汉即将克复的时候，刚在汉口取得租界的英国侵略者，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力阻陈玉成率部向武汉挺进。英国参赞巴夏礼赶到黄州，求见陈玉成，一面进行恐吓，说太平军夺取武汉就会损害他们的贸易，破坏他们的商业利益，“奉告”太平军“必须远离该埠”；一面造谣欺骗，说南路西征军尚未进入江西，你们现在进兵汉口，势将陷于孤军作战，遭到武昌守军和安徽援军的夹击<sup>②</sup>。陈玉成被巴夏礼的胡言乱语所欺骗，加上李秀成率领的南路军尚未及时赶到，便决定暂停进攻武汉，令赖文光留守黄州，亲率大军转攻德安、随州等地，同时派人疾速回京请示进止。四月，湘军根据曾国藩“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sup>③</sup>的方针，猛攻安庆。陈玉成率军从湖北回援安庆。当天京关于仍照原定计划“进军汉口，与英国官员进行谈判”的指示到达时，陈玉成早已不在湖北了<sup>④</sup>。

李秀成率领的南路军出师较晚。因为他从错误的战略思想出发，一再对抗洪秀全的战略决策。他自江浙根据地开辟以来，就产生了忽视上游，片面重视下游的错误的战略思想。这种思想的产生，一是因为他“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sup>⑤</sup>，把军队看作自己的私产，视江浙根据地为自己的“封地”，恋栈苟安，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一是因为他对湘军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太平军的力量估计过低，不敢同敌军主力争上游，一意向敌军空虚的江

① 《清代名人书札录》第31册。

② 王崇武译：《英国参赞巴夏礼报告在黄州访问英王陈玉成的经过》，《历史教学》一九五七年第四期。

③ 曾国藩：《谕纪泽儿》，《曾国藩家训》卷上。

④ 咒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70页。

⑤ 《黄文英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8页。

浙发展。洪仁玕写信严厉批评他“既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的错误思想，指出：“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对于洪仁玕的批评劝导，李秀成拒不接受，顽固地坚持己见，复信说什么“特识高见，读之心惊神恐，但今敌无可败之势，如食果未及其时，其味必苦，后当凛遵”<sup>①</sup>。李秀成供认，只是因为“天王严诏颁到”<sup>②</sup>，他才勉强应命西征。但他西征的真意，并不是去攻武汉救安庆，而是招集鄂南一带起义群众，扩充自己的实力。一八六〇年十一月，李秀成率领南路军从皖南芜湖出发，翌年六月才攻克武昌县（鄂城），逼近武汉。当时，李秀成如果联合屯军黄州的赖文光，南北夹击，克复武汉或吸引安庆外围敌军回援是可能的。曾国藩的重要幕僚赵烈文就曾供认：李秀成率军“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困撤矣”<sup>③</sup>。但李秀成计不出此，他在招集鄂南一带数十万起义群众之后，便于七月中退回江西，旋即入浙。李秀成所以这样匆促撤军，一是他身在湖北，心向浙江。他说：“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犹鸟无翼，故归图之。”<sup>④</sup>二是他惧怕湘军，在行动上势必陷入逃跑主义的泥坑。他供认：“先欲救皖，后知皖难救，又闻鄂兵强故退。”<sup>⑤</sup>三是他顾忌英国侵略者的干涉。英国领事金执尔曾到兴国，“劝说”他不要进攻武汉，并扣留了他托付转给黄州赖文光的一封公函。

这样，奋战经年，纵横长江两岸，会师武汉，解救安庆的战略

①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2页。

② 《李秀成自供》。

③④⑤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20，《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4、375页。

计划，就完全落空了。

这次西征战役的失败，使保卫安庆的战斗更加艰巨。从一八六一年四月起，陈玉成便倾注全力救援安庆。曾国藩也全力加强安庆外围的力量，飞调鲍超、李续宜等驰援安庆，并把自己的指挥部由祁门移至东流，以便就近组织顽抗。当时双方阵势虽然犬牙交错，层层包围，但基本情况是：湘军深沟高垒，围城打援；太平军被分割为二，城内的进行阵地防御，城外的进行阵地攻坚。由于敌处优势，太平军要想在阵地战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当机立断，组织退却，放弃安庆，以便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因为保存土地”<sup>①</sup>。可惜陈玉成只看到保卫安庆的重要性，却没有认识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的危险性，决计不惜任何代价硬拚到底。结果城外援军节节失利，城内守军弹尽粮绝。九月五日，安庆终于失陷。叶芸来率领守城军一万六千余人英勇奋战，全部壮烈牺牲。李秀成不仅破坏会攻武汉的计划，而且在安庆激战时，还拥兵自重，坐视不救，帮了敌人的大忙。

安庆保卫战失败，西线太平军精锐部队丧失殆尽，这对太平天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整个安徽根据地动摇了，天京经常处在敌人的威胁之中。正如洪仁玕所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sup>②</sup>

安庆失陷后，陈玉成率部退守庐州。他原想“死守上游”，为

---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475—476页。

②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3页。



### 陈玉成致赖文光等书

天京“犄角”<sup>①</sup>。后来又打算联合张乐行“分兵扫北”<sup>②</sup>，“由汴梁直取燕京，共归一统”<sup>③</sup>。但是，这些“尽忠报国”的理想，终因强敌压境，一退出庐州，二被捕于寿州，而未能付诸实现。寿州团练苗沛霖用阴谋手段，诱捕陈玉成，献给清帅胜保邀功。陈玉成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象疾风中的劲草，岁寒时的松柏，经受了敌人软硬兼施的严峻考验。他对因胜利而骄妄的反革命头子胜保，给予彻底的揭露，愤怒地指斥道：“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尔犹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两万，与吾战后，有一存者乎？”胜保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妄图用荣华富贵

① 李应珪：《皖中发匪纪略》。

② 《英王陈玉成自述》。

③ 《大汉盟主张天朝九门御林真忠报国开朝勋臣彦天安程晓谕》。

来诱降。陈玉成昂然挺立，气冲霄汉，厉声喝道：“大丈夫死则死尔，何饶舌也！”<sup>①</sup>真是声声如霹雳，使胜保丧魂落魄，字字如匕首，直刺敌人心脏。一八六二年六月四日，陈玉成慷慨就义于河南延津，时年二十六岁。陈玉成的牺牲，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一个重大损失。

安庆的失守，陈玉成的牺牲，标志着太平天国西线的战斗已经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之中了。

#### 四、坚决反对外国干涉

太平天国所面对的敌人，不仅是尊孔卖国的封建统治者，而且还有尊孔侵华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

一八五六年以后，外国侵略者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面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企图以武力胁迫清政府进一步屈服；一面加紧对太平天国的颠覆活动。他们看到这场革命所涂上的宗教色彩，认为如果能够按照基督教的面貌改造拜上帝会，“培植其善而遏止其恶”<sup>②</sup>，用驯服于殖民者的灵魂来取代农民革命的灵魂，那就可以把太平天国推上他们所安排的殖民地轨道，扑灭农民革命的火焰。外国传教士怀着这种鬼胎，削尖脑袋往太平天国里面钻。一八六〇年，罗孝全<sup>③</sup>来到天京，是传教士涌入太平天国的顶点。

---

① 佚名：《陈玉成被擒记》。

② 米赫斯：《中国革命军概观》，《太平天国》第6册，第917页。

③ 罗孝全（一八二二——一八七一年），美国传教士，一八三七年来到中国，先后在澳门、香港和广州传教。一八四七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广州去向罗孝全求教，要求洗礼，但遭到拒绝。

罗孝全这个口称为上帝效忠，实为美国侵略政策服务的传教士，骗取了太平天国“外务丞相”之职，负责处理外交事务。他劝诱洪秀全放弃革命理想，宣传西方的“福音”，以便“推翻偶像之崇拜而开放门户，使福音得普遍传播于全国”<sup>①</sup>。所谓传播“福音”，实际上就是要按照西方侵略者的殖民要求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和美国从精神上统一起来，为美国侵略者消灭太平天国、使中国殖民地化鸣锣开道。洪秀全坚持太平天国的革命信念，给了罗孝全的颠覆阴谋以迎头痛击。据罗孝全说：洪秀全“要我到此地来，但不是要我来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劝化人民信奉上帝，而是要我来做他的官，宣传他的主义，劝导外国人信奉他。”罗孝全哀叹：“我的传道工作是没有成功的希望了。”他表示“决计要离开这里”<sup>②</sup>，他也果然于一八六一年底夹起尾巴逃跑了。

外国传教士既不能说服洪秀全，直接通过太平天国政权来进行奴化教育，于是就要求在太平天国保护下，建立一个教士独立、教义自主的教会，直接向人民传播“福音”。但是这个精神侵略方案，也同样遭到洪秀全的拒绝。洪仁玕告诉传教士缪维廉说：“关于这一方面，天王不愿意依赖外援。他认为中国人可以自己来做这件事，中国人有自己的骄傲，不愿意从外国人的手上接受福音。”<sup>③</sup>看！这是何等豪迈的革命气概，多么崇高的民族自尊啊！

这样，洪秀全就挫败了外国侵略者利用宗教使太平天国殖民地化的阴谋。与此同时，洪秀全在一八六〇年夏，派出太平军

---

① 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太平天国》第6册，第825页。

② 转引自麦克奈尔：《中国现代历史选读》英文本。

③ 《外国布道会》英文本，一八六一年九月号。

踏破江南大营，席卷苏、常，进逼上海，正式揭开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序幕。

上海，地处东南前哨，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中外反革命蚊聚的巢穴。太平军攻取上海，对于粉碎中外反革命的勾结，巩固江浙根据地，保卫天京，集中全力打击顺江而下的湘军，具有重要意义。

太平军威震东南，直捣上海，使中外反动势力惊恐万状。当时，虽然英、法和清政府进行着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正源源北上，准备侵占清廷老巢北京，但在上海，这些强盗却同清朝地方官僚、地主、买办们握手言欢，共同策划镇压革命的阴谋。中外反动派一面组织英法联合部队，在上海近郊积极布防；一面在买办出身的苏松太粮道杨坊的倡谋下，拼凑了一支以美国政治流氓华尔为首的臭名昭著的反革命武装——洋枪队，准备抗拒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一八六〇年七月，洋枪队偷袭松江，并伙同清军进犯青浦。太平军立即还击，大破敌军，毙伤洋枪队三分之一，洋枪队头子华尔身中五枪，仅免于死，拖着残兵败将，狼狈逃回。

正当外国侵略者剑拔弩张、杀机毕露的时候，统率太平军的李秀成却对外国侵略者仍然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深信”它们“尊重信义”，和太平天国“同心”，“不至暗助官军”<sup>①</sup>。他“留下大部分军队防守各地，进攻清军的残部”，“只携带卫队及非正规部队三千人作为护随，而无任何进攻企图”。他满以为上海的外国人会出来接应，至少会保持“中立”。可是当他到达上海时，却发现“在城上用排枪和霰弹热烈款待”他的正是英、法的军

<sup>①</sup> 《李秀成致英美法公使书》，《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4页；《李秀成致各国公使书》，吟唚：《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07页。

队<sup>①</sup>。英、法侵略军用洋枪洋炮疯狂地轰击，残酷地屠杀太平军。太平军战士虽然以罕见的勇敢进行顽强的战斗，但终因猝不及防，而遭到挫败。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政变以后，中外反动派以尊孔为纽带，走上公开勾结、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道路。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英雄们，坚决摒弃封建统治者所鼓吹的孔孟卖国哲学，对外国侵略者既不讲什么“忠敬”，也不搞什么“和让”，而是进行了英勇卓绝的反抗斗争。

外国侵略者在大规模武装干涉之前，曾对太平天国发动外交攻势，进行政治讹诈。

有一次，外国侵略者来到天京觐见洪秀全，提出要帮助太平天国打倒清朝、平分中国的“建议”。洪秀全识破了他们的阴谋诡计，义正词严地说：我起义兵，要救全中国。“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他们看诱骗不成，就施之以威吓，说什么“尔天王兵而虽众，不及洋兵万人”。“尔不与合，尔天朝不久，待为我另行举动”<sup>②</sup>。但是，洪秀全的骨头是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既不受诱骗，也不怕威胁，义无返顾地赶走了这些骗子加强盗。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英国侵略者向太平天国提出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九江、汉口三地一百里之内等四项无理要求。太平天国指出这种要求“实属谬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英国佬“伪托友好，暗助满妖”的两面派嘴脸，庄严宣告“我军肩负重任，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放弃寸土于不顾”，“今满妖未除，伟业未竟，我

---

① 吟唚：《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06、208页。

② 《李秀成自供》。

国碍难照准贵国所请”<sup>①</sup>。

外国侵略者在政治讹诈失败之后，公开撕掉“中立”的假面具，露出了革命绞杀者的凶相。

早在一八六一年八月间，中外反动派就协同改组了洋枪队，以外国侵略者为军官，中国的兵痞流氓为士兵，人数逐渐增至二千余人，并配备了新式武器。英国侵略军司令何伯表示：一旦英法联军公开与太平军作战，洋枪队应编入联军之内。在改组洋枪队几个月之后，英法联军从天津陆续调到上海，并且组织了一支一千七百多人的干涉军，由何伯和法国海军上将卜罗德指挥。与此同时，“世界宪兵”<sup>②</sup>、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沙皇俄国，也狂热地支持清朝反动政权，不仅于一八六一年派出“教练”，“赠送”武器，扶植清朝反革命军队；而且直接出兵参战，血腥屠杀太平军。一八六二年春，沙俄派兵参加了英、法在上海组织的干涉军。同年十月，沙俄驻华公使把留捷克“照会”清朝政府，恶毒攻击太平天国革命是什么“‘贼匪’扰乱”，说沙皇“时常代虑”，特派“总管东洋俄国兵船水师提督颇福，带领兵船前赴中国”，如果“‘贼匪’扰乱紧要海口，本地方官独力难支”，则“帮同”清军“堵御击退”<sup>③</sup>。十二月，颇福带领兵舰三艘，驶到上海，声称沙皇与清帝“实心和好，闻海口不靖，派令前来帮同堵剿”<sup>④</sup>。清政府秉承把留捷克的旨意，决定让俄国兵舰“暂驻上海”<sup>⑤</sup>。

① 《南京太平天国当局答宾汉书》，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323—326页。

② 列宁：《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列宁全集》第15卷，第428页。

③ 转引自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历史组：《沙俄武装干涉太平天国革命的罪证》，《文物》一九七五年第2期。

④⑤ 董恂：《洋兵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550页。

照  
會

一八六二年十月十一日沙俄公使给清政府的照会

一八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奕訢等所上的奏折

清政府为了扑灭农民革命烈火，挽救自己的垂危统治，外靠外国侵略者，内靠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加紧在上海和江浙战场布防。曾国藩伙同李鸿章、左宗棠等施展了全部反革命伎俩，投靠外国侵略者，残酷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年），安徽合肥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是曾国藩的门生。太平军到安徽后，他先在家乡办团练，后投入曾国藩的幕府。左宗棠（一八一二——一八八五年），湖南湘阴人，出身地主家庭，他先充当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的幕僚，后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一八六二年初，曾国藩策划分兵三路进犯太平天国江浙地区：曾国荃率嫡系湘军主攻天京；左宗棠部湘军援浙江；李鸿章部淮军援上海，图苏、常。四月，李鸿章率领几

千名由皖北地主武装扩建起来的淮军，乘坐外国轮船到达上海。

面对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太平军仇恨满腔，勇猛杀敌。东线太平军在克复杭州，解除苏州南面的威胁以后，于一八六二年初，乘大胜余威，再次进攻上海。太平军对上海采取了沿江连营、深沟高垒、四面包围、待机攻取的方针。太平军从四面八方逼近上海，清军狼狈溃逃，上海指日可下。但是，英、法、俄、美侵略者蓄意帮助清政府，立即驱使整装待发的干涉军和洋枪队，倾巢而出，向太平军进行疯狂反扑。四月初，华尔、何伯、卜罗德分别带领洋枪队、英法干涉军，“并约同新到之俄国兵数十名”<sup>①</sup>，驰抵七宝，在清军的配合下，向驻守王家寺、龙珠庵的太平军发动进攻。慕王谭绍光等指挥太平军，奋起迎战，在重创敌军之后，主动撤离。中外反革命联军凭借洋枪洋炮，相继侵占嘉定、青浦等地，焚烧掠夺，无恶不作。外国侵略者因一时侥幸取胜而趾高气扬，清朝统治者也因暂时得救而感激涕零，竟无耻地照会“英、法两国并俄国驻京公使，一律嘉奖”<sup>②</sup>，甚至把洋枪队誉之为“常胜军”，扩充至四千余人，昼夜进行训练。

但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在中外反动派弹冠相庆、神气活现的时候，太平军迅速地集中了兵力，举行了大反攻。五月，太平军发动了太仓之役，经过两天激战，敌军全线崩溃。太平军踏破清营三十多座，歼灭清军五千多人，击毙外国干涉军数百人，缴获了大批洋枪洋炮。接着，太平军又同外国干涉军激战于奉贤南桥，获得辉煌战果，击毙卜罗德，打伤何伯。人民群众因战争胜利而兴高采烈，热情地唱道：“南桥南桥，两下交兵，活

① 董恂：《洋兵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540页。

② 转引自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历史组：《沙俄武装干涉太平天国革命的罪证》，《文物》一九七五年第2期。

捉洋鬼，洋枪当柴烧。”太平军乘胜收复嘉定，进逼青浦，“常胜军”副统领美国人法尔思德焚城逃窜，太平军穷追猛打，生擒法尔思德，并把华尔和“常胜军”紧紧围困在松江城内。六月初，太平军进逼上海近郊。在一连串的沉重打击下，清军闻风丧胆，“洋人敛兵不动”<sup>①</sup>。左宗棠供认：“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sup>②</sup>

同上海战场相呼应，在浙江宁波，太平军也给予来犯的反革命联军以应有的惩罚。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太平军克复宁波。一八六二年初，英、法等侵略者擅自宁波城外划定“租界”，并无理要求太平军拆除城墙炮台，撤出宁波。太平军驻宁波守将黄呈忠复照驳斥说：“炮台城墙炮眼，我军性命攸关”<sup>③</sup>，“断难撤除”<sup>④</sup>；“本主将等北剿南征，无非欲得疆土”，“宁郡何能擅弃！”<sup>⑤</sup>黄呈忠等并庄严宣告：“租界区属于‘天朝’，所以它应该象中国其他的地方一样，绝对受太平军的管辖”，断然拒绝承认外国侵略者“对租界区的权利”<sup>⑥</sup>。五月，英、法侵略者悍然出动“孔夫子号”等军舰六艘，陆战队四百多人，伙同清军向宁波大举进犯。太平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奋起反击，一发发仇恨的炮弹射向“孔夫子号”等敌舰，杀伤大量敌人，然后为保存实力，主动转移。外国侵略者侵占宁波后，一面从上海调来华尔的部分“常胜军”；一面由法国侵华海军司令勒伯勒东和英国军官丢乐德

① 李鸿章：《权衡沪镇缓急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第30页。

② 曾国藩：《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9，第34页。

③⑤ 《黄呈忠范汝增致英法领事照会》，《太平天国》第2册，第748页。

④ 《黄呈忠致英总兵丢乐德克照会》，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415页。

⑥ 《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致北京英国公使普鲁斯的信》，《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22页。

克，先后组成了中法混合军（称“花头勇”，又称“常捷军”）和中英混合军（称“绿头勇”，又称“常安军”、“定胜军”）。他们先后陷奉化、慈溪等地。太平军节节抗战，在慈溪伤毙华尔，在绍兴伤毙勒伯勒东，给了罪恶累累的侵略分子以应得的惩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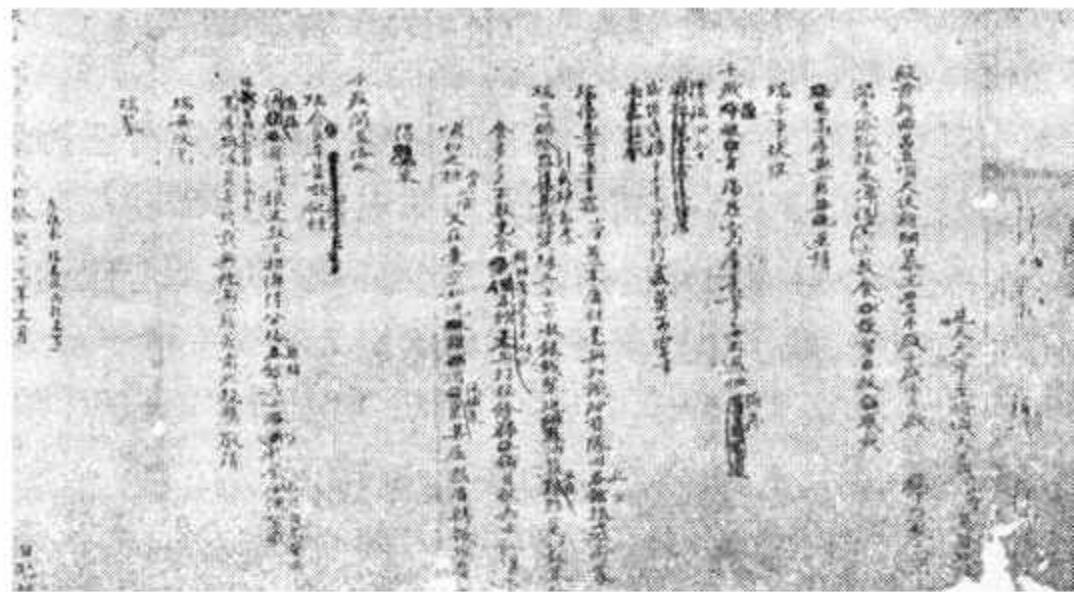


洋 槍 队

从一八六二年底以后，江浙根据地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中外反革命的联合进攻，和太平军主力因西线失利，湘军进逼天京，不得不挥戈西向，致使江浙战场的太平军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

这时，外国侵略者为了进一步绞杀太平天国革命，一面将干涉军留在后方，固守上海老巢，并大力加强和控制清军、“常胜军”，驱使他们去前线卖命；一面在坚持军事镇压的同时，加紧政治诱降，指使清政府采取分化太平军的策略。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参赞威妥玛要清政府“解散胁从、借为内应”，办法是清政府降旨“晓谕该‘贼’投诚，无不赦罪”，再由英国公使等“出示保其必能执信”。在他们看来，这样做“‘贼’势自灭，不及一旬，必有内应”，“金陵自不难于克复”。清政府心领神会，命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即着一体办理”<sup>①</sup>。

<sup>①</sup> 董恂：《洋兵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551—552页。



吳习玖致譚紹光稟稿

一八六三年三月，英国侵略分子戈登继任“常胜军”统领，伙同李鸿章淮军进犯苏南根据地，逐渐逼进太平天国苏福省会苏州。太平军在慕王谭绍光指挥下，“决心坚守阵地”，誓与苏州共存亡。他们面对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屹立不动，寸土不退”<sup>①</sup>。敌人因久攻不下，便采取了分化革命阵营的毒计，收买叛徒郜永宽等，于十二月惨杀了谭绍光，占领了苏州。李秀成早就知道郜永宽等“有投大清之意”，但他不惟“不罪”，还竟然对叛徒们说：“现今我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事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尔。”<sup>②</sup>这说明李秀成已经由悲观失望发展到包庇怂恿部属叛变的地步，他是造成苏州失守的罪魁祸首。洪仁玕说：“安庆之失，天京已危，及苏州一陷，得救之望绝少矣。”<sup>③</sup>

与苏州战场相配合，中外反革命联军在浙江战场也展开了

① 吟唶：《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566、56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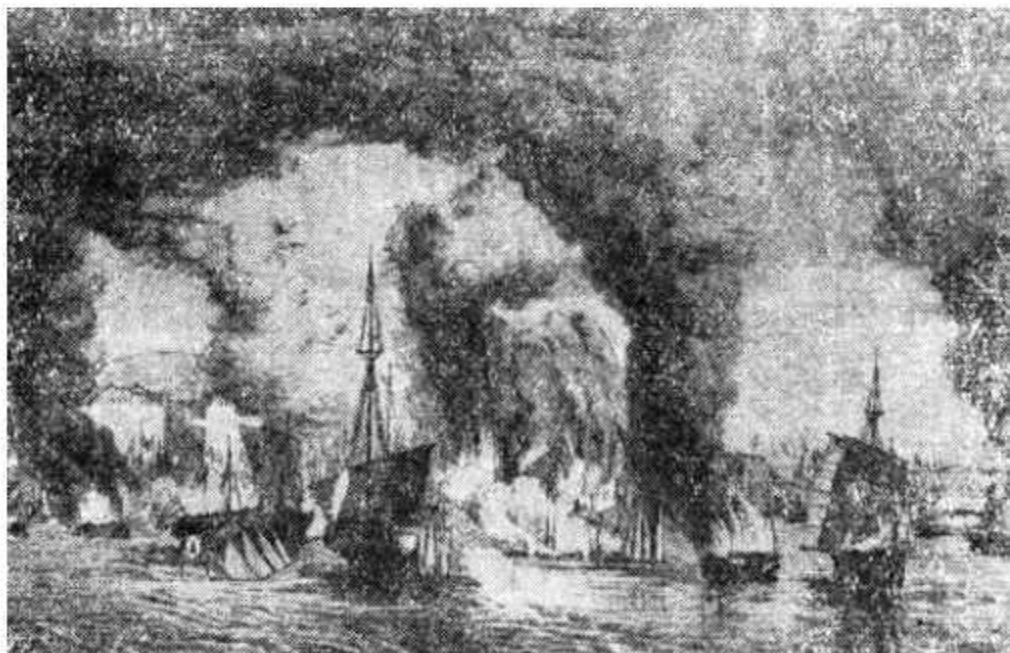
② 《李秀成自供》。

③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5页。

进攻。一八六三年九月底，“常捷军”伙同左宗棠湘军攻下富阳，十月包围了杭州。他们同样采取了“剿抚并用”的反革命策略。太平军在处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殊死搏斗，对外坚持抵抗，对内镇压谋叛分子。直到一八六四年三月，太平军终因内无粮饷，外无援兵，忍痛放弃杭州，突围北撤。李秀成的心腹钱桂仁公开投敌叛变，成了中外反革命的鹰犬。

## 五、英勇悲壮的天京保卫战

随着江、浙根据地的相继沦陷，天京东南屏障渐次尽失，加之西线失利，湘军进逼，天京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就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英雄们，立场坚定，毫不动摇，为保卫革命政权，浴血奋战达两年之久。



太平军保卫天京，炮击清军

一八六二年五月底，湘军主力曾国荃部的陆军，彭玉麟部的水师，趁着太平军主力集中江、浙的机会，自安庆顺江东下，进犯

天京，陆军踞雨花台，水师泊护城河。曾国荃湘军虽然气势汹汹，但在部署上却破绽百出。首先，进逼天京的水陆兵数仅逾二万，“兵力太单”，而“地势太阔”<sup>①</sup>。其次，“孤军深入，后路处处空虚”<sup>②</sup>。因此，曾国藩主张“方今处处兵单，似宜先守后战，脚跟站定，庶免震撼之虞”<sup>③</sup>。针对敌人的弱点和战略计划，洪秀全决定乘湘军立脚未稳之际，集中太平军主力，一举解除天京之围，巩固革命的根本之地。他命令东线太平军驰援天京，但东线指挥李秀成却拒不听命。李秀成只顾苏、杭，不顾天京，并被湘军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声言“其军常胜，其势甚雄，不欲与战”<sup>④</sup>。他主张等两年之后，“再与交战解京围”<sup>⑤</sup>。这在客观上正投合了曾国藩争取“先守后战，脚跟站定”的战略图谋。洪秀全非常气愤，派专使当面谴责李秀成“不忠”，揭露他有“自图之意”<sup>⑥</sup>，警告他“若不遵诏，国法难容”<sup>⑦</sup>。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虽被迫决定回援，但仍然磨磨蹭蹭，从六月一直拖到九月中旬，才“启队发行”<sup>⑧</sup>，十月十三日才投入战斗。这就使湘军获得了三个多月的准备时间。

天京保卫战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洪秀全调集太平军主力二十余万，占地五、六十里，环攻反革命劲旅湘军。湘军凭借水师优势，拚死顽抗。曾国荃面受枪伤，几乎丧命。远在安庆的曾国藩吓得日夜忧灼，心胆俱碎。太平军虽然英勇奋战四十余天，杀伤无数敌人，但终因李秀成贻误战机于前，动摇退却于后，而功败垂成。十一月下旬，在双方胜负未分的情况下，李秀成就

① 曾国藩：《复严渭春中丞》，《曾国藩未刊信稿》第59—60页。

② 曾国藩：《复多礼堂将军》，《曾国藩未刊信稿》第53页。

③ 曾国藩：《复吴仲宣漕帅》，《曾国藩未刊信稿》第89页。

④⑤⑥⑦⑧ 《李秀成自供》。

借口粮饷不继，下令撤兵。军粮、冬衣的缺乏，各将领的不能同心协力，固然是战胜敌人的困难条件，但并不是李秀成撤兵的主要原因。曾国藩说：“忠酋之党‘伪’听王败于上海四江口，余股就歼，苏昆腹地空虚，初四分‘贼’六七万人回顾老巢，初五又破逆垒多座，忠酋亦即回苏。”<sup>①</sup>由此可见，李秀成急于回顾自己的“封地”，才是主动撤兵的主要原因。天京保卫战的第一个战役，就这样结束了。

正面强攻不利，洪秀全又命令李秀成执行“进北攻南”的新计划。“进北攻南”的战略，就是渡江北攻，进军安徽、湖北，会合西北太平军，把战火引向敌人后方，夺取武汉，切断湘军补给线，迫使长江下游和天京外围的敌军回师救援，以便趁机歼灭湘军，解除京围。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认为“‘贼’志在武汉，此为舍坚攻瑕之计，使之得志，上游失守，其害不可胜言”<sup>②</sup>。但是，这个打中敌人要害的战略计划，却因遭到曾国藩和李秀成从内外两方面进行破坏而未能实现。开始，李秀成出兵就十分勉强。他说：“自攻（曾国荃湘军）未下，我主严责革爵，调我当殿明责，即饬我进兵北行，不得不由。”<sup>③</sup>十二月初，他派先头部队渡江，但他统率的后续部队却没有及时跟上。因他急急忙忙折返东线，欲救常熟。直到一八六三年三月以后，他才率部陆续渡江。这就使曾国藩争取到了时间，一面派兵进援皖北，层层设防，固守顽抗；一面令湘军猛攻天京，企图迫使太平军回援。李秀成军至六安州，面对着这种局势，又感到军粮难筹，加上急欲回救苏、杭，就擅自放弃了原来大有可为的攻势，匆匆南撤，使太平军受到重大损

① 曾国藩：《复方存之》，《曾国藩未刊信稿》第109页。

②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17，《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269页。

③ 《李秀成自供》。

伤。天京保卫战的第二个战役，又以失败而告终。

这两次战役的失败，使天京坐困的形势无可挽回地形成了。从此，太平军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进攻，而只能凭借城防工事，进行消极防御。相反的，反革命方面却取得了战略的主动权，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天京保卫战进入了更加艰苦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摆在太平天国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放弃天京，西走江西、湖北，会合西北太平军，另辟根据地；二是坚守天京，同敌人硬拚到底。显然，前者是保存革命力量，复兴革命大业的正确道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sup>①</sup>但是，洪秀全却狃于过去天京两次解围的经验，主张婴城固守，等待远征西北的太平军的救援，坚持走第二条路，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这显然是一大失策，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

形势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天京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正当农民英雄们进行英勇悲壮的战斗时，李秀成却在暗地里干着包庇纵容部属叛变的勾当。他的妻舅宋永祺同曾国荃的一个师爷接洽投降，松王陈德风也私通湘军萧孚泗，都因事泄被捕，他赶忙“出计保之”，行贿为之开脱，把事情平息下去。李秀成的背叛行动，使洪秀全警觉起来，加意防范。李秀成说：“自此之后，时时有人防备，恐我有变心”<sup>②</sup>。

一八六四年六月，太平天国杰出的革命领袖洪秀全，不幸因病逝世，为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一生。洪秀全的逝世，是太平天国的最重大的损失。太平军将士拥护幼

---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87页。

② 《李秀成自供》。

主洪天贵福即位，并多次粉碎敌人的“百计环攻”。七月，湘军挖地道用火药炸塌城墙二十余丈，闯入缺口。英雄的太平军将士，坚守革命信念，抱着与反动派誓不两立的决心，高喊着“弗留半片布与妖享用”<sup>①</sup>的战斗口号，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宁肯与敌人同归于尽，也绝不投降。革命的都城，屹立十一年之久的天京，终于沦陷了。保卫天京的太平军将士，英勇顽强，浴血奋战，慷慨悲壮，可歌可泣，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天京陷落后，幼主洪天贵福乘夜突围，至广德与洪仁玕会合，转战皖、浙边界，后入江西，兵败遇害。洪仁玕被俘后，敌人对他软硬兼施，时而高官厚禄的引诱，时而严刑拷打的折磨，但他都一一经受住了考验，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崇高气节。十一月，洪仁玕英勇就义于南昌。就义前，他还吟绝命诗以明志，最后两句是：“天国祚虽斩，光复待他年！”这种坚贞豪迈的壮志，永远值得后人颂扬。

与洪仁玕忠诚不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秀成的背叛投敌。天京失陷后，他被湘军俘



洪仁玕手迹

<sup>①</sup>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20，《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1页。

获，立即跪倒在敌人脚下，成了可耻的叛徒。他在遗臭万年的自供状中，为了替自己的叛卖行径寻找遮羞布，起劲地鼓吹孔孟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他宣扬清朝统治中国“是天命而来，非由自成”，“天朝数满”，“仍大清再复升平”。既然清朝“再复升平”是天命使然，那么他自己的投降就成了“顺天应人”的“义举”了。他恶毒地攻击太平天国革命，无耻地阿谀敌人，痛哭流涕地忏悔自己的过去，说什么自己“未悉天命之先排”，否则“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他甚至提出《收齐章程》十条，阴谋为敌人招降继续坚持斗争的太平军余部，以便消除清朝的“心腹之患”<sup>①</sup>，并妄图用革命战士的头颅去敲开自己的“幸福之门”。但是，这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最终仍被敌人杀了头，这正是一个叛徒的可耻下场。

### 第三节 封建统治者的反攻倒算和各族人民的继续战斗

#### 一、“隆礼”复辟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清朝封建统治者立即向农民群众大搞反攻倒算，血腥的屠杀，残暴的统治，沉重的压榨，一齐扑将过来，农民群众又陷入了黑暗、苦难的深渊。

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是一群口念仁义经、手舞大砍刀的杀人魔王。曾国藩抬出孔老二的亡灵作为残杀革命农民的护法

---

① 《李秀成自供》。

神，他叫嚷对太平天国“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sup>①</sup>。有个名叫方宗诚的程朱理学家，还公然把杀人说成是“行仁之术”<sup>②</sup>，用孔孟之道为刽子手屠杀革命群众打气和辩解。清军侵占天京后，狂叫着奉“主帅令”，“从‘贼’者杀无赦”<sup>③</sup>，挥舞着血淋淋的屠刀，进行了惨绝人寰的烧杀抢掠。“老弱本地人民……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sup>④</sup>他们“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sup>⑤</sup>。曾国荃手下干将萧孚泗从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sup>⑥</sup>。结果六代繁华的江南名城，惨遭洗劫。“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sup>⑦</sup>。李鸿章供认：南京已被湘军弄成“一座空城，……无屋、无人、无钱，管、葛居此，亦当束手。”因此，南京人连“妇孺”都“怨诅”曾国荃<sup>⑧</sup>。南京的遭遇，是反革命匪军蹂躏其他经受革命洗礼地区的缩影。“江、浙、皖三省，几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皆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sup>⑨</sup>广大劳动人民亲手画出的锦绣江南鱼米乡，被反革命匪军糟踏得残破不堪。

就在这累累的白骨堆上，清朝封建地主政权又重建起来。

① 曾国藩：《致沅、季两弟书》，《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7，第43页。

② 方宗诚：《与马命之书》。

③ 《江南黄烈女遗诗》，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纪载订谬集》第44页。

④⑥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20，《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6页。

⑤ 谭嗣同：《上欧阳瓣疆师书》，《谭嗣同全集》卷3，第326页。

⑦ 何绍基：《金陵杂述》四十绝，《东州草堂诗钞》卷26。

⑧ 李鸿章：《复郭筠仙中丞》，《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第34页。

⑨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用农民鲜血染红顶子的大刽子手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显赫要职，坐镇南京，依靠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和贪官污吏，残民以逞。他们建立“保甲局”，普遍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联坐，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和镇压。对所谓“不安本分”的人民，或编入“另册”，或于户口册加盖“有过”戳记，进行残酷迫害。对于太平军战士和忠实于革命的乡官，更是百计追索，甚至“因友及亲，敲骨吸髓，不满欲壑，不稍宽贷”<sup>①</sup>。那些参加过“天试”的知识分子，也被当做什么“斯文败类”而横遭抑勒屠戮。“州县仍如饿虎出林，绅衿如毒蛇发动，差役如恶犬吠村”<sup>②</sup>，这正是封建地主政权在大江南北复辟后的真实写照。

在大江南北复辟的封建地主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保护地主的产权，严禁佃农抗租。一八六三年末，清廷就命令督抚“于新复各处督饬各该州县，确切查明实在‘逆’产入官。其荒废地亩，有原主者，即行给领，尚未查得业主者，即著暂行造册登记”，“俟业主续归，再行给还”<sup>③</sup>。曾国藩在侵占南京后，就通令设立善后总局、分局，由地主豪绅主持，将“城内庐舍田地，分别清查，各还业主”<sup>④</sup>。曾国藩规定“业主”认占田地、房产的手续非常简便，凡是能够呈验印契的固然可以“准其管业”，就是无印契可以呈验的，也只须勾串邻里出具一张保结就成<sup>⑤</sup>。有些地方官府也悍然宣布“不分熟荒，概不准佃户私有”。这样，那些曾在革命风暴打击下一度成为“惊弓之鸟”的大大小小地主们，现在又依靠封建政权卷土重来，回窜乡里，

① 范城：《质言》，《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3期，第81页。

②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95页。

③ 《同治朝实录》。

④⑤ 《曾中堂示》，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

穷凶极恶地夺田追租，劫掠农民财产。他们有的自称“原主”，随意圈占荒地；有的乘战后农民“无以自存”之际，趁火打劫，以极低的代价“购买”农民的大片土地，如安徽南陵一带就有“富豪”用“几等无价值”的代价，大量收购荒地，最多者一家达两万余亩<sup>①</sup>；有的勾串地保、胥吏之类，任意“飞诡侵挪”，如浙江淳安有一个“掌户籍者”，就自动向一个破落地主献媚，说要把某地的“良田若干”，“潜易君名，可据为已有”<sup>②</sup>；有的肆意抢夺垦农的劳动果实，“往往垦农甫经办有眉目，即有自称原主，串同局董书差，具结领回”<sup>③</sup>。当时抢夺农民田产的，除旧有的地主分子外，还有从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湘、淮系官僚军阀。他们是政治上的新贵，经济上的暴发户。他们凭借在战争中掠夺的财富，依仗手中的政治特权，“逼占人妇女，强买人田宅”<sup>④</sup>，成为举国侧目的恶势力。湘军头子曾国荃，每攻陷一座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sup>⑤</sup>。他一人霸占的土地就有六千亩<sup>⑥</sup>。湘军将领郭松林，“出军中资获，置田宅十余万金，……复治宅省城，……侈于姬妾”<sup>⑦</sup>。湘军“诸将帅还者，挥霍煊赫，所过倾动，良田甲第期月而办”<sup>⑧</sup>。这些家伙除“田宅之外，如当店以及各项之豪买豪卖，无不设法垄断。贫民生计，占搁殆尽”<sup>⑨</sup>。淮系军阀头子李鸿章兄弟六人，“大购田地，毗近者悉为

①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715页。

② 章乃羹：《观山文稿》卷8，第12页。

③ 丁日昌：《抚吴公牍》卷37，第9页。

④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82页。

⑤ 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第3页。

⑥ 徐琦：《康居笔记汇函》，仲可笔记，第87页。

⑦⑧ 王闿运等：《湘潭县志》卷8，列传，第182、186页。

⑨ 李桓：《上王夔石中丞书》，《宝韦斋类稿》卷93。

所有，几于强取”<sup>①</sup>，在安徽合肥等地，先后占田六十万亩。

地主阶级不仅用巧取豪夺的办法抢夺农民的土地，而且想方设法向农民清租追欠。从《黟县佚名地主租簿》看，在太平军撤出安徽黟县、革命遭到挫折的情况下，于一八六四年秋冬，黟县地主就向佃农刮起一股大规模的清租追欠的黑风。这家佚名地主“照大众清租”例，先开出“欠租清单”，随即按照清单，逐户追缴。清追的对象，包括新佃、老佃、祖孙父子相承的世佃，乃至早已被撤换的旧佃。清追的范围从近年一直追溯到一、二十年前的所谓远年老欠。欠租数平均约相当于租额的五倍左右，有的高达十二倍以上。清追不遂，就撤田换佃，结果有一大半佃户被撤佃，失去了土地<sup>②</sup>。

地主阶级在清租追欠的同时，恣意扩大租额，采用大斗收租、按高价折合银钱交租等手段，残酷地盘剥农民。据苏州绅士王炳燮供认，当时租额极高，吴县的徐庄、塘桥，元和的车坊、甪直等处，“多有一石五六斗额”<sup>③</sup>。而每亩全年收获量才二石左右，瘠地只有一石二、三斗。地租剥削量高达百分之五、六十，甚至百分之七、八十<sup>④</sup>。苏州府属的城市地主在城里设收租柜，限期收租，交租要“折色”，即折钱或银，不要“本色”即实物。“折色”就当时具体情况说，是对农民更大的剥削。农民到期不能交纳，地主就派人偕同府县差役四出追租，“一不如欲，出缧绁而囚之，甚至以私刑盗贼之法，刑比佃农”<sup>⑤</sup>。贫苦农民被勒索得物产荡

---

① 刘本智：《异辞录》。

② 章有义：《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一个实例》，《文物》一九七四年第4期。

③④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33、37页。

⑤ 陶煦：《租覈》，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92页。

尽，地主恶霸就抢劫农民的妻媳儿女，以偿租抵债。有的豪强甚至搬弄“株连蔓延”的苛法，拘禁佃户的亲族邻友，勒令代交租税。

封建统治者的烧杀抢掠，夺田占产，横征暴敛，给广大农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一八七六年，有人就指责当时是“滴水成冰之世界”<sup>①</sup>。人民在“寒流”的袭击下，村村饿莩相枕藉，十家九室无炊烟。

封建统治者在从政治、经济领域进行反攻倒算的同时，在思想领域也大肆尊孔“隆礼”，拼命鼓吹孔孟之道。反革命湘、淮军所到之处，都把重修孔庙、扶植孔丘亡灵复位和设局刊发“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作为当务之急。曾国藩伙同李鸿章，遵照他们的祖师爷孔老二复辟“礼治”的遗志和孟轲关于“无礼无学，贼民斯兴”的教训，在太平天国都城的废墟上，立即重建孔庙和“江宁府学”。从一八六五年开工，到一八七〇年建成，“规模宏阔，甲于东南”，用银十一万七千五百余两<sup>②</sup>。曾国藩精心炮制了《重建江宁府学记》黑文<sup>③</sup>，由曾国荃书写，树碑立传。这块碑记是曾国藩颠倒黑白，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恶见证。

首先，他尊儒反法，攻击秦朝的政治制度。他胡说什么“汉承秦制，封禅郊畤之礼，多迂怪支离，不应经义”。他妄图从反对秦代祭礼着手，来否定秦朝的政治制度，这反映了垂死的地主阶级对革新事业的恐惧心理。

其次，他恶毒攻击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无耻地污蔑洪秀全领导的革命“窃泰西诸国绪余，燔烧诸庙，群祀在典与不在典，一切毁弃……并见摧灭”。敌人的恶毒咒骂，恰好证明农民英雄们

①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105页。

② 《上江两县志》卷11。

③ 曾国藩：《江宁府学记》，《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2，第33—34页。

打中了封建统治的要害。因此，虽然风暴已过，敌人还是惊魂未定，心有余悸。

第三，他大肆鼓吹尊孔“隆礼”，说什么“将欲黜邪慝而反经，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礼而已矣！”所谓“隆礼”，就是妄图通过所谓“崇祀至圣”，宣扬纲常名教，毒害农民群众的心灵，把农民群众的思想言行束缚在清朝统治者划定的“规范”之中，以便消灭革命于无形，复辟被太平天国打乱了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 二、前赴后继，坚持战斗

天京失陷以后，就全国来说，革命开始进入低潮，但广大农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一面坚持分散而无统一领导的武装反抗，一面零星地进行夺田抗租的经济斗争。

在江、浙、皖、赣等地区，农民群众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经济斗争。有的外省破产农民大批入境，运用暴力强占地主土地。进入皖南的客民“至则择其屋之完好者踞而宅之，田之腴美者播而获之”<sup>①</sup>。广德等县客民“强占田宅”，修造会馆，“私藏军器，动辄聚众，地方官并不（实际上不敢）严办”<sup>②</sup>。有的在租佃关系下垦辟荒田的农民，往往进行抛荒罢垦斗争。据《黟县四志》记载，“咸、同兵燹，荒秽滋甚”，“每召籍外之民垦殖，议三年获不责纳，佃益横狡，届约辄毁舍盗木弃而之他”<sup>③</sup>。这种抛荒罢垦斗争并不限于“籍外之民”。据《黟县佚名地主租簿》记载，同治十一年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71页。

② 《东华续录》（同治朝），卷88。

③ 《黟县四志》卷9，《政事志·田地》。

六月，“召佃汪灶春嫂”，“因坦荒芜，复行开荒，言定让他自收三年，开荒期满三年，再行议租。如三年之后，如推不种，即将三年租交清，方只准他退佃”。尽管事先作了防止退佃的规定，但结果还是在期满前就又抛荒了<sup>①</sup>。被清租的佃农，如数交清者寥寥无几，地主以撤田相威胁，他们就“霸田不交”，拒绝撤田<sup>②</sup>，给了那些气焰嚣张的地主当头一棒。

“抗租逋赋”，是当时农民进行经济斗争的主要方式。特别是在江、浙、皖、赣原太平天国地区，地主收租经常遭到农民的反抗。一八七六年，吴江县令编了一首《劝民还租歌》，歌的开头一句就是“莫欠租，莫欠租，欠租之人吴江多。”这个知县恐吓农民说：“抗租终是要还租，枉受官刑何值得。”<sup>③</sup>地主官府软硬兼施，妄图诱胁农民忍受残酷的剥削，但结果都枉费心机。“往往一差船至乡，则乡中之力不能完租者争赴县，甘死杖下，曰：‘吾辈有人而无钱也。’至人众船不能容，而隶役反无能为计。”<sup>④</sup>有的农民拒绝按地主原定苛重的租额交租，“费觉多而交租少”；有的农民反对地主强征好米好麦，“以糠粃土块搀和米麦擅交”；有的农民反对高价勒折租谷，“以租价不同，屡兴雀角”；有的地方遇到歉收年成，如一八七七年，苏州浒关发生旱灾，农民便“悉指枯稻举欲退租”；有的农民甚至奋起殴打逼租的地主，弄得地主既收不到租谷，又“受辱而归”。农民抗租斗争的普遍，说明这个地区封建剥削特别残酷，和农民斗志的显著增强。

广大农民群众一面进行经济斗争，一面继续坚持武装革命。

---

①② 章有义：《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一个实例》，《文物》一九七四年第4期。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69页。

④ 陶煦：《租覈》，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69页。

天京失陷后，太平军余部和捻军继续转战大江南北。

一八六四年八月，堵王黄文金率部撤出湖州，向江西转移，打算先联合江西抚州一带的侍王李世贤部，然后北渡长江会合在江西的扶王陈得才部，另辟根据地。但因屯聚抚州东北的听王陈炳文叛变，李世贤部为了避开敌人压力，已向江西南部转移。结果会师计划落空，黄文金所部成了势单无援的孤军。黄文金活动于浙赣边界，不久病死，余部败散。

十月，李世贤部穿过赣粤边界，进入福建，攻占闽南重镇漳州和龙岩。康王汪海洋部也从江西入福建汀州境内。他们试图在闽南建立一块根据地。李世贤曾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力求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他制定出保护农民和商人的法律，发布告谕指出“民以食为重，业以农为先”，号召农民“速返乡里，采尔甘蔗，收尔禾稻”<sup>①</sup>。他也希望利用漳州临近厦门的位置，开展对外贸易，以土产交换各种欧洲货物，特别是军火武器以装备自己。但是，他既想推翻清朝统治，又感“力量薄弱”，幻想以有损国家主权的屈辱条件，换取外国侵略者的“援手”，“共襄义举”<sup>②</sup>。这显然是十分严重的丧失民族立场的错误。

十二月初，李世贤在漳州附近大败福建水陆清军，并阵斩提督林之察。清政府急调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率重兵入援福建，英船帮助清军运兵，法国接济清军开花大炮。一八六五年三月，汪海洋率部转进广东镇平县（今蕉岭县），清军全力攻漳州。五月，李世贤战败走镇平。八月，汪海洋刺杀了李世贤。一八六六年二月，清军围嘉应州（今梅县），汪海洋战死，谭体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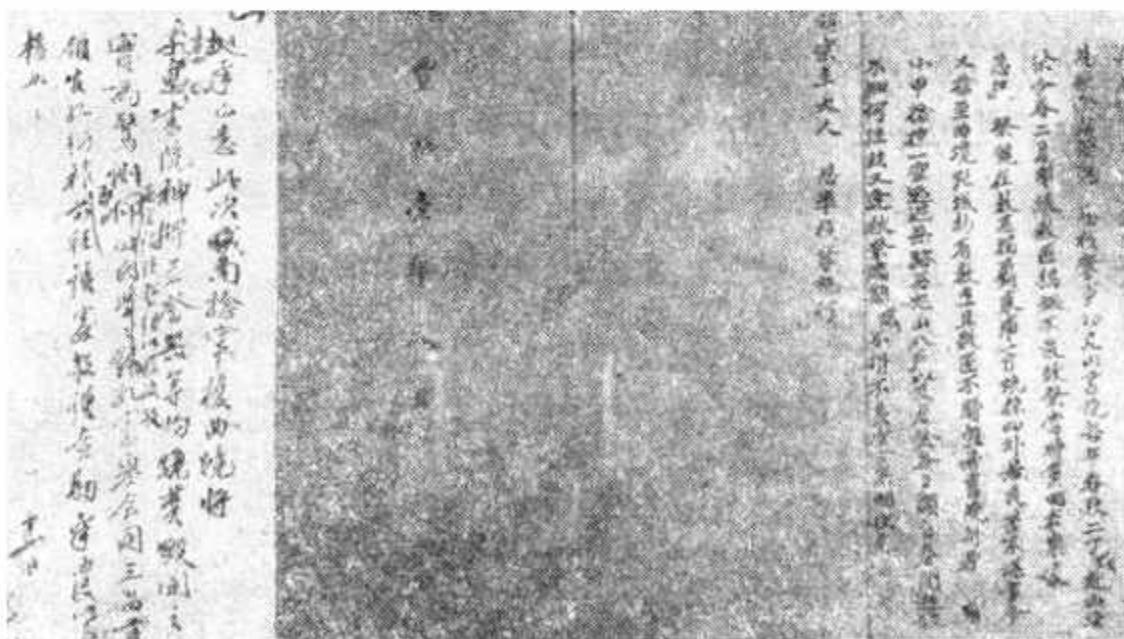
<sup>①</sup> 《漳州太平军首领告谕》，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632页。

<sup>②</sup> 《漳州太平军首领致各协约国书》，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633—634页。

率余部弃城出走，趋黄沙嶂，被清军包围，受伤被俘牺牲。

长江以南太平军的斗争虽然被反革命绞杀了，但长江以北的太平军和捻军还在不屈不挠地战斗。

自一八五七年捻军同太平军联合作战以来，捻军一直是太平天国的北方屏障。在中原大地上，捻军在武装反抗清朝的同时也燃起了反孔的熊熊烈火。从一八六〇年到一八六七年，捻军及其在山东同盟军，曾先后十六次攻打曲阜，毁庙宇，烧书院，杀腐儒，横扫孔孟之道，讨伐万恶的“圣人家”。一八六〇年十一月，捻军进攻曲阜东北乡一带，焚毁了孔庙、孔林的一部分。一八六一年九月，捻军联合白莲教起义军直逼孔孟的老巢曲阜和邹县，袭击了孔丘出生地尼山书院和号称孔丘讲堂的洙泗书院，焚毁孔老二的牌位和祭器。一八六三年白莲教起义军再攻曲阜，烧掉为吹捧孔丘母亲而修建的“颜母祠”，还经常以小股部队出没于曲阜、邹县之间，对所谓“圣贤林庙”、“衍圣公府”和“亚圣府”，造成极大的威胁。



尼山书院学录孔宪璧向孔府报告捻军活动的禀帖

一八六四年，天京陷落后，捻军同太平军的联合作战进入一个新时期。早在一八六二年一月，英王陈玉成在庐州时曾派赖文光、陈得才等会同捻军进军河南，远征西北，以便“广招兵马，早复皖省”<sup>①</sup>。一八六三年，捻军首领张乐行牺牲，余部在梁王张宗禹等率领下，继续坚持战斗。一八六四年十一月，捻军与太平军结合，共推遵王赖文光为统帅，捻军诸首领表示服从赖文光的领导，“誓同生死，万苦不辞”<sup>②</sup>。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兵制、纪律，整编了捻军，并把复兴太平天国作为奋斗目标。经过整编，捻军声威大振。一八六五年五月，赖文光率部诱敌穷追，在山东曹州设伏歼灭僧格林沁所部马队，杀死僧格林沁。清朝大惊，先后派曾国藩、李鸿章督湘、淮军攻捻。曾国藩针对捻军的流动战术，提出以静制动的方针，即以固定的点和线，来围困捻军。李鸿章督师后，仍然袭用此法，按照他的说法就是“先堵后剿”<sup>③</sup>。面对着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湘、淮军的围攻，捻军虽然屡败敌军，但在政治上提不出新的号召，又没有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因而斗争形势日益艰险。一八六六年秋，赖文光深感“独立难持，孤立难久”<sup>④</sup>，在河南许州将捻军分为东、西两支，以便互为犄角。一支以遵王赖文光为首，东入山东，打算联络鲁西肥城黄崖教起义、郓城水套人民起义、直隶南部盐民起义，称东捻军；一支以梁王张宗禹为首，西入陕西，打算联络陕甘回民起义，称为西捻军。东捻军转战于山东、河南、安徽、湖北一带，屡歼敌军，生擒淮军悍将郭松林，击毙淮军头目张树栅和湘军头目彭毓橘。一八六七年东捻军进入山东登莱地区，准备进行休整，但不幸陷入清军重围。李鸿章拚死扼守运河和胶莱河防线，清政府又雇外国轮

①②④ 《赖文光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63页。

③ 李鸿章：《行抵济宁筹防运河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1，第46页。

船运送由英、法军官训练、用沙俄武器装备的洋枪队在烟台登陆，四面围逼。十二月，在山东寿光，东捻军与清军主力决战失败，折损三万余人。赖文光率余部南走苏北。一八六八年一月，赖文光因伤被俘，在扬州就义。

以梁王张宗禹为首的西捻军，长驱入陕，在西安十里坡设伏，全歼陕西巡抚刘蓉所部湘军，然后进入陕北，开辟了以宜川为中心的临时基地。一八六七年底，西捻军得知东捻军危急的消息后，立即全师东下驰援。一八六八年初，西捻军深入直隶腹地，打算奔袭清朝老巢北京，吸引围困东捻军的清军，但因东捻军已经失败，原定计划落空。八月，清军会同洋枪队和英法侵略者的炮船，把西捻军围困于山东境内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西捻军几经苦战，不得突围，终于全军覆灭。

在太平军余部和捻军转战大江南北的时候，西南、西北各族人民继续坚持反清斗争。

贵州苗族起义军，在张秀眉领导下，一直活动在贵州东部、南部大部分地区，进行反封建斗争。苗军团结侗族、水族、布依族、回族人民，打击苗、汉地主豪绅，捣毁许多清政府修建的镇压苗民的城堡，夺取清军以“屯垦”为名所霸占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一八六七年，清政府陆续征调湘军席宝田部和川军唐炯部入黔。他们都有外国侵略者的支持和接济，特别是席宝田所率湘军，依仗洋枪洋炮，采取“雕剿法”，残酷屠杀起义人民。一八七〇年，由于清军大举进犯和苗族地主的叛乱，苗族起义军的中心台拱失守。张秀眉退到雷公山，率众坚持战斗。一八七二年四月，张秀眉被俘牺牲，起义最后失败。

云南彝族起义军，在李文学领导下坚持战斗。一八六八年，彝族起义军的根据地扩展到哀牢山北段大部分地区，生产也逐

步发展，能够自制铁工具和武器等。一八七〇年，清军全力进犯，起义军接连失利，王泰阶战死。一八七二年，李文学领兵援助大理回军抵抗清军时，被捕遇难。余部在李学东率领下，在艰苦的环境里顽强坚持战斗。清政府遣人招降，李学东坚定地回答：“我起义兄弟，已全为夷、汉庶民尽节，我所以不早死者，徒以满贼未除耳。我夷虽一时受挫，满贼终必败亡，为时亦不久矣！”①一八七六年夏，李学东病故，起义失败。

云南回族起义军，以大理为中心同清军相对峙。一八六七年，杜文秀集合二十万起义军包围昆明，声势颇盛。但久攻未下，内部发生分裂。清政府一面派广西西林县团练头子岑毓英带兵攻回，一面招降回族叛徒马德新等，“借回杀回”。一八七一年，起义军作战失利，杜文秀义子艾山（刘道衡）往伦敦献土称臣，背叛祖国，乞怜求援。一八七二年十二月，清军攻陷大理，杜文秀服毒后投降清军。一八七三年五月，清军侵占腾越等地，起义最后失败。

陕甘回民起义始于一八六二年，当时太平军陈得才部攻入汉中，陕西回民到处起义响应，号称十八大营。起义军以大荔的王阁村和羌白镇为主要据点，控制了渭河两岸，并屡次围攻省城西安。清政府先后派胜保、多隆阿统兵入陕，相继攻占羌白镇和王阁村，回民军主力大部退入甘肃。就在陕西回民起义受到挫折时，甘肃、宁夏、青海一带回民的反清斗争却正方兴未艾。金积堡、河州、肃州成为三个起事的中心。一八六七年春，清政府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率湘军前往镇压。左宗棠向英国汇丰银行等大量借款，从德国军火商那里购来大批军火，一面纵兵烧杀

---

① 夏正寅：《李学东传》，《哀牢夷雄列传》，《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二期，第54页。

抢掠，一面收回军叛将董福祥，“以回杀回”。一八七〇年春，金积堡的义军首领、富豪马化龙，向左军刘松山部投降，但起义群众不服，奋起击毙刘松山，乘机突围反攻。一八七一年冬，马化龙再次投降，金积堡终于被左军攻陷。一八七二年，据守河州的马占鳌开门迎降。一八七三年十一月，肃州马文禄献城投降。西北回民起义先后坚持十二年，终因篡夺了领导权的地主绅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而被清政府镇压下去。

各兄弟民族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在反对共同敌人——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中，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彼此支持，互相激荡，用鲜血和生命加深了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的革命情谊，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巩固了祖国的统一。

## 第四节 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 一、单纯农民战争高峰

历时十四年，转战十八省，先后克复六百多个城镇，规模空前宏伟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犹如惊天动地的一声春雷，划破阴霾密布的夜空，唤醒了亿万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奴隶，高举战旗，挥舞刀矛，向着那吃人的旧社会展开猛烈地冲击，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毛主席说：“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sup>①</sup>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在中国刚刚沦为半殖民地

<sup>①</sup>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183页。

半封建社会的初期。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已经打开中国的大门，但尚未深入内地，对封建自然经济的破坏还被限制在东南沿海的局部地区；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经济，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基本的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早已存在，但远没有突破自然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中不能起决定作用；中国社会中还只有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没有形成新的先进的阶级力量；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爆发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势力，从对抗走向结合，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而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则是农民阶级；因此，太平天国革命仍旧是一个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革命。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踏着陈胜、吴广“奋臂为天下倡始”的革命足迹，顶狂风，扫妖雾，坚持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把中国历史上的单纯农民战争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了巨大的准备，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太平天国革命对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进行了英勇地冲击，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长期遭受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束缚的广大农民群众，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下，奋起造反，他们组成强大的太平军，纵横驰骋大江南北，气势雄伟，锐不可挡，把清朝的反动军队、地主政权和封建地主特权，打得落花流水，打出了一个与地主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农民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制度，提出并部分实行了代表农民利益的各种革命政策。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是在农民革命战争的烈火中诞生，在战争的考验中成长的。它是农民阶级反抗清朝封建统治，镇压地主阶级及

其靠山外国侵略者的一种有组织的暴力。农民政权取代了地主政权，“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sup>①</sup>经过革命风暴的扫荡，清朝封建统治大大削弱，地主阶级日益分裂，爱新觉罗氏的皇权趋于衰落，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地主、官僚、军阀渐露头角，反动的清王朝已经不能照旧不变的统治下去了。

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还试图把反对封建“四权”，同推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结合起来，挖掉封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他们提出了一个以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的美好理想，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它的革命精神却鼓舞农民群众举起铁拳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列宁说：“革命愈深入，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sup>②</sup>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经过革命洪流冲击过的江南许多地区，“绅富产业多成灰烬，骨肉半已凋零”<sup>③</sup>。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有所缓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一定时期有了不同程度的削弱，出现了一批新的小土地占有者。有些农民运用暴力强占地主土地，如皖南宁国境内，就曾出现过“有主之业，百不获一，侵占之产，十居其九”<sup>④</sup>的局面。有些农民向官府认垦无主荒地，而获得土地所有权。据浙江《龙游县志》记载，经过太平天国革命，龙游“土著流亡十居其五，所有各田，多系客民承垦管业。”在江苏江宁、镇江一带，正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31页。

②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第304页。

③ 洪昌燕：《时务敏斋存稿》卷1，第15页。

④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66页。

如一八八八年英国驻镇江领事所说的：“一八六五年以后，长江以南的土地为先来者所占耕。他们耕种几年以后，（官府）便发给他们一张地契，令完纳田赋。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只有靠田地生产而能维持生活的穷苦农民才能占耕土地，而且只是小量的土地。”<sup>①</sup>此外，还有一批农民买得小块的土地。一八六九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奏称：“近来江南荒田因垦种乏人，类多贱卖。”<sup>②</sup>有些人“买荒田为业，或自种，或招佃承种。”<sup>③</sup>这样，革命后江南地区自耕农的数量就增加起来，个别县的自耕农甚至占有全县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如浙江汤溪，“富室多中落，田易佃而主，自有而自耕者什且七八。”<sup>④</sup>有些地方“昔时大户今（一八八〇年）皆中落，稍有力者类皆别谋生计，视田业为畏途。”<sup>⑤</sup>自耕农的增加，是活跃商品经济的有利因素；而某些地主“视田业为畏途”，把部分资金投入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农民革命风暴打击了封建桎梏，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

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在反对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同时，力图摆脱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以朴素的平等思想为指导，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掀起了群众性的讨孔怒潮，沉重地打击了奴役农民的精神枷锁——“圣道”和“神道”，促进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醒，形成了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不仅为历史上法家的反孔批儒斗争所望尘莫及，而且超过了以往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成为“五四”时期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73页。

②③ 马新贻：《招垦荒田酌拟办理章程折》，《马端敏公奏议》卷7。

④ 民国《汤溪县志》卷3。

⑤ 刘坤一：《查实江苏各属荒熟田地报部折》，《刘坤一遗集》第2册，奏疏，卷16，第570页。

打倒“孔家店”的先声。

太平天国英雄们，就用这些辉煌的战绩，撼动了“清妖”的魔宫蛇殿，掘松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基地，加速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步伐。

第二，太平天国革命破天荒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反侵略的任务，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把中国迅速殖民地化的图谋。面对着貌似强大的凶狠狡诈的外国强盗，农民英雄们刚毅坚强，欺骗利诱不能使他们弯腰，武力威胁不能使他们低头。他们反对殖民侵略和民族压迫，主张各国建立独立、平等、友好交往的关系。他们在外交谈判中坚持了革命立场，在战场上又杀出了中国人民的威风。他们的正义要求和气壮山河的斗争，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①

第三，太平天国革命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十九世纪中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疯狂侵略，引起亚洲各国人民的坚决反抗，亚洲出现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高潮。其中有波斯巴勃教派起义，印尼人民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斗争，印度民族起义，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则是这次亚洲革命潮流中的洪峰。尽管当时亚洲各国人民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还是各自孤立作战和缺乏联系的，但既然亚洲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侵略者是亚洲人民的共同死敌，那么他们所进行的解放斗争就不能不是彼此支持和互相影响的。早在一八五三年，正当太平天国刚刚兴起的时候，一个外国作家就写道：太平天国革命对“新加波、

---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95页。

印度、英国和美国说来，好象是地震似的打击。”<sup>①</sup>太平天国革命对资本主义世界是个“地震似的打击”，对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它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正象马克思所说的：“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sup>②</sup>

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太平天国的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一直在民间广泛地传播着，激励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不少会党打着洪秀全的旗号发动起义。义和团天津地区重要首领张德成，就以洪秀全自居。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以太平天国的后继者自许。许多参加辛亥革命的志士，曾从太平天国的榜样中，获得了反清革命的最初启示。

太平天国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证明了“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sup>③</sup>，“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sup>④</sup>，显示了亿万被欺凌的农民，一旦革命精神焕发出来，挣脱了身上的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镣铐，他们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就会象火山爆发一样喷射出来，推动历史巨轮滚滚向前。

---

① 《冈察洛夫全集》第3卷，第413页。

②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

③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76页。

④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67页。

## 二、农民不能成为革命的正确的领导者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

毛主席指出：“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sup>①</sup>绞杀太平天国革命的，正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及其走狗中国封建统治者，它们为了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建立了反革命联合战线。清朝封建统治者内则倚重汉族地主武装湘、淮军，外则无耻地“借师助剿”。外国侵略者一面用武器、金钱给垂死的封建统治者打强心针；一面组织干涉军和洋枪队，配合湘、淮军镇压太平军，惨绝人寰地屠杀中国人民。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在中外反革命的联合镇压下失败的。美国资产阶级学者丹涅特在《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说：“自从一八五三年以后，满洲皇朝的保存权位，并不由于它自身的力量，或者中国人民对它的忠诚拥护，而却出于列强的意愿，它才存在的。不然它早在太平天国暴动中被推翻了。”血的事实说明，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帝反封建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能被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镇压下去，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

---

<sup>①</sup>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40页。

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sup>①</sup>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洪秀全提出的和推行的农民革命路线，集中了农民群众的智慧，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愿望，把单纯农民革命思想发展到最高峰。它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团结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发起总攻击。但它毕竟是农民“革命本能的简单的表现”<sup>②</sup>，是农民思想的产物，并不是依据科学的世界观，在揭示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因而它仍然不能引导农民群众最终走向解放的道路。洪秀全及其战友们由于阶级的局限和封建思想的侵蚀，在领导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等战线的斗争中，都发生了不少缺点或错误，致使太平天国没有战胜中外反动派及其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代理人的夹击，终于悲壮的失败了。

首先，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基于农民小生产的特点，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的世界观和理论武器。他们用以指导自己行动的是农民朴素的平等思想，这种思想武器尽管在当时是最革命的，但是并不能彻底摧毁封建枷锁。他们还把这种平等思想戴上基督教的面纱，而宗教毕竟是唯心主义的东西，是对现实的歪曲的反映。浓厚的宗教色彩，神秘的宗教语言，终究有损于革命的政治内容。正因为这样，他们虽然对于儒家思想和封建法权进行过猛烈冲击，但是并没能从根本上战胜儒家思想的腐蚀和摆脱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67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页。

封建法权的羁绊。他们一面借“皇上帝”的权威鞭挞孔老二，否定孔孟的“妖书邪说”；一面又不能彻底揭露孔孟之道的阶级内容和反动实质，甚至说什么“皇上帝”“念他（指孔老二）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sup>①</sup>。他们反对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为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国而奋斗，但他们却又在自己的政权组织和制度中，因袭封建政权的某些形式，使新事物中保存了旧的封建残余。后来，洪秀全和洪仁玕虽然觉察到旧制度、旧思想侵袭的严重性，强调“甚矣习俗之迷人”<sup>②</sup>，提出“防意如防城”、“胜惑即胜敌”<sup>③</sup>的正确主张，但他们终究跳不出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找不到有效的措施加以抵制，在政治思想领域里彻底实行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专政。

其次，由于农民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不能彻底摧毁封建经济，建立起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太平天国英雄们不了解社会发展规律，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明确的纲领。他们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固然表现了在封建压迫下的农民群众对于土地的革命要求，但却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他们虽然通过各种形式打击了地主阶级，使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更多的农民不交租或少交租，但总的说来，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满足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迫切愿望，从而削弱了他们同农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他们提出的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虽然有着进步的意义，但在当时的中国还缺乏足以供其滋长的土壤。正因为他们不能用新的经济制度取代旧的经济制度，在经济领域里解放农民，彻

---

① 《太平天日》，《太平天国》第2册，第636页。

②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第2册，第525页。

③ 洪仁玕：《克敌诱惑论》，《太平天国》第2册，第661页。

底实行对地主阶级的专政，所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农民专政就失去了获得最后胜利并长期存在的基础。

第三，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由于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不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没有及时而彻底的把暗藏的敌人从各条战线上清洗出去。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人，纷纷向太平天国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失意文人、地方官吏、中小地主以及抱着各种不纯动机的人，相继混进革命队伍，其中有些是清朝的奸细，有些是个人野心家，更多的是投机分子。除了钻进来的以外，还由于儒家思想的腐蚀和封建法权的存在，在革命队伍里不断出现蜕化变质分子。这些家伙有的钻进领导核心，有的窃据地方要职，他们利用篡夺的军政实权，竭力推行投降路线，妄图颠覆农民政权，复辟地主阶级的统治。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英雄们，虽然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对这些阶级异己分子所推行的投降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对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还缺乏本质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还不可能明确地认识到革命内部始终存在着路线斗争。因此，他们既没有及时而彻底地把阶级异己分子从革命队伍中清洗出去，更没有充分地展开同投降路线的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彻底地清算，致使革命遭受到极大危害。

第四，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彻底解决革命内部团结和分裂的问题。革命的团结，是农民革命路线的重要内容，争取革命胜利的保证。而那些投降路线的代表人物，适应中外反动派的需要，则千方百计地分裂革命队伍，破坏革命的团结，其中有的发动反革命政变，有的独树一帜，有的搞独立王国。农民由于分散的个体小生产的生产方式，

造成了某些狭隘性和涣散性。推行投降路线的头子时刻想利用农民队伍本身存在的这种不利于团结的因素，以达到其政治上的反动目的。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英雄们，为了维护团结，制止分裂，曾经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狭隘眼界的限制，他们看不清团结与分裂斗争的阶级实质，没有足够注意农民队伍本身存在的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始终提不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战胜阶级敌人破坏团结的阴谋，清除发生分裂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第五，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虽然进行了英勇地斗争，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还处于“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sup>①</sup>，不能看出外国资本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不能看出外国资本主义联合中国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他们曾经错误地因为宗教的形式相同的原因，而把以信奉基督教作招牌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看做朋友，完全不了解侵略者只是利用传教事业作侵略的工具，没有预想到就是这些满口讲上帝的教义的国家，竟会帮助敌人来打倒自己。”<sup>②</sup>经过斗争实践和一连串事实的教育，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最后终于认清外国资本主义是他们的死敌。正如洪仁玕在就义前所说的：“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但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sup>③</sup>这是从血的教训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此外，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还不能从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他们在军事指挥上也犯了不少错误。

---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5页。

② 《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③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3页。

凡此种种，就使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不能领导革命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无法解决夺取全国政权的问题。这就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sup>①</sup>

---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08页。

## 第五章

# 中国社会加速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早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 第一节 外国资本主义卵翼下的洋务活动

### 一、秉承洋人旨意的“借法自强”

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前后，至中日甲午战争，这是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从沿海沿边向中国内地继续深入，中外反革命势力进一步结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在中国逐渐形成的时期。这时，在外国资本主义卵翼下，中国出现了喧嚣一时的举办洋务的狂潮。洋务活动是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的产物，是在尊孔崇洋路线指引下进行的。主持洋务活动的是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及至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在一八六五——一八六六年间，总税务司赫德和英使馆参赞威妥玛分别向清政府提出《局外旁观论》和《新议略论》，公然指令清政府在遵守已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同时，要向外国侵略者“借法自强”。“外国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sup>①</sup>他们所说的“外国所有之方便”，就是外国的近代工业技术和新式

<sup>①</sup> 赫德：《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17—18页。

武器；“中国原有之好处”，就是中国固有的孔孟之道和封建制度。在外国侵略者看来，“如以中国之声名文物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sup>①</sup>正是遵循洋主子的这种指示，洋务派一方面力求保存孔孟之道和封建的统治秩序；一方面不仅崇拜欧美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而且赞美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秩序。他们把尊孔、守旧和崇洋、卖国结合起来，以“孔子学于四夷”、“小国师大国”等儒家说教为护身符，匍匐在洋大人的脚下，用出卖中国人民权益的办法，乞求外国主子的支持，妄图利用洋枪、洋炮和新式技术，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镇压中国人民革命，保护以孔孟之道作为精神支柱的封建制度。后来，张之洞把洋务派的这种方针归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这正象鲁迅所揭露的那样：“‘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sup>②</sup>他们实际上是按照外国侵略者的要求，努力把衰败腐朽的封建统治制度，纳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模子里去。

洋务活动有两个轴心：一个是以“求强”作幌子的军事方面，一个是以“求富”相标榜的经济方面。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附属的。但在洋务活动的整个过程中，随着形势的发展，洋务的重点也在不断的调整，因而形成了洋务活动的两个阶段。

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是洋务活动的第一个阶段，重点集中在建立军事工业方面，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强化封建地主阶级的反革命专政。

洋务派头子奕诉、曾国藩、李鸿章等，在所谓“中外同心”绞

① 李提摩太：《时事新论》卷7，第3页。

② 鲁迅：《热风》，《鲁迅全集》第2卷，第57页。

杀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认识到洋枪洋炮是镇压人民革命的有力武器，是挽救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救命稻草。所以，他们极力主张向外国侵略者大量购买洋枪洋炮，并大肆宣扬办厂仿制的重要。奕䜣说：“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sup>①</sup>曾国藩说什么：“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sup>②</sup>“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sup>③</sup>李鸿章对洋枪洋炮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sup>④</sup>就是在这种崇洋媚外思想指导下，他们十分热衷于近代军事工业的经营。

一八六二年，曾国藩创设安庆军械所，这是洋务派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工厂。此后，在许多省份都相继建立了军事工业。其中主要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等。

江南制造总局是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一八六五年，李鸿章购买了美商的旗记铁厂，并将苏州制炮局部分机器和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来的机器拼凑一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它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并附设翻译馆。江南制造总局是湘、淮两系共同创办的，但实权却把持在淮系手里，主要的工程师是英国人彭他和柯尼施。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页。

②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7，第5页。

③ 曾国藩：《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第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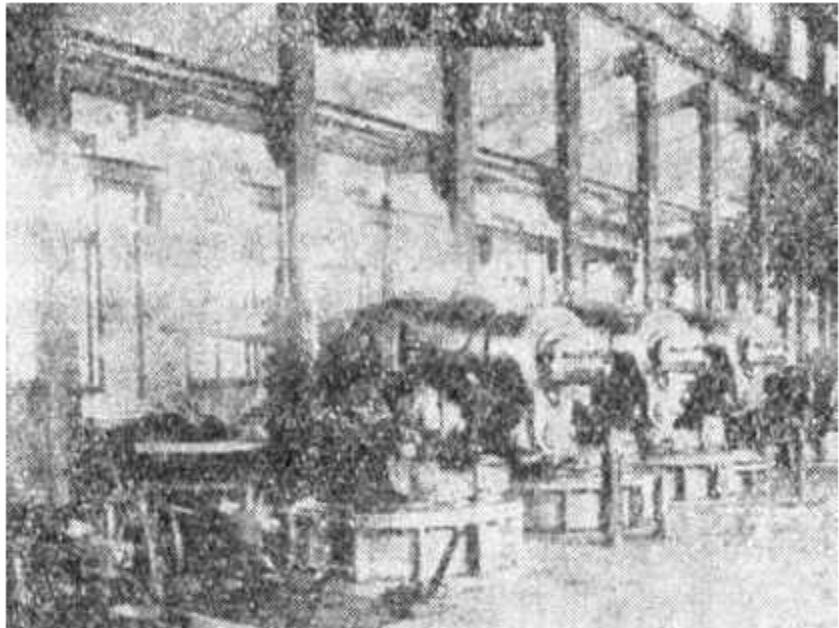
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

金陵机器局是一八六五年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后，将英国人马格里主持的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改建而成的。它的规模比江南制造总局小，但制造

的枪炮种类却更多。它在李鸿章的直接控制下，成为淮系军阀屠杀人民的军火供应基地。

福州船政局是洋务派创办的最大的轮船修造厂。一八六六年，湘系军阀左宗棠在闽江口马尾山下设局建厂，专门制造轮船，并附设求是堂艺局，延师教习英法两国语文、算法、画法。左宗棠任命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和法国洋枪队头目德克碑为福州船政局的正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sup>①</sup>福州船政局从一八六八年正式开工起，到一八七四年，仅仅造船十五只，而且都是由日意格主持用法国破旧机器装配成的。

天津机器局最初是满洲贵族创办的军火工厂。清政府担心汉族官僚军阀操纵军事工业，为了“防患固本”<sup>②</sup>，于一八六七年命令北洋三口通商大臣、满洲贵族崇厚设立天津机器局，以英国



江南制造总局炮厂

<sup>①</sup> 左宗棠：《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0，第64页。

<sup>②</sup> 李鸿章：《筹议天津机器局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6页。

人密妥士为总管，购买外国机器，制造火药，供应卫戍京师的军队使用。一八七〇年，李鸿章在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接办天津机器局，并从香港等地招来“洋匠”，添置设备，大事扩充，把它建成“洋军火总汇”，即淮军和直隶、河南、吉林、奉天等省军队的军火供应库。

除了这四大兵工厂以外，清政府还相继在西安、兰州、济南、成都、昆明等地和湖南、广东、吉林、山西、浙江、台湾等省设立机器局，规模虽然较小，但均为能供应各省清军军火以镇压各地人民起义的地方性兵工厂。

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并不是资本主义企业，而是中国历代封建政权制造军器的官府手工业的继续和发展。

这些军事工业，属于清政府所有。它采用官办的方式，由清政府派官员经办，职务有总办、会办、提调等角色。这些家伙“或且九九之数未谙，授以矿质而不能辨，叩以机栝而不能名，但求不至偷工减料，已属难得，器械利钝，悉听工匠指挥，茫无分晓”<sup>①</sup>。在经营管理上完全是一套腐朽的官僚制度，营私舞弊成风。“购料则价不尽实，工作则时多废弛，材料则任便作践，成货则或致盗窃，出售则价或分肥，即不然用人或碍于情面而多冗员，办事则狃于请托而多迁就，以乱章为圆到，以姑息市私恩。甚或苞苴公行，干俸累累，……似此种种弊窦，层层朶削，安有不赔累倒闭者哉！”<sup>②</sup>

这些军事工业，生产经费全部由国库开支，制造出来的枪炮、弹药和轮船，由政府调拨给各军，加强镇压人民革命的力量，不计算产品的价格，不以商品形式参加市场交换，企业没有盈利

① 胡燏棻：《上变法自强条陈疏》，《皇朝经世文三编》卷16，第2页。

② 《郭春畲对问》，《直隶工艺志初稿》丛录下，第15页。

可言，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金内部积累。企业的繁荣和停滞，不取决于市场需求和企业本身的生产，而同政府的拨款息息相关。在正常年景，“一切工料资本，每岁均有定额，即有自出心裁，思创一器者，而所需成本，苦于无以报销”<sup>①</sup>。何况清政府财政拮据，每年定额经费往往不能付足。比如，福州船政局每年定额经费八十四万两，但因经常打折扣，不得不停工待款，甚至“积三年之费，不能成一新式快船”<sup>②</sup>。

这些军事工业，分别隶属于几个洋务集团，具有封建割据性。洋务派在举办洋务的过程中，分别结成了以李鸿章为中心的淮系集团，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中心的湘系集团，以张之洞为首的集团，他们把各自创办的军事工业都看作是本集团的私产。李鸿章特地向清政府声明，他所开设的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乃是淮系的“命脉关系，诚不敢轻以付托”<sup>③</sup>。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设立的福州船政局，在他调任陕甘总督后，继续控制在他手中。各个派系之间，畛域分明，互相倾轧。他们口口声声喊“求强”，其实所孜孜以求的只是地主买办之强，封建军阀派系之强。

所有这些，是官办军事工业缺乏生命力的重要根源，是它的封建性的突出表现。

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是洋务活动的第二个阶段。筹建海军和围绕军事工业而建立民用企业，是这一阶段的特点。

军事工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洋务派把这个环节勉强地移植过来，因为缺乏本国社会经

① 胡燏棻：《变法自强疏》，《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第23页。

② 张佩纶：《筹办船政事宜折》，《洞于集》，奏议，卷4。

③ 李鸿章：《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57页。

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一连串的困难。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上，技术落后，人材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原料、燃料供应的困难，并追逐高额利润，以便发财致富和为“养船练兵”<sup>①</sup>建立经济基础，洋务派除继续经营军事工业外，还围绕军事工业建立了其它有关民用企业。

洋务派是在“求富”的口号下，提出举办民用企业的主张的。李鸿章垂涎外国资本主义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认为“富”是“强”的先决条件。他说：“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sup>②</sup>“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sup>③</sup>他为了“求强”而“求富”，企图通过“求富”来支撑和发展军事工业，借以达到“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权势的目的。

这个时期，国内已具备发展民用工业的客观条件。自然经济因外国商品的倾销而逐步解体，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正在扩大。外国在华设厂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他们的高额利润刺激着某些官僚、买办和商人产生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兴趣。

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派共举办民用工业企业二十

<sup>①</sup>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50页。

<sup>②</sup> 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第43页。

<sup>③</sup> 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第25页。

多个，其中包括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纺织业等。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唐胥铁路、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官局等。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活动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一八七二年，李鸿章奏请设立，他派浙江海运总局总办候补知府朱其昂拟定轮船招商章程，在上海设局招商。李鸿章凭借职权，先后借拨官款一百九十余万两，招得商股七十三万多两。商股主要来源于官僚、买办和旧航运业转来的资金。官款由招商局轮船运输漕米等物抵还。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sup>①</sup>，并借机搜刮钱财，扩充本集团的实力。他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sup>②</sup>。可见，该局在洋务派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初，只有轮船三只，到一八七六年陆续添船九只，一八七七年又高价收买美商旗昌洋行的破旧轮船十八只，共计拥有轮船三十只。轮船招商局除经营沿海与内河航运外，还试图开拓海外航运业务，曾先后派遣轮船驶往日本、美国、东南亚等地。结果由于外国侵略者的排挤，使轮船招商局的远洋航运遭到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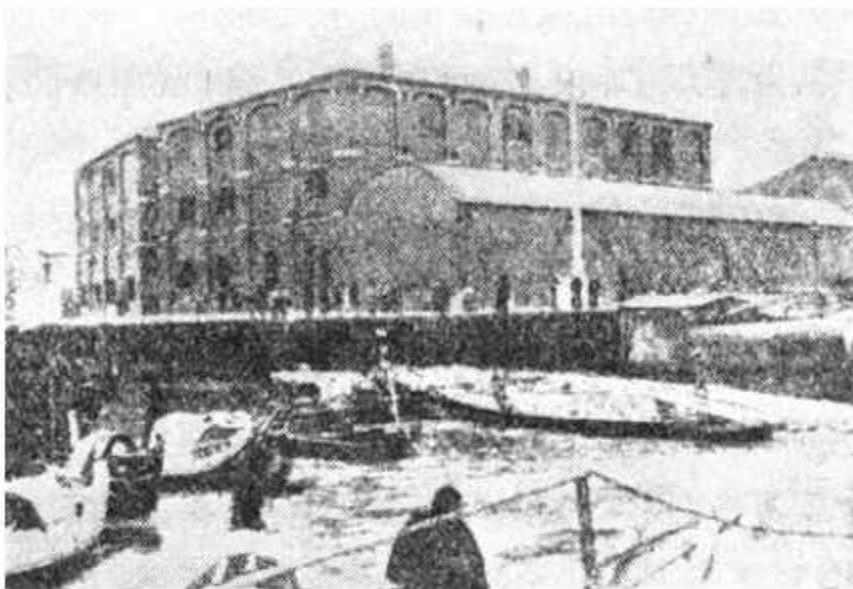
一八七七年，李鸿章任命轮船招商局总董唐廷枢在天津设立开平矿务局，开采开平镇唐山煤矿，一方面满足外国轮船、清朝军舰、商轮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需要；另一方面为了“榷其余利”，“养船练兵”<sup>③</sup>。原拟官办，后因清政府财政困难，改为官督

---

① 李鸿章：《轮船招商请奖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5，第4页。

② 李鸿章：《复刘仲良方伯》，《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第24页。

③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50页。



轮船招商局仓库

商办。计划招股八十万两，但到一八八〇年股金只凑集了三十万两。资金不足，只好靠借贷度日。据说它“自直隶省总督衙门借款二十万

两，自民间借款四十五万两，加上出煤以来三年售煤所得价值三十二万余两，用以补足开支”<sup>①</sup>。因此，“在最初十年中，始终未能分付股息”<sup>②</sup>。开平煤矿自一八七九年开始，由英国矿师巴赖主持，应用从外国购办的机器，以新式方法开采。九十年代又增开林西煤矿。至一八九五年职工约有一万七千人，年产煤约六十万吨。开平煤矿蕴藏丰富，煤质优良，获利较多，为帝国主义所觊觎。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英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官僚资本家，通过私相授受的方式，霸占了开平煤矿。

黑龙江漠河金矿是一八八一年清政府创办的。漠河地处我国东北的极边，北隔大河，同沙俄毗邻。清政府把开采漠河金矿视作巩固边防的一个措施，垫借资本十三万两，商股只有六万余两，规定矿局总办有与俄国便宜交涉的权力，矿局可自募兵勇。名义上官督商办，实际上类似清政府的一个边政机构。漠河成了“兵民辐辏”的“边陲重镇”<sup>③</sup>。一八八九年初，该矿正式开采，

①② 日本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第10辑，第630页。

③ 李鸿章：《漠河金厂请奖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5，第19页。

工人约二千人。一八九〇——一八九二年的三年内，共得金砂六万二千余两。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沙俄把魔掌伸进我国东北，侵占了漠河金矿，几经交涉，一九〇一年始由清政府用款赎回，但该矿已遭到严重破坏。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一八八二年李鸿章奏请设立的，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工厂。起初，是候补道彭某等上海几个官僚、商人集资申请兴办，经李鸿章奏准拨给官款，先后派郑观应、龚寿图、龚彝图、盛宣怀等人主持局务，成为官督商办企业。李鸿章说：“设局纺造布匹”，目的在于“冀稍分洋商之利”<sup>①</sup>。所谓“稍分洋商之利”，不过是与侵略者一道压榨中国人民，追逐高额利润的代名词。厂址设在上海杨树浦临江地方，有纱锭二万七千个，布机三百台，均由英、美进口，技师雇用美国人丹科等充任。由于美国技师刁难，封建官吏经理不善，以及资本不够充裕，直到一八九〇年才有部分机器开车生产。但投产不久，一八九三年清花厂起火，租界救火会坐视不救，厂货被焚，刚刚建成的大工厂顿时变成一片瓦砾。估计损失不下七十余万两。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后，李鸿章派盛宣怀负责重建。盛宣怀另起炉灶，于一八九四年设立华盛纱厂，资本八十万两。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官款的损失，规定“悉归以后商办各厂按每出纱一包提捐银一两，陆续归交”<sup>②</sup>，完全转嫁到民族工业身上。

唐山胥各庄铁路是由李鸿章根据原开平矿务局矿师英国人巴赖的提议，为了解决开平煤矿运煤的需要而决定修筑的。聘请英国人金达为技师，筹备建筑事宜。该路于一八八〇年开工，费时一年，全长十一公里，这是中国自建铁路的开始。后来，李

① 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第43页。

② 李鸿章：《推广机器织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第10页。

鸿章为了延长这条铁路，东至山海关、西至天津，特地组织天津铁路公司，官督商办。一八八八年，唐山至天津铁路建成。一八九〇年李鸿章又成立官办的北洋铁路局，吞并了天津铁路公司的私股。一八九四年修成唐山至山海关段，并向关外延伸了六十四公里。

此外，台湾巡抚刘铭传聘请英国技师马德逊主持，于一八九一年和一八九三年相继筑成台北——基隆、台北——新竹两条铁路。原为官督商办，后因官、商矛盾重重，改为官办。甲午战争前，洋务派修建铁路不过四百公里。洋务派修建铁路主要是从军事上的需要和解决财政困难出发的。在他们看来，修筑铁路可以增加“洋税厘金”，替侵略者开辟市场；便于运兵输饷，镇压革命；便于运送煤铁，促使“矿务益兴”，“而军需利源，更取不尽而用不竭”；总之，这是关系“国计军谋两事，尤属富强切要之图”<sup>①</sup>。

在这个阶段，新起的洋务派头子张之洞在湖北搞了一个所谓“自相挹注”的工业体系。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年）河北南皮人，出身于封建官僚世家。一八六三年考中进士。一八八二年调任山西巡抚，他一到任，就一面大搞尊孔读经，祭祀孔老二，核定隆重的祭孔章程，建立“令德堂”，专事“通经学古”；一面设立“洋务局”，高喊“洋务为当务之急”。一八八四年，他升任两广总督后，就奏准借外债购买洋枪洋炮，并招聘外国军官教练反动军队，还说什么他这样做是符合“经之明训”<sup>②</sup>。一八八九年，他调任湖广总督，更一头栽到英、德的怀抱，依赖外力举办洋务，在湖北陆续建立起一批新式工厂。其中包括汉阳枪炮

① 李鸿章：《妥议铁路事宜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第21—22页。

② 张之洞：《筹议海防要策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1，第16页。

厂（一八八九年创立，官办）、汉阳制铁局（一八九〇年创立，官办）、大冶铁矿（一八九一年创立，官办）、马鞍山煤矿（一八九一年创立，官办）等重工业厂矿，以及湖北织布局（一八九〇年创立，官办）、湖北纺织局（一八九四年创立，先官商合办，后改官办）、湖北缫丝局（一八九四年创立，官督商办）和湖北制麻局（一八九四年创立，官办）四个轻工业工厂。张之洞的洋务活动也是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他别出心裁的说什么“兵事乃儒学之精”。他创办炼铁厂，就是为了给制造枪炮提供原料；他办丝麻纺织等轻工业，目的在于攫取盈利，“佐助铁局经费”<sup>①</sup>。张之洞的一个亲信幕僚说他举办洋务是“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sup>②</sup>。

此外，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企业，比较著名的还有：一八七五年刘铭传在台湾开设的基隆煤矿；一八八〇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的电报局、左宗棠在西北创办的兰州机器织呢局等。

总之，在这一个阶段里，军事仍是洋务活动的中心，但是，范围已经扩大。前一阶段官办军事工业的清一色的局面已经改变，开始创办民用企业，并且为了解决经费和管理上的困难，在非军事部门内吸收了私人投资。采取的形式有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主要的是官督商办。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官督商办企业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洋务派缺乏经费，并害怕私人自由开办企业，因而阴谋通过官督商办，利用、控制和侵吞私人资本，以便“收天下之财为己用”；而握有资金的地主、官僚和商人，既贪图新式企业的利润，又不甘冒独立经营的风险，为了取得封建政权的荫庇，希望投资于洋务派所主办的新式企业，这

① 张之洞：《增设纺纱厂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5，第21页。

② 奉鸿铭：《清流党》，《张文襄幕府记闻》。

就是为什么官督商办形式盛极一时的原因。

在官督商办形式下兴办起来的企业，主要都是为了销售于市场而进行商品生产，并且在开始经营的时候，创办者都期望该企业能多少赢得一定的利润；它们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的特质。但是，绝大多数官督商办企业并不是民族资本主义，而基本上是早期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因为虽然资本全部或大部分来自私股，私股保持着资本的所有权，但代表国家政权的洋务派大官僚，在这类企业中却处于支配地位，掌握着企业的经营管理、资金和人事调配大权。而私股根据官督商办企业章程的规定，一般都无权过问局事，只有股金上一万两者，才准派一人入厂司事，但仍须由督办察看；企业的生产和分配主要是为巩固封建统治和扩大洋务派政治经济势力服务的；就盈余分配来说，招商局等企业的盈余，首先要有数成报充政府的军饷及其它贡赋，其次是总办等人的花红，所余才是股东红利。很显然，这类企业是洋务派利用、控制和侵吞私人资本的一种形式。洋务派官僚利用掌握企业经营管理权的便利，通过贪污盗窃、挪用资金、挥霍浪费、政府勒索等办法，侵蚀企业的私人资本。结果使官督商办企业大都“股本耗折，成效毫无”，股东备受亏累。当时有人说：洋务派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二十年来，到处创办，到处无成”<sup>①</sup>。绅商闻官督商办和集股之事，“咸有戒心”<sup>②</sup>，视为畏途。

官督商办，在企业内部，“由官总其大纲”<sup>③</sup>，“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sup>④</sup>；在企业外部，则依靠封建政权实行专利垄

① 俞赞：《恤商论》，《皇朝经世文三编》卷31，第12页。

② 陈炽：《矿人》，《庸书》外篇，卷上。

③ 李鸿章：《论试办轮船招商》，《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第40页。

④ 李鸿章：《试办招商轮船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0，第33页。

断，其办法主要是：（1）由封建政权给予各种减免税厘的优待。如开平煤矿每吨煤税由六钱七分二厘减为一钱。（2）在营业上给予它们以种种便利条件。如给予招商局轮船以装运漕粮的特权。（3）从国库获得垫借巨款的利益。比如一八七七年轮船招商局自有资本仅七十三万两，而从政府借来的资本达一百九十万两。（4）禁止开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相竞争的同类企业。比如，李鸿章在创办上海织布局时，就为该局奏请“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sup>①</sup>。在一八九三年筹设华盛纺织总厂时，李鸿章又要求清政府“应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合中国各口综计，无论官办、商办，即以现办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为额，十年之内，不准续添”<sup>②</sup>。

这种垄断，名义上是防止洋商排挤，保护利权，实际上是限制民族资本，摧残民族工业，为官僚、买办们“求富”，替“洋商”扩张在华侵略势力开辟道路。

官商合办企业数量很少，这类企业是官、商妥协的产物，因为官最喜欢官督商办，商则希望“官为保护，商自经理”，妥协办法是官商合办。但因官商合办企业依然控制在洋务派官僚之手，没有获得多大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里，外国侵略势力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边疆危机纷至沓来。洋务派一面坚持对外妥协投降的方针，不断的丧权辱国；一面又利用外部危机扩充自己的实力，积极筹建海军。

早在一八六一年，洋务派就开始了建立海军的活动。清政府根据赫德的提议，决定叫正在英国休假的海关总务司李泰国

---

① 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第44页。

② 李鸿章：《推广机器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第11页。

采购船只，建立近代海军，从水路进攻太平军。一八六二年，李泰国在英国擅自招募六百多名军官、水手，并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司令，组成“中英船队”。一八六三年，这只船队开到中国，英国图谋通过李泰国和阿思本加以控制，引起同湘、淮军阀争夺指挥权的矛盾，迫使清政府决定遣散。

一八六六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设局监造轮船”，“整理水师”。一八七四年，丁日昌提议成立北洋、南洋、东洋三支水师，北洋水师负责山东、直隶海面，设司令部于天津；东洋水师负责浙江、江苏海面，设司令部于吴淞；南洋水师负责广东、福建海面，设司令部于南澳。一八七五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调拨关税和厘金四百万两作为经费，准备在十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海军。一八八四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大约南洋海军有军舰十七艘，北洋海军十五艘，福建海军十一艘。南洋、北洋和福建水师分别掌握在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和福建船政大臣手中。在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覆灭，南洋海军受了损失，北洋海军由于李鸿章避战自保，而保存了实力。

一八八五年，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管理一切与海防有关事宜，派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大臣，以李鸿章为会办，实权操在李鸿章手中。一八八八年，李鸿章乘机把北洋海军扩建成北洋舰队，拥有两艘七千多吨的铁甲舰，七艘三千吨以下的巡洋舰和其他舰船十三艘，还修建了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成为最大的一支海军。海军衙门成立后，海军经费大部分被奕譞挪作为那拉氏兴建颐和园之用。从一八八八年后，海军停止添船，一八九一年又停购军火。因此，北洋舰队建成后，军力就没有什么发展。

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口口声声以“自强”相标榜，好象真是要抵御外国侵略似的。其实，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扩充本集团的实力，镇压人民革命。正如他在购买外洋枪炮时所供认的那样，“亦不过聊壮声威，未敢遽云御大敌也”<sup>①</sup>。

北洋海军具有明显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它拥有船舰二十二艘，其中就有十七艘购自外洋（德国五艘，英国十二艘），其余五艘虽说是自制的，其实“一切钢铁料件，皆由西洋订购”<sup>②</sup>，并由洋匠拼凑而成。教官英、德并用，英国人琅威理和德国人式百龄曾先后担任北洋海军的总教习。这些洋员惟以控制北洋海军为能事，对于军事训练，只知敷衍塞责。“自设海军以来，所备大小兵轮，不下数十余艘，平日除会操载送官员外，一无事事”<sup>③</sup>。军中派系畛域很深，“军官多闽人，……提督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sup>④</sup>。头目腐化，军纪废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sup>⑤</sup>。对于北洋海军的腐烂情状，“识者早忧之”<sup>⑥</sup>，可是李鸿章却视而不见，采取放任态度。一八九一年，他在第一次检阅北洋海军后，竟然自欺欺人的吹嘘什么：“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sup>⑦</sup>

① 李鸿章：《查阅大沽炮台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8，第20页。

② 李鸿章：《拟驶船政请饬造三铁甲船奏稿》，《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7，第40页。

③ 郑观应：《游历》，《盛世危言》卷2。

④⑤⑥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第1册，第63页。

⑦ 李鸿章：《巡阅海军竣事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2，第4页。

## 二、卖国主义的洋奴哲学

洋务派把他们搞的洋务活动美化为“求富”、“自强”之道，吹嘘成“入圣之门径”，“报国之经纶”。其实，这完全是无耻的谎言。他们奉行卖国主义的洋奴哲学和尊孔崇洋路线，使中国不仅没有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反而更深地陷进了半殖民地的泥潭。

洋务派既是外国殖民主义的忠实走狗，又是中国封建主义的驯服奴才。他们杂揉封建主义奴才哲学和殖民地奴化思想，造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洋奴哲学。在他们看来，中国除了孔孟之道和封建制度，一切都不如洋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他们举办洋务，事事照抄外国，处处依赖洋人。真可谓离开了洋主子，土奴才就寸步难行。正因为一切都仰承洋人鼻息，所以他们所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除了封建性之外，无一不具有买办性的特点。

第一，在资金来源上依赖外国资本。洋务派头子李鸿章公然提出“借债以兴大利”<sup>①</sup>的主张，想靠外国贷款举办洋务，使洋务派获得“久远”之利。轮船招商局竟不惜以动产、不动产和运费收入作抵，在一八七二——一九一年间，先后借外债四百六十二万余两。张之洞为创办湖北枪炮厂和汉阳铁厂，曾向德国高林银行借款一千万元，从英国汇丰银行借银九十三万余两。他为了向英国乞得借款，甘心以“布局作保”，当英方提出索息七厘的苛刻条件时，他竟然说什么“并不为多”，“重息无妨”<sup>②</sup>。

① 李鸿章：《妥议铁路事宜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第24页。

② 张之洞：《致伦敦薛钦差》，《张文襄公全集》卷138，电牍17，第1页。

第二，在技术上“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sup>①</sup>。洋务派创办的四大军事工厂，都是洋人独揽大权。从技师、机器和原材料，不是来自英、美，就是来自法、德。李鸿章供认：“炮队所用器械子弹，尽仿洋式，所需铜、铁、木、煤各项工料，均来自外国”<sup>②</sup>。制造轮船，“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与购买外洋船只略同”<sup>③</sup>。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厂矿，也是“购器雇匠，悉资外洋”<sup>④</sup>。厂矿的施工和生产，一切听“洋匠”主持，“不掣其肘”<sup>⑤</sup>。设备器材，大至炼钢炉，小至枕木、砖头、螺丝钉，也无不来自外洋。

第三，在业务上是外国资本的附庸。比如，一八七七年和一八九三年，轮船招商局同怡和、太古两个外资轮船公司“订立齐价合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结果使自己变成外国资本在中国取得垄断利润的垫脚石，扼杀民族资本航运业的帮凶。

第四，在经营管理上实行买办制度。比如，轮船招商局就曾把怡和、太古洋行实行的一套买办制度移植过来，栈房、船务设买办，栈货、货力的赔赚全由买办报销；买办之下又有“二买办”、“三买办”等等。这种以佣金为基础的买办制度，为洋务派官僚进行营私舞弊、贪污中饱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制器练兵，目的在于搬进外国资本主义的“器”，用以保护清朝赖以维持其统治的“道”，是枪口对内的。李鸿章供认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淮军，“以剿内寇尚属可

---

<sup>①②③</sup> 李鸿章：《复沈幼丹节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4，第30页；《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56页；《成船用款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6，第16页。

<sup>④</sup> 张之洞：《铁厂征税商情未便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4，第30页。

<sup>⑤</sup> 张之洞：《劝学篇》，矿学，第11，《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41页。

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sup>①</sup>。外国侵略者扶植清政府建立军事工业，武装和训练水陆各军，纯粹是为了控制和强化清政府镇压人民革命、保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反动武装，并推销自己破烂的设备和军火，以攫取高额利润。只有在这个限度内，外国侵略者才支持洋务派的“求强”活动，否则就要加以限制和破坏了。马格里在主持金陵机器局时，曾负责督造供给大沽炮台用的大炮。可是造成的七门大炮，于一八七五年在大沽炮台施放时，竟接连爆炸了两门，死伤多人。过了两个月，马格里还装模作样的带着一个视察团来到大沽，亲自试放，结果又爆炸了一门。其余几门，也成了废铁。

洋务派办工业，走的是一条爬行主义的道路。在这些洋奴们看来，西方的技艺，非中国所能骤及，只能“逐渐仿行”<sup>②</sup>。“若急求胜”，就是“殊不自量”<sup>③</sup>。他们的办法是，必须先向外国购进现成的东西，然后在“洋人指授”下慢慢地学着仿造。这种先“购置”、后“学制”，“事事依样葫芦，一成不变”<sup>④</sup>的作法，结局只能是“随人作计，终后人也”<sup>⑤</sup>。有人揭露福州船政局“所制轮船，悉西国古法耳，不值识者一噱”<sup>⑥</sup>。一八七四年，江南制造总局“试造小铁甲船，不能出海，炮位布置，亦不合法”<sup>⑦</sup>。外国人嘲笑说：江南制造总局所造的兵船，“太平年月无用，战争起时是废

①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附议复各条清单》，《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3页。

②③ 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第25页；《筹议天津设备事宜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50页。

④ 胡燏棻：《上变法自强条陈疏》，《皇朝经世文三编》，卷16，第2页。

⑤ 李鸿章：《闽广学生出洋学习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第20页。

⑥ 王韬：《弢园文录外篇》变法下。

⑦ 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第31页。

物”<sup>①</sup>。自己制造既不适用，那就只好“以购备西洋精利军器为第一要著”<sup>②</sup>。可是，外国侵略者所能卖给清政府的，并不是什么“精利军器”，而只是一些破枪烂舰。一八七九年，李鸿章在赫德的劝诱下，从英国购买了“龙骧”、“虎威”等八艘“蚊船”。赫德吹嘘这种船是守港利器，“炮位较大，在浅水处亦能轰坏铁甲”<sup>③</sup>。其实这些所谓“守港利器”，完全是用“钢片镶做，岁需两修”，行动迟缓，“船轻炮重”，根本不能参加战斗的破烂货。

洋务派创办的“官商各局，仿效西法，而综理一切，统用西人，绝不思教养华人，以渐收其权利”<sup>④</sup>。在这些洋奴的心目中，中国人民无非是“群氓”和“阿斗”，而那些挂着“工程师”、“专家”招牌的“洋匠”，才是“本事通天”的“救世主”。其实，被洋务派请来的所谓“名师高匠”，都不过是一些不学无术的骗子和盗窃经济情报的特务。轮船招商局各船主、大副、二副、大车、二车皆洋人。他们多为流氓兵痞，“非赌博宿娼，即酗酒躲懒，行船则掉以轻心”<sup>⑤</sup>，结果多次肇事，最严重的时候，五天之内竟连沉两船。他们不仅“行船掉以轻心”，而且贪污舞弊无所不为，“俱各发财而去”<sup>⑥</sup>。武昌纱布局的一个洋匠，月薪四百金，竟挂名取薪，在上海坐食五年之久。纱布局临开车，因洋匠不敷分配，就只好“停机待匠”，而一旦“机器不甚灵动，则洋匠必另行购一机器以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89页。

②③ 李鸿章：《拟请收捐购器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1，第14页；《筹议购船选将折》，《李文忠公全集》，卷35，第28—29页。

④ 陈炽：《自立》，《庸书》卷下。

⑤ 钟天伟：《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策》，《皇朝经世文三编》卷26，第17页。

⑥ 《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56页。

救之”<sup>①</sup>。德国自称“久造铁路”的“专家”时维礼，竟利用勘矿之机，大肆搜集经济情报，当他发现大冶铁矿“矿量丰富”时，便立即将情报密报德国政府。一八八五年，江南制造总局由洋匠设计建造一艘“保民”号铁甲兵船，有个中国工匠认为外国“轮船设计师”设计的龙骨和舵都不合规格，船成后必然行驶缓慢，不能掉头。这个局的“总办”迷信洋人，厉声斥责中国工匠说：“外国人设计的图样还会错吗？难道你比洋人还高明？”船成后，果然不出中国工匠所料，最后还是按照中国工匠的意见进行改装，才勉强可用。

洋务派的所谓“借法自强”，是秉承洋人旨意干的，也确实为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扫清了道路。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季南曾供认：“对英国说来，极重要的事情在于支配中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支配她的舰队。”<sup>②</sup>自然，这对其他列强说来，也绝也不例外。李鸿章等洋务派要制器练兵，列强就假援助之名，行控制之实。“他们总是在贷款、武器装备、军队训练各方面给以充分的帮助，使李鸿章等充分地强有力，来为他们的利益而统治着中国。”<sup>③</sup>还在洋务派大办军事工业时，一八六七年，一个外国侵略者就赤裸裸地说：“中国人既已认识在这种事业方面可以使用外国机器与技术，那末在开发中国富源方面的种种障碍也许就有希望能够逐渐减少了。”<sup>④</sup>外国侵略者要“开发中国富源”，洋务派就依靠外国技术举办民用企业。除运漕粮外“兼揽客货”的招

---

① 张之洞：《请添铁厂开炼用款片》，《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4，第26页。

② 季南：《一八八〇——一八八五年间英国在华的外交》，一九三九年英文版。

③ 拉铁摩尔：《亚洲的决策》。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48页。

商局轮船，所运货物绝大部分是外国资本主义推销的商品及其所需要的物资，加快了外国侵略者商品推销和原料供应的流转速度。开平煤矿为外国轮船提供了廉价优质煤，促进了外国在中国航运业的扩展。洋务派依靠外力修建铁路，等于侵略者自己修建一样，它为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开辟中国这个新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英国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在中国沿海设有海线，本想在中国陆地架设陆线，但遭到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洋务派从八十年代开始设立电报局，架设电线，由大东、大北公司承包，逐渐伸展到内地和边疆，东面与大东、大北的海线相接。陆线的使用原则是先官后商，先外国后中国，外国侵略者完全以殖民主义者的姿态使用中国陆线。由于电报掌握在洋人手里，“每发密电至京，无不消息外布”<sup>①</sup>。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适应正向垄断阶段过渡的外国资本主义对华输出资本的要求，洋务派头子提出了“借债兴利”的口号，为外国资本涌入中国鸣锣开道。

洋务派推行洋奴哲学和尊孔崇洋路线，注定了洋务活动必然失败的命运。甚至连当时的某些改良主义者也已看到，洋务派的这种“喜西方而兼用西人”的行径，只能是“开门揖盗，受制于人”<sup>②</sup>，欲求中国的“富强”，“无异睡中之梦”。

### 三、早期的官僚买办阶级

毛主席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

<sup>①</sup> 钟天伟：《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策》，《皇朝经世文三编》卷26，第8页。

<sup>②</sup> 陈炽：《西法》，《庸书》外篇，卷上。

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sup>①</sup>

早在鸦片战后，各通商口岸就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外国侵略者服务的买办商人。到了六十年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华侵略的扩大和加深，买办的人数逐步增多，活动范围也逐步在扩大，渐渐成为一种政治势力。有些买办不仅是在华外商企业的雇员，而且成为外国侵略者在华开办的洋行、银行、保险公司、轮船公司的重要伙伴。他们主要是从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部分旧式商人和鸦片走私贩子转化而来的。

三十年的洋务活动，为买办队伍的扩大，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洋务派的头目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之流，都是手握军政大权的封建官僚。而洋务派的骨干分子，诸如丁日昌、钱鼎铭、徐润、唐廷枢、盛宣怀等人，则多是买办或具有浓厚买办倾向的地主士绅。洋务活动就是封建官僚和买办合流的结果，封建官僚举办洋务所以需要买办，这是因为：第一，买办和外国侵略者关系密切，封建官僚举办洋务，在资金、机器、原料、技术、军火等方面，都需要通过买办与洋人加强联系，取得支援。第二，买办资力雄厚，封建官僚办近代企业需要大量资金，通过买办作中介可以吸收较多的股本。例如，创办轮船招商局募集商股时，“华商诡寄洋行者，多方忌沮”，后来邀请买办“唐丞廷枢为坐局商总，两月间入股近百万”<sup>②</sup>。第三，买办有经营工商业的经验，封建官僚需要依靠他们直接管理洋务企业。而一些买办所以投奔封建官僚，则是出于洋主子的意旨和本阶级的要求，目的在于促使封建政权买办化，并借机谋取权位和积累个人

①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373页。

② 李鸿章：《复沈幼丹船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第13页。

资财。由于官僚和买办相结合，加速了一部分官僚的买办化和一部分买办的官僚化的过程，促进了中国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形成。

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主要包括控制官办和某些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洋务派大官僚，以及实际负责经营这些企业的大买办。他们既是封建大地主、大官僚或大买办，又是经营具有很大买办性和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大资本家。

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它有着自己的特点。

毛主席在论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时指出：“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sup>①</sup>中国的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初步具有这样的特征：

第一，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和清王朝的反动政权结合在一起。他们既是清政府的重要官员，又是腰缠万贯的大资本家。他们依靠封建政权垄断近代工业，压制和侵吞民族资本，残酷地压榨工人阶级。比如，李鸿章既是淮系军阀的头子，手中握有重兵，并爬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左右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是近代历史上有数的封建大官僚、大军阀；又通过洋务活动，大发横财，成为显赫一时的大资本家。梁启超说：“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sup>②</sup>再如盛宣

<sup>①</sup>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149页。

<sup>②</sup> 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85页。

怀，他出身于官僚世家，一八七〇年经杨宗濂的推荐，投入李鸿章的幕下，迅速获得信任，以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后因李鸿章的奏请调署天津海关道，从此成为李鸿章经办洋务的总代理人。一八七三年，他由李鸿章札委为轮船招商局会办之一，此后历任招商局督办、董事长等职达三十五年之久。在任职期间，他运用招商局的资金广为投资，多方控制，曾经一度为他自己建立了一个包括轮船、电讯、银行、工矿等企业的大集团。

第二，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和外国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毛主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sup>①</sup>中国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靠外国资本主义豢养长大的，反过来在经济上为外国强盗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奔走效劳；在政治上竭力推行洋主子的“以华制华”的政策，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支柱。比如，丁日昌、徐润、吴健彰、杨坊等人的活动，就是鲜明的例证。丁日昌早就同外国侵略者有所勾结，以“留心西人秘巧”著称。一八六二年，在广东提督昆寿军营筹划“攻剿”，督办火器，旋被李鸿章奏调上海主办洋炮局，随即升任苏松太道。有人说丁日昌是一个“抑民奉外，……以求快洋人之意”<sup>②</sup>的“丁鬼奴”。因此，丁日昌官运亨通，不久被提升为江苏巡抚。徐润从幼便弃书经商，一八六一年充当上海宝顺洋行副买办；不久，他便向清政府纳资捐官，经过更番捐买，由监生而郎中。他在淮军镇压太平军时以“转运得力”，于一八六六年被赏加四品衔。他曾自行经营丝茶出口和鸦片进口生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3—4页。

<sup>②</sup>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8，第17页。

意，积累了不少资财。一八七三年，经盛宣怀的引荐，投靠李鸿章，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之职。一八八三年，脱离招商局后，他又屡受李鸿章的札委，代其经营开平煤矿、热河承平银矿、建平金矿等，奉李鸿章意旨，控制新式矿山，推行崇洋卖国路线。旗昌洋行买办吴健彰，在一八四八年，由于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的支持，署理苏松太道兼任海关监督。一八五三年，曾被上海小刀会俘虏，因得到美国领事的援助而逃脱；出来后继续镇压小刀会起义和出卖中国主权。怡和洋行买办杨坊，勾结美国侵略分子华尔组织洋枪队，直接镇压太平军。再如，湘淮系军阀官僚也正是在勾结外国强盗、血腥镇压农民革命中迅速买办化，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凶恶鹰犬。

第三，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封建的高利贷和地租剥削关系十分密切。他们不少人投资于钱庄、当铺或广置田产，对农民和小生产者进行封建的高利贷和地租剥削。比如，长期经销美孚洋油的买办商人叶澄衷，由一个在黄浦江驾船向外商兜售五金杂货的小商人起家，从老顺记发展为南顺记、北顺记、新顺记，分支机构和钱庄遍及全国大中城市，并拥有大量房地产和经营沿海运输业的沙船。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已积资八百余万两。徐润在一八九五年供认：他除了把一百二、三十万两银子投资于近代工矿交通企业外，还经营房地产，拥有城市房屋五千余间，置地三千余亩，并附股于许多当铺和钱庄等<sup>①</sup>。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它们和农村中的封

---

<sup>①</sup> 《徐愚斋自叙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以下简称《洋务运动》）第8册，第172页。

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①

中国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代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它是一个极端反动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 第二节 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

### 一、中国社会经济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反动卖国的洋务活动，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开辟了道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外国经济势力已经伸展到中国的广大地区，渗透到许多重要经济部门，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化日益明显。

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辟大量商埠，作为经济侵略的重要基地。到九十年代初，列强强迫中国开辟的商埠共有三十四处。它不仅分布在沿海各地和长江两岸，而且出现于内地和边远地区，如甘肃、新疆、蒙古、西藏等地。外国商人以这些商埠为基地，向广大城乡倾销商品和鸦片，低价收购农业、手工业产品和矿产原料，掠运出国。在许多商埠里，外国商人还开设了商行、工厂、银行，开始作为对华资本输出的重要据点。

外国侵略者取得了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行权，控制了中国的交通运输业。六十年代以后，列强相继在华设立轮船公司，其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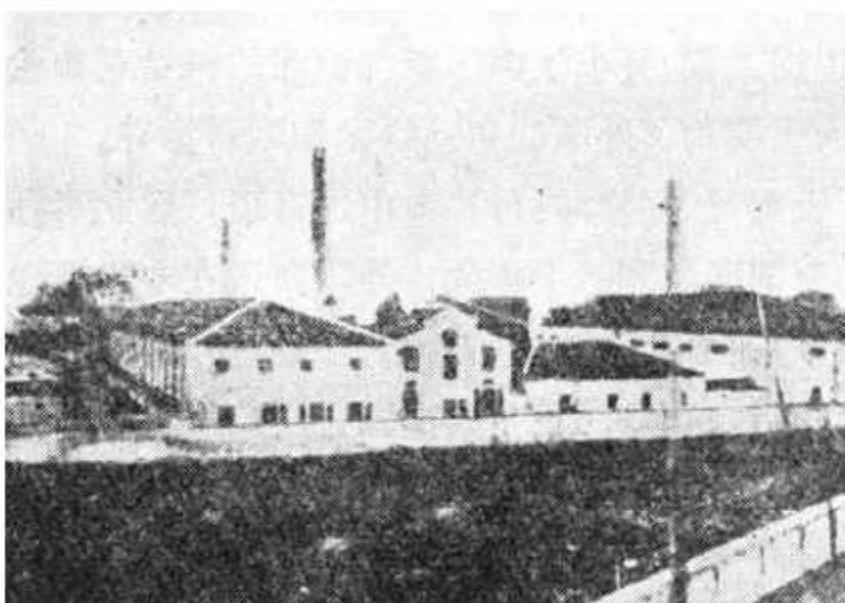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02页。

主要的有：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一八六一年）；德国美最时洋行（一八六六年）；英国大沽驳船公司（一八六四年）、太古洋行（一八六七年）和怡和轮船公司（一八八二年）。一八九二年，中国各通商口岸轮船进出口总吨数为二千八百多万吨，其中属于外国的为二千二百多万吨，中国只有六百多万吨。外国垄断中国航运业，不仅侵犯中国主权，打击了中国沿海沿江的帆船业和轮船业的发展，而且大大便利了外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

外国侵略者开设商行（亦称洋行）操纵中国市场，建立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到八十年代，外国商人在中国设立的商行已有五百多家，著名的有英国的怡和、沙逊、安利洋行，德国的礼和、禅臣等洋行。这些洋行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操纵（抬高或降低）物价，迫使中国商业和高利贷资本成为外国商业资本的附庸。

外国侵略者利用种种政治、经济特权，竭力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据统计，在一八六五——一八六八年间，每年平均进口总值为六千二百余万海关两，出口总值为五千四百六十万海关两，入超七百五十万海关两。一八九〇——一八九四年，每年平均进口总值增到一亿四千二百万海关两，出口总值增到一亿零七百多万海关两，入超三千四百余万海关两。这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常地出现入超现象，而且逆差额也在不断增加。不仅如此，中外贸易的内容也逐渐发生变化。在进口方面，八十年代以前，鸦片居首位。八十年代以后，棉织品成为进口第一大宗，占进口总值三分之一以上。在出口方面，八十年代以前，丝、茶是出口大宗，以后棉花、大豆的出口则逐步增长。进出口贸易的这种状况说明，中国社会经济日益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

八十年代前后，正在向垄断阶段过渡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扩大商品输出的同时，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注重资本输出的趋势。据估计，中日甲午战前，外国在华的投资总额达到二亿至三亿美元。



沙俄商人在汉口设立的顺丰砖茶厂

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在中国的工业投资，大致可分四类：第一类是为适应航运需要开设的船舶修理厂。如一八六四年英国在香港开设的黄埔船坞

公司，一八六五年在上海开设的祥生耶松船厂。第二类是为便于掠夺原料而开设的加工工厂。如一八六三、一八六六年沙俄在汉口开设的顺丰、新泰砖茶厂，一八七八年美国在上海创办的旗昌缫丝厂，一八八二年英国在上海开办的怡和缫丝厂等。第三类是在租界中开办的公用企业。如英国在上海办的自来水公司、电汽公司等。第四类是外资开办的轻工业，如火柴、造纸、肥皂、玻璃、卷烟等厂。总计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设立的工厂有一百多家，资本总额为二千八百万元，其中最大的五家各有资本一百多万元。

银行是外国侵略者在华投资的一个重要项目。早在一八五〇年左右，英国就在上海开设了丽如银行支行；一八五一年后

东方银行陆续在香港、上海等地设立分行；一八五四年、一八五七年又设立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分行于上海；一八六四年汇丰银行成立于香港，第二年在上海设立分行，它的实力自七十年代起一天天增长，逐渐发展成为英国在中国资本最雄厚的金融机构。法、日、德等群起效尤。法国于一八六三年在香港、上海成立法兰西银行分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年在香港、上海设立东方汇理银行分行。德国于一八八九年在上海设立德华银行。一八九三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机构。它经营国际汇兑，以便于外商加速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它收集外商暂时闲置的资金和中国地主、官僚手中的现金，贷给一时缺款的中外商行、工厂主及买办商人。它在中国发行钞票，用纸币代替黄金、白银作为支付手段。郑观应曾说：“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sup>①</sup>它对清政府进行贷款。从一八六一年到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共借外债四千五百余万两。外国侵略者通过银行逐渐操纵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特别是英国在华金融资本最大，所以在一八八九年前，英国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事业。

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社会经济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在外国工业品的冲击下，中国城乡手工业进一步破产，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其中首先遭到破坏的是手工纺织业。据记载，一八六七年洋纱进口值为一百六十万余海关两，而到一八六九年则为三千一百八十三万余海关两，增长了二十倍<sup>②</sup>。当时洋纱所谓“物美价廉”，据一八

① 郑观应：《银行》，《盛世危言》卷5。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89页。

八二——一八九一年《海关报告》宜昌部分记载，印度棉纱和中国东部诸省棉花零售价格相差无几。一八八七年《海关报告》牛庄部分记载，土纱在牛庄的售价三百斤为八十七两，而洋纱仅为五十七两<sup>①</sup>。由于二者价差悬殊，中国城乡纺织业用棉花纺纱、织布比直接用洋纱织布还贵。但用洋纱织布加上人工、设备，产品成本仍高于外国机器生产的纺织品，还是无力与之竞争。因此，长江下游和沿海各省已有不少地方停止纺纱，更多的地方用洋纱做经线来织布，纯用土纱织成的布匹销路愈来愈狭窄，有些地方已经出现停织土布的现象。到八十年代，山东土纱织布几乎停顿。即使家庭纺织业比较发达的浙江鄞县，到一八八四年后，“则巡行百里，不闻机声”<sup>②</sup>。不仅棉纺织业如此，其他手工业部门也遭到破坏，形成“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木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治者多无事投闲”<sup>③</sup>的形势。由于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和洋货充斥中国城乡，迫使农民多用洋货，同商品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农民为了购买商品，不得不日益增多地出售农产品，加上外商大量收购棉花、丝、茶等，从而导致了农村经济作物如棉、桑、茶、烟草、甘蔗等耕种面积的迅速扩大，甚至使苏、浙、闽等地区成为主要经济作物区，加速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农产品商品化和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促使城乡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农民和手工业者日益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原来城市手工业作坊，有些购用外国原料进行生产，开始陷于依赖外国的境地；有些则被洋货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77页。

② 蔡芷卿等：《鄞县通志》卷3、《博物志》。

③ 郑观应：《纺织》，《盛世危言》卷7。

挤垮遭到破产的命运。如广东“佛山针行向称大宗，佣工仰食以千万计，自有洋针，而离散殆尽矣”<sup>①</sup>。广大农民在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盘剥下，也日益贫困化。外国侵略者通过其豢养的小买办，利用茶商、丝贩、米商等在收购农产品时，往往先开出高价以控制货源，然后“抑价压秤，多方挑剔，不使稍有赢余，否则联络各邦，摈绝不买”<sup>②</sup>，致使农民受到更严重的剥削。如江西市场的茶价，原为三百五十文一斤，到一八八九年被压为二百七十文一斤。广西浔州、梧州等地的桂皮原先百斤售银七至八两，在八十年代被压低到八、九钱。随着农产品的商品化，高利贷资本也活跃起来。农民在青黄不接的困难季节或遭遇天灾人祸的打击时，不得不向高利贷者抵押借贷，使农民“禾未苗而贷于人，蚕未丝而偿夫债”<sup>③</sup>。同时随着外国经济侵略的加深，封建剥削也日益沉重。由于奢侈品、鸦片的大量输入，使地主官僚的寄生腐朽性更为严重，他们挥霍费用都以增加地租或额外浮收等形式转嫁到农民身上。清政府也肆意增加赋税，遍设厘卡，加紧盘剥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掠夺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压榨，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破产失业，一部分冻饿死于沟壑，一部分流入通商口岸变成劳动力的出卖者。

综上所述，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83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53页。

③ 汤成烈：《治赋》，《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7。

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sup>①</sup>

## 二、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

正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出现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有着自己的特殊过程。

原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远没有发展到直接向近代工业过渡的阶段。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道路。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在中国出现了，但它主要不是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扩大。

鸦片战争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因为所处的地位条件不同，归宿也各异。那些为广大群众生活所需要，而外国工业又特别发达的部门，如棉纺织业、制铁业、染制作等行业，由于遭到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侵袭而渐渐趋于没落破产。那些能够提供出口货物，又有长远历史的著名手工业，如制茶业、丝织业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丝、茶大量出口，有的逐渐变成替外国资本掠夺中国农产原料进行加工的附庸经济；有的就在新条件下采用机器生产，由工场手工业发展为半近代或近代的工业，虽然这部分数量既少，也不是经济生活里的重要部门，但它们却是中国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不过，由于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是不允许它们发展的，它们在

---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9—590页。

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只能艰难缓慢地前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手工业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的道路——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道路受到阻碍，而地主、官僚和商人直接投资办近代工业的道路就成了最主要的途径。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过程中，产生了中国的买办和买办资本；从中国的封建压榨中，增加了地主、官僚、富商和高利贷者的财富积累。随着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客观条件的逐渐形成，一部分地主、官僚、商人和买办，既看到“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sup>①</sup>；又看到外商在经营上的一诺千金转手致富，因而积极要求把他们积累的一部分货币，投资于新式工业，以攫取高额利润。

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出现于六十年代末，在七十年代里，只有二十来个企业，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民族资本前后一共创办过一百多个大小不等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种类有：

机器工业。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方举赞、孙英德合伙设立的上海发昌机器厂。它是为外商船厂打制、修配船用零件而设立的。它在一八六六年初创时还是一个手工业锻铁作坊，一八六九年开始使用车床，这是它从手工工场转化为近代工业的重要标志。一八七六年它制造出小火轮船和车床、汽锤公开出售。八十年代，是发昌厂发展的最高阶段，制造轮船，经营进口五金，业务发达，获利甚多，成为当时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除发昌外，在上海还相继出现建昌钢铁机器厂、广德机器造船厂等，到中日甲午战前共有十二家。

---

<sup>①</sup>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

缫丝工业。一八七二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开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使用蒸汽动力和传动装置，招有“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sup>①</sup>。九十年代初，新式缫丝工厂以广州为中心发展到五、六十家。上海方面，从一八八一年黄佐卿创办公和永机器缫丝厂起，到中日甲午战前，先后开设六个新式缫丝厂。

纺织轧花业。一八九一年，官僚唐松岩在上海建立华新纺织新局；一八九四年，朱鸿度在上海办裕源纱厂；一八八七年，严信厚在宁波开办通久源轧花厂。随后在一八九一——一八九三年间，上海先后成立了棉利公司、源记公司和礼和永轧花厂等。

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业。在一八七八年后，天津、上海、福州、北京先后成立小型机器面粉厂；八十年代后，天津、上海、重庆、广州、福州、太原等地相继建立火柴厂，其中以上海燮昌火柴公司为最大；一八八九年广州成立宏远堂机器制纸公司，一八九一年上海成立伦章造纸厂，一八八二年上海成立了同文书局。其它尚有制茶、制糖、制药、碾米、玻璃等近代工业出现。

公用企业。一八八六年，杨宗濂、吴懋鼎开办天津自来水公司（一八九一年改为中外合办）；一八九〇年华侨黄秉常在广州创办电灯公司。

采矿业。在八十年代前后，相继开办的采矿业有湖北荆门煤矿（一八七九年）、山东峰县煤矿（一八八〇年）、湖北乐鹤峰铜矿（一八八一年）、直隶临城煤矿（一八八二年）、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一八八二年）、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一八八二年）、热河承德三山银矿（一八八二年）、安徽贵池煤矿（一八八三年）、山东

<sup>①</sup>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57页。

平度招远金矿等，到一八九四年约有十九个。这些采矿业多是在原来土法开采的基础上，个别工序使用机器，规模较小，只有山东平度招远金矿规模较大。

由于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在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产生的，多数是由商人、地主、官僚投资举办的，所以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主要是轻工业和小规模的采矿业，机器工业极少。这是因为经营轻工业需要的投资比较少，企业的建设时间短，资金周转比较快，容易获得较高的利润。所以初期民族资本家经营的缫丝、火柴制造业等，大部分都比较成功。

第二、大部分企业投资较少，规模较小，技术落后。这个时期创办的企业，大部分资本都在十万两以下，少的只有几万两、几千两甚至更少些，而且独资经营的少，绝大部分属于集股合营。因此，一般的企业规模较小，机器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有的企业如火柴业、采矿业，除有些生产环节采用机器外，不少工序仍采用手工操作。所以，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高，产品很难同外国进口商品竞争。

第三、大部分企业集中在上海、广州两地，其它零星各厂也多建立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形成这种畸形布局的原因较为复杂，有的为了给外国船舶厂加工零件，有的为了便利产品出口，有的为了交通运输、原料获得和技术依靠的方便，有的为了适应地方市场的特殊需要。有些企业建立在天津、上海等地的外国租界内，目的显然在于求得外国势力的庇护。这些情况反映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在布局方面的半殖民地性质。

第四、民族资本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既存在矛盾，又有密切联系。

民族资本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虽然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但它们侵入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因此，它们积极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千方百计地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国侵略者开始曾采用限制机器进口的办法，妄图阻止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英国公使欧格纳叫嚷：“机器进口，恐非西国之福也。”另一个英国侵略分子更露骨地说：“中国多织一匹布，即我国少销一匹”，因而“机器不宜进中国”<sup>①</sup>。当中国民族工业兴起以后，外国侵略者就利用在华攫取的种种特权，通过控制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等手段，大量倾销商品和搜刮原料，从而使中国民族工业在原料供应和产品市场方面受到巨大压力。如一八九三年重庆聚昌火柴厂开办之初，英商怡和洋行即运大量火柴到重庆倾销，聚昌请求官府扣留洋商火柴。李鸿章竟认为：“只能不许华人在该处再开，不能禁止洋商贩运贸易。”<sup>②</sup>外国侵略者还在中国开设工厂，凭借其雄厚资金、先进技术，在竞争中击败或吞并中国民族工业。如一八八二年创办的上海玻璃厂，一八八八年即被英商福利公司吞并。一八九一年福州中国商人购入英国机器，设立三个焙茶厂，过了几年就被沙俄的砖茶厂挤垮，“相继停闭”<sup>③</sup>。

民族资本受到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首先，封建统治者竭力禁止开办民族工业。一八六八年盐商何某，在江苏句容买山

---

① 《论机器不宜进中国》，《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287、288页。

② 李鸿章：《论重庆自来火专利》，《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20，第49页。

③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5，实业8。

一处，准备开矿采煤，地方士绅视为异端，予以驱逐。一八七三年，上海商人魏镛等向李鸿章申请在该处开矿，当时在南京、镇江两府应试的儒生“闻此消息，讹言日起”，群起反对。句容官府、士绅甚至立碑严禁：“如有不法棍徒再敢煽惑开矿，一经告发，或被访闻，定即提案照例严办，决不姑宽”<sup>①</sup>。一八八二年，商人何岷山在广州创议开办自来水公司，虽有商户表示赞成，但地方士绅以“有伤风水”为理由，拚命反对，结果未能实现<sup>②</sup>。更为突出的是，武举李福明在北京东便门外开了一个小型机器面粉厂，旋被都察院奏准勒令停业，因李不服，一八九五年清政府便以“实属异常刁狡”的罪名，“交刑部照例治罪”<sup>③</sup>。其次，封建统治者用苛捐杂税勒索民族工业。其中以厘金的危害为最甚。汪康年说：“今厘卡如织，一水之地而抽十余次”，“有始仅值百抽五者，继至十抽三、四”，“尤可异者，一国之中而各省之章程不一，一省之中而各局之章程又不一，一局而前后之章程又不一，至于以若干起税，皆无一定之章。”<sup>④</sup>这就大大加重了民族工业的负担。陈炽曾深刻地揭露说：“天下设官数千，增司事巡丁数万。贪狼猛虎，砺齿磨牙，皆敲商之骨而吸商之髓者也。”<sup>⑤</sup>第三，封建统治者对外推行“抑民以奉外”的方针，对内顽固维护封建剥削制度，严重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比如，清政府的税收政策，名义上“华洋一体待遇”，实际上是保护外国资本，打击民族工业。李鸿章曾供认：“中国原定洋货税则过轻，土货税则较重，以致华商疲累，难与洋商颉颃。”<sup>⑥</sup>再如，清政府保护封建土

① 李承霖：《劫余勗存》，《学府公建禁矿碑四道》。

②③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022、988页。

④ 汪康年：《商战论》，《皇朝经世文三编》卷30，第32页。

⑤ 陈炽：《纠集公司说》，《续富国策》卷4。

⑥ 李鸿章：《清减出口煤税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0，第44页。

地制度，不仅限制了中国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而且使中国工业难于筹集更多的资本。因为中国地租额高，有碍于工业吸收新的资本，并常常使工业资本反转来为购买土地的资金，从事封建地租剥削。此外，洋务派凭借政治特权，经济优势，力图垄断新式工业，控制和排挤民族工业。

所有这些，就造成了民族资本同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冲突。

但是，有些民族资本为了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又在许多方面依靠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有的企业不仅在技术和机器设备上依靠外国，而且为了减轻中外反动势力的压力，甚至引进外资，聘请外国人作经理，或“贿买牌照，假托洋商之名”<sup>①</sup>开业。有些企业请求加入官股，或使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名义，乞求封建势力的庇护，以取得“专利”和减免捐税等优惠。至于在产品的销售和原料的收购上，依靠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就更是普遍的现象了。不仅如此，民族工业的创办人，也主要是地主、官僚、商人和买办。买办的资本来自为外资服务的佣金。比如祝大椿，原是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买办，一八八八年他以买办等项收入独资创办源昌机器碾米厂，一八九四年后又办源昌缫丝厂等企业，但同时仍身兼外商洋行买办。官僚地主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封建剥削。如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其父曾任山东肥城县官，“居官积‘廉’俸，置田二百亩”。杨宗濂也做过盐官。一八八六年他们用封建剥削所得与吴懋鼎合资开办天津自来水公司。一八九六年杨氏兄弟集股二十四万两开办学勤纱厂，而后又以资本剥削所得买下“庄屋一区”，“足成千亩”。这一切就使民族

<sup>①</sup> 《奏复请讲求商务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2册，第399页。

资本同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结下不解的依存关系。

随着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中国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

“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sup>①</sup>，具有两重性的特点。“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sup>②</sup>“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sup>③</sup>

民族资产阶级是由不同的阶层组成的。“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sup>④</sup>。他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内部还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土地没有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部分，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或中间派。他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

### 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七十年代前后，伴随着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

---

①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4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02—603页。

③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35页。

④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31页。

的产生，中国出现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思潮。

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汤震、陈虬、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sup>①</sup>。他们是从地主阶级中逐渐分化出来的、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都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或者是同国内外反动势力有着

---

①王韬（一八二八——一八九七年），江苏苏州人。一八四九年到上海，受雇于英教士麦都思所办之墨海书馆，前后达十三年之久。一八六二年去香港，后曾游历过英、法、俄等国。一八七四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笔。晚年回上海，任格致书院掌院。其主要著作《弢园文录外编》。

薛福成（一八三八——一八九四年），字叔耘，江苏无锡人。早年人曾国藩幕府。历任按察使等职，曾随李鸿章办外交。一八八四年任浙江宁绍台道时，与提督欧阳利见在镇海击退法军，后又以左副都御史身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他的著作经后人编为《庸盦全集》。

马建忠（一八四四——一九〇〇年），字眉叔，江苏丹徒人。曾从事过一些重要的外交活动。一八八二年参加中法、中日交涉。他的政治思想著作是《适可斋记言记行》。此外，他还对中国古文辞进行研究，写成《马氏文通》，这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文法著作。

郑观应（一八四一——一九二〇年），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人。曾在英商太古公司担任过买办，又在洋务派所办的轮船招商局、粤汉铁路、汉阳铁厂等企业任过重要职务。写过许多议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文章。他的政治思想代表作是《盛世危言》。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成为商界著名人物。

汤震（一八四七——一九一七年），又名寿潜，字蛰仙，浙江山阴（绍兴）人。曾任知县，后入张之洞幕。一九〇四年任沪杭铁路总理。一九〇六年与张謇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为著名的立宪派人物。一九〇九年任浙江谘议局议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交通总长，一九一二年与张謇组织统一党，任参事。他著有《危言》四卷。

陈虬（一八五一一一九〇三年），字志三，浙江乐清人。一八九八年参加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温州。他著有《治平通议》八卷。

陈炽（？——一八九九年），字次亮，江西瑞金人。曾任户部郎中。一八九三年著有《庸书》，一八九五年参加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一八九六年写成《续富国策》。

何启（一八五八——一九一九年），字沃生，广东南海（今广州）人。留学英国。长期居住香港，任香港议政局议员。从一八八七年到一九〇〇年，和胡礼垣先后发表许多论文，辑成《新政真诠》一书。

密切的联系。陈炽曾在清政府中当过户部郎中；薛福成和马建忠则长期依附于洋务派大官僚，并直接参与了洋务派的外交活动；郑观应先后在英国的太古公司和洋务派举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中担任过重要职务；王韬曾受雇于上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墨海书馆；何启曾在香港英国殖民统治机构长期任职。这种出身和社会经历，使他们既对中外反动势力有较大的依赖性，又比同时代的人都较多的接触到资本主义世界，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中法战争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处于萌芽、酝酿阶段。它认识到仅仅依靠船坚炮利和洋务企业，并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因而要求以西方强国为榜样，作些改革。但它还没有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划清界限，还没有明显地提出要建立君主立宪制的问题。中法战争失败后，在外国侵略日益加深和洋务活动开始破产的情况下，改良主义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它公开批评洋务活动，积极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

早期改良主义思想，是鸦片战争时期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变法革新、抵御外侮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是后来康有为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思想前驱。它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主张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早期改良主义者具有爱国思想，他们“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sup>①</sup>，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媚外卖国，表示愤慨和抗议。马建忠揭露说：“窃谓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

---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

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睨于京师，以凌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sup>①</sup>

他们反对外国侵略者强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纷纷要求取消其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薛福成认为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祸害。他主张借修约的机会，设法取消片面最惠国待遇，并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收回领事裁判权。陈炽特别反对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享有协定关税权，认为清政府把税则订入对外约章中，结果“太阿倒持，授人以柄；九州之铁，铸错竟成”<sup>②</sup>。他主张收回关税自主的权利，取消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协定关税。

他们严厉谴责英国侵略分子赫德把持中国海关，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的罪行。薛福成痛斥赫德“阴鸷而专利，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sup>③</sup>。郑观应要求从赫德手中收回海关行政权，指出只有将海关收交中国人管理，“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sup>④</sup>。他们警告清政府如果继续依靠外国侵略分子，将使中国重蹈印度亡国的覆辙。

在早期改良主义者当中，有人告诫人们在注视从东南沿海进犯的英、法等侵略者的同时，要特别警惕从北方陆路威胁中国的沙皇俄国。陈炽非常赞赏林则徐，他说：“至哉，林则徐之言曰：

① 马建忠：《拟设翻译院书议》，《适可斋记言》卷4。

② 陈炽：《税则》，《庸书》外篇，卷上。

③ 薛福成：《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海防司书》，《庸盦全集》文编，卷2。

④ 郑观应：《税则》，《盛世危言》卷3。

‘英法诸国不足虑也，终为中国之大患者，其俄罗斯乎！’文忠之言，其殆圣矣。”<sup>①</sup>他揭露沙俄“虎狼”成性，“见利忘义”，“蚕食鲸吞”<sup>②</sup>中国领土，“得寸进尺”<sup>③</sup>，现“倾一国之金资”，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成则“必攻中国”<sup>④</sup>，争霸东亚，那时中国不仅“东省不能安枕，即内外蒙古以袤络新疆、西藏，皆日在风声鹤唳之中”<sup>⑤</sup>。因此，他认为沙俄是中国“心腹之疾”<sup>⑥</sup>，必须早作应付准备。他批评洋务派“汲汲于东南，而不知其要害乃在西北也”<sup>⑦</sup>。他主张中国应把国防建设放在从西北对付沙俄侵略的基点上。

## 第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早期改良主义者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王韬的“恃商为国本”论<sup>⑧</sup>，薛福成的“商握四民之纲”论<sup>⑨</sup>，马建忠的“富民”说<sup>⑩</sup>，陈炽的“富国”策<sup>⑪</sup>，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愿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郑观应提出的“商战”的口号。

郑观应认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有“兵战”和“商战”两种，“兵战”为“有形之战”，“商战”为“无形之战”，“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sup>⑫</sup>。他主张中国不仅要讲求武备，以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兵战”，而且更应当振兴民族工商业，同外国侵略者进行“商战”。“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

①②④⑥ 陈炽：《合纵》，《庸书》外篇，卷下。

③⑤⑦ 陈炽：《庸书》自叙。

⑧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⑨ 薛福成：《庸盦海外文编》卷3。

⑩ 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卷1。

⑪ 陈炽：《续富国策》。

⑫ 郑观应：《商战》，《盛世危言》卷3。

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土、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sup>①</sup>他特别强调发展近代工业的重要性，认为必须发展工业，才有可能发展商业，“商务之盛衰，不独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sup>②</sup>。为了发展近代工业，首先就要兴办机器制造业。他说：“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因此，“宜设专厂制造机器”<sup>③</sup>。

早期改良主义者反对清政府限制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郑观应要求清政府改变“有困商之虐政，无护商之良法”<sup>④</sup>的局面，保护和赞助民族工商业。他说：“欲整顿商务，必先俯顺商情，不强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不强以所苦而从其所乐……。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sup>⑤</sup>王韬、何启、胡礼垣等痛斥洋务派垄断新式企业的行径。王韬提出“官办不如商办”的口号。何启和胡礼垣主张兴办一切企业，都必须“独任商民，勿加官督二字。……商之必可以办，官之必不可以督”<sup>⑥</sup>。

### 第三，主张革新政治，建立君主立宪制度。

早期改良主义者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出发，要求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王韬、陈炽、郑观应都看到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远不如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何启、胡礼垣批评当时中国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政则有私无公，令则有偏而无平。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啻如奴贱也；官吏如

---

①② 郑观应：《商战》，《盛世危言》卷3。

③④⑤ 郑观应：《商务》，《盛世危言》卷3。

⑥ 何启、胡礼垣：《新政始基》，《新政真诠》3编。

虎，而君上纵之，不啻如鹰犬也”<sup>①</sup>。他们认为，要使中国变贫弱而为富强，非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不可，“长治久安，必基于此”<sup>②</sup>。

早期改良主义者虽然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各种政治制度，但都倾向于“君民共主”。郑观应说：“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sup>③</sup>他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sup>④</sup>。郑观应和其他改良主义者都不想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只是希望以英国的政治制度为蓝本，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制度。他们高喊“民权”，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谋取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因此，他们竭力美化资产阶级，赤裸裸地宣扬什么“今之国若有十万之豪商，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sup>⑤</sup>。“天下事，必以出钱者为主”<sup>⑥</sup>。在他们看来，让资产阶级参加政权，建立起“君民共主”制，就能够“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张国威，御外侮”<sup>⑦</sup>。

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反映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具有时代的和阶级的特征。

当时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不久，羽毛未丰，力量极其微弱，加上同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保持紧密联系，因此，反映这个阶级要求的改良主义思想，软弱性和妥协性就显得特别突

① 何启、胡礼垣：《曾论书后》，《新政真诠》初编。

② 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新政真诠》2编。

③④⑦ 郑观应：《议院》，《盛世危言》卷1。

⑤ 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新政真诠》2编。

⑥ 何启、胡礼垣：《正权篇辩》，《新政真诠》5编。

出。

早期改良主义者虽然吐露出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呼声，但他们对外国资本主义还缺乏本质的认识，甚至对某些西方国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王韬曾经错误地认为英国侵略者“仗义执言，慷慨善哉”，“我中国如能结好英日，以彼为援，互为唇齿，……乃足有恃而无恐”<sup>①</sup>。马建忠主张向外国借款兴办实业，“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sup>②</sup>。他们把求得中国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侵略者的援助上，这无异于与虎谋皮，结果一定会遭到更大的损害。

早期改良主义者虽然对封建专制制度有所抨击，要求进行一些资产阶级性的改革，但并不愿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强调民权和君权的对立，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且主张维护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封建伦理纲常，提出所谓“主以中学，辅以西学”<sup>③</sup>的口号。

早期改良主义者虽然要求“民权”，但却敌视人民群众。抵制农民革命，是他们倡导变法的共同出发点之一。王韬对太平天国革命表现了极大仇恨，不断向清朝官僚上书献策，主张“当今要务，首在平‘贼’”，“治今日之‘贼’，计非多杀不可”<sup>④</sup>。陈炽诬蔑“无地之民，大半皆惰民也，游民也，……防之之法，莫善于保甲”<sup>⑤</sup>。

---

① 王韬：《英但自守》，《弢园文录外编》卷3。

② 马建忠：《铁道论》，《适可斋记言》卷1。

③ 郑观应：《西学》，《盛世危言》卷1。

④ 王韬：《与周弢甫征君》，《弢园尺牍》卷4；《火器说略前序》，《弢园文录外编》卷8。

⑤ 陈炽：《编审》，《庸书》外编，卷6。

## 第三节 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的诞生

### 一、社会基础和突出优点

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中国产生了工业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不同于西欧无产阶级只是伴随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

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三种企业里产生的。首先是伴随外国资本在中国直接经营近代工业企业而来。从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陆续兴建了一百多个厂矿企业，在这些工厂企业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其次，从六十年代起，清政府开始经营近代军事工业，三十年间创办了十几个兵工厂和造船厂，在这些企业里产生了第二批产业工人。再次，到了七十年代左右，在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和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中，又产生了第三批产业工人。据统计，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在七十年代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八十年代时增加到四万五千人，截止到一八九四年大约有九万数千人。在近十万的产业工人当中，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里只有二万七千五百人，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五左右；而外国资本经营的企业里却有工人三万四千人，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左右；清政府和官僚资本经营的近代军事、炼铁、纺织、采矿等企业里共有三万五、六千人，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由此可见，“中国

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sup>①</sup>

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sup>②</sup>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最富于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工人工资低微。中外资本家为了增加利润，总是力求把工人工资水平压到最低限度。据统计，七十至九十年代，中国普通男工每日工资一角五至二角钱，而外国普通男工每日工资却高达七角五至一元，工资相差四、五倍。所以，连在汉口经营砖茶业的俄国资本家也不得不供认“中国工人工资低廉，有时手工业制造比使用机器还要低廉”<sup>③</sup>。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每日一角五至两角钱的工资收入很难维持一个壮年男工的温饱，更谈不上养活妻子和儿女了。即使这样低微的工资，也不能如数的到达工人手里，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和工头们，常常想方设法的拖欠和扣扣工资。工人工资微薄，而资本家的利润却十分丰厚。据《北华捷报》记载，十九世纪八十一九十年代在华外国资本企业的利润率最高达百分之二十四，一般地也在百分之十五以上。这说明工人所受资本剥削的残酷程度。

<sup>①②</sup>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90、607页。

<sup>③</sup> 吉尔：《金沙江》，一八八三年版。

中外工厂主在拼命压低工人工资的同时，还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的办法，以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在八十年代，一般工厂的劳动日短的是十一、二小时，较长的达十三、四小时。据湖北织布局的一个英籍监工德金生透露，湖北织布局的工人们“离开工厂出去散散步的机会都很少，因为厂中作工是从早晨五点钟直至下午六点钟，每隔一个星期日才休息一天。这些工人很可怜，因为他们瘦到只有皮包着骨头，五十人里面也找不出一个体格康健的人”<sup>①</sup>。

工人的劳动条件也是极其恶劣的。中外剥削者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在厂矿中不安装必要的卫生设备和安全设备，加上工人劳动强度过大，致使伤亡事故不断发生。尤其在采矿业中，工作条件更为恶劣。采矿用手镐，有的工作面不及一米高，工人得躺在地上挖，运矿石是把绳子套在脖子上象牛马一样爬着向上拉。那时百分之九十的矿井采用自然通风与明火灯照明，井下温度高，空气污浊，疾病率很高。据记载，基隆煤矿“矿工的死亡率非常的高，中国工人开始工作不久便一个个死掉了”，这“使得人们畏惧而离去此地。所以，看来很不容易找到足够的挖煤手来保证每日二百吨的产量”<sup>②</sup>。更严重的是经常发生“冒顶”、瓦斯爆炸、水淹事故。一八九五年马鞍山煤矿一次压死八十人。开平煤矿经常发生伤亡事故，最大的一次是一八九三年发生的坑道崩塌事件，压死在里边的就有五十人。事前，工程师提出报告，要求采取措施，但工厂主竟视若罔闻，只顾追求利润，不管工人死活，结果造成了大惨案。资本家对于伤亡事故，根本谈不上什么抚恤，伤亡只出少许的钱，有的甚至完全不出。

<sup>①②</sup>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233—1234、1236—1237页。

近代工业在中国从出现之日起就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一八七二年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有女工六、七百人。当时纺织、火柴等厂中都雇佣很多女工。据一八九三年《北华捷报》估计：“上海有一万五千或二万妇女被雇用”，占当时全国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童工的使用也很普遍。即使在劳动条件极其艰苦的采煤业中，也有大量幼童从事繁重的劳动。开平煤矿的“煤窑规程”规定：可雇佣十三至十八岁的幼童。这些女工和童工遭受的剥削更为严重。同工不同酬，女工同男工一样干活，工资却少百分之二十五，甚至一半。而在纱厂、火柴厂工作的女工，有每日工资仅五分钱的。童工每日工资一般只有七、八分钱，而“包身工”就更为悲惨，连工资都没有。残酷地剥削压榨，往往使幼童无法生活，不少人没有“满师”就被折磨死了。为了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女工和童工是使用机器的资本家们首先压榨的对象。十九世纪下半叶，大量的妇女和幼童在近代工业里工作，不仅扩大了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的范围，而且使得整个工人的工资水平降低，加重了对工人剥削的程度。

当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微薄工资时，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如房主、商人等又向工人扑将过来。一八七〇年至一九〇五年，仅上海的米价就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六点六，煤的零售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三十八点四。工人的名义工资基本上没有变动，而实际工资却大大下降，生活日趋恶化。工人出卖全部劳动力，换来的只是茅棚、土屋的住处和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生活。例如，原江南制造局退休老工人黄富泉的父亲黄仲卿，那时在枪厂做铣工，每天工资四角，早晚种些菜卖。黄福泉十四岁进局学徒，挖坞泥，塘炉灶，干着远远超过自己体力所能负担的重活，每天挣得二角左右。早晚帮助父亲种地、浇

菜、挑菜上街去卖。黄福泉的妹妹则在家里摇袜。一家拚死拚活的劳动，还换不到全家六口人的温饱，每到冬天，他家还不得不讨些破旧棉衣给孩子过冬<sup>①</sup>。遭受残酷经济剥削的中国无产阶级，就是在世界上这种最低的生活水准线上挣扎。

中国无产阶级不但受着资本的剥削，而且由于生存在半封建社会里，还受着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这主要表现在：

(1) 封建把头制。在中国开办的近代厂矿中，普遍实行着封建把头制度。“把头”、“管工”、“工头”、“夫头”等封建把头对工人有无限的“约束”权力，掌握工人的招雇、解雇和发放工资等大权，他们不仅对工人进行封建盘剥，而且充当中外资本家的看门狗，殴打、凌辱和监视工人。翻开开平矿务局的《煤窑专条六十六则》和《煤井规条十二则》，就可以发现有这样的记载：“窑里采煤、拉车、垒矸子工人，马夫，看门，全归把头、管工约束。……如有不听指挥，或不依法开采，或作工大意，或工人短欠，准告知煤师查办。”“窑里作工之人，当做工时候，若无把头执照，不许出窑。”<sup>②</sup>一八八三年英领事的商务报告也供认：开平矿务局从汕头招来一百个工人，“他们的‘把头’极其残忍地掠夺他们。最后，矿局把他们全部解雇了”<sup>③</sup>。

(2) 封建行会制度。在中国各类企业内，封建官吏和资本家利用封建行会制度束缚工人。如江南制造总局，工人按行业有行会组织，木工有红帮和白帮两个行会。红帮是轮船木作，白帮是建筑木作，虽同是木作，但各有自己的会所，不得越业工作，造船的木作不能造屋，造屋的木作不能造船。行会组织的规章

<sup>①</sup> 《江南造船厂史》编写小组：《中国的第一代工人》，《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三年第4期。

<sup>②③</sup>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245—1246页。

很严，如同业工人必须加入本业的行会，不得个别增加工资，不得参加罢工等等；同时，要按期交纳较高的会费，多的竟达工资的百分之二十<sup>①</sup>。

(3) 在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里，设有刑庭，驻有军警。如热河三井矿务局、漠河金矿、湖北纺织局等都“有勇有弁”“以资镇压”。一八八二年，李鸿章批准在开平矿务局设立刑庭，对所谓“寻常酗酒斗殴、聚赌行窃等犯，准暂由吴守炽昌就近督查审讯，量予枷责发落，按月呈报，以归简便”<sup>②</sup>。官督商办企业是如此，官办企业就更不用说了。

在中外企业里的洋人对中国工人的压迫，也十分骇人。如英国人马格里，在金陵机器局任职时，“他优待外国技师。他虐待中国工人，稍不从命即加鞭笞解雇。他非法组织一个卫队来保卫自己。他一再写信给李鸿章……侮蔑中国工人”<sup>③</sup>。

中国无产阶级遭受如此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因而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毛主席指出：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sup>④</sup>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在形成过程中就比较集中。从地域上看，中国无产阶级主要诞生于沿海几个大城市。一八九四年，集中于上海、汉口、广州、天津四大城市的工人，占全国工厂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多（不包括矿工）。上海一地即占百分之四十七，约有工人三万六千人，汉口一万三千人，广州约万人，天津四千人。此外还表现为工人集中在雇佣五百人以上的几十家大企

①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247、1243页。

③ 鲍尔吉：《马格里传》。

④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07页。

业中。一八九四年，雇佣五百人以上的企业有三十九家，其中最大的企业雇佣工人多达三、四千人，如香港黄埔船坞公司雇佣工人多时为四千五百人。总计有五万九千至六万二千二百人在这三十九家企业内作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见，中国无产阶级从形成时起，就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几十家大企业中，这种异常的集中性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所少有的。中国无产阶级所以一开始就比较集中，是因为当时外国的、清政府的和民族资本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在中国创办的近代工业，大多数是把西方大规模生产的企业组织直接移植到中国来；清政府开办的近代工矿业，一般都是购买外国全套机器设备，仿效外国工厂规模；民族资本所经营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所以雇佣工人较多，这表现了民族工业的落后性。但是，对于工人来说，近代的大工业使分散的、个体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变为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大军，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增长，有利于开展革命斗争。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从产业工人的来源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量的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成为无产阶级最广大的后备军；其次是破产的手工业者；少量的产业工人还来自被裁减下来的士兵。这些由破产农民转化为工人的，一般离开农村的时间不长，其家属、长辈、亲友还在农村，他们绝大部分是农村中的贫农和佃农，其政治、经济地位同样十分低下。这就使得“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sup>①</sup>

---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07页。

## 二、早期的斗争

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受的切身痛苦，决定了他们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由于外国侵略者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在中国建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所以中国无产阶级一开始就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矛头直指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中国封建势力。

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产生在外国人经营的近代企业里，出现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区。因此，这些地区的工人斗争就发生的最早。一八五八年，在广州人民反对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城的斗争中，香港曾有两万多名市政工人、运输工人等，同仇敌忾地举行罢工，并回到广州参加了斗争，给予英国侵略者以严重打击。

中法战争期间，又是中国年青的无产者在香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斗争序幕是由香港船舶修造工人揭开的。一八八四年九月中旬，被福建长门炮台击伤的法国军舰驶入香港船坞，船厂工人集体协议拒绝修理，并密谋将敌舰炸毁。不料事机不密，被英国殖民当局侦知，通告法国侵略者连夜将所有船只驶出船坞。英国殖民当局并派“满载差队”的小轮两艘，驻扎船坞，企图对工人进行镇压。但是，船厂工人爱国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其他各行各业中国工人的普遍支持和响应。九月十八日，“法人在港购煤，令小工挑运上船，而小工皆哗然散去”。九月二十七日，法国商船到港，“民艇不起货”；“法船在港买牛羊，民艇不载”。在往来香港、日本的法轮上的“司火华工”，也纷纷罢工，“悉数走散”<sup>①</sup>。

---

<sup>①</sup> 汪敬虞、聂宝璋：《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经济研究》，一九六二年第3期。

这次罢工，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而且吓坏了英国殖民当局。他们用高压手段对付罢工工人，无理逮捕了十一名拒运法货的民艇工人，撤销了许多民艇的执照。这种野蛮的镇压，激起了工人们更强烈的反抗。民艇工人和搬运工人联合起来，索性对所有“中外货皆不搬运”，使“整个港口工作陷于完全停顿”。十月三日，罢工进入了高潮。以船厂工人、民艇工人和搬运工人为主体的香港工人群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示威。英国殖民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全副武装，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一个工人，逮捕了四十多个工人。但是，蔓延整个岛上的工人斗争，并没有被压服。十月五日，东区的码头工人又计划举行示威。隔了一天，九龙区的搬运工人起而响应，以舞龙为名，到油麻地示威。各界人民在街头到处张贴声援罢工的揭贴，要求释放被捕工人。面对这种情况，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低下头来，“还所罚款，放所拘人”，“听华民不装法货”，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法国侵略军只好滚到西贡、日本采购军火，补充给养。

随着工人数量的增多和苦难的加重，工人群众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日益频繁。一八七九年，耶松船厂工人，因把头寇扣工资而举行罢工。同年，上海英属祥生船厂工人，为反对外籍监工欺压工人而举行罢工。一八八二年夏天，开平煤矿的矿工为了要求平等的工资待遇而举行罢工，使矿厂大半陷于停工状态。一八九一年，开平煤矿外国工程师依势欺压工人，激起工人反抗，罢工数日，逼令所有的外籍技师离开矿厂。李鸿章动用武力，才把这次斗争镇压下去。一八八三年和一八九〇年，江南制造局总办为了加紧剥削，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全厂二千工人，团结起来，举行罢工。在官办的军工厂进行罢工是很困难的，结果

是“工人们受了严重的责罚，并被驱散了”。一八九五年，汉阳铁厂的翻译委员无理“笞责”工人，工人们罢工抗议。铁厂督办会同地方政府“调营勇二百余”，到厂弹压，工人继续抗争。后来厂方被迫将两个笞责工人的家伙“严行申饬”，并允诺以后“不得擅用刑责”，工人才停止罢工。

当然，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而是当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尽管属于自发性质，但却震撼了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清朝的反动统治，推动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必将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 第六章

## 保卫祖国边疆， 反对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

### 第一节 反对沙俄侵略中国西部边疆

#### 一、讨伐阿古柏入侵新疆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间，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的过渡时期。在这期间，世界资本主义“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①

远东地区，是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激烈争夺的重要场所。在这个地区进行角逐的，过去主要是英、俄、美、法四国。英国和俄国虽然仍在各方面保持着优势地位，但已经开始感受到美、法两国日益尖锐的竞争。除此以外，这时在远东舞台上还有两个新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渐露头角，一个是通过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迅速走上对外侵略道路的日本；另一个是在七十年代初期击败法国，完成日耳曼各邦统一，拥有强大武力和最新工业技术的德国。

由于这些国家加紧侵略朝鲜、越南等中国的邻邦，并进而侵略中国，使中国的边疆地区出现了普遍的严重危机。在中国西

---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98页。

北，沙俄和英国先后将魔爪伸入中国新疆。

新疆是中国的西部门户。这里有高耸入云的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还有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是祖国西部的屏障。贪婪的沙皇早就垂涎三尺，觊觎着富饶的新疆。它在一八六四年从中国西部割去了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之后，仍然不能餍足，妄图进一步鲸吞整个新疆。英国也不甘落后，梦想把新疆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因此，沙俄与英国之间勾心斗角，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一八六四年，新疆回民在陕甘回民反清斗争的影响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清朝统治的举事。举事者先后攻占库车、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喀什噶尔和伊犁等地。

但是，这次举事的领导权，一开始就被以和卓、伯克<sup>①</sup>、逃亡的将军等为主体所组成的反动封建主集团所窃取。他们拥兵割据，互相攻杀，有的甚至与俄、英侵略者相勾结，从事背叛祖国的活动。他们举事的目的是以暴易暴，取清朝统治而代之。他们把新疆地区分裂成为若干小汗国，而这些小汗国的背后，又都站着外国资本主义作靠山。其中有以妥明为头子，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东干洛台汗国”；以金相印、萨德克为头子，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哲德沙尔汗国”<sup>②</sup>；以迈孜木杂特为头子，以伊犁为中

---

① 和卓和伯克，都是清代新疆地区特有的称呼。和卓的原义，是大人、老爷、先生的意思，是对当地宗教内部上层封建主的尊称。伯克是官名，清代仅新疆南路设立，其中职务最高者称阿奇木伯克，统一管理城乡事务，受当地将军和大臣指挥，各级伯克还有世袭权。原来，新疆建省前，清代中央政府在新疆只设伊犁将军等武职，各级地方文官，均由原来传统的伯克来担任。和卓是握有教权的封建主，伯克是握有政权的封建主，都是当地的统治阶级。

② “哲德沙尔”的含义为七城，这是指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叶尔羌、库车、莎车和吐鲁番。

心的“伊犁苏丹国”。这些小汗国对外依靠俄、英，对内统治十分暴虐，因此，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回族、汉族等各族人民，还没有挣脱清朝统治的枷锁，就又戴上了外国资本主义和地方分裂主义的镣铐。

在南疆，以金相印和萨德克为头子的举事者，一开始虽然攻占了喀什噶尔二城之一的疏附（回城），但因清朝军队坚守疏勒（汉城），久攻不下。他们竟向中亚细亚三个小汗国之一的浩罕乞师。浩罕统治者派部将阿古柏入侵新疆，占领喀什噶尔地区。阿古柏原是浩罕安集延的舞师，后来逐渐爬上浩罕军事长官的地位。他为人贪婪残暴，野心勃勃，侵入新疆以后，经过几年经营，“遂尽有南路八城”，“地极辟展”<sup>①</sup>。一八六七年，阿古柏悍然建立反动的“哲德沙尔汗国”，自称“毕调勒特汗”。一八七〇年，他打败妥明，占领乌鲁木齐，势力进一步扩展到北疆。

阿古柏在喀什噶尔所建立的政权，完全是一个浩罕入侵者的政权。他依靠封建神权对新疆各族人民进行奴役统治，只有极少数反动封建主、伊斯兰教上层分子是它的脆弱支柱。他依靠掠夺我国新疆地区贵重资源来维持一支反动的军队<sup>②</sup>。他不仅“严刑厚敛，税及园树”<sup>③</sup>，而且厉行宗教歧视和民族压迫。他对外投靠沙俄和英国，成为他们的走狗。

十九世纪后半叶，沙俄、英国竞相在中亚细亚争夺殖民地，

<sup>①</sup> 曾毓瑜：《新疆靖寇记》、《征西纪略》卷四。辟展就是现在的鄯善，在吐鲁番以东。阿古柏窃据的地区，除新疆南路外，打败妥明以后，北路据有乌鲁木齐、玛纳斯（绥来）、吐鲁番等地，东北到辟展以东的七克台。清政府还控制着七克台以东，乌鲁木齐、玛纳斯以北等地区，巴里坤（镇西）是清军的中心，后来清朝军队就是以此为依据，逐步向南向西收复祖国领土的。

<sup>②</sup>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88，第17页。

<sup>③</sup> 左宗棠：《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第23页。

并进而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新疆。沙俄狂妄地称我国新疆为“东土耳其斯坦”，梦想鲸吞我国新疆地区。沙俄和英国都阴谋假手阿古柏，来达到侵占我国新疆的目的。新疆回民举事以后，沙俄便认为“中国正遭受分裂的威胁，在中国西部，……正在形成独立的回族伊斯兰教领域”<sup>①</sup>。沙俄妄图乘此机会分裂中国，便与阿古柏伪政权相勾结。一八六六年，沙俄与阿古柏订立了所谓“协议”，规定俄国有权入南疆追捕逃人。阿古柏也向圣彼得堡方面频送秋波，多方联络<sup>②</sup>。从一八六六年到一八六八年，沙俄先后派遣克鲁道夫、乌兰托等军官来到喀什噶尔，协助阿古柏训练军队。一八七二年，沙皇政府无视中国主权，又同阿古柏订立通商条约，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国首领”，肢解中国的新疆。阿古柏则答应沙俄在天山南路各城设商务代表和建立商馆；俄国商人进行贸易，只纳百分之二点五的进口税；俄国商队还有经过南疆到邻国的通行权。阿古柏派赴沙俄的使节赛亦德·雅古布，先后到塔什干、圣彼得堡，沙俄都待以上宾之礼，并邀请参加阅兵典礼。反过来，沙俄也多次派遣使节到达喀什噶尔，为阿古柏政权撑腰打气，涂脂抹粉，说什么这个政权“是公正的”，这里的人民生活还“过得自由”等等<sup>③</sup>。

英国见沙俄势力深入南疆，认为对己不利，多次派人到南疆活动，加紧笼络和极力支持阿古柏。从一八六八年前后开始，英国的商品、军火和特务，便从土耳其、印度方面不断地涌进新疆。英国商人罗拔特·邵伍来到喀什噶尔，和阿古柏谈判并达成协

① 巴布科夫：《我在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九一二年圣彼得堡版。

② 《国闻周报》，一九三四年，第11卷，第11期。

③ 彼夫佐夫：《西藏探险队著作》，转引自《为正确阐明中亚细亚民族底历史问题而斗争》第204页。

议。一八七三年，以茀赛斯为首的英国特派使团，带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亲笔信，到达喀什噶尔。一八七四年，英国承认阿古柏的“艾米尔”（意即统治者）地位。同年，英国人送给阿古柏一万支步枪和若干大炮，指使他抗拒中国军队收复国土的战争。英国和阿古柏并签订通商条约十二条，根据这个条约，英国攫取了在新疆驻使、通商和设立领事等特权。阿古柏对此受宠若惊，派出亲善使节，前往英国答礼。这样，阿古柏就成了英、俄分裂中国神圣领土新疆的罪恶工具。

面对着新疆的严重危机，加上沿海地区警报的纷至沓来，清政府内部发生了“塞防”与“海防”的争论。

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拥有北洋海军，其地盘在天津，后来又是著名的亲俄派。他从本集团的利益出发，主张“海防”为重，“塞防”为轻，应该把大量的国防经费用于北洋海军的建设和整顿。关于新疆和西北的防务，他主张“暂弃关外，专清关内”，只要把西北地区的回民起义镇压下去就行了，至于新疆，可以不要。这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论调。他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sup>①</sup>，要求把用兵新疆的费用移充海防。这表明李鸿章为了扩充本集团的势力，而不惜出卖祖国的大片领土。

湖南巡抚王文韶认为沙俄对中国的威胁最大，“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在他看来，只要在西北挫败了沙俄的侵略图谋，“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

以左宗棠为首的湘系军阀，拥有军队十余万，其地盘先在闽浙，后在西北的兰州。他也从本集团的利益出发，主张“东则海

<sup>①</sup>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9页。

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反对“扶起东边，倒却西边”。他要求把李鸿章控制的江南制造总局合并到自己控制的福州船政局里去，以便扩大规模，仿制铁甲舰；在西北则应该在镇压回民起义以后，立即出兵新疆，消灭阿古柏入侵者的反动政权。左宗棠关于收复新疆的意见在客观上符合民族的利益，因而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

一八七六年七月，清政府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名义，率军前往新疆，讨伐阿古柏。在新疆各族人民支持下，清军节节胜利。七月至九月间，清军陆续收复乌鲁木齐及其附近的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等地。清军胜利进军，引起英国侵略者的极大不安。英国侵略者为了保护其走狗阿古柏政权，始则力阻清军前进，继则玩弄“调停”阴谋。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提出让阿古柏“投诚”，条件是“保南八城自王”，“作为属国，只隶属版图，不必朝贡”，企图牺牲中国在南疆的主权，维护阿古柏的统治。清政府以“交回各城，献缚叛逆”作答而加以拒绝。一八七七年五月，清军陆续攻占吐鲁番、达坂城和托克逊等城市。新疆各族人民听到祖国大军到来，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中国军队所到之处，都受到“欣喜的欢迎”<sup>①</sup>。在人民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协助下，中国军队摧毁了阿古柏精心部署的吐鲁番、托克逊、达坂城三道防线，阿古柏的主力被歼灭，反击入侵者的战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阿古柏本人畏罪自杀于库尔勒。

十月，清军到达拜城，拜城各族人民为了迎接祖国大军的到来，与溃退的叛军白彦虎部进行战斗。白彦虎叛军始终未能攻下拜城。清军一到，拜城人民开城欢迎，这就说明了新疆各族人

---

<sup>①</sup> 别里尤：《克什米尔与喀什噶尔》，一八七七年圣彼得堡版。

民的心是向着祖国的，他们与大军一齐进行了反入侵的战争。

阿古柏死后，在俄、英的扶植下，他的儿子伯克胡里继续挣扎，依然自称为“汗”。沙俄在中亚细亚的军事头目高福曼狂叫“不应让中国军队占领”喀什噶尔<sup>①</sup>，妄图阻挡清军前进。伯克胡里再向英国求援，英国外交部照会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声称愿作“调停”。同时，在喀什噶尔的英国人也放出空气，说要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前线“调停”，希望清军停火。清政府拒绝了所谓调停。一八七八年一月，清军收复喀什噶尔，伯克胡里等残匪，裹胁当地居民五千余人和大批牲畜，由布鲁特逃往俄国境内。清政府曾经要求沙俄引渡有关人犯，但被拒绝。沙俄包庇这批败类，是要利用他们，作为继续反华的工具。此后若干年，这批残匪在沙俄的支持和豢养下，不断在边疆上侵扰，结果被爱国军民打得一败涂地。由此可见，历史的车轮是不可扭转的，在新疆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西征的中国军队，终于取得了歼灭入侵者、收复祖国疆土的军事胜利。俄、英利用阿古柏分割我国新疆天山南北的可耻阴谋，终于彻底破产。

## 二、沙俄侵占伊犁和《伊犁条约》

伊犁河流域是新疆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伊犁是我国西部边疆的战略要地，也是新疆交通贸易的中心，清政府统治新疆南北两路的伊犁将军治所，就设在这里。沙俄对于伊犁地区，早就怀有侵略野心，当时任沙俄参谋总部上校、后来任沙俄陆军大臣的库罗巴特金就说过：“伊犁是向东伸展的一个大盆地，如果属于

---

<sup>①</sup> 转引自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184页。

俄国，就可以使俄国边防有相当保障，而使中国在军事上受到威胁。”①

沙俄一方面同英国争夺阿古柏作为自己的走狗，一方面又趁阿古柏入侵南疆、中国军队东撤的时机，直接出兵侵略我国新疆北部。一八六六年，当着阿古柏的势力向北扩展，并准备进占伊犁的时候，沙俄一看时机成熟，决定抢先一步，于一八七一年六、七月间，派廓尔帕科夫斯基率兵侵占我国伊犁地区。它对清政府说，这是为了安定“边境秩序”，进行“代守”。其实，沙俄侵略者在这里撤销中国行政机构，监禁中国官吏，实行殖民统治。他们抢劫当地人民牲畜财产，拆毁中国城池，残酷地剥削和凌辱当地人民。仅以苛捐杂税而论，“俄人在伊犁地方，岁收各项税租，每年不下数十万两”②。

沙俄侵略者强占伊犁，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各族人民不堪沙俄的屠杀和压迫，纷纷进行反抗，多次掀起抗俄的斗争浪潮。一八七一年，当沙俄出兵侵占伊犁的时候，沿途就遭到中国各族人民的阻击。一八七二年，沙俄侵略军伪装商队，企图进袭玛纳斯，当地各族人民在途中又将其击退。伊犁地区人民渴望早日回到祖国怀抱，他们纷纷表示“所有人民”，断不甘为俄国的奴隶，惟望中国政府“速为救援”③。

一八七二年，清政府派遣署理伊犁将军荣全，多次与沙俄交涉，让其归还伊犁，结果遭到沙俄的无理拒绝。沙俄在占领伊犁以后，曾经假惺惺地表示什么“只以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立即交

---

① 库罗巴特金：《俄国军队以及日本的战争》，英文版第1卷。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5，第17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8，第22页。

还”<sup>①</sup>。沙俄所以这样表示，是因为他们估计清政府根本没有力量收复新疆，他们不仅可以永久据有伊犁，而且还可以通过阿古柏，最后并吞全新疆。但是，沙俄的如意算盘显然是打错了，他们没有想到一八七八年阿古柏政权就覆灭了，清军继续挺进，节节胜利，新疆只剩下伊犁还在俄军手中了。所以，索还伊犁的斗争也就重新开始。

一八七八年六月，清政府派遣满洲贵族崇厚出使俄国，索还伊犁。崇厚到达圣彼得堡，转往克里米亚半岛，于次年十月二日，在雅尔达附近的里瓦机亚，在沙俄政府的胁迫下，没有取得清政府的同意，擅自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机亚条约》）十八条款，索还了一个残破的伊犁，却把霍尔果斯河以西，及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大片形势险要的地区割让出去；并有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合中国白银二百八十万两）；俄商在新疆、蒙古贸易免税、增辟由陆路至天津、汉口、西安通商路线；俄国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等地增设领事等内容。这样，伊犁一地名义上虽然归还中国，但其西境、南境都被沙俄割去，截断了伊犁和天山南路的交通孔道，使伊犁成了“弹丸孤注”，陷于北、西、南三面被沙俄包围的危险地位。消息传来，舆论哗然，以致“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sup>②</sup>。国内的人们把愤怒集中在崇厚身上。清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以“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的罪名，把崇厚拘押起来，随即定为斩监候，表示了对这个条约的不满。

这时，中、俄关系紧张，沙俄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气急败坏，决定对中国实行武力恫吓。沙俄驻华使馆代办凯阳德“抗

① 《新疆图志》，卷54。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8，第10页。

议”惩处崇厚。他质问总理衙门说，把崇厚交部议处的谕旨“是何用意？”还威胁说：“俄国并非无力量，至条约准与不准，在俄国总是一样。”<sup>①</sup>沙俄调集军队数万，在伊犁地区集结待命，其海军司令勒索夫斯基率太平洋舰队二十三艘军舰，从海参崴开到中国海面示威，摆出了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

一八八〇年二月，清政府任命曾纪泽以驻英公使兼任驻俄公使，要他前往俄京重开谈判，以收回伊犁，挽回崇厚所放弃的一些权利。七月三十日，当曾纪泽到达圣彼得堡时，就遇到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的“厉色相待”，曾纪泽感到他的这次任务好象“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sup>②</sup>。因此，他十分胆怯，缺乏信心。在谈判过程中，吉尔斯叫嚷说：“（我认为）必须向他们露出牙齿。”“我们不能放弃赔偿的要求……，如果中国人不愿意理解这点，则我们只有向他们伸出拳头。”<sup>③</sup>他的副手也说：“（同中国人谈判），只有痛打他们一顿，才能使他们老实下来。”“必须把手按在剑柄上，有准备和有决心把剑拔出鞘来。”

“我认为最好是不拘采取何种形式，尽量从他们手里多索取几百万，至少可以用来减轻今后由于必须保持武装防御而给我国财政增加的负担。”<sup>④</sup>沙俄侵略者的狰狞的、流氓无赖的嘴脸，在这里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了。沙俄在对曾纪泽进行外交恫吓，恣意勒索的同时，还炫耀武力，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

经过多次谈判，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曾纪泽在沙俄逼迫下，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以代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8，第11页。

② 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3，第13页。

③④ 查尔斯·耶拉维奇、巴巴拉·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一八七六—一八八〇），《从阿·约·若米尼给尼·克·吉尔斯的信中看俄土战争和伊犁危机》，一九五九年荷兰布利尔出版社版。

替崇厚原来签订的条约和章程。这个条约规定：沙俄将特克斯河一带地方与伊犁九城交还中国<sup>①</sup>，而仍然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原属中国的大片领土；俄商在天山南北两路贸易暂不纳税，并得由陆路经新疆到肃州（嘉峪关）的贸易；中国赔款增加为九百万卢布（合白银五百多万两）；伊犁居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国籍者，均听其便”，这使沙俄侵略者胁迫五万多名中国居民及其财产迁入俄境的罪行获得“条约”的根据。

《伊犁条约》还留下了后患，条约规定：“斋桑湖（泊）迤东之界，查有不妥之处，应由两国特派大臣会同勘改。”沙俄就以此为借口，在一八八二年到一八八四年的三年之内，又连续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勘界议定书。每勘一次界就割去一大块中国土地。这样，沙俄通过《伊犁条约》和后来的几个勘界议定书，一共割去了塔城、喀什噶尔等地以西约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总之，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一八八四年，沙皇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勘界议定书，一共侵占我国西部领土五十多平方公里，这是沙俄对于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沙俄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人民拒绝迁居俄境，沙俄出动军队进行逼迁，并严刑拷打，以致宁远一城“哀号之声，彻于四野”<sup>②</sup>。《伊犁条约》签订后第二年，霍尔果斯河西岸的索伦营右翼四旗人民，就强烈要求“再议疆界，收回其地”<sup>③</sup>。乌梁海左翼蒙古族牧民“男女老幼，至死不肯分让”<sup>④</sup>。

<sup>①</sup> 当时，伊犁河流域座落着大小九个城池，统称之为伊犁九城，即惠远、惠宁、熙春、绥定、广仁、瞻德、拱辰、塔尔奇、宁远，其中的惠远城是这个地区的中心即今伊宁市。沙俄侵占伊犁后，曾经拆掉了其中三城。

<sup>②③④</sup>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32，第15页；卷27，第26页；卷29，第1页。

他们都拒绝划入俄境，强烈要求回到祖国怀抱。这充分表明了西北边疆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沙俄侵占我国领土的坚定立场。

由于沙俄的野蛮侵略，西北边疆危机日趋严重。一八八四年，清政府在新疆正式建省，省会设于乌鲁木齐。新疆建省对我国西北边疆建设和防御沙俄侵略有积极意义。

### 三、沙俄侵占中国帕米尔

沙俄在侵占中亚各汗国和中国伊犁地区的同时，不断派遣出它的侵略先锋——“探险队”，对帕米尔进行窥探。

帕米尔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公元前六十年，汉朝设西域都护府于新疆，帕米尔地区的无雷等部落，即受其统辖<sup>①</sup>。七世纪中叶，唐朝在帕米尔设州治理。一七五九年，清政府平定了维吾尔族封建贵族大小和卓的叛乱以后，在帕米尔西部的叶什库里湖畔苏满塔什地方，树立了记述平定天山南路经过的满、回、汉三种文字的大石碑，碑文是乾隆帝写的<sup>②</sup>。清政府在帕米尔设有许多巡哨的卡伦，到一八七八年阿古柏入侵者被消灭后，新疆巡抚刘锦棠又在此地设立卡伦七处。直到一八八九年，还在乾隆大石碑的北面十里地方，新设立了一个苏满卡伦。

一八八四年勘界时，沙俄胁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规定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

① 《汉书·西域传》。

② 一八九二年六月二日，沙俄军官伊鄂诺夫上校，率军侵入苏满塔什地方，将此石碑挖出，移往塔什干的博物院，以便消灭证据。（见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217页）

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sup>①</sup>。这是中俄两国在帕米尔地区的唯一边界条约。沙俄通过这个界约把它的边界由苏约克山口，向南延长二百公里，直到乌孜别里山口，侵占了我国帕米尔西北部大片领土。

一八八九年、一八九一年，沙俄派军队连续多次越界侵入帕米尔地区。一八九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由沙俄伊鄂诺夫上校指挥的侵略军三百多人，以游猎为名，分兵三股，窜入塔敦巴什和阿尔苏睦尔瓦、苏满、巴什拱拜孜等地。窜入塔敦巴什的俄军，竟在毕依比达坂竖立木杆，张贴布告，欺骗当地牧民，诈称他们已属“俄国百姓”。对于沙俄的越界事件，中国新疆巡抚魏光焘向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提出抗议。清政府也于一八九一年九月指示驻俄公使许景澄，就俄兵无故越境侵占的违约事件进行交涉，要求沙俄迅速撤兵。十月三日，许景澄至俄外交部会见沙俄外交副大臣基斯敬，要求俄方立即撤出越境部队，拆毁木杆，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基斯敬始则支吾搪塞，继而狡辩抵赖。许景澄指出俄兵所到之处，明明是在喀什噶尔境内，对于这种越界行为，中国军队“本可开枪阻拒，亦以顾全和好，故特先为理论”。基斯敬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此番俄武员带兵竟到中国界内，是其错处，已经行文申饬”，并且同意俄兵在中国界内所立木杆“任凭华官撤毁”。他还自我表白什么“俄国地方如此广大，并不愿再得他国之地。俄国但愿自保疆土，与中国和好，决无他意”<sup>②</sup>。但是，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种谎言！仅仅过了几个月，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沙俄外交大臣格尔斯就突然发出照会，借口“地界不清”，要挟清政府不得派兵巡逻中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457页。

② 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卷6，第20页。

国的边疆帕米尔，并诡称阿尔楚尔帕米尔的苏满卡伦“与中国毫无干涉”，要求中国撤退驻防苏满的军队，并要清政府把驻“在帕米尔之卡伦防兵”一律全行撤退。基斯敬还欺骗说：“如中国卡兵一撤，俄国必立即派员与中国会勘。”<sup>①</sup>清政府明知这是沙俄的一种包藏祸心的领土讹诈，虽曾据理辩论，但迫于沙俄的威胁，在六月下令把派往帕米尔的马队三旗以及守卡兵丁，“一律撤回”<sup>②</sup>，以表示谈判解决争端的诚意。就在中国军队撤出的同时，沙俄竟背信弃义，立即派兵窜入我帕米尔郎库里附近进行侦察活动。七月初，沙俄侵略军三千多人，大举南侵，先后侵占郎库里、苏满、阿克塔什，毁掉中国在该处所设的卡伦，武力强占了我国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鉴于沙俄这种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清政府据理质问，要求撤兵，沙俄不仅拒不撤兵，反而提出什么以“山中水分流处”（即萨雷阔勒岭）划分中俄在帕米尔边界<sup>③</sup>的无理要求，阴谋迫使清政府承认其以武力强占中国帕境的既成事实。

一八九二年秋，清政府在沙俄武力强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与沙俄进行谈判，清政府坚持以《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原则规定，议分帕米尔。但沙俄得寸进尺，提出了要“从乌孜别里山口，先往东、再往南”<sup>④</sup>的妄图进一步侵吞中国领土的无理要求。

为达其罪恶目的，在谈判中，沙俄外交大臣格尔斯时而说什么帕米尔“荒寒不毛，无关险要”，对“中国毫无用处”，“何必如此坚持”；继而说“帕米尔向归浩罕，（浩罕）既已归俄，帕地自应与之俱归”。对此，中国谈判代表庆常当即指出：中国对帕米尔“既有管辖之权，又有成约”，“无论肥瘠，不能舍弃”。至于帕米尔向

<sup>①②</sup> 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卷7，第1、5、9—10、16页。

<sup>③④</sup> 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卷7，第25页；卷4，第13页。

归浩罕之说，中国“未之前闻，而其属华，则确有证据。一则从前官兵迭入帕境，平定巨寇，勒石纪功，至今犹存；一则帕地向有中国卡见于贵国公牍；一则帕地之民，向受华官约束，应中国徭役”<sup>①</sup>。格尔斯在铁一般事实面前，理屈词穷，于是采取了拖的办法。谈判期间，清政府还不止一次地照会沙俄外交部，明确指出这种旨在侵吞中国领土的划界办法“中国不能允许”<sup>②</sup>。

此后，沙俄一面与中国谈判，以敷衍中国；一面与英国密谋瓜分帕米尔。

谈判进行了很久，由于沙俄本着“与其与中国作无谓之周旋，不如与英国”瓜分帕米尔<sup>③</sup>的强盗逻辑，因而毫无结果。

一八九四年四月，中俄双方换文，清政府被迫接受沙皇政府的建议：暂时保持双方军队各自的位置，直到帕米尔问题最终解决为止。但是，中国政府当时就作了明确的保留，声明“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于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利。它认为应保持此项以一八八四年界约为根据的权利，直达到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sup>④</sup>。中俄换文是当时双方的暂时维持现状的文件，萨雷阔勒岭是当时双方的临时军事分界线。可见，沙俄也不敢坚持以萨雷阔勒岭为国界线。

一八九五年三月，沙俄背信弃义，竟然背着中国政府私自与英国订约，象窃贼一样偷偷地瓜分了中国的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领土。此事发生以后，清政府当时曾据约力争，坚决不予承认，并一再声明：“后日必重申前说”<sup>⑤</sup>，明确地表示了中国政府的态度。

<sup>①③</sup> 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卷8，第16、5—6页。

<sup>②</sup> 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卷4，第14页。

<sup>④</sup> 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

<sup>⑤</sup>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13，第16页。

## 第二节 反对美、日侵略台湾和 英国侵略西南边疆

### 一、日、美侵略中国台湾省

在沙俄侵略我国西北边疆的同时，东南海疆和西南边境也燃起了报警的烽火。

一八七四年，日、美联合侵略台湾，是中国近代时期日本侵华的起点，中日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有过友好的往来。但是，日本自从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以后，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便处心积虑地要征服中国，使两国过去在历史上形成的友好联系，开始遭到了破坏。一八六九年，日本明治天皇发布了一封宣布“国威”的御笔信，扬言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他亲自制定了所谓“大陆政策”，要第一步侵略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侵略中国的东北和蒙古，第四步征服全中国，第五步征服全世界，妄图使日本成为“八纮一宇”的大帝国。从这一野心出发，日本明治政府提出了所谓“富国强兵”的口号，并且叫嚣“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它要把日本的富强建立在掠夺别国人民的基础上。为此，从明治政府起，就把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极力扩展军事工业，全力建立近代化的海陆军。为了从精神上麻醉日本人民，制造侵华舆论，明治政府相继颁布了《军人敕谕》、《教育敕谕》，把孔孟之道中的“忠孝节义”与

日本封建道德中的“武士道”精神合而为一，妄图使日本人民服从天皇意志，为其军国主义效劳。这样，在军国主义路线引导下的日本就成了远东地区的战争策源地。

尽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如此猖狂，但它毕竟还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小国，就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和中国当时的具体条件来看，它的力量和它的野心还是不相称的。要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独吞下去，还是不可能的。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日本首先向中国的台湾伸出了侵略的魔爪。日本之所以敢于悍然发动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是与美国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领土中最大的岛屿，全境由台湾本岛、澎湖列岛和其他若干附属岛屿所组成，其中包括钓鱼岛等岛屿。到了近代，随着在不平等条约中规定台湾开口通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侵略逐步深入，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的侵略着着加紧。一八六七年，美国借口其船只“罗佛”号失事于台湾，水手被杀，竟然出动军队，在该岛南部琅环（恒春）登陆，企图占领台湾，但被当地高山族人民击退。美国直接侵略台湾失败后，就转而采取支持日本侵略的方式，企图利用日本军阀的刺刀，实现它侵略台湾的野心。当时日本既能容纳美国资本，又希望在侵略中国时借重美国的政治势力。所以两个强盗，一拍即合。

一八七一年，我国邻邦琉球渔船在海中遇到飓风，飘流到台湾，船民被当地高山族人民误杀。这本来是纯属于中国和琉球双方的问题，不难解决，但日本以此为借口，乘机插手，于一八七三年就此向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其外务卿副岛种臣派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询问，中国方面的董恂和毛昶熙说：这是中国与琉

球双方的问题，“我……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sup>①</sup>日本看讹诈不成，就加紧作军事上进犯的准备。

这时，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号称“台湾通”）适由中国回美国，路经日本，经美国驻日公使德隆推荐，受聘为日本顾问，成为日本侵台的得力帮凶。在李仙得和德隆的共同策划下，美国向日本提供子弹八千万发，船舶两只，并协助日方到我国台湾察看地形，绘制地图，运输作战物资。

一八七四年四月，日本政府设立台湾事务局，以大隈重信为长官，在长崎设立侵台军事基地，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负责指挥军事，美国的李仙得和海军少校日格赛尔等都在日军中服务，发兵三千名，进犯台湾东部。五月七日，当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时，美舰“纽约”号曾停泊于琅峤海面，为日军助威。日军登陆以后，在当地烧杀抢掠，并且携带着种子和农具，计划作长期殖民的打算。台湾人民面对着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英勇地进行战斗，以大刀、长矛等比较原始的武器，和装备精良的敌人作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使日军遭到重大伤亡。清政府得此消息后，以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为办理台湾事务大臣，命福建布政使潘霨帮同办理，率大军渡海保卫台湾。中国军队实力超过日本，这使日本产生了顾虑。加以日本当时实际国力不足，作战又不顺利，难以实现其侵略计划。在国际上，英国恐怕中日间的战争损害到英国的商业利益，主张停战议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对李鸿章施加压力，要他议和。美国原来支持日本，后来惟恐引起美国自己对华的纠葛，损害美国在华利益，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新任美

<sup>①</sup>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59页。

国驻日公使平安，要求美舰“纽约”号离开，美国驻华公使卫三畏也告诉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说，日本应该承认中国在台湾的主权。这种变化，

使刚刚从资本主义脱壳、羽毛尚未丰满的日本无可奈何，只好罢战议和，它“追悔为西人所卖”，对英、美极为不满。

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是洋务派头子奕诉，经手外交事务的实际是李鸿章。这些人都是对外妥协投降的典型代表。在英、美、法三国公使的调停下，一八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李鸿章与日本公使大久保利通订立了《北京专约》，对日本侵略台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规定日军撤出台湾，清政府给军费银五十万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反而出钱赔偿，这种倒行逆施的卖国外交，大大纵容了日本侵华的野心。由于这个条约上有台湾居民“曾将日本国属民妄为加害”和日军侵台“原为保民义举”字样，日本便据此，作为清政府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琉球人民为日本人民的依据。从前，琉球曾经向日本的萨摩藩“入贡”，到一八七二年日本就封琉球国王为藩王，即寓有琉球属于日本之意。一八七五年，日本强迫琉球断绝它同中国的一切关系，不准再有来往。一八七九年，日本乘着清政府集中力量解决伊犁问题，无暇东顾之际，乘机以武力正式吞并了琉球，改为冲绳县。从此，琉



一八七四年，反抗日本侵略的台湾高山族人民

球成了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军事基地。

日本对于台湾的侵略和对于琉球的并吞，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但是，主持朝政的那拉氏和掌握大权的投降派头子李鸿章，对日本吞并琉球完全采取妥协的态度，漠然置之，遂使琉球完全丧失独立。

## 二、“马嘉理事件”和《烟台条约》

由于英国侵略缅甸，法国侵略越南，中国西南边疆的危机开始出现，云南地区直接受到威胁。

缅甸与中国云南接壤。一八五二年，英国占领下缅甸后，就开始积极寻找从缅甸直接侵入中国云南的道路，企图由此进入中国西南市场。英国不断有人提出建议，要求从缅甸到中国的云南修筑一条铁路。从此，就不断有英国的“探险队”、“调查团”之类的组织，进行诡秘的活动。杜文秀的大理政权失败以后，英国在印、缅的殖民当局打算组织“探路队”，从缅甸曼德勒北上入中国云南，以探测滇缅的陆路交通。他们要求英国驻华使馆派一名通晓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官员前来缅甸，与探路队会合，伴“探路队”进入中国。一八七四年七月，英国驻华使馆向总理衙门索取“三、四名官员”从缅甸进入中国云南“游历”的护照，当时总理衙门虽然极力说明边疆地方不够安全，英国人前来难以负责保护，力劝他们不要冒险前进，但英国侵略者那里会听这一套，坚持必须发给他们护照。当时正值日本侵略台湾，清政府生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敢开罪英国，终于发给了护照。英国公使威妥玛随即派遣使馆随员马嘉理为翻译，前往云南迎接由英国陆军少校柏郎率领的“探路队”。

马嘉理于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七日到达缅甸八莫，与柏郎等会齐。二月初，这个“探路队”离开八莫向中国边境进发。“探路队”除了正式官员以外，还有印度士兵护送，实际上是一支有将近二百人的武装侵略队伍。云南各族人民和清军爱国官兵，出于对英国侵略者的义愤，于二月二十一日在中缅边境的蛮允附近拒绝他们通过。当时腾越镇左营都司候补参将李珍国，与地方民团结合，加上一些自动集合起来的各族人民，共同阻止英国人前进<sup>①</sup>。英国侵略者蛮横无理，竟开枪打死我国群众数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群众进行自卫反击，将马嘉理及其随行五人杀死在蛮允，弃尸户宋河中。柏郎一看形势不妙，送厚贿给当地土司，又放火烧山，才得以乘机逃脱，返回八莫。这就是所谓“马嘉理事件”。

“马嘉理事件”本来是英国侵略者无视中国主权，悍然武装侵入中国内地所造成的。我国腾越地区各族人民和爱国官兵为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对猖狂的入侵者进行自卫反击，这完全是正义的行动。但是，英国却以此为借口，兴风作浪，蓄意扩大事态，向清政府进行讹诈。事件发生后，英国认为这是对它“在东方的威信充满了严重危险的回答”。英国女王甚至下达谕旨，要“不惜用一切的力量来达到惩罚”<sup>②</sup>中国人民的目的。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于一八七五年三月四日训令驻华公使威妥玛进行交涉。威妥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达不到目的，竟然以下旗绝交和调兵开战相恫吓，并离京出走，以示决绝。这时清政府在伊犁和台湾

<sup>①</sup> 《腾越绅众致李珍国原信二件》，《李珍国致绅众原信》，《云南史料丛刊》第1辑。

<sup>②</sup> 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九年版，第152—153页。

等事件上弄得焦头烂额，穷于应付，为了预防西南边疆再生事端，再次向侵略者妥协。清政府命令李鸿章挽留威妥玛，并邀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天津税务司德璀琳从中斡旋。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同威妥玛在烟台进行谈判。这个威妥玛穷凶极恶，蛮横无理，破口大骂清政府，破口大骂总理衙门大臣，非要把他们换掉不可。他公然说：“自咸丰十一年至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象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中国要改变一切，要紧尤在用人，非先换总署几个人不可。”李鸿章则和威妥玛一鼻孔出气，他认为“中外交涉，先论事理之曲直，此案其曲在我，百喙何辞？威使气焰如此张大，断非敷衍徇饰所能了事”<sup>①</sup>。前者显出一副殖民者的凶相，后者露出一副殖民地奴才的嘴脸，这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作了巨大牺牲的则是中国的人民。云南腾越的文武官员全部被革职拿问，大批抗英的人民群众被逮捕法办，其中被杀害的即达数十人之多。

经过英国的敲诈和俄、德、美、法四国公使的“调解”，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三日，卖国贼李鸿章在山东烟台和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主要内容是：（1）增开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西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2）扩大领事裁判权；（3）租界内的外国商品免除厘捐；（4）洋货运入内地，不论中外商民，都只纳子口税，全免各项内地税。此外，又规定英国将派员到云南调查；准备订立通商章程，英国人可以经过甘肃、青海、四川等地进入西藏，并由西藏去印度等。这些规定，不仅扩大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特权，而且其中关于英国人可以

---

<sup>①</sup> 李鸿章：《论滇案不宜决裂》，《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3，第46页。

进入西藏的规定，为英国侵略我国云南、西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三、英军侵藏和西藏人民抗英斗争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藏族是我国境内历史悠久的兄弟民族之一，从很早的古代起，藏族人民就和汉族人民及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一起，劳动、生息在祖国富饶辽阔的土地上，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的文化。

但是，封建农奴主的反动统治，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造成了西藏的悲惨局面。外国侵略者勾结西藏地方一小撮民族败类，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妄图把西藏变为殖民地。其中特别是英国，通过其殖民地印度对于西藏的侵略，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开始。鸦片战争以后，这种侵略就更加加紧进行。一八四五年，英国侵入印度北部的旁遮普，控制了拉达克和克什米尔。一八四六年，英属印度总督哈定，就派人到边界投信，要求划分拉达克与西藏阿里的边界，并要援例通商。一八四七年，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也向两广总督耆英和广东巡抚黄恩彤交涉。这时，《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不久，沿海五口次第开放通商，清政府为防止英国在西藏地方别生枝节，答以“西藏本有定界，无庸再勘，通商系原约（指《中英南京条约》和《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所无，不得违背”<sup>①</sup>，而拒绝了它的要求。但清政府后来经不起英国的压迫，终于同意它所提出的划界和通商的要求。只是由于拉达克和克什米尔人民的反英斗争还没有完全被镇压下去，同时阿里

---

<sup>①</sup>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7。

与克什米尔的交通又非常梗塞，致使定界、通商的交涉实际上没有实行。

《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侵略者便根据其中的另议专条规定，迫使清政府同意英国派员由内地入西藏赴印度，或由印度入西藏进行所谓“采路”。但是，西藏群众“一闻洋人入境，哗然聚兵拦阻，情势汹汹”<sup>①</sup>。西藏人民誓死拒绝英人入境的坚决态度，使英国的侵略计划终于无法实现。一八八六年，英国侵略分子马科蕾，组织了一支大约三百人的武装队伍，准备由印度进入西藏，行至干坝地方，被西藏人民所阻。当时，前后藏三大寺即色拉寺、别蚌寺和噶尔丹寺的全体僧众和藏族人民，联合向驻藏大臣文硕说明，“英人欲入西藏佛地，违例开端通商、游历等因，先后不但烦渎天朝圣聪，连年致使……唐古特所属人等致受烦劳，实属毫无定止”。况英国人与西藏人民“情性教道全不相同，实为冰炭”。他们坚决表示，这些英国侵略者若能听从警告退回即可，“倘若不听，……僧俗人等男丁死尽，即剩女流，情愿复仇抵御，别无所思”<sup>②</sup>。英国侵略者慑于人民的反抗，不得不收敛一下侵略的锋芒，答应停止派员入藏。

英国侵略者在遭到一连串的失败以后，便变换手法，公然对西藏发动武装进攻。英国从哲孟雄（锡金）修筑道路，侵入西藏境内，西藏地方官员前往制止无效，就在隆吐山建卡设防，实行自卫。一八八六年冬，英国提出藏族人民“越界戍守”，这是蓄意反诬，其实越界的正是侵略者自己。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英国侵略军七、八千人，在拉累诺的率领下，向守卫在隆吐山地区

<sup>①</sup> 丁宝桢：《藏番驱逐洋人派兵弹压保护片》，《丁文诚公奏稿》卷19。

<sup>②</sup> 《前后藏等地各属寺院僧俗头目人等公禀》，《清季筹藏奏牍》第1册，文硕奏牍，卷2，第15、16页。

的藏族军民猖狂进犯，藏族军民五千余人，英勇抵抗，歼敌一百余名。这是西藏人民第一次抗英战争的开始。五月，我国藏族军民在一次突袭纳汤英军军营的战斗中，几乎活捉印度的孟加拉代理省督。但是，英国调来了援军，又以大炮轰卡，藏族爱国军民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隆吐山、纳汤相继失守。暂时的挫折并没有影响西藏爱国军民保卫祖国的决心，他们共同宣誓：“凡我藏众男女，誓不与英人共天地，有渝此誓者，众共殛之。”<sup>①</sup>

在西藏爱国军民积极准备反攻，并请求清政府派大兵进行增援的时候，昏愦的清政府竟将支持西藏军民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革职，而代之以主张妥协投降的升泰为驻藏大臣。清政府命令升泰到前方议和，并派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弟弟赫政为升泰的助手。赫德指示赫政要“试作中间人，将事权掌握在自己手里”<sup>②</sup>。一八九〇年，升泰自大吉岭前往加尔各答，与英印总督兰士顿举行谈判，三月十七日，缔结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款，其主要内容是：拟定了西藏地方和哲孟雄间的边界；清政府承认哲孟雄归英国“保护”；其余通商、游牧等项，以后再议。

根据上述条约，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中国和英国又在大吉岭订立了《中英会议藏印续约》九款。在这个条约里，清政府同意开放亚东为商埠，规定藏、印、哲边界免税贸易，以五年为限，在此期间印度茶叶不得入藏，五年后印茶运藏，纳税不高于华茶入英之数。

通过这两个条约，英国侵略者侵占了中国西藏的一部分领

---

① 《西藏六十年大事记》第52页。

②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五编，《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第89页。

土，攫取了种种的特权，为英国进一步侵略西藏准备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是清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与英国进行外交斗争的重大失败，暴露了清政府对外投降妥协的真面目。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坚决反对这两个不平等条约，藏民指责升泰是“失信藏番，见好英国”，那是击中了投降派的要害的。

### 第三节 反对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

#### 一、中越人民联合抗法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侵略我国邻邦越南，并以越南为跳板，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

中国和越南自古以来就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中越两国人民从来就是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兄弟。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sup>①</sup>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也指出：“越中两国人民早就有着历史悠久的深厚友谊。近百年来两国人民都曾长期饱受帝国主义者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我们不但是友好邻邦，同时也是患难的兄弟。”<sup>②</sup>

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法国资本主义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工业总产量有一定的增长，特别是它北部的

<sup>①</sup>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电贺阮友寿主席》，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sup>②</sup> 《胡志明主席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煤矿工业和纺织工业逐渐集中，形成垄断联合企业，增强了财政资本的作用。当时在法国执政的，是以共和党温和派茹费理为首的内阁。这个党所代表的是法国大金融资本家的利益。茹费理是一个狂热的侵略分子，他在一八八〇——一八八一年和一八八三——一八八五年两度担任内阁总理。在他领导下的法国政府，竭力执行向海外扩张的殖民政策。这个政策在东方的具体表现，就是法国资图完全占领越南，并从越南侵入中国的西南边疆。

法国侵略越南的历史由来已久，可以向上追溯到十七世纪。法王路易十六曾经根据法国阿德兰区主教百多禄的奏议，制定了变越南为法国殖民地的“法兰西东方帝国”计划，并采取了侵占越南的实际步骤。

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国加紧侵略越南。一八六二年六月，法国强迫越南封建王朝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即《柴棍条约》），把越南南方以西贡为中心的地区割让给法国，从此，越南南方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一八六七年，法国侵略者以越南南方为基地，开始谋占越南北方。一八七二年十月，堵布益率领一支侵略军强行占领河内，挑起了一场对越南北部的侵略战争。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五日，法国又派出安邺率领的一支侵略军北援堵布益，法军连陷河内、海阳、宁平、南定四省。

越南国王阮福时（即嗣德）请求驻在中越边境保胜地方的黑旗军出来协助越南，抵抗法国的侵略。

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时期活动于我国广东、广西边境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因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故称黑旗军。其首领是广西钦州农民家庭出身的刘永福（一八三七——一九一六年）。黑

旗军后来被清军压迫，流亡到越南，驻扎在中、越边界的保胜（今老街），人数有两千余人。黑旗军原来就十分痛恨法国侵略者，这时在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激励下，决定接受越南政府的邀请，发兵一千多名，从保胜出发，与越南北圻军务大统督黄佐炎率领的越南军队一万多人会合，列阵于河内郊外。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黑旗军配合越南军民，攻占河内，将法国侵略军头目安邺击毙，歼敌数百名，缴获枪械数百枝，大获全胜，迫使法国侵略军退出红河，困守海防。越南国王授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以三宣副提督之职，命他管理宣光、兴化、山西三省，据守富良江两岸。

当黑旗军击毙安邺，取得大捷，准备继续进攻时，越南阮氏封建王朝却在胜利面前动摇起来，害怕黑旗军的胜利会招致法国更大的报复，于是派人与法国议和，一八七四年三月十五日签订了卖国的第二次《西贡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不仅掠去越南大量主权，而且还把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

当时，因普法战争刚刚结束，损伤的元气尚未恢复，加上巴黎公社的余威犹在，法国资产阶级一时无力在越南大举进攻，不得不暂时容忍河内的惨败。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代表法国大金融资本家利益的茹费理组阁时，才又发动了第二次侵略越南的战争。一八八一年七月，在茹费理主持下，法国议会通过了二百四十万法郎拨款，作为侵略越南的军费。一八八二年三月，法国驻西贡总督黎眉派遣李维业（亦译李威利）上校率军北上，五月侵占河内，一八八三年三月又侵入南定，他悬赏十万元攻取黑旗军的根据地保胜，来势汹汹，气焰相当嚣张。越南封建王朝再次邀请黑旗军参战。这时，茹费理第二次组阁，法国议会通过增加军事拨款五百五十万法郎，派遣军队一千八百名，配以铁甲

舰、运输舰等十二艘到达越南，支援法国侵略军。

面对着敌人的疯狂进攻，黑旗军接受越南政府的邀请，发兵三千人，会合越南黄佐炎所部军队，向法军反攻。五月十日，黑旗军全体将士在河内城外慷慨誓师，严阵以待，决心“为越南削平敌寇”，“为中国捍卫边疆”而战斗。十九日，双方订约会战，决战于河内城西的纸桥。右翼统将杨著恩表示“虽死愿任先锋”。他率部守卫在纸桥关帝庙前，用简陋的武器，抗击法军的进攻。他身中数弹，仍坚持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法军以为黑旗军战败，蜂拥过桥，不料遭到右翼统将吴凤典部的突然袭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鏖战，黑旗军在越南人民的支持下，大获全胜，法军大败，击毙了法军司令官李维业和韦鹭，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纸桥之战。纸桥大捷以后，越南政府任命刘永福为一等义良男、三宣正提督，以表彰其功。

法国侵略者的两次进攻，在越南人民和黑旗军的抵抗下，都以全军溃败和主将毙命宣告结束。当然，侵略者是绝对不会甘心的。一八八三年五——六月间，茹费理内阁命令法国海军部发兵两路，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一路由西贡法军司令波滑率领，自河内进攻北宁和山西；一路由海军大将孤拔和交趾支那民政专员何罗栏率领，进攻越南首都顺化。在北圻的法军虽然遭到越南军民和黑旗军的迎头痛击，死伤数百人，损失惨重；在中部的法军却进入顺化，强迫越南封建王朝订立了城下之盟。七月十七日，越南国王阮福时病死，封建统治者在强敌压境时未能合力御侮，反而争权夺利，引起内讧，以致法军得以乘虚而入。八月二十五日，越、法第一次《顺化条约》订立，法国终于以暴力把越南完全置于自己的严格控制之下，并割占了平顺省。越南从此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但是，越南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越南人

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不甘忍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和奴役，为了捍卫祖国的独立和自由，坚决反对越南封建王朝的卖国投降政策，同法国殖民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人民群众的反法起义，首先在南圻爆发，接着北圻和中圻人民也纷纷掀起大规模的反法起义。从一八六〇年一直延续到一八八五年，大小起义数十次，著名的如张定起义、武唯扬起义、潘三潘五起义、阮文历起义等。这些起义对猖獗的法国侵略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并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表示了越南人民是永远不可征服的。

## 二、中、法陆路和海上战争

面对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的严重局势，中国人民坚决主张保卫祖国，援助越南，抵抗法国侵略。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两派，一派以洋务派头子李鸿章等人为代表，主和；一派以清流派首领李鸿藻等人为代表，主战。

清流派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的一个派别。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不掌握实权的官僚、士大夫，经常上奏慷慨言天下事，对外标榜抗战，对内主张弹劾权贵。但是，清流派并不是什么朝廷允许自由议政的表现，也绝不是真能抵抗侵略、打倒权贵的果敢勇士。相反地，它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洋务派和顽固派、湘系集团和淮系集团斗争的夹缝里钻出来的一种舆论力量，实质上是清朝封建统治者面临危机时进行自我调节的工具，是掌握着最高统治权的那拉氏操纵不同政治派系力量天平上的法码。那拉氏既想依靠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发迹的那些政治暴发户——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一大

批地方督抚，又害怕他们权势过大，造成“外重内轻”、尾大不掉的局面，于是想借清议抑制“豪强”，以巩固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这就是清流派所以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在法国侵略越南、中国的问题上，清流派虽然慷慨激昂地主张抗战，但却提不出有效的抗战方案。站在清流派背后的，还有湘系集团中的彭玉麟、曾纪泽、刘坤一和左宗棠等。他们也是封建买办军阀，和李鸿章淮系集团属于不同派系，具有不同利益。他们所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维护清朝统治和本集团的权益。他们和清流派虽然口头上表示要主战，但却瞧不起、甚至敌视人民群众这支最坚决和最强大的抵抗力量。因此，这些人的抗战主张尽管发表了不少，但结果只能限于空谈。当局势发生变化，或者战争形势由胜到败，或者幻想其他国家的干涉破灭，这些人就会从一定程度的主战变成主和。

主和派的首领是淮系军阀李鸿章。李鸿章是中国大地主和大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淮系军阀是一个既有地盘，又有军队，还有财权的集团。他们声势烜赫，炙手可热。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达二十五年之久，事实上成为清政府旁边的第二中央政府的首脑。他说：“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sup>①</sup>他认为法国“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sup>②</sup>。在他看来，唯一的出路是出卖国家主权，以博取侵略者的欢心，依靠洋大人支撑清朝统治，扩大本集团的权势。清政府中以那拉氏为头子的最高当权集团摇摆于这两派之间，有时主张反击，但更多的时候是趋向妥协，

<sup>①</sup> 李鸿章：《论海防兵单未可轻言战事》，《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4，第10页。

<sup>②</sup>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4，第23页。

和李鸿章一鼻孔出气。法国侵略者知道清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抵抗侵略的决心，因而更加猖狂地通过侵略越南进而侵略中国。

一八八三年十二月，法国议会两次通过共达二千九百万法郎的侵越军费和派遣一万五千名远征军的提案，“决议夺取山西、北宁，将不与中国谈判”<sup>①</sup>。十一日，法国侵略军向驻扎在越南山西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法战争正式揭幕。

早在一八八一年底至一八八二年初，清军就根据越南政府的请求，开进越南的北圻。在战争开始前夕，北圻防务的部署是：黑旗军驻扎在河内西北的怀德和丹凤，人数大约二千，处在阵地的最前沿；云南布政使唐炯率滇军八百余人（后来人数有增加），驻扎在山西，在黑旗军背后，实际上是第二线；广西布政使徐延旭率粤军六千余人，驻扎在北宁，位置在河内东北，屏蔽着背后的浪张府、谅山和镇南关（今友谊关）。这三支军队，对战争却采取了两种态度，黑旗军在战前不存幻想，积极准备作战，而两支清军却在投降主义路线的指导下，不作任何战争准备。清军在出国作战时，清政府就向他们交代，“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法人并未与我失和，我军总以剿办土匪为名，未可显露作战之迹，致启衅端”<sup>②</sup>。这就是说，既要他们参加抗法，又要他们不露痕迹；既要他们准备作战，又要他们不去主动进攻。因此，当法军进攻时，两种态度便产生了两种结局。

一八八三年八月十五日，法军在波滑统率下，以一千八百人、兵船九艘，进攻怀德。黑旗军与之大战十四小时，法军大败，黑旗军大胜，法军退回河内，黑旗军亦因怀德地势低洼，易被水

①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四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42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5，第3、27页。

淹，移扎丹风。九月一日，法军三千，乘兵船十一艘，与黑旗军大战于丹凤。经过三天激战，黑旗军又大破法军，击毙法军八十余人，击伤二百余人。这两次大战使法国损失很大，何罗栏无奈派波滑回巴黎，搬取救兵。但黑旗军也损失千余人，失掉了部分精锐。怀德之战和丹凤之战是黑旗军向法国侵略者所进行的两次可歌可泣的战斗，它使法国军队无法沿红河上溯，使保胜一带成为可靠的后方基地。

当黑旗军与法军大战时，唐、徐两支清军不仅不加支援，反而逍遥自在，“作壁上观”。但当黑旗军大胜后，他们却假冒他人战功，捏奏上报。而昏愦的清政府也毫无察觉，竟把徐延旭和唐炯两人分别提升为广西和云南巡抚，以奖励他们的所谓“战功”。十二月十一日，法军六千余人在孤拔统率下，乘兵船十二艘、民船四十艘，大举进攻山西。驻扎在山西的唐炯，竟然撤军而走，擅自逃回云南，去庆祝自己的升官去了。就连清廷上谕也说：“该抚并未奉有谕旨，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sup>①</sup>他之所以敢于如此，是因为他摸清了朝廷的底，“明知朝廷战议不坚，败则为罪，胜不为功，即弃军而逃”<sup>②</sup>。唐炯率军逃走以后，黑旗军曾经在此坚守，大战五天，到十六日终因众寡悬殊而退出山西。法军占领山西以后，法国反动派大叫什么“色当被山西掩蔽了”。意思是说，山西之战的胜利弥补了普法战争中法国在色当之战的失败。

一八八四年二月，法国一个旅团的援军到达河内，米乐任侵越军司令，孤拔改调为远东舰队司令。三月十二日，法军在米乐

<sup>①</sup> 《上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以下简称《中法战争》）第5册，第301页。

<sup>②</sup>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7。

统率下长驱直入北宁，清军未经抵抗即自行溃逃。因为驻守在这里的徐延旭，“仅出关数日，即折回龙州避暑，逗留竟至数月”。这时，驻在北宁的清军人数已达两万，但徐延旭仅留下提督黄桂兰和道员赵沃驻守，而这两个人又互不团结，相互倾轧，他们的部队半携眷属，半吸鸦片，贪污腐化。所以，法军一来进攻，立即溃退。清军的腐败，是招致败局的基本原因。

山西、北宁的败报传到北京，清政府大为惊慌。为了掩饰败绩，下令将徐延旭、唐炯两人撤职查办，以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并由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前线战事。但是，这个靠镇压云南回民起义起家的岑毓英，同样是一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家伙。当他刚到前线的时候，三月十九日太原失守，他马上找个借口放弃了所在的兴化，逃回云南去了。在清廷中央，那拉氏把战败的责任往下一推，乘机黜退了恭亲王奕訢，而以贝勒（后封为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自己的妹夫载湉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会同商办军机处要政”。

但是，这种前线和中央人事方面的变动，都无补于这个业已彻底腐朽了的清政府的“复苏”。清政府已是一具政治僵尸，任何措施都无法使之起死回生。相反地，前线的军事溃败，却给投降派以可乘之机，李鸿章又加紧进行投降妥协活动了。他通过总理衙门，任命淮系的李凤苞接替曾纪泽为驻法公使，这就为中法和谈铺平了道路。一八八四年四月十七日，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也通过粤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关系，向李鸿章提出议和。五月十一日，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中国将驻北圻的部队即行调回边界，并对越、法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条约一概不过问；法国不向中国索取赔款，但法国商品可以从云南、广西输入

中国内地；法国答应在与越南订约时，决不出现有损中国体面的字样；三个月以后，双方各派全权大臣，照以上各节，制定细则。

这个条约，完全违背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利益，屈从了法国侵略者的讹诈，中国人民愤怒地加以抨击。茹费理和福禄诺之流却非常满意。茹费理致电福禄诺，向李鸿章表示敬意，说什么“请告中堂，以中法两国所定缔交通商条约，彼此意见亦已俱极相合。中堂为国名臣，深于阅历，所见两国公共利益并未来之事，竟与我辈相同，显有证据，下怀曷胜欣幸。”<sup>①</sup>李鸿章的复电竟是：“久仰贵大臣办事明决，见识远大，……彼此为难之隐衷，两地心照。”<sup>②</sup>李鸿章的卖国贼面目更加暴露无遗，他博得了法国反动派的极力喝彩，却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这个条约，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清流派人物借机纷起弹劾李鸿章通夷，“致比诸秦桧、贾似道”。在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命令在北圻的清军“仍扎原处”，不得撤回。滇、桂军将帅面对着国内的愤怒情绪，也不敢擅自离防。

一八八四年六月六日，即《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还不到一个月，法国又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这就确立了法国对于越南的殖民统治。根据《中法简明条约》，中国在北圻的驻军即行调回边界，法国侵略军于六月间，向北圻进兵，去执行所谓“接防”任务。二十三日，准备“接收”谅山的法军七百人在度日业率领下到达北黎（中国当时称观音桥）之北的谅江，再向前，就是中国军队的防地。为了避免冲突，清军派出代表，向法军解释说，没有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请暂缓进兵。但是，法军

<sup>①</sup> 李鸿章：《照译法国相臣费理致总兵福禄诺电函》，《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2，第14页。

<sup>②</sup> 李鸿章：《寄法国外部大臣费理》，《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2，第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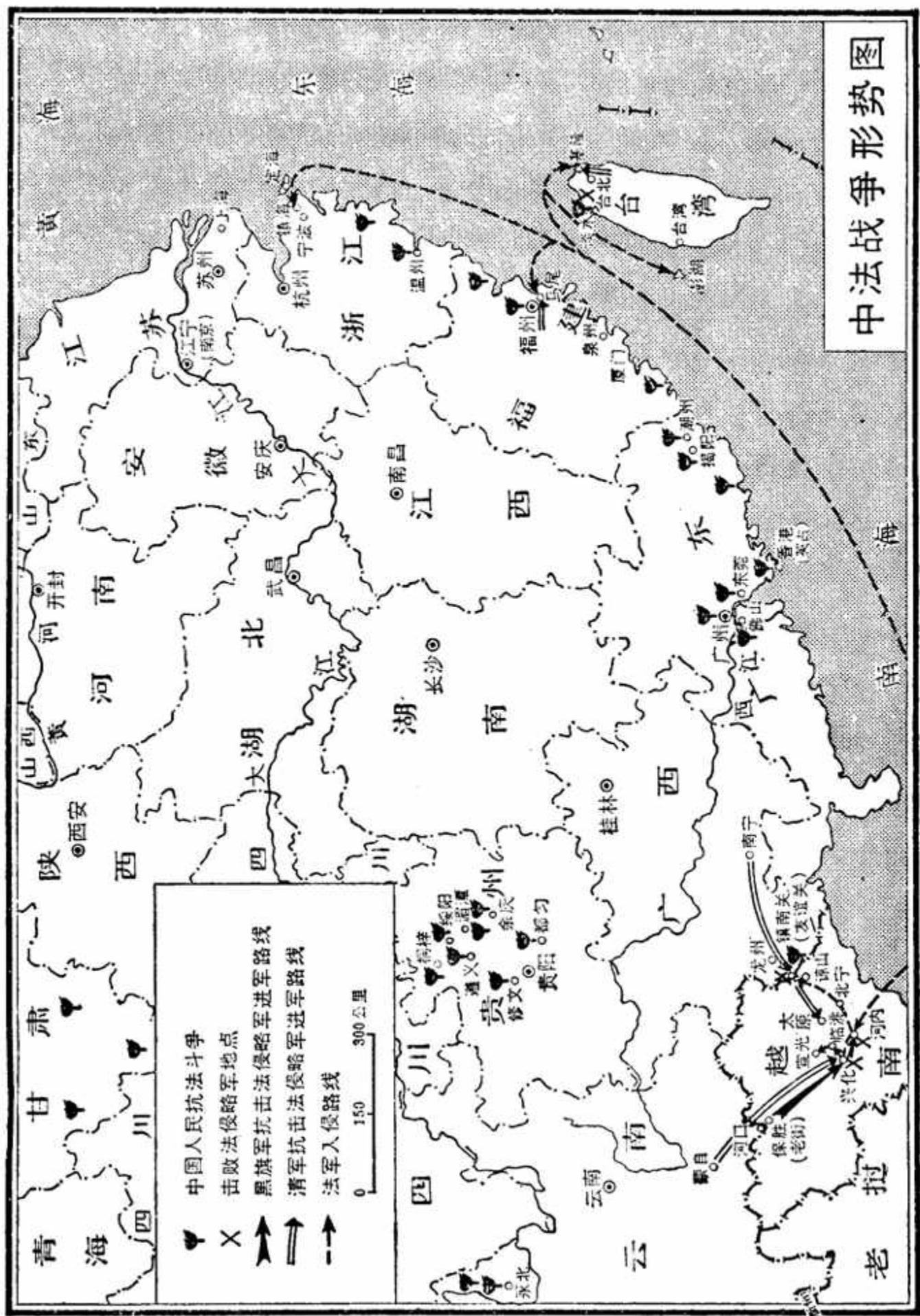
统帅蛮横异常，竟回答说：“一点钟内，法国军队将继续前进。”及至与清军接触时，更声称：“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sup>①</sup>说罢，法军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爱国官兵忍无可忍，被迫自卫反击。在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次战斗中，清军爱国官兵都获得胜利，击毙法军将校二人，兵士十七人，打伤其官兵七八十人，法国人丢掉了几乎所有的行李、军火和给养，狼狈地退驻屯牙。这次事件，通常被称为“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变”。

“北黎冲突”成为法国扩大侵略战争的借口，法国反动派大喊大叫，说是中国破坏协定，“法兵在谅山被中国官兵四千人打伤”，法国在北圻蒙受了莫大的侮辱等等。茹费理命令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暂缓与中国方面讨论《中法简明条约》的细节，要求中国立刻从北圻撤出军队，并索取二亿五千万法郎的巨额赔款。法国对清政府进行恫吓，提出了最后通牒。清政府虽然派出了两江总督曾国荃为代表与巴德诺商谈，曾国荃虽然卑躬屈节的向法国公使表示可以答应一些条件，但是，巴德诺仍然怒气冲冲地加以拒绝，认为最后通牒的期限已过，法国要“任凭举动，无所限阻”。在军事上，法国决定从海上进攻中国，它组成了远东舰队，分兵两路向中国再一次地发动侵略战争。以利士比为首的一支舰队，进泊台湾基隆，利士比狂妄地叫喊：“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占据基隆煤场和台湾北部”，这个反动派满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台湾。以孤拔为首的另一支舰队，进泊福建马尾军港，其目的则是针对着除北洋海军和南洋海军外的中国第三支海军——福建海军，和设在马尾的著名洋务派企业——福州造船

---

<sup>①</sup>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8。

中法戰爭形勢圖



厂。

八月四日，利士比的舰船十三艘和法军四百余人，在基隆要挟清军交出炮台和一切防御工事。中国当局置之不理。次日，法军开炮轰击，清军爱国官兵奋勇抵抗，发炮还击，炮弹命中法舰，可惜由于炮弹威力较小，未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法舰利用其优势火力，将基隆炮台全部炸毁。接着，法国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一度占据基隆炮台，清军爱国官兵在提督章高元、总兵曹志忠的率领下，及时予以还击，双方经过激烈战斗，打败了法军陆战队，使其狼狈逃去，法军被击毙击伤二百余人。这时，台湾共有守军四十营，约计二万余人，力量相当雄厚。所以，法国侵略军无可奈何，进犯台湾宣告失败。利士比的舰队狼狈地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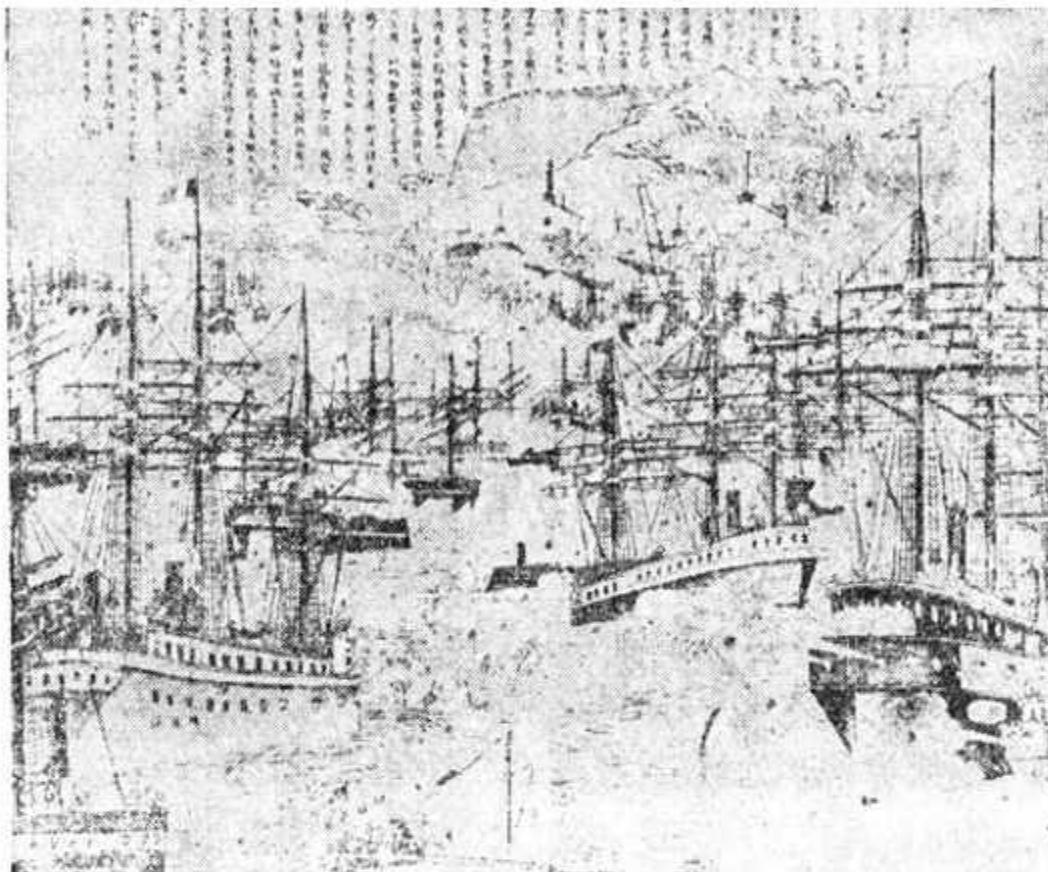
紧接着台湾之役以后，更大规模的马尾海战又开始了。原来，福州东南的闽江有一段叫做马江，又称马尾，这是一个海军的天然良港，清政府耗费了人民亿万资财所建成的福建海军，和创建了将近二十年之久的福州造船厂，便在这个军港里。法军见台湾防守严密，一时难以得手，就暂时放弃占领台北的打算，调动全军进攻福州。当孤拔以“游历”为名，率军舰驶入马尾前，就有人提出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应该拒绝他们前进。但是，闽浙总督何璟、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等都是李鸿章投降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深怕这样作会触犯法国侵略者，导致和谈的破裂。因而面对着进犯的敌人，不但不严加戒备，反而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让法国舰队开进来，和中国的舰队同泊一处。这样，福建海军处于被敌舰围困的状态，战云业已密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表面上慷慨激昂，主张抵抗，实际上只会说大话，纸上谈兵，而且“矫情傲物，达于极

点”，“非三品以上之官吏概不在眼”<sup>①</sup>。这时，他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连电清政府告急，要求迅速明定和战方针。但是，这时的清政府却仍然幻想和平，请求各国出面调停，不准中国海军主动出击，这种束缚自己手脚的妥协行为，终于带来了马尾海战失败的悲惨结局。

八月二十二日，法国政府命令孤拔率军舰进攻福州，扑灭中国海军。二十三日早八时，法国驻福州副领事白藻太匆匆将作战决定通知各国驻福州领事，并通知了中国地方当局。何璟连忙把这个消息通知有关方面。何如璋竟然封锁消息，不让海军中的中下级官兵知道，他还向法国建议，请推迟一日开战，但立即遭到拒绝。当天下午，法国舰队向中国舰队发起进攻，由于福建海军缺乏准备，军舰还没有来得及起锚，就遭到敌军水雷艇的进攻，当即有两艘军舰沉没，四艘受了重伤。面对着外国侵略者的疯狂进攻，福建海军中爱国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旗舰“扬武”号开炮击中敌统帅孤拔座舰“伏尔他”号，差一点把孤拔炸死，但“扬武”号也被敌水雷艇的鱼雷所击中，受了重伤。“振武”号在战斗中被两艘法舰所包围，虽然受了重伤，但全舰官兵仍然奋战，坚持到最后。“飞云”号管驾高腾云亲督炮手开炮，一一命中敌舰，“飞云”号以一小舰，与敌三大舰顽强战斗，坚持不退，直至全舰沉没。“福星”号管驾陈英，勇敢地指挥他的小炮舰，与敌方围困他们的三大舰作战，“舰中机损人亡，均不暇顾，向敌帅舰猛击”<sup>②</sup>，连续命中“伏尔他”号，直到舰中火药库中弹爆炸，全舰官兵英勇牺牲。

---

<sup>①②</sup> 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中法战争》第3册，第131、133页。



马尾海战图

与广大爱国官兵的英勇奋战相反，闽浙总督何璟却“日惟蠖屈署中，拜佛念经，以冀退敌”<sup>①</sup>。当他与福州英领事会晤时，数千愤怒的群众集合在督署之前，大骂他是汉奸，“势甚凶猛，意欲拆辕门，擒英领”<sup>②</sup>。船政大臣何如璋连忙逃往乡下，在一个祠堂里躲避，当地人民愤恨已极，半夜放火烧掉祠堂，几乎把他烧死。福建巡抚张兆栋，“亦无御敌之策，只恐城被围困，署中绝粮，多购柴米及咸鱼等物，存积署中。论者谓其只图一己口腹，不顾民生涂炭”<sup>③</sup>。战争开始后，这个家伙也就“微服怀金而逃”<sup>④</sup>。会

①②③ 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中法战争》第3册，第130、129、130页。

④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张兆栋》。

办大臣张佩纶在大战开始后，吓得神慌意乱，晕倒在地，由随从扶起逃命。就这样一伙浑浑噩噩的清吏指挥下，马尾海战终于遭到了失败。马尾海战使中国受到巨大的损失。福建海军军舰十一艘、商船十九艘，在半小时内全部化为灰烬，海军将士死伤亦达七百余人。

二十四日，法国舰队的三艘军舰，乘潮上驶马尾福州造船厂附近，用重炮进行轰击，使船厂发生五次强烈的爆炸，工厂、仓库和一艘业已建造完工的巡洋舰，全被击毁。福建海军和福州造船厂的覆灭，标志着洋务派多年所吹嘘的“自强新政”的破产。

同清政府的卖国投降路线相反，中国人民却坚定地执行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主义路线。当法国侵略者把战火引向中国以后，广大劳动人民以及其他各阶层爱国力量，通过各种形式，到处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法斗争的怒潮，充分表明中国人民始终是反侵略斗争的主力军。

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站在反侵略斗争的第一线，香港工人发动了声势很大的罢工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阻缓了法国对中国的侵略攻势，表现了中国幼年时期的工人阶级的坚定性和革命性。

全国各地接连爆发的反洋教斗争，组成了中国人民反对法国侵略斗争的另一条战线。在中法战争期间，法国天主教堂为非作歹，气焰极为嚣张，法籍传教士进行间谍活动，搜集中国政治、军事情报，有的地方甚至组织反动教民武装，扬言要作法军内应。为了反击这批侵略分子，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都连续发生了拆毁教堂、殴打教士和驱逐反动教民的事件。愈是靠近中越边境的省区，反洋教斗争就愈加波澜壮阔。

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间，中国创办的报纸增多，各种图书和画报也激增起来。有的报纸在中法战争中起了宣传和激励民心士气的作用，表达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决心。如当法国提出最后通牒时，一八八四年七月十六日《申报》发表了《论中国不可不一战》的社论。接着，又连续在八月十五日发表了《论今日之势惟有速战》，八月十七日发表了《论中国今日当明与法人示战》，八月十九日发表了《论目下战务愈不宜迟》等社论。这些文章都是主战的，并大声疾呼“人心敌忾，薄海皆同”，“我数十年来义愤所激，众志成城，正可借此以纾人心之郁结”。这都是广大人民被法国侵略者所激怒的反映，表达了中国人民斗争到底的决心。

不仅在国内，而且海外侨胞也积极支持祖国的反侵略斗争。旅居美国旧金山华侨曾捐款五十万两，旅日华侨捐款一百万两，古巴侨胞也有同样的义举。这些消息，都曾分别发表于一八八四年九月十一日的《申报》和同年九月二十四日的《益闻录》上。

风起云涌的反侵略的群众运动，造成了抗法民族斗争的浩大声势，也促使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人主战的呼声更加急迫。例如远戍甘肃的爱国将士也纷纷要求开赴前线为国效力。

在中国人民抗法斗争的推动下，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亦感到法国偷袭马尾，把战火引向中国本土，使它的体面和尊严受到损害，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了。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清廷被迫发布了宣战的诏旨，命令前线的陆海各军准备对法作战：

“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轮驶入，着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悉数歼除。其陆路各军，有应行进兵之处，亦即迅速前进。”并公开表示支持黑旗军，任刘永福以提督记名简放、赏戴花翎，令吏部主

事唐景崧和他合作，准备进攻宣光；又命令岑毓英、潘鼎新收复北圻。为了表示它的“决心”，又诏谕今后倘有再敢以赔偿和解之说法陈奏者即交刑部治罪，等等。

从此，中法战争进入了第二时期。

### 三、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马尾海战以后，法国对华军事有一个短暂的停顿时期，而从政治上对清政府进行诱降活动。以赫德为拉线人的幕后外交，又在频繁地进行。这种拉拉扯扯的外交，不过是它在军事上进行积极部署的烟幕。所以，到了十月初，大战又复开始，法国在台湾和北圻两个战场上，陆续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在台湾和澎湖战场上，一八八四年十月一、二两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兵舰进犯基隆和沪尾（淡水）。在台湾防务大臣刘铭传的指挥下，清朝爱国军民浴血苦战，台湾当地劳动人民有五千余人参加了战斗，并捐款数十万元，以支援前线。由于基隆炮台已在八月间被轰毁，加上军事上的考虑，清军放弃了基隆，而坚守淡水。在这里，由清军提督孙开华等率部作战，击退了自基隆进攻台北的法军，粉碎了敌人夺占台北的计划，取得了胜利。此后，法国宣布封锁台湾，切断大陆与台湾的联系，法国军舰巡逻于台湾海峡，妄图使台湾军民孤立无援。为了反抗侵略、保卫祖国领土，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支援台湾同胞的运动。仅华北数省，当时即接济台湾毛瑟枪五千枝，克虏伯炮十六尊，现金二十多万元。清朝援台陆军有几万人集中福州待命，有的部队绕道从东台（卑南）登陆。曾经有五千军民乘夜冲破了敌人的海上封锁线，胜利地到达台湾，并击败了敌人在基隆的进

攻①。

一八八五年三月一日至三日，孤拔率兵舰侵扰浙江镇海海口，中国“澄庆”、“驭远”两船为法舰所逼，驶入三门湾而被击沉。长期以来，镇海地区已经修筑了严密的防御工事，从金鸡山到育王岭驻扎清军，由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统领，各要隘地区均密布地雷，所有沿海的灯塔、标杆和浮筒全部撤除，以防御和迷惑敌人。各个乡村市镇，均组织起民团，以盘查汉奸，并把法国教堂的教士全部迁于后方，派兵监护，以切断敌人的内应。在这样的情况下，法舰进攻数日不得入。此地为甬江入海口，故又称甬江之战。此战的最大胜利，是欧阳利见发炮击伤法国统帅孤拔，法军虽然在此间占领了澎湖岛作为基地，但孤拔终于死在澎湖岛上，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北圻战场上，战争分东西两路进行。

在东路，法国侵略军自从控制了红河三角州以后，于一八八五年二月四日向北进攻，不过几天光景，就侵夺了清军驻防地的观音桥、谷松、车里、谅山等地。二月二十三日，法军攻陷文渊州，提督杨玉科阵亡，战火已经燃烧到中国的边沿地区。而指挥前线战事的淮系、广西巡抚潘鼎新，在李鸿章投降主义路线的指挥下，在法军进攻面前，不但不加以坚决反击，反而放弃镇南关，相继退至幕府、凭祥、海村，后竟逃回到龙州。法军占领了镇南

---

① 关于爱国军民五千余，乘夜冲破法舰巡逻线，从福州到达台湾的经过，史料记载是：有一个在福州的道员王诗正，“慨然率数千人乘夜发，亲友知其事者，临送，无不为之泣下。始迂道出澎湖，乃易商船，甫半渡，天黑风厉，海波涌起，舟乍为礁石所破，水骤没入膝，舟中人皆号，而夷船巡弋者方衙尾掠而过，观察（指王诗正）躬撤臥褥塞舟所穿处，越日乃得济，其危险如此。师至基隆，与夷船战月眉山，大破之”。（罗正钧：《劬盦文稿》，《中法战争》第3册，第155页）从这里，可以看出爱国军民援助台湾骨肉同胞的一个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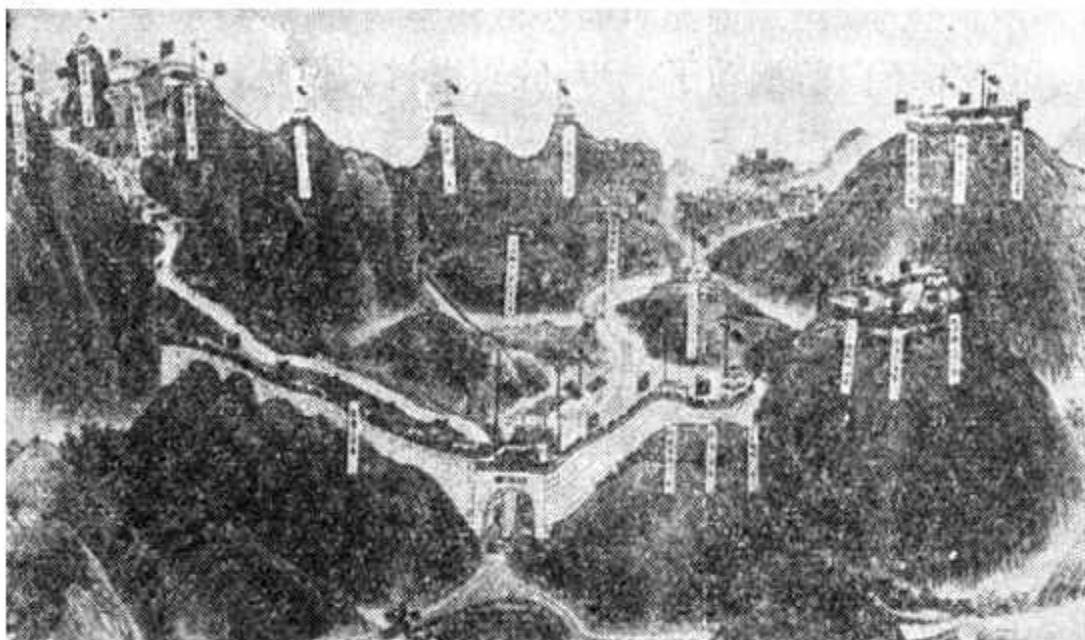
关，将关上的设施焚毁净尽，又退驻谅山。这时战局已十分严重，全国舆论哗然，谴责潘鼎新的陈奏和宣传品如雪片飞来。这个反动派不得不向前挪动了一步，驻军海村。但是，情况已是非常紧急，广西全境已经十分危急。法国侵略者已经在叫嚣着要拿下广西了。

就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三月下旬，中、法两国军队在镇南关进行了关系全局的一战。中国方面，指挥这次作战的有帮办广西军务、年近七十岁的老将冯子材等人。冯子材在镇南关把清军逃跑现象制止下来，把社会秩序安定下来，把各种不同番号不同系统的清军逐渐收拢起来，团结全体将士，激励地方人民，共同起来抗击侵略者。这时，法国侵略军纠合越南伪军共一萬多人，在尼格里的统率下，气势汹汹地来到镇南关，准备进攻广西，他们叫喊着：“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中国人民却在关上写着：“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以作为对敌人的回答。

冯子材选定了镇南关内十里的关前隘，作为与敌作战的阵地。他命令在此沿山筑起了一道长墙作为防御工事。他把湘军、粤军和淮军一起编制起来，分成左、中、右三路统一指挥。一八八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国军队和法国侵略军在关前隘正式展开了决战。这时，炮声震天，喊声如雷，四山大雾弥漫。法军已经临近长墙工事，或已越墙而进入中国阵地，“冯（子材）与苏（元春）誓死决战，告于诸统领曰：‘凡败逃者，不论何军，皆诛之！’于各隘设卡截杀逃者。冯……以帕裹首，赤足草鞋，持矛，大呼跃出。诸军将领，见冯如此，俱感奋力战”<sup>①</sup>。越南人民和一

---

<sup>①</sup> 佚名：《克复谅山大略》，《中法战争文学集》第294页。



镇南关布防图

些散兵游勇自动集合了一千余人，成为游击队，他们听说冯子材在亲自大战，便一齐赶来协助，声东击西，伺隙击敌，以配合正规部队。

经过三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天的激烈战斗，中国军队取得了大胜，法国军队被击败。当法军败逃出关的时候，在后路截击的王德榜军又大呼而出，拦截冲杀，这使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的法军更加溃不成军，只有狼狈逃窜了。此次战役，歼灭法军千余人、军官数十名，法军统帅尼格里受重伤，中国军队获得了大量的战利品。当法军从镇南关败退的时候，狼狈不堪，以爱尔明加中校为头子的一个旅的法军在败逃时，把十三万银元和无数袋面粉扔到河里，把大量作战物资原封不动地丢下，“在旅部队伍出发的时候，还留下一百八十至二百樽的烧酒，通打破了，又有八百袋大米、谷物和食盐，先戳穿了，然后混和起来，践踏完

事”<sup>①</sup>。这个家伙为了逃命，“他命令烧毁文件、档案，破坏电信机器。总是象在谅山一样，为着不拉长纵队，为着可以逃得快一点，为着多些苦力抬伤员，他命令抛弃回光通信机，——用手枪打碎这机的外镜，并抛弃军官们的行李及堆积在屯梅的粮食和所有的军实物资”<sup>②</sup>。这一支法军的败逃情形如此，其他各部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军队乘胜前进，于三月二十七日攻克文渊州，二十八日攻克驱驴庸，二十九日收复谅山，三十日和三十一日收复谷松和观音桥。随即分军追击，在几日内便把法军一直追赶到船头、郎甲一带。他们原来准备在此休息整顿，然后乘胜收复北宁和河内，把法国侵略军赶出北圻地区。但是，就在这时，停战的诏书下达，战争就这样嘎然而止了。

这是中法战争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也是法国侵略者发动侵略越南和侵略中国战争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惨败。这次战争的胜利，不仅彻底扭转了前线的局势，使中国由着后退变成了节节前进，而且它大大地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欢欣。镇南关、谅山大捷以后，中国人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各地出版了许多歌颂这次胜利的诗歌、戏剧、小说和画报。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由名画家吴友如等执笔，定期出版关于中国爱国军民抗法战绩的画幅。其中田子琳所绘的《谅山大捷图》，得到广泛传布，脍炙人口，题诗唱和者竟达十四人之多。前线的胜利和民气的激昂，使中国人民反对法国侵略的斗争进一步向高潮发展，这就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真理：真正有力量的是中、越两国被压迫的人民，而法国侵略者不过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

<sup>①②</sup> 黎贡德：《法军谅山惨败》，《中法战争》第3册，第500、492页。

当东路战场节节胜利的时候，在西路的战争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几个月来，黑旗军和清军爱国官兵与法国侵略者一直在宣光附近大战，并几次进入宣光，法国又几次反扑夺回。直到镇南关谅山大捷的同一天，即三月二十三日，在临洮黑旗军和清军爱国官兵大败法军，当即收复临洮府、广威府、黄冈屯等地，取得了胜利。当他们准备再次进攻宣光之际，接到了清廷的停战诏书，只好罢兵。在中路，清军唐景崧部也和越南人民联合作战，收复了太原，取得了胜利。东路、西路和中路的一连串的胜利，不仅使法国侵略者无力再发动什么进攻，而且连退守河内，退守红河三角洲也很困难了。

镇南关、谅山大捷不仅挫败了法国侵略军的气焰，而且使法国国内的政局发生了巨大的波动。法国人民本来就反对法国大资产阶级发动侵略战争，这次法国的惨败，增强了法国人民反对法国反动派的信心。在巴黎的法国资产阶级议会里，激进派领袖克雷蒙梭向茹费理内阁发出了猛烈的攻击。法国报纸也向其反动政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法国人民集合在巴黎议会大厅前面，举行游行示威。有些群众集合在法国外交部门前，高呼“打倒茹费理！”三月三十一日，法国的茹费理内阁终于在一片打倒的呼喊声中倒台，法国的政治和军事陷于一片混乱中。

这几年，法国在战争中耗费了大量的人民脂膏，仅兵费即达十二亿法郎，死亡兵士达三万人之多。法国人民长期以来所郁积着的愤怒，这一下象打开了闸门的怒潮，向法国反动派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据说，在茹费理内阁倒台这一天，愤怒的群众人山人海，吓得茹费理和他的阁僚们不敢从正门走出去，只好从旁门溜走。当茹费理走过桥头走向一个广场去的时候，突然被群众发现，人们当即拥上前去，把他包围起来，高呼口号，呼喊着要把

他拥到河里淹死。伟大导师恩格斯说：茹费理“是镇压公社的可耻的刽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也是仅仅为了从法国和它的殖民地榨取膏脂才想统治法国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的坏透顶的代表之一。”<sup>①</sup>这就深刻地揭露了茹费理这个反动头子的丑恶嘴脸和阶级本质。

镇南关、谅山大捷扭转了整个战局，使形势变得对中国很有利。但是，本来被迫宣战的清政府，这时不仅没有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去进一步争取战争的胜利，反而主和派又抬起头来，高唱“乘胜即收”的论调。在战争过程中，始终是打打谈谈，边打边谈，法国不断通过外交渠道进行诱和试探，英、美、德等国，为了加强对清政府的影响，也都一再进行“调停”活动。英国害怕战争延续下去有损于它的在华侵略利益，也怕法国在印度支那过分扩张势力，所以起而积极干涉，以求早日结束战争。福禄诺从前就对李鸿章讲过，中国“素有内‘匪’”，法国早已“深悉”，如果“海疆既有外战，各省必生内乱”<sup>②</sup>。在中法战争中，清朝反动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依然存在，清政府并没有因对法作战而改变它压迫人民、镇压人民的态度。清政府最怕人民的抗清起义，听了福禄诺的这种话急欲要赶忙结束战争。一八八五年二月，中国在越南战场上一度失利时，清政府已经根据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意见，派税务司英国人金登干到巴黎，和法国政府接洽秘密谈判，磋商了两个多月。终于在四月四日，中法双方在巴黎签订了《议和草约》，承认一八八四年五月《中法简明条约》有效，双方立即停止敌对活动，法国派公使到北京或天津，确定条约详

<sup>①</sup> 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9页。

<sup>②</sup>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四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52页。

细条款。

镇南关、谅山大捷以后，李鸿章又大肆散布求和论调。他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sup>①</sup>胜利成为求和的资本，这是一个投降主义政府必然带来的悲剧。四月间，在巴黎达成的《中法议和草约》，既然已经承认《中法简明条约》继续有效，那就是说，停战协定已经达成协议。于是，清政府压制了前线中国军队的昂扬斗志，不顾越南人民的恳切挽留，下令将中国军队撤退出国。此后，广西、云南各部队及黑旗军陆续撤回。

黑旗军回国以后，就被清政府以各种借口加以裁撤和改编，三千人最后只剩下了三百人，许多黑旗军将士被遣散回籍，流离失所。黑旗军的首领刘永福却接受了清政府赐予的巴图鲁勇号和南澳镇总兵官职。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抗法斗争中屡获胜利，对维护民族利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战争结束以后，他在清政府的诱惑与禄位面前退却了，投入了清朝统治者的怀抱，丢下了和他共过患难的黑旗军旧部，给自己的历史留下了污点。

一八八五年六月九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和谈全权大臣，辅以邓承修和锡珍二人，和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承认了法国对于越南的殖民统治。（2）在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法国得在此设立领事馆，法商可以进行贸易。（3）法国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减轻。（4）中国日后修筑铁路时，应与法国商办。（5）法国

---

<sup>①</sup> 李鸿章：《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5，第24页。

撤退其在基隆和澎湖的军队。二十一日法军自基隆撤走，七月二十二日法军自澎湖撤走。一八八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在天津签字，一八八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中法界务专条》及《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在北京签字。通过这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西南边疆的门户已被打开，法国侵略者心满意足，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一切利益和特权。

中法战争与其他各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所不同的，就在于中国在军事上并没有遭到失败，相反地，还取得了击败法国侵略者的军事胜利。然而，由于清政府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却使胜利变成了失败，有利形势等于不利形势，以致法国在战败以后，仍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用当时人的话说，这叫做“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鉴于台湾多次遭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历史教训中，深深感到台湾在国防上的重要性。一八八五年十月，清政府决定台湾正式建行省，设置巡抚，同时升迁澎湖海防通判为同知。一八八六年四月，清政府任命刘铭传为台湾省的第一任巡抚，设台湾府于台中，定府治为省会（因为省会尚未建成，巡抚暂驻台北）。继刘铭传以后，巡抚为邵友濂。邵内调后，藩司唐景崧继任台湾巡抚。到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台湾在行政区划上共有三府（台北、台中、台南）、十一县和六厅、一直隶州，人口已达三百二十万左右。

中法战争结束后，葡萄牙正式侵占了中国的澳门。中国边疆地区的危机不是缓和了，而是进一步的激化了。中国人民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不是完成了，而是更加艰巨了。在此以前，中国沿海各省已因资本主义的入侵而门户大开，北部、东北部和西部边疆已经为沙俄侵占去大片土地，但那时的西南边疆如云南、

广西、西藏等地，东南边疆如台湾等地，却还没有直接受到外国侵略势力的严重威胁。到这时，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西南几个友好邻邦沦为殖民地，这些地区已经处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直接侵略之下。外国侵略者纷纷以新占领的殖民地为基地，不断地向中国腹地推进，这就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

## 第七章

# 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

## 第一节 反对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 一、日本蓄意挑起侵华战争

一八九四年，日本军国主义为了逐步实现其争霸世界的“大陆政策”，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中国和朝鲜是当时正在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世界列强争夺的主要对象。沙俄公然把朝鲜和中国长城以北的大片领土看作它的势力范围，阴谋在这里建立其反动的殖民统治。它利用和中国、朝鲜近邻的便利，大肆展开侵略活动。从九十年代开始，沙俄动工修筑横贯东西的西伯利亚铁路。它把这条铁路看成自己在远东谋取霸权的生命线。在修筑这条具有战略性的铁路的同时，沙俄急不可待地向远东调兵遣将，增强在远东的海军力量，并极力企图在中国和朝鲜沿海海岸寻求不冻港。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夺取中国的海参崴军港后，仍不满足，又强迫朝鲜与其订立不平等条约，假借派军官帮助朝鲜训练军队为名，阴谋控制朝鲜的军队，并企图占据朝鲜永兴湾附近的元山港，建立强大的海军基地，为其称霸太平洋作准备。沙俄在太平洋谋求霸权的活动，和老牌殖民主义者英国发生了矛盾。英国是当时太平洋的霸主，它在澳大利亚、马来亚等地有着强大的势力，在中

国的长江流域占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它十分害怕俄国夺取朝鲜，建立军事基地，南下与其争夺在远东的霸权，所以它也迅速把侵略魔爪伸向朝鲜。英国强迫朝鲜订立不平等条约，并一度占领了朝鲜南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巨文岛，借以抗衡俄国，直到确信俄国不敢占据元山港时，英国才退出巨文岛，可见英俄在争夺朝鲜中矛盾之深。美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较晚，但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工业有了急剧的发展，一八九〇年它的工业产值已超过当时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占世界第一位。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促使美国加紧向外侵略扩张。它渴望建立“太平洋帝国”，进而称霸全世界。但是，美国要远涉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侵略中国，就缺少一块可靠的军事基地。从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就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入侵朝鲜，进行商品输出和政治控制，阴谋独霸朝鲜，进而向中国扩张势力。法国和德国当时在远东的争夺中，同俄国勾结在一起，它们也觊觎着朝鲜，妄图插上一脚，进窥中国东北。朝鲜一时成了列强在远东争夺的焦点。

对朝鲜侵略野心最大的是日本，它利用邻近朝鲜的便利条件，积极扩展自己在朝鲜的政治、经济侵略势力，竭力谋取独占地位。但是，日本和其他列强相比，其实力差距很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sup>①</sup>，因此日本积极投靠美国。美国看到日本资本主义不太发达，不可能和自己争夺；同时日本在远东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富于掠夺性，可成为它的重要帮凶，所以就在政治上、军事上积极支持日本。英国为了对付沙俄的南进，也

---

<sup>①</sup>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8月7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198页。

把日本看作一个可以联合的力量。有了美国和英国的撑腰打气，日本军国主义更加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它在英、美的支持下积极推行“大陆政策”的第二步计划，入侵朝鲜，夺取这个“渡满洲的桥梁”。

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日，日本一艘军舰借口在朝鲜沿海进行测量，非法闯进汉江入海口江华岛附近。朝鲜守军开炮示警，日舰竟借机攻陷炮台，屠杀朝民，并占据永宗岛。一八七六年，日本强迫朝鲜政府订立了《江华条约》，取得了在朝鲜派驻公使、开放通商口岸、自由测量沿海岛屿和领事裁判权。《江华条约》是资本主义侵略者强加于朝鲜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此后，在一八八二、一八八四年，日本又相继用刺刀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仁川条约》和《汉城条约》，攫取了在朝鲜首都汉城驻兵等特权。

日本侵略朝鲜的目的之一，是进而侵占中国的东北。这时日本政府内部就发动侵华战争问题出现了激进派和缓进派的争论。激进派看到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的怯懦腐败，主张不给清政府以喘息之机，迅速对华开战，一举独霸朝鲜，攻占中国大片领土。以伊藤博文为首的缓进派则认为清政府的腐败是无疑的，但日本目前的实力还不强，如果战争一起，俄国势必乘机南进，到时日本花饷费力，俄国坐收渔利，夺取朝鲜。他们主张日本应先积蓄力量，“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几年后“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sup>①</sup>。日本政府采纳了缓进派的意见，一面加紧扩军备战，一面派遣大批特务到中国和朝鲜活动。当时美国驻华的使馆实际上成了日本间谍活动的大本营。他们刺探情报，绘制军事地图，以致早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就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

---

<sup>①</sup>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0，第3页。

国东北、渤海湾在内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一个欧洲人波纳尔曾经获得这样一份地图。他后来十分肯定的指出：“这份地图本身就是日本久已蓄意侵略中国的证据。它驳斥了日本当时（指甲午战争时期——引者）是被迫作战的说法。相反地，那是一次有意图的、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①

一八九〇年日本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为了掠夺原料，寻求市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极力鼓吹向外扩张。当时上台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山县有朋发表的“施政演说”，就叫嚣“国家独立自卫之道，其途有二：第一，守卫主权线；第二，保护利益线。主权线，指国之疆域；利益线，指与主权线的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②。按照他们解释，保卫主权线，倒也无可厚非，唯其所谓“防卫利益线”，公然把中国和朝鲜列为与日本主权线有“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赤裸裸地道出了吞并中国和朝鲜的狼子野心。八十年代末期一度担任外相的大隈重信也猖狂叫嚷：“如果小心利用目前独一无二的情势，日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不仅受朝鲜敬畏、而且受其它一切国家敬畏的强大帝国。”③一八九四年，日本驻美公使建野乡三在同美国副国务卿的谈话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对国内现状的不满中转移出来，我们宁愿欢迎反华战争。”④诸如此类的叫嚣，再清楚不过地道出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真实动机。

---

① J·丹尼特：《罗斯福与日俄战争》第148页。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31页。

② 大山梓编：《山县有朋的意见书》（日文版），第203页。

③ 麦科多克：《英国的远东政策》第88页。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31—332页。

④ 田保侨洁：《中日战争外交史》第264页。

一八九四年一月，朝鲜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六月一日，起义军攻下全罗道的首府——全州，在全罗道五十三个州建立起农民革命政权——“执纲所”，其他各地农民纷起响应。农民革命烈火到处燃烧，朝鲜封建政权岌岌可危。为了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朝鲜封建统治者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向清政府求救。

“东学党”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绝好时机。六月二日，日本内阁就作出借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名出兵朝鲜的决议，并且得到明治天皇的批准。日本政府设立指挥海陆各军的大本营，秘密下达动员令，调兵遣将，作好出兵的一切准备。同时玩弄阴谋，一面由玄洋社浪人组成“天佑侠团”，打入“东学党”起义军，以帮助作战为名，妄图使东学党起义成为日本的挑衅工具；一面又向清政府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sup>①</sup>，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以便把清政府拖入预设的战争陷阱。

昏庸腐朽的清政府并没有看出日本政府的阴谋，它基于对朝鲜农民起义军的极端仇视，于六月四日派淮军将领、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兵一千五百人赴朝，驻扎牙山。同时将出兵情况通知了日本。

日本政府见其阴谋得售，立即派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军包围朝鲜京城。接着又派日军在仁川登陆，并调十艘军舰游弋于朝鲜海口。日军的后续部队接着分批出动，偷偷在沿海登陆。到七月中旬，侵入朝鲜的日军达一万八千多人，仁川到汉城的路上布满了日军的军营。他们扼守险要，构筑工事，刺探军情，日夜

---

<sup>①</sup>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90，第30页。

练兵。七月十二日，日本政府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说：“促成中日之冲突，为今日之急务。为断行此事，可取任何手段。”<sup>①</sup>战争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猖狂挑衅，中国人民和清军爱国官兵积极主张给予坚决回击。但清政府一意“保持和局”，掌握军政外交大权的李鸿章更是“力持其牢不可破之和议”<sup>②</sup>。他根本不认真备战，准备打仗，而是施展其“以夷制夷”的伎俩乞灵于外国主子。李鸿章首先乞求沙俄出面“调停”。沙俄对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所采取的态度是，既不“与日本公开为敌”，又想对清政府示以笼络。所以沙俄在口头上答应李鸿章可出面“调停”，而实际上又迟迟不动，其目的在于等待时局的发展，保证俄国“将来行动的自由”以便坐收渔人之利<sup>③</sup>。可是李鸿章对沙俄的虚情假意信以为真，得意洋洋地告诉入朝清军“静守勿动”<sup>④</sup>，不要性急。但没过几天，沙俄驻华公使却通知李鸿章：俄国不能“用兵力强勒日人”<sup>⑤</sup>。李鸿章乞求沙俄出面“调停”的幻想破灭了，接着又乞求于英国。英国虽然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存有戒心，怕损害自己在长江流域一带的利益，但因日本保证不侵犯英国的在华权益，加上英国想利用日本抵制沙俄，七月十六日，英国和日本订立了“友好条约”，支持日本对华一战。英国对李鸿章的请求采取虚与委蛇的态度，表面“频来调处”，暗地鼓动日本进攻。李鸿章碰了一鼻子灰，但并不死心，又乞求美国、法国、德国出面“调停”。结果美国完全拒绝，法国无动于衷，德国不仅一

①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57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1页。

③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史料选译》第67页。

④ 李鸿章：《寄朝鲜成欢交叶提督》，《李文忠公全集》卷16，第10页。

⑤ 李鸿章：《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6，第12页。

口拒绝，还暗地为日本打气，要日本必须给清政府“以一大打击”<sup>①</sup>。俄、英、美、法、德这样偏袒日本，打击清政府，使日本侵略者有恃无恐，肆意发动侵略战争。

七月二十三日，日本突然调兵闯入朝鲜王宫，解除朝鲜军队武装，劫持国王，另组傀儡政权。在日本侵略者刺刀扶植下的朝鲜傀儡政府，按照日本的意图，于七月二十五日正式宣布与中国断绝关系，并给日本侵略军驱逐中国在朝鲜军队的权力。同时，日本不宣而战，下令在牙山的日军向清军发动了突然袭击，中日战争正式爆发。

在日本侵略者发动突然袭击的前夜，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在全国抗战舆论的压力下，李鸿章才不得不作出一点抵抗的姿态，派左宝贵奉军、卫汝贵的盛军、马玉崑的毅军从陆路增援朝鲜，并花重金雇高升号等三艘英国商船，载兵两千，从水路去增援牙山，由中国兵舰济远、广乙、操江等护送。潜伏于天津的日本间谍侦知清军开船的时间后，便密报日本特务机关，使日本早有准备。七月二十四日，日舰吉野号、浪速号、秋津洲号等聚集牙山口外的丰岛，阴谋中途拦击从海上增援牙山的清军。二十五日晨，中国船舰驶至丰岛，日舰不宣而战，频频发炮，中国海军战士被迫还击。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无耻地在舰上挂起白旗，自己钻入舰内铁甲最厚的地方，鼓轮逃跑。水手王国成、李仕茂愤怒至极，自动操动尾炮，连发四炮，击中日舰吉野号。吉野号黑烟四起，舰头低斜，受重创。日舰将高升号团团包围，发炮轰击，中国士兵用步枪英勇还击。最后，高升号被鱼雷击沉，中国士兵七百多人殉难，日本偷袭取胜。

---

<sup>①</sup>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39页。

七月二十八日，日本陆军向牙山清军发动进攻。这时叶志超和聂士成两军分别驻扎公州和成欢驿。二十九日，日军向成欢驿进犯，遇到武备学堂学生于光忻率小队士兵的伏击，死伤甚众。随后日本又调集大批军队，包抄而来，清军经过激战而不能取胜，退往公州。不料，守公州的叶志超早已率军逃之夭夭。聂士成急追叶志超，合兵北走。由于怕遇日兵，不顾烈日炎炎，绕道狂奔两千余里，逃到平壤。叶志超逃到平壤后竟无耻谎报“战功”。李鸿章根据叶志超的报告，假报牙山“大捷”，清政府赏叶白银两万两，并提升他为驻平壤清军的总指挥。逃跑将军受重赏，全军大哗，不思迎战。

八月一日，清政府被迫宣战，日本也同时宣战。

## 二、投降路线下的清军溃败

中日战争的突然爆发，使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但在这民族存亡之秋，清政府并没有奋起抗战，而是借战争问题进一步展开了激烈的帝后党争，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

所谓“帝党”就是以载湉（光绪帝）为头子的集团；所谓“后党”则是以那拉氏（西太后）为代表的集团。帝党和后党的矛盾由来已久。一八七五年，载淳（同治帝）短命死去，按清王朝家制应由其子继位。但一方面载淳无子，另一方面权势欲极强的那拉氏也不愿意让载淳的下一代来继承皇位。原因是载淳的下代继位，那拉氏当不了皇太后，无法独揽皇权。善于玩弄权谋的那拉氏于是立载淳的堂弟、自己的外甥载湉为皇帝，改年号为光绪，用作自己的政治傀儡。当时载湉年仅四岁，乳臭未干，那拉

氏仍然“垂帘听政”<sup>①</sup>，左右朝廷。一八八六年载湉已十六岁，那拉氏感到不便再露骨地“听政”了，于是宣布从一八八七年起改为“训政”，凡国家大小事务，先请示了那拉氏，再由载湉颁布推行。一八八九年，载湉十九岁了，按清朝的惯例已经成人，那拉氏觉得也不便再“训政”了，就宣布“撤帘归政”，由载湉“亲政”。

“亲政”和“训政”的不同处，只是载湉先看奏折，然后再请那拉氏懿旨。所以名目虽然这样改来改去，实权仍然紧紧握在那拉氏的手中，载湉名义上亲政，实际事无巨细都须由那拉氏点头才能办理。这样，就在清朝宫廷内部形成了实际当权的西太后与名义执政的载湉之间的矛盾。朝廷中的许多官僚也分别从个人和本集团的利益出发，集中于那拉氏和载湉的周围。后党纠集顽固腐朽的封建官僚作基干，并勾串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为援手，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手握军政外交大权，并有洋主子作靠山，自成北洋系统，政治上接近后党。帝党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他是一个“尊王攘夷”论者，当时既是载湉的老师，又任户部尚书。翁同龢等通过主持科举考试，有意拔擢文廷式、张謇等，通籍京师，入居词馆，成为帝党的主要策士。帝党因无军队作支柱，积极拉拢湘系军阀，而刘坤一等湘系军阀由于和淮系军阀争权夺势也倾向于帝党。帝后两党都是封建统治集团，矛盾的焦点是争夺最高统治权。两个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还极力寻找某个帝国主义作为后台。后党联俄，以取得沙俄的支持，企图利用沙俄来打击帝党的势力；帝党亲英，以换取英国的协助，达到反击后党专权的目的。因此，帝后党争又反映了英俄争霸中国的矛盾。中日战争爆发

<sup>①</sup> 按照封建王朝的规定，如果由太后或皇后主持政务时，为了表示男女有别，在接见大臣时要用帘子遮隔，故曰“垂帘听政”。

后，后党主张“借俄以慑倭”，极力乞求俄国出面调停，保持和局，以免在战争中削弱自己的实权地位，尤其不让帝党在战争之中夺去一丝一毫的权力。帝党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联英伐倭”，把希望寄托于英国的支持，要对日一战，目的是企图借主战沽取声望，贬低后党，提高载湉的地位，并借抗战之名动用后党军队，削弱后党的力量，伺机取得军政大权，使载湉成为一个有职有权的皇帝。

清军在牙山溃败后，帝党就掀起了一场抗战声浪。载湉连发上谕，要求抗战到底，并督促李鸿章速调海陆军迎战日军。帝党的许多官僚也纷纷上奏折，要求对日一战。礼部侍郎志锐在一份奏折中严厉斥责李鸿章卖国投降，揭露叶志超逃跑误国，尖锐地指出：“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痈贻患，以至于今日，气焰嚣张，贪婪无已。一误再误，则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sup>①</sup>他们这样慷慨陈词，并非真正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而完全是出于党争的需要；同时他们又没有什么力量，除了高喊些抗战的口号再没有别的行动，既调动不了军队，也管不了财政。因此，帝党的主战并没有在中日战争中起什么作用。相反，后党的主和倒决定了整个战局。

一八九四年，正值那拉氏六十岁寿辰，为了壮大声势，粉饰太平，她积极筹组盛大的万寿庆典。准备从皇宫到颐和园的路上，遍设彩棚、戏台，上面布花环，设景物，演剧奏乐。她并且指令各地文武官员来京祝寿，对心腹官僚加俸晋爵。李鸿章被赏三眼花翎，奕劻被封为庆亲王。那拉氏企图以此来压帝党的威风，壮后党的权势。中日战争的炮火，使那拉氏分外耽心，她惧

<sup>①</sup>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92，第17页。

怕战火冲击了她的万寿庆典，更怕在战争中削弱她的最高统治地位，因此她一心想保持和局，早了战事。那拉氏的这种态度更使掌握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有恃无恐。李鸿章从来把淮军、北洋海军当作他个人的私产和升官发财的资本。他十分清楚自己之所以权倾一时，就是因为手中有一支反革命的军队。为了保持他的北洋地盘和在清王朝中的权势，他竭力迎合那拉氏的意旨，积极主张保持和局。在外交上，他屈辱求和；在军事上，他避战自保；在舆论上，他贩卖投降主义，甚至“闻败则喜，闻胜则忧”<sup>①</sup>。正是在这样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导引下，清军节节溃败，日军步步进逼，造成了清政府惨败的结局。

当叶志超狂奔两千多里到达平壤的时候，左宝贵等清军援兵已先到达，各路大军近两万人，屯驻平壤城里。平壤是朝鲜北面的一个重镇，背靠险峻的高山，前有日泻千里的大同江，形势极为险要。各路清军在叶志超的总统下，既不利用平壤的险要地形设兵据守，也不修筑工事准备打仗，而是人各一心，大闹矛盾，各不统属，有的军营甚至置酒高会，沉醉于歌舞酒色之中。与此同时，北洋海军在遭受日军丰岛偷袭之后，根本不敢到大同江以南海域去巡逻，把制海权拱手让给日本。这样，日军在丰岛、牙山获胜后，休整一个多月，随即兵分四路，一路从大同江下游渡江，攻平壤西南；一路从元山登陆，横越朝鲜北部，截断平壤后路；一路从汉城北面大道攻平壤东南；一路绕道从大同江上游渡江，攻平壤东北，杀气腾腾地向平壤扑来。九月十三日，日军从大同江南岸发炮轰击平壤城，叶志超惊惶失措，不敢出阵，并散布平壤防守不住的失败主义论调。十四日夜，叶志超准备逃

---

① 安维峻：《劾强臣玩寇疏》，《中日战争文学集》第5页。

跑，被左宝贵强制留住，但他根本无心守城。十五日，日军以四路重兵向平壤发起猛攻。马玉崑部坚守大同江东岸，在友邻部队的支援下，广大爱国官兵奋勇杀敌，打死打伤日军四百余名，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左宝贵率部守卫平壤玄武门（北门），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登城指挥，广大爱国士兵迎着硝烟弥漫的战火，奋不顾身，英勇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地打击。左宝贵在鏖战中不幸中炮牺牲，许多营官也力战阵亡，部队伤亡重大，终因寡不敌众，玄武门失守。日军虽然攻占玄武门，但因城内清军还有相当力量，所以还不敢进城。可是，就在玄武门失守的当夜，身为平壤诸军总统的叶志超，竟自带部分将士再次率先逃走，致使军心大乱，无人指挥，溃不成军，牺牲士兵二千余人，被俘者六百多人，清军在平壤积存的“大小炮四十尊，快炮并毛瑟枪万数十杆，将弁私财，军士粮饷，军资、器具、公文、密电，尽委之而去”<sup>①</sup>。叶志超狂奔五百里，从平壤一口气跑过鸭绿江，沿途险要，皆弃而不守。逃回国后，叶志超照样又谎报战绩，得到清政府的免予处分。平壤战役就这样惨败了，日本侵略者从此把战火烧到了中国境内。

由于中朝两国同受日本的侵略，共同的命运把他们联在了一起。当中国军队到达平壤时，朝鲜人民“箪食壶浆，馈遗不绝”<sup>②</sup>，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中国军队赴朝抗日。朝鲜人民对中国军队“所至供给，呼应云动，其待日兵则反是。故敌军进攻平壤之际，除干粮以外，无所得食，以一匙之盐供数日”<sup>③</sup>。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朝鲜全境后，疯狂地奸淫烧杀。日本侵略军的野蛮

①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第1册，第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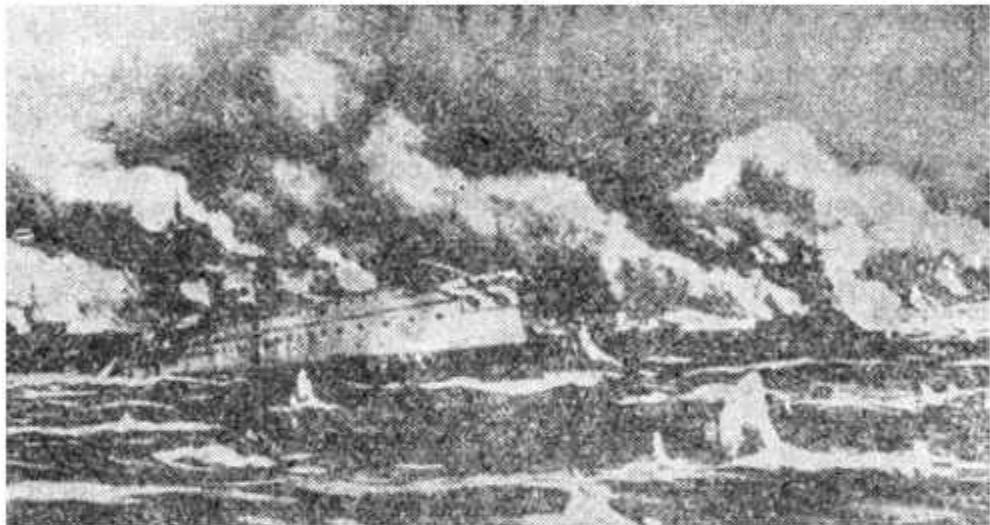
② 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46页。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8，第17页。

暴行，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了富有反侵略斗争传统的朝鲜人民的坚强反抗。朝鲜人民自发的反抗烈火燃遍三千里江山。在全罗道有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农民武装，英勇抗击日军。在这支抗日武装队伍中，有中国士兵和朝鲜人民并肩战斗。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们坚持斗争到一八九四年底。

平壤战役结束后三天，日本舰队又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向清朝北洋舰队发动了一场大的攻击战，即黄海大海战。九月十二日，清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十二艘为运送平壤援军的五艘商轮护航，十六日，行抵大东沟口外，当晚援军登陆。十七日上午丁汝昌率舰队返航旅顺。北洋舰队正破浪前进，忽然发现远处有一支悬挂美国国旗的舰队迎面驶来。中午，这支舰队渐近，十二艘军舰一律改挂日本国旗，成一字竖阵向北洋舰队奔袭而来。丁汝昌立即命令全舰队以分段纵列队形迎敌。旗舰铁甲船定远号管带刘步蟾畏敌胆怯，擅改命令为相并横列队形，企图让小舰来护卫旗舰。这样，处于两翼的小舰感到处境危险自动减速缓进，整个舰队成半月形，居中两铁甲船（定远以外还有镇远）突出于前方。日舰先向最弱的右翼进攻，丁汝昌命令全队右移四度，以主力舰首先接敌。刘步蟾再次违令停留不动，企图避敌。为了给自己壮胆，当距敌舰尚有六千米远时，刘步蟾就下令开炮。结果不但没有伤着敌舰一根毫毛，反而震裂了自己年久失修的飞桥，在飞桥上指挥作战的丁汝昌被摔伤。丁汝昌虽然坚持在甲板上督战，但是指挥不灵，舰队阵势混乱，扬威舰中弹受伤，超勇舰中弹后起火沉没。广甲舰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开战后即仓惶逃跑，后搁浅被日舰炸沉。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开战后竟用巨锤击坏各炮，然后假报“本舰重伤”，逃之夭夭。济远舰

在逃跑中，不仅对致远、经远舰危急视而不救，而且又把已经受伤的扬威舰拦腰撞坏，以致不久沉没。同这些民族败类相反，广大爱国官兵激于义愤，奋勇迎战。致远舰受重伤和弹药用尽后，又与日舰中速度最快的吉野舰相遇。管带邓世昌以为日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遂鼓快车”<sup>①</sup>，向吉野舰冲



直冲敌舰的致远舰

去，要和吉野舰同归于尽，不幸一鱼雷打来，致远舰下沉，全船官兵二百五十多人全部英勇牺牲。经远舰管带林永升指挥爱国官兵，在兵舰中雷下沉的危急时刻，仍坚持射击到最后。来远舰中弹起火受重伤，但全船官兵坚守岗位，奋力抢救，最后得以安全返航。其它军舰上也有一些爱国军官同爱国士兵一起，勇敢作战，给了敌人以应有的打击。一位目击者英国人泰莱写道：中国军舰上的“巨炮喷着火焰和硝烟，将……炮弹猛射出去。水手们严肃、乐观，他们当中丝毫没有恐惧形迹。有一个水手在我去巡视时受了很重的创伤……。但当我再来巡视这门炮时，这个受伤的人——裹着绷带而且已局部残废——却正在专心致志地作

<sup>①</sup>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第1册，第67页。

战”<sup>①</sup>。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勇敢战斗，才给了日本侵略者以较重的打击。参战的日本全部军舰或轻或重都受到损伤，旗舰松岛舰几乎被击沉，吉野、赤城、比叡、西京丸诸舰受伤尤重，赤城舰自舰长以下死伤甚众。整个黄海海战经历约五小时，日本舰队向南先退，北洋舰队返航旅顺。

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船只数目和总吨数大体相等，日舰船身小，驶速高，快炮多，重炮少。中国舰队火力强，主力舰吨位大，铁甲厚。在力量对比相当的情况下，日本舰队虽有损失，但北洋舰队损失更重，这完全是李鸿章的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在战略上，李鸿章一贯避战自守，被动挨打，根本没有主动出击的思想准备。北洋海军在丰岛已遭偷袭，李鸿章不引以为诫，加强防守，反而不让北洋舰队出海巡逻，把广阔的海域让与日本。丁汝昌护送援军至大东沟，也由于李鸿章消极避战思想的影响，缺乏敌情观念，各舰所带的炮弹很少，根本没有作战的准备，当他看到挂着美国旗的日本舰队时，仍不下令作好战斗准备，直到船至咫尺，才仓促应战，造成被动。在战术上，日舰是鱼贯而进，进攻力强，目标小。而丁汝昌由于仓促应战，指挥失灵，舰队成半月形，目标显著，调度困难，“致远则轻敌太前，广甲、济远则畏敌太后，超勇、扬威未至队，平远、广丙尚在港内未来，……督船离敌船尚远，码数不准，竟行开炮，全军亦随之同开。斯时烟雾迷天，……安能命中？一发不中，再发、三发又不中，则我之气竭而且衰矣。敌窥我炮之虚发，其威愈壮，其焰愈张。我竭彼盈，是以败也”<sup>②</sup>。再加上刘步蟾、方伯谦等民族败类无耻溃逃，其失败

<sup>①</sup> 《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345页。

<sup>②</sup> 张秉铨：《北洋海军失利情形》，《中日战争》第5册，第468页。

是必然的。如果没有邓世昌、林永升等爱国官兵的拚死奋战，损失必然会更大。

黄海之战是中日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战。战败的消息传到紫禁城，帝党立即借机向后党发动猛攻。翁同龢等主张严办李鸿章，要求拔去其“三眼花翎，褫黄马褂”<sup>①</sup>。翰林院有三十五人联名上奏，弹劾李鸿章战败误国。志锐等三十八人上书，要求严惩李鸿章一伙。载湉还发谕严责其罪，李鸿章惊慌不已，以“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搪塞其词。帝党还要以徐建寅代丁汝昌，撤叶志超、卫汝贵统领职，代之以聂士成，企图夺后党的兵权。有的还上奏要求停止万寿庆典，“一切点景俱暂停办，工程已立架油饰者，不再添彩绸，灯盏陈设等均收好，俟来年补祝”<sup>②</sup>。帝党分子还主张一面切断山海关铁路，一面向英国借款，同时叫嚷“连英伐倭，欲以二三千万饵之”<sup>③</sup>。帝党活跃一时，企图压倒后党。但后党毫不退让。那拉氏极力包庇重用李鸿章，李公开反对用徐建寅代丁汝昌。那拉氏还起用在中法战争中被罢官的奕诉主持总理衙门，办理投降外交，并命奕劻来帮办军务。她令万寿庆典照常进行，各省官员进贡祝寿于十月二十三日前送往福华门，并向一些大臣发放如意珍宝，赠送绫罗绸缎，借以回击帝党的进攻。她恶狠狠地宣称，你们今天令我不欢，我将使你们“终身不欢”，准备要严惩帝党。有了那拉氏这样的支持，李鸿章就进一步大肆推行其投降主义路线，他极力渲染清军在黄海战役的失败，大肆贩卖“唯武器”论，胡说什么“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sup>④</sup>。他借口中国

<sup>①②③</sup> 《翁文恭公日记》，《中日战争》第4册，第495、501、499页。

<sup>④</sup> 李鸿章：《据实陈奏军情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第61—62页。

武器不如日本，来宣扬抗战必败，投降有理，并压制爱国官兵的抗战行动。海军官兵要求出海迎战，李鸿章严厉拒绝，把北洋舰队圈在威海卫的军港里，坐以待毙。他还派出成批暗探，游窜街市，在人民的“街谈巷议”中听到抗敌言论，立即捉拿惩究。李鸿章幻想以这样的叛卖活动，去讨日本侵略者的宽示，但日本军国主义并不就此歇手，反而大大助长了它的侵略气焰。

一八九四年十月下旬，日军向中国境内大举进犯。十月二十四日，日军第一军偷渡鸭绿江，进攻九连城，刚放一排枪，清军除聂士成部在虎山稍作抵抗外，其他各军都亡命溃逃。日军很快侵占了九连城，并进一步攻陷安东（今丹东），进而向辽河入侵。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军从花园口登陆，从背后向大连、旅顺袭击。

旅顺口、大连湾是清政府经营多年的重要海军军港。大连设有炮台六座，旅顺水陆炮台多至二十二座，并设有海军学堂、火药库、船坞等各种海军设施，是北洋舰队的精华所在地。同时旅顺、大连地处辽宁的南端，突伸海内，和威海卫隔海相对，犹如突伸的两臂，将滔滔渤海环抱，是渤海的锁钥，北京的门户。驻守大连、旅顺的清军守将赵怀益、龚照玙贪鄙庸劣，根本不去利用这里的险峻地形，分兵把守，而一味花天酒地，准备溃逃。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搬运炮马辎重上岸，历时十二天，他们不闻不问。有的将士请求迎击日军，赵怀益不知羞耻地回答：“我奉中堂（李鸿章）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sup>①</sup>十一月六日，日军攻旅顺、大连后路重镇金州，总兵徐邦道率军奋勇迎敌，日军猛烈进攻，徐力不能敌，向赵怀益求援。赵怀益这时正汗流浃背地在大

<sup>①</sup>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第1册，第37页。

连码头督催士兵为他搬运行李物品，准备逃之夭夭。徐邦道不得已退往旅顺，不料赵怀益已先逃到这里。大连炮台不战而让与敌军。八日，日本海军来攻，见城上已竖日旗，深感意外。大连城内清军丢下大小炮一百二十尊，炮弹二百四十六万颗，枪枝、军帐、马匹无数，全部送给了敌人。由于清军的极端腐朽，日本侵略者就这样意外地占领了大连湾。

日军在侵占大连后十天，十一月十八日向旅顺进攻。海军提督丁汝昌深感形势危急，如果旅顺失守，将失去北洋海军的一扇大门，必将影响大局，所以亲自赶往天津，请求李鸿章准许北洋舰队救援旅顺，可是竟遭痛斥。李鸿章胡说什么：“汝善在威海卫守汝数只船只勿失，余非汝事也。”<sup>①</sup>这样旅顺孤立无援，统帅龚照玙又早已逃往烟台，八艘鱼雷艇也驶往威海卫避难。清军大小官员惊恐慌乱，抢夺库中金银财宝，雇民船争相逃窜。日军来攻，只有总兵徐邦道率少数部队迎战，但仍给日军以重创。土城子一战击毙日军校官二人，打死打伤敌人八十多人。二十一日，日军大队人马围攻旅顺，徐邦道再次率军迎战，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二十二日，日军攻取炮台，旅顺陷落。日军攻入旅顺后，兽性大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他们见人就杀，远的开枪，近的刀刺。有的砍掉脑袋，有的割去双腿，有的挖去眼睛，有的剖腹斩腰，有的小孩被钉在墙上，甚至有的妇女被奸污后剖腹开膛。屠杀持续了四天，整个旅顺仅有三十六个人幸免于难。这三十六人还是因被日军抓来抬死尸的，他们脸上有免杀的记号。一时旅顺城里死尸堆着几尺高，鲜血淋淋，惨不忍睹。日军的暴行，令人发指。

---

<sup>①</sup>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第1册，第69页。

旅顺、大连陷落，辽东告急，京师震动，帝党和后党不去认真备战，内部却激烈地展开争权夺利的活动。翁同龢等官僚聚集一起，攻击李鸿章求和失地，揭露淮军既腐败不堪，又难于驾驭。御史安维峻甚

至上书请斩李鸿章，斥那拉氏干预朝政，让她不要迁事牵制载湉。载湉发上谕命湘系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湖南巡抚吴大澂和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指挥山海关以外的军事。在这里，帝党打着主战的旗号，企图抬高湘系军阀的地位，排斥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逼迫那拉氏交出军政大权。狡猾凶狠的后党则玩弄两面手法，进行反击。那拉氏一面因看到淮军在战争中接连惨败，便乘机同意把湘军推上前线，以削弱帝党的力量，以便在湘军吃败仗后，好放手推行求和路线；一面向帝党中那些锋芒毕露分子开刀，杀鸡给猴看。她下令将志锐革职，将安维峻交刑部议罪，把帝党的两个活动场所上书房和南书房（上书房即光绪皇帝读书处，南书房是典内廷书诏的地方）撤销，并斥责载湉的宠爱妃子珍妃劣绩种种，降之为贵人，以此来窘辱载湉，打击帝党。随着战争的节节失利，后党更加妥协退让，卑屈求和。李鸿章则奔走于各帝国主义的门下，奉行“以夷制夷”的卖国主义路线，根本不作任何的战斗准备。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北洋海军彻底覆灭的惨局。



日本侵略军在旅顺的暴行

一八九五年一月，日本发动了对北洋海军的另一个基地——威海卫的进攻。威海卫军港位于山东半岛的顶端，港岸作半圆形，犹如两臂环抱，港口横列刘公岛、日岛，好象两扇大门守卫，形势极其险峻。岸上并设有南邦炮台和北邦炮台，计有炮台十五座，刘公岛和日岛设有炮台五座，总计有大炮一百六十门。就当时而论，若从正面进攻威海卫，那是极端困难的。日本侵略者侦知这种情况，决定采取从陆路背后偷袭威海卫的战术。二十日，日军分两队，一队佯攻登州，一队从荣城县成山头登陆。同时日本军舰也从海面发炮轰击威海卫。如果丁汝昌这时率舰队出海迎敌，还不至遭到惨败。可是李鸿章早命令他们坐守港内，不准出击，不准出海巡弋。丁汝昌不敢违抗命令，结果形成坐等挨打的局面。日军在成山头登陆后，西攻南邦炮台，清军孙万龄率队迎战。当时北风呼号，“大雪弥日”，孙万龄和广大清军爱国官兵不畏艰辛，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后日军大队人马来攻，孙万龄仅有三营军队，不得已退走。负责守卫北邦炮台的戴宗骞尖刻腐朽，平日对士兵敲打，战时见敌人溃逃。三十日，日军攻占南邦和北邦炮台，戴宗骞逃往刘公岛。港岸炮台的相继失守，使威海卫处于日军包围之中。日军从岸上集中炮火猛轰威海卫，日本海军舰队也向威海卫频频发炮轰击，北洋海军坐困港内，腹背受敌，形势极其危急。丁汝昌命令刘公岛、日岛各炮台集中火力回击，又让各军舰勇猛反击，击沉敌军舰两艘、鱼雷艇五艘，但仍没有挽回危局，军心紊乱。这时海军副统带英国人马格禄和美国人浩威串通一气，煽动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清军官兵，向丁汝昌鸣枪示威，要求他带领全体人员投降。丁汝昌毕竟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他拒绝投降，坚持抗战。二月十一日夜，他召集尚存的十一艘军舰的将领开会，研究突围问题。

马格禄、浩威等洋员和大部将领早已丧魂落魄，极力反对突围，自动散会。接着他们唆使暴徒手持刀矛威逼丁汝昌尽快投降。丁汝昌气愤难忍，在绝望中服毒自杀。第二天，浩威伙同一小撮民族败类，盗用丁汝昌的名义，立即起草投降书，悬挂白旗，可耻地向日本投降了。威海卫的十一艘军舰以及各种军资物品全拱手送给了侵略者，守卫京城的渤海湾上的旅顺、威海卫两大门户全被日军攻占了，李鸿章经营十几年的北洋海军就这样全部覆灭了。

日军在进攻威海卫的同时，又在辽东大举入侵。一八九四年十月，日本第一军攻占九连城、安东后，于三十日攻占凤凰城，



凤凰城大战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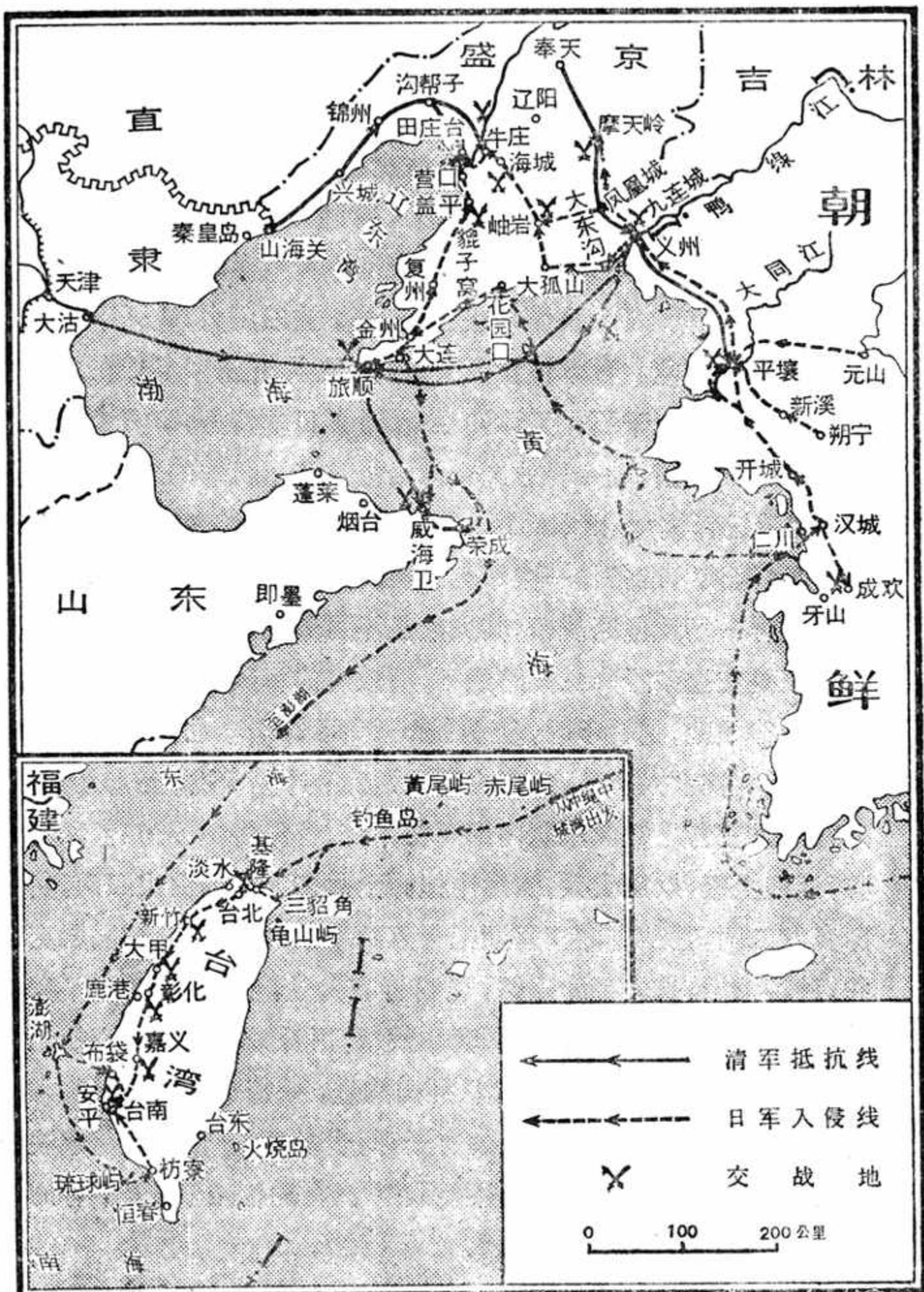
又相继攻下岫岩、海城，扬言要进占辽阳，夺取沈阳。辽东危急奏报如雪片飞来。虽然刘坤一、吴大澂、宋庆等早于一八九五年一月就指挥清军一百多营、六万多人，出山海关作战了，但仍无法挽救败局。因为刘坤一和李鸿章一样昏庸腐朽，自己坐镇天津，抽鸦片，玩象棋，对军事漫不经心。吴大澂更是一个玩古董的专家，吹牛皮说假话的骗子，对军事一窍不通。但他竟装成风流老将，吹嘘要打一胜仗。从一月到二月，清军先后四次反攻海城，结果由于指挥不灵，互不相统，计划不周，腐败懦弱，全部失败。二月二十八日，海城的日军分三路冲出城来，攻占鞍山站，三月四日进犯牛庄，敌军冲进市区，守将李光久、魏光焘等还

在抽鸦片，闻警惊慌失措，弃军逃跑。广大清军战士自发地据守房屋，顽强地保卫每一条街道，英勇作战。但由于无人指挥，牺牲极重，死伤两千多人，日军攻陷牛庄。驻扎在田庄台的吴大澂见牛庄失守，胆颤心惊，拔腿就逃。驻守营口的宋庆，见吴大澂已先逃跑，也于当晚率三万大军越过辽河，逃往田庄台。日军不战而陷营口。营口所存大炮四十五尊、大小轮船三艘和枪枝弹药全归日军所有。三月九日，日军一面在辽河架起大炮，猛轰田庄台，一面绕道从上游渡河，包围了田庄台。宋庆弃城先逃，留下的士兵来不及逃跑，被日军杀死两千多人，繁华的田庄台在日本的烧杀下，几成废墟。至此，辽东半岛全被日军占领。日本由于感到战线太长，财政、兵力不足，便停止了大规模进攻，一面抽部分兵力南侵澎湖列岛，一面准备以和谈来掠取中国更大的权益。而清政府更以辽东大溃败作为投降的借口，决心割地赔款以维持那拉氏一伙的反动统治。许多王公大臣纷纷上书求和，叫嚷“宗社为重，边徼为轻”。载湉为头子的帝党官僚也被日本的炮火吓破了胆，收起了主战的叫喊，乞求早日议和。可见，当外国侵略危害他们的反动政权时，他们宁肯卖国投降，甘当亡国奴，也不肯抗战到底。

清军从牙山败退到辽河溃逃，其间展现给人们的完全是一幅清军溃败图。清军惨败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推行的那条彻头彻尾的卖国投降路线。

正是在这条投降主义路线下，清朝统治集团不顾大敌当前，国难临头，而加紧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攻，并没有阻止他们的争斗，最后以后党的得势而告止。那拉氏进一步结党营私，组成了一个以李鸿章、奕訢、奕劻为骨干的卖国营垒，放手投降日本军国主义。那拉氏在战争中除了举办荒

# 中日战争形势图



淫无耻的万寿庆典，就是指令其爪牙求救俄国帮助议和。奕䜣、奕劻对于战事更不过问，一味地向帝国主义主子叩头请和。李鸿章早就公开宣称他“素未准备与外国交争”，并借口他的淮军、北洋海军太弱，不肯动用他的军队出战。他贩卖失败主义的黑货，鼓吹战败求和，“和款可无大损”，战胜则“兵连祸结，大局不可收拾”。同时李鸿章在战争当中大肆进行叛卖活动，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内奸。日本缺煤，他三令五申，施以压力，让开平煤矿卖给日本三万吨。日本粮食紧张，他指使其儿子李经芳在上海卖给日本大米三千石。天津知县抓到了日本特务，李鸿章授意李经芳出面说情，勒令释放。台湾沿海拿获了日本的间谍船，李鸿章“请旨释放”。日本的军火遇到了困难，李鸿章竟和盛宣怀等“密室繁谈”，准备作一次军火买卖。用这样一些民族败类去指导这样一场反侵略战争，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在这条投降主义路线下，清政府的军队腐败到了极点。军队纪律松弛，赏罚不明，英勇抗战受不到表彰，亡命逃跑反领到赏金。各队“人皆乌合，来去无恒”，竟有十营不满五营之额，八营不足三营之数。军队内部腐朽不堪，各级将官只知营私舞弊，逢迎上级，欺压士兵，贪污中饱。士兵每人月饷白银四两，实际竟发二两，甚至有的营官敢把十万两军饷偷运回家。“层层克扣，种种摊派，长夫视为津贴，营官皆有例献，将拥厚赀，士不宿饱；……营官统领，专讲应酬，奢华佚惰，用费繁多，营谋请托，无所不有”<sup>①</sup>。清军的武器大都从外国购进，一箱箱子弹打开，有的是空箱，有的装砂土，即使装有子弹，也多弄虚作假，“药线铁管，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sup>②</sup>。有的枪拉不开拴，有的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陆军。

② 蔡尔康等：《中东战纪本末》，《中日战争》第1册，第173页。

炮弹中满装的是腊。在洋人指导下建的炮台，也是只有前台炮，没有后台炮，敌人一绕到背后进攻，就束手无策。军队中还花重金雇用大量的洋教官，他们拿中国的钱，却为外国侵略者效劳。他们为日本通风报信，使日军对中国的炮台设施、兵力部署、船舰性能、沿海地形等了解得十分清楚。尽管清政府每年拿出半数以上的收入去训练军队，也不能建立起英勇善战的清军。后来李鸿章曾这样供认：“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sup>①</sup>这表明半殖民地化的清朝封建政权根本建立不起一支可以保卫中华民族的军队。

正是在这条投降主义路线下，清政府在整个战争中处处被动挨打，在战略战术上犯了致命的错误。一八九四年七月中旬，日本要发动侵华战争已是路人皆知，但清政府毫无抗战准备，既不派兵救援孤军深入牙山的清军，也不在国内整顿军备，准备打仗，而一味向列强乞求援助，请求调停，结果“使敌人著著占先，而我兵无可进之路”<sup>②</sup>。待日兵作好了战争的一切准备，李鸿章才被迫发援兵，结果水路遭覆亡，陆路在平壤吃了败仗，接着又在黄海打了一个无准备之仗，从此清军一蹶不振，形势急转而下。清统治者这时没有也不可能来扭转危局，反而从各集团的私利出发，把战败作为理由，急速求和，李鸿章则更为了保住北洋

① 吴永：《庚子西狩丛谭》，《中日战争》第5册，第500页。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8，第6页。

地盘，不许部队主动出击，象神灵一样把海军关起来。这样妥协退让，长了日军的威风，灭了中国军队的士气。日军猛烈进攻，攻占旅顺、大连，灭了北洋海军，战火烧遍辽东，清军只有望风溃逃，没有向前一步。那拉氏一伙甚至准备迁都逃窜。这样“一误再误，终于不可收拾”<sup>①</sup>。

清王朝在中日战争中的溃败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腐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那拉氏控制下的小朝廷正象人们所讥讽的那样“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政治、军事腐朽不堪，根本不可能打赢一场保卫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 三、人民群众的抗日烽火

和清政府投降主义路线导引下的清军节节溃败相反，广大人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杀上战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坚持了一条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抵抗路线。

当日本侵略军从花园口登陆进犯金州时，当地人民立即组织“红枪帮”，展开抗日斗争。他们利用当地的崇山峻岭，经常伏击日军，给以重大打击。貔子窝有一位勇敢的抗日英雄高武，他机智果敢，把当地八百多户农民组织成一支强大的抗日队伍，用铁锹、镢头、镰刀、棍棒作武器，经常袭击日军的军营，使日本侵略者闻之胆寒。金州城南三道沟塾师阎士开，当日寇用金钱诱他作向导时，他用笔作刀枪，痛斥日本的强盗行径，最后写道：“宁作中华的断头尸，不做倭寇的屈膝人！枪毙刀杀，任凭你们。”<sup>②</sup>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竟将阎士开开膛杀死。阎士开虽

① 文廷式：《闻尘偶记》，《中日战争》第5册，第497页。

② 吉林省历史研究所调查材料，转引自《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91页。

然牺牲，但他保持了中国人民坚贞不屈、保家卫国的崇高立场，是永远值得歌颂的。

旅大地区人民在清军不战而溃，日寇进行血腥大屠杀的时候，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而起，广大工人、农民、店员、爱国知识分子和艺人以及和尚都投入了反侵略、反屠杀的斗争行列，其英勇悲壮的事例举不胜举。陈家屯机匠陈金发，得知日本强盗要来杀他时，他临危不惧，手持斧头，等日本强盗进门时，抡起板斧，一斧劈掉日寇的脑袋。铁匠苑某，当手持洋枪的日寇闯进他家时，他怀着千仇万恨，抡起铁锤，一连砸死四、五个敌人。有个少年儿童，痛恨日寇入侵，就自动装扮乞丐，潜入日本军营，把毒药放到日军的饮水缸中，毒死许多日本鬼子。被捕后，他慷慨陈词，大声说：“我为国杀敌，拚命一死，可惜的是，毒药还有，没有杀尽你们这些强盗。”<sup>①</sup>最后，英勇就义。

日本陆军第一军攻占九连城、安东向辽东进犯时，立即遭到当地人民的武装抵抗。辽阳、凤城、岫岩、海城、新民周围七八百里，“无民不团”，农民、猎户、矿工、流民以及部分爱国士绅都积极地投入了战斗。猎户李樾、徐润等组织猎户两千多人，协助清军作战，“先后斩倭二千余名”<sup>②</sup>。岫岩东南的桂花岭，有个复来社村，大都是采煤工人，他们“连村数十，自练乡团，贼来犯之，乡团极力堵御，以抬枪毙贼无数。自十月中旬至下旬，相持甚久，贼不敢轻进”<sup>③</sup>。吉林夹皮沟的贫苦农民武装首领韩登举，一向被统治阶级诬为“金匪”，剿之又剿。但是，一到大敌侵入国门，清军望风而逃，韩登举却决心保家卫国，率领三千名夹皮沟的英

<sup>①</sup> 参见阿英：《近代外祸史》第343—344页。

<sup>②</sup> 曹和济：《津门奉使纪闻》，《中日战争》第1册，第156页。

<sup>③</sup> 易顺鼎：《盾墨拾余》，《中日战争》第1册，第113页。

雄健儿，离家乡，跨雪原，穿林海，上前线，到被日军占领的海城，与当地人民一起投入了反侵略的战斗。一次，海城日军四千多人出来骚扰，韩登举率军奋勇迎战，击毙日军五百多人，从此，日军一听韩登举之名，就心惊肉跳。铁岭武进士李葆真，在人民群众热火朝天的抗日斗争鼓舞下，自出粮饷，编练义军五百多人，守城攻敌，给日军以很大打击。这些分散各地的人民抗日队伍，如一把把火炬，烧得日本侵略者焦头烂额，使它寸步难行。

一八九五年一月，辽阳一带人民又展开了威武雄壮的辽阳保卫战。

辽阳是奉天的南大门，辽阳一失，奉天即危。所以，保卫辽阳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时驻扎海城的日军向辽阳猖狂进攻，狂妄地叫喊要“取奉天度岁”。但是辽阳一带人民自动组织起来，互相配合，团结一致，好似铜墙铁壁。日军从海城四次出兵进攻辽阳，四次惨败而归。《辽阳县志》生动记载了辽阳人民机智灵活的战斗情景：“各乡勇昼夜张旗帜，夜燃火把，出没往来，虚实兼用”，“林烟石火”，伏击敌人<sup>①</sup>。一八九五年一月十日，日军进攻辽阳棘楼堡子，当地团民奋勇迎击，活捉日兵一名，打死七名，日军狼狈逃窜。十七日，日军又集结兵力进犯韩家岭，团民英勇抵抗，激战三小时，杀死日军数十名，日军纷纷逃走，团民乘势追击，收复离韩家岭不远的潜家大岭。十九日，日军再次纠集残兵败将进攻韩家岭，团民怒火万丈，立即整兵出击，奋力抵御，杀死敌督队官一名，击毙日军数十名，缴获许多衣帽武器，日军惨败而逃。但日军并不甘心失败，二十八日，又集结五百多人，进攻梨宝沟岭口。团民大队集合，扼守岭口，敌兵不仅攻不上去，

---

<sup>①</sup> 白永贞等：《辽阳县志》，《中日战争》第6册，第314页。

反被团民打得大败，争相逃命，团民乘胜追击十几里，杀死大量日兵。辽阳一带人民这样勇敢、顽强、机智、灵活的战斗，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其“取奉天度岁”的计划变为泡影。

一八九五年二月，东边道人民又发动了收复宽甸、长甸两县城的战斗。

宽甸和长甸两县地处辽宁省西部，日军在攻占九连城后，向两县逐步进犯。当时人民群众就曾进行了英勇抵抗，“壮夫老弱，死战不降”<sup>①</sup>。日军占领宽甸、长甸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更激起了当地人民的愤怒。他们先后组织起十个民团，近一万多人，决心和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二月二十五日，各路团民集合一起，向宽甸的日军发动了进攻。日军闻之，慌忙出城阻击，在一拨茅、欢喜岭等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团民熟悉地形，出没往来，把日军拖得精疲力尽，一举生擒其领队广田甚吉，打死日军七、八十人，缴获枪械子弹衣物无数，余下的日兵狼狈逃入县城。团民乘胜追击，沿路杀死日军多人，从东门冲进县城，日军从南门逃命，将宽甸县城收复。三月一日，团民因势利导，将长甸县城团团包围。敌人据守城内，负隅顽抗，团民英勇回击，打死日军七、八十人，日军弃城而逃，团民胜利占领长甸，获取大批衣物枪械子弹，大大武装了自己。

宽甸、长甸的收复，给当地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大高岭一带的团民立即展开收复三家子的战斗。三家子地势险要，又是通往凤凰城、岫岩的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三月二日，辽阳、岫岩、凤凰城交界的龙头寨、屯山一带的团民，在袁得山等的领导下向三家子的日军发起了冲锋，日军力不能挡，败退而逃，被团

<sup>①</sup>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06，第25页。

民活捉十二名，打伤十二名，马匹、衣服全被缴获，三家子被团民收复。

辽阳保卫战，宽甸、长甸、三家子的反攻战，以及旅大地区人民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事例，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反抗精神，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抗击外国侵略的主力，是保卫祖国的真正铜墙铁壁。但是，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者，他们不敢、也不愿组织人民群众，甚至敌视、镇压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因此，人民自发的反抗，无法挽回由清政府投降路线所造成的失败局面。

## 第二节 《马关条约》与所谓“干涉还辽”

### 一、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早在平壤溃退和黄海之战后，那拉氏、李鸿章就积极从事求降活动。一八九四年九月底，奕訢再次主持总理衙门后，立刻指使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于十月六日向英人赫德乞求调停，“从下午四时谈到六时，几乎痛哭流涕”。只要赫德答应调停，他们保证“以后（为英国）办这样，办那样”<sup>①</sup>。一副奴才嘴脸暴露无遗。英国为了笼络一下清政府，乘机操纵调停大权，于是建议英、美、俄、德、法五国集体出面调停，促成中日和谈。这个建议一提出，美国首先反对，德国认为调停还不到时候，俄、法也不积极。连英国的《泰晤

<sup>①</sup> 《1894年10月7日北京去函Z字第635号》，《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七），第63页。

士报》也发表社论反对，说什么：“若企图对交战国施以强压或牵制，难免自陷于困窘的地位，而不断为东方最强大的国家所敌视。”<sup>①</sup>这样一来，英国的建议就流产了。

但是，腐败的清政府并不甘心碰壁，一味死心塌地的乞求议和。十月下旬，清政府又指使其驻美公使乞求美国出面调停。对于插手中日和谈，美国并不是不愿意，而是第一，它准备单独操纵和谈，从中夺取巨大的利益；第二，它窥测有利时机，以便迫使清政府作出更大让步，使日本能“心满意足”。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的儿子曾供认：要使清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非武力不行。中国走倒运，使它的统治阶级受到威胁时，那才是有利的事情。只有这样的情况成熟时，才是美国进行干涉的时机”<sup>②</sup>。这清楚说明，日本不将清政府打得大败，并攻占中国大片领土时，美国决不出场调停。十月里，黄海大战刚结束，日军还没有进到中国内地，因此美国拒绝了清政府的乞求。可是清政府仍不从中吸取教训，象着了迷似地仍然继续向各国乞求调停。十一月三日，总理衙门召请英、美、德、法、俄五国公使，要求说服日本停战，并训令驻外国公使向各政府提出同样的请求，幻想通过“连衡说合”达到求和的目的。但美国根本反对联合调停，英国叫嚷“不便与日再言”，德国表示“现时和议无济于事”，俄法两国也无动于衷，清政府“连衡说合”的幻想破灭了。

伴随着清政府乞求调停的连连碰壁，日本侵略军相继攻陷大连、旅顺，猖狂地向辽东进犯，奉天危急，京城震恐。这时美国觉得出面干涉的时机已到，于是破门而出，阴谋操纵中日和谈。日本当然对美国的用意深表赞同，但它又怕美国单独调停会招

① 《伯爵陆奥宗光遗稿》，第436页。

② 一八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田贝报告2004号。

致其它列强的反对，于是表面上对美国的调停表示不感兴趣，暗地里则和美国就既使美国单独操纵和谈、又不引起其它列强的干涉等问题，进行秘密磋商。十一月十七日，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和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一次交换意见中，决定美国以“交换双方意见”的“中介人”身分，参与中日和谈。这样，既可以使其它列强无空可钻，又能使美国借此机会联合日本对清政府进行讹诈。于是，一场由美国操纵的中日议和谈判开场了。

十一月十八日，李鸿章派德璀琳赴日议和。德璀琳是德国人，任天津海关税务司二十多年。中日议和这样重大事情，李鸿章居然拉一位洋大人出场，这也只有在李鸿章卖国主义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活动中才能找到。但李鸿章的这一招并没有博得美国和日本的赏识。这是因为德璀琳既没有替清政府卖国的实权，又不是死心塌地为美国和日本效劳的人。所以当美国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不满，其驻华公使田贝立即向总理衙门提出严厉质问，并要清政府立将德璀琳召回。当德璀琳到达日本后，日本政府也拒之门外，声称德璀琳没有“交战国使者资格”，绝对不和他“谈判军国大事”<sup>①</sup>。德璀琳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返回天津。

一八九五年一月三十日，清政府改派张荫桓、邵友濂赴日议和。美国政府一手安插了两个“顾问”：科士达为清政府的“顾问”，端迪臣为日本政府的“顾问”，两个“顾问”均为美国人，而科士达的屁股，又是完全坐在日本一边的。陆奥宗光毫不隐讳地声明科士达“是我个人的朋友”；科士达也叫嚷“我同日本的友谊是尽人皆知的”<sup>②</sup>。所以，这样的议和谈判，实质上是美、日联合向清政府敲诈勒索。

---

①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90页。

② 《科士达外交回忆录》，《中日战争》第7册，第465页。

二月一日，中日双方在广岛第一次会见。这时，日本一方面觉得清政府的北洋海军还未被消灭，怕它不能完全屈服；一方面觉得清政府所派张荫桓、邵友濂等人名位太低，缺乏卖国实权，即使一时谈妥，达成协议，也未必能够执行。于是，伊藤博文就按照事先捏造好的谎言，指责张荫桓等人“全权不足”，拒绝谈判。同时，又通过美国顾问端迪臣，告诉科士达，要清政府派出奕訢或李鸿章这样有卖国实权的人物，到日本谈判。张、邵等人虽再三声明他们奉有全权，清政府甚至不顾日本的侮辱，答应以电报形式修改全权证书，但均被日本所拒绝。

二月十二日，张荫桓等被逐出日本的当天，威海卫军港陷落了，北洋海军覆没了。日军控制旅顺和威海卫军港，封锁渤海湾，进入了中国东北，清廷一片混乱，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求和。但是就当时局势而论，战争持续下去，对日本已经不利。一方面，日军深入中国内地，人民反抗风起云涌，使日本侵略者寸步难行；另一方面，日本已感到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并因向中国大举进攻，已危及其它列强的在华利益，如果继续推进，有可能遭到列强的干涉。日本的外务大臣自己供认：“去年以来，经过长期战斗的舰队以及人员、军需等均告疲劳缺乏”，“国内的海陆军备”也“几成空虚”<sup>①</sup>。日本的后台美国也认为“若战争延长，无法节制日本海陆军进攻时，与东方局势有利害关系之欧洲列强，难免不向日本提出不利于日本将来安宁和幸福之要求”<sup>②</sup>。日本要受到干涉，连美国利用日本在华掠夺权益的梦想也将不能实现。因此，美国国务卿格莱锡对日本驻美公使栗野说：“日本应当结束战争了……。如果把中国打垮，英、德、法、俄等强国，

---

①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153页。

② 同上书，第111页。

将以维持秩序为名，瓜分中国。”<sup>①</sup>美国一面劝日本及时停止战争；一面又压迫清政府屈辱求和。日本方面固然由于内外交困不能再打下去；而中国方面，原来主战的帝党束手无策，原来主和的后党更急于了结战事，当那拉氏得知日本点名要李鸿章去谈判时，立即召见李鸿章，并委以“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乞和。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九日，李鸿章带同科士达到达日本的马关（今下关），同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谈判。在所谓谈判期间，日本侵略者索地索款，蛮横无理，李鸿章低头哈腰，卖国求和。科士达，这个所谓清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则只是本着等“战胜者强定条件就是了”<sup>②</sup>的态度，帮日本掠夺权益。就这样，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日本的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二、清政府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三、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搬运进口，日本在中国制造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五、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根据《马关条约》，第二年又订立《通商行船条约》，承认日本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卖国条约。连卖国贼李鸿章也感到自己卖国罪行严重，“至觉惶恐”。他从马关回到天津后，目睹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反对《马关条约》的滚滚

<sup>①</sup> M·斯凯勒：《格莱锡传》，转引自刘大年：《美国侵华史》，第43页。

<sup>②</sup> 《科士达外交回忆录》，《中日战争》，第7册，第466页。

怒潮，更觉罪责难逃，钻进家里，装病不出，而求科士达“代他去京”复命。他向科士达“详细介绍了军机处每一位大臣的个性，及其政治环境”，要科士达利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各个成员的弱点来达到批准《马关条约》的罪恶目的。科士达果不负李鸿章所托，四月三十日在总理衙门和奕劻、翁同龢等大臣会谈两小时之久，最后威胁说：现在的条约“已经不是李鸿章的条约了，已经是皇帝的条约了”，如果皇帝“拒绝批准这条约，他将在这个文明的世界前面丢脸，内阁诸大臣将负这一丢脸的责任”<sup>①</sup>。科士达把“皇帝丢脸”这顶大帽子拿出来一恐吓，这些满脑子孔孟之道的大臣便吓坏了。五月二日清政府便批准了这一条约，并于八日在烟台和日本换约。

《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民头上套上了又一副沉重的枷锁，加速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进程，它对近代中国社会所造成的恶果是极其严重的。

第一，《马关条约》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投资设厂，使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合法化，这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沉重打击，是对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极度摧残，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

第二，《马关条约》使日本割占了中国台湾省等大片土地，这是继沙俄吞并中国广大领土后，又一次对中国领土的大掠夺。这就严重的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使数百万同胞横遭日本殖民者的蹂躏，而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第三，《马关条约》使清政府付出巨额赔款，加剧了清政府的

---

<sup>①</sup> 卿汝楫：《甲午战争以前美国侵略台湾的资料辑要》，《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三期，第196页。

财政经济危机。清政府过去的赔款最多不超过两千万两，而《马关条约》所定的赔款数竟高达两亿两。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七、八千万两，赔款的总数再加上分期付款的利息，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收入的三倍。这就迫使财政竭蹶的清政府为借外债而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则通过放高利贷进一步控制清政府。清政府把赔款和外债统统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遭到更加沉重的压榨。

第四，《马关条约》加速了日本向帝国主义的转化，助长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也加深了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甲午战后，日本政府利用从中国人民身上掠夺到的巨额赔款，投资于它的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使其迅速发展。英、俄、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看到日本这个后起的小国竟在中国捞到如此巨大的权益，也争相在中国进行投资和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掠夺中国的过程中，你争我夺，矛盾重重，他们的争斗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甲午战后的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反映。这表明，帝国主义在对别国的侵略中，总是既勾结，又争夺的。

总之，通过《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了。

## 二、沙俄导演下的三国“干涉还辽”

甲午战争一爆发，伺机坐收渔利的沙俄，就密切注视着战争局势的发展。一八九五年一月下旬，当日军攻占旅顺，并进而海陆夹攻威海卫，渤海湾即将被日本海军封锁时，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基斯敬就提出：渤海湾是“俄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占领旅顺，攻取威海卫是“损害我们的利益”。沙俄统治集团中的另外一些

人甚至公然叫嚷什么俄国应该乘机“占领满洲的一部分”<sup>①</sup>。但是，由于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成，军队及物资运输均感困难；加上害怕与英国发生冲突，出现麻烦，特别是还不知道日本在谈判中，将向中国提出什么条件，所以在二月一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决定“如果日本政府和中国缔结和约时所提出的要求侵犯我国的重要利益时”，则要与英国及其他欧洲列强“对日本施以共同压力”<sup>②</sup>。于是，沙俄决定增加在远东的海军力量，积极与英、法、德等国进行磋商，并以交换意见为名，探听日本方面的口气，鼓动日本从中国勒索赔款和夺取台湾。二月十四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与沙俄驻日公使希特罗渥举行会谈，当陆奥宗光谈及日本要向中国提出割占土地的要求时，希特罗渥立即答称：“现在日本向中国要割地是当然之问题”。但是，日本应知道“俄国欲在太平洋沿岸获得自由通路亦非一日”，“若日本放弃岛国地位，向大陆扩张版图，则非上策”，“如果日本要求割让台湾，俄国毫无异议”<sup>③</sup>。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沙俄得知日本割占了早被它视为“势力范围”的辽东半岛后，立即正式邀请法、德两国，共同对日进行干涉。

法国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便与沙俄缔结同盟，共同扼制德国在欧洲势力的膨胀。这次参与沙俄的图谋，一则表示它对盟国沙俄的友谊，防止德国乘机离间俄、法同盟；二则也想借机从清政府手中索取“报酬”。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工业大国。这时，它一面在欧洲与沙俄争夺霸主地位，一面积极在中国沿海物色军事基地，以便向远东

①②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44、148页。

③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172页。

伸张势力。甲午战争爆发后，它既看到这次战争为本国军火商提供了一个“赚钱的良好机会”<sup>①</sup>，希望继续打下去；又密切注视俄、日矛盾的发展，企图利用俄、日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的矛盾，

“转移俄国视线于东方”<sup>②</sup>，借以减轻自己在欧洲所受沙俄的压力。一八九五年四月下旬，德皇威廉二世在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中说：“开发亚洲大陆并且防止庞大的黄种人侵入欧洲明显地是俄国将来的重大任务。在这件事情上，你会永远看到我是站在你这一方面的，准备尽我所能做到的来帮助你。……我将很感兴趣地期待我们的行动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希望，正如我将欣然地帮助你解决俄国对某些部分领土的最后兼并问题，请你设法让德国也可以在不妨碍你的地方获得一个港口。”<sup>③</sup>就这样，俄、法、德三个帝国主义各怀鬼胎，走到一起来了。

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即《马关条约》签订的第六天，三国分别照会日本，要其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并限十五日内答复。与此同时，三国军舰纷纷出动，停舶在日本各港口及海参崴的沙俄军舰，更是升锚起火，准备在一旦接到命令后，即可在二十四小时内，对日本发动进攻。驻守在远东的沙俄陆军，也蠢蠢欲动。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三国干涉的突然爆发，给日本以很大震动和压力。已经内外交困的日本，深感“不仅对三国海军无力应付，即单独对抗俄国也无把握”<sup>④</sup>。如果断然拒绝三国的警告，势将遭到三国的联合打击，如果全盘接受三国的警告，又不甘心。于是，日本积极

<sup>①②</sup>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4、27页。

<sup>③</sup> 《德国外交文件》第14卷，第1篇，第12页，注脚，第3648件；第9卷，第359页，注脚。

<sup>④</sup>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158页。

开展外交活动，争取英、美等国的支持，以牵制俄、德、法三国。

英国早在三国干涉前夕，就是俄、德、法三国争取的对象。但英国想通过日本勒索中国，以便分享更多的商业利益；同时，还想利用日本对辽东半岛的占领，阻止沙俄势力南下，所以拒绝参与三国对日联合行动。日本对此十分清楚，所以，当三国干涉发生后，它幻想英国能出面对三国进行反干涉；同时，秘密要求美国政府对沙俄进行劝告，以免使刚刚到手的东西，因三国干涉“化为乌有”。但是，英国在三国干涉前夕，虽拒绝与三国联合行动，干涉爆发后，却也不愿为日本火中取栗。因而只以“英国对日本虽有友谊，而俄、德、法三国也是英国的友邦”<sup>①</sup>的外交词令，婉言谢绝。美国虽然极力支持日本，但面对三国的联合行动，也感到力不从心，因而只答以“关于媾和条约一事，可电令驻北京美国公使，劝告中国从速批准”，至于劝告沙俄，则由于与美国的所谓“局外中立”<sup>②</sup>态度相矛盾，不能卖力。

日本的外交活动，由于英、美态度暧昧，希望全部落空。于是，日本不得不在四月三十日，由其驻欧各国公使，分别通知俄、德、法三国，表示愿意在中国给予适当“赔偿”的条件下，只割占辖有旅顺港口的金州，而放弃对辽东半岛其他部分的永久占领。对此，沙俄立即通知德、法两国：“辽东半岛之重要，主要的是它拥有旅顺；因此，俄国政府认为日政府的答复不能满意。俄国政府的意见是：必须坚持原来的要求，即必须要放弃半岛全部。”<sup>③</sup>德、法也紧跟在俄国后面，以同样的话答复日本。这时，日本感到“如无以武力一决胜负的决心，单凭外交上的折冲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而且，随着交涉的旷日持久，刚刚强迫清政府代表签

---

①②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162页。

③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42页。

了字的《马关条约》，也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即所谓“逐两免者不得一免”。于是，决定“实行‘对俄、德、法三国完全让步，但对中国一步不让’的政策”<sup>①</sup>。五月五日，日本通知三国，表示接受“劝告”，放弃辽东半岛，但是清政府必须缴纳“赎金”。俄、德、法三国为了不伤害日本的“自尊”，支持日本从清政府手中勒索所谓“赎辽费”。十一月八日，中日两国签订了《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条约》，规定：清政府要在十一月十六日前交给日本三千万两白银以“酬报”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日军在款项交清后三个月内全部撤出辽东半岛。

辽东半岛从纸面上看是“赎”回来了，但没过多久沙俄就以“租借”的名义霸占了辽东半岛的主要港口旅顺、大连。所以，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并不是出于他们对中国的“友谊”，而是各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中国这块“肥肉”的狗咬狗的争斗，也是沙俄妄图独霸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 第三节 反对日本霸占台湾省的斗争

#### 一、英勇悲壮的反割台斗争

清政府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阶层人民悲愤交集，怒不可遏。他们纷纷举行集会，发表演说，愤怒声讨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严厉抨击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反侵略、反投降的斗争，犹如大海怒涛，势不可挡。上海的许多

---

<sup>①</sup>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165页。

报刊尖锐地指出：“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sup>①</sup>。这不但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对投降卖国的坚强意志，而且说明了广大人民和清政府走的是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许多爱国知识分子还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漫画，反对清政府签订



反对卖国投降的书籍

《马关条约》。一些爱国艺人也把清政府的卖国罪行编成通俗易懂的唱词，四出弹唱，号召人民奋起反对卖国的《马关条约》。辽东人民得知清政府要割让辽东半岛，“痛不欲生”，他们响亮地提出要“结寨固守”，“坚壁清野”，把盘踞在东北的日军剪除干净。奉天省有二十多个举人联合上书，要求利用日本劳师远征、补给线长等弱点，发动人民打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尤其是当清政府割让台湾的消息传到台湾时，台湾省人民如午夜暴闻轰雷，奔走相告，台北人民立即“鸣锣罢市”，“捶胸泣血”，愤怒抗议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宣布饷银不准外运，制造局不准停工，台湾税收应全部留做抗日之用。他们抱定“桑梓之地，义与存亡”，“万众一心，誓

① 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五日《申报》。

同死守”的决心，宁“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sup>①</sup>。台湾人民自愿投军杀贼者，“日有千数百人”<sup>②</sup>，“一律预备与倭人决一死战，不愿将全台归于倭人，众志成城，有死无二”<sup>③</sup>。同时，他们发出檄文，愤怒声讨卖国贼李鸿章，表示与李鸿章“不共戴天”，提出不论在任何地方，凡遇到李鸿章等卖国贼者，都要悉数斩除，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反对投降的坚强决心。

但是，清政府却无视人民的愤怒呼声，决心如期交割台湾。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日下令台湾巡抚“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官员并著唐景崧饬令陆续内渡”<sup>④</sup>。与此同时，清政府特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芳为割台大臣，前往台湾办理交割手续。面对台湾人民的正义呼声，李鸿章怕得要死，他不仅诬蔑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为“凶横”，而且丧心病狂地要日本派遣“水陆各军”前去“弹压”。由于害怕其子被杀，卖国经传授无人，李鸿章再三叮咛李经芳要跟在日本舰队后面“相机进止”<sup>⑤</sup>。六月一日，李经芳同美国顾问科士达在日舰护送下到达基隆口外，由于惧怕人民的反抗而不敢登陆。科士达建议李经芳“用一个书面文件，叫做‘让渡证书’就够了，把这个文件签字交付后，所有权也就移交了，不需要再去巡视土地”<sup>⑥</sup>。这样，李经芳一日之间就办完了出卖台湾的手续。中国各族人民长期以来辛勤开垦和建设的台湾宝岛，被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割让给了日本侵略者。

① 蔡尔康等：《中东战纪本末》，《中日战争》第1册，第203页。

② 《台湾唐维卿中丞奏稿》，载《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下册，第311页。

③ 一八九五年五月十五日，《申报》。

④ 李鸿章：《译署致台抚》，《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20，第64页。

⑤ 李鸿章：《寄伯行》，《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20，第63页。

⑥ 《田贝论中日战争》，《中日战争》第7册，第485页。

五月二十七日，在卖国贼李鸿章的电请下，日军主力近卫师团从冲绳中城湾出发，乘大批船舰分路向台湾岛扑来。二十九日，一路日军从三貂角强行登陆。六月二日，日舰炮击基隆，三日，基隆失陷。日本的侵略战火已经在台湾燃烧，形势迫使台湾的所有人作出抉择。

以台湾巡抚唐景崧为代表的大地主、大官僚，他们早被日本军国主义的气势汹汹吓破了胆。他们一面和清政府密电往来，准备逃回大陆；一面又假惺惺地宣布要“抗战到底”。其实他们的抗战是假，逃跑是真，那些抗战的宣言只不过是掩盖逃跑的烟幕。果然没过几天，唐景崧一伙就乘船从台湾逃往大陆。一时没有逃掉而留在台湾的那些大地主、大官僚也暗地作好了投降的准备。这是因为在他们面前并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撇去了民族的界限，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

广大人民群众对唐景崧的逃跑愤恨至极，他们自动组织抗日义军，积极投入了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农民出身的徐骧是新竹一带义军的领袖，他激昂慷慨地向台湾同胞发出号召：台湾“吾民父母之方也，吾民之田庐在于是，子孙在于是，祖宗丘墓在于是，吾民将安归乎？诸公皆健者，义薄秋云，气吞百川，际此生死存亡之交”，要挺身而出，“人自为战，家自为守”，“举吾民之骨与全台俱尽焉，是亦亡国之荣也”<sup>①</sup>。广大群众激于爱国义愤，争先恐后地投奔徐骧组织的义军，表示愿“随骧俱死”。与此同时，新竹北埔人姜绍祖、苗栗人吴汤兴也在当地组织义军。一时台湾各地人民自动组织的义军风起云涌，迅速形成一支强大的

---

<sup>①</sup> 江山渊：《徐骧传》，《小说月报》第9卷，第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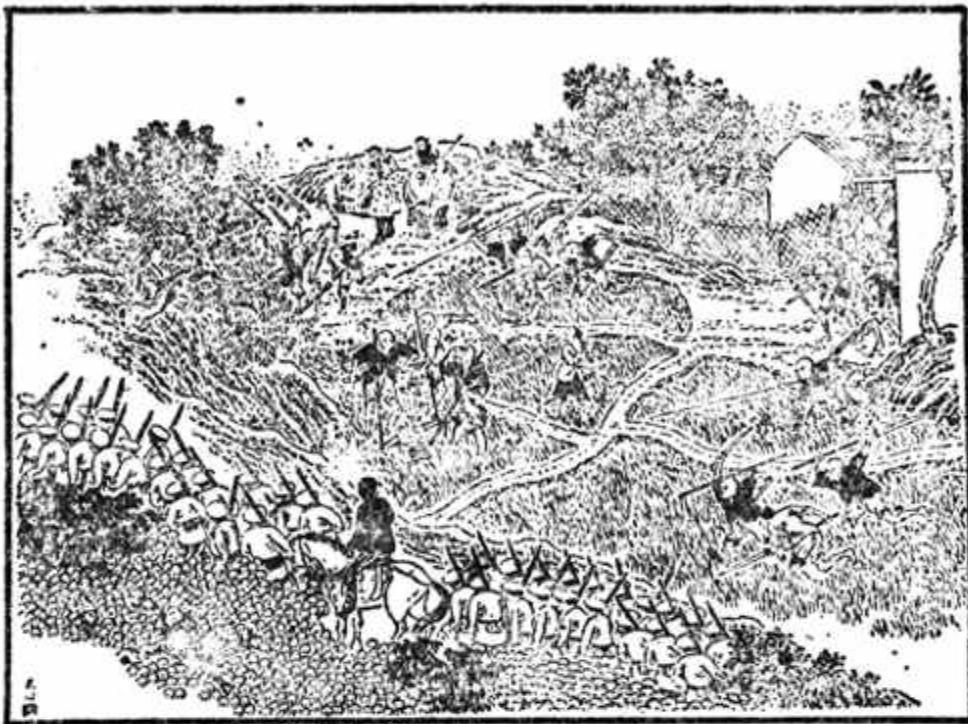
抵抗日本侵略的主力军。

在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热潮的推动下，刘永福也加入了抗日的行列。中日战争开始后，刘永福从广东南澳镇调防台湾，因受唐景崧排挤而驻兵台南。唐景崧逃跑后，他和台湾义军联络，共同抗日。

六月七日，日军攻占台北，十二日即分东、西两路南犯新竹。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分头率义军迎敌。徐骧一军在龙潭陂与东路敌人遭遇，在三角涌、三峡庄一带人民纷起参战的情况下，一举包围并全歼了日本大佐樱井氏所率领的六十多名日军。吴汤兴、姜绍祖率义军自大湖口出发与西路日军激战六天，一度击败日军，后因饷械不支退出。日军于十九日侵占大湖口，二十三日又因新竹城内富户破坏义军抗战，致使日军侵占新竹城。

新竹是台中陆上的北部门户。日寇占领后，立即在中坜镇设立兵站，四出扫荡，积极为其进一步南侵打通道路。各路义军在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的率领下，大举反攻。七月中旬在新竹城东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消灭了大批敌人。但是，终因弹药缺乏，被迫撤退。义军领袖姜绍祖也在这次战役中不幸壮烈牺牲。

为了配合义军反攻新竹的战役，台北、新竹一带的各乡义军、农民，到处截击日寇的粮食，伏击日寇的扫荡队，使敌人步步挨打，行动迟缓。六月底，日寇对新竹的平镇进行扫荡。这时由胡嘉猷、黄盛娘率领的义军在平镇附近与敌人展开激战。七月一日，日寇为攻占由义军控制的一个大院落，相继增调炮兵、工兵各一中队，从上午九时，围至下午四时，仍不能攻下。最后，日寇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不得已向中坜镇方向败退。据日方公布，为攻打这座院落，他们以数倍于义军的兵力，出动工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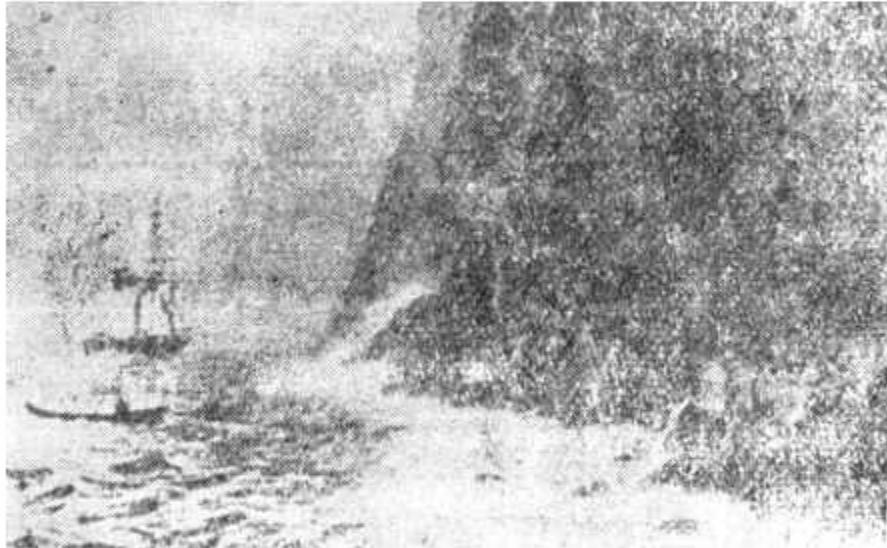
台湾人民打击日本侵略军

炮兵，费去炮弹九十一发、枪弹七千五百八十九发、炸药十五公斤，还贴上一百多名强盗的性命，终不能取胜。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台湾人民顽强反击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十三日，大溪镇人民组织的义军在福德坑伏击来犯之敌，一举消灭日寇二百多人，大获全胜。十四日，三峡地方许奇领导的义军在莺歌义渡伏击日军运粮船，打死打伤日军三十多名，缴获十八只运粮船及全部粮食。十五日，日寇从台北派出骑兵二十余名护送日军运粮船，经板桥镇向三峡前进途中，到顶埔水圳附近遭义军和当地农民的伏击，全部被歼。在广大人民的英勇反击下，日寇的南侵计划受到沉重打击。日本人竹越与三郎在《台湾统治志》一书中供认：

“不论何时，只要我军（指日寇）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青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也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

所房子里去。永远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不仅台北的情况是这样，而且整个新竹的四郊也是这样，新竹村民是以顽强和勇猛著称的。”①

八月十四日，日军进攻苗栗。刘永福派吴彭年率黑旗军战士赴援，迎战失利，苗栗沦陷。于是，刘永福又联合各军扼守大甲溪。二十二日，日军进犯大甲溪，刚过溪岸，埋伏在大甲溪南岸丛林中的吴彭年军，突然出击。日军往北溃退，慌忙渡河，刚渡一半，徐骧又率第二支伏军突然横腰杀来，日军失魂落魄，纷



台湾人民利用险峻地形伏击日军

纷落水，死伤无数。这次伏击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但因刘永福所派知县忠满率领四营援军畏葸不前，日军大部人马于二十三日又来进犯，占领大甲溪。徐骧、吴彭年等率军退守彰化，刘永福又派七星队前往增援。二十八日双方在彰化东门外的八卦山展开激战，日军近卫师团配备快枪快炮，环垒而进，义军奋勇迎击，展开了自日军近卫师团侵台以来最大的一次肉搏

① 竹越与三郎：《台湾统治志》英译本，第88页。

战。吴汤兴、吴彭年都英勇战死，七星队几乎全部壮烈殉国。

彰化陷后，嘉义告急。刘永福赶至前线筹防，并请黄荣邦、林义成、简精华等率义军助战，不久便将彰化以南的云林一带收复，歼敌数百人，扭转了战局。但是，由于台湾腹地狭小，供给有限，抗日军饷竭蹶的危机日益严重。而甘心卖国的清政府，不仅自己拒绝援台抗日，而且“严行禁止”<sup>①</sup>沿海各省人民支援台湾同胞的斗争。刘永福先后多次派人求援，遍谒沿海督抚，结果都空手而归。

在粮饷枯竭的情况下，前线各军连日忍饥与敌人奋战，毫不动摇，并希望收复彰化。九月下旬，义军在攻彰化的战斗中，损失很重，黄荣邦战死，林义成等多人受伤。十月上旬，彰化日军得到增援后，倾巢出动，乘势反扑，云林再次陷入敌手。接着又于十月十一日大举进犯嘉义，防守嘉义的黑旗军将领王德标，在城外军营中埋了许多地雷，然后弃营入城。日军不战而得军营，欣喜若狂，结果被地雷炸死七百多人。义军乘势交攻，浴血奋战，杀死大量日军，连近卫师团长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也在这次战役中受伤毙命。此后日军又调大批兵力，才攻下嘉义。

日军在攻占嘉义的同时，其第二师团从台南附近登陆，海陆三面夹攻台南。当时敌众我寡，饷械奇缺，绝大部分义军枵腹与敌激战，情况十分危急。义军领袖徐骧视死如归，冲锋在前，大声疾呼：“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sup>②</sup>数百名高山族勇士一起冲杀过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不幸徐骧中弹牺牲，为捍卫祖国神圣领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徐骧死后，日军一面调大批兵力围台南，一面进攻刘永福驻守的安平炮台，形势万分紧迫。在这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13，第7页。

② 江山渊：《徐骧传》，《小说月报》第9卷，第3号。

种严重的关头，刘永福经不起考验而动摇了。他打出“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官禄，竟然抛弃了自己率领的抗日军队，一头钻进一艘英国船底，逃回大陆，成了一名可耻的逃兵。二十一日台南被日军攻占，整个台湾被日军攻陷了。

在日寇侵占台湾的过程中，英勇的台湾各族人民在外绝救援、内缺饷械的情况下，以粗劣的武器，抵抗了一个日本近代化师团和一个海军舰队的疯狂进犯达半年之久，虽然最后失败，但给日本侵略者的打击却是十分沉重的。据戴维逊所著《台湾岛》一书的记载，日军在侵略台湾过程中被毙伤达三万二千三百一十五人。据日本官方公报所公布的缩小了的数字，侵台日军前后增援五万余人，夫役两万六千余人，战死病死的官兵四千八百余人，重伤的五百余人，因疲困劳累病倒者二万六千余人，损失几乎占全军的一半，其少将山根、中将北白川亲王都送了命。台湾人民的英勇斗争与清政府几十万军队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望风溃逃的可耻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对清政府投降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

## 二、连绵不断的台湾各族人民大起义

日军占领台南后，以为大局已定，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正式宣布“台湾平定”，并准备在一八九六年元旦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台湾人民并没有被征服，被杀绝，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留下来的清军爱国士兵，也没有因为刘永福逃走而投降，他们和台湾人民一道，毅然继续战斗。从日军宣布“台湾平定”那天起，

我台湾人民反对割占台湾的抗日斗争



到一九〇四年的十年中，台湾人民的武装起义连绵不断，如火如荼，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就在日军准备召开“庆祝”会的前一天，刘永福旧部林大北、林李成等在兰阳宣布起义，以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起义队伍很快就收复了瑞芳、头围、礁溪、罗东等地，进而包围宜兰，杀死打伤大量日军。同时还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台湾人民“驱逐倭奴，恢复中华”<sup>①</sup>。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惊恐万分，立即调兵警戒，亲自登城防守。这对日本宣布“台湾平定”是个绝妙的讽刺。事实上，在林大北起义后不久，武装暴动的烈火就燃遍了全台。

台北地区，在林大北等起义后的第二天，即一八九六年元旦晨三时许，陈秋菊、简大狮和新竹的胡阿锦等率领当地群众，聚集台北城郊，举火为号，分别从三峡、大龙磅等地进攻台北。起义军在台北转战月余，给日寇以重创。次年五月，陈秋菊等再次大规模袭击台北，使驻守台北的日军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在挥舞屠刀血腥镇压起义军的同时，又使出了另外一手——“招安”。但是，其结果，与疯狂屠杀不能征服台湾人民一样，招安诱降也丝毫不能动摇台湾人民的斗争意志。一八九九年，简大狮等人又在台北一带宣布起义。日本派兵疯狂镇压，起义失败，简大狮回到大陆，但竟被媚外卖国的清朝地方官吏抓住交给日本。简大狮怒火冲天，临死前还慷慨陈词，严厉斥责清政府的卖国罪行，愤怒控诉日本在台湾的残暴殖民统治，表现了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上海报纸上表彰他为“中国最有志气之人”<sup>②</sup>。一九〇四年五月，陈秋菊等人又一次在北部发动起义，起义军曾一度攻入台北城。

---

① 转引自杨克煌：《台湾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小史》第54页。

② 阿英：《中日战争文学集》，第63页。

台中地区，就在日寇宣布“台湾平定”不久，人民群众纷纷拿起武器反击日本殖民统治。竹山镇的起义军在陈发、陈永等领导下，配合其他义军先后收复了竹山镇、集口镇、南投镇、北斗镇、斗六镇，声威大振。他们还在斗六镇东南的大坪顶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敌人频繁残酷扫荡的情况下，以粗劣的武器，巧妙的战术，经常打击敌人；同时，“辟草莱，营商工，通山泽之货”<sup>①</sup>，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清军台东守将刘德杓，也深入台中的云林山中，发布檄文，继续抗日。更值得称赞的是，草屯镇女英雄李朱氏（李乌毛妻），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踢开孔老二那套族权、神权、夫权的束缚，毅然挥戈上阵，率领当地人民起义。这支起义军和其他各路起义军联合袭击被日寇占据的台中县城，先后击毙日寇守备队宫永大尉、宪兵团田岛中尉，歼灭敌军无数，一度收复台中。与此同时，嘉义的詹阿瑞、林添丁、黄国镇等起义军也袭击了嘉义县城的敌人，使台中的日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四处乱窜，走投无路。一九〇一年二月，詹阿瑞等再次发动对台中日寇的大规模进攻。为了进一步动员和组织群众，他们在起义军的纲领中写道：“救民脱苦，惟倭是征；定集人民，雪恨复清”<sup>②</sup>，充分表达了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决心和怀念祖国的热烈感情。一九〇三年底，詹阿瑞率领义军在与敌人激战之后被捕遇害。他那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台南地区，东港人民也举行了起义。后来又有凤山县起义军在郑吉生等领导下，先后于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连续攻打凤山县城，并袭击内埔的日寇警察办事处，歼灭不少敌人。一八九

① 洪弃父：《台湾战纪》，《中日战争》第6册，第364页。

② 转引自刘大年等：《台湾历史概述》第69页。

八年二月，日本政府派军人兼政客儿玉源太郎任台湾殖民总督。他到任后，面对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感到单用武力不能征服台湾，于是进一步采用欺骗招安的手法，以辅佐武力的镇压。他开设所谓“仁济堂”（救济院），举力所谓“飨老典”（敬老会），还派任几个汉奸当所谓“街长”、“庄长”，企图以此收买人心，平息中国人民的抗日怒火。他还打算与各地起义军控制地区划分界线，订立“互不侵犯”条款，妄图分化各地义军，破坏义军联合作战，以便各个击破。但是，英勇顽强的台湾人民，在凶残狡猾的敌人面前，既不屈服，也不受骗，仍然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继续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就在儿玉源太郎任总督的一八九八年，陈发、阮振等以嘉义、台南间的番仔山为根据地，再次举起义旗，与日寇进行长达四年的英勇斗争。同年十月，高乞等在台南发动武装起义，占领横山，后与林添丁等起义军配合，进攻日寇的店仔口警察办事处，全歼敌军。十二月十八日，林天福等率领一支三千多人的起义军进攻潮州日寇警察办事处，杀死日寇瀨户署长等，并乘胜攻占恒春。一九〇一年底，日寇在台南进行扫荡，嘉义黄茂松等领导抗日人民以放弄山为根据地，坚持斗争达十个月之久。一九〇二年黄国镇等再次在嘉义起义，誓死不屈。

台湾各族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极其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尽管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继续狡猾地使用血腥屠杀和招安诱降的反革命两手，但台湾人民始终针锋相对，“剿杀则不惧，招诱则不信”<sup>①</sup>，一直英勇顽强地与日本殖民统治者进行了五十年的战斗。

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

---

<sup>①</sup> 洪弃父：《台湾战纪》，《中日战争》第6册，第364页。

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它表明任何外来的侵略势力，妄图霸占台湾，肢解我们祖国的阴谋，都是绝对不能得逞的。

## 第四节 瓜分狂潮和人民的反抗

### 一、沙俄最先伸出魔掌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加速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伐，俄、英、法、美、日、德等国掀起了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〇年，这个世纪的最后五年，是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年代，是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大祸的年代。

在这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穷凶极恶的沙皇“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sup>①</sup>。它借口三国干涉还辽有功，首先要中国予以“酬谢”。

当时清政府为了偿付对日本的巨额赔款，急需举借外债，向洋主子伸手乞讨。借外债的消息传出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前来兜揽，争着要当债主，各国驻华公使把总理衙门的门槛都要踢破了。清政府原来有意先向英国借款，曾经征询赫德的意见，沙俄政府立即进行拦阻。一八九五年五月一日，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向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说：“闻中国拟将偿费借付日本，此事俄国户部（财政部）已筹良策，有益中国，预备商。乃闻欲向不肯合劝（还辽）之英国商借，颇觉诧异。特请代达国家，应先商俄国，方见交谊。”<sup>②</sup>法、德两国也表示愿向清政府借

<sup>①</sup>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

<sup>②</sup> 《许文肃公遗稿》卷10，第14页。

款，清政府不敢开罪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只好表示愿意向俄、法、德三国分借，并声明拟向沙俄借款五千万两。沙俄本来不愿别国染指，又嫌借款数目太少，曾经表示不满，罗拔诺夫对许景澄说：“分借不如勿借。”无奈这时候老沙皇的财力并不充裕，它只好拉拢法国合作，七月六日，在沙俄的逼迫下，许景澄与俄法银行团在彼得堡签订了《中俄四厘借款合同》，俄、法的第一批对华借款，就此拍板成交。

这个合同规定，借款总数为四万万法郎，约合银一千万两，年利四厘，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如果清政府不能按期偿还本息时，则由沙俄政府加以“垫付”，这就俨然把清政府置于它的保护之下，沙俄成为清政府的后台老板。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沙俄对华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机构——华俄道胜银行在彼得堡成立。次年二月，在上海成立了它的分行，此后在中国的北京、天津、汉口、哈尔滨等地，都设立了它的分支机构。据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声称，这个银行的任务是“巩固俄国在华的经济势力，以与英国之既得优势对抗”<sup>①</sup>。该行资金预定为六百万卢布，后来陆续增加。该行的董事都是沙俄政府高级官员，董事会长是沙俄的亲王乌赫唐斯基，银行的一切活动都听命于沙俄政府，沙俄当时负责远东外交事务的官员罗生说：“（该行是）一个政治金融的混合机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略加伪装的俄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而已。”<sup>②</sup>

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之初，沙皇尼古拉二世就以特许状的形式，授予该行以十分广泛的权利。根据这个特许状，它不仅在中

<sup>①</sup>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73页。

<sup>②</sup> 罗生：《四十年外交》第1卷，第198页。转引自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140页。

国经营一般银行业务，还要攫取中国政府征收赋税、发行货币、经营国库业务、代中国政府偿付债务利息以及在中国敷设铁路和电线等权利。例如，该行曾在中东铁路沿线大量发行俄国纸币，到“东清铁路告成，俄之卢布、羌帖遂通行铁路所经之地，操纵财政，市间不见官币”<sup>①</sup>。不仅东北，它在新疆等西北地区也大量发行纸币，掠夺中国资源，破坏中国的民族经济。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sup>②</sup>

沙俄为了把它的魔爪伸向中国东北，积极修筑中东铁路。一八九五年沙俄的西伯利亚铁路已经修到外贝加尔湖，关于铁路的走向问题，沙俄统治阶级内部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沙皇批准了其财政大臣维特提出的方案：铁路应该从赤塔以东入满洲里，斜穿过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一直到达海参崴。后来是按照维特的方案修筑了，这就是中东铁路，当时还叫做东清铁路。与此相联系，还有一个支线的修筑计划，这就是从哈尔滨往南再修一条铁路，一直修到旅顺和大连，这后来也完成了，这就是南满铁路。通过中东铁路控制北满，通过南满铁路控制南满，这样一来，中国东北就成了沙俄的天下，这就是维特方案的最终目的。关于这一点，维特在一八九六年四月十二日给沙皇的报告中，作了赤裸裸地自我招供：“（该路）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相当数目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的出现，一

① 《财赋志·币制》，《黑龙江志稿》卷21。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92页。

种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sup>①</sup>所谓使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就是在中国内部组织叛乱，然后宣称“申请归并”于沙俄，借以掠夺中国领土。

维特方案批准以后，一八九五年八月沙俄未经清政府同意，就擅自派人到东北勘察线路。一八九六年六月又借李鸿章赴俄的机会，用秘密条约的形式肯定下来。

原来，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定于一八九六年五月在彼得堡举行，各国均派特使致贺，清政府拟派布政使王之春前往。但是，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提出抗议说：“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鸿章）耳。”<sup>②</sup>清政府不敢违拗沙俄政府的意旨，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并以邵友濂为副使，到俄国去，顺便也到英、法、德、美四国访问，以联络“邦交”。

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带着一大批随从出国访问。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得到李鸿章出访的消息后，邀请他访问的函电如雪片般飞来，谁都想把李鸿章先抓到手里，谁都想从他身上捞到点油水，即索取一些中国的权益。但是，沙俄那里舍得放手，沙皇连忙派乌赫唐斯基公爵坐专轮到苏彝士运河迎接，特将李鸿章由黑海送往彼得堡。五月三日，李鸿章与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开始举行秘密谈判。为了达到卑鄙的目的，沙俄不惜采取卑鄙的手段，对李鸿章及其随员施行贿

<sup>①</sup>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69页。

<sup>②</sup> 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60页。

赂<sup>①</sup>。六月三日，双方签订《中俄密约》，其主要内容是：一、当日本侵占俄国的远东领土及中国领土时，中俄两国海陆军应互相援助，并互相接济军火粮食。二、在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期间，俄国军舰在必要时可以进出中国的一切港湾，当地中国官吏应以物品供应。三、中国允许俄国于黑龙江、吉林两省地方，修造铁路以达海参崴，修路事项，由华俄道胜银行经办。四、铁路建成以后，俄国可以利用它载运军队、粮食和军火器材。这个密约，打着中俄军事同盟的幌子，从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为了共同对付日本的侵略，实际上是以沙俄在东北修筑铁路为主要内容，成为沙俄控制中国东北的一条锁链。当时清政府和沙俄恐怕日本方面知道，更主要的是害怕中国人民的愤怒声讨，所以这个条约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是秘密的，李鸿章后来到别国访问时，列强纷纷猜测和询问，但李鸿章守口如瓶，绝不认账<sup>②</sup>。

《中俄密约》签订不久，沙俄政府财政大臣维特派遣华俄道胜银行总办罗启泰，和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于九月八日在柏林签订了《中俄合办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决定由这个银行特

① 关于这次行贿的情形，据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记载，乌赫唐斯基公爵取得维特同意后，与沙俄财政部总务厅长罗曼诺夫、华俄道胜银行董事罗特斯坦商定，由华俄道胜银行拨出三百万卢布，作为行贿专款，名曰“李鸿章基金”。此项专款由沙皇特降密旨予以批准。沙俄的计划是：铁路合同批准时付一百万，路线勘定时付一百万，铁路完成时付一百万。后来乌赫唐斯基公爵来华访问时，在上海曾交付一百万卢布予李鸿章。这是第一次行贿与成交。清朝政府是腐朽的，所以有这样受贿的卖国贼与墨吏；但沙皇俄国政府也是腐朽而且卑鄙的，卑鄙到用国家的名义行贿，用最高统治者沙皇的名义行贿，这真是别开生面的秽行。

② 十五年以后，到一九一〇年，清朝驻英公使、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为了替他父亲的卖国行为洗刷，曾在当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伦敦《每日电讯》报上，透露了这个密约的基本内容，但中俄两国政府都没有吭声。一九二一年华盛顿会议时，北洋军阀政府曾把密约的内容摘要宣布，亦未宣布其全文。直到十月革命以后的一九二四年，苏联政府才把全文公布，这个秘密才大白于天下，但这已经是大约三十年以后，清政府和沙俄政府均已覆灭，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设“中国东省铁路公司”，负责中东铁路的修筑事宜。二十日沙俄政府又单方面提出一个《中东铁路公司章程》，不管中国方面同意不同意而强制执行。根据这些条约和章程，中东铁路于一八九七年八月十六日开始动工，到一九〇三年七月一日全线通车。这条铁路成为沙俄控制中国东北的重要工具。它名义上是中俄合办，实际上自“会办”以下全部要职都是俄籍人员把持，中国只得到一个挂名的“督办”。铁路的一切规章制度，铁路的宽窄和长短，都是俄国标准。不仅如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还攫取了铁路两旁区域内的军警护路权、采矿权、采伐森林权、开垦土地权、内河航行权，以及立法、司法、行政、文化和教育等特权。

中东铁路是用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筑成的，建路的大量器材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掠夺的。沙俄通过这条吸血管，疯狂地吮吸着中国人民的膏脂，它每年为沙俄政府提供几千万卢布的利润，仅一九一三——一九一六年的纯收益即达一亿六千万卢布，几乎等于铁路造价的三分之一<sup>①</sup>。铁路沿线地区成为“国中之国”，沙俄会办成了殖民地式的“总督”。他们还在沿线地区开设了轮船公司、面粉公司及其他企业，并建教堂、设学校，形成一套殖民统治的机构和制度。不过几年，整个东北全境都受到了沙俄的干预。

继中东铁路以后，沙俄又把它的魔爪伸向中国辽东半岛，企图夺取旅顺和大连，建立它在远东的海军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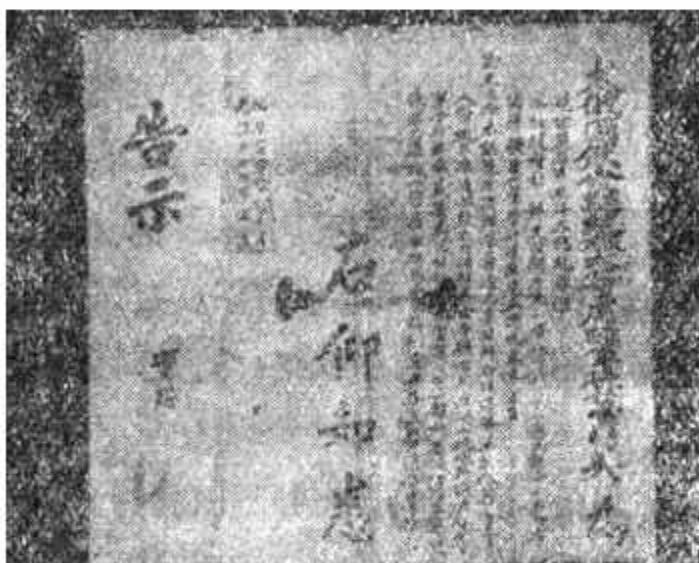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沙俄外交大臣穆拉维夫上奏沙皇说：“我们应不失时机，即由俄国舰队（假使我国舰队今日已具有既足以达到所计划的，而且还足以防止可能发

---

<sup>①</sup> 久间猛：《北满之政治经济价值》，一九二三年日文版，第179页。

生纠葛的巨大力量)占领大连湾(由外交部的材料看来,目前无疑是具有明显优越性的港口)。”他还叫嚷说:“东方民族最尊重力量及威力;在这些民族的统治者面前耗费任何建议和忠告,都不能达到目的。”<sup>①</sup>尼古拉二世对这个建议的批语是“十分正确”,并召开了特别御前会议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立即执行这项建议。就这样,十二月十五日沙俄打着监视德国行动的幌子,派遣舰队占领了中国的旅顺和大连。

占领旅大以后,沙俄又无耻地撒谎,它通知清政府说:“俄国并无夺取中国领土之意,占领旅大,系为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之侵略。德国军队撤退后,俄国亦立即撤退。”<sup>②</sup>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七日,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出,要求俄国撤退旅顺口的驻军,尼古拉却别有用心地说:“我真心关切中国,前后无异,请中国无疑。”他要求清政府照顾两国的“友谊”,允许中东铁路“将来倘通至黄海尤好”<sup>③</sup>。沙皇政府为了达到侵占旅大的目的,它对清政府进行威胁恫吓,接着又施出卑鄙的伎俩,命令其驻华代表朴科第运用行贿手段,第二次收买李鸿章,分别送给李鸿章五十万卢布、张荫桓二十五



俄国侵占旅大后所发告示

①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85页。

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第213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29,第18页。

万卢布，作为卖国的报酬<sup>①</sup>。卖国贼李鸿章在接受贿赂以后，便积极怂恿清政府答应此事。三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和张荫桓代表清政府和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九款，五月七日莫拉维诺夫和许景澄续订《旅大租地续约》六款。通过这两个条约，沙俄强占了中国的旅顺和大连，租期二十五年，沙俄并有权在旅大建筑炮台，驻扎军队，它把这里改为沙俄的“，按照俄国的办法设置了“总督”，还有不隶属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俄国人控制的税务司。通过这两个条约，沙俄还取得了从哈尔滨至旅大，从牛庄至鸭绿江之间修筑两条铁路的权利。这样一来，沙俄不仅有了横贯东北全境的中东铁路，还有了控制辽东半岛的南满铁路。这是对于中国领土主权的凶横侵犯。

但是，沙俄的侵略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有更加狂妄的野心。它要从东北到华北，越过长城脚下，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的腹地。一八九八年一月三十日，英国驻俄大使欧格讷写信给英国外交大臣沙士伯雷说：“一月二十二日我会见了维特。这位大臣……拿出一份中国地图，用手指着直隶、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并且说：‘俄国迟早总得吞并这一大片领土。’接着，他手指着兰州说：‘西伯利亚铁路将来要修筑一条支路到达这个城市。’他已经有了关于这条支路的距离、修筑费用等等极其详细的材

---

<sup>①</sup> 关于这次行贿情形，据《红档杂志》记载，朴科第（一译巴克洛夫）当时致维特的电报说：“余今日面付李鸿章银五十万两，李大为欣慰，嘱余向阁下致谢。……余未得便交银与张荫桓，盖彼行为远较谨慎也。”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讲到这次行贿也仅提到李鸿章，而没有谈到张荫桓。李鸿章的受贿，这已经是案可查的第二次了。史料记载，李鸿章共受贿五次，总数字不详，卖国贼就是这样，每受贿一次，便出卖一次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清政府已经腐朽到发霉的程度，李鸿章便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料。”①

甲午战后，一八九六年清政府计划修筑芦汉铁路（从芦沟桥到汉口），为了争夺该路借款权，各帝国主义之间互相勾心斗角，磨牙欲噬。沙俄与法国相勾结，利用较小的帝国主义比利时出面，于一八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在武昌签订了《芦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取得了四百五十万英镑的借款权。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又通过中比《芦汉铁路借款详细合同》及行车合同，取得了对该路的修筑权和经营管理权，并由华俄道胜银行掌握其财政权。这时，山西商务局正拟修筑正太铁路（从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华俄道胜银行贷款六百八十万两，企图加以控制。为了阻滞沙俄势力的南下，英国以“援助”清政府修筑从山海关到新民屯、牛庄的铁路为名，与中国缔结了《关外铁路借款条约》，借款二百三十万英镑。英国竟敢向东北伸手，这使沙俄大为恼火，英俄互斗，经过一段酝酿，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双方达成协议，订立所谓《英俄铁路范围协约》，这两个强盗偷偷地议定：俄国保证不在长江流域进行铁路投资，同时也不直接或间接妨碍英国在长江流域的铁路投资；英国保证不在长城以北地区进行铁路投资，同时也不直接或间接妨碍俄国在长城以北地区的铁路投资。英、俄就这样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的主权，赤裸裸地干着分赃勾当。

## 二、划分势力范围和“门户开放”政策

跟着沙俄的后面，英、美、德、法等国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也

---

① 古奇编：《关于大战缘起的英国文件1898—1914》第1卷，第8页。

伸向了中国。它们输出资本、“租借”军港、划分势力范围，把中国推向被瓜分的边缘。

帝国主义各国争先恐后的对华投资，这是甲午战后列强侵华的一个显著特征。

甲午战争后，列强援引《马关条约》的规定，在中国大办工矿企业，以攫取高额利润。一八九五年，有英国资本的怡和纱厂设立，一八九六年有美国资本的老公茂纱厂、鸿源纱厂、德国资本的瑞记纱厂、日本资本的上海纺织公司第一厂、第二厂、三井制药厂和英国资本的增裕面粉公司等设立。此外，为了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英国还组织了一个“福公司”，以贿赂和威逼手段，在一八九八年先后与山西、河南地方当局签订了《山西矿务合同》和《河南矿务合同》，取得许多特权。据统计，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〇年，外资在华设厂共计九百三十三家，其中资本在十万两以上的就有二十家。和资本输出的同时，帝国主义的商品也象潮水一样的流入中国。据海关统计，一八九四年进口货总值为一六、二一〇万海关两，一八九八年便增至二〇、九五七万海关两。而中国原料的出口，也猛烈增加，一八九四年土货出口总值为一二、八一〇万海关两，一八九八年便增至一五、九〇三万海关两。

帝国主义与设厂同时，又在中国纷纷扩大银行，发行纸币，吸收存款，从财政金融上对中国进行控制。到一九〇〇年计有英国的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有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等，它们有的设立总行，有的设立其分支机构，美国在一九〇一年则设立了花旗银行。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是真正布满了世界各国。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

是设在殖民地的银行及其分行。”①

通过政治借款既可获得经济利益，又可发展政治势力，这是帝国主义进行资本输出的重要手段。在借款过程中，列强争着要当债主，各国驻华公使经常到总理衙门大吵大闹，清朝官员则低声下气，卑躬屈节，一律不敢开罪。这时候的帝国主义已经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而总理衙门也变成了拍卖行，拍卖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继第一次大借款即俄法借款后，清政府因为不敢开罪各帝国主义，于一八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又向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这是第二次借款；一八九八年三月一日又向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这是第三次借款。通过这三次大借款共合银约三万万两，加上利息，竟达六万万两，是甲午战前清政府对外借款总数的九倍以上，数量之大，实在惊人。这些借款，不仅利率高，折扣大，而且附有各种各样苛刻的政治条件。如一八九八年的借款，折扣即达百分之八十三，年息四厘五，以四十五年不改变英国控制中国海关为条件，除以海关税收作抵押外，又加上由海关征收盐税、厘金作为偿还债务的担保。

掠夺铁路的修筑权，或间接向铁路进行投资，这是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输出资本争夺中国权益的又一重要手段。甲午战后是中国铁路兴建的第一次高潮时期，在这期间兴建的几条重要干线是：中东、胶济、滇越、京汉、粤汉、津浦、沪宁等干线。但是，这些铁路中国自建的不多，外国投资的却不少。在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四年这十年间，由外国资本直接投资经营的有沙俄投资的中东铁路（一八九七年开工，一九〇三年通车），德国投资

---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87页。

的胶济铁路（一八九九年开工，一九〇四年通车）和法国投资的滇越铁路（一九〇三年开工，一九一二年通车）三大干线。由列强借款给清政府而修筑的有京汉铁路（一八九七年开工，一九〇六年通车）、粤汉铁路（一九〇一年开工，一九一八年通车）、道清铁路（一九〇二年开工，一九〇七年通车）、沪宁铁路（一九〇三年开工，一九〇八年通车）、汴洛铁路（一九〇四年开工，一九〇八年通车）等干线。据英国方面统计，从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八年，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共攫取了长达六千四百二十里的铁路投资权利，其中英国占二千八百里，沙俄占一千五百三十里，德国占七百二十里，比利时（背后是俄法资本）占六百五十里，法国占四百二十里，美国占三百里。

这些说明，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的对华投资有了猛烈的增长，它和甲午战前以商品输出为主要特点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这些无孔不入的经济渗透，配合着它的政治掠夺，正在形成着对于中国财政经济的垄断和控制，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已经大大地加深了。

与对华资本输出相适应，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军港，划分势力范围。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法国外长哈洛托借口法国多次“帮助”中国（主要指三国“干涉还辽”），要求中国驻法公使龚照瑗就中越通商等问题磋商“通融办法”<sup>①</sup>。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也奉命在北京大肆活动。清政府虽然看出了法国是“迹近要挟”，但也不敢拒绝，乃于六月二十日由奕劻和徐用仪代表清政府与施阿兰签订了《中法商约》等不平等条约，商约中规定中国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河口和思茅四处通商，并许可法国派

<sup>①</sup>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11，第23页。

驻领事，法国还取得了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境内的开矿权和筑路权。一八九六年六月五日，清政府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一个筑路合同，即由法商费务林公司修筑从越南同登到中国广西龙州的铁路。

一八九七年八月，德皇威廉二世访问沙俄，就侵占中国胶州湾问题，同沙皇尼古拉二世取得默契。同年十一月，沙皇尼古拉二世致电德皇威廉二世，赞同德国占领胶州湾，并命令沙俄驻北京代办“支持德国代表”<sup>①</sup>。

一八九七年山东曹州府巨野发生教案，“巨野教案”遂成为德国向中国夺取胶州湾的借口。原来，在此前一年，由于山东德国传教士横行作恶，兗州、滋阳就发生了人民“聚众”抵制德国主教安治泰入城传教的斗争。到这年十一月，巨野大刀会群众进攻张家庄天主堂，杀死德国传教士能方泽、韩理二人，接着，济宁、兗州、寿张、菏泽、单县、城武等州县群众纷纷捣毁教堂，鲁西南的反洋教斗争进入高潮。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德国即以此为借口，派舰队进入胶州湾，压迫胶州湾守将章高元退出炮台，立即加以占领。

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德使靖海与李鸿章、翁同龢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九十九年，并允许德国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的矿产，由德国开采，山东从此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关于教案本身，山东巡抚李秉衡被革职，赔偿教堂损失，代修教堂及教士住宅，屠杀和监禁爱国的反洋教人民，清政府成为代帝国主义执行压迫中国人民的傀儡和奴才。

---

<sup>①</sup>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91页。

法国跟在德国后面，也提出了租借广州湾的要求。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三日，法国代办吕班提出照会，要求中国不得把云南、广西和广东三省让与他国；中国邮政局总管由法人担任；法国修筑自越南至云南昆明间的铁路；法国在中国南部沿海岸设立“趸船”之所。法国外长哈洛托对中国驻法公使庆常说：“山东允德借地及铁路数道，法独向隅，议院不平，请派舰重办。所开四事，必须照准。如中国和商，法必顾大局，否则不得不筹办法。”<sup>①</sup> 经过反复交涉，清政府终于屈服，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六日广西提督苏元春和法国提督克学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把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借给法国，租期九十九年；清政府承认了云南、广西和广东三省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他国不得染指，中国允许法国修筑从越南边境到中国云南昆明和从广州湾赤坎到官铺之间的铁路，并敷设电线；中国将来设立独立的邮政局时（此际邮政局归海关办理，一切大权操于赫德之手，所以法国人要来抢夺），聘请法国人“邦办”。此后，法国还取得了四川铁矿和金矿的开采权。

德国租借胶州湾，沙俄租借旅大，法国租借广州湾，这一连串的侵华行动，引起了在中国拥有很大利益的英国的极度不满。英国认为它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已经受到严重威胁，于是，便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要向中国租借九龙半岛和威海卫。三月二十五日，当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字前两天，英国政府即训令其驻华公使窦讷乐说：“由于总理衙门接受了俄国租借旅顺口的要求，渤海湾内的均势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因此，必须用你认为最有效的和最迅速的办法，取得在日军撤退后占领威海卫的优

---

<sup>①</sup>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31，第4页。

先权。占领条件必须和俄国占领旅顺口的条件相同。英国舰队已经从香港出发，开往渤海湾。”<sup>①</sup>窦讷乐为此在总理衙门大吵大闹，说是沙俄既已租得旅大，英国就“非租借山东之威海卫停泊兵轮，不足以资抵制”<sup>②</sup>。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奕劻、廖寿恒两人代表清政府与英国公使窦讷乐签订了《威海卫租借专条》，其中规定威海卫及其附近海面，包括刘公岛、威海卫湾中的群岛及威海卫沿岸十英里之陆地，租与英国，租借办法完全仿照沙俄的一套。日本的军队刚刚撤走，英国的军队立即进来，这真正是前门走虎，后门进狼。

英国不仅强租威海卫，而且还要占领九龙半岛。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三日，清政府同意法国租借广州湾的第三天，英国代理外交大臣巴尔福就训令其驻华公使窦讷乐，提出了租借九龙半岛及其他一些要求。窦讷乐对总理衙门进行了种种讹诈和威吓，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即：九龙半岛包括大鹏湾和深圳湾租与英国，租期亦为九十九年；允许英国修筑沪宁铁路；清政府不把西南诸省的筑路权和开矿权，独让与法国；清政府不把广东和云南两省让与他国。

日本虽然刚刚在甲午战争中从中国获得大量特权，但当它看到各帝国主义纷纷向中国下手的时候，它也迫不及待地企图分得一杯羹。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发出照会，“请清国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之地让与或租与别国”。二十六日，清政府答复说：“查福建省内及沿海一带均属中国要地，无论何国，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他。”卖国的清政府同意了福

<sup>①</sup> 《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号，一八九八年，第54页。转引自胡滨：《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第144页。

<sup>②</sup>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32，第7页。

建是日本特定的势力范围。

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美帝国主义虽然迟来一步，但其野心更狂妄，手段更狡猾。美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时在工业生产上已经突飞猛进，超过了英国和法国。但是，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四年的南北战争以后三十年间，美国主要是把力量用在对南北美洲的侵略上，对于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它感到它的手还没有那么长，勉强伸过来还有些吃力。甲午战争前后，它采取了扶植日本侵略的政策，妄想借日本的力量，从中捞取一些好处。后来日本是壮大了，而且打败了清政府，但美国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利益。一八九八年美国与西班牙进行了帝国主义战争，美国战胜，取得关岛和菲律宾为殖民地，同年，又正式并吞了夏威夷群岛。这样，美国就为自己建立了跨过大西洋而达到中国的跳板。

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争斗，在中国居于传统优越地位的英国看来，不是什么有利的事情；在依靠强大的经济力量，企图把中国置于自己支配之下的美国看来，也不是什么有利的事情。这样，英国和美国就有了在对华政策上暂时合作的可能性。一八九九年九月六日，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笼的。美国对其驻英、俄、法、德四国大使发出训令，要他们各向其所在国政府提出这个政策来加以协商。十三日，美国又训令其驻日本和意大利大使，提出同样的要求来进行交涉。英国对此比较满意，首先进行答复，它表示各国均赞同，英国愿意接受此项建议。其他各国由于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产生种种矛盾，也企望相互缓和一下，因此亦陆续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建议，德国和俄国并且宣布了胶州湾和旅大为自由港。美国这个政策，获得了各帝国

主义的一致赞成，并把他们互相之间为争夺对华权益而愤怒咆哮的状态“缓和”下来了。

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就是承认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各项特权，同时要求列强在自己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内，在征收铁路运费、港口税收方面，不实行对别国不利的区别对待；在港口装卸的一切货物，由中国政府按条约税则规定的办法征税。这个政策，要求列强开放在华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使美国垄断资本能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运用自己优势的经济力量，尽量掠夺中国，并逐步排挤其他列强，最后达到独吞中国的目的。同时，这个政策，也暂时缓和了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把一伙强盗联合起来，共同宰割中国。

在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下，甲午战后的中国出现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图画，四面八方到处是磨牙欲噬的野兽般的外国侵略者，它们象一群疯狗一样，妄图把中国这块“肥肉”撕裂殆尽。

### 三、中国人民反瓜分浪潮

甲午战后，面对着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和封建统治者的祸国殃民之政，以农民和城市贫民为主体的各阶层人民，掀起了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浪潮。

沙俄侵占旅大后，曾向当地人民强迫征粮，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刘家店的群众奋起反击，沙俄侵略军狼狈逃窜。次日，沙俄派重兵前来镇压，开枪射击，打死群众三十多人，又乘马追砍，死伤群众七十余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刘家店惨案”<sup>①</sup>。同年

---

<sup>①</sup>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29，第2、5页。

四月，沙俄侵略军进攻辽东半岛的金州，金州军民曾经予以猛烈的抵抗。俄军进驻金州后，擅自设卡征粮，强行勒索，金州人民奋起抗捐和抗粮，使沙俄军队在金州无法立足，终于被迫退出<sup>①</sup>。沙俄在修筑中东铁路时，到处强占民地，同样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一八九八年盖州南乡人民因俄国修路“强占田地”，起而斗争，他们不怕威胁，不惧镇压，终于迫使沙俄侵略者“迁有庐墓绕道改画轨线”<sup>②</sup>。一八九九年秋，奉化（梨树）群众也因沙俄强占土地，筑路开矿，奋起反抗，给了沙俄侵略者以狠狠的打击。

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山东人民愤怒地反击侵略者。早在一八九七年，山东兰县农民就曾经起义，发布檄文，宣称要把巴结洋人、欺压人民的“瘟官”“碎尸万段”，并且要把“洋人”驱逐出境。一八九九年德国组成“山东铁路公司”及矿务公司，要在胶济沿线筑路开矿，他们恣意霸占土地，威胁人民生计。六月，高密大吕庄人民忍无可忍，“乘势拔去路桩，聚围公司”，德国侵略者借口护路，竟派兵弹压，屠杀大吕庄群众二十多人，造成“大吕庄惨案”。消息传出，附近各乡人人切齿痛恨，李金榜，孙文“率众持械阻工，拆毁木架”<sup>③</sup>，与德军进行武装战斗，迫使德国的筑路计划一度停顿。

一八九八年四月十日，中法在北京商谈租借广州湾的具体条件，决定派员前往查勘界址，广州湾地区人民闻讯后群情愤激，起而抗争。由于人民的斗争，使查勘界址的工作无法进行，以致一直推迟到一八九九年十月才告完成。法国占领广州湾以后，侵略军“四出奸淫，打死文士，枪毙多命。……九月（一八九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30，第18页；卷131，第7页。

② 《盖平县志》1930年版，卷3，《职官志》，政绩，第25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42，第22—23页。

九年十月）后法人竟迭次开炮出队，攻打村落。百姓不能束手待毙，因联络应敌，以顾身家”<sup>①</sup>。广州湾人民起义后，法国派遣军队两营，前往镇压，清政府也派广西提督苏元春前往“会办”，中外反动军队的联合进攻，更加激起了反抗的怒潮。十一月初，广州湾附近遂溪县乐石地方人民杀死法国兵头二人，法国以此为借口，扩大事态，血腥镇压起义者，并要求将两广总督谭钟麟革职，以李鸿章代之，还乘机索取了高州、雷州等处矿产开采权和黄埔铁路的修筑权。

在上海，一八九八年七月，法国强行扩展法租界，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以示抗议。据记载：“甬（宁波）人多为洋人服役，已一律停工罢市，……粤人又群趋附和，聚毁法捕房外墙电灯，被枪轰伤华民三十余人，毙十二人。”<sup>②</sup>上海人民以惨重的牺牲阻止了法国侵略者扩充租界的阴谋。

英国租借九龙半岛以后，情况也很不妙。据记载：“（一八九九年四月）新安（九龙原属新安府）民风强悍，租界内村庄不下万户，……闻租与英国管辖，咸怀义愤，不愿归英管。乃港官未交收租界之前，两次遣兵径至租界内。……于是，租界内各乡聚众，扬言集资备械，专与洋人为难。众情汹汹，不可复遏。”这是九龙人民反租借斗争的开始。接着，“三月初六日（四月十五日），土民数千聚集大埔墟山坡，开挖坑堑，拒阻英兵。英派印度兵……往逐，开放枪炮，互有伤亡。初七日（十六日），复与土民相攻，……乘民不备，升竖英旗，作为接收管理，土民纠约壮丁出斗，固结莫解”<sup>③</sup>。中国人民就是这样的英雄好汉，他们不顾卖国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41，第8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33，第3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38，第28页。

政府的卑屈投降，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和沿海地区中国人民反租借反瓜分斗争的同时，在内地各省不断开展的抗捐抗租的斗争，组成了这个时期人民斗争的另一条战线。

在这期间，清政府为了支付巨额赔款，陆续增加了盐、茶、糖、烟、酒各种捐税和厘金，各地广大群众抗租、抗捐、抗税的斗争和抢米风潮风起云涌，声势愈来愈大。一八九五年，甘肃发生回民暴动，参加者达数十万人。一八九八年，广西玉林人民在李立亭的领导下，举行起义，他们一度击败清军，人数曾达十一万人，起义军占领了浔州、玉林、博白、贵县等地，发出檄文，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立誓驱逐洋人”。全州、灌阳、兴安、泗城、东兰等地人民起而响应。同年，苏北、皖北和河南都发生大刀会、小刀会起义，起义者少则数百，多则数万不等。

这期间的农民暴动和农民起义，已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不同。那时，农民起义的矛头主要是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地主阶级剥削的，特别是对于比较偏远的省份和广大农村说来，更是如此。但是，到十九世纪末叶，被帝国主义瓜分和亡国灭种之祸已在眼前，帝国主义通过传教士又把它的魔爪伸入于穷乡僻壤，修路和开矿的“洋鬼子”到处出现，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痛切地感到这种巨大的变化，农民起义不仅反对封建剥削，也愈来愈显著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了。







